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九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4 $\frac{3}{4}$ · 插頁 8 · 字數 592,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24 定價（四）2.40 元

目 录

第九卷說明	VII—XXVII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顛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馬志尼在倫敦。——土耳其	3—13
弗·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点	14—19
卡·馬克思。倫敦的報刊。——拿破侖在土耳其問題上的政策	20—23
弗·恩格斯。土耳其問題	24—30
卡·馬克思。柏林密謀	31—34
弗·恩格斯。歐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35—40
卡·馬克思。柏林密謀。——倫敦警察局。——馬志尼。——拉德茨基	41—43
卡·馬克思。希爾施的自供	44—48
卡·馬克思。新的財政把戲或格萊斯頓和辨士	49—55
卡·馬克思。內閣的成就	56—64
卡·馬克思。菲格斯·奧康瑙爾。——內閣的失敗。——預算	65—71
卡·馬克思。英鎊、先令、辨士，或階級的預算和這個預算對誰有利	72—76

- 卡·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
——預算77—86
- 卡·馬克思。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賄賂。——
联合內閣的預算87—95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96—100
- 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101—108
- 卡·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09—116
- 卡·馬克思。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顛國債
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117—123
- 卡·馬克思。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
其問題124—128
- 卡·馬克思。土耳其問題。——“泰晤士报”。——俄
国的擴張129—131
- 卡·馬克思。俄国的欺騙。——格萊斯頓的失敗。——
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132—142
- 卡·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43—150
- 卡·馬克思。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問
題。——印度151—159
- 卡·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內閣对俄国的
的纵容。——預算。——报纸附刊稅。——議会的
舞弊160—166
- 卡·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結果167—176
- 卡·馬克思。印度問題。——爱尔兰的租佃权177—183
- 卡·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
人运动184—196

- 卡·馬克思。土耳其战争問題。——“紐約論壇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197—209
- 卡·馬克思。*累亚德的质詢。——圍繞着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210—217
- 卡·馬克思。俄土糾紛。——不列顛內閣的詭計和詭辯。——涅謝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問題.....218—227
- 卡·馬克思。緬甸战争。——俄国問題。——外交官的有趣信件228—236
- 卡·馬克思。战争問題。——議會动态。——印度.....237—245
- 卡·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246—252
- 卡·馬克思。政府在財政問題上的失敗。——馬車夫。——爱尔兰。——俄国問題253—263
- 卡·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論东方問題。——沙皇宣言。——丹麦264—270
- 卡·馬克思。广告稅。——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271—277
- 卡·馬克思。战争問題。——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議會动态.....278—290
- 卡·馬克思。烏尔卡尔特。——貝姆。——土耳其問題在上院291—298
- 卡·馬克思。土耳其問題在下院299—312
- 卡·馬克思。大陆和英国的情况313—320
- 卡·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321—323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 卡·馬克思。粮价上漲。——霍乱。——罢工。——
海員中的运动 324—326
- 卡·馬克思。致“人民报”編輯 327—329
- 卡·馬克思。*維也納照会。——美国与欧洲。——苏
姆拉来信。——皮尔的銀行法令 330—340
- 卡·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341—349
- 卡·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
經濟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設 350—359
- 卡·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經濟危机的
征兆 360—371
- 卡·馬克思。*倫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 372—378
- 弗·恩格斯。俄軍在土耳其 379—385
-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勳爵 387—461
- 第一篇 389
- 第二篇 398
- 第三篇 405
- 第四篇 418
- 第五篇 429
- 第六篇 436
- 第七篇 443
- 第八篇 451
- 卡·馬克思。战争問題。——金融状况。——罢工 462—471
- 卡·馬克思。*土耳其宣言。——法国經濟状况 472—476
- 卡·馬克思。*德勒克吕茲被捕。——丹麦。——奥
地利。——“泰晤士报”談对俄战争的前景 477—479

弗·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480—485
弗·恩格斯。神圣的战争	486—490
卡·马克思。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491—500
卡·马克思。*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 矿工	501—506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507—514
弗·恩格斯。俄军的失败	515—517
卡·马克思。工人问题	518—521
卡·马克思。繁荣。——工人问题	522—529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530—536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	537—571
卡·马克思。*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 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 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	572—579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	580—587
卡·马克思。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	588—591
卡·马克思。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592—601
卡·马克思。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602—608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	609—612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613—619
注释	623—69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99—712
人名索引	713—749
期刊索引	750—753

地名索引	754—764
------------	---------

插 图

載有卡·馬克思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的“紐約每日 論壇報”原版的一部分.....	148—149
英国佔領印度图(十九世紀中叶)	244—245
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的一頁,上面記有发送馬克思和恩格 斯的文章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日期.....	361
載有卡·馬克思的“帕麦斯頓勳爵”这組文章的第一篇的“人 民報”原版的一部分.....	388—389
卡·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第一版的扉頁.....	539

第九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3 年 3 月至 12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論文和通訊，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发表在美国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端反动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全被禁止。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文章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机会同群众来往和影响輿論。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起为該报撰稿。从那时起，在“論壇报”上写作政論的工作就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以私人关系托他写文章)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馬克思除了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稿之外，还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了一些文章，該报从 1852 年 5 月起开始出版，主編是厄·琼斯。此外，馬克思为“論壇报”写的文章，也有个别篇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报”上，还有几篇曾部分轉載在德文报纸“改革报”上，該报在約·魏德迈的积极参加下从 1853 年 3 月起在美国出版。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政論文章是同他們的理論工作和他們的全部党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馬克思結合着报刊工作来研究政治經濟学的重要問題，研究世界历史，其中包括各殖民

地国家的历史、經濟、社会制度以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恩格斯則繼續系統地研究軍事科学，研究語言学問題、斯拉夫語言和东方語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給報紙写文章。同时，报刊工作也使他們密切注視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为科学研究工作搜集事实和积累材料。例如，馬克思为“論壇报”写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經濟方面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后来用在“資本論”中。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仅自己特別注意理論研究，而且鼓励他們的拥护者利用革命战斗中已經到来的一个間歇时期，充实自己的理論知識，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是暫時性的，并且努力向无产階級战士的队伍灌輸这种信心。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已經沒有了任何无产階級的國際組織，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繼續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保持着联系，努力从思想上影响他們，帮助他們在反动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先前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員約·魏德迈和阿·克路斯去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厄·琼斯和革命的宪章运动的其他領袖去影响英国的工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利用自己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和“人民报”写政論的机会来揭露資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病态和恶迹，揭露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論证无产階級在各个国家的國內外政策的重大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和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壇报”上宣傳自己观点的严重障碍是該报編輯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观。这种情况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要特別灵活，要善于在一定的時候不用直接的方式，而用隱喻的

方式來表达自己的觀點，同時始終如一地在文章中貫徹與該報編輯部的路線截然不同的路線。早在 1853 年的時候，該報編輯部不僅在觀點上就已開始表現出和馬克思根本不同，而且還對馬克思採取了資產階級報界常見的不禮貌態度以及報社主人和編輯部對撰稿人慣常採取的剝削者的態度。“論壇報”編輯部不經馬克思的同意就把他寄來的文章抹去姓名作為社論發表，許多文章根本沒有發表；有一些文章被編輯部任意分為幾部分，遭到編輯的塗改，被編輯添上了他們自己的、往往和馬克思的文章的內容和風格相矛盾的意見。編輯部的這種行為使馬克思很惱怒，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議。然而，在工人的和革命民主主義的刊物幾乎連一個也沒有的情況下，馬克思不得不珍視自己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的機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的政論作品的內容極其豐富和多样化。他們在自己的文章中闡述了工人運動中一切比較重要的現象，闡述了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鬥爭，各國的經濟，以及歐洲、亞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軍事事件。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對當前的各種事件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科學分析，並且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論概括和政治結論。

從本卷所發表的著作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所注意的主要是以下三類問題：歐洲各國特別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經濟狀況，以及與此相關連的民主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的新高潮的前景；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主義政策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國際關係——與歐洲各國在近東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備戰以及俄國和土耳其之間已經開始軍事行動有關的國際關係問題。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這個時期的科學工作和政論工作有一個新的重要的特點，這就是他們對亞洲的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首先是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命運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他們開始在刊物上系統地發表文章闡述這些國家的情況，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的掠奪性的殖民主義政策。

馬克思分析了歐洲各國的經濟狀況，在收入本卷的“戰爭問題。——英國的人口和商業報告書。——議會動態”、“政治動態。——歐洲缺糧”、“西方列強和土耳其。——經濟危機的徵兆”、“戰爭。——罷工。——生活費用上漲”以及其他許多文章中說明了工業生產（首先是英國的工業生產）、農業、國內和國際貿易、市場價格、外匯行市等等方面的情況。馬克思通過許多實例考察了當前工商業週期的各個階段，並且把他早在四十年代的經濟學著作中就已提出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週期性的原理具體化。馬克思在文章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駁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論家的謬言，這些人把資本主義描繪成建立在和諧基礎上的、能使所有階級繁榮昌盛並且符合自然規律的制度。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不過就在於把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的暫時的社會關係，變為永恆的、普遍的、不可動搖的規律，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自然規律”（見本卷第 280 頁）。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缺陷在於，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當前時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它們必然要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消失”（同上）。

馬克思在文章中尖銳地評述了以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論者用關於“自由”、“和諧”、“繁

榮”等伪善辞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馬克思揭穿了作为資本主义辯護士和工人階級敌人的自由貿易論者的真面目。他揭穿了自由貿易論者所散播的貿易自由可以消除經濟危机的幻想。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1853年底的时候，就已經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自由貿易論者关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发生危机的說法是毫无根据的了。当时，工商业中的繁荣阶段被停滞阶段所代替，許多生产部門开始出现危机現象。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危机，完全证实了馬克思关于新的經濟危机必然到来，資產階級想消除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費气力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同馬克思的經濟評論有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有关財政問題的文章，如“新的財政把戏或格萊斯頓和辨士”、“內閣的成就”、“英鎊、先令、辨士，或階級的預算和这个預算对誰有利”、“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賄賂。——联合內閣的預算”，以及其他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些是为宪章派的報紙“人民报”写的。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向工人讀者揭示了資產階級国家的經濟政策的階級性质，揭示了英国政府的財政措施和稅收措施的真正本质。馬克思把格萊斯頓的預算看做“階級的預算，是由貴族执笔写出的資產階級的預算”，指明了資產階級的財政制度和稅收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工。这些文章和闡述其他經濟問題的文章，都鮮明地描繪出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以及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表现为大規模階級冲突的矛盾的日益尖銳。

馬克思在文章中非常注意闡述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在这一斗争进程中不断发展的职业联合組織——工联的活动。在“英国

的繁荣。——罢工。——土耳其問題。——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倫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和其他文章中，馬克思不厌其詳地引用了关于英国各工业区发生的罢工的消息，同时着重指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現象——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参加了这些罢工。他分析了罢工者的要求，揭露了工厂主和資產階級当局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蛮橫行动，并且对罢工运动的性质和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作了评价。

馬克思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資本之間的战争的鮮明表现。馬克思证明，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合乎規律的現象；罢工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橫、保障工人的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

特別重要的是馬克思关于罢工的意义的小結，他认为罢工是激发劳动者的斗志，团结他們向剝削者作斗争的要素。这些思想是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貧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經提出的关于工人联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学校这一原理的直接发展。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能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們团结起来，組織起来。“如果現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經過停滯、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資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間不是进行着經常的、与工資和利潤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顛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羅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見本

卷第 191 頁)

馬克思在闡述英國工人運動的同時，進一步發展了他在“哲學的貧困”中就提出的關於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統一、關於政治鬥爭對無產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有決定性意義的思想。馬克思在許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儘管經濟鬥爭對於團結和教育工人有很大作用，可是只進行經濟鬥爭是不夠的，必須在全國範圍內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他着重指出了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群眾性的政黨並且開展奪取政權的鬥爭的重要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瓊斯和憲章派的其他革命領袖，因為這些領袖要把英國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聯合起來，要在新的基礎上恢復憲章運動，把爭取憲章的鬥爭和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認為英國工人爭取人民憲章的鬥爭具有巨大的意義，因為人民憲章規定了在國內實現普選權。在英國的無產階級已經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而統治階級還沒有強大的軍事官僚機器的條件下，普選權能夠成為確立無產階級政治統治——實現革命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桿。馬克思在通訊稿中往往援引瓊斯在工人群眾大會上的演說，從這些演說中可以看出科學共產主義對這位傑出的英國無產階級活動家所起的良好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視着歐洲大陸各國開始革命行動的跡象。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了德國、法國、意大利的人民群众都懷着隱蔽的不滿情緒。

在“俄國的勝利。——英國和法國的地位”一文中，馬克思指出了法國的政局怎樣在經濟困難、物價高漲等等的影響下日益惡化。馬克思着重指出，廣大群眾特別是相當多的農民對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各項措施深為不滿，這證明第二帝國的反革命統治是

不巩固的。在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这篇文章中，馬克思指出意大利的教皇国、腊万納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搶粮風潮。馬克思在 1853 年的文章中談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时，繼續对馬志尼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評，因为他們不考虑客观条件，坚持奉行他們从前的密謀性的策略。

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也是为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密謀性的策略、冒險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內容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两篇文章相銜接。在这篇著作中，馬克思繼續揭露小資產階級的假革命和夸夸其談的作風，揭露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首領們醉心于在革命中玩弄煽惑性的把戏，醉心于密謀手段。这篇文章的特定目的是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前的宗派小集团的首脑之一、利用流亡者的民主主义刊物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誹謗和攻击的奧·維利希。馬克思在这篇著作(其中还包括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以尖銳諷刺的笔法勾画了这个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空談家、冒險主义策略的卫士的面貌。馬克思用維利希的十分可笑的“革命”計劃做例子，严厉譴責了密謀性策略的拥护者的通病：唯意志論和主观主义，不善于冷靜地估計形勢，政治上极不坚定。这篇著作除了一些揭发性的材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材料。

馬克思反对馬志尼、維利希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活动家不顾客观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专在“革命的”冒險和密謀上打主意，他认为，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方面，主要的因素是資本主义的經濟矛盾的增长、新的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的欧

洲各国階級斗争的尖銳化。馬克思写道：“煽动家的詞藻和权謀家的廢話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經濟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預兆。”（見本卷第349頁）

馬克思在分析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提和前景的时候，还估計到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他反复強調已經成为資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的亚洲大陆各国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欧洲各国的革命化的影响。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宗法制的封建关系由于这些国家被拖上資本主义的发展軌道而遭到破坏。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这种变革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的意义。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視着这些国家中日益高漲的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1853年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专文，这些文章現在都已收入本卷。这些周密研究了各种材料而写成的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資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的野蛮压迫和剝削而进行不調和斗争的光輝典范。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馬克思詳細地考察了資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这个亚洲的最大国家的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馬克思指出了英国的商品竞争对中国地方工业的破坏作用。他指出，英国人把鴉片輸入中国，使中国白銀大量外流，使中国經濟面临着完全枯竭的灾难；他指出，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的鴉片战争失敗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賠款而使捐稅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軍起义。

馬克思写道：“中国的連綿不断的起义已延續了10年之久，現

在已經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剂。”（見本卷第 109—110 頁）

馬克思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用武装力量直接支持反动的滿清王朝鎮压太平軍的起义，揭露了摧殘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欧美資產阶级的劊子手行为。

馬克思在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縮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場，而商品市場的縮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馬克思在強調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現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見本卷第 114 頁）。

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結論，对于馬克思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革命問題有极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結論，弗·伊·列宁制定了关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最重要的后备軍的学說。

本卷中还有馬克思論印度的一些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結果”、“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等。这些文章前后呼应，有深刻的科学分析，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作了有力的揭露，是馬克思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极为出色的著作。

在論印度的文章中，馬克思通过这个幅員辽阔、物产丰富和文明悠久的国家被英国統治的例子，揭示了資本主义国家对經濟落

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統治制度的特征。他探討了从原始資本积累时期起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馬克思揭露了东印度公司的作用，指出它是征服印度的工具，它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利用当地王公之間的封建內訌，煽动部落的和种姓的糾紛，以实现其对印度領土的侵占。馬克思着重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和侵略是英国本国土地貴族和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財富增加和势力加强的源泉。馬克思有力地揭露了：西蒂的商人、大地主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員这一伙强盜怎样靠剝削印度的人民群众而大发橫財，人民群众怎样被殖民主义者弄得貧困不堪。在“土耳其战争問題。——‘紐約論壇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一文中，馬克思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建立的官僚管理制度的寄生性，在这种制度下，印度人民群众陷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任凭英国殖民主义当局摆布。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統治阶级根本不要印度人民代表参加而在印度管理方面进行的所謂改革。馬克思揭露了这些改革的阶级目的，指出进行这些改革的原因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想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壟断，直接进入印度市場，从印度的賦稅中取得收入，以便在对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剝削中增加自己的份額。

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盜匪式管理的惊人情景。在印度的英国統治者从东方統治者那里继承了財政部門和軍事部門这样的管理部門并用它們来掠夺和压迫人民以后，就把第三个部門——甚至东方专制君主都予以注意的公共工程部門撇开不管了。因此，印度的农田水利极度衰落下去。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使当地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使手紡业和手織业破了产，使千百万印度居民束手待毙。田賦、盐稅以及殖民主义者施行的一整套

橫征暴斂的財政制度，沉重地压在居民身上。英国人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同时把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許多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下来。英国人在孟加拉管区实施了柴明达尔制度，在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施了萊特瓦尔制度，这样就使印度土地制度中的各种奴役性租稅以及地主、土地中介人、收稅人对农民的各种資本主义以前的剝削形式保存下来，甚至加强了。馬克思指出，在这两种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萊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貧化”（見本卷第 244 頁）。馬克思作出結論說：英国侵略者給印度带来的災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災难比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見本卷第 144 頁）。在这方面，馬克思表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資本主义的剝削、掠奪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現得最为露骨。“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資產階級文明的故乡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見本卷第 251 頁）

馬克思在无情地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時候又指出，他們純粹为发橫財和进行殖民主义掠奪的利益所驅而不得不促成印度資本主义經濟成分的产生。資本主义关系的出現給印度人民群众带来了特別深重的苦难，因为这些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統治的条件下出現的，殖民主义者阻碍殖民地資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們只容許对自己有利的工业部門产生。但是，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者既然容許了資本主义生产在印度萌芽，并且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的封建結構，就在无意中为这样一些力量的成长造成了前提，这些力量将来会打垮他們的統治，消灭他們对印度的殖

民压迫。

馬克思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結果的問題，通过这个例子鮮明地揭示了整个資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馬克思指出，資产階級統治的时期应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物质基础。造成这些物质前提的代价，是在資产階級殘酷剝削下的人民群众遭到种种难以置信的牺牲，全国的人民被資产階級逼迫走着流血、污秽、貧困和屈辱的苦難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見本卷第 252 頁）。

馬克思着重指出：印度的生产力因資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減輕印度人民群众的苦難，并不会改善他們的处境。要办到这一点，人民必須自己掌握生产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消灭外国殖民統治。馬克思写道：“在大不列顛本国現在的統治階級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鎖之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顛資产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結的果实的。”（見本卷第 250 頁）只有英国的无产階級革命，或者印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統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这就是馬克思在論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所作出的革命結論。所有这些文章都充滿着坚定的信心，相信将来印度总能摆脱殖民奴役，相信“这个巨大而誘人的国家”复兴的一天总会到来。

收入本卷的“印度問題。——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也是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篇著作。馬克思把爱尔兰看做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他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的

掠奪性的剝削方式。他着重指出，英國對愛爾蘭的侵略和民族奴役使這個國家保留着半封建的關係，這種半封建的關係“使一個小小的特殊等級——貪婪的貴族得以對愛爾蘭人民為所欲為，任意規定他們在什麼條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見本卷第179頁）。

馬克思論中國、印度、愛爾蘭的文章，第一次為無產階級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些文章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論述這個問題的文章和書信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弗·伊·列寧創造性地探討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出發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聯繫着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無產階級運動以及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問題考察了國際關係的問題。本卷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闡述這些問題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認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最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熟悉國際政治的秘密，揭露統治階級的外交陰謀及其侵略計劃和侵略行為。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階級，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看做是能夠積極抵制統治階級的沙文主義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力量。他們強調指出工人階級在國際沖突中必須遵循自己的革命路綫，這個路綫就是要在歐洲全面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並為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準備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歐洲革命叫做“第六強國”，他們就是從這個“第六強國”的立場出發來對待任何國際問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關於國際問題的論文中嚴厲抨擊了歐洲國家的反動統治者在維也納會議期間建立起來的整個國際關係體系。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認為這個體系阻礙了歐洲的進步發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阻礙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民族統一。他

們严厉譴責統治階級在外交上使用挑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恐吓和詐騙以及粗暴干涉小國內政的方法。

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的是欧洲列強在近东的尖銳矛盾和它們之間为瓜分土耳其帝國的領地、夺取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达达尼尔海峽的統治权、爭取在巴尔干和前亞細亞各国占优势的斗争。这个所謂东方問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很多篇文章中所研究的題目。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东方問題的看法，在恩格斯所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点”、“土耳其問題”、“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这几篇有关东方問題的头几篇文章中已經作了叙述。恩格斯分析了近东和巴尔干被土耳其征服后在历史上形成的状况，揭示了欧洲各大国在土耳其領地的命运問題上互相竞争的經濟原因、政治原因和軍事原因，論证了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民主派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东方問題像对待其他国际問題一样，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西欧的許多外交家和政論家相反，例如，英国政論家戴·烏尔卡尔特主張保存反动的封建的奥斯曼帝国，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认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民族取得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支持让这些民族独立的要求，主張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巴尔干半島的被压迫民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西欧各国政府有一种虛假的理論，即在巴尔干半島也保持維也納會議所确定的現狀，用这种虛偽的說法来掩盖它們反对巴尔干半島民族解放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西欧各国政府在东方問題上的政策，痛斥維護 status quo [現狀]的人主張“畏首畏尾和因循

守旧的外交”，痛斥他們反对用进步方法解决东方問題。“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問題，正如其他重大問題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月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問題也归在这个偉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 1789 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經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龐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見本卷第 37—38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繼續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正如 1848—1849 年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沙皇专制制度是革命的死敌。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也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些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做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竭力把它保存下来，繼續作反动势力的堡垒。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警察統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以及西欧的許多政治活动家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他們指出，沙皇政府力图利用巴尔干半島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来达到侵略的和反革命的目的。俄国在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但是沙皇的反动政策必然会引起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反对。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各民族的压迫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

危險。列宁在1909年写道：“半世紀以前，俄国就牢牢地享有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紀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領袖們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說，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紀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漲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沒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8頁）

本卷中有許多文章是专门分析英国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的。这些文章是：“烏尔卡尔特。——貝姆。——土耳其問題在上院”、“土耳其問題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以及其他許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指出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资产階級貴族的寡头的狹隘私利。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英国内閣的对外政策仍然体现着资产階級貴族的英国从对法国资产階級革命作战的时候起在欧洲所起的那种反革命作用，这种作用在1848—1849年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英国资产階級同沙皇和其他反动势力結成联盟，极力扼杀革命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統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問題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耽心这种冲突会轉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顛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尖銳地揭发出英国統治階級外交的傳統特

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撥、对同盟国背信棄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用他們反对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言論来促进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統治和改变大不列顛的对內对外政策而斗争。馬克思的一組揭露性文章“帕麦斯頓勋爵”，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人民报”上，“紐約每日論壇报”也发表了一部分。这一組文章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帕麦斯頓勋爵”是馬克思仔細研究了許多外交文件、議會辯論紀錄和报刊之后而写成的輝煌的抨击性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馬克思用十分准确和幽默机智的笔法，勾画了寡头政治的最著名的代表、資產階級貴族英国的最突出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帕麦斯頓的肖像。在馬克思对帕麦斯頓的評論中，包含着对英国的整个政府制度、对英国官方的整个政治路綫的評价。馬克思揭露了这一套制度的階級根源，說明帕麦斯頓式的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关心的是怎样使“土地和金融巨头的上空”一直晴朗无云。馬克思以帕麦斯頓对爱尔兰問題以及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运动的态度为例，彻底揭露了在籠絡性的自由主义詞句掩盖下，在对专制制度受害者的假惺惺的态度掩盖下的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帕麦斯頓在口头上拥护“宪制”，而在英国本国則首先倡議施行警察措施，反对任何进步改革，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則支持反动的君主政府，并且討好法国波拿巴集团。帕麦斯頓政策的特点是：奸詐、圓滑、虛伪和无耻，正如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是极端反人民的。

馬克思在这一抨击性著作以及“帕麦斯頓辞职”一文中說明，

帕麦斯顿和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問題上所采取的也是这种背信棄义和两面三刀的手法，他們在东方問題上的政策也有反革命的趋向。不过应该指出，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是英国統治階級利益的典型代表这一評論虽然十分准确，但是却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位英国大臣的活动的某些方面。馬克思极力強調俄国沙皇政府和英国寡头政治共同的反革命意图，但是在他的这一抨击性著作中稍許夸大了帕麦斯顿看沙皇专制政府的眼色行事这一点。帕麦斯顿和英国寡头政治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不仅仅取决于害怕革命，希望利用专制制度来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統治階級对近东抱着侵略野心，他們想夺取高加索，他們計劃削弱沙皇俄国来加强自己，这种計劃在引起克里木战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利用了烏尔卡尔特的材料，当时的某些資產階級報紙和后来的許多資產階級文人曾利用这一点来胡說馬克思和烏尔卡尔特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一样。但是，散見于本卷各篇文章中的馬克思批判烏尔卡尔特立場的意見，就已經证明了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同意烏尔卡尔特，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烏尔卡尔特的观点是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馬克思利用烏尔卡尔特言論中所引的某些事实以及烏尔卡尔特派所办的反对党的报刊来揭露英国政府。

馬克思在“倫敦的报刊。——拿破侖在土耳其問題上的政策”一文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揭示了波拿巴法国在东方危机时期所持立場的真正背景。馬克思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在导致了克里木战争的东方冲突中所追求的冒險家目的和皇帝癮，馬克思着重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來說，对外冒險是維持反动波拿巴专政的手段，

并且通过对外冒险使当时欧洲的各国统治者承认他这个法国王位篡夺者是“可敬的”君主。

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为了侵略目的而把人民拖入战争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提出了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真正的革命战争在欧洲实现民主改革的思想，提出了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的思想。他们着重指出，这样的战争会使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革命统治崩溃，归根到底会促使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在俄国和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见“多瑙河战争”、“神圣的战争”等文）中，恩格斯分析了高加索战场和巴尔干战场上军事行动的条件、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双方军队的最初几次战役。这里应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是紧跟着事件写的，没有时间可能去全面查对来自战场的消息。例如，在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中，他对西诺普海战的估计就受了片面的、不客观的消息的影响。由于报道不确切，在恩格斯所写的“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的文章中，关于多瑙河上的俄军人数就采用了夸大的数字。恩格斯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后几篇文章中（见本卷第 530—532、585—587 页）对这些数字作了重要的订正，改变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某些估计和预测。

在编入本卷以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包含着有关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结论；这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对于军事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很有意义。恩格斯在论克里木战局的文章中进一步解决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

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論上概括当代战争的經驗。

* * *

本卷所刊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 13 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沒有收入，并且是用俄文第一次发表的。在全集第一版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許多文章，都沒有完整地刊載，而是把各个片段按問題性质归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本版則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发表在報紙上的形式刊載出来。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一再指出的，“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对他們的文章的原文采取了任意处理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論发表出来的文章。本卷在編譯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文章中有編輯部添加的文字。对于編輯部添加的这些文字，本版都附在有关的注釋中。“紐約每日論壇报”和其他報紙上显然印錯了的引文、人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現在都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始材料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館的材料一一核对，并作了更正。各篇文章的篇名完全依照当时報紙上的标题。原稿中沒有篇名的文章，則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前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3年3月—12月

NEW-YORK DAILY TRIBUNE.

VOL. XII.....NO. 3,736

NEW-YORK, THURSDAY, APRIL 7, 1853.

PRICE TWO CENTS.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顛政局。——迪斯累里。 ——流亡者。——馬志尼在 倫敦。——土耳其¹

1853年3月22日星期二于倫敦

迪斯累里辞去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領袖职位，在現时的政党史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²。据悉，迪斯累里还在托利党内閣辞职八九个星期之前，曾打算拋棄自己的旧同盟者，只是由于得比勋爵再三要求才放棄了这种打算。可是現在，迪斯累里自己被排挤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約翰·帕金頓爵士接替。帕金頓是一个稳健謹慎的人，有一些領導能力，但是，他又是一个阴暗的人物，是英国土地貴族的腐朽偏見和陈旧思想的真正化身。这次更換領導，意味着托利党彻底改組，可能还是最后的改組。迪斯累里可以庆幸自己摆脱开了那些慣于欺詐的土地占有者了。不管我們对这个据說是鄙視貴族、仇視資產階級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的意見怎样，他毫無疑問是本屆議會中最有才干的議員，而他的灵活性則使他能够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至于流亡者的問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报道过：奥地利報紙在帕麦斯頓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說后表示，要从被帕麦斯頓的有害影

响所腐蝕的內閣得到滿足是徒勞無功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的聲明用電報一拍到維也納，情況就變了³。這几家報紙現在又強調說，“奧地利相信英國內閣是高尙的”，而半官方的機關報“奧地利通訊”⁴則刊載了該報巴黎通訊員所寫的下面一篇報道：

“考萊勛爵在返回巴黎後向法國皇帝宣稱，英國駐北方各國宮廷使節都接到了正式指令，這個指令要他們盡一切努力阻擋北方列強向英國政府提出聯合照會，並提出下面這種理由使它們不去採取這樣的步驟，即英國政府在整个英國的心目中愈能保持它在這個問題上自主自願的樣子，那末它就愈能滿足這些強國的要求……

不列顛大使考萊勛爵極力向法國皇帝說明，他可以完全信賴不列顛內閣，而且，即使這種信賴被辜負了，皇帝還可以隨時採取他認為需要的任何步驟…… 法國皇帝同意考驗一下不列顛內閣的誠意，但同時保留了自己將來行動的完全自由；他現在正企圖說服其他強國也照他這樣做。”

諸君可以看到，從«ce cher Aberdeen»〔“這個可愛的阿伯丁”〕（路易-菲力浦通常這樣稱呼他）那里所期待到的是什麼，阿伯丁所許下的諾言的內容大致是些什麼。繼這種諾言之後，現在已開始了實際的行動。上星期，英國警察當局擬出了居住在倫敦的大陸流亡者的名單。幾個暗探挨街區、街道、住宅到處追蹤搜索，並且記下了流亡者的特征；他們大都在附近的小酒館里轉來轉去，有時甚至借口搜捕罪犯闖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宅，亂翻他們的文件。

正當大陸上的警察在徒勞無功地追捕馬志尼的時候，正當紐倫堡當局下令關住城門捉拿馬志尼的時候（德國有句老話：“抓不住就絞不死”），最後，正當英國報刊大量報道馬志尼可能的行踪的時候，馬志尼却在倫敦安然無恙地住了幾天了。

緬施科夫公爵在舉行了駐多瑙河各公國俄軍閱兵式並檢閱了駐塞瓦斯托波爾的陸軍和艦隊之後（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爾

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2月28日以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員共12人，包括俄国黑海分舰队司令海軍上将^①、一位师級將軍^②、几位參謀軍官和使团秘书小涅謝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緬施科夫的接待，就像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倫敦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緬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滿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益不但放棄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棄任命希腊总主教的权利；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顛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黄蜂号”蒸汽舰往馬尔他島，以便立即調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群島，而俄国舰船則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报纸“通报”⁵报道，在土倫的法国分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領水。不过，邓达斯海軍上将仍然在馬尔他島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欧洲，东方問題又提到 *ordre du jour* [日程]上来了，但这样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們來說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風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現同一个問題——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問題”。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風雨过去，拿破侖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簽訂了提尔西特和約⁶，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現过这个問題；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暫时的平靜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剛被来巴赫會議和維罗那會議鎮压下去⁷，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給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經過若干年，当七月

① 弗·阿·科尔尼洛夫。——編者注

② 阿·阿·涅波科伊契茨基。——編者注

革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 1831 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 1840 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⁸。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 *status quo* [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状况）是一个 *testimonium paupertatis* [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在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⁹的代表们，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们）¹⁰ 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 *status quo*——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 *status quo ante* [一定时间以前的现状] 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 *status quo*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外交家们又要从 8—10 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

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維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這就像要把一匹死馬的屍體的腐爛過程停在一定階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爛一樣。土耳其正在爛下去，而且，只要現行的“均勢”和維持 status quo 的體系繼續存在下去，還會越爛越厲害。因此，它將不顧所有的會議、議定書和最後通牒，經常地每年在外交難題和國際糾紛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就像任何一種腐爛物體向周圍大量放出沼氣和其他“芬芳的”氣體那樣。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問題到底在哪裡。土耳其由以下三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非洲的藩屬王國（埃及和突尼斯）、亞洲土耳其和歐洲土耳其。非洲的領地暫時不談，因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從屬於蘇丹的國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從屬於英國人，在今後瓜分土耳其時它毫無疑問將成為英國人的屬地。亞洲土耳其則是土耳其帝國現時還擁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400年間，土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亞細亞和阿尔明尼亞，這兩個地方是經常補充土耳其軍隊的充裕的來源，從圍攻維也納的土耳其的軍隊，一直到庫列夫查戰役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戰術擊潰的土耳其軍隊¹¹都是這樣。亞洲土耳其儘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個非常團結的屬於土耳其族的狂熱的伊斯蘭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所以，實際上一討論“東方問題”的時候，在亞洲各地區中受到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經常引起糾紛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個大的半島，即歐洲土耳其。這個好地方卻不幸成了各個不同種族¹²和民族雜居的地方，同時很難說它們當中誰最缺少走向進步和文明的條件。1200萬斯拉夫人、希臘人、瓦拉几亞人、阿尔納烏特人¹³處於100萬土耳其人的統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還很難說，除了土耳

其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統治，而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統治权不能不只屬於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怜的失敗，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議每一次都不惜向奥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沒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爭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亚，而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維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居住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島所拥有的一切潜力的發揮。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統治階級，因为那里各不同社会階級之間的相互关系像各不同种族之間的关系一样复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軍人；但是，不管一个土耳其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却屬於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土耳其人才有佩帶武器的权利，而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見社会下层的穆斯林时也必須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斯拉夫族的貴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人民群众仍然是“萊雅”，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們的土耳其族教友的地位一般來說是同等的。

欧洲的土耳其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引过来的后备）的

主体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平民。他們主要是土耳其族，同时，尽管他們的雇主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資本家，但是他們仍然狂热地維護自己想像的优越性和胡作非为不受懲罰的实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因为他們信奉有特权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享有，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誰都知道，在任何一次重要的 *coup d'état* [政变] 中，都必須用收买和恭維的手段把这些平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是这一些人形成了(某些殖民地除外)人数相当多同时又密集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不言而喻，完全有必要把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好的地方从平民(羅馬帝国时代的平民和他們比起来都成了賢人和英雄)統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必要性迟早总会出現的。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談一談阿尔納烏特人。阿尔納烏特人是勇敢的山民，他們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們有特殊的語言，这种語言大概屬於大印欧語系。在阿尔納烏特人中，部分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是穆斯林；据我們所知道的关于他們的一切来判断，他們好像还很少具备走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們慣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圍地区工业的进步沒有保证他們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¹⁴和其他地方的山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用軍事力量严格控制他們。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羅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們都屬於正教教会，他們的語言源自拉丁語，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語相似。在这个民族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柯維納的居民是奧地利帝国的臣民，而貝薩拉比亚的居民則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是达克-羅馬尼亚种族得到政治存在的唯一

的两个公国，这里的居民有自己的公爵，公爵名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藩臣，而实际上則处于俄国統轄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事，我們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听到很多了¹⁵。奥地利人用小恩小惠和各种諾言把这些陷于野蛮状态的瓦拉几亚人（他們迄今一直受着匈牙利大地主的封建压迫，而且这些大地主又适应着奥地利制度变成了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拉到自己这边来，如同1846年他們在加里西亚对处于农奴地位的卢西人所做的那样¹⁶，于是瓦拉几亚人便对匈牙利人进行了一场焦土战争，这场战争把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荒漠地带。土耳其各公国的达克-羅馬尼亚人至少还有自己的貴族和政治机关，在那里，俄国虽然极力防范，但革命精神仍然渗进去了，1848年的起义¹⁷就充分說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他們在俄国占领时期所身受的压迫和勒索，无疑地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他們同俄国的共同宗教和他們对沙皇的宗教迷信使他們直到現在还把戴皇冠的正教教主当作天然的保护者。所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末瓦拉几亚民族在最后决定这些地区的问题方面，能够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族，虽然他們接受了新希腊語。实际上現在所有的人都承认，除了几家名門望族以外，在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比曾德，甚至在希腊本土，純粹的希腊人都已經很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构成了各沿海口岸和內地許多城市中的商人的基本部分。在某些地区，他們也从事农业。但是，除了在特薩利亚（也許还有伊皮罗斯）以外，無論从人数、人口密度来看，或是从民族意識来看，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为一个民族所起的政治作用。少数几家希腊的名門望族的代表人物由于当通事（翻譯官）在君士坦丁堡所享有的威望，在土耳其人到欧洲受教育

和歐洲各大使館配備了通曉土耳其語的隨員之後，也幾乎喪失淨盡了。

現在來談談構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個種族混雜的地方其血統都占主要地位的那個種族。可以斷言，這個種族構成了從摩里亞半島到多瑙河，從黑海到阿爾納烏特山脈這一地區內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這個種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別是其中名為伊利里亞 (Ilirski) 或南方斯拉夫 (Jugoslavenski) 的一個分支。繼西方斯拉夫人 (波蘭人和捷克人) 和東方斯拉夫人 (俄羅斯人) 之後，它構成了在 12 個世紀中定居在歐洲東部的人數眾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統中的第三個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並且居住在達爾馬威亞、克羅地亞、斯拉窩尼亞和南匈牙利。他們都講同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同西歐人聽來無疑最富有音樂性的一種斯拉夫語言——俄語非常相近。克羅地亞人和部分達爾馬威亞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其餘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書寫時則使用俄語、古斯拉夫語 (或稱教會斯拉夫語) 所使用的基利爾文字。由於這種情況，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礙了他們的民族發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區不能匯入一個民族的軌道。貝爾格萊德的居民不能閱讀印成自己的語言但在阿格拉姆或貝奇^① 出版的書。他甚至還可能拒絕用手去拿，因為這本書是用“異教”字體和按“異教”正字法的規則印的。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困難地閱讀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書，因為兩種語言非常相似，特別是在古斯拉夫語源學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外，這本書還是用“正統”(正教) 字體印的。大多數信正

① 塞爾維亞人對維也納的叫法。——編者注

教的斯拉夫人甚至不願意他們的聖經、祀神书和祈禱书在本国印，因為他們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特別正确、正統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¹⁸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維亞人、保加利亞人、波斯尼亚的“萊雅”、馬其頓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他們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語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不論发生什么事，他們总注視着彼得堡，希望从那里来个救世主把他們从所有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們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們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本城复兴真教；另一方面是紀念在土耳其征服全国以前統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正教沙皇。

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斯拉夫人虽然自己选地方政权，但他們都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統治之下；在某些地方（在波斯尼亚），他們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斯拉夫种族只在土耳其的两个地区里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或爭得了政治独立。其中一个地区是位于摩拉瓦河谷的塞尔維亞，这个地区有着明显的天然边界，这条边界600年前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1806年俄国的战争¹⁹使长期处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塞尔維亞人得以独立，虽然只不过是土耳其統轄下的独立。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維亞就經常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維亞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貿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里，即在斯拉夫族和正教的塞尔維亞，就出現了反俄的进步党派；当然，这个党派在改革要求方面是非常温和的。領導

这个党派的是前財政大臣加腊沙宁²⁰。

如果希腊-斯拉夫居民一旦成为自己居住的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那个国家的主人,那末毫无疑问,上述的需要逐渐会使他們中間出現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出現,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每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

門的內哥罗不是拥有較大城市的肥沃平原,而是一个貧瘠的、交通极不便的山国。境內盜匪盘踞,他們到平原去搶劫,搶来东西就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然而相当粗暴的先生們早就成了欧洲的負担,而俄国和奥地利則保护黑山(Tsernogorci)^①这个地方的人焚毀村庄、杀戮居民和搶掠牲畜的权利,因为这种情况和它們的政策是十分諧調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53年3月12日和22日之間

載于1853年4月7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736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① 即門的內哥罗。——譯者注

弗·恩格斯 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点

很奇怪，在目前东方問題的爭論中，英国报纸沒有更坚决地強調英国的切身利益，而正是这些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擴張領土計劃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領达达尼尔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俄国如果占領这两个海峽，無論在貿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国和土耳其之間的貿易关系就清楚了。

在沒有开辟通往印度的捷徑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貿易的中心。就是現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經波斯、图兰^①和土耳其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居中同欧洲和亚洲內陆地区进行着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貿易。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整个远离海洋的地区，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諾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止，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大河，德涅斯特河、德涅泊河和頓河，都是从远离海洋的地区把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运河。我們說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商品

① 土尔克斯坦(图兰)低地的旧称。——編者注

交換方面都有天然的紐帶同欧克辛海^① 联結起来,同时,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匈牙利、波兰和南俄的粮食、羊毛和皮革在我們西方市場上数量与年俱增,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在加拉茲、敖德薩、塔干罗格和欧克辛海其他港口装船运来的。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貿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亚洲内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尔克斯坦进行商队貿易的主要中心。这种貿易也在迅速增长着。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比曾德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这种貿易。它的后方接連着阿尔明尼亚高地,这里較之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設刺子和德黑兰相当近;德黑兰則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貿易地点。这一种貿易和整个黑海貿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聞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商人越来越多,他們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德語、英語和希腊語、南方斯拉夫語的讲话声交織在一起。

特拉比曾德的貿易也成为极其严重的政治問題,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 1840 年以前,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壟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貿易。俄国的商品一直渗入印度河流域,有时甚至比英国的商品还流行。可以大胆断言,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²¹ 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貿易几乎等于零。現在情况不同了。迫切需要不断扩大貿易,这

① 黑海的古称。——編者注

个 fatum [厄运] 像幽灵一样追逼着现代的英国，如果不马上使这个厄运追逼得缓和一点，那末它就会从纽约到广州、从圣彼得堡到悉尼引起可怕的震荡。这种无法缓和的需要，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向亚洲内地进攻。我们虽然对于俄国向这个地区的出口额知道得很少，但仍然可以从英国向这些地区的输出增加这一事实中大胆断定，俄国在那里的贸易恐怕是大大缩减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比曾德；先前曾经直抵东方英帝国边界的俄国贸易，现在已被压回到防御线上，这条防御线也正是它本国的国界。这一情况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它关系到东方问题将如何解决，俄国和英国在这当中能起什么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家”²² 统计，英国向土耳其地区，包括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出口总值如下：

1840 年.....	1 440 592 英鎊
1842 年.....	2 068 842 英鎊
1844 年.....	3 271 333 英鎊
1846 年.....	2 707 571 英鎊
1848 年.....	3 626 241 英鎊
1850 年.....	3 762 480 英鎊
1851 年.....	3 548 959 英鎊

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决定于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遙

远角落的道路。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能否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闖入俄国的貿易范围呢？

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峽在貿易上的意义就是如此。很明显，商貨經過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貿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間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現在讓我們从軍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問題。达达尼尔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在貿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們成为头等的軍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要地同直布罗陀和松德海峽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后面这两个据点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火不能控制自己海峽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鎖海峽，还要借助于舰队。而达达尼尔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却很狹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設備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峽，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峽。如果这样，黑海就会成为俄国的內湖，甚至位于俄国腹地的拉多加湖也比不上它；高加索人的反抗力量也馬上就会耗完；特拉比曾德就成了俄国的港口，而多瑙河就成了俄国的河流。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通气或相互支援，而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馬其頓、特薩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絕，它們除了求饒和請求派兵維持国内秩序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是否可以設想，这个如此龐大、擴張得这样厉害的国家，

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而会在半路止步呢？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吞并了土耳其和希腊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精锐的水兵。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它就在地中海的门前立定了脚跟；控制了都拉索和从安提瓦利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以后，它就可以进入亚得利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 36 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尔他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以后，它就完全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藩属一样对待哈布斯堡王朝。还有其他一些结局也是可能的，甚至是一定的。这个帝国的西部边界弯弯曲曲，同自然边界不一致，这样就要修改边界，于是俄国的自然边界就是从但泽或者施特廷到的里雅斯特了。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 年来就是这样，直到 1789 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就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²³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护

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3月23日
和28日之間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1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0号

卡·馬克思 倫敦的報刊。——拿破侖在 土耳其問題上的政策²⁴

1853年3月25日于倫敦

直至今晨尚未得到來自土耳其的任何新的可靠消息。“先驅晨報”²⁵駐巴黎通訊員在今天的報上報道，他從權威方面获悉，俄軍已經進入布加勒斯特。在本月20日的“馬賽信使報”上我們讀到：

“我們可以向讀者諸君報道萊寧根伯爵剛離開以後和緬施科夫公爵在御前會議上作出無禮舉動以前奧捷羅夫先生向土耳其政府遞交的照會的內容。這項外交照會涉及的主要之點歸結如下：涅謝爾羅迭伯爵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堅決的要求，因為土耳其政府違背自己不侵犯門的內哥羅人的正式諾言，對他們發動了流血戰爭，這樣就引起彼得堡當局極大的不滿。因此，為了保證門的內哥羅人得到應有的保護並使他們免于新的災難，俄國想建議土耳其政府承認門的內哥羅的獨立。照會抗議封鎖阿爾巴尼亞沿海地區，最後還要求蘇丹黜退那些做事一向引起兩國政府誤會的大臣。據稱，土耳其接到這一照會後，雖然感到惋惜，但同意讓步，不過只是在一個問題上讓步，即同意黜退幾個大臣，其中包括蘇丹的妹夫傅阿德-埃芬蒂，他的職務現已由親俄的里法特-帕沙^①接替。然而土耳其政府拒絕承認門的內哥羅的獨立。於是緬施科夫公爵不管通常禮貌，不去拜會外交大臣，就違反一切外交慣例，親赴御前

① 帕沙是蘇丹土耳其軍政大員的稱號。——譯者注

會議，并強硬要求御前會議接受他提出的要求。這種要求就使土耳其政府向英國和法國請求保護。”

在古希臘，如果一個演說家因為得了錢而不說話，人們就說他“舌頭上有牛”。應當指出，這個牛就是埃及的銀幣²⁶。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泰晤士報”²⁷，自從重新提出東方問題以來，它的舌頭上一直是有牛的，——這樣說即使不是根據它保持緘默，至少也是根據它所作的報道。起初，這家善于發明的報紙借口問題涉及基督教而為奧地利干涉門的內哥羅事務的行為作辯護。但是後來俄國進行干涉時，這家報紙就拋棄了這個論據，硬說這只是正教和天主教會之爭，與英國國教教會“虔誠的教徒”毫不相干。此後，它就大談土耳其的貿易對大不列顛的意義，這種意義很大，所以它作出結論說，如果以土耳其貿易自由去交換俄國的禁制關稅和奧地利的保護關稅，這對大不列顛只會有利。然後“泰晤士報”就極力證明，英國在糧食供應方面是依賴俄國的，因此英國應當默認沙皇的地理觀點。為了減輕英國對俄國的依賴，黑海應當成為俄國的內湖，而多瑙河應當成為俄國的河流，——這樣的說法對於“泰晤士報”所頌揚的貿易體系來說是多麼入耳的話，是多麼誘人的一個論據啊！當“泰晤士報”的這個一攻即破的立場被戳穿之後，它馬上又抓住一種廣泛流行的說法，即土耳其帝國的崩潰是不可挽回的了，而這一點，在“泰晤士報”看來，就是俄國在目前應當成為這個帝國的受托者和繼承人的決定性的論據。接着“泰晤士報”決定，應當使土耳其的居民受俄國和奧地利的“純粹的統治”和文明的影響，並且引用智慧來自東方這句古代的格言，而忘記了它自己不久前說過的這些話：“奧地利在本國各省和各王國內維持的制度，是恣意橫行的強制的制度，是不受任何法律節制的暴虐的制度。”最後，“泰

晤士報”竟然無耻之極地為自己發表了有關東方問題的“出色的”社論而自我祝賀了一番！

所有倫敦的報刊，晨報和晚報，日報和週報都紛紛起來齊聲指責這家“主導報紙”。“晨郵報”²⁸譏笑自己“泰晤士報”的同行，指責他們故意散布荒誕無稽的假消息。“先驅晨報”把“泰晤士報”叫做“我們這個時代的猶太—奧地利—俄羅斯人”，而“每日新聞”²⁹則更簡單地把它叫做“布隆諾夫的機關報”。“泰晤士報”的孿生兄弟“紀事晨報”³⁰則這樣打擊它：

“只圖十來家希臘公司的生意興隆而要把土耳其帝國出賣給俄國的報界人士，真不愧為製造絕妙的俏皮話的大王。”

“晨報”³¹寫道：

“‘泰晤士報’說它在維護俄國的利益時是單槍匹馬，這是說對了……的確，這家報紙是用英文刊印的，但是它只有這一點是英國的東西。只要問題涉及俄國，它就是徹頭徹尾的俄國報紙了。”

毫無疑問，只要俄國熊堅信英國和法國之間的«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協商”]³²是暫時的，他就不會縮回自己的爪子。在這方面值得耐人尋味的是，下列事件竟然令人驚異地湊合在一起。就在“泰晤士報”力圖要阿伯丁勳爵和克拉倫登勳爵相信土耳其問題只不過是法俄之間的小小爭吵的當天，«roi des drôles» [“丑角之王”]（基佐平常就是這樣稱呼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先生的）就在“立憲主義者報”³³上作出了這樣一個發現：整個這回事情只不過是帕麥斯頓勳爵和沙皇之間的爭吵。讀了這些報紙，你就能夠真正認識狄摩西尼發表激烈的反菲力浦演說時代那些舌頭上有馬其頓“牛”的希臘演說家們的面貌了。

以聯合內閣為代表的不列顛貴族的态度是：一有必要他們就

會犧牲英國的民族利益來滿足自己特殊的階級利益，讓東方年輕的專制制度加強，以期為自己在西方的虛弱的寡頭統治找到支持者。路易-拿破侖的態度則搖擺不定。他對那位專制君主十分同情，這個君主的政體他已經在法國實行了；他對英國十分反感，英國式的議會制度他已經在法國廢除了。除此之外，他如果讓沙皇在東方掠奪，沙皇也許會讓他在西方掠奪。另一方面，他又不大相信神聖同盟對他這個“暴發的可汗”所抱的感情。因此，他採取的是模稜兩可的政策，力圖像他當年愚弄法國國民議會的各黨派一樣來愚弄歐洲列強。他一面同英國駐土耳其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表示親熱，做出這個樣子給人看，一面又向俄國的利文公爵夫人大獻殷勤，大許其願，并把狂熱擁護奧法同盟而反對英法同盟的戴拉庫爾先生派到蘇丹宮廷去。他命令土倫艦隊開入希臘領水，而第二天却在“通報”上宣布這一舉動事先並沒有同英國有過任何協議。他一面指使自己的一家機關報“國家報”³⁴大談東方問題對於法國極為重要，一面又允許自己的另一家機關報“立憲主義者報”說，東方問題決定着俄國、奧國和英國的利益，至於法國的利益，則只是間接地沾一點邊罷了，因此法國採取完全獨立的立場。誰將給他更多好處？是俄國還是英國？這就是他所考慮的問題。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3 月 25 日

載於 1853 年 4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739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弗·恩格斯 土耳其問題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³⁵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 *terra incognita* [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知識，但是这种知識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誰也沒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語言，他們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①的偏頗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們总是把時間花費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詭計上面。他們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約瑟夫·馮·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們对該国的人民、机构和社会制度根本不感兴趣，只同宮廷、特别是同希腊的法納尔人³⁶往来，这些法納尔人是双方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則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和潜力的真实情况。西方外交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在很长的时期都是从十分可怜的情报中所得出的傳統观念和判断，而且，尽管使人奇怪，甚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这样。

① 西欧的商人(法兰克是近东对西欧居民的流行称呼)。——編者注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猾地超过了它們。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風俗、傳統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 700 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說外国語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曉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費难地完全通曉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的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計的俄国的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宣傳：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領、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負有最終解放它的使命；他們特別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輸沙皇全能的思想，說沙皇迟早要把偉大的斯拉夫种族的所有分支团結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成为欧洲的統治种族。希腊教会的僧侶早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子和俄国的影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促成了 1804 年塞尔維亚的起义³⁷ 和 1821 年的希腊起义。土耳其的帕沙無論在哪里举起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的旗帜，从来也少不了俄国人出主意和俄国人出金錢。因此，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問題最終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們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向巴尔干挺进，于是一块一块的領土就同正在被瓜分的奥斯曼帝国脫离了关系。

不錯，近 30 年来在向广大公众介紹土耳其状况方面做了許多努力。德国的語文学家 and 批評家向我們介紹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

学；英国的代理人和英国的商人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的资料。但是，外交界的才子们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不放，而这些传统是由于知道了东方神话才产生的，是经过世界上最容易被收买的一小撮希腊商人用同样使人惊奇的胡说加过工的。

自然的結果如何呢？結果，由于西欧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举棋不定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納瓦林会战³⁸起，到現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各国的行动不是由于相互間的爭吵（这些爭吵大半是出于它們对东方情况都不了解，出于那种对东方人來說完全不可理解的小猜忌）而瓦解，就是他們的每一次行动都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而且斯拉夫人，也都认为俄国是自己的天然的保护者。而且，甚至君士坦丁堡政府也越来越不再希望那些以根本不能独立判断土耳其的情况为荣的西方列强的使节們終究会了解它的迫切需要和它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个土耳其政府每次都不得不向俄国求情，請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魯斯海峽，并把圣安德烈的十字架豎立在艾亚-索非亚清真寺的尖塔上。

俄国的这些一貫的和順利的侵略行动，不管外交傳統怎样，終于使西欧各国的內閣模模糊糊地預感到危險的迫近。这种預感就使它們提出了一項原則，作为一种偉大的外交上的专利药。根据這項原則，維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現狀〕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些用詞藻来掩飾自己无能的当代国家要人，其不学无术和束手无策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原理中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个原理虽然一直是死的条文，但 20 年来却成了神圣的

傳統，就像約翰王的 Magna Charta³⁹ 那樣不容忽視和不容爭辯。維持 status quo！呵，當然！只是為了維持 status quo，俄國才挑起了塞爾維亞的起義，使希臘獨立，攫取了对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几亞的保護權并把阿爾明尼亞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當這一切大功告成時，英國和法國連手指頭也沒有動一下。它們僅僅有一次作過自己還活着的表示，這是在 1849 年，但是當時它們不得不保護的並不是土耳其，而是匈牙利流亡者⁴⁰。在歐洲外交界看來，甚至在歐洲的報刊看來，整個東方問題歸根到底只能是：要么俄國人坐鎮君士坦丁堡，要么維持 status quo。二者必擇其一，他們腦子里再也沒有任何別的東西。

我們不妨拿倫敦的報刊來說明。我們看到，“泰晤士報”主張瓜分土耳其，並且宣布土耳其種族已無力繼續統治歐洲這一塊好地方了。“泰晤士報”運用它一貫的技巧，大胆抨擊維持 status quo 的舊的外交傳統，宣稱繼續維持 status quo 是不可能的。這家報紙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從各方面證明這種不可能，並且為英國同情征討薩拉森人的末代後裔的新十字軍進軍作證。誰也不會否認，“泰晤士報”對它兩個月之前還奉之為神聖的陳詞濫調進行這樣無禮的攻擊是一項功勞。但是了解這家報紙底細的人也都知道，這種異乎尋常的大膽行為是直接為俄國和奧地利的利益效勞的。“泰晤士報”提出的關於完全不可能維持土耳其現狀的正確假設，只是為了事前作好醞釀，讓英國公眾和全世界老老實實迎接彼得大帝遺囑⁴¹ 中最重要的一點——奪取博斯普魯斯海峽——完全成為事實的那一天到來。

自由派的機關報“每日新聞”則代表完全相反的观点。“泰晤士報”至少是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新的一面，必然的一面，當然，這是

为了然后来歪曲它，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自由派的机关报则相反，立场虽然非常明显，但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庸人精神的表现。事实上，“每日新闻”的眼光超不出自己家的大门。这家报纸知道得很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上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英国基地和英国舰队势必进一步武装和加强起来。由于这个原因，“每日新闻”极力挑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难道瓜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一样吗？难道基督徒在土耳其不是享受到比在奥地利和俄国更多的宗教自由吗？难道土耳其政府不是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允许各民族、各宗教和各地方自治机构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吗？难道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天堂吗？难道生命和财产在那里没有保障吗？英国同土耳其的贸易不是比英国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吗？难道这个贸易不是在逐年增长吗？往下就是一片赞美声（因为“每日新闻”向来就是善于唱赞美诗的），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弄得这家报纸的大多数读者都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议员阁下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这位绅士是苏格兰人，深受他家乡广泛流行的中世纪的宗法思想的熏陶，但又受过一个文明的英国人所受的现代教育，他在希腊同土耳其人打过3年仗以后到了土耳其，就一变而为最狂热的土耳其人崇拜者。这位浪漫的苏格兰高地人住到了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的山谷里，感到好像重回家乡一样。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归纳成下面三点奇谈怪论，这三点奇谈怪论实际上就是：（1）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当个土

土耳其人；(2)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教教徒，他除了信伊斯兰教外什么别的宗教都不願信；(3)只有英国和土耳其才是世界上享有自治、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国家。从此以后，这位烏尔卡尔特就被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捧之为东方問題的大权威。“每日新聞”上的土耳其贊美詩就是他提供的材料。

对問題持这种态度的人的論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論据是：“有人断言，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現在哪里呢？难道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得到迅速傳播，貿易不是得到迅速扩大嗎？在你們只看到衰落，別的就什么也看不見的地方，我們的統計学家却证明那里只有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蒸蒸日上的貿易統統記在土耳其的功劳簿上，那就大錯特錯了，而在上述情况下人們正是这样做的。这无异于我們想要判断荷兰这个通向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孔道的国家的貿易和工业发展的能力，只是以过境运输占十分之九的巨大进出口額为根据。如果这样看荷兰，任何一个統計学家都会馬上承认这是一个拙劣的騙局，而所有英国的自由派报刊，包括学术刊物“經濟学家”在內，却企图硬要輕信的公众这样看土耳其。其次，誰在土耳其进行貿易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当他們还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們进行貿易的方法只是搶劫商队，現在，他們稍許文明一点的时候，是任意强征各种各样的捐稅。居住在大海港的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貿易，而他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应当感謝土耳其的貝伊^①和帕沙让他們有从事貿易的可能。如果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貿易也决不会碰到什么災难。至于談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末

^① 貝伊是土耳其旧时小藩臣的称号。——譯者注

誰是歐洲土耳其的所有地區的這種文明進步的體現者呢？無論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因為他們為數不多，並且散居全國各地；除了君士坦丁堡和兩三個不大的農業地區之外，恐怕說不出他們還有哪些定居地點。各城市和各貿易地點的斯拉夫的和希臘的資產階級才是真正滲入這個國家的任何一種文明的真正支柱。這部分居民越來越富，影響越來越大，而土耳其人則越來越被擠到後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壟斷了民政軍政的官職，那末很快就會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但是這種壟斷在將來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將由強變弱，只能是進步道路上的絆腳石。事實總是事實——應當從土耳其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但是，如果斷言只有讓俄國人或奧地利人取代土耳其人才能做到這一點，那仍然等於斷言歐洲現在的政治狀況將永恆地保持下去。可是誰敢堅持這種斷言呢？

弗·恩格斯寫於 1853 年 3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 1853 年 4 月 19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746 號

卡·馬克思 柏林密謀

1853年4月1日星期五于倫敦

第五“大国”普魯士終於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为奥地利警察当局对革命者的“蠱惑陰謀”的大揭露⁴²做出自己的貢獻。

官方報紙告訴我們說：“政府在得到民主派領袖經常与革命宣傳有关系的证明后，下令于3月29日在柏林进行住宅搜查，搜查时逮捕了40人，其中有施特雷克富斯和普魯士国民議會前議員貝倫茲、瓦尔德克等人。搜查是在80个有参加密謀嫌疑的人的家里进行的。查获了武器和彈药。”

普魯士政府不以在自己的官方報紙上发表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为滿足，它还认为应该用电报通知英国外交部。

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这个新的可笑的把戏的秘密，必須追溯一下前些时候的事情。在波拿巴 coup d'état [政变] 两个月之后，柏林警察总监辛凱尔迪先生和他的下屬警务顧問施梯伯先生两人背后商定：前者做普魯士的**莫帕**，后者做普魯士的**比埃特里**。看来，法国警察当局的举世聞名的无上权力使他們艳羨不止。辛凱尔迪去找內政部长馮·威斯特华倫先生，向这位平庸而又狂热的反动分子（馮·威斯特华倫先生是我的內弟，我完全有机会充分了解过他的智力）做了个沒有根据的报告，证明必須把普魯士国家的全部警察权力集中在这位柏林警察总监的手里。他肯定說，为了使

警察当局的活动更灵活机动，应该使它不受内政部长的管辖而完全交给他辛凯尔迪负责掌握。内政部长馮·威斯特华倫代表普魯士貴族中最保守的集团，而首相馮·曼托伊費尔先生則代表旧官僚。他們两人是政敌。尽管辛凯尔迪的建議显然会縮小内政部的活动范围，但馮·威斯特华倫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因为他的政敌的兄弟馮·曼托伊費尔先生在內政部当司长，专门负责监督整个警察事务），因此就把辛凯尔迪的建議呈交由国王^①亲自主持的国务會議审核。

爭論異常激烈。得到普魯士亲王支持的曼托伊費尔反对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建議。国王則同意馮·威斯特华倫先生的建議。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所罗門式的决定，說“如果事实向他证明采取这个步驟是必要的”，他就效法波拿巴成立一个警务部。于是，为了举出这样的事实，辛凯尔迪和施梯伯就选择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⁴³。他們在科倫案件中的英雄功績，諸君都知道了。科倫案件结束后，普魯士政府就决定把这位在科倫的街道上一露面就挨嘘的公然背誓者施梯伯提升为科倫警察厅长。但是，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和萊茵普魯士的其他好心的保守派議員进行了干涉，他們警告大臣們說，当波拿巴正在极力要求法国**天然边界**⁴⁴的时候，这种公然触犯这个省的社会輿論的作法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政府作了让步，任命施梯伯为柏林警察厅长，以奖励他在科倫的背誓行为和**在倫敦的盜窃勾当**。事情到此就暂时擱置下来。科倫案件已不可能实现辛凯尔迪先生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願望了。辛凯尔迪和施梯伯等待好机会到来。正好碰上了米兰起义。施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伯馬上在柏林逮捕了 20 个人。但是，这种把戏是太可笑了，无法开庭审判。然而接着又发生了李伯尼行刺事件，这样一来，国王就完全願意作出决定了。胆战心惊的国王馬上认为必須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于是辛凱尔迪的宿願实现了。国王一紙令下，使他成了普魯士的**莫帕**，而馮·曼托伊費尔先生的兄弟也就提出了辞职。但是，这场滑稽剧的最可笑的一幕还在后头。辛凱尔迪先生剛升任新职，立即又揭露出一个“柏林大密謀”。可見，这个密謀是专为证明辛凱尔迪先生的必要而安排的。这是辛凱尔迪先生用以交换自己剛剛到手的生杀予夺的警察权力而献給昏庸的国王的謝礼。辛凱尔迪的助手，善于制造奇案的施梯伯过去在科倫发现，結尾凡是有“敬礼”和“兄弟友誼”字样的信，毫無疑問都是存在共产主义密謀的证据，現在又发现，在柏林从某个时候起出现了多得可怕的“卡拉布里亚帽”，这种帽子一定是革命者的“暗号”。根据这个重要的发现，施梯伯在 3 月 18 日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工人和外国人，罪名是戴了卡拉布里亚帽。同月 23 日又搜查了馬格德堡一个商人卡尔·德利烏斯（第二議院一个議員的兄弟）的住宅；这个人对卡拉布里亚帽也有一种倒霉的爱好。最后，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时所报道的，上月 29 日在柏林进行了反对卡拉布里亚帽的大 coup d'état [政变]。凡是多少知道瓦尔德克、貝倫茲等这些无足輕重的反对派的人，都会为在这些无害于任何人的布魯士斯之流的家里查出“武器和彈药”而大笑一場。

但是，不管警察当局的这场滑稽剧（可以說，这场滑稽剧純粹是由于辛凱尔迪和施梯伯两位先生的个人动机而排演的）多么无聊，它却不是沒有意义的。普魯士政府由于处处碰到消极反抗而大伤脑筋。它在看来淡漠的气氛中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它由于捉

摸不到这个怪影而感到失望，因此每当警察当局給它找到这个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見的敌人的化身时，它就感到好像摆脱了一场恶梦。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发动进攻；它的把人民消极反抗变为积极反抗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4 月 1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74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我們看到，欧洲的国家要人們由于頑固的不学无术、傳統的因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懶惰，都迴避回答这个問題，甚至根本不打算回答。阿伯丁和帕麦斯頓，梅特涅和基佐都认为已經沒有希望找到任何解决这个問題的方法，至于 1848—1852 年时期他們的那些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說了，这些人的名字后代人永远不会提起。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慢慢地，但是一步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全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計謀和手腕放在眼里。

欧洲各国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但是没有一个官方要人能够解釋这个事实。他們看到这个事实的影响，甚至看到它的后果，但是原因何在，他們仍然不知道，尽管一切因由都非常簡單。

推动俄国去占領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別的，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沒有实现过的維持 status quo [現狀] 的理論。

Status quo 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轄下的基督教臣民來說，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們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們只要

仍然处在土耳其統治的压迫下，他們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和 6 000 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 1 000 万正教徒向俄国求援。

我們且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早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棄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惠。它终于在締結阿德里安堡条約(1829 年)⁴⁵的时候取得了极为广泛的特权，以致上述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受制于土耳其。当 1804 年爆发了塞爾維亞革命的时候，俄国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萊雅”，在两次战争中支持他們，在两个条約中保障他們取得了本国的内政独立⁴⁶。而在希腊起义期間又是誰决定了斗争的結局呢？不是亚尼納的帕沙阿利和他的一切阴谋叛乱，不是納瓦林会战，不是摩里亞的法国军队，不是倫敦會議和議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領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馬里乍河河谷的俄国军队⁴⁷。于是，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們仍然把 status quo 和奧斯曼帝國的領土的不可侵犯当做某种圣物来保障和維持！

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則仍然是傳統的政策，即無論如何都要維持 status quo，維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

現在暫且假定，土耳其在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島上的統治結束，那里的政体比較符合人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地位如何呢？大家知道，在土耳其境內每一个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独立的国

家里，都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說，在俄国的援助是掙脫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一旦对这种压迫的恐惧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土耳其人的統治被排挤到波斯普魯斯海峽以东，如果巴尔干半島上的各个民族获得自由并享有信仰自由，如果欧洲列强的各种計劃和阴謀，各种針鋒相对的意图和利益都在那里暢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提出这样的問題。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頓、阿伯丁、克拉倫登和大陆上形形色色的外交大臣們有能力做出任何这样的行动。他們即使想一下这件事也不能不发抖。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擋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車輪是怎样无情地馳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廢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謀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說，只要了解和重視我們时代的異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風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紀，——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問題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問題。

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問題，正如其他重大問題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問題也归在这个偉大运

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龐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

如果企图为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可能分割草拟详尽的蓝图,那就是无聊的幻想。可以想出至少20种草案,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19种一样合适。但是我们打算做的,并不是編造空幻的计划,而是要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探讨的这个問題有两个方面。

首先,决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叫做欧洲土耳其的半島是南方斯拉夫种族世代相傳的当然财产。在1200万居民当中有700万属于这一种族。它占有本土已有12个世紀了。如果把极少数本屬斯拉夫族而改說希腊語的居民除外,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或阿尔納烏特人是斯拉夫人的对头。这些土耳其人早就被斥責为仇視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不錯,他們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們在塞尔維亞已經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維亞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們同数量大大超过他們的敌人进行了11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內政自主。近20年来,他們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馬其頓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維亞看做他們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塞尔維亞、塞尔維亞民族的結合程度越大,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試看,塞尔維亞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經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

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組織。因此才出現这样的反常現象：塞爾維亞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本身却是君主立宪，而且从一解放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無論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緣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們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两国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貿易需求来看就易于理解这一点。俄国是密封的大陆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有朝一日工业生产也可能发展起来。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島的版图不大而海岸綫极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自己控制；因此，它在目前主要是过境貿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壟断，而南方斯拉夫人則要扩大市場。此外，他們在中亚还是竞争对手，俄国的现实利益要求除自己的商品外不准任何其他商品渗入中亚，而南方斯拉夫人目前就已經迫切要求把西欧的商品运往东方市場。在这种条件下，两个民族怎么能互相一致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現在就同西欧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当現在从奥斯坦德、哈佛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綫延至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正如現在計劃的那樣）的时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貿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經常化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內的斯拉夫人深受要由他們供养的穆斯林軍事占領者的压迫。这个軍事占領者階級独攬一切国家职权：軍事的、民政的和司法的。但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結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按軍事方式来組織等級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負全部費用的軍事占領嗎？誰要是认为这类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請他看看 1804 年以来的塞爾維亞历史吧。塞爾維亞独立的締造者卡拉-格奧尔基被人民唾

棄了，重新恢复了這個独立的米洛什·奧布廉諾維奇可耻地被逐出国，这两个人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軍事的官僚制和敲詐勒索，像土耳其的帕沙們現在所做的那样。

总之，这个问题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历史和現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須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廢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間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領君士坦丁堡。它势必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在衰敗虛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原地上促成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⁴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3 年 4 月 2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74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柏林密謀。——倫敦警察局。
——馬志尼。——拉德茨基

1853年4月8日星期五于倫敦

当我写上一篇关于施梯伯先生所揭发的大密謀的文章^①时，我还不可能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将被柏林的两家保守派报纸或多或少地证实。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所领导的保守派机关报“普魯士周刊”⁴⁹ 4月2日被沒收了，因为它劝告自己的讀者“不要太相信警察当局对最近的逮捕所說的瞎話”。但是，普魯士政府中以馮·曼托伊費尔先生为首的集团办的半官方报纸“时代报”⁵⁰发表的一篇文章，意义还要大得多。“时代报”被迫承认：

“凡是眼睛沒有失明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欧洲整个局势中的无数难以解决的复杂問題迟早会引起可怕的爆炸。欧洲大国的真誠努力可以暂时延緩这种爆炸，但它們决不能根本防止这种爆炸，即使是它們作尽人力所及的一切…… 我們认为我們的职责是不要繼續掩盖不滿情緒日益扩大的事实；而更其危險和更加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这种不滿情緒不是流露在外面，而是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們心中，应该直言不諱地說，这种不滿是由于要在普魯士实现反革命的企图而引起的，这种企图最近竟非常 *étourderie*（輕率地）表露出来了。”

① 見本卷第31—34頁。——編者注

“时代报”只是在結尾时說錯了。普魯士的反革命决非始于今日，相反地，它已接近完成了。这不是一种新現象，这种現象早在1848年3月20日就开始了，而从那一天起就日益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目前普魯士政府正在酝酿两个极端危險的方案。一个是限制不动产分配的自由，另一个是把国民教育置于教会的监护之下。很难再想出两个更能使政府脫离萊茵普魯士的农民和整个王国的资产阶级的措施了。还有一个笑話，由于“大密謀的揭露”，柏林卫生协会(病人互助协会)竟被强迫解散了。这个协会約有1万名属于工人阶级成分的会员。看来政府认为，現行的普魯士国家的宪法是同“卫生”不相容的。

至今沒有对倫敦警察局的行为发生过怀疑的倫敦报界，看到維也納“新聞报”⁵¹和比利时的主要反动报纸“解放”⁵²刊登了一条消息，說倫敦警察局編制了一份所有住在倫敦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并附有他們的私人生活和举止行动的詳細情况，它們都吃了一惊。

“晨报”叫道：“既然对外国人可以实行这种办法，那末只要政府或政府的任何一个成员认为必要，也就会采取这种办法来詳細調查我国同胞的私人生活了……倫敦警察将要扮演他們大陆上的同事們所担任的可耻的角色，这岂不令人痛心？”

除了比利时报纸及其他报纸的上述报道外，倫敦的报纸上今天还登載了这样一条来自維也納的电訊，电訊說：

“关于流亡者的問題已經解决：英国政府答应严密監視流亡者，一旦發現他們参加某种革命陰謀，必将依法予以严惩。”

“晨报”就此发表評論說：

“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贱，竟拜倒在奥地利的脚下。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卑贱的了。联合内阁弄到这种地步是必然的。”

我听到非常可靠的消息說，只要馬志尼住在倫敦的消息一經证实，皇家法官們就打算对他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我又听說下院要就大臣們同奥地利的可耻勾結和他們在流亡者問題上的一般意图提出质詢。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写过，拉德茨基很想用米兰起义作口实“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錢”⁵³。这种看法不久就得到了最肯定的证实。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已由国家管制的、自1847年起以倫巴第流亡者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債据和典契，均作无效。这种沒收财产的做法，只证明奥地利国库 horror vacui [害怕真空]。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过去到处拿革命当祭品供奉自己的上帝——私有制。现在反革命背棄了这个上帝。

今天从海底电綫得到消息說，緬施科夫公爵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協議，俄国軍隊得到命令撤离土耳其边境，东方問題这次又順利結束了。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4月8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3年4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374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希尔施的自供

希尔施的“自供”⁵⁴在我看来仅仅在有旁证的情况下多少有点价值，这是因为，这些供状是前后矛盾的。希尔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从科倫回来后，曾在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說，維利希是他的同謀。自然，要求把这个虛假的供状記錄下来的建議被輕蔑地拒絕了。曾有各种人向我暗示（不知道他們是受了希尔施的委托还是自动这样做的），說是希尔施表示願意向我彻底坦白。我拒絕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希尔施正处于极端貧困之中。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最后的”供状是为了目前津貼他的那个党派的利益而写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非藏在一個叫希尔施的人的背后不可。

現在我只談几点意見。我們都握有其他一些密探如維多克、謝努、德拉奧德等人的自供⁵⁵。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所有這些密探都不是普通的密探，而是高尚的密探，是“庫伯密探”⁵⁶的嫡系子孫。他們的自供必然只不过是自我辯護。

例如，希尔施企图暗示說，关于我的党内同志集会的日期，不是他而是班迪亚上校向格萊夫告密，而后者又通知了弗略里的。希尔施参加过的那几次我們的會議，都是星期四举行的。但是在希尔施被赶走以后，我們的會議便改为星期三举行了。在伪造的

會議記錄⁵⁷上，無論是在希尔施参加之前，还是在他被赶走之后，會議的日期都标明是星期四。除了希尔施之外，又有誰能搞出这样的“誤会”呢？

从另一点看，希尔施就比较走运了。希尔施一口咬定，班迪亚曾多次提供了关于我和德国通信的情报。既然科倫案件中一切与此有关材料都是伪造的，那末，当然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究竟是誰捏造的了。現在我們来談一談班迪亚。

班迪亚是密探也罢，不是密探也罢，他对我或者对我的党内同志从来都不能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談过我的党内的事情，而且班迪亚本人也竭力避免談到这些，正如他在自己的一封申辯书中向我表白的那样。因此，不管他是不是密探，他都不可能告发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科倫案件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证明，除了在德国制造的那些供詞和在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外，普魯士警察当局对于我所屬的那个党的事情便一无所知了。因此，它才不得不制造出最荒唐无稽的东西来。

可是，班迪亚不是把馬克思的“关于流亡者”的小册子⁵⁸出卖給警察当局了嗎？

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班迪亚曾經从我这儿打听到，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我打算出一部关于在倫敦的德国流亡者的书，并分成几册出版。班迪亚滿有把握地說，他能够在柏林找到出版人。我請他馬上就去打听。过了8—10天，他通知說，柏林有一个名叫艾澤曼的出版人，願意出**第一册**，条件是作者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怕书被沒收。我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同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稿費在手稿交出之后立即付清（我是想避免再发生我在“新萊茵报評論”⁵⁹时期发生的事情），手稿送到之

后立即付印。我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在那里我們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此期間，班迪亚交給我的妻子一封柏林来信，在这封信中，艾澤曼接受了我的条件，但說明是否出第二册，要看第一册的銷路如何。我回来以后，班迪亚收到手稿，而我則拿到稿費。

然而，出书的事情在种种堂皇的借口下一直拖延着，我就有点怀疑起来。倒不是疑心手稿被轉交給了警察当局，由警察当局来出。即使是俄国皇帝，只要他同意明天就付印，我也情願今天就把我的手稿交給他；相反地，我只是担心他們把手稿束之高閣。

在手稿中，我們攻击了时髦的空談家，我們攻击这些人，当然不是因为他們对国家說来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們起着反革命敗类的的作用。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奥尔格·維尔特（我曾請他在柏林打听艾澤曼其人）写信告訴我說，他根本找不到什么艾澤曼。于是我便同德朗克一起到班迪亚那里去。这时才发现艾澤曼原来是雅科布·柯尔曼的一个經理。因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班迪亚的一篇书面声明，所以我坚决要求班迪亚当着我的面写一封信給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把他向我說过的一切情况重述一遍，并且把柯尔曼的地址告訴他。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短信給布魯諾·鮑威尔，請他打听一下，在班迪亚对我說的那所柯尔曼的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但是我沒有收到回信。而那位冒牌的出版人对我一再写信詢問的答复是：我沒有經過任何合同来約定出版手稿的确切日期，最好能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最为适宜。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就扮演起受委屈的角色来。最后，班迪亚向我声明，出版人拒絕出书，并把手稿退了回来。班迪亚本人則在巴黎躲起来了。

有关前后一切交涉的柏林来信和班迪亚的信件（其中还包括

班迪亚企图替自己申辯的信件),都在我的手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流亡者关于班迪亚的为人所散布的疑心沒有使我不安呢?这是因为我知道产生这些疑心的“前因”。这种前因,就让它受到应有的待遇,暫且秘而不宣吧。

因为我知道,在匈牙利战争期間,班迪亚以革命軍官的資格执行过类似的委托。因为他和我所尊敬的瑟美列有过通信关系,他和佩尔采尔將軍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亲眼看見科苏特任命班迪亚为自己 in partibus [在国外的]^①警察总监的证件,证件上还有科苏特的亲信、曾跟班迪亚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西尔莫伊伯爵的签字。班迪亚在科苏特那里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同样也說明班迪亚和警察有必要的来往。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班迪亚現在也还是科苏特在巴黎的代理人。

匈牙利的領袖們知道,他們同誰打了交道。和他們比較起来,我算冒什么險呢?什么危險也沒有,只是手稿的副本可能被弄去藏起来,但原稿还保存在我的手里。

以后,我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人利齐烏斯和德国的其他一些出版人探詢了一下,問他們是否願意出版上面提到的那部手稿。他們回答說,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最近則有希望在德国国境以外出版。

我的这些說明自然不是讲給希尔施先生听的,而是讲給我在美国的同胞們听的。經過这番說明之后,关于普魯士警察当局为什么要把抨击金克尔、維利希等等“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册子封鎖起来这个問題,不知道是否仍是“悬案”?

^① 直譯是:“在異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主教被任命担負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有名无实的主教职务时所附加的封号。——編者注

啊！埃林杜尔，告訴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①

1853年4月9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4月9日
載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
和紐約刑法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美文学杂志
和紐約刑法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引自繆尔納的悲劇“罪”第二幕第五場。——編者注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50)

LONDON, SATURDAY, APRIL 16, 1853.

(Price Fourpence.)

卡·馬克思

新的財政把戏或格萊斯頓和辨士⁶⁰

讀者諸君根据自身的痛苦經驗知道，并且在感到自己錢袋空虛的时候体会到，由于过去玩弄种种財政把戏，人民已經負上 8 亿英鎊的國債。这些債款主要是为了防止美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反对上个世紀的法国革命而发行的。國債的增加对国家支出的增加所起的影响，可以从下面的統計表中看出：

1. 國 債⁶¹

威廉逝世后女王安即位时(1701)	16 394 702 英鎊
乔治一世即位时(1714)	54 145 363 英鎊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1727)	52 092 235 英鎊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1760)	146 682 844 英鎊
美洲战争之后(1784)	257 213 043 英鎊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1801)	579 931 447 英鎊
1810 年 1 月(拿破侖战争时期)	811 898 082 英鎊
1815 年以后	約 1 000 000 000 英鎊

2. 国家支出

包括國債利息在內的一切支出共計：

威廉逝世后女王安即位时(1701)	5 610 987 英鎊
乔治一世即位时(1714)	6 633 581 英鎊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1727)	5 441 248 英鎊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1760)	24 456 940 英鎊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1801)	61 278 018 英鎊

3. 国 稅

女王安时期(1701)	4 212 358 英鎊
乔治一世时期(1714)	6 762 643 英鎊
乔治二世时期(1727)	6 522 540 英鎊
乔治三世时期(1760)	8 744 682 英鎊
美洲战争之后(1784)	13 300 921 英鎊
反雅各宾战争之后(1801)	36 728 971 英鎊
1809年	70 240 226 英鎊
1815年后	約 82 000 000 英鎊

人民根据自己錢袋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因國債而来的稅捐是怎样的一种負担。然而許多人还不知道國債在发行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以及國債在繼續存在的現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国家”，这是土地貴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統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錢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資本家和高利貸者借錢，而付給他們一紙凭据，并且規定每 100 英鎊借款必須付給一定数量的利息。国家用課稅的办法向工人階級榨取金錢来支付这些款子。这样，人民便給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那些借錢給压迫者的人放心借錢給他們压迫人民。构成國債的借款名目繁多；有的按三厘付息，有的按三厘五或四厘付息不等。根据利率的不同以及其他条件，国家的有价证券就有不同的名称，如三厘证券以及其他等等。

这些利息的担負者不仅仅是工人階級，工厂主和大地主也不得不担負一部分，同时他們还力图尽量少担負一些，因此，每一任財政大臣，只要他不是輝格党人，都企图用某种方法来減輕这种負擔。

4月6日，在本屆內閣預算提出之前，格萊斯頓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个关于國債的決議案。早在他发表这次演說之前，“紀事晨报”就曾报道，內閣将提出极其重要的決議案，“据傳这些決議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別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謠傳，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漲了。給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萊斯頓打算清償國債。总之，“嚶了这一陣是为了什么呢？”⁶²

格萊斯頓先生的建議的最終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說，是要把各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經依次分別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末現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3%降低到2.5%呢？

可是我們看一看，格萊斯頓先生建議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他建議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海公司⁶³有关、總額为950万英鎊的各种证券統一起来，并把它們的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25 000英鎊。在每年支出3 000万英鎊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25 000英鎊，这实在不值得怎样特別贊美。

第二，他建議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國庫債券的有价证券，總額不超过3 000万英鎊。这些債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

1864年9月1日以前按利率2.75%計息，自此以後到1894年9月1日則按2.5%計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商业階級有利的新的財政机构。他說“不收代售佣金”的意思，就是說，西蒂的商人用不着任何支出。目前所有的是总額为1800万英鎊按利率1.5%計息的國庫期票。按照比國庫期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國庫債券的利息对国家說来不是要亏一笔錢嗎？無論如何，这第二个建議絲毫也无助于减少國債。國庫期票只能在大不列顛流通，而國庫債券則可以当作普通期票来轉让；因而，这一措施只对西蒂的商人有利，而人民則要為它付出昂貴的代價。

最后，現在讓我們談談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統一公債券和“三厘跌息”證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5亿英鎊的資本。由于議会有一个决定，禁止不在12个月以前預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證券的利息，所以格萊斯頓先生選擇了自願兌換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法供三厘證券的持有者選擇，以便把三厘證券換成其他一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證券。每100英鎊的三厘證券有三种兌換方法，三厘證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一种：

1. 三厘證券的一部分換成國庫債券：每100英鎊的三厘證券可以換成同等价值的國庫債券，后者的利息在1864年以前每年是2英鎊15先令，1864年以後至1894年以前每年是2英鎊10先令。如果年利二厘五的3000万英鎊的國庫債券換回来3000万英鎊的三厘證券，那末在头10年內就可节省75000英鎊，而在以後的时期內則可节省15万英鎊，总共节省225000英鎊。但是这样一来，在40年期滿时政府就得把3000万英鎊的債款全部償清。因此，这个方案絲毫也不能取消或使國債減輕多少。当每年的支出达到3000万英鎊的时候，节省225000英鎊有什么意义呢？

2. 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 82 英镑 10 先令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的利息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每 100 英镑是 3 英镑 10 先令。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 100 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 3 英镑，而是 2 英镑 17 先令 9 辨士，也就是说减少了 2 先令 3 辨士。如果 5 亿英镑全都用这种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付的利息就只有 14 437 500 英镑，而不是现在的 1 500 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 562 500 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 562 500 英镑，议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证利息超过 2.8%！然而，格萊斯頓也会赢得一点好处：到 40 年期滿之前，存在的就不是目前受到 12 个月前預告的規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而是议会可以按名义价值收回的三厘五证券。格萊斯頓建議不要規定发行这种三厘五证券的限額。

3. 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当格萊斯頓先生在 4 月 6 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沒有限定发行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其他两个办法比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願用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 5 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 125 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債却会增加 5 000 万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萊斯頓先生第二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議把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3 000 万英镑。由于規定了这个限額，他的建議对这笔龐大的国債几乎失

去了任何影响；它只能使这笔借款增加 300 万英镑而已。

現在諸君知道，所謂“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規模最大的財政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沒有有什么比所謂財政更帶欺騙性了。玩弄這門“神秘科學”的術士們把有關預算和國債的最簡單的業務蒙上一層難懂術語的外衣，掩蓋着普通的騙術：發行名目繁多的證券，舊證券換新證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額，提高利息而減少基本金額，設立獎金、獎勵和優惠存款，規定有償年金和無償年金的區別，把轉讓不同證券的利益人為地分成等級。所有這些令人厭惡的生意經和一大堆不勝其多的煩瑣規定，把公眾完全給弄糊塗了。但同時，每一次這種財政把戲都為高利貸者造成加緊進行害人的掠奪活動的有利機會，對於這種機會，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是不會放過的。沒有疑問，格萊斯頓先生是玩弄這種財政煉金術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議的特點描繪得最清楚的，恐怕莫過於迪斯累里先生的話了：

“在我看來，哪怕是最機靈的詭辯家的聰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複雜和更奧妙的安排來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結果了。在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個針尖上能有多少個安琪兒跳舞的問題。這是只有人類的天才才能發出的最稀有的議論之一，我發現，在提出的決議案中就有某種和這個傑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記得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格萊斯頓計劃的最終目的是要推行“標準的”二厘五的國家有價證券。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要發行數量非常有限的這種二厘五證券和數量不限的三厘五證券。為了實現有限制地發行二厘五證券，他把利率降低 0.5%，並用獎勵 10% 的辦法來增加基本金額。為了擺脫三厘證券的立法保障（12 個月以前預告）所造成的困難，他寧願用今後半個世紀的法

律明文來束縛住自己。簡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人民在未来半个世紀內將喪失任何擺脫財政壓迫的機會。

任何人都會同意這樣的意見：如果說，關於取消對猶太人權利的限制的法案是確立宗教寬容的微小嘗試，關於加拿大預備基金的法案是承認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嘗試，而關於教育的決議案是迴避國民教育問題的微小嘗試，那末，格萊斯頓的財政方案便是企圖對付名叫大不列顛國債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嘗試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4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4 月 16 日“人民報”

俄文譯自“人民報”

第 50 號

署名：卡·馬·

卡·馬克思 內閣的成就⁶⁴

1853年4月12日星期二于倫敦

如果要为联合內閣說句最好的話，看来可以这样說：联合內閣表現了过渡时期的政权的軟弱无能，在这个时期中，有存在可能的不是真正的政府，而仅仅是表面的政府；旧的政党正在退出舞台，而新的政党还没有結合起来。

“群賢政府”在它最初三个月的活动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举行了二讀，关于加拿大教会預备基金的法案举行了三讀。后一法案将使加拿大立法机关能够掌握一部分出卖土地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原先是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独占的。这个法案在約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条款。第三条要求廢除这样一条法律：在出卖加拿大土地的进款不到9 285 英鎊的年代中所产生的赤字，应当用国家統一基金来弥补。这一法案在二讀时已經通过。但是在3月18日議會作为全院委员会⁶⁵开会討論这一法案的时候，約翰勋爵却突然要求撤銷他提出的第三条。因而，如果加拿大立法机关收回教会預备基金的話，那末，英国人民就不得不每年从自己的口袋里付出将近10 000 英鎊来維持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教派。反对給宗教界任何补助的激进派大臣威·摩耳斯沃思爵士，看来已

經成为約翰勛爵的这样一种理論的信徒，即“不列顛的殖民地只有靠宗主国英国人民出錢才能摆脱国教会这种負担”。

在內閣活动的头三个月中，激进派提出了三个決議案。柯立尔先生建議取消教会法庭，威廉斯先生建議使遺產稅和遺囑驗認稅也适用于不动产，而休謨先生則建議廢除一切“純粹保护性”關稅。不言而喻，內閣对这些“激进的”改革表示了反对。不过，联合內閣反对改革的方式是另一种，与托利党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托利党人是断然宣称他們坚决反对“对民主的侵犯”。联合內閣实际上也是这样，只不过借口必須为改革作更周密的准备而已。它是靠改革为生的，就像过去历届內閣靠营私舞弊为生一样。它装出非常热心于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想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拖延改革：一会儿說，“最好等調查出結果以后再說”；一会儿說，“剛剛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得到它的結論以前什么也不能做”；一会儿說，“政府恰巧正在研究这个問題”，并希望自己的緊張的腦力工作不被打断；一会儿又說，“問題值得議會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討論”，“适当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要很久，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局部性的措施应当暫緩执行，以便改組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制度应当保存下来，以便实行局部性措施。在东方問題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样也是內閣的对內政策。

当約翰·罗素勛爵第一次宣讀了联合內閣的綱領并且这个綱領引起了普遍慌乱的时候，罗素的拥护者曾大叫大喊道：“我們应当有一种能够激发热情的东西。国民教育問題就应该是这样的东西。我們的罗素正在制定一个惊人的組織国民教育的計劃。你們等着看吧。”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这个計劃。4月4日罗素大体上說明了

他所拟定的教育改革計劃。这个改革的基本要点是：授权市議會征收地方稅来維持現有的必須讲授英国国教教义的学校。談到各大学——国家教会的寵儿，任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約翰勋爵希望，“各大学自行改革”。把兴办学校的慈善基金用来营私舞弊，这是尽人皆知的。从以下材料可以了解到这些基金的数量：

“每年得到补充的慈善基金，从2 000 英鎊到3 000 英鎊的有24 笔，从3 000 英鎊到4 000 英鎊的有10 笔，从4 000 英鎊到5 000 英鎊的有4 笔，从5 000 英鎊到6 000 英鎊的有2 笔，从8 000 英鎊到9 000 英鎊的有3 笔，10 000 英鎊、15 000 英鎊、20 000 英鎊、25 000 英鎊、30 000 英鎊和35 000 英鎊的基金各1 笔。”

不需要有特別敏銳的目光就可以猜想到，靠濫用这些基金为生的寡头們在处理这些基金时为什么极为小心謹慎了。罗素建議：

“关于每年进款不超过30 英鎊的慈善基金的案件由郡的法庭审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目，則由大法官法庭的档案保管官审理。但是，如果没有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樞密院委員會的許可，無論在哪一个法庭上，都不得提起訴訟。”

为了在皇家法庭上提出訴訟，要求賠償被貪污的本来規定用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慈善基金，就需要得到委員會的許可。許可！但是，罗素甚至在提出了这个附带条件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心。他补充說：

“如果发现某一学校的行政上有营私舞弊之罪，除了樞密院委員會而外任何人都不得干預。”

这是地道的英国老味道的改革，新事物一个不立，旧事物一个不破。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人們比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謂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这就

是英国的寡头立法的“傳統智慧”的秘密。干脆点說，这实质上就是使营私舞弊的行为带有傳統的性质，为此——不妨这样說——就不时給这些現象加一些新鮮血液使它們新鮮一下。

任何人都会同这样的意見：如果說，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寬容的微小嘗試，关于加拿大預备基金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嘗試，而关于教育的法案是迴避国民教育問題的微小嘗試，那末，格萊斯頓的財政方案无疑就是企图对付名叫大不列顛國債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的嘗試了。

4月6日，在預算公布之前，格萊斯頓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个关于國債的決議案。还在这次演說发表以前，“紀事晨报”就发表了一篇專門的报道，說內閣将提出极为重要的決議案，“据傳这些決議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別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謠傳，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漲了。給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萊斯頓打算清偿國債。但是，当4月8日議會举行會議，以全院委員會的資格来审查这些決議案的时候，格萊斯頓突然作了修改，而且修改得这样多，以致完全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現在，我們要像迪斯累里先生一样发問：“嚷了这一陣是为了什么呢？”

格萊斯頓先生的建議的最終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說，是要把各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經依次分別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末現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3%降低到2.5%呢？格萊斯頓先生的建議如下：

第一，他建議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海公司有关、总額为950万英鎊的各种证券統一起来，并把它們的

利息从 3 % 强行降低到 2.75 %。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 25 000 英鎊。在每年支出 3 000 万英鎊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 25 000 英鎊，这并不能算是值得特别驕傲的事情。

第二，他建議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國庫債券**的有价证券，总額不超过 3 000 万英鎊。这些債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1864 年 9 月 1 日以前按利率 2.75 % 計息，自此以后到 1894 年 9 月 1 日則按利率 2.5 % 計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商业階級有利的新的財政机构。但是，格萊斯頓如何能够在保持总額达 1 800 万英鎊，利息为 1.5 % 的國庫期票的流通的同时又发行利息为 2.5 % 的國庫債券呢？按照比國庫期票大 1 % 的利率来偿付國庫債券的利息对国家說来不是要亏一笔錢嗎？这第二个建議不管怎么样，它对減輕國債絲毫也沒有帮助。

最后，第三，讓我們談談格萊斯頓的決議案的最主要和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統一公債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 5 亿英鎊的資本。Hic Rhodus, hic salta! ① 由于議会有一个决定，禁止不在 12 个月以前預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所以格萊斯頓先生選擇了自願兌換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選擇，以便把三厘证券換成其他一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 100 英鎊的三厘证券有几种兌換方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其中一种：

1. 每 100 英鎊的三厘证券可以換成同等价值的國庫債券，后

①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话源出伊索寓言“說大話的人”，这个人吹嘘自己曾經在罗陀斯島上跳得很远很远，人們就对他說了这句话。）——編者注

者的利息在 1864 年以前是 2.75%，自此以后至 1894 年是 2.5%。如果年利二厘五的 3 000 万英鎊的國庫債券換回來 3 000 万英鎊的三厘證券，那末在頭 10 年內就可節省 75 000 英鎊，而在以後的時期內則可節省 15 000 英鎊，總共節省 225 000 英鎊。但是這樣一來，政府就得把 3 000 万英鎊的債款全部償清。因此，這個方案絲毫也并不能使國債減輕多少。

2. 第二個辦法是：三厘證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鎊的三厘證券換成 82 英鎊 10 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證券，後者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將按 3.5% 的利率計息。這樣做的結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證券的人，從現在的每 100 英鎊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 3 英鎊，而是 2 英鎊 17 先令 9 辨士。在這種情況下，每年從每 100 英鎊中所得到的收入將會減少 2 先令 3 辨士。如果 5 億英鎊全都用這種辦法來兌換的話，那末國家每年償付的利息就只有 14 437 500 英鎊，而不是現在的 1 500 万英鎊。這就是說，每年可節省 562 500 英鎊。但是，為了節省這 562 500 英鎊，議會就要在整整半個世紀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來，并在任何利率都極不可靠的不穩定時期保證利息超過 2.8%！然而，另一方面，格萊斯頓先生至少也會贏得一點好處：到 40 年期滿之前，他再用不着替目前受到 12 個月前預告的規定所保障的三厘證券操心了。格萊斯頓將只同議會可以按名義價值收回的三厘五證券打交道。格萊斯頓建議不要規定發行這種三厘五證券的限額。

3. 第三個辦法是：三厘證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鎊的三厘證券換成新的 110 英鎊的二厘五證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當格萊斯頓先生在 4 月 6 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時候，他沒有限定這種將要發行的二厘五證券的數量。但是，迪斯累里

先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前两个办法比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願用 100 英鎊的三厘证券来兌換 110 英鎊的二厘五证券。如果 5 亿英鎊的三厘证券都換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 125 万英鎊，然而另一方面，国債的基本金額却会增加 5 000 万英鎊。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萊斯頓先生第二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議把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3 000 万英鎊。由于規定了这个限額，他的第三个办法从对国債的影响来看便失去了意义。这个办法只能使这笔国債的基本金額增加 300 万英鎊而已。

現在諸君知道，所謂“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規模最大的財政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沒有什么比所謂財政更帶欺騙性了。玩弄这門神秘科学的术士們把有关預算和国債的最簡單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最普通不过的騙术：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換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額，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額，設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規定有償年金和無償年金的区别，把轉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級。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經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煩瑣規定，把公众完全給弄糊塗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財政把戏都为高利貸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貪得无饜的高利貸者是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一个經濟学家从这种乍一看来使人眼花撩乱的兌換、調配、折合当中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說是屬於財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說是屬於簡單算术或者純粹詞句方面的东西。

沒有疑問，格萊斯頓先生是玩弄这种財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議的特点描繪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

話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詭辯家的聰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結果了。在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針尖上能有多少安琪儿跳舞的問題。这是只有人类的天才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議論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決議案中就有某种和这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記得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格萊斯頓先生的計劃的最終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証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証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証券。为了實現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証券，他把利率降低了 0.5%，另一方面則規定 10% 的奖励，以求实现降低利率 0.5% 的目的。为了摆脱那种受到必須在 12 个月前預告的規定“保障”的棘手的三厘証券，他宁願在今后 40 年內用法律明文来束縛住自己。簡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末有两代人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財政状况的机会。

联合內閣在下院的处境，可以从关于表决的統計数字中看出来。在全院委员会會議上表决关于梅努特⁶⁶問題时，內閣只获得了 30 票的微弱多数。在表决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时(这个法案还没有举行三讀)，出席議会的議員共有 439 人，內閣获得了甚至还不到 30 票的多数。在討論关于加拿大預备基金的法案时，在罗素收回他所提出的第三条建議之后，內閣是因托利党人投票贊成而得救的，而它的支持者則投票反对。获得多数几乎全是靠保守党人。

我不再談內閣的内部分歧了，这些分歧表現在关于加拿大法案的辯論中，表現在各官方報紙关于所得稅問題、首先是关于对外

政策問題的熱烈爭論中。沒有一個問題聯合內閣不能像蓋札那樣給以回答。蓋札是匈牙利的國王，他加入了基督教，但仍然奉行他先前信仰的多神教的儀式，當人們問他，這兩個教他究竟信奉哪一種時，蓋札回答說：“我家東西多，可以有兩種信仰。”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4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4 月 2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753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菲格斯·奧康瑙尔。——內閣的
失敗。——預算

1853年4月19日星期二于倫敦

上星期为确定諾定昂前任議會議員菲格斯·奧康瑙尔的精神状况而召开的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我們认为，菲格斯·奧康瑙尔先生从1852年6月10日以来就患有精神病，并且没有任何恢复常态的迹象。”

奧康瑙尔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已在1848年完結。他的力量已被摧毀，他的使命已經完成。他无力去領導自己所組織的无产階級运动了，簡直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如果說，对历史的公正态度要求我不要掩盖这种情况的話，那末，它也同样責成我对这位倒下的战士的功績作出应有的評价，所以我特把厄內斯特·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对奧康瑙尔的評論介紹給讀者：

“当年的他，是一个放棄官职、財富和社会地位，拋棄有收入、有声望的事业的人；他耗費巨額資財不是为了滿足个人的自甘清苦的癖好，而是为了政治上的殉道。他使自己处于終身放逐的地位，去国离乡，而在故乡他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并且是一个最大的郡的代表。当年的他，是一个由于热爱人类而被親屬痛恨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現在几乎淪于赤貧，正走在他那充滿无比光輝劳动的生命道路的尽头…… 这就是他的一生。現在請看他的劳动成果。在力量极其衰退的时期，在紛乱、疑惑和貧困的时

期，他使我国的千百万人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奥康奈尔把爱尔兰人联合到自己周围，但这是在牧师们的协助下做到的。马志尼唤醒了意大利人，但站在他那方面的有贵族和商人。科苏特团结了匈牙利人，但站在他背后的有参议会和军队。而且无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胸中都燃烧着仇恨外国掠夺者的火焰。但是，奥康瑙尔独自——不要贵族、牧师和商人——集合和发动了被压迫的阶级反对上述所有这些人；为了把这个阶级联合起来，他甚至没有利用像民族感情这样的手段！跟着拉斐德走的是商人，跟着拉马丁走的是小店主，跟着奥康瑙尔走的是人民！但在十九世纪立宪制的英国，人民是最没有力量的。奥康瑙尔教会了他们如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⁶⁷

上一周对联合内阁来说是失败的一周。它第一次碰到一个联合反对派。在星期二，即 12 号，帕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把基尔梅赫姆残废疗养院保留下来，作为爱尔兰士兵的收容所。军务大臣^①反对这个建议。但是，尽管政府反对，这个建议仍然以 198 票对 131 票被通过了，政府的这次失败是由于爱尔兰旅⁶⁸和保守反对派联合而造成的。此后在星期四，政府又由于保守派和曼彻斯特学派⁶⁹信徒们联合而再遭失败。在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出了年年都提的关于废除“知识税”的建议之后，便废除了广告税⁷⁰。尽管格莱斯顿、罗素和悉尼等人反对，但他们还是成了少数，只得 169 票，而赞成的有 200 票。布莱特、基卜生和麦克格莱哥尔在投票时同迪斯累里、帕金顿等人站到了一起，而科布顿先生则正式声明：“他衷心接受迪斯累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使政府遭到大得多的失败的还不是议会里的表决，而是政府本身的行为。

关于轰动一时的科苏特火箭案^②详情，大概“论坛报”的读者

① 悉·赫伯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96—98 页。——编者注

已經知道了。为了证明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事先在帕麦斯顿和外国列强之間就已达成協議，只要举出帕麦斯顿自己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見就够了：

“政府所表現的敏捷和机警，取得了外国列强的信任，而这些国家原来是怀疑我国的法律是否能够制止那些好鬧事的客人的恶意行动的。”

这个案件对联合內閣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現在就已經（这一点有很大意义）迫使帕麦斯顿抛掉他那陈旧的爱穿革命时装的假面具了。甚至他的最盲目的，然而正直的崇拜者“晨报”也公开和他断絕关系了。从帕麦斯顿向十二月二日和薩托里广场的英雄献贈祝願的时候起，他这颗明星就开始昏暗，而当他公开成为“奥地利大臣”的时候，这颗明星就完全西沉了⁷¹。至于联合內閣，恰好，它的使命正在于使現在的群賢和旧时寡头政治的干才一齐垮台。联合內閣正以惊人的頑强精神执行着这一任务。如果帕麦斯顿所参加的內閣竟能渡过这场灾难，那它肯定就能把弗朗斯瓦一世的話稍加改变，用玩笑的方式宣布：“除了名誉以外，什么都沒有丢”⁷²。

現在再来談談当前大家注意的問題，即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这个預算昨天他已經在长达 5 小时之久的演說中向下院提出了。这是一个根据百科全书的要求精心編制的联合內閣的預算，完全可以当作一大条目收到**埃尔希和格魯伯**所編纂的卷帙浩繁的科艺全书⁷³中去。大家知道，凡是百科全书編纂者的紀元到来的时候，总是事实大量积累而思想則相应落后的时候。

每一个預算的基本問題是預算收支部分之間的对比关系，是編制平衡表，或者为結余，或者为赤字，这是确定国家或者削減、或者增加稅收的基本条件。**迪斯累里**先生曾估計 1852—1853 年度

的收入總額為 52 325 000 英鎊，而支出總額為 51 163 000 英鎊。現在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們說，本年度的實際收入為 53 089 000 英鎊，而實際支出只有 50 782 000 英鎊。這些數字表明，收入比支出實際超過 246 萬英鎊。因此，同迪斯累里相比，看起來好像格萊斯頓改善了財政狀況。迪斯累里只結余 160 萬英鎊就可以夸耀，而格萊斯頓却節約了 246 萬英鎊。不幸的是，和迪斯累里的結余不同，格萊斯頓先生的結余經過進一步的考察就縮減到 70 萬英鎊的微薄數字。下院的各種決定以及其他各項特別支出已經從他的錢袋里拿出去成百萬英鎊了。此外，格萊斯頓先生頗有先見之明地又聲明一句：

“應當記住，70 萬英鎊中有 215 000 英鎊屬於臨時進項，而不是固定進項。”

這樣一來，格萊斯頓先生的活動余地就是這結余的 485 000 英鎊了。因而，任何關於減少舊的稅收的建議如果超過這個數字，就要施行新的稅收來加以平衡。

格萊斯頓是從所得稅這個 «question brûlante» [“緊急問題”] 開始自己的演說的。他說，本來現在就可以放棄所得稅了，但是，政府還沒有準備就緒，不能建議立即廢除它。格萊斯頓要求人們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我們從這個稅中得到 550 萬英鎊的收入”。其次，他企圖從所得稅的良好效果的角度來替它進行一次“精彩的”辯護，為此他花了不少心血來闡述所得稅的歷史。

他指出：“所得稅在我國爭生存時期已經克盡職責。它使我們得以增加了國家的收入，彌補了用於戰爭和民政管理的支出……如果諸位不取消這種手段的效能，那末，一旦不幸重起戰事，它就能使我們立即把陸軍擴大到 30 萬人，把海軍擴大到 10 萬人，並相應地擴大我們的其他一切機關。”

再其次，格萊斯頓先生指出，所得稅不仅在反雅各賓戰爭時有用，而且對於實施羅伯特·皮爾爵士的自由貿易政策也有用。在發表了這樣熱心辯護的引論之後，他突然使我們大吃一驚地說：“所得稅充滿缺陷。”格萊斯頓先生實際上是承認了，要保存這種稅，就必須對它進行改造，以便消除它在目前所包含的不平等因素。但是，消除這種不平等就必須打破整個制度。於是他就陷入了驚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又來極力證明這種不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看來似乎存在而已。至於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問題，他歸結為“土地和商業”的問題，企圖用相當笨拙的算法使公眾相信，對土地徵收的稅實際上每鎊是 9 辨士，而對商業徵收的稅每鎊僅 7 辨士。然後他又補充說：

“對土地和房屋的徵稅不依它們的所有者每年收入多少而定，而在商業方面，收入的多少是由占有者自己呈報的，他們往往謊報。”

對於國家有價證券的持有者，格萊斯頓先生肯定地說：如果對他們收入中的那部分資本化的價值課稅，就是一種粗暴的破壞社會信任的行為。簡言之，格萊斯頓先生是斷然拒絕迪斯累里先生的提議，不同意把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作任何區別。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所得稅擴大到愛爾蘭，此外還要向每年超過 100 英鎊的收入徵收所得稅，而在此以前，被課稅的最低收入是 150 英鎊。但是，他違反自己剛剛宣布過的原則——“不可能在智力、勞力和財產的相應價值間定出差別，並用數字值來表達這些比例”，而建議把每年 100 英鎊至 150 英鎊的收入的徵稅限定為每英鎊 5 辨士。最後，格萊斯頓先生為了調和一下他對所得稅的贊揚態度和他公開承認必須廢除所得稅的論調，建議：

“從 1853 年 4 月起延期兩年每英鎊徵稅 7 辨士，從 1855 年 4 月起再延

期两年每英鎊徵稅 6 辨士，从 1857 年 4 月起再延期 3 年每英鎊徵稅 5 辨士。依照这个建議，从 1860 年 4 月 5 日起，所得稅就将完全消失。”

格萊斯頓先生觉得，这样一来，由于他拒絕承认区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原則，他就給了土地貴族和有价值證券持有者好处；另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給曼彻斯特学派一个同样的誘餌，即調整遺產稅，使之适用于一切种类的財產，同时却拒絕考虑遺囑驗認稅的問題。

他宣称：“我毫不怀疑，調整遺產稅(如果議會通过这个建議的話)，将使我們的固定資金在 1853—1854 年度增加 50 万英鎊，在 1854—1855 年度增加 70 万英鎊，在 1855—1856 年度增加 40 万英鎊，在 1856—1857 年度增加 40 万英鎊，总共将使国家的固定收入增加 200 万英鎊。”

对于苏格兰，格萊斯頓先生建議把現在施行的 3 先令 8 辨士的酒精稅附加 1 先令(这将提供 318 000 英鎊的附加收入)。此外，他建議增加茶商、啤酒釀造場主、制麵場主、烟厂厂主，烟草商和肥皂制造場主的特許稅。

1853—1854 年度由增加稅收而得的進項的总数将是：

所得稅.....	295 000 英鎊
遺產稅.....	500 000 英鎊
酒精稅.....	436 000 英鎊
特許稅.....	113 000 英鎊
<hr/>	
共 計.....	1 344 000 英鎊
加上進項超过支出的部分.....	805 000 英鎊
<hr/>	
使我們可以用来减少稅收的总数.....	2 149 000 英鎊

格萊斯頓先生关于削減旧稅的建議怎样呢？对于这个迷宮，我当然不准备朝里面进得太远，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說清楚的。因此，我只指出以下一些基本要点：

- (1) 廢除肥皂稅，這項稅收目前的总收入是 1 397 000 英鎊。
 - (2) 在大約 3 年內逐步降低茶稅，最后使茶稅从 2 先令 2 1/4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 (3) 降低大量小商品的稅。
 - (4) 縮減以統一公債的形式逐年償還的相当于 400 万英鎊的爱尔兰債務。
 - (5) 鉴于罗·格委弗諾尔勛爵建議完全廢除律師執照稅，把這項稅收降低一半。
 - (6) 根据基卜生先生的建議，把廣告稅降低到 6 辨士（但議院已經通过了关于完全廢除這項稅收的决定）。
- 最后：
- (7) 廢除報紙附刊的印花稅（这是唯一的一家出附刊的報紙“泰晤士報”的天大的 *pièce de réjouissance* [喜事]）。

簡單說來，格萊斯頓先生在 4 个多月中苦心制定的預算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下院預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的辯論，將使我有可能就联合內閣的这一創作繼續发表意見。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4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5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75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英鎊、先令、辨士，或階級的 預算和这个預算对誰有利

格萊斯頓提出了自己的預算。我們都看到过两只公鸡在打谷場上声嘶力竭地比誰叫得更响亮的情形。前任財政大臣^①和現任財政大臣两人在下院中的竞赛就和这种情形有点相似。区别仅仅在于，我們的輝格党斗鸡模仿了保守党火鸡的某些音調。在上个星期我們考察了格萊斯頓先生的財政計劃中有关國債的那一部分，并指出，这一部分只是一种躲避所討論的問題的可怜嘗試，只是一种使高利貸者、証券交易人和商人滿足，使他們减少开支和易于成交的簡單手段^②。今天，我們將看到，提出的这个預算是階級的預算，是由貴族执笔写出的資產階級的預算。首先，讓我們簡略地評述一下这一个出色的

I. 关于支出和收入的方案。財政大臣确认，本年度的國家支出将比去年的支出超出 140 万英鎊!! 这对于作为財政改革的序幕的預算說来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开端! 造成支出的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同样令人安心。

这里包括：海軍軍費增加 617 000 英鎊，陸軍和軍需机关軍費增加 9 万英鎊，炮兵部队軍費增加 616 000 英鎊，民軍軍費增加 23

① 迪斯累里。——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9—55 頁。——編者注

萬英鎊。但同時，給作為教育工具和知識堡壘的學校事業追加的經費則只有 10 萬英鎊。國家本年度的支出總額規定為 52 183 000 英鎊。收入總額為 5 299 萬英鎊。收支相抵，收入超過 807 000 英鎊。然而，其中有 10 萬英鎊已經消耗在海上郵件運輸的費用上了。歸根到底，實際結余總共只有 50 萬英鎊。

現在，再來談談

II. 財政方案。第一，這位財政大臣注意到所得稅，然而他不區別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他建議過兩年後，把所得稅從每英鎊 7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再過兩年再降低一次，從 6 辨士降到 5 辨士，在愛爾蘭也徵收所得稅 3 年，并把應課所得稅的數目降低到年收入 100 英鎊。他保證說，這“絕不會牽涉到工人”。年收入 100 英鎊以上和 150 英鎊以下的人，規定每英鎊只繳 5 辨士的稅。這樣，由於把負擔轉嫁到不富裕階層身上，富人的捐稅負擔就將減輕。富商將會付得少一些，然而，不太富裕的小店主在先前他可以不用交直接稅的那些情況下也必須納稅了。這種公平真成問題！誠然，在 4 年內收入 100 英鎊的人所繳納的稅將比收入 150 英鎊或者 15 萬英鎊的人所繳納的稅每英鎊要少兩辨士。但是，過了這個期限之後，他們將按同樣的稅率交稅；甚至兩年之後富人就占便宜，因為那時的稅額將靠着不富裕階層的納稅而降低。在稅收方面，比較符合我們的觀點的，是施行累進所得稅，就是說，稅率隨着收入總額的增加而增加。因為，一個年收入 1 萬英鎊的人拿出 5 萬辨士，要比年收入 100 英鎊的人拿出 500 辨士更容易些。但是輝格黨人的財政政策卻是這樣：他們採取裝門面的、毫無價值的治標辦法，拐彎抹角地做事，並且逐漸地然而是不斷地減輕富人們的捐稅負擔，而把全部重擔轉嫁到窮人身上。至於那種認為所得稅

似乎不触及工人的說法，显然是无稽之談：在我們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制度下，資產階級在碰到加稅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資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

第二，这位財政大臣談到遺產稅問題。他改善了未婚的女婿和媳妇們的境况，把他們的“親屬”稅从 10% 减少到 7%（真是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并把各种財產都包括在这种稅收的範圍以內。被課稅的財產应当納稅多少，由它的所有者生前从財產中所得到的收入的多少来决定。依靠这个办法，格萊斯頓使国家的稅收總額增加了 200 万英鎊，并且自夸他支持手工业和工业的利益而反对土地占有制。这一条具有原則性的意义，这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土地壟斷集团那里夺来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我們再重复一遍：这是让步，但这是一种易于規避的让步，財政界中負責立法的土地占有者事先就把这种让步估算过了。

第三，取消单据印花稅。今后不管數額有多大，只要在单据上貼 1 辨士的郵票就行了。这对富人們說來是非常有利的措施。采取这种措施，郵票消費量的增长，正如事先所預計的那樣，將抵銷印花稅收入减少的損失；但是，这对工人階級來說仍然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工人們的交易很少达到需要貼郵票的那个起碼的數目（5 英鎊）。

第四，廣告稅从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这又是一个可憐的治标办法的典型。既然已經放棄了 1 先令，那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根据來說明有保存 6 辨士稅的必要了，因为征收这 6 辨士稅的机构臃腫，花錢很多，它本身就会把从这种稅收中所得到的全部收入消耗干淨！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不願意取消所有那些与这种稅收有关的职务和位置。只刊登廣告的報紙附刊可以免稅。所

有這兩條都是對資產階級的讓步，但由於保留了報紙的印花稅，今後仍然大大妨礙民主教育的推廣。據此，這位財政大臣就說：“現有的報紙將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新的更便宜的報紙將不會產生。”

第五，人壽保險稅從 2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這同樣又是舍本逐末的精神的一個表現；無報酬的學徒合同稅從 1 英鎊降低到 2 先令 6 辨士；律師執照稅從 12 英鎊和 8 英鎊降低到 9 英鎊和 6 英鎊；辦事員訓練合同稅從 120 英鎊降低到 80 英鎊。第一條以及最後兩條，又是對資產階級的明顯的寬待。而對於窮人，它們根本沒有帶來什麼好處；而 6 辨士的廣告稅、報紙的印花稅和紙張稅之所以保存下來，是為了能夠降低僕役稅、犬稅和馬稅，為富人謀利益。

第六，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將追加酒精稅，而釀酒者都得到補償“流失”的特惠。

第七，商人的營業執照費將進一步使之均等，（這是送給資產階級的又一個禮物）。

第八，取消肥皂稅和其他許多物品的捐稅。茶稅至 1854 年從 2 先令又 $2\frac{1}{4}$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辨士，至 1856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再往後降低到 1 先令。

這就是輝格黨人的預算的基本特點。現在我們來問一問我們的讀者，什麼時候曾經從大臣席上提出過比這更加可憐的“廉價的立法”（用大臣自己的話來說）的范本嗎？從表面上看來，預算好像非常堂皇可觀，動人的條目很多；但是，它的實際效果如何呢？它使英國工人階級的賦稅負擔真正減輕了多少呢？唯一可以指出的是取消肥皂稅和降低茶稅。然而這種減輕是多麼微不足道啊！有一條界綫到處被準確地遵守着，人們竭力避免超過它，因為超過它

就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貴族和資產階級受到損害。輕信的人可能会受这个預算的騙。“廣告稅降低到 6 辨士，取消報紙附刊的印花稅！”但是，这实际上会給人民带来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单据上只須貼 1 辨士的郵票！”但是，仅仅在領取自己的微薄工資时才“簽署单据”的僱傭奴隶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沒有任何关系！“人壽保險稅从 2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但是，对于那些被僱傭的，每周掙 6 先令、8 先令或 10 先令工資，在曼彻斯特的惨重奴役下不能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劳动者來說，这有什么好处呢？甚至对那些每周收入 1 英鎊或 30 先令的人來說，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沒有！律師所交付的執照稅將減少 3 英鎊，辦事員的訓練合同稅將由过去的 120 鎊減為 80 鎊，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遺產稅有一条将要減輕，而关于征收遺產稅的一般規定又非常容易迴避，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这能否使工人的負擔減輕一絲一毫呢？工人的工資是不可能同店主利用工人的貧困所榨取的利潤均等的，那末店主的營業執照費进一步均等能使工人得到什么好处呢？“財政改革”，这是本屆議會当选和本屆內閣上台執政的两大口号之一。現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財政改革了，这就是輝格党人、貴族和資本家所提出的改革。必須干一点什么事情，作出一些小让步；任务在于，要使这种让步变得根本微不足道和难于捉摸，而我們的理財能手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預算确实是——完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为了工商业階級的便利”而編制的，同时，也正是“廉价的立法”的典范。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0 日左右

載于 1853 年 4 月 23 日“人民报”

第 5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卡·馬克思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預算⁷⁴

1853年4月22日星期五于倫敦

据电訊，本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发生了很大的乱子；有15个基督徒被一群狂热的土耳其人打死或打伤了。

“在武装力量的帮助下，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另一条来自哥本哈根的消息說，下院否决了关于新的丹麦王位继承制度的內閣咨文。我們应当把这一举动看做是俄国外交的严重挫折，因为咨文是根据倫敦議定书的精神維護俄国利益的，該議定书承认，俄国是丹麦王国的无可爭辯的继承人⁷⁵。

来自海牙的消息告訴我們，像两年前在英国由于“天主教的进攻”⁷⁶而引起的那种激憤情緒，現在在尼德兰已經开始产生，并导致了极端新教派內閣的建立。关于德国（或者更确切些說，关于德国的先前名叫帝国的那一部分），应当說，在表明資产階級有教养人士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思潮方面，再沒有什么东西比“法兰克福报”⁷⁷編者4月20日的声明更精彩了。为了使貴报讀者引以为訓，現在我把这个声明的譯文轉录如下：

“每一班邮件都給我們送来关于招魂术 (Tisch-Rücken)⁷⁸的消息，消

息之多，是从尼古勞斯·貝克尔的不朽的‘萊茵河之歌’出現以來，以及从1848年3月革命的最初日子以來所未有的。這些消息比任何政治議論都更好地說明，我們重新生活在一個多么無風波和無惡念的時代。但是，不管這些消息多么令人欣慰，遺憾的是，我們今後不能給以應有的注意，因為我們擔心，這些消息完全有可能使讀者諸君以及我們自己負擔過重，並且最終占滿本報所有各欄的篇幅。”

“一個英國人”^①就不久前發生的科蘇特案件^②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編輯部和帕麥斯頓勳爵，他在信的結尾寫道：

“當聯合內閣就要到它的父親們，或叔伯們，或老祖宗們那里去的時候，我們要婉轉地向勳爵閣下暗示一下最新版的約·密勒。當然，我們完全不是想再聽到‘約’這個名字。‘帕麥斯頓’——這就是將要出現的名字。這個名字長了一點，這不好。然而，我們相信，按照盎格魯撒克遜的形式改稱‘帕姆’[*Pam*]就比較合適了。它在散文和詩中可以同«sham»〔“耻辱”〕、«flam»〔“謊言”〕、«cram»〔“欺騙”〕等字押韻。”

我在星期二寫的那篇文章^③中，向諸君簡略地評述了一下格萊斯頓的預算。現在在我面前已經有了一本共計50頁的in folio〔對開〕官方出版物，標題是：“財政大臣即將提出的決議案”和“決議案的說明”。但是，我只打算談談預算草案果真成為大不列顛的法律以後可能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的細目。

最重要的是有關關稅的決議案。建議取消123種次要商品的關稅，這些關稅每年的收入約達55 000英鎊；這裡包括各種（有4種除外）用來製造家具的木料以及梁柱、門窗和磚瓦。擬降低關稅的項目有：第一，茶葉，1854年4月5日以前從2先令2 $\frac{1}{4}$ 辨士降

① 阿·理查茲。——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96—98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65—71頁。——編者注

低到 1 先令 10 辨士。第二，12 种食品。現行的杏仁稅拟降低到每公担 2 先令 2 辨士；干酪——从每公担 5 先令降低到 2 先令 6 辨士；可可——从每磅 2 辨士降低到 1 辨士；核桃——从每普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1 先令；蛋类——从每百枚 10 辨士降低到 4 辨士；桔子和檸檬——每普式耳降低到 8 辨士；黃油——从每公担 10 先令降低到 5 先令；葡萄干——从每公担 15 先令 9 辨士降低到 10 先令；苹果——从每普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3 辨士。所有这些商品的稅收目前共計 262 000 英鎊。第三，預定还要降低 133 种食品的關稅，这些食品的稅收共計 7 万英鎊。此外，簡化了許多商品的課稅方法，抽稅將有一定的数量，而不是 ad valorem [抽从价稅]。

在消費稅方面，正如我已經指出的，要取消肥皂稅，提高啤酒場主、茶商、咖啡商、烟草商和肥皂場主的特許稅稅率。

在印花稅方面，除了降低律師執照稅和廣告稅以外，还要降低人壽保險稅、单据印花稅、学徒合同稅和出租馬車稅。

在直接稅方面，要降低男僕稅、私人馬車稅、馬稅、波尼馬稅和犬稅，田賦贖金減付 17.5%。

根据郵政主管机关的意見，拟降低寄往各殖民地的郵件的印花稅，办法是施行 6 辨士的單一稅率。

預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它的大部分項目都是联合政府在議会的这次會議过程中进行絕望反抗沒有效果而不得不接受的。

格萊斯頓先生現在建議把遺產稅推广到不动产上；然而，就在 3 月 1 日他还反对威廉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不动产也应当“像动产一样征收同样的遺產稅和遺囑驗認稅”的建議。格萊斯頓就像

托利党人的报纸目前所做的那样，声称这只是表面上的优惠，这种优惠已被纯粹由不动产担负的其他税收抵销了。就在3月1日那天（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威廉斯先生威胁格莱斯頓先生說：“如果他在這個問題上不让步的話，他将被迪斯累里先生取代。”

格莱斯頓先生**現在**建議取消或降低大約268种次要商品的保护关税。但是，3月3日他还反对过休謨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取消大約285种商品的純粹保护关税”的建議。下面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即迪斯累里先生曾在当天声明：

“我們不能死抓住保护关税制度的片断和破烂不放。”

格莱斯頓先生**現在**建議把广告税削减一半，但是，仅仅在他提出自己的預算的四天之前，他就曾反对过米尔納·基卜生先生关于取消这种税的建議。誠然，下院表決的結果，他遭到了失敗。

把联合內閣向曼彻斯特学派所作的让步一一列举下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些让步究竟說明什么問題呢？这些让步說明：工业資產階級，無論它在議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輝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好，只有按照資產階級的意图，为資產階級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資產階級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顛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財政方面以对資產階級一貫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資產階級。寡头政治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簡單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經濟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經濟权力的那个階級必然也会爭得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亲自頒布对手工工場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只是准备了1789年的革命，而回答他的«l'état, c'est

moi» [“朕即国家”] 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话：«le tiers état est tout» [“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79。

預算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精确地抄襲了迪斯累里先生“这位輕举妄动的冒險家”的政策。迪斯累里在議會里大胆断言：自由貿易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是財政革命，也就是用直接稅来逐步代替間接稅。事实上，格萊斯頓先生所建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加强和扩大直接稅制度，以便削弱和縮小間接稅制度。

一方面，他建議，在 7 年內保持所得稅，不去触动它。他把这种稅扩大到全国，即扩大到爱尔兰人身上。他仿照迪斯累里先生的做法，把这种稅扩大到整个社会集团——收入为 100 至 150 英鎊的人身上。他部分地採納了迪斯累里先生所提議的增加房屋稅的办法，以变相的許可証稅的名义来增加房屋稅，并且根据住宅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地增加这些許可証稅的稅率。最后，他把直接稅增加了 200 万英鎊，办法是使遺產稅也适用于不动产，这也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經允諾过的办法。

另一方面，他又对間接稅的两种形式——關稅和消費稅进攻，在關稅方面，他採納了迪斯累里的降低茶叶稅的建議，并取消、降低或簡化 268 种商品的稅收。在消費稅方面，他完全取消了肥皂稅。

格萊斯頓的預算和前任大臣的預算之間的唯一差別是，迪斯累里是作者，而格萊斯頓仅仅是抄襲者；迪斯累里取消消費稅和其他的捐稅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land-interest]，而格萊斯頓取消这些稅則是为了城市資產階級的利益 [town-interest]；迪斯累里虽然宣布了原則，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在實踐上歪曲这一原則。而格萊斯頓虽然反对這項原則，但由于他所参加的那个內

閣的联合性质,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把这个原则的細節一一付诸实施。

联合内阁的預算可能会有怎样的前途呢?各有关党派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般說来,至少会有 3 个問題可能引起剧烈的斗争,这就是所得税問題、遗产稅問題和爱尔兰問題。

曼彻斯特学派曾經提出过庄严的諾言,表示要反对延长征收目前所得税的任何做法,因为这种所得税是“可怕的不平等”的化身。印刷所广场⁸⁰的預言家,“泰晤士报”,10 年来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过这种“荒謬絕倫的不公正現象”,大不列顛的輿論一般都反对不分收入的种类而划一抽稅的制度,并坚决譴責这种制度。但是,正是在这唯一的問題上格萊斯頓先生拒絕作任何妥协。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他自己当財政大臣的时候,曾建議修改所得税,把非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区别开来,前者每英鎊征 5 辨士的稅,后者每英鎊征 7 辨士的稅,所以看起来所得税似乎成了一个把保守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輿論”組成統一反对派的联系环节。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庄严諾言呢?这是很有問題的。他們一向都遵循着把原則放在一边而大撈实际利益的商业习惯。而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所預示的实际利益也很不小。曼彻斯特派的机关刊物在所得税問題上的語調已經变得非常温和、非常折衷了。他們开始用格萊斯頓所表示的“7 年之后所得税将完全消失”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在紧要关头就忘記了,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 1842 年施行这种稅的时候就曾經答应在 1845 年把它取消;他們也忘記了,把某一种稅扩大到更广大的阶层身

上,这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稅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至于“泰晤士报”,它是从格萊斯頓先生关于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稅的建議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在一星期內每天都出两个附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辨士或大約166英鎊3先令的附刊稅。由于格萊斯頓先生放棄这种稅收,所有4万辨士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錢柜。因此,我們可以預料,塞卜洛士将被馴服成为羔羊,尽管格萊斯頓先生不会变成海格立斯。在大不列顛的整个議會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格萊斯頓先生这种在預算中列入一条专门有利于报纸的项目来收买报纸支持的做法更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取消知識稅主要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列維坦的壟断。“献殷勤的”格萊斯頓先生从所建議的措施中抄襲来的东西,恰好使“泰晤士报”的壟断变本加厉。

当格萊斯頓先生否定各种收入来源之間有任何差別时,我們在原則上承认,这是对的。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間的质的差別,那就一定要考虑它們之間的量的差別,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如果要区分它們之間的量的差別,那末,就必然要采取累进稅,由此更进一步,就要陷入某一种社会主义,它具有极尖銳的性质,无疑是格萊斯頓先生的反对者所憎恶的。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間的差別所作的狹隘的和利己的解釋,我們會得出一个可笑的結論:英国最富的階級,即工商业階級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曼彻斯特派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負担从自己的肩上轉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証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

至于說把遺產稅扩大到不动产上,那末,毫無疑問,土地占有者的党将会坚决反对这一点。土地占有者当然希望像过去那样不

繳稅而獲得遺產。但是，當迪斯累里先生擔任財政大臣的時候，他就已經承認，這種例外是不公平的，曼徹斯特派在這個問題上也將同政府一致。“晨報”在昨天已經警告土地占有者的黨，如果它仍舊採取這樣不明智的態度，在遺產稅問題上堅持自己的觀點的話，那它將不得不失掉任何指靠自由派支持的希望。在英國未必還有什麼其他的為不列顛資產階級所更強烈反對的特權，也未必還有什麼其他的更鮮明的寡頭立法的例子。1796年皮特曾提出兩個法案，其中的一個法案規定對動產徵收遺產稅和遺囑驗認稅，另一個法案規定把這些稅擴大到不動產上。這兩個法案是分開來討論的，因為皮特擔心，對兩院議員的領地徵收這樣一些稅，會遭到他們的有效反抗。第一個法案在議會中幾乎沒有遇到反對派。表決總共進行了一次，只有16個議員投票反對；第二個法案經過了一切階段，但是，在進行三讀的時候，沒有通過，30票贊成，30票反對。皮特知道，他沒有任何可能使法案在兩院中通過，所以不得不收回這個法案。如果從1796年起就開始對不動產徵收遺產稅和遺囑驗認稅的話，國債的絕大部分就可能清償了。土地占有者的黨現在可能提出的唯一有力的反對意見，就是有價證券的持有者還享受着這樣的優待。但是，它當然不會用這樣一些論據來鞏固自己的立場，因為這會使特別愛好財政特權的有價證券的持有者重新起來反對它。

這樣，只剩下一個可能順利地反對聯合內閣的預算的機會了。這就是土地占有者的黨和愛爾蘭旅結成聯盟。誠然，格萊斯頓先生力圖使愛爾蘭人同意在愛爾蘭施行所得稅制度，為此，他減少了他們應當清償的450萬統一公債，作為贈給他們的禮物。但是，照愛爾蘭人的說法，這450萬中有300萬是由於1846—1847年間的

饥荒而产生的，爱尔兰人民从来没有把它看做是国債，而且也从来没有承认它是国債。

看来，內閣本身是没有获得胜利的充分信心的，因为它威胁說，如果預算不能全部通过，那就**提前解散**議院。这对大多数議員來說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在最近一次竞选期間，由于合法的支出，他們的囊中快要空空如也了”。这对那些激进派也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為他們是竭力遵守反对派的旧定义的：反对派在政府机构中执行着安全閥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閥并不停止机器的工作，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設備爆炸的那部分能量化为蒸汽放出去。激进派也是把人民的要求像把蒸汽放出去那样放掉。显然，他們提出建議仅仅是为了后来又把这些建議收回去，或者是为了給自己过多的言詞找出路。

議院的解散仅仅会表明旧政党的解体。从联合內閣成立时起，爱尔兰旅就分成了两派：政府派和独立派。土地占有者的党也分裂为两个陣营：一个陣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另一个陣营以約·帕金頓爵士为首。但是現在，在危急的时刻，两个陣营又重新团結在迪斯累里的周圍。激进派本身也划分成两个集团：梅費尔派⁸¹和曼彻斯特派。旧政党中的內部团結的力量消失了，但同时也没有出現实际对抗的力量。新的大选不会改善而只会巩固現狀。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选民中間賄賂成風。在这一切都揭露出来之后，內閣是否敢冒險向这些打上耻辱烙印的选民們呼吁呢？是否敢冒險向全国呼吁呢？內閣向全国提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它一只手拿着拒絕实行議会改革的决

定，另一只手則拿着奧地利提升它担任大陸警察局主要情報員之職的證書⁸²。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4 月 22 日

載于 1853 年 5 月 6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761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 得賄賂。^①——联合內閣的預算

每一个人都知道，預算只不过是國家本年度預期收入和支出的一覽表，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財政經驗即平衡表為根據的。

因此，格萊斯頓先生的第一件作品就是 1852—1853 年度的預算平衡表。當迪斯累里先生任財政大臣的時候，他曾規定 1852—1853 年度的預期收入為 52 325 000 英鎊，同一時期的預期支出為 51 163 000 英鎊；這樣，他預計結余 1 162 000 英鎊。格萊斯頓先生根據賬目確定實際平衡表時發現，上一年度的實際收入等於 53 089 000 英鎊，而實際支出額則只有 50 782 000 英鎊。實際結余有 2 307 000 英鎊，或格萊斯頓先生計算的 246 萬英鎊（這個數目是用我們不能理解的什麼方法計算的）。

已經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或者確切些說，議會已經習慣於把財政大臣看做是一個神秘的魔術師，能利用誰也不知道的神秘的法術創造出國家的全年收入；所以毫不奇怪，不管這個重要人物是誰，他總是力求不戳穿這個對他說來是如此體面的假象。因此，如果國家由於擴大了生產而能夠使稅收進項超過規定的總額，那末

① 俏皮話：“肥皂”原文是《soap》；“賄賂”、“償錢”原文是《sop》。——編者注

可以确信，那个因为这个緣故而能使結余超过他的前任所答应的結余一倍多的財政大臣，无疑要被称贊为一位十分杰出的理財能手。格萊斯頓先生的光輝的思想也就在这里，这种思想在議院的捍卫联合寡头政治的人当中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应有的评价。

結余二百四十六万英鎊！

但是，这二百多万英鎊的結余，議院一文錢也不允許給予人民。那末，这些錢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格萊斯頓先生解釋道：

“不管这个决算是多么令人感到滿意，議院也不应当忘記，它已經表決把这笔結余的大部分用作本年度的各种紧急支出。”

議院曾經从迪斯累里先生那里知道，結余無論如何总要超过100万英鎊。根据这种情况，議院筹款委员会⁸³就大大方方地批准了以下預算之外的补充撥款：

海軍，以及海軍郵政机关.....	617 000 英鎊
陸軍和軍需机关	90 000 英鎊

此外，正如格萊斯頓先生宣布的，在这些支出中还应当加上：

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戰費〈不会和平嗎？〉.....	270 000 英鎊
炮兵部队增支	616 000 英鎊
民軍增支	230 000 英鎊
公立(应讀作私立)学校經費	100 000 英鎊

共 計.....1 923 000 英鎊

格萊斯頓先生仍然认为总数是1 654 000 英鎊(大概是沒有把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撥款計算在內，因为这一次支出还没有确定)。如果从最初估計的(只是名义上的)246万英鎊的結余中扣除这个数目，那末实际結余只有806 000 英鎊，或格萊斯頓先生計算的

807 000 英鎊。尽管如此，議院还被警告說，甚至在这笔微小的款項中还要扣除 22 万英鎊，因为这笔进款預計来自临时收入而不是来自固定收入。这样，起初大肆吹嘘的两百多万結余，最后終於縮減为 587 000 英鎊了，这个数目無論如何不能认为是可以賴以进行哪怕是最微小的稅制改革的真正广泛的基础。但是，既然一再向国家保证，政府是实行改革的，那末，改革就一定要进行，因而，格萊斯頓先生也就立即着手草拟改革計劃了。

一个像休謨先生那样平庸的自由貿易論者，或許会劝財政大臣把自己的結余用来做一件好事：取消外国商品的關稅（根据海關統計材料，外国商品所納的稅收恰好也是 587 000 英鎊）。但是，对于像格萊斯頓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和深謀远慮的財政炼金术士來說，这样的建議是陈腐的，平凡的和庸俗的！难道可以設想，对于一个打算不多也不少剛好消除全部國債的人來說，仅仅縮減 50 万英鎊的稅收就能滿足他的虛榮心嗎？为了这个渺小的目的，当然值不得把那位桑科·庭伯尔^①打发到印度的巴拉塔利亚去，以便把他的位子让給联合內閣財政上偉大的唐·吉訶德。

格萊斯頓的稅制改革就像牛津街上的店鋪一样，傲視行人的招牌在閃閃发光：

“大減价！”

“馬上省下五百几十万英鎊！”

这倒是可以吸引人民的注意，甚至可以使最頑固的議會老太婆們着迷。

^① 指查理·伍德，他从 1846 年起担任財政大臣，但在 1852 年联合內閣成立时被任命为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这里的名字是双关語：庭伯尔(timber)在英文中意为“木材”，“木料”，伍德(wood)意为“木头”。——編者注

讓我們到这个店舖里去看看吧。“格萊斯頓先生，請把您的價目表拿出來看一下。先生，您所說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什麼？降低500萬英鎊嗎？”格萊斯頓先生回答道：“當然，親愛的先生，您想看一看數字嗎？下面就是這些數字：

1. 完全取消肥皂稅	1 126 000 英鎊
2. 人壽保險稅從2先令6辨士降低到6辨士	29 000 英鎊
3. 降低單據印花稅和確定1辨士的統一稅率	155 000 英鎊
4. 學徒合同稅從20先令降低到2先令6辨士	} 50 000 英鎊
5. 降低律師執照稅	
6. 廣告稅從1先令6辨士降低到6辨士	160 000 英鎊
7. 出租馬車稅從每天1先令5辨士降低到每天1先令	26 000 英鎊
8. 年滿18歲以上的男僕稅降低到1英鎊1先令，不滿18歲者降低到10先令6辨士	87 000 英鎊
9. 降低私人馬車稅	95 000 英鎊
10. 降低馬稅、波尼馬稅和犬稅	108 000 英鎊
11. 降低郵政車馬稅，廢除按距離收費，代之以特許證制度	54 000 英鎊
12. 降低寄往殖民地的郵件稅(每封信降低到6辨士)	40 000 英鎊
13. 降低茶稅，至1854年4月5日以前從2先令2¼辨士降低到1先令10辨士，1855年降低到1先令6辨士，1856年降低到1先令3辨士，此後降低到1先令	3 000 000 英鎊
14. 降低蘋果、干酪、可可、蛋類、黃油和各種水果稅	262 000 英鎊
15. 降低133種次要商品稅	70 000 英鎊
16. 取消123種次要商品稅	53 000 英鎊
共 計.....	
	5 315 000 英鎊”

當然，縮減5 315 000英鎊的稅收無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這個極端自由主義的預算是不是沒有自己的缺點呢？無疑是有的。否則怎麼可以把它叫做改革呢？要知道，憲制改革也像

牛津街上的店鋪一樣，不管它們的門面裝點得多么好看，缺點必然是很可觀的。

不管這個預算費了多少心機，人們的智慧最終會揭穿它的秘密。格萊斯頓先生的錢包里只有**五十萬**英鎊，但他却要送給公眾**五百五十萬**英鎊的禮物。這些錢從哪里弄來呢？很明顯，正是從那些現在被他的慷慨弄糊塗了的被愚弄的公眾的口袋里弄來的。他送給公眾一件禮物，同時卻向公眾提出了付出同等代價的要求。自然，不是以直接的挑釁形式提出來的，甚至不是向那些現在他想爭取到自己方面來的人提出的。他立意要同各式各樣的顧客打交道，於是魔術家羅素就教會了煉金術士格萊斯頓，應當用什麼方法在明天來補償他今天所作的慷慨犧牲。

格萊斯頓把舊的稅收削減了 5 315 000 英鎊。格萊斯頓增加了新的稅收 3 139 000 英鎊。這看起來仍然使人覺得，好像格萊斯頓使我們得到了 2 176 000 英鎊的好處。但是要知道，格萊斯頓最多不過是只當一年的大臣，而今年他計劃削減的稅額只有 2 568 000 英鎊，這將使收入減少 1 656 000 英鎊，而這筆錢將由擬定在今年增加的 1 344 000 英鎊的新稅收來彌補。312 000 英鎊的差額仍然應當從預算規定的 807 000 英鎊的實際結余中得到補償。扣出這一切之後，仍然還有 495 000 英鎊的順差。

聯合內閣的預算的基本特點就是如此。現在我們想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內閣預期會特別受到贊揚的條目，以及議會中各個反對黨派最可能提出的反對意見，最後談談我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儘管格萊斯頓力圖引起轟動，力圖借助大大降低稅收的辦法來保證他的財政專家的光榮和在人民中的聲望，但他感到還是有

必要利用一个漂亮的、乍看起来是合理的借口，来提出关于增加 3 139 000 英鎊稅收的建議。他懂得，如果不用議員和資產者的詞句使他的謀划具有某些維護“原則”和“正義”的色彩，那別人就不会让他修改整个稅收制度而不适宜地、絕非正当地專門滿足个人的利益。因此，他很机灵地决定利用他摸得很清楚的立法界的柏克司尼弗們的弱点，說什么“要公正地扩大某些稅收的範圍，以便在这方面达到最終的和持久的平等”，用这样一些悅耳动听的話把他增加社会負擔的計劃巧妙地掩飾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選擇了以下几种稅：

- (1) 遺產稅，
- (2) 酒精消費稅，
- (3) 所得稅。

格萊斯頓要求把遺產稅同样地加到所有各种財產上。由于地产至今都沒有征收这种稅，所以估計这个建議应当使厂主和商人感到滿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应当征收酒精消費稅，以便使那里的釀酒业和英格兰的釀酒业处于平等的地位。

最后，征收所得稅的範圍应当扩大到年收入为 100 至 150 英鎊，以及扩大到爱尔兰。自然，格萊斯頓不能期待他的关于所得稅的建議会引起特別的掌声。但是，这一点在我們談到反对預算的意見时再談。

除去关于遺產稅和酒精稅的建議之外，內閣无疑地认为根据自由貿易政策的精神降低大量进口商品稅是最好的誘餌；而店主、家庭主婦以及一般小資產者，在还没有認識到消費者从降低關稅中，至少是从降低茶稅中只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因为大部分利益有被公司老板和壟断生产的資本家的利潤吞噬的趨勢）以前，

也可能会紛紛贊成这样做。然而，肥皂稅是完全取消了，像格萊斯頓所希望的，这一措施不仅应当帮助人民摆脱不整洁的、不卫生的寒儉相，使所有的面孔都变得清洁、瀟洒和幸福，而且还应当彻底廢除对黑人的奴役，結束无数“湯姆叔叔”的災难，因为它将促进“非洲棕櫚油的合法的貿易和生产”。格萊斯頓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他决心在吹嘘自己的手段方面賽过最世故的服飾商人和最会吹的江湖騙子。格萊斯頓还給这些誘人的前景添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賄賂，其中包括送給爱尔兰旅的几百万英鎊的賄賂，即豁免由于饥荒而貸給爱尔兰的國債，还包括送給“泰晤士报”这个“善良的阿伯丁”及其聯合內閣的同僚的可靠支柱的賄賂。这后一种賄賂就是取消只登广告的報紙附刊的印花稅。大家知道，在所有的報紙中，只有“泰晤士报”发行大量这样的附刊。

現在我們来談一談反对派可能提出的对預算的反对意見。由于上星期一下院的辯論只不过是試探性的交鋒，因此我們不得不根据定期刊物尽可能来了解各个党派的意图。然而，在定期刊物中我們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泰晤士报”、“紀事报”和“邮报”实际上已成了联合政府的附屬品，而“每日新聞”也未必能算作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此外，这个報紙的立場非常动搖，看来它已經完全被自由貿易性质的建議迷住了。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先驅报”——托利党保守派的机关报，我們就会发现，該报已經发表了明确的意見，而且是以真正異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发表的。

該报写道：“格萊斯頓先生的整个預算，不过是賄賂和倒卖的不体面的混合物。”

因此，托利党人无疑将会反对格萊斯頓的草案，而迪斯累里也一定会要求恢复他在扩大遺產稅和所得稅的征收範圍和降低茶稅

方面被窃走了的桂冠的所有权，以及要求承认他的被格萊斯頓如此无耻地攫为己有的其他功績。土地貴族即使不得不忍心再一次丧失自己的特权，那末它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保持自願放棄这些特权的功績。但是，由于它不能把关于遺產稅的問題作为自己的据点，所以迪斯累里将使它团結在要求区分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这个原則的周圍。站在这个立場上，迪斯累里将能爭取爱尔兰旅的很大一部分人成为自己在斗争中的同盟者。很明显，爱尔兰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而且也沒有承认英格兰人預先使爱尔兰居民破产然后再强加于他們的国家的債務。姑且不談这一点，从純粹实际的观点来看，豁免想像中的 300 万英鎊資本的利息，在他們看来是对实行所得稅和酒精消費稅的极其不等价的让步。至于曾經向自己的选民庄严地保证即使不廢除至少也要修改所得稅的曼彻斯特学派，所能期待于它的只是：它将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考虑的不是政治荣誉，而只是有沒有好处。而从格萊斯頓的“整个”預算所得到的好处，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是很小的。

最后，談談我們自己对這個問題的意見。我們所最热烈希望的是內閣失敗，因为这个內閣的对內政策反动而詭詐，同它的畏首畏尾的和阿諛逢迎的对外政策一样，都應該受到鄙視。而且我們认为，我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样的事件无疑将符合人民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在貴族的联合內閣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階級的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許工人階級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的党再一次占了上風，資產階級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議會就不能擺脫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資產階級就不能只限于宣傳局

部改革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当然，人民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是决不会附和资产阶级或者投靠资产阶级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目前财政制度极其彻底的革命。现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不要求用单一的直接所得税来代替传统的财政 olla podrida [大杂烩]。直接征税的原则早已为曼彻斯特学派所接受；这个原则也得到了迪斯累里的承认，甚至得到了寡头联合内阁的确认。一旦征收直接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

工人阶级的预算。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5 日
左右

载于 1853 年 4 月 30 日“人民报”
第 5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⁸⁴

1853年4月29日星期五于倫敦

前几天，臭名昭著的警察厅长施梯伯在警尉戈德海姆和刑法参事紐尔納的陪同下从柏林来到这里。他們到这里来的特殊使命是确定罗瑟海特“火药密謀”同柏林“卡拉布里亚帽”密謀^①之間的联系。我从私人方面获悉，上面所說的这些人曾在肯辛頓聚会，地点是弗略里的家里。前商店职员希尔施也在場。第二天，这个希尔施又秘密会晤了俄国領事克列美尔先生。如果讀者諸君还記得我写的科倫案件一文⁸⁵，馬上就会发现，这些人就是制造科倫案件的那些人，他們現在又开始活动了。

星期六（本月23日）审讯开始：弯街的治安法官亨利先生出庭审讯黑耳先生，即被政府查封的罗瑟海特火箭工厂的厂主。在这一天，法庭辯論只圍繞着一個問題：被沒收的爆炸物是不是火药。拖到昨天才作出决定的亨利先生不顾著名化学家尤尔先生的意見，当时宣布：这些东西正是火药。因此，他对黑耳先生处以罰款，超过法定額的每一磅火药罰2先令，而在他工厂中查出的超过法定額的火药数量是57磅。接着，威·黑耳和他的儿子罗·

① 見本卷第31—34頁。——編者注

黑耳以及詹·博伊林又被控从 1852 年 9 月 13 日至 1853 年 4 月 13 日在不同時間內制造或接受几大宗火箭定貨而受到法庭审讯。檢察长博德金先生宣布，威·黑耳先生曾数次建議英国政府购买他的火箭而沒有成功，他的工厂从 1852 年 10 月起雇用了大批工人，其中一部分是流亡者，全部生产过程严守秘密，海关的貨运报告也駁斥了黑耳先生的火箭經海关运出的說法。博德金先生最后說：

“在黑耳先生那里查出的火箭估計值一两千英鎊。他哪来的这些錢呢？要知道，黑耳先生就在不久以前还是个破产戶，后来用每鎊債款只还 3 先令的办法才不算破产戶。”

偵緝警察約·桑德斯报告，他查获了“1 543 枝装有火药的火箭、3 629 顆火箭头、2 482 个火箭壳、1 955 枝沒装火药的火箭、22 顆铁彈、2 副火箭爆炸工具”。随后被傳的证人烏茨奈尔先生报告：他当过 15 年的普魯士炮兵軍官，在匈牙利战争期間是少校參謀；曾在罗瑟海特的黑耳先生工厂里生产火箭；进厂以前，因迫于貧困而盗窃在梅德斯頓監獄坐过五六个月的牢。下面就是他的证詞的最重要部分的原話：

“我同黑耳父子認識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紹的。我因这件事同科苏特先生初次見面是在去年夏天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大約在 9 月中旬，我見到老黑耳先生在科苏特先生家里作客，当时在場的还有一个匈牙利人，是科苏特先生的副官。科苏特先生向黑耳先生介紹我說：‘这个人在匈牙利軍隊中服务过，当过普魯士炮兵軍官。我願介紹他給您做工人，参加制造我們的火箭或你們的火箭’——我記不清他究竟說‘我們的’还是‘你們的’了。科苏特先生对我說，我每周工資 18 先令，并囑咐我对这一切严守秘密；他說，黑耳先生会告訴我担任什么职务。科苏特先生有时說匈牙利語，有时說英語；黑耳先生大概不懂德語。‘严守秘密’這句話是用德語对我說的。不久以后，罗·黑耳派我

到品利科同科苏特先生見面，我就在皮克林廣場會見了他；威·黑耳和另外一个匈牙利人也在那里。我們当时是要試驗火箭发射器。當我們大家都到齐了，发射器安装好了，我們就做了火箭試驗。我們的談話一部分是用英語，談的主要是有关火箭质量等事。我們在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当全部工作結束时，科苏特先生和黑耳先生要我們小心地、一个一个地走出去；黑耳先生在街道的一个角落同我們走到一起。科苏特先生在这次会面时再三囑咐我們对他同火箭的关系保守秘密。”

再往后是审問威·格尔拉赫先生，他也是德国人，口供通过翻譯。他在黑耳先生的工厂里工作过，参加过制造火箭。除了他以外，还有 3 个匈牙利人在那里工作过。他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紹給黑耳先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們两人在一起。

亨利先生当时可以有两种判決法：对被告处以 5 鎊的罰款或者把案件轉交陪審法庭。他選擇了后一种，但是同意黑耳父子二人可以交保开釋。威·黑耳先生說，他拒絕請任何一个朋友作他本人或他儿子的保人，因此他两人被押往馬販子街監獄。

很明显，上面所引用的証詞显然同老黑耳先生的信（內容我已經向諸君报道过⁸⁶）相矛盾，也同科苏特先生給梅恩·里德上尉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勳爵的信相矛盾，科苏特先生在信里证明，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黑耳先生以及他的火箭的事情。不过，在科苏特先生作出进一步的解釋以前就从这里做出什么結論是不公正的。至于烏茨奈尔先生这样一个飄流異国的有才干的我国同胞、这样一个渴望劳动的人（他願意每周拿 18 先令的工資当个普通雇工就证明了这一点），竟落到迫于极度貧困而偷窃的地步，而一些游手好閑、无所事事的德国流亡者却胡乱揮霍貼补革命者的为数不多的金錢，作种种假借名义的傳教旅行，进行种种可笑的密謀，举行各种酒館 conciliabules [聚会]，相形之下，难道不是很

可耻嗎？

星期五(本月 22 日)在弗里布尔州(瑞士)又发生了暴动,这是自不久以前同宗得崩德⁸⁷作战以来第五次暴动了。暴动本来要在整个州同时发起,但大多数暴动者在指定时刻都没有出动。三个答应参加暴动的“纵队”没有到行动地点。真正进了城的暴动者主要是法尔瓦尼区和奥提尼伊、普雷兹、多尔尼、米德等乡镇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的居民。早晨 4 点半,一个由 400 名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配戴了宗得崩德的标志,旗帜上绣着圣母像)沿着洛桑的大道向弗里布尔挺进。他们的首领是佩里埃上校和领导过 1851 年暴动、而后来得到议会特赦的著名农民卡拉德。5 点钟左右,暴动者从 Porte des Etangs [埃汤门] 进入城市,占据了一所中学和一个军火库,在军火库夺取了 150 支枪。市议会接到警报后召集了会议,立即宣布紧急戒严。格伯克斯少校担任了召集起来的国民近卫军的指挥。他命令在中学背后的附近街道上架起大炮,同时指挥步兵队从正面进攻暴动者。步兵队攻克了通向中学的两层阶梯,迅速地击退了把守在窗口的农民。战斗继续了一小时左右,进攻者已经有 8 人阵亡,18 人受伤;在这个时候,暴动者由于想到建筑物后面的街道上隐蔽起来没有成功,他们在那里遭到了霰弹的射击,于是就派一个神甫打着白旗出来,表示愿意投降。

国民近卫军委员会立即组成了军事法庭,判处佩里埃上校 30 年徒刑。审判至今仍在进行。被捕者达 200 人,其中有乌伊勒、韦克和肖雷先生。有人在罗蒙门附近看到了波焦的某个委员会的主席沙尔先生,但是他没有被擒。除了来自多尔尼-勒-格朗的神甫以外,在被捕者当中还有两个神甫。至于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弗里

布尔州在这方面看来并不担心：因为沒收貴族韦克先生财产的一半就足够补偿这些損失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年4月26和29日之間

載于1853年5月14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3768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⁸⁸

1853年5月1日于倫敦

从前的皇族通常都养有替挨打的孩子，这些孩子享有一种光荣的权利：每逢王孙公子違犯了某种規矩，他們就要拿出自己低賤的脊背来領取一定数量的鞭笞。欧洲現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傳統，它建立了一批小小的緩冲国，这些小国在发生任何細小糾紛，足以破坏和諧的“均勢”的时候，都扮演着替罪羊的角色。为了使它們能够相当体面地担任这种不平常的角色，在“集聚一堂开会的”欧洲⁸⁹的一致同意下，并通过十分隆重的仪式，宣布了这些小国为“中立”国家。希腊就是这样的替罪羊或替挨打的孩子；比利时和瑞士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些現代的政治替罪羊的特殊的地方，仅仅是它們由于生存条件不正常而很少受到完全不應該的鞭打罢了。

在这一类国家中，現在最典型的要数瑞士，

Quidquid delirant reges, plectuntur……

〔不管暴戾的国王們做了什么事，遭殃的都是……〕^①

瑞士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同統治者发生冲突，瑞士人都

^① 見賀雷西“书信集”第二册第二封信；这一行的終了是 *achivi* ——亞該亞人。——編者注。

可以有把握地等着，他們那里也少不了麻煩，就这样一直弄到瑞士这个已經招来革命政党鄙視的国家在今年年初又被欧洲大陆的統治者視為異端而拋棄为止。瑞士在流亡者問題上同波拿巴皇帝发生冲突，一度几乎卷入战争；在紐沙特尔問題上同普魯士发生冲突；在德森人和米兰起义問題上同奧地利发生冲突⁹⁰；在什么人不发生兴趣的問題上同一些德国小邦发生冲突；冲突簡直四面八方都有。这些冲突，以及威胁性的照会、驅逐令、签发护照时阻撓、宣布封鎖等等，就像冰雹一样落在不幸的瑞士的头上。但是，恐怕是人的天性吧，瑞士人仍然很幸福，很滿意，仍然自有驕傲之处；他們感到处在这种被人嘲弄侮辱的冰雹之下，要比在政治地平綫上万里无云的时候还要舒服。

对于瑞士的这种光荣的政治地位，欧洲輿論界有一句虽然有点含糊而粗魯但是很能說明其特征的話：欧洲的統治者为了使共和政体丢臉，就制造出了一个瑞士。的确，梅特涅或基佐会一再这样叫嚷：如果沒有瑞士，就应当造出一个来。對他們來說，瑞士这样的邻邦是一个真正的无意中的收获。

不要以为我們会重复真革命派或假革命派不久以前对瑞士和它的設施所提出的各种責难。早在 1848 年运动以前，德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就已經分析了這個問題，指明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瑞士会一直跟不上欧洲进步的脚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一片共和主义气象的国家实质上总是反动的⁹¹。由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当时甚至遭到各种民主空談家和撰写华而不实的秘密作品的作者的猛烈攻击，他們把瑞士捧作他們的“模范共和国”，这样一直到他們亲自尝到瑞士的模范制度的滋味时为止。現在，这个道理已經成了尽人皆知的道理，

任何人都不会来争论了，所以我们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把真实的情况说个清楚。

大部分瑞士居民非牧即农，在高山地区都经营畜牧业，在土壤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经营农业。牧民部落——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部落——属于文明程度最低的欧洲人之列。即使他们在举行审判会时不像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那样采取砍脑袋和割耳朵的办法，但行为野蛮的程度也并不逊色。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瑞士雇佣兵就充分证明了，瑞士人能干出怎样残暴凶狠的事情来。农民像牧民一样守旧，他们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变动，生活才有来源，这些农民每年都开垦出面积超过瑞士整个领土很多的耕地。瑞士农民耕种的还是从前他父亲和祖父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像祖辈父辈一样耕种得马马虎虎，收获的东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同祖辈父辈差不多，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不是有封建义务，如果不是有一部分由贵族世家、一部分由贵族的市镇公所向他们抽取捐税，他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就会像他们的邻居——牧民那样守旧。瑞士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工业居民，在文明道路上自然要比上述两个阶级前进得多；然而这一部分居民，由于他们生存的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到现代工业体系对西欧所起的那种巨大的进步影响。在瑞士，人们几乎不知道利用蒸汽；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就促使瑞士建立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这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式。例如，某些州的钟表工业和缟带工业以及稻草制品及刺绣品等等的生产很发达，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造成新的城市，甚至没有使现

有的城市有所发展。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两个最富裕、在工业方面最发达（还有苏黎世）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扩展。因此，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如果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

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某些马扎尔政客曾经利用这种情况，企图以此为根据硬要我们匆忙做出匈牙利民族并不怎样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布达的小商人和郎卡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匈牙利草原上的流浪镀锡工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哩，而且是千百年。同样，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类似之处，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美国 and 瑞士这样两个彼此极不相同的国家了。美国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化，它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国家，对于这个使命的规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到现在才开始窥见一些头尾；而瑞士却停滞着，如果不是邻邦的工业成就违反它的本意把它硬朝前推的话，那末，无休止的细小纷争归根到底会使它永远踏步不前。

对这一点还有怀疑的人，看一看瑞士铁路的历史就会相信了。如果没有从两侧纵贯瑞士南北的过境铁路，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不会修起一条铁路来。现有的铁路都是晚了20年才修建起来的。

1798年的法国入侵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瑞士农民得以摆脱封建义务，使工商业居民得以摆脱贵族和行会的中世纪的控制。有了这点进步，在州政方面的革命就算完成了。最先进的州

都取得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法。州的革命又影响了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和执行机关。在州里失败的政党在中央仍然很有势力，因而斗争又起。1840—1847年普遍的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演习性的战斗，或者为决战准备了基础。由于大国竞争，这个运动在所有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里都使从性质上看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派得到了好处。当时瑞士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从道义上支持，基佐迟疑不决，梅特涅的手脚又被意大利的困难局面拖住，所有这一切都帮助瑞士人顺利地渡过了同宗得崩德的战争。1830年在各个自由派的州里取得胜利的政党，这时就夺得了中央政权。1848年的革命使瑞士人得以改革他们的封建宪法，使宪法同大多数州的新的政治组织一致起来；所以可以直接了当地说，现在瑞士已经达到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般所能取得的政治发展的顶点。瑞士联邦的新宪法是完全符合国家需要的；在币制和交通工具方面一直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工业生活的立法措施，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可惜得很！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要对这种改革感到羞愧，——传统的绊脚石是那样多，社会状态是那样原始，直到现在，一进行这些改革就暴露出来。

能够说明1848年瑞士宪法成就的，顶多不过是最文明的一部分瑞士人通过宪法的施行表达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由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能不能摆脱有特权的商业公所、行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中世纪的宝贝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性质，只要一度看到过那些握有“既得权利”的尊贵人物是怎样死顽固地反对甚至最必要的改革，都会觉得很成问题。

因此，正当欧洲大陆以往的全部稳定局面都被1848年革命连

根摧毀的時候，自行其是的瑞士人仍然繼續安靜地生活在自家的小圈子里。巴黎、維也納、柏林、米蘭的革命，都成了他們進行州際摩擦的各種借口。歐洲發生大地震，甚至瑞士的激進派也只是覺得地震可以把他們的保守的鄰居家的鍋碗震碎，造成麻煩而已。在爭取意大利獨立的時候，撒丁曾經迫切要求同瑞士結盟，如果當時瑞士能出 2 萬或 3 萬人加入撒丁軍隊，那末毫無疑問，奧地利人很快就會被趕出意大利的。在那不勒斯有 15 000 名瑞士人站在敵對意大利自由的一方作戰，既然如此，瑞士為了維持它那大受稱贊的“中立”，總該派出同樣多的人去援助意大利人，但是關於結盟的建議被拒絕了，這樣，在斷送意大利的獨立事業方面，瑞士人和奧地利的刺刀就起了同樣的作用。此後，革命派連遭失敗，意、法、德的流亡者全部涌向了中立的瑞士。但是這時中立已經完結，瑞士的激進派對於既得的成就已經心滿意足，於是，那些使瑞士的監護人和天然統治者——大陸各國的專制政府——的力量受到牽制并使瑞士人得以順利進行國內改革的起義者，現在在瑞士就遭到了種種欺侮，只要追捕者提出要求，就被驅逐出境。而在此以後，瑞士的鄰國政府就一個接一個向它施加了一系列的欺侮和凌辱；如果瑞士的民族性有點基礎，如果瑞士的獨立不僅是存在於傳說和頌詞中，那末每個瑞士人看到這種情況血液都會沸騰起來的。

從來還沒有一個民族遭到過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以及那些二流的德國小邦對瑞士的那種待遇。從來還沒有一個國家面對着即使是減半的屈辱性的要求而不作決死抵抗。各鄰邦政府竟敢通過自己的代理人在瑞士領土上行使警察權力，它們不僅對流亡者行使這種權力，而且對瑞士警察人員也行使這種權力。它們表示不滿意瑞士的下級警務人員，要求把他們撤職；它們甚至暗示瑞

士必須修改某些州的宪法。而瑞士政府对任何无理要求都低声下气地作了回答。即使它在措詞上有时带点抗議味道，那末也不必怀疑，它在实际上会用加倍的逢迎来弥补这一点。屈辱一个接着一个忍受，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照办，直到欧洲对瑞士的普遍鄙視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瑞士所受的鄙視甚至超过了两个在“中立”方面同它不相上下的国家——比利时和希腊。而現在，在它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向它提出的要求已經蛮橫到甚至像德律埃先生这样脾气的政治活动家不稍作抗議都难以忍受的时候，瑞士在它給維也納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决的照会中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它是如何卑屈而已。

瑞士在照会中痛罵爭取意大利独立的战士們，其实这些人不仅根本沒有表現过任何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傾向，而且恐怕也沒有足够的勇气希望意大利有甚至像瑞士現行的这种宪法；这些連馬志尼的夸夸其談都不敢学的人，瑞士在照会中竟然罵他們是杀人放火的强盜和一切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然，对馬志尼使用的詞句就更其凶狠了；然而大家知道，馬志尼不管搞什么密謀和暴动，仍然和德律埃先生本人一样，是一个現代社会制度的維護者。因此，交換这些照会結果只弄明了一件事：在原則問題上，瑞士人已經向奥地利人让步。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瑞士人今后在实际事务中不向奥地利人让步呢？

有一点是沒有疑問的：任何一个蛮橫和强硬的政府都能从瑞士人那里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們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河谷、同一个州的居民是同心合力的。但是他們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統一的民族起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同目的而斗争。每一次外

国入侵时,情况只要一严重,例如在 1798 年,这个瑞士人就对那个瑞士人变臉,这个州就出卖那个州。奥地利人毫无理由地从倫巴第赶走了 18 000 名德森人。瑞士人为这件事正在大吵大嚷,并且为自己受难的同联邦人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让那些德森人回去,那末我們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社会輿論就要来个惊人的轉变。他們对募捐将表示厌倦,并且会說德森人一向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这是咎由自取;还会說德森人实际上不是瑞士联邦可靠的成員 (keine guten Eidgenossen)。另外还会說,被驅逐的德森人要散居到瑞士其他各州,会“夺去当地人的工作”。要知道,在瑞士的一个人不算是瑞士人,而算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的当地人。当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們就会看到:这些威武的同联邦人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憤恨,会怎样制造各种各样的傾軋来对付这些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德森州的瑞士人将怎样同逃到瑞士的流亡者一样,成为被仇視、被迫害和被誹謗的对象。这样,奥地利就将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还有很多額外的东西,奥地利一要就会到手。

到欧洲各民族能够自由而正常生活的时候,它們就要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怎样处置这几个在反革命得胜时期对反革命曲意逢迎,对任何革命运动都采取中立的甚至敌对的立場,同时还冒充为自由独立民族的小小的“中立”国家。不过恐怕不到那个时候,病体上的这些贅瘤就連影子都沒有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 26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5 月 1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77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有一个爱好虛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①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說的对立統一[contact of extremes]規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語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視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視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发现一样。

“对立統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則，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⁹²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們下一阶段爭取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現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說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誕，然而，这絕不是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連綿不断的起义已延續了10年之久，現在已經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

^① 黑格尔。——編者注

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 1830 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 1833 年起，特别是 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自 1833 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

轉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项輸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起这项輸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輸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細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紡織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結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⁹³失败后被迫付給英国的賠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稅捐更重更难負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稅捐。例如，1853年1月5日皇帝^①在北京頒发的一道上諭中，就責成南方各省、武昌、汉阳的总督和巡撫減輕稅捐，允許緩交，首先是絕對不要額外再征；否則，这道上諭中說，“小民其何以堪？”又說：

“……庶几吾民于顛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②

記得在1848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們也听到过同样的話，看到过同样的让步。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財政、社会風尚、工业和政治結構，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絕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

① 咸丰。——編者注

② 見北京圖書館藏“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訓”原刻本卷一，第十一頁。——譯者注

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我们时常提起读者注意不列颠的工业自 1850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当时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⁹⁴，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 1833 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是 60 万英镑，而 1836 年达到了 1 326 388 英镑，1845 年增加到 2 394 827 英镑，到 1852 年便超过了 300 万英镑。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 1793 年还不超过 16 167 331 磅，然而在 1845 年便达到了 50 714 657 磅，1846 年是 57 584 561 磅，现在已超过 6 000 万磅。

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 200 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 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了 1852 年的出口量上；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市场。可是讲到以后的茶叶收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

点可以从倫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黄金价格上涨 25%，而且人們还加紧收进，貯藏起来。白銀奇缺，甚至不列顛輪船向中国繳納关税用的白銀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耳科克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作担保，說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保证的有价证券，便繳納这笔关税。从商业急需的角度来看，金銀的缺乏是最不利的条件之一，因为金銀恐慌恰恰是发生在急需它們的时候。茶絲收购商沒有金銀便不能到中国内地去采购，因为要采购就要預付大量現洋，以便使生产者能够完成自己的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簽訂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現在人家不讲別的問題，只是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因而一切事务都陷于停頓…… 要是不采取措施在四五月間把茶叶收集起来，那末，包括紅茶綠茶的精品在內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毀掉。”

当然，停泊在中国領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資金，但它們的干涉却能够很輕易地引起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事务联系。由此看来，要完成目前这一季的茶葉收集势必要提高价格，——在倫敦投机生意已經开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葉收集，可以有把握地預言，一定会产生巨額赤字。但問題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蕩时期的一切人一样，願意將他們現有的全部貨物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各国的居民在担心发生大变动的時候所做的那樣，他們也会把他們的絲和茶貯存起来，非現洋不卖。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問題：它的主要消費品之一漲价，金銀外流，它的棉毛織品的最主要市場之一大大縮小。甚至“經濟学家”这个一向以乐观面目出現，用咒語驅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会人心不定的东西的杂志，也不得不說出以下的話：

“我們不应当自欺，以为我們可以在中国为自己的出口貨找到以前那樣

大的市場……更可能的是：我們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要倒霉，對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產品的需求量要減少。”

不應當忘記，茶葉這樣一種必需品漲價和中國這樣重要的一個市場縮小的時候，正是西歐發生歉收，從而使肉類、糧食及其他一切農產品漲價的時候。這將引起工業品市場的縮小，因為生活必需品每漲一次價，國內和國外對工業品的需求量就要相應地減少。現在大不列顛到處都在抱怨大部分莊稼不好。“經濟學家”雜誌說：

“在英國南部，不僅有許多田地的莊稼種不上去，以致最後想種什麼都來不及，而且有許多已經播種的田地看來也將是滿地雜草，或者是根本不適於莊稼生長。麥田的土壤陰濕貧瘠，顯然預示着歉收。現在，播種飼用甜菜的時節可以說已經錯過了，種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種植飼用燕菁的季節也快要過去，然而沒有完成任何一項必要的準備工作來栽植這個主要的作物……雪和雨嚴重地阻礙了燕麥的播種。早播的燕麥種的不夠，晚播的燕麥又很難有好收成……許多地方種畜大量死亡。”

谷物以外的農產品的價格比去年上漲 20%、30%、甚至 50%。大陸的谷物價格比英國漲得更高。在比利時和荷蘭，黑麥價格整整漲了 100%，小麥和其他谷物作物也跟着漲價。

既然有這樣的情況，而且不列顛的工商業又已經經歷了通常的一個經濟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來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場面：中國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動亂，但西方列強則借助於英法美等國的軍艦在上海、南京和運河口建立“秩序”。這些往外輸出“秩序”，企圖扶持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的列強恐怕是忘記了：仇視外國人，把他們逐出國境，

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洲韃靼人征服了这个国家⁹⁵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紀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們之間的剧烈糾紛曾經有力地推动了滿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个世紀里即在中国被韃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緒。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香港商人进行交易；政府特許这些商人有做洋貨生意的特权，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无論如何，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滯时期。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顛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鴉片，而印度对不列顛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鴉片生产。不錯，中国人不願戒吸鴉片大概同德国人不願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頗有意在本国种植罌粟和炼制鴉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鴉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資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許不会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終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財政危机尖銳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們在前面已經預測过了。

欧洲从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业危机和財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錯，

我們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統治者和他們的臣民之間、国家和社会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現时的列强相互之間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緊張，以致非动武不可，非訴諸国君的 *ultima ratio*〔最后論据〕不可。在欧洲各国首都，現在每天傳来的消息全是关于大战爆发的傳聞，过一天又換一套，說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約一星期。尽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相信，無論欧洲列强間的冲突怎样尖銳，無論外交界上空的烏云怎样濃重，無論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經濟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样都会緩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結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

現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經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則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的 不公平現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們就不用多說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3 年 6 月 14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794 号

卡·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顛
国債条款变更。——印度。
——土耳其和俄国⁹⁶

1853年5月24日星期二于倫敦

荷兰由于不久以前国会解散而举行的大选，現在已經結束了。选举結果，极端新教派和保皇派的內閣以 12 票取得了多数。

丹麦現在反政府的小册子到处都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格隆德威格先生写的“向丹麦人民說明議會解散的原因”，以及一篇匿名作者写的抨击作品，标题为“关于丹麦王位继承問題的爭論，或欧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本小册子的目的都是要证明，如果实行內閣的主張，执行倫敦議定书的規定，廢除先前的王位继承法，国家就会灭亡，先变成霍尔施坦公国的一个省份，然后，淪为俄国的藩屬。

由此可見，丹麦人民大概終於認識到，他們盲目反对什列斯維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 1848 年提出的独立要求，給他們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丹麦人民曾經坚持要保持丹麦和霍尔施坦的永久联合，为此还对德国革命宣战；由于贏得了战争，就保住了霍尔施坦。但是現在，丹麦人民对这个战果却不得不付出祖国淪亡的代价了。在 1848—1849 年間，“新萊茵报”曾不断警告丹麦民主派注

意他們对德国革命抱敌对态度会招致什么后果⁹⁷。“新萊茵报”曾一再毫不含糊地預言，丹麦帮助別人来解除外国革命的武装，就是把自己永远同这样一个王朝联在一起，这个王朝当它的王位继承制度合法化和被丹麦人自己批准的时候，就会把丹麦人的民族独立交給俄国沙皇 *bon plaisir* [随意处置]。丹麦民主派拒不听从这一劝告，他們的近視和輕率現在正招来波希米亚^①的斯拉夫人所遭到的恶果，后者为了“保持自己对德国人的民族独立性”，曾經一拥而上地投入对維也納革命派的杀伐，反对了唯一有可能使他們摆脱他們所仇視的德国专制制度的人，即維也納革命派。这个事实，現在对这两个被反革命唆使而投入自杀性战争来反对革命事业的民族來說，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訓嗎？

現在，当格萊斯頓提出的縮減国債的計劃已在議會通过，正在受实践檢驗的时候，他的拥护者（恐怕倫敦的所有报刊都曾經极为欣賞这个出色的計劃）却馬上沉默了下来。格萊斯頓提出的5亿英鎊三厘证券的三項自願轉換办法，結果都成了渺茫的願望，接受其中任何一个办法的人都少得不值一提。至于南海公司证券的轉換，截至5月19日晚为止，总数1000万英鎊的证券換成新的有价证券的一共只有10万英鎊。根据一般的規律，像这样的业务如果不在头几个星期內就完成，那末以后就越来越沒有可能实现。此外，利率漲得虽然慢，但是却一直上漲。因此，认为总数1000万英鎊的旧有价证券会在規定时期內兌成新的有价证券，恐怕估計得过高了一些。但是，即使情况是这样，格萊斯頓先生也得付給不願意換新的有价证券的南海公司证券持有者800万英鎊。格萊斯頓

① 即捷克。——編者注

先生所掌握的应付这种情况的唯一的一笔基金，是英格兰銀行中的总数約八九百万英鎊的国家預算資金。但是，这笔資金不是收入超过支出所产生的結余，而仅仅是在支出以前的几个月暂时存入銀行里的一笔国家收入。因此，格萊斯頓先生将来早晚有一天会遇到很大的財政困难，这种困难同时会在銀行金融业务中和整个金融市場上引起极为严重的混乱。除此以外，由于粮食收成可能很坏，还会促使相当多的黃金外流。

东印度公司特許状的有效期到 1854 年就要滿了。約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将在 6 月 3 日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宣布政府对此后印度管理問題的打算。某些內閣报纸正在暗示公众說，甚至这一个巨人般的印度問題，也已經被联合內閣几乎縮成了一个侏儒，——这样就证实了公众中流傳的可靠傳聞。“观察家报”⁹⁸正在使英国人民对一次新的失望做思想准备。在这家不公开的阿伯丁的机关报上，我們讀到：

“在我們的东方帝国的新的管理机构方面，要做的事远远少于人們通常的預料。”

罗素閣下和阿伯丁閣下要做的事甚至比預料的还要少得多。

在联合政府打算进行的改革当中，看来主要可归結为以下兩項无关重要的事情：第一，董事会将补充几名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新董事，加以“革新”，但是，即使这一份鮮血，也将“在最初时期很节省地”添进去。这就是說，他們治疗旧董事制度的潰疮的办法，就是使現在“极其謹慎地”注入的那一份鮮血在完全停滯之后再來注入第二份。第二，将取消法官和稅务檢查官的职务由一人兼任的做法，并且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許担任法官。大家听到这类主張的时候，是否感到回到了中世紀初期呢？在那封建男爵担任的审

判官职务刚开始由法官代替的时候，不也是要求这些法官至少要学会讀会写嗎？

将要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这样一个模范改革计划的“查理·伍德爵士”不是別人，他就是在上届輝格党政府时期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以致联合內閣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安插他，幸而灵机一动，让他担任印度的领导的那位木头[timber]^①先生。理查三世曾經要王国騎馬走，而联合內閣却給王国找了一头馱子。的确，如果这种寡头政府的官式的愚昧无知說明了英国现在有什么能力，那就是說，英国統治世界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我們曾不止一次看到，無論什么措施，即使是无关紧要的措施，联合內閣也总是要找各种便宜的借口拖延下去。現在，它的这种一貫的拖延作風在印度問題上得到了两个国家的社会輿論的支持。英国和印度的人民同时要求联合內閣在印度問題上延期采取任何立法步驟，要等印度居民的意見，要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要等业已开始的調查工作完成。印度的三个管区反对匆忙頒布新法律的請願书已經送到了唐宁街⁹⁹。曼彻斯特学派成立了“印度协会”¹⁰⁰，协会要立即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組織群众集会，反对在本屆議會会會議期間頒布任何有关印度問題的法律。此外，議會中現在还有两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准备关于印度管理情况的报告。但是联合內閣这一次却铁面无情，它不願等到任何委员会发表意見的时候。它想立即直接地頒布用于 15 000 万人的法律，并且这些法律一下子就管 20 年。查理·伍德爵士一心渴望享有現代摩挲的声

^① 俏皮話：«wood»(伍德)意为“木”；«timber»意为“木料”。——編者注

誉。我們这些“謹慎的”政界老朽究竟为什么突然地这样匆忙起来，突然表现出这样的立法热情呢？

他們想要把旧特許状的有效期再延长 20 年。他們的做法是老說什么大家希望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样說呢？因为英国政治寡头預感到他們的光荣統治的末日即将到来，他們有一种很可以理解的願望，即想同英国的立法机关訂一項合同，有了這項合同，即使不久以后英国摆脱了他們的无力然而貪婪的手掌，他們和他們的同伙在印度的特权也可以再保持 20 年。

上星期六从布魯塞尔和巴黎拍来了几份报道君士坦丁堡 5 月 13 日消息的急电。接到急电后，在外交部立即举行了一个历时三个半钟头的內閣會議。当天，就向朴次茅斯海軍司令部发去电报，命令派 90- 炮式“倫敦号”和 71- 炮式“圣帕賴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从斯比特海德开赴地中海。21- 炮式“海弗拉尔号”和 16- 炮式“奧登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也同时接到了开赴地中海的命令。

这些急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使大臣們这样突然地积极起来，并且打破了英国一向昏沉沉的安靜状态呢？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問題已經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¹⁰¹；俄国駐巴黎和倫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并没有別的企图，它只是要求承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主要地位。俄国外交目的的狭义性质并不亚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薩和獅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說的。

“辯論日报”¹⁰² 报道說：“5 月 5 日，俄国蒸汽巡航舰‘貝薩拉比亚号’从敖德薩开来，乘坐該舰的是一名上校，給緬施科夫公爵送来了急电；到 5 月 7 日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大臣們递交了一份協議或專門条約的草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被称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簡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御前會議接受或拒絕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

5月10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复照拒绝，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根据十八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¹⁰³，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正教教堂，而且俄国大使馆有权干预正教教堂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緬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緬施科夫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安提奥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而且，即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緬施科夫是要苏丹^①放弃自己的主权，使俄国得利。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緬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到5月14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对头列施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而傅阿德-埃芬蒂复任大臣之职；三、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就算是俄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也不能向土耳其提出这样一些过分的要求。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打算，证明了欧洲每一次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会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运动也总是意味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却弄错了，它把欧洲的现状同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的进攻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大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不管怎样，俄国最近所耍的手腕，至少对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那些因素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唯一的问题是：俄国现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行动呢，还是不由自主地只是新天命——革命——的不自觉的奴隶？我相信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4日

载于1853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馬志尼。——瑞士和奧地利。 ——土耳其問題

1853年5月27日星期五于倫敦

馬志尼先生正在英國居留這件事，現在終於被一家同他有聯系的倫敦報紙發表的一個准官方消息所證實。

黑耳先生父子的“火藥陰謀”案件，本屆陪審法庭將不予審理，而被移到8月去了，這是因為聯合政府渴望在它作了“揭發”以後，到舉行法庭辯論判明這種“揭發”的價值之前，要過上一個時候，使這些“揭發”被人淡忘。

奧地利駐伯爾尼代辦卡爾尼茨基伯爵於5月21日接到本國政府命令，要他向瑞士聯邦總統宣布斷絕奧瑞外交關係，然後立即離職回維也納。但是5月23日的“聯邦報”却說，奧地利的使節早就獲准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隨時可以離開瑞士。這家報紙把卡爾尼茨基伯爵的最後通牒說成是奧地利對聯邦委員會5月4日照會的答复。實際上，最後通牒的內容要比普通的答复更多一些東西，這一點可以從以下的事實中看出來，即聯邦委員會近日曾要求弗里布爾州政府就它不久前對潰敗的暴動分子採取的“非常”措施作出解釋。英國各報都刊登了5月23日發自伯爾尼的這樣一個消息：

“由於奧地利代辦向瑞士聯邦總統宣布了斷絕奧瑞外交關係，聯邦委員

會決定立即停止瑞士駐維也納的使節的活動。”

但是，“瑞士報”發表的一篇寫於5月23日的文章則把這個消息的內容作了更正：

“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大致和皮蒙特一樣¹⁰⁴。奧瑞兩國的談判中斷了…… 奧地利外交使團仍然留在伯爾尼執行日常事務。‘聯邦報’說，召回瑞士駐維也納代辦的做法是適宜的，因為他以進行國家事務為借口在那裏安然地干自己的私人營生，專門作綢緞生意。施泰格爾先生是一個二等外交官，誰都知道，他對養蠶倒比他對委託給他的公事知道得多得多。所以，對於這樣一個沒有得到任何特殊權利而一向在維也納獨行其是的外交官，本來就毫無召回的必要。”

所以，希望誰也不要認為瑞士人記起了1789年路斯達洛用來裝飾自己的報紙“巴黎革命”¹⁰⁵的那句名言：

Les grands ne sont pas gran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Levons nous! ①

瑞士表現了勇敢精神的秘密，可以從熱那亞公爵訪問巴黎和比利時國王^②訪問維也納這兩件事情上，同時恐怕也可以在不小程度上從法國報紙“通報”5月25日刊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說明。文章說：

“任何國家都不應當干涉法國同瑞士的關係，一切其他的想法在這種主要情況面前都應當退讓。”

由此可見，普魯士國王收回紐沙特爾的企圖是得不到很大贊同的。而且，現在還盛傳法國正在瑞士國境綫上建立監視軍。路

① 有些東西我們所以覺得偉大，
只不過因為自己跪在地下。

——讓我們站起來吧！——編者注

② 列奧波特一世。——編者注

易-拿破侖如果有机会报复一下俄皇、奧皇、普魯士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最近几个月內对他的蔑視¹⁰⁶，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报道的君士坦丁堡已拒絕俄国的最后通牒和組成反俄內閣的消息^①，已經被完全证实。5月17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最近消息說：

“列施德-帕沙上任后，要求緬施科夫公爵延期6天。緬施科夫声称外交关系已断，表示拒絕，接着又說，他在君士坦丁堡将再停留3天，以便做好一切必要的回国准备；他請土耳其政府好好考虑一下形势并且利用他暫停回国的这段不长的時間。”

根据5月19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消息，我們进一步了解到：

“5月17日举行了御前會議，結果断然决定不能接受緬施科夫公爵所建議的条約。緬施科夫得悉此事后，仍然沒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反地，他已着手和列施德-帕沙重开談判。俄国使团沒有再規定回国的日期。”

与这个消息相反，法国政府机关报——“祖国报”（晚报）¹⁰⁷肯定地声称，政府已获悉緬施科夫公爵乘船去敖德薩，而且这一事件在君士坦丁堡並沒有产生很大影响。“国家报”证实了这段話的正确性，但“新聞报”¹⁰⁸却否定了它。不过，日拉丹又补充說，即使这些消息可靠，那也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釋。

“如果緬施科夫公爵确实已乘船离比尤克德列¹⁰⁹去敖德薩，那末問題就是，他由于沒有达到完成自己使命的目的 (manqué son effet)，因此別无他着，只好做出訪問一个港口以后再訪問另一个港口的样子，溜之大吉。”

某些报纸断言，德拉修斯海軍上将的舰队已經駛过达达尼尔海峽，現在正停泊在金角港。但是，这种說法却被“晨邮报”否定。“的里雅斯特报”极力要讀者相信，土耳其政府在把答复递交緬施科夫公爵以前，曾詢問过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庫尔先生，問他們

① 見本卷第122頁。——編者注

土耳其政府最后是否可以指望他們的支持。“泰晤士報”則鄭重地否認了這一點。

我現在特寄去巴黎“世紀報”¹¹⁰上的一段文章的直接譯文，在這篇文章中，有一些關於從5月5日到5月12日君士坦丁堡談判的很有意思的細節。它如实地表明了緬施科夫公爵的行為是如何可笑，這位公爵在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中都表現出那種北方的野蠻作風和拜占庭的兩面手法的極其可惡的結合，從而非常成功地使俄國成了歐洲的笑柄。這位«grec du Bas-Empire»〔“東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人”，即拜占庭人〕竟想只通過舞台效果去奪取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俄國除了從列強地位向可笑地位邁進一步別無他法——這是只有用血才能洗掉的恥辱。但現在是進行交易所投機活動的金融寡頭時代，已不是騎士競技的時代了。“世紀報”上的那篇文章是這樣說的：

“在5月5日，星期四，法國郵船開走那天，土耳其政府把蘇丹關於聖地問題的敕令副本分別送交戴拉庫爾先生和緬施科夫公爵。這一天不見緬施科夫公爵有任何聲明和舉動就過去了；於是所有各國大使都推測問題已經解決，想趁法國輪船開走之便向本國政府發出關於事情已有轉機的報告。可是，緬施科夫公爵接到關於聖地問題的敕令後，到半夜的時候派了一個普通卡瓦斯（憲兵）給外交大臣^①送去一份最後通牒，要求簽訂解決聖地問題的條約，條約還要預先為希臘正教教會的特權和不受侵犯作出保證；換句話說，就是要求確立俄國對正教教會的最廣泛的保護權，這就等於要求在土耳其有兩個皇帝，一個是穆斯林的蘇丹，另一個是基督徒的沙皇。公爵給土耳其政府一共4天的期限來答复這一最後通牒，同時還要求由政府官員立即證明已經收到了最後通牒。外交大臣通過他的一个阿加（低級憲兵軍官）給緬施科夫公爵送去了一個類似收據的東西。當天夜里，這位公爵把輪船派到了敖德薩

^① 里法特-帕沙。——編者注

去。到5月6日，星期五，当苏丹知道了用这种奇怪方法递来最后通牒的事情以后，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把这件事正式通知给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两位大使立即约定共同行动，建议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一最后通牒，同时在措词上要保持最大的慎重。此外，正如人们所肯定的那样，戴拉库尔先生十分明确地声明，在圣地问题方面，法国将反对任何侵犯它根据1740年条约而得到的权利的协议。这时，緬施科夫公爵已跑回比尤克德列去了（像阿基里斯跑回自己的营幕那样）。5月9日，坎宁先生表示希望同公爵会晤，打算促使他采取比较温和一些的行动。公爵拒绝了。5月10日，陆军大臣^①和外交大臣在总理大臣^②那里，总理大臣邀请緬施科夫公爵到他那里去，共同筹划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办法。公爵又拒绝了。然而，緬施科夫公爵仍向土耳其政府示意，他愿意再给它延长3天期限。但是苏丹和他的政府回答说，他们也已作出了决定，时间并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土耳其政府的这一否定回答于5月10日午夜送到比尤克德列；整个俄国使团人员都集合在那里，并在最近好几天中都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土耳其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几乎已准备让步，但是苏丹要它辞职，并且组织了新的政府。”

现在，我从“立宪主义者报”摘录一段文章来结束我关于土耳其情况的报道，这段文章描述了希腊正教教会在这些谈判期间的情况：

“对这个問題有那么大关系的希腊正教教会赞成 *status quo*，即赞成土耳其政府。他们 *en masse*（絕大多数）都表示反对俄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种保护权。正教居民一般都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他们不受俄国的直接统治。他们甚至一想到源出东正教教会的俄国教会将来有一天居然会统辖东正教教会就极为不快，但是，彼得堡当局方案如被接受，这种局面是必定要出现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7日
 載于1853年6月10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791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穆罕默德-木特尔晋-帕沙。——編者注
 ②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編者注

卡·馬克思
土耳其問題。——“泰晤士報”。
——俄國的擴張

1853年5月31日星期二于倫敦

在比斯開灣，發現科里海軍上將的分艦隊正開往馬爾他，去那里加強鄧達斯海軍上將的分艦隊。關於這件事，“先驅晨報”公正地指出：

“如果在幾個星期以前能夠讓鄧達斯海軍上將到薩拉米斯附近和法國分艦隊會合，那末，現在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

如果俄國企圖以實際的軍事行動來支援緬施科夫的可笑的示威行動（哪怕僅僅是為了顧全自己的面子），那末，它的第一個行動很可能就是再一次占領多瑙河各公國，侵入阿爾明尼亞的卡爾斯省，侵入巴土姆港。這些地方，俄國遠在簽訂阿德里安堡條約的時候，就曾千方百計地力圖弄到自己手里。由於巴土姆港是黑海東部的唯一可靠的安全港口，所以，如果俄國占領了它，土耳其就會喪失自己在歐克辛海的最後一個海軍基地，歐克辛海就要變成純粹俄國的海。如果俄國占領卡爾斯——阿爾明尼亞的最富庶、農業最發達的地方，同時再占領巴土姆，那末，它就能夠切斷英國和波斯之間通過特拉比曾德的貿易，並且還能為自己建立一個既能對付英國又能對付小亞細亞的作戰基地。即使如此，如果英國和

法国能持强硬态度，尼古拉就很难在这一地区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就要碰到当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在同阿加-穆罕默德斗争时碰到的命运，那时，阿加-穆罕默德曾经命令他的奴隶们用鞭子把俄国大使沃依诺维奇和他的随从赶出阿斯特拉巴德，迫使他们坐船逃走。

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引起的慌乱，比任何地方都要大。“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拼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完全失效了”的机器。“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做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报线以后，就用大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企图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提划清界限。“泰晤士报”声称：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点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終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铁蹄之下，使俄国的巨大领土更加扩大。我们深切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决心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

那末，可怜的“泰晤士报”那时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叶卡特林娜也曾一再开导奥地利，劝说法国，一同来瓜分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①为首的希腊帝国，而

① 康斯坦丁。——编者注

且還胸有成竹地讓她的孫子受了相應的教育，甚至給他取了相應的名字。現在，比較穩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認他是土耳其的唯一的保護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記得，俄國做過波蘭的保護人、克里木的保護人、庫爾蘭的保護人、格魯吉亞和明格列里亞的保護人、切爾克斯和高加索各部族的保護人。現在它又要當土耳其的保護人了！為了說明俄國對擴張所抱的“反感”，讓我從俄國自彼得大帝那時起搶奪領土的許多事實當中舉出幾件材料罷。

俄國邊界向外伸展的情況是：

往柏林、德勒斯頓和維也納方向伸展 ……約 700 哩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約 500 哩
往斯德哥爾摩方向……………約 630 哩
往德黑蘭方向……………約 1 000 哩

俄國從瑞典手里獲得的領土比這個王國剩下的領土還大；它在波蘭獲得的領土相當於整個奧地利帝國；在歐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超過了普魯士的國土面積（不包括萊茵河流域的屬地）；在亞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有全部德國本土那樣大；在波斯獲得的領土面積不亞於一個英國；在韃靼獲得的領土面積等於歐洲土耳其、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總和。俄國最近 60 年來所獲得的領土，從面積和重要性來看，等於俄羅斯帝國在此以前的整個歐洲部分。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5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6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794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俄国的欺騙。——格萊斯頓的失敗。
——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¹¹¹

1853年6月7日星期二于倫敦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委员会撤銷了弗里布尔州軍事法庭对不久前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建議：如果州委员会不予赦免，就将該案移交普通法庭。于是，我們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奥关系决裂”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决裂的必然后果，我在前面一篇論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文章中已談过了^①。

我在轉述关于普魯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軍官速返职守的消息时，誤写了他們在俄国軍隊中任教官，而我的本意是想說，他們在土耳其炮兵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訓練¹¹²。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將軍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的命令。俄国駐巴黎公使基謝廖夫先生說話很带威胁性，并且耀武揚威地出示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对土耳其問題的談法 *assez cavalièrement*〔非常驕橫〕。从这里就产生一种傳言：似乎俄国要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岸頂端的領土和阿斯特拉巴德城。同时，俄国商人正向他們駐倫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像消息所报道的，已

① 見本卷第 124—125 頁。——編者注

經发出了——指示：“目前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威胁迫于眉睫，谷价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神秘莫测地暗示：俄国军队正开赴边境；雅西居民筹备欢迎；俄国駐加拉茲領事采购大批圆木，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設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諸如此类的，由“奧格斯堡报”¹¹³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机关报煞費苦心編出来的謠言。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新聞、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們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繼續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之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計劃了。这一幕騙局是怎样系統地演出的，从以下可以看到：

上星期，某些公开接受俄国津貼的法国报纸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

“实质上，与其說是俄土之爭，倒不如說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即沙皇和旧俄派之爭；对专制君主來說，宣战的危險性，比遭到坚决要求攻城略地的党派的报复，要小得多，这个党派已經不止一次地表明它会如何对待它所不乐意的君主。”

不言而喻，緬施科夫公爵就是“这一党派的首領”。“泰晤士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馬上就接着宣揚这一荒謬的論断，它們当中有一些完全了解这种說法的真意，有一些可能是无意受騙。但是从这个新发现中公众会得出什么結論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笑之下后退，放棄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做法，那末，他就是战胜了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末，他这样做只不过是由于必須向这个(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問題”，因而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問題。

至于著名的旧俄派，我曾偶然地从一些在巴黎与我常相往来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党派早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他的苛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来用一下。他们都說，现在所以把緬施科夫挖掘出来，給他穿上故事中的旧俄服装，就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沙皇所担心的只是俄国贵族中的一个党派，即想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的党派。

为了欺騙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招来形形色色的阴魂之外，最近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出版了波蒙-瓦西子爵所写的一部著作，书名是“維也納會議以来的俄罗斯帝国”¹¹⁴。要介紹这本 opusculum [小册子]，只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大家知道，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內藏有硬币和金銀錠的儲备。截至1850年1月1日，这一**秘密金庫**据官方估計为99 763 361銀卢布。”

有誰想到过談論英格兰銀行的**秘密金庫**嗎？俄国的“秘密金庫”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紙币流通的金屬儲备**，此种紙币可換取**貴金屬**，至于不能換取貴金屬的、国庫发行的有价证券构成的“秘密”准备金的存在，那就不用說了。不过，有可能这种金庫确实可以称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每年任命几名彼得堡商人来檢查他所存的錢袋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見过。

但是，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耍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辯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賢人圣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我們认为，现在欧洲有两个大危險，一个是威胁它的独立的**俄国**，一个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欧洲只有完全投入一个危險，才能避免另一个危險…… 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關鍵在君士

坦丁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要表現出勇敢大膽精神來解決問題，那末，這就意味着跟俄國開戰。法國和英國在這個戰爭中就是為保障歐洲的獨立而戰。德國將如何行動呢？這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在當前的歐洲形勢下，戰爭就意味着社會革命。”

不言而喻，聖馬爾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價要和平因而反對社會革命的。但是他忘了俄國皇帝對這種革命感到的“恐慌”，至少也同他本人及其東家貝坦先生一樣。

儘管俄國外交給英國報界和英國人民送上了上述種種麻醉藥，但“老頑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向海軍上將鄧達斯發出了到土耳其沿海與法國艦隊會合的命令。即使是最近幾個月來只會用俄文寫字的“泰晤士報”，看起來也充滿了更多的英國感情。它現在也開始用極端驕橫的口氣說話了。

丹麥問題（過去是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問題）在英國開始引起極大的注意，因為英國報界終於了解到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同東方糾紛的根源一樣，都是俄國的擴張意圖。土耳其和東方制度的著名崇拜者，議員烏爾卡爾特先生出版了一個論述丹麥繼承權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我將在今後的一篇文章中詳細論述¹¹⁵。這一著作的主要論據是指出：俄國的意圖是想使松德海峽在北方所起的作用，正同達達尼爾海峽在南方一樣，就是說，力求利用松德海峽來保障自己在波羅的海的統治，就像它力求占領達達尼爾海峽來鞏固它在歐克辛海^①的統治一樣。

不久前我曾經說過，英國的利率要上升，這種情況對格萊斯頓的財政計劃將起不良的影響^②。果然，英格蘭銀行上星期就把最

① 黑海的古稱。——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18—119頁。——編者注

低貼現率从 3 % 提到 3.5 %。我曾預言格萊斯頓的國債條款變更計劃必遭失敗，現在這已是既成事實，這一點从下面的材料就可看出来：

英 格 兰 銀 行

1853 年 6 月 2 日 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推銷的新有价证券的价值：

	英鎊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138 082	0	3
二厘五证券.....	1 537 100	10	10
國庫債券.....	4 200	0	0
共 計.....	1 679 382	11	1

南 海 公 司

1853 年 6 月 2 日 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經轉換为有年收入的債券的价值：

	英鎊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67 504	12	8
二厘五证券.....	986 528	5	7
國庫債券.....	5 270	18	4
共 計.....	1 059 303	16	7

由此可見，在要轉換的南海公司債券總額中，只換了八分之一，而在格萊斯頓先生所发行的为數 2 000 万的新有价证券中，总共只推銷了十二分之一。因此，格萊斯頓先生不得不在利率已經上升，看来还将繼續上升的时候借債，而且这笔借款的數額不得少于 8 157 811 英鎊。完全失敗了！因而，預計通过國債條款變更而节省的并且已經記入預算收入部分的 10 万英鎊，也只好付諸东流了。在國債的主要部分即 5 亿英鎊的三厘证券方面，格萊斯頓先

生通过自己的財政实验所取得的結果只是：到 1853 年 10 月 10 日又是一年，在此期間他要实行任何轉換都办不到。但更糟的是，最近就要付給国庫期票持有者現金 3 116 000 英鎊，因为这些人拒絕根据格萊斯頓先生所提出的条件更換国庫期票。这就是“群賢”政府的財政成就。

在就爱尔兰教会收入問題进行辯論时（下院，5 月 31 日），約翰·罗素爵士声称：

“从天主教僧侶在英国的行为来看，从天主教会在其首脑——他本人是外国的君主——指使下的行动来看，近几年来已經很明显：天主教僧侶力图取得政治权力（喊声：“对！对！”），在我看来，这是与对英王的不二忠誠不相容的（喊声：“对！对！”），也是与对共同自由事业的不二忠誠，对国家的每一个臣民所肩負的義務的不二忠誠不相容的。我想同在我以前发言的那位受尊敬的紳士同样地直吐肺腑，所以希望議院不要对我誤解。我决不否认，在議院內外，無論是在**我們国家**或是在爱尔兰，有不少天主教人士忠于王权，忠于**我們国家**的自由；我只是肯定，——而且我深信，——如果天主教僧侶的权利扩大，如果天主教神甫获得比現在更大的政治影响和控制，那末，他們就会不按照在**我們国家**中大放異彩的**普遍自由**来利用这种权力（雷鳴般的喊声），他們就会在政治权力問題上以及在其他問題上，作出无益于辯論的**普遍自由**，无益于人类智慧的积极而坚毅的活动，即无益于构成**我們国家**宪法的真正精神的事来。（掌声如雷）我不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把天主教徒同苏格兰长老会派（嘘声），同**英国的**威斯利派¹¹⁶，同**英国**国教教会相提并論（全場热烈贊許）…… 总之，我必須下結論，——虽然出于无奈，但却非常坚决，——如果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而不是由国家支持**这个国家**的新教教会，这是不可能得到**我們国家**議会的贊同和批准的。”

由于約翰勋爵在講話中第一百次极力用狂热崇拜某些伪善的新教教派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对“普遍自由”的热爱**，所以在他講話后两天，薩德勒先生、克奧先生和蒙塞耳先生向联合內閣递交了辞

呈，辭呈是以蒙塞耳先生致阿伯丁閣下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的。阿伯丁閣下在 6 月 3 日的答复中向这些紳士保证：

“我和我的許多同僚，对于約翰·羅素勳爵的那些使你們不滿的意見和感情的流露并不以为然…… 約翰·羅素勳爵請求我轉告你們，他并不是責備天主教徒不够忠誠。”

此后，薩德勒、克奧和蒙塞耳等先生收回了他們的辭呈。昨天晚上“約翰·羅素勳爵非常滿意”議會采取了使大家言归于好的步驟。

1783 年的印度法案曾經成为福克斯先生和諾思勳爵的联合內閣的致命伤。1853 年的关于印度的新法案同样可能成为格萊斯頓先生和約翰·羅素勳爵的联合內閣的致命伤。前者的垮台是由于企图取締董事会和股东会[Courts of Directors and of Proprietors]，后者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却是由于恰好相反的原因。6 月 3 日，查理·伍德爵士要求准許他宣布印度管理法案。查理爵士一开头先为他要发表特別长的演詞作辯解，說是“問題的面很广”，“這個問題牽涉到一亿五千万生灵”。查理爵士认为他必須在每三千万同胞身上至少牺牲他一生中一小时。但是，为什么在为这个“巨大問題”立法时表現得如此仓促，而在处理“甚至是細小事务”采取措施时却經常拖拉呢？原来东印度公司特許状有效期到 1854 年 4 月 30 日就滿了。但是，为什么不暫且通过一个暫时延长特許状的法案，留些時間以备将来討論較永久的法律呢？据說，因为不能期望将来会再有“这么方便的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討論这个广泛而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再沒有把这个問題在議會里埋葬掉的机会了。此外，据說还已經掌握了這個問題的全部材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也认为必須在本屆會議上为這個問題立法，而印度总督达

尔豪西勋爵也来了紧急信，要求政府无论如何要立即通过制定法律的决定。然而，查理爵士主張馬上通过他的法律草案的一个最令人惊異的論据却是：尽管他以为他已經准备好要談到許多“他所提出的法案中沒有規定的”問題，但是，

“在法律草案所决定的程度上提交审查的措施并不超出相当狹窄的範圍”。

查理爵士在这一番開場白之后，便开始为 20 年来的印度管理作辯护。“我們應該用印度人的眼光来看印度”，这眼光有一种特性，看英国事事光明，看印度則事事黑暗。

“在印度我們所碰到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它很不乐意变动，它受着宗教偏見和古老風俗的束縛。那里实际存在着种种阻撓迅速进步的障碍。”〈想必是在印度存在着輝格联合党。〉

查理·伍德爵士說：

“受到最大重視的各项条目，都是同司法权的行使、公共工程的缺乏和土地占有制度有关的，这些条目也是提到委员会来的申訴书中的主要内容。”

关于公共工程的問題，政府打算举办“規模最大和意义最大的”工程。关于土地占有制度，查理爵士十分順利地证明：印度現有的三种土地占有制度的形式——柴明达尔制度、萊特瓦尔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只不过是公司用来經營財政的三种形式，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普遍推广，而且也不值得普遍推广。至于建立其他性质上截然相反的形式問題，查理爵士根本沒有想到。

他繼續說：“在司法权的行使方面，申訴所牽涉到的，主要是由于英国訴訟手續、由于据說英籍法官不称职以及土著官吏和法官貪污等等而产生的困难。”

于是，为了证明在印度要保证司法权的行使是多么困难，查理

爵士告訴我們，早在 1833 年那里就成立了專門的法律委員會。但是，根據查理·伍德爵士本人的証詞，這個委員會做了些什麼呢？它的第一個同時也是唯一的一個工作成果就是：在馬考萊先生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部**刑法典**。這部刑法典曾分發給印度各地方當局，各地方當局又送回加爾各答；從加爾各答又寄往英國，然後，又從英國重返印度。在印度，比頓先生代替馬考萊先生任法律顧問之後，把法典作了徹底修改。那時總督^①並不認為“拖延就是弱點和危機的源泉”，他以修改為借口，再一次把它送到英國，再從英國寄回，並且授權總督用他本人認為是最好的方式來批准法典。但是比頓先生死了，總督認為最好是把法典交給第三個英國法學家——並且是對印度人的風俗習慣一無所知的法學家去裁奪，這樣他就為自己保留了等這位完全不稱職的官員拼湊好一部法典後再來否定的權利。這部至今尚未問世的法典的坎坷歷史就是如此。關於印度訴訟程序荒謬的問題，查理爵士在這裡所引證的是英國訴訟本身的同樣荒謬的程序。他肯定英籍法官在印度是廉潔奉公的，但是他仍然甘願犧牲他們，改變了任命辦法。查理爵士把目前的德里狀況同庫利汗入侵時期的德里狀況作了比較，用這種辦法來證明印度已普遍進步。用來為鹽稅作辯護的，是從最有名的經濟學家那里抄襲來的論據，這些經濟學家曾經一致主張對任何生活必需品都要課稅。但是，查理爵士沒有補充說明這些經濟學家在知道兩年來情況以後會說些什麼。兩年來，從 1849—1850 年到 1851—1852 年，鹽的消費量縮減了 6 萬桶，這就使總數為 200 萬英鎊的鹽稅收入減少了 415 000 英鎊。

① 達爾豪西。——編者注

查理爵士提出的“不超出相当狹窄的範圍的”措施是这样的：

(1) 董事会应由 24 人減至 18 人，其中 12 人由股东选出，6 人由国王任命；

(2) 董事的薪金由一年 300 英鎊增至 500 英鎊，主席領 1 000 英鎊；

(3) 民政机关的所有公职以及必须具备专门知識的所有軍职，在印度都通过公开征求的办法补缺；董事只有任命集团軍直屬騎兵的低級軍官的权利；

(4) 总督一职和孟加拉省督一职分开；授予最高权力机关在印度河区域成立新的管区的权利；

(5) 最后，在議會沒有作出新規定之前，上述各措施一律有效。

查理·伍德爵士的演說和他所提出的措施，遭到布萊特先生的非常严厉而尖刻的批評；但是，布萊特所描繪的只是印度由于公司和政府的財政勒索而破产的情景，这里自然不包括曼彻斯特和自由貿易对印度的破坏情况。至于昨天晚上发言的那一位东印度老手，公司的董事或前任董事詹·霍格爵士的演說，老实說，我确实感到我在 1701、1730、1743、1769、1772、1781、1783、1784、1793、1813 和其他年份的報告书中早就拜讀过了。为了回答他对董事会的頌詞，我只从据我記得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出版的关于印度的年度報告书中引用一些材料：

印度純收入總額

1849—50.....	20 275 831 英鎊	} 3 年来收入減少 348 792 英鎊
1850—51.....	20 249 932 英鎊	
1851—52.....	19 927 039 英鎊	

支出總額

1849—50.....	16 687 382 英鎊	} 3 年來支出增加 1 214 284 英鎊
1850—51.....	17 170 707 英鎊	
1851—52.....	17 901 666 英鎊	

田 賦

過去 4 年中田賦總額：

孟加拉.....	搖擺于 3 500 000 英鎊到 3 560 000 英鎊之間
西北區.....	搖擺于 4 870 000 英鎊到 4 900 000 英鎊之間
馬德拉斯.....	搖擺于 3 640 000 英鎊到 3 470 000 英鎊之間
孟買.....	搖擺于 2 240 000 英鎊到 2 300 000 英鎊之間

	1851—52 年的 總收入	1851—52 年的 公共工程支出
孟加拉.....	10 000 000 英鎊	87 800 英鎊
馬德拉斯.....	5 000 000 英鎊	20 000 英鎊
孟買.....	4 800 000 英鎊	58 500 英鎊
共 計.....	19 800 000 英鎊	166 300 英鎊

由上可知，總收入 19 800 000 英鎊中，用于修建道路、河渠、橋梁及其他必需的公共工程的支出總共只有 166 300 英鎊。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6 月 7 日

載于 1853 年 6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801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¹¹⁷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倫敦

据維也納電訊报道，那里对于土耳其問題、撒丁問題和瑞士問題的和平解决都很有信心。

昨晚下院繼續辯論印度問題，辯論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萊克特先生責备查理·伍德爵士和德·霍格爵士，說他們的发言有点假乐观主义。內閣和董事会的一批辯護士对这个責难极力加以反駁，而无所不在的休謨先生則在結論中要大臣們把法案收回去。辯論最后决定改期举行。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規模的意大利。喜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倫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錫兰島相当于西西里島。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結構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劍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攏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臥儿或不列顛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結合在一起的現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

古老傳統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納特的宗教¹¹⁸；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也不必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而搬出庫利汗統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所做的那样^①。但是大家可以拿奥朗則布时期做例子；或者拿莫臥儿出現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現在南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拿穆斯林入侵和南印度七国爭雄¹¹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如果大家願意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那就可以拿婆罗門自己的神話紀年看一看，它把印度災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創始时期更远的时候。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屬於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顛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結合起来要比薩尔赛达庙¹²⁰里的猙獰的神像更为可怕。这种結合并不是英国殖民制度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制度的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确切，所以为了說明不列顛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萊佛尔斯爵士談到旧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說过的一段話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賺錢，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場主人对待他們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場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錢，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錢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現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

① 見本卷第 140 頁。——編者注

民，使他們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納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貢獻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壟断利己心腸結合在一起进行統治的。”

內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鬧饥荒——所有这一切接連不断的灾难，不管它們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則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結構，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絕了联系。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說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門；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門。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結成自願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产生自願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預。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經濟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无法解釋的事实，

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說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內人烟蕭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現在，不列顛人在东印度从他們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財政部門和軍事部門，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門。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竞争原則——*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原則¹²¹——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們在亚洲各国經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統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因此，假如沒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末無論对农业的損害和忽視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顛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遙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終沒有改变。曾經产生了无数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机是印度社会結構的樞紐。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时运貴金屬去交換，这样就給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則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員，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們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飾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脚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机，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挤出了欧洲市場，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后就使这个棉織品的祖国充滿

了英国的棉織品。从 1818 年到 1836 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长的比例是 1:5 200。在 1824 年，輸入印度的英国細棉布不过 100 万碼，而到 1837 年就超过了 6 400 万碼。但是在同一时期內，达卡的人口却从 15 万人减少到 2 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聞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統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結合彻底摧毀了。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們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組織，过着閉关自守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鎮自治区。它通常設有以下一些官員和職員：**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务，調解居民糾紛，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稅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納姆**負責督察耕种情况，登記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幫助計算收成。**边界守卫員**負責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爭議时提供证据。水庫水道管理員負責分配农业用水量。有專門的婆罗門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

沙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門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員和職員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損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紀又一个世紀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潰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們的村社完整无損,他們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統治,因为他們内部的經濟生活是仍旧沒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稅吏。”¹²²

这些細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說是由于不列顛的收稅官和不列顛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說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貿易造成的結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織业、手紡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結合而自給自足。英国的干涉則把紡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織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們的經濟基础;結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实說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純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說,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这些田园風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終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們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範圍內,成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为傳統規則的奴隶,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历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

French Emperor married King Leopold. It seems that Napoleon is eager to pick a quarrel with King Leopold, who has thrown himself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Russia and Austria...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Consolidation of The N. Y. Tribune. LONDON, FRIDAY, JUNE 22, 1883. Telegraphic dispatches from Vienna announce that the public solution of the Turkish, Sardinian and Swiss questions, is regarded there as a certainty.

Last night the debate on India was continue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the usual dull manner. Mr. Parnell charged the statements of Sir Charles Wood and Mr. J. Hogg with bearing the stamp of official falsehood. A lot of Ministerial and Directorial advocates rebuked the charge as well as they could, and the inevitable Mr. Hume summed up by calling on Ministers to withdraw their bill. Debate adjourned.

Hindustan is an Italy of Asiatic dimensions, the Himalayas for the Alps, the Plains of Bengal for the Plains of Lombardy, the Deccan for the Apennines, and the Isle of Ceylon for the Island of Sicily. The same rich variety in the products of the soil, and the same dismemberment in the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find as Italy has, from time to time, been compressed by the conqueror's sword into different national masses, so do we find Hindustan, when no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Mohammedan, or the Mogul, or the Briton, dissolved into as many independent and conflicting States as it numbered towns, or even villages. Yet, in a social point of view, Hindustan is not the Italy, but the Ireland of the East. And this strange combination of Italy and of Ireland, of a world of voluptuousness and of a world of woes, is anticipated in the ancient traditions of the religion of Hindustan. That religion is at once a religion of sensualist exuberance, and a religion of self-torturing asceticism; a religion of the lingam and of the Juggernaut; the religion of the Monk, and of the Bays-dere.

I share not the opinion of those who believe in a golden age of Hindustan, without recurring, however, like Sir Charles Wood,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my view, to the authority of Khuli-Khan. But take, for example, the times of Auring-Zeb; or the epoch, when the Mogul appeared in the North, and the Portuguese in the South; or the age of Mohammedan invasion, and of the Hephatarely in Southern India; or, if you will, go still more back to antiquity, take the mythological chronology of the Brahman himself, who places the commencement of Indian misery in an epoch even more remote than the Christian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re cannot, however, remain any doubt but that the misery inflicted by the British on Hindustan is of an essentially different and infinitely more intensive kind than all Hindustan had to suffer before. I do not allude to European despotism, planted upon Asiatic despotism, by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ming a more monstrous combination than any of the divine monsters starting up in the Temple of Baalsetra. This is no distinctive feature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but only an imitation of the Dutch, and so much so that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the working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t is sufficient to literally repeat what Sir Stamford Raffles, the English Governor of Java, said of the ol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Dutch Company, actuated solely by the spirit of gain, and viewing their subjects, with less regard or consideration than a West India planter formerly viewed a gang upon his estate, because the latter had paid the purchase money of human property, which the other had not, employed all the existing machinery of despotism to oppress from the people their utmost mite of contribution, the last drops of their labor, and thus aggravated the evils of a capricious and sad barbarous Government, by working it with all the protracted ingenuity of politicians, and all the monopolizing self-love of traders."

All the civil wars, invasions, revolutions, conquests, famines, strangely complex, rapid, and destructive as the successive action in Hindustan may appear, did not go deeper than its surface. England has broken down the entire framework of Indian society, without any symptoms of re-constitution yet appearing. This loss of his old world, with no gain of a new one, imparts a particular kind of melancholy to the present misery of the Hindoo, and separates Hindustan, ruled by Britain, from all its ancient traditions, and from the whole of its past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in Asia, generally, from immemorial times, but three 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 that of Finance, or the plunder of the Interior; that of War, or the plunder of the exterior; and, finally,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Climate and territorial conditions, especially the vast tracts of desert, extending from the Sahara, through Arabia, Persia, India, and Tartary, to

personal influence and minu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situation, and concerns of the people, render him the best qualified for this charge. The function keeps the resources of civilization, and registers everything intrusted with it. The latter and the latter the duty of the former of which consists in gaining information of a times and of times, and in recording and protecting persons traveling from one village to another, the province of the latter appearing to be more immediately confined to the village, consisting, among other duties, in guarding the crops and assisting in reaping them. The latter work, and preserves the limits of the village, or gives evidence respecting them in cases of dispute. The Superintendent of Tanks and Water-courses distributes the water for the purpose of agriculture. The Brahmin, who performs the village worship. The schoolmaster, who is seen teaching the children in a village to read and write in the sand. The village headman, or saralloger, &c. These officers and servants generally constitu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llage, but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it is of less extent, some of the duties and functions above described being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 in others it exceeds the above-named number of individuals. Under this simple form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have lived from time immemorial. The boundaries of the villages have been but seldom altered, and though the villages themselves have been sometimes injured, and even desolated by war, famines or disease, the same name, the same limits, the same interests, and even the same families have continued for ages. The inhabitants gave themselves no trouble about the breaking up and divisions of kingdoms; while the village remained entire, they cared not to what power it is transferred, or to what sovereignty it devolves. Its internal economy remains unchanged. The peon is still the head inhabitant, and still acts as the petty judge or magistrate, and collector or renter of the village.

These small stereotyp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have been to the greater part dissolved, and are disappearing,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brutal interference of the British tax-gatherer and the British soldier, as to the working of English steam and English free trade. These family-communities were based on domestic industry, in that peculiar combination of hand-weaving, hand-spinning and hand-tilling agriculture which gave them self-supporting power. English interference having placed the spinner in Lancashire and the weaver in Bengal, or sweeping away both Hindoo spinner and weaver, dissolved these small semi-barbarous, semi-civilized communities, by blowing up their economical basis, and thus produced the greatest, and to speak the truth, the only social revolution ever heard of in Asia.

Now, sickening as it must be to him who feeling to witness these myriads of industrious, patriarchal and indust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disorganized and dissolved into their units, thrown into a sea of woes, and their individual members lo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ir ancient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their hereditary means of subsistence,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se little village-communities, inefficient though they may appear, had always bee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Oriental despotism, that they restrained the human mind within the smallest possible compass, making it the unresisting tool of superstition, enslaving it beneath traditional rules, depriving it of all grandeur and historical energies. We must not forget the barbarian system which, concentrating on some miserable patch of land, had quietly witnessed the ruin of empires, the perpetration of unspeakable cruelties, the massacre of the population of large towns, with no other consideration bestowed upon them than on natural events, itself the helpless prey of any aggressor who deigned to notice it at all.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is undignified, stationary, and vegetative life, that this passive sort of existence evoked on the other part, in contradistinction with, aimless, unbounded forces of destruction and rendered murder itself a religious rite in Hindustan.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se little communities were contaminated by distinctions of caste and by slavery, that they subjugated man to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stead of elevating man to the sovereignty of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transformed a self-developing social state into never changing natural destiny, and thus brought about a brutalizing worship of nature, exhibiting its degradation in the fact that man, the sovereign of nature, fell down on his knees in adoration of Kautman, the monkey, and Sabbath, the cow.

England, it is true, is causing a social revolution in Hindustan, was actuated only by the vilest interests, and was stupid in her manner of enforcing them. But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can mankind fulfil its destiny without a fundamental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 state of Asia? If not,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crimes of England she was the unconscious tool of history in bringing about that revolution.

Then, whatever bitterness the spectacle of the crumbling of an ancient world may have for our personal feelings, we have the right, in point of history, to exclaim with Goethe:

"Seltz' diese Qual uns gebeth
Da sie unser Lust vermehret,
Eist nicht recht zu beklagen,
Denn der Herrschafft entgegen"

KARL MARX.

載有卡·馬克思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的

“紐約每日論壇報”原版的一部分

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靜靜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潰、各种难以形容的殘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現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們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們一下，他們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們不應該忘記：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們不應該忘記：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們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預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①虔誠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踐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沒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說来，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們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Sollte diese Qual uns quälen
Da sie unsre Lust vermehrt,*

① 哈努曼是印度傳說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財富和土地之神。——譯者注

*Hat nicht Myriaden Seelen
Timur's Herrschaft aufgezehrt?*»^①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6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6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804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① ——“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
難道不是有無數的生靈，
曾遭到帖木兒的蹂躪？”

（引自歌德“東西詩集”中“給祖萊卡”一詩）

卡·馬克思
英国的繁荣。——罢工。
——土耳其問題。——印度

1853年6月17日星期五于倫敦

根据官方材料，英国的出口值如下：

1853年4月为	7 578 910 英鎊
而1852年4月为	5 268 915 英鎊
1853年头4个月为	27 970 633 英鎊
而1852年头4个月为	21 844 663 英鎊

这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增长額为 2 309 995 英鎊，即增长 40% 以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增长額为 6 125 970 英鎊，即增长 28% 左右。如果今后繼續这样增长，那末到 1853 年底，大不列顛的出口总值将超过 1 亿英鎊。

“泰晤士报”在向自己的讀者报道这些惊人数字时，大大唱了一陣贊歌，最后一句是：“我們举国幸福，和諧！”但是，該报剛剛大声报告了这个可喜的发现，在英国全国，特别是在它的北方工业区，几乎到处都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成了“泰晤士报”歌頌和諧的贊歌的一个很怪的回声。这些罢工，是剩余劳动力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普遍上漲的同时相对减少的必然結果。利物浦罢工的有 5 000 人，斯托克波尔特有 35 000 人，等等。罢工热甚至把警察也

傳染上了，在曼徹斯特就有 250 名巡警提出了辭呈。這種情況使資產階級報紙（例如“地球報”¹²³）完全失去了自制，拋掉了平時那種慈善家的腔調。它開始誣蔑、咒罵、威脅，甚至公開吁請市政當局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法律借口就進行干涉（在利物浦實際上已經進行干涉了）。這些市政當局即使本身不是工商業主，像郎卡郡和約克郡兩地通常的情況那樣，它們至少也都同實業界有密切聯繫，並且奉命唯謹。它們讓工廠主規避執行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規避禁止以實物作勞動報酬的法律¹²⁴，讓工廠主不受懲罰地違反其他一切為制止工廠主的“露骨的”貪欲而專門頒布的法律；而對結社法¹²⁵ 它們總是作最偏頗和最不利於工人的解釋。“富有騎士精神的”、以積極反對政府干涉而聞名的、宣揚私人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自由處理的資產階級學說——laissez faire [聽之任之] 的自由貿易論者，只要工人的私人利益同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發生衝突，總是第一個起來要求政府干涉。一遇到這種衝突，他們就以公開羨慕的目光注視着大陸國家，這些國家里的專制政府儘管不讓資產階級執政，但是至少也不容許工人進行反抗。至於革命政黨準備怎樣利用老板和工人之間的這場大衝突的問題，你們可以從憲章運動的領袖厄內斯特·瓊斯寫給我的下面這封信里清楚地了解到，這封信是他動身去郎卡郡的前夕發出的，那里正準備發起一個運動：

“親愛的馬克思！

……明天我去黑石山脊，那里將舉行一個約克郡和郎卡郡兩地憲章派的露天群眾大會，我很高興地告訴您：大會的準備工作在北方正以極大的規模進行。自從在這個具有憲章運動傳統的地方舉行真正人民的大會¹²⁶ 以來，已經 7 年過去了。這次大會的目的如下。1848 年的叛變和分裂，當時的組織

由于它的500个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和流放而瓦解，宪章派的队伍由于流亡国外而渐渐减少，政治热情因受工商业的复苏的影响而低落，——所有这一切使得国内的宪章运动蜕化成孤立的行动，而宪章运动的组织恰恰在社会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却显得虚弱无力。但是，在社会知识领域内进行的初步尝试所造成的工人运动，在纯政治运动的废墟上成长了起来。这一工人运动起先采取的形式是分散地创办合作社，当发现这样做不成功时，就采取了积极的斗争形式：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限制机器开动的時間，反对经常迟发工资，争取对結社法作新的解释。工人阶级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了这些本身就有好处的措施上。争取立法保障来实行这些措施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使不列颠工人产生了比较革命的情绪。这就为把群众团结在真正社会改革的旗帜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大概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不管从满足目前的要求来看上述的措施怎样好，但是对未来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并且绝不体现社会权利的任何根本原则。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同工商业的复苏相比劳动力相对不足，人民的不满和人民力量的一定程度的增长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面所说的对运动有利的条件，使运动有顺利发展的可能。现在到处发生罢工，并且很多罢工进行得都很顺利。但遗憾的是：本来可以用在根本改进上的力量却耗費在暂时性的治标办法上。因此我才同许多朋友一起来一次改造，利用这种非常有利的时机把零散的宪章运动队伍在社会革命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为此我已经改组了无所作为和不堪战斗的地方小组，并训练他们在全英国范围内进行普遍的和大规模的示威，——我希望这个示威能够成功。新的运动将从黑石山脊的露天群众大会开始，接着就在所有工业地区举行群众大会；同时，我们的代表也正在农业地区进行活动，努力把农业劳动者同其余的劳动大军联合起来——对于这个任务，我们的运动在此以前一直是忽视的。我们第一步是要求接受这些人民群众大会所提出的宪章，并且打算迫使我们的卖身投靠的议会接受关于实行宪章的建议，公开明确地承认宪章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宪章的问题还没有在议院提出。如果工人阶级支持这个运动（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映使我有根据指望这一点），后果就很可观。因为，如果议会拒绝，假自由派和托利党慈善家的空话将被揭穿，他们指望人民容易上当的最后一着也将失败。如果议会竟同意接受和讨论这些建议，奔腾的激流就将冲向广阔的地区，用临时的让步将阻止不住。您对英国政治生活很熟悉，应

該知道：我們的貴族和金融寡頭沒有什麼雄心和力量來對人民運動進行任何嚴重的抵抗。統治集團只是各種蛻化黨派的亂七八糟的混合物，它們匆匆集結在一起，就像需要拯救一隻漏了水的航船時集結在抽水機旁爭吵不休的船員一樣。他們完全是沒有力量的，即使他們能從底艙中向民主海洋里潑出幾滴水來，但絲毫也不能平息汹涌奔騰的浪潮。我的朋友，這就是我在目前看到的有利機會，這就是我希望這些機會將得到利用所凭借的力量，這就是這些力量要追求的首要的最近目的。關於第一次示威的結果，我將專門寫信告訴您。

忠於您的

厄內斯特·瓊斯”

沒有任何根據指望議會會考慮憲章派的請願書，這一點恐怕用不着詳細證明。無論過去在這方面有過怎樣的幻想，現在面對以下這樣的事實，這些幻想應該破滅了：議會剛剛以 60 票的多數否決了由貝克萊提出並得到菲利莫爾先生、科布頓先生、布萊特先生、羅伯特·皮爾爵士等支持的關於無記名投票的建議。做這樣的事的，也就是那個用全力反對在本身的選舉中出現的恫嚇和賄賂現象的議會，它寧願在整整好幾月中丟開正經事不問，整天調查選舉舞弊情況來削減自己的人數。到目前為止，聖潔的瓊妮^①反對賄賂、恫嚇和貪污的唯一手段一直是剝奪選舉權，最常用的辦法是縮小選區。毫無疑問，如果他能使這些選區縮到像他自己那樣小，那末英國的政治寡頭就可以不用操心費事，不用支出賄金而大得其選票了。貝克萊先生的決議案所以被托利黨和輝格黨聯合投票否決，是因為他們的共同利益——保持他們在地方上對不獨立的租佃者、小店主和被保護的土地所有者的影響——受到了嚴

^① 對約翰·羅素的戲稱。——編者注

重威胁。“交租金者应当把选票同租金一块交来”——这就是光荣的英国宪法的一条古老的原则。

上星期六，“新聞报”¹²⁷（以迪斯累里先生为后台的一家新周报）向英国公众揭发了一件很有意思的材料：

“春初，布隆諾夫男爵把俄皇准备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要求的内容通知了克拉倫登勋爵，同时声明他通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克拉倫登勋爵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也丝毫没有譴責所提出的方針。俄国外交官向俄皇报告：他对金角所怀的意图，在英国方面并无反感。”

为了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这个严重的罪名，昨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外交部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官方文章，但是依我看，这篇文章与其說是駁掉了这个罪名，不如說是加重了这个罪名。“泰晤士报”肯定：春初，在緬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布隆諾夫男爵曾向約翰·罗素勋爵抱怨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希腊正教教会根据条约而得的特权，約翰·罗素勋爵由于认为这个问题仅仅牵涉到圣地，便同意了沙皇的计划。但是“泰晤士报”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緬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和克拉倫登勋爵接替約翰·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布隆諾夫男爵曾向克拉倫登勋爵提出一个新的通知，“其目的是說明他所得到的指示以及緬施科夫公爵代表俄皇向苏丹递交的国书中所用的某些說法的含意”。“泰晤士报”同时还承认：“克拉倫登勋爵同意了布隆諾夫男爵告訴他的要求”。显然这第二次通知的内容，要比对約翰·罗素勋爵的通知多一些东西。因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声明决沒有使问题就此了結。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隆諾夫男爵是个外交騙子，或者克拉倫登勋爵和阿伯丁勋爵是卖国贼，真相将来自明，我們就走着瞧吧。

倫敦的一家報紙不久前发表了下面一項有关东方問題的文件，讀者諸君对此或許感到兴趣。这就是現在住在倫敦的阿尔明尼亚大公发表的、在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居民中散发的一項文告：

“受命于天的阿尔明尼亚最高大公獅子座告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人：

亲爱的兄弟們和忠实的同胞們！我們謹表示意志和殷切的希望，願你們保卫你們的国家和苏丹，反对北方暴君，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要記住，兄弟們，土耳其沒有鞭子，土耳其人不割你們的鼻子，不鞭打你們的妻子，無論是私下还是当众。苏丹治下，人人安乐，北方暴君治下，只有野兽般的殘暴。因此，你們要听从神的指示，勇敢地保卫你們国家的自由和你們現在的国君而战。你們要拆除房屋来修筑街垒；如果没有武器，那就拆掉家具当做武器来自卫吧。願主把你們引向光荣的道路。我唯一的幸福，就是在你們的队伍中为反对你們国家和你們的信仰的压迫者而战斗。神保佑使苏丹贊同我的号召，因为我們的宗教在他的治下保持着純洁，而在北方暴君的統治下我們的宗教将被糟踐。最后要記住，兄弟們，在写这个告示的人的血管中流着 20 个国王的血，流着我們的信仰的保卫者魯西揚氏族众英雄的血。因此我們号召你們：保卫我們的宗教的純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本月 13 日斯坦利勋爵在下院发表了一个声明，說在印度法案二讀时(本月 23 日)，他将提出下列的決議案：

“議院认为，必需握有进一步的情报，議會才能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来建立对印度的长期管理制度。而在此議會會議結束阶段，不宜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只能打乱現狀，而仍然不能认为是彻底解决問題。”

但是到 1854 年 4 月，东印度公司特許状的有效期就要滿了，因此，总得采取一些措施。政府原是想頒布一項长期性的法律，即把特許状再延长 20 年。曼彻斯特学派是想拖延下去，任何法律措施都不让采取，而使特許状的有效期最多延长 1 年。政府声明：为了印度的“福利”，必須頒布一項长期性的法律。曼彻斯特学派表示反对，說沒有情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福利”和沒有情

报这两者都同样是虛假的借口。当权的寡头想在改革后的議院召开會議以前就能够使自己今后 20 年的“福利”从印度得到保证。曼彻斯特学派根本不願意在改革現在的議會以前进行任何立法，因为他們在这个議會里沒有机会貫徹自己的主張。于是，联合內閣就由查理·伍德爵士来出面，違反自己先前的种种声明（不过却同它通常迴避困难的手法完全一致），提出了一种类似法律草案的东西。不过，它不敢建議更換特許狀，不敢給特許狀規定任何一个明确的期限，而是提出了一个“安排”，让議會去变动一下，如果議會願意干这件事的話。政府的建議如被通过，那末，这就不是更換，而只不过是暂时延长东印度公司存在的時間罢了。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草案只是在表面上把管理印度的方式改变一下；它提出的唯一的重大改变就是增加几个新的省督，虽然多年来的經驗证明：在东印度，干脆由特派專員 [commissioners] 管理的地区，比起那些对人民开恩，設立了省督及其参事会，豪华万状的地方，情况要好得多。輝格党人发明的改善破产国家的处境的办法（在这些国家里增設一些由破落貴族担任的优缺），使人想起了前届罗素政府时期的一件事，那时，輝格党突然对东方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精神貧困状态感到吃惊，于是决定派几个新的主教到印度去帮助他們，而托利党执政时一直认为派一个去就够了。这个决定剛通过，当时的督察委员会主席輝格党人約翰·霍布豪斯爵士馬上就发现，他有一个亲戚，由他担任主教簡直是太合适了。于是他的这位亲戚立刻就被任命充当了一个新的主教。一位英国作家指出：“在鞋子恰好合适的情况下，真是很难說，是鞋子为脚而設呢，还是脚为鞋子而設。”同样，对查理·伍德爵士的发明也很难說，是新的省督为印度各省而設呢，还是印度各省为了新的省督

而設。

不管怎样，联合內閣把提出的法律草案交給議会让議会有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修改以后，就以为已經滿足一切要求了。不幸的是，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提出了一个決議案，这个決議案一宣布就得到“激进的”反对派大声贊同。但是，斯坦利勋爵的決議案却有內在的矛盾。一方面，斯坦利拒絕政府的草案的理由是：下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情报才能頒布长期性的法律，另一方面，他的理由又是：这个草案所建議的不是长期性的法律，而只是改变一下現狀，不想彻底解决問題。保守派当然是反对法案的，因为法案总归是規定要作一些改变。激进派反对它，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什么。斯坦利勋爵在目前的联合时期找到了一个公式，想在这个問題上把反对政府立場的两种正好相反的观点合在一起。联合內閣对这种策略装出一副义憤填膺的样子，而它的机关报——“紀事报”就大叫：

“所提出的关于延期討論的決議案，是党派性的意見，是极端分裂性的和可耻的…… 这个決議案之所以提出，只是因为政府的某些拥护者曾經答应过，在这个局部性問題上，他們要同那些經常携手的人分手。”

看来大臣們确实非常惊慌了。今天的“紀事报”又回到这个問題上：

“关于斯坦利勋爵的決議案問題的投票大概将决定印度法案的命运；因此，迫切需要那些意識到立即頒布法律的重要性的人竭尽全力来加强政府的立場。”

另一方面，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政府关于印度的法案的命运开始比較明朗起来了…… 政府所面临的危險在于：斯坦利勋爵的反对意見同社会輿論的結論完全吻合。这个決議案

的每一個字都是堅決反對內閣的。”

在後面的一篇文章^①中，我將說明大不列顛各黨派在印度問題上的立場是什麼，不幸的印度人民從英國的貴族、金融寡頭和工業巨頭關於改善他們處境問題的爭吵中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6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7 月 1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809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① 見本卷第 167—176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內閣对
俄国的纵容。——預算。——報紙
附刊稅。——議会的舞弊¹²⁸

1853年6月21日星期二于倫敦

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結果締結了阿德里安堡条約，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納帕南至波提（切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并且占領了多瑙河河口諸島屿，而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脫离了土耳其，被交給俄国統轄，当时大不列顛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勳爵。1853年，我們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个国家的“混合內閣”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簡單的事实，就足以說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見：“泰晤士报”在星期四提出的那种强詞夺理的、狡猾的和伪造的辯护理由，恐怕平息不了由于“新聞报”对阿伯丁、克拉倫登和布隆諾夫男爵之間的秘密協議的揭露所引起的風波^①。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倫登勳爵实际上同意了俄国打

① 見本卷第155頁。——編者注

算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补充說，俄国人在倫敦所通知的要求同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尽管布隆諾夫男爵介紹給英国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緬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示中“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議）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語，并且为布隆諾夫男爵作证，說他是极其“誠实和正直的”。“先驅晨报”昨天提出一个問題：“是不是俄国向布隆諾夫男爵本人发了一个虛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英国大臣呢？”但是与此同时，人們又知道了卖身为奴的报纸千方百計向公众隐瞒起来的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釋。这些揭发材料证明，全部責任都在“混合內閣”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控告阿伯丁勋爵和克拉倫登勋爵犯了国事罪，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議會都会这样做，只有本届議會除外，它只不过是用心行賄和恫吓手段硬拉起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已經确定，克拉倫登勋爵曾收到通知，通知告訴他关于圣墓的問題不是俄国公爵^①所关心的唯一問題。这个通知还談到一个主要問題，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正教居民和俄皇根据条約对他們所采取的态度問題。所有这几点都經過了討論，俄国准备采取的方針也被詳加說明，这就是5月6日的条約草案¹²⁹詳尽闡述的那个方針。克拉倫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針並沒有表示絲毫的不贊同，沒有表示絲毫的反对。正当倫敦这样办事的时候，波拿巴派出了舰队前往薩拉密斯，社会輿論对議會施加了压力，在两院中都向大臣們提出了质詢，罗素郑重許諾要保护土

① 緬施科夫。——編者注

土耳其的不可侵犯和獨立，而緬施科夫公爵則在君士坦丁堡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倫登兩位勳爵這時就不能不向其他大臣說明事件的全部經過了，於是聯合內閣瀕於瓦解，因為帕麥斯頓勳爵（他的過去使他不能不這樣做）開始堅持完全相反的政策。為了防止內閣瓦解，阿伯丁勳爵終於向帕麥斯頓的主張作了讓步，同意英法兩國艦隊在達達尼爾海峽共同行動。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阿伯丁勳爵為了履行自己對俄國所負的義務，用急電告訴聖彼得堡說，他將不把俄軍占領多瑙河各公國看做 *casus belli* [宣戰的理由]，而“泰晤士報”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促使輿論接受這一個對國際條約的新解釋。這裡不能不為這家報紙說句公道話：它為了把黑的說成白的，確實非常辛苦了一場。這家報紙過去一直斷言，俄國對土耳其的正教居民的**保護權**根本不會有任何政治後果，而現在却突然證明說，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有兩個宗主國，它們實際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嚴格地說來”，占領它們並不是對土耳其帝國的侵犯，因為，按照布加勒斯特條約和阿德里安堡條約的規定，沙皇對多瑙河各省的正教居民有**保護權**¹³⁰。1849年5月1日簽訂的巴爾塔利曼尼條約¹³¹有這樣一個十分清楚的規定：

“一、對這些省份的占領如屬應當，也只能由俄國和土耳其的武裝部隊來聯合執行；

二、進行占領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多瑙河各公國發生了嚴重的混亂。”

但是，這些公國根本沒有發生任何混亂，而且俄國也絕不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領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為了反對土耳其才去占領這些地方，於是“泰晤士報”就說，土耳其首先應當對俄國單獨占領這些公國的行為採取容忍態度，然後再同俄國進行談判。

如果土耳其沒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靜态度，认为占領就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那末，該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應該抱同样的态度。即使它們要抱同样的态度，“泰晤士报”建議，它們的行动也要有分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以土耳其盟国的資格来保护土耳其。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懦弱而滑头的行为加以痛斥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論中引证下面一段話。这篇社論簡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的种种矛盾、詭辯、借口、顾虑和 *lâchetés* [卑鄙行为] 之大成。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对各公国被占領一事提出抗議，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繼續进行談判。土耳其政府应当取得四大国大使的同意而在这个重要的問題上自己做出决定，特別是要确定，敌对行为已經超出界限多少，是否可以根據 1841 年公約¹³² 的規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軍艦开放。如果这个問題肯定了，并且舰队得到了开进海峡的命令，还要弄清楚一个問題：我們到那里去究竟是作为調解国还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根據 *casus foederis*^① (!) 而被允許进入海峡，那还不能由此作出結論說，它們一定要作为交战国的船只而不是作为調解国的船只进行活动，而这个問題是它們更为关心的問題，因为它們被派往那里去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們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論并沒有达到任何目的。沒有一家报纸跟在“泰晤士报”后面跑，也沒有一家报纸上它的圈套，甚至“紀事晨报”、“晨邮报”、“地球报”、“观察家报”这些政府报纸也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場上，响应拉芒什海峡对面的热烈反响，——在那里，

① 直譯是：同盟的时机，即同盟国应当履行义务的时候。——編者注

也只有一家正統主義報紙“國民議會報”¹³³好像還沒有把占領多瑙河各公國一事看做 *casus belli* [宣戰的理由]。

這樣一來，由於政府報刊以不同的腔調叫嚷起來，公眾就知道了聯合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帕麥斯頓已經說服了內閣把占領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一事看做宣戰行為，並且得到輝格黨人和“混合內閣”的假激進派閣員的支持。阿伯丁勳爵（他僅僅由於指望俄國不在達達尼爾海峽而只在多瑙河各公國採取行動才同意英法兩國艦隊採取共同行動）現在就陷入了非常狼狽的境地了。於是政府的存在又成了問題。這樣弄到最後，當帕麥斯頓向阿伯丁勳爵的頑固主張進行讓步，並且準備迫不得已同意俄國強占兩公國的行為的時候，突然從巴黎拍來急電，報告拿破侖打算承認這種行為就是 *casus belli*。混亂就達到極點了。

如果上面這種對事件的闡述是正確的（根據阿伯丁勳爵的過去一切，我們有一切理由這樣認為），那末幾個月來吸引着歐洲注意的俄土悲喜劇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來了。現在我們馬上明白了，為什麼阿伯丁勳爵不願把英國艦隊調離馬爾他島。我們開始懂得，為什麼羅斯上校會由於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堅決行動而遭到訓斥；我們也弄清楚了，為什麼緬施科夫公爵的態度那樣咄咄逼人，為什麼沙皇表現得那樣大胆強硬。沙皇了解到，英國的軍事示威只不過是一場鬧劇，所以，他如果能夠通過這次毫無阻礙地占領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行動，使他不僅可以以主人的資格退場，而且還可以用蘇丹臣民的錢糧進行年年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那他是非常樂意的。如果戰爭還是要爆發，那末我們認為，這僅僅是因為俄國太過分了，勢必丟面子才能下台。而且，俄國之所以這樣強硬，正如我們估計的那樣，僅僅是因為它一直指靠着英國

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談到联合內閣的話說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風的时候，联合內閣都要发生动摇。善良的阿伯丁胆小怕事，克拉倫登无能得可怜，这就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

最近从土耳其傳来的消息是：土耳其駐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坦丁堡通过澤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給列强的备忘录拒絕了俄国的最后通牒¹³⁴。据馬賽的报纸“信号报”¹³⁵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說，俄国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但是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輝的胜利，繳获大炮不下 23 門。

最近，格萊斯頓先生声明修改他所提出的关于广告稅的建議。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議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稅。現在他被輿論吓住了，又建議免征所有第一次附刊的稅，以后每出一份附刊則征稅半辨士。可以想見，“泰晤士报”是多么憤怒了，因为这么一变，就使它每年不是得到 4 万英鎊的好处，而只有 2 万英鎊的好处，同时，市場的大門还将为它的竞争者敞开。这家一贯拚命保护知識稅，其中包括广告稅的报纸，現在对任何附刊稅都反对。但是它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如果說，內閣在通过大部分預算后感到沒有必要再来討好“泰晤士报”的話，那末曼彻斯特派在預算中爭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內閣。这一点也正是內閣所担心的；預算辯論为什么占了整个議會會議的时间，恰好可以从这种担心中找到說明。格萊斯頓先生在把报纸广告稅从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的同时，又建議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 6 辨士的稅，这件事最能

說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今晚下院将要审查两起贿赂案件。在这次开会期間，为选举問題而召集的委员会有 47 个，其中有 4 个仍在继续开会，43 个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审查工作，并作出了大部分被剥夺当选证书的議員都犯了贿赂罪的結論。为了說明社会輿論現在对本届議會——一个脫胎于舞弊而孕育出联合內閣的东西——抱着怎样尊敬的态度，可以从“先驅晨报”上摘引以下一段話：

“如果說，目的和意图都不明确而且常常动摇是低能的迹象，那末应当承认，这届議會，这个 6 个月的嬰兒，已經成为一个老糊塗了，它現在就已經力竭才尽，并且正在瓦解为一些没有任何活力和目的的小集团。”

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1 日

載于 1853 年 7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14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东印度公司, 它的历史与結果

1853年6月24日星期五于倫敦

斯坦利勳爵关于暫緩为印度立法的提案, 被延期到今天晚上开始討論。印度問題成为英国政府的問題, 从1783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

东印度公司真正的創始不能說早于1702年, 因为在这一年, 爭夺东印度貿易壟断权的各个公司才合并成一个独此一家的公司。在1702年以前, 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生存曾經一再陷于危殆。在克倫威尔摄政时期, 它的活动曾中断多年; 在威廉三世統治时期, 它又因議會干涉而几乎全部解散。但是, 正是在这位荷兰亲王的統治时期, ——那时, 輝格党人成了不列顛帝国的包稅者, 英格兰銀行創辦了, 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确立了, 欧洲的均势最后稳定了, ——仅仅是在这个时候, 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由議會承认。这个表面上自由的时代, 实际上是壟断企业的时代。这些壟断企业并不是根据国王的特許令建立起来, 像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代那样, 而是由議會核准, 得到法律的承认, 并且被宣布为国家的企业。英国历史上这个时代, 实质上很像法国的路易-菲力浦时代, 那时, 旧的土地貴族遭到失敗, 而資產階級只是在金融寡头或 «haute finance» [“大金融家”] 的旗帜下才占据了土地貴族的位置。在下

院排斥平民，不讓他們有代表進入下院的同時，東印度公司也排斥平民，不讓他們和印度通商。這種情況以及其他一些事情，都具體說明了，資產階級初次獲得對封建貴族的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也就是對人民實行最露骨的反動的時候。這個現象，曾迫使不只一個科貝特那樣的平民作家不向未來而向已往去尋找人民的自由。

君主立憲制度與享有壟斷權的金融巨頭結成了聯盟，東印度公司與 1688 年的“光榮”革命結成了聯盟，造成這種聯盟的力量，也正是在各個時期和各個地方促使自由派資本與自由派王朝聯繫起來並結成一體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賄賂的力量——君主立憲制度的主要動力，威廉三世的守護天使，路易-菲力浦的要命鬼。早在 1693 年，根據議會的調查，東印度公司在給權貴“送禮”項下的支出每年就達到了 9 萬英鎊，而在革命前每年還很少超過 1 200 英鎊。里子公爵曾被控受賄 5 000 英鎊，德高望重的國王本人也被揭發受賄 1 萬英鎊。除了這些直接的行賄外，東印度公司為了排擠同它競爭的公司，還給政府大批利率極低的貸款，或者收買這些公司的董事。

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是靠着向政府行賄而獲得權勢的，它也不能不像英格蘭銀行那樣繼續用行賄來保持這種權勢。每當它的壟斷權期滿時，它只有向政府貢獻新的貸款，奉送新的禮物，才能更換特許狀。

七年戰爭¹³⁶使東印度公司由一個商業強權變成了一個軍事的和擁有領土的強權。正是那個時候，才奠定了現時的這個東方不列顛帝國的基礎。那時，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會漲到 263 英鎊，紅利高達 12.5%。但這時就出現了東印度公司的新的敵人，不過這一次已不再是同它競爭的公司，而是同它競爭的大臣和同它競爭

的国家了。人们一再指出, 公司的领土是在不列颠海軍和不列颠陆軍的协助下占领的, 无论哪一个不列颠臣民都不能离开王室而拥有对某些领土的最高权力。在那时的大臣和国家看来, 东印度公司获得“惊人的宝藏”是新近的侵略的结果, 所以就要分享一份。只是由于 1767 年达成协议, 公司答应每年献给国库 40 万英镑, 它才得了救而存在下来。

但是, 东印度公司遭到了财政困难, 它不但无法履行这个协议, 向英吉利国家纳贡, 反而要求议会给予金钱上的援助。结果公司的特许状作了重大修改。公司在新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起色; 与此同时, 英吉利国家又失掉了北美殖民地,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英国必须在别处重新取得一个广大殖民帝国。因此, 大名鼎鼎的福克斯才认为 1783 年是适当的时机, 提出了他那轰动一时的印度法案, 建议取消董事会和股东会, 把管辖印度的全权交给议会任命的 7 位特派专员。由于低能的国王^①在上院的个人势力, 福克斯先生的这个法案遭到了否决, 福克斯和诺思勋爵的联合政府因此被打倒, 大名鼎鼎的皮特因此被任命为政府的首脑。皮特于 1784 年在上下两院通过了自己的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 6 位枢密院委员组成的督察委员会, 它的职责是:

“检查、监督一切涉及东印度公司领土和属地的民政、军政或赋税的法令、业务和事务。”

历史学家穆勒对这个法案的评价是:

“实行这个法律所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为了不致被人责难想要实现福克斯先生法案中那种被称为可恶企图的东西, 必须制造一种假象, 似乎大部分

^① 乔治三世。——编者注

权力仍归董事們掌握。但为了內閣的利益，又必須在**实际上**剝夺董事們的一切权力。皮特先生的法案同他的政敌的法案的表面上区别，主要就是皮特的法案在形式上好像是原封不动保留了董事們的权力，而福克斯的法案則剝夺了他們的一切权力。按照福克斯先生的法律，大臣們的权力必須得到公开的承认；而皮特先生的法律則通过欺騙的手段秘密地实现这些权力。福克斯先生的法案要把从公司手中夺取的权力移交給議會任命的特派專員；而皮特先生的法案則把这种权力移交給国王任命的特派專員。”¹³⁷

所以，1783年和1784年这两个年头，是印度問題第一次而且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成为政府問題的时期。皮特先生的法案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許状更換了，印度問題被擱置到了20年以后。但是，181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1833年剛剛通过的改革法案¹³⁸，把其他一切政治問題都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就是印度問題在1784年以前和以后都未能成为重大政治問題的主要原因。在1784年以前，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要維護自己的生存和势力；在1784年以后，英国寡头政治把它能够攫取的公司的权利都攫为己有，同时却不承担任何責任；而到1813年和1833年更換公司特許状的时期，英国人民所注意的主要是其他更迫切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這個問題。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想为代理人建立海外商館，为貨物建立儲运站。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商館和堆棧，公司建造了若干堡垒。尽管从1689年起东印度公司就想在印度占据領地，使領地上的收入成为公司的一种財源，但是一直到1744年，它只在孟买、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一带弄到几块不大的地区。随后就爆发了卡尔納梯克的战争，經過一系列战斗，公司实际上就成了印度的这一地区的主宰。由于孟加拉战争和克萊夫的胜利，公司得到的好处就更大了，它已实

实际上占有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随后,在十八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公司同提普·萨希布进行战争,结果是大大加强了侵略者的势力,并且广泛推行了军费补助金制度¹³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终于第一次争到了一条合适的边界,即印度边境的沙漠地带。只是到这个时候,东方不列颠帝国才占有了作为印度历代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那些亚洲地区。但对帝国最为险要的一个地点,每逢新的侵略者要赶走旧的侵略者时总是从那里入侵印度的那个地点,即屏障着内地的西部边陲,还没有落到不列颠人的手里。到1838—1849年时期,在同锡克教徒的战争和同阿富汗人的战争中,英国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¹⁴⁰,这样,从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上看,就在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建立了不列颠的统治。占有了旁遮普和信德,就可以击退来自中亚细亚的任何侵犯,对抗正向波斯边境扩张的俄国了。在这10年之中,英属印度共并吞了拥有8 572 630人口的167 000平方哩的领土。至于印度内部,那末所有的土邦现在都已被英属领地所包围,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隶属于不列颠的宗主权,除了古扎拉特和信德以外,都同沿海地区割断了。至于印度的对外关系,从此以后已根本谈不到了。所以,只是从1849年起,才开始出现一个统一的庞大的英印帝国。

由此可见,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两百年之久,直到最后才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时期内英国的所有党派对这件事抱着默然纵容的态度,其中还有一些人决心要在统一的英属印度帝国 *arrondissement* [边界完整] 大功告成之后用假仁假义地号叫和平的喊声盖过所有的人。不言而喻,他们必须先把印度拿到手里,然后才使印度成为他

們那種令人討厭的慈善事業的對象。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麼印度問題在今年，1853年，比以前歷次更換公司特許狀的時候都不同的原因了。

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大不列顛和印度之間商業往來的各個階段，我們就能更好地了解在給印度立法方面發生的危機的特點。

東印度公司起初在伊麗莎白女王時期得到特許，每年可以運出總值3萬英鎊的白銀、黃金和外國錢幣，同印度進行有利的通商。這打破了很久以來的成見，所以托馬斯·曼在他的“英印貿易論”¹⁴¹一書中，就不得不在闡述“重商主義制度”的原則，承認貴金屬是任何國家唯一的真正的財富的同時又證明，只要國際收支差額對輸出貴金屬的國家有利，也可以安心地容許輸出貴金屬。因此他才斷言，從東印度輸入的貨物，大部分都再輸出到其他国家，從這些國家得到的金銀大大超過在印度購買這些貨物所需的金銀。根據這樣的精確精神，約瑟亞·柴爾德爵士就寫了“論東印度貿易是最有利於國家的對外貿易”一書¹⁴²。逐漸地，東印度公司的擁護者就愈來愈大膽了。在英國首先鼓吹自由貿易原則的人居然是壟斷印度貿易的人，這可以說是奇怪的印度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

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要求議會干預東印度公司的事務的呼聲又起，不過發出這種呼聲的已不是商人階級，而是廠主階級。正是在這個時候人們大聲疾呼，由東印度輸入棉織品和絲織品會使不幸的不列顛廠主們傾家蕩產。約翰·波累克斯芬在他的著作“英印工業生產不相容”（1697年倫敦版）¹⁴³中表示了這個意見，這本專著的書名過了150年以後果然得到了可驚的應驗，不過，這種應驗却同原來的涵義正好相反。那時，議

会就进行了干涉。威廉三世在位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二年颁布的法令中，第十节就规定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运来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谁要是收藏或买卖这些物品，就课以 200 英镑罚金。后来，在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时期，在如此“开明的”不列颠厂主们继续要求之下，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这样，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印度的工业品凡是运到英国来的，一般来说仅仅是为了再运到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对这些工业品始终是关着大门的。

除了贪婪的英国厂主们用纠缠不已的请求使议会对东印度的事务进行干涉以外，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地的商人每逢解决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候也都要用出一切力量，以求打破公司的贸易垄断，参与这种被看做是一座真正金窖的贸易。在他们强求之下，1773 年的法令（这个法令把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延至 1814 年 3 月 1 日）就有了一条规定，允许不列颠臣民私人从英国办货去印度，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办货去英国，货物种类几乎没有限制。但是这个让步附上了种种条件，使私商办货去印度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到了 1813 年，公司对于广大商业界的压力已无力再抵抗下去，结果，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同印度的贸易却在一定条件下向私人竞争开放。到 1833 年更换特许状的时候，这最后的限制也被取消，公司什么生意都不许做了，它的商业性没有了，而且还被剥夺了禁止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居留的特权。

同时，同东印度的贸易本身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英国各阶级对这种贸易的利害关系。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

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1813年取消贸易障碍以后，英印之间的贸易额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贸易的整个性质也改变了。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一个出口国；然而这时它却成了一个进口国了。而且这种发展又是这样快，以致到1823年，原来的一个卢比换2先令6辨士的汇率就落到了一个卢比只换2先令。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厂，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1780年，英国货包括成品在内，总值只有386 152英镑，同一年输出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为15 041英镑，另外，1780年英国的全部输出总值相当于12 648 616英镑，这样，对印度的贸易额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 $\frac{1}{32}$ 。到1850年，由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印度的输出总值增至8 024 000英镑，其中仅棉织品一项的输出即达522万英镑，占大不列颠出口总值的 $\frac{1}{8}$ 强，占棉织品对外输出总值的 $\frac{1}{4}$ 强。现在，大不列颠在棉纺织业中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 $\frac{1}{8}$ ，国民收入的 $\frac{1}{12}$ 来自棉纺织业。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英国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东印度大陆实际上就成了英国最好的销售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商品充斥于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以前是

一致的。但是, 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 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 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 那是不行的。英国厂主们发现, 他们的生意不是增加, 而是正在衰退。到 1846 年为止的 4 年中, 印度由大不列颠进口产品的总值是 26 100 万卢比; 而到 1850 年为止的 4 年中, 只有 25 300 万卢比。另一方面, 印度出口的总值也由前一时期的 27 400 万卢比减至后一时期的 25 400 万卢比。厂主们发现, 印度对他们的商品的购买力已降到最低水平; 他们看到, 在英属西印度群岛, 每人每年对他们商品的消费量还是 14 先令左右; 在智利是 9 先令 3 辨士; 在巴西是 6 先令 5 辨士; 在古巴是 6 先令 2 辨士; 在秘鲁是 5 先令 7 辨士; 在中美洲是 10 辨士, 而在印度却只有 9 辨士左右。接着就是美国棉花歉收, 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在 1850 年损失了 1 100 万英镑。他们恼恨自己依赖美国而不从东印度弄到足够数量的原棉。此外, 他们还看到, 他们对印度投资的一切企图都遭到印度当局的阻挠和暗中破坏。于是, 印度就成了产业资本对金融寡头和寡头政治作斗争的场所了。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权势不断加强, 现在正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 铲除在印度的全部旧的管理机构, 彻底消灭东印度公司。

最后, 让我们再从第四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印度问题。从 1784 年起, 印度的财政状况愈来愈恶化, 目前国债已达 5 000 万英镑, 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少, 而支出则相应地不断增加; 鸦片税这一笔不可靠的收入已很难弥补赤字, 因为中国人已经开始自种罂粟, 鸦片税现在已面临完全枯竭的威胁。此外, 还要为毫无意义的缅甸战争¹⁴⁴ 而增加支出。

狄金遜先生說：“情况就是这样：失掉印度帝国会使英国破产，但要維持它又会使我国的財政緊張，以致引起破产。”¹⁴⁵

这样，我便說明了，为什么 1783 年以来，印度問題第一次成为英国的問題和政府的问题。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81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印度問題。——爱尔兰的租佃权¹⁴⁶

1853年6月28日于倫敦

就斯坦利勳爵的关于印度的建議而进行的辯論是23日开始的，24日繼續进行，后来又移到本月27日，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束。当这些辯論最后結束以后，我打算就印度問題归納一下自己的看法。

因为联合內閣依靠爱尔兰派的支持，又因为下院的所有其他政党彼此力量是这样平衡，爱尔兰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天平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所以，現在对于爱尔兰租佃者准备作出某些让步了。上星期五下院通过的“租佃权法案”（在爱尔兰）有一条規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滿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地上和在土地之外所进行的改良；新的租佃者在估价时自己决定是否接收这些改良；至于改良土壤本身的补偿，則应在地主和租佃者所立的合同中讲明。

在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資本投入土地，因而改良了土壤以后（这种改良或者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或者是間接的，如农用建筑），地主就插了进来，要租佃者出更高的租金。如果租佃者让步，結果就是他用自己的錢，而給地主利息。如果他坚持不肯，那末他就会被人不客气地赶走，換上新的租佃者，新的

租佃者由于接收了前一个租佃者投入的費用，于是就能够付出更高的租金了；新的租佃者也改良土地，結果是照老样被另外的人代替，再不然就是处于更苛刻的条件之下。住在本国以外的地主阶级依靠这种簡便的方法，不仅把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劳动，而且还把他們的資本攫为己有；爱尔兰的每一代农民都为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而作了努力和牺牲，但他們反而直接为了这个緣故而在社会阶梯上下降一級。如果租佃者勤劳肯干，那末正是由于这种勤劳肯干而被加上一层苛捐；如果情况相反，租佃者无所作为，馬馬虎虎，則被責之为“賽尔特人傳統的恶习”。总之，他們沒有别的出路，他們只能淪于赤貧——由于自己勤劳或由于自己不好好干而穷下去。为了对爱尔兰的这种状况进行斗争，曾宣布了“租佃权”——不是租佃者对土地的权利，而只是对他自己出錢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改良設施的权利。現在讓我們看看“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社論中是怎样企图駁倒这个爱尔兰“租佃权”的¹⁴⁷。

“农場租佃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佃者在一定的年限內租用土地，另一种是經過預告在任何时候停止他的租佃。在第一种情况下十分清楚：租佃者有可能好好安排自己的資金，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或者几乎在任何条件下于租佃期滿以前得到利益。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很清楚：租佃者不会在沒有正常的收入保证的情况下冒险投入自己的資本。”

当然，在地主同那些可以随自己的意把資本投入商业、工业或农业的大資本家阶级打交道的地方，长期租佃也好，沒有一定的租佃期限也好，这种資本家租佃者都知道怎样用本錢取得“正常的”收入，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对爱尔兰的情况來說，这种假設是完全騙人的。爱尔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人数很少的土地壟断者阶级，另一方面是人数极多的貧苦租佃者阶级，他們沒有可能去

選擇运用自己那一点点資金的办法，只能把这点資金投入一个生产部門即投入农业。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做沒有租期保障的租佃者 [tenants at will]。作为这样的租佃者，如果他不把这点可怜的資本投进去，那末自然有得不到收入的危險。但是，如果他們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而把这些資本投进去，那末他們就要冒連这笔資本都失掉的危險。

“泰晤士报”繼續写道：“也許有人会反对我們說，租佃期滿时地块上什么都没有留下这种情况是很少見的，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租佃者的某种形式的财产，因此，租佃者应当得到补偿。这个意見有点道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关于这种要求的問題是可以由地主和租佃者很容易地加以解决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要求都可以在最初的合同中考慮到。我們主張，这些关系应当由社会条件来調节，在我們看来，任何議会法令都不能代替这种因素。”

的确，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我們就根本不需要議会来干涉爱尔兰的租佃关系了，正如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用不着軍隊、警察和劊子手来干涉一样。立法、司法和武装力量——这一切完全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乎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的关系。但是，这样說来，是不是“泰晤士报”变成了社会革命者呢？是不是它不要“議会法令”而要社会革命来改組“社会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呢？英国曾經摧毁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条件。它先是沒收了土地，然后通过“議会法令”扼杀了工业，最后用武装力量摧殘了爱尔兰人民的积极性和活力。这样一来，英国就建立了这样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級——貪婪的貴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規定他們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人民的力量还弱，不能对这种“社会条

件”进行革命，于是他们就訴諸議會，要求至少把这种条件減輕或調整一下。但是，“泰晤士报”宣称：“不能，如果你們不是生活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議會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如果爱尔兰人民要按照“泰晤士报”的說法馬上自己起来改变这种社会条件，那末同一个“泰晤士报”就会第一个求救于刺刀，責罵“带着傳統恶习的賽尔特人”，說他們不像盎格魯撒克逊人那样爱和平的进步、爱在法律範圍內进行改善，并且向他們发出一連串嗜血的威胁了。

“泰晤士报”写道：“如果地主有意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損失，那末他就不容易再找另外的租佃者；既然他的全部事业就是出租土地，他就会体会到，要把土地租出去是愈来愈难的。”

但是爱尔兰的情况恰恰相反。地主越是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損失，他就越容易去压迫另一个租佃者。租用土地的租佃者成为損害前一个被赶走的租佃者的工具，而后者又成为奴役新的租佃者的工具。至于說地主由于使租佃者受到損失而到一定时期后也使自己受到損失以致破产，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爱尔兰已經成为事实，不过，要說这个事实对破产的租佃者是一种安慰也是非常成問題的。

“泰晤士报”宣称：“地主和租佃者之間的关系，是两个商人之間的关系。”

这句话正是貫穿在“泰晤士报”整个社論中的 *petitio principii* [本身尙待证明的論据]。貧穷的爱尔兰租佃者全靠土地生活，而土地都屬於英国的貴族。从上述的論据出发，大可以宣布两个商人之間的关系是掏出手枪的强盜和掏出自己錢包的过路人之間的关系。

“泰晤士报”說道：“但是，实际上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間的关系不久就将被一种比立法更有力的因素所改造。土地所有权正在迅速易手，同

时,如果人口外流照現在这样的規模繼續下去,那末,爱尔兰土地的耕种权也将轉到其他人手里。”

在这里,“泰晤士报”最后說出了实話。不列顛的議会在旧的过时的制度行将使双方——富有的地主和貧穷的租佃者——都彻底破产的时候拒絕进行干涉。富有的地主是受到管理抵押地产的委员会的铁錘的打击,貧穷的租佃者是由于被迫外流而被赶走。这使我們想起了摩洛哥苏丹的老故事。这位摩洛哥苏丹不管发生什么爭論,他都用双方杀头来解决爭端,此外他就不知道其他更“有力的因素”了。

“泰晤士报”在結束自己的关于租佃权的文章时这样写道:“再沒有比类似共产主义的财产分配更能造成混乱了。唯一对土地享有某种权利的人就是地主。”

看来,“泰晤士报”像埃披門尼底斯一样,在本世紀睡了整整上半个世紀,根本沒有听见这一时期內就地主的无理要求而进行的热烈辯論;这种辯論不是社会改革派和共产党人进行的,而是經濟学家——不列顛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进行的。李嘉图这位大不列顛現代政治經濟学的創始人並沒有批駁地主的“权利”,因为他深信地主的无理要求所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利,而政治經濟学是根本不研究法权問題的。李嘉图攻击土地壟断的办法更簡單、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險。他证明,土地的私有制不同于农业工人及农場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它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地租——这些关系的經濟表現——如能由国家握有,則有很大利益;最后,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如果要把李嘉图学派从反对土地壟断的这些前提中所得出的所有結論——列举出来恐怕令人不

耐煩。从我的目的上來說，只要引证政治經濟学方面英国的三个最近的权威的話就够了。

倫敦的“經濟学家”（它的主編詹·威尔逊先生不仅是自由貿易派的神灵，而且也是輝格党人的神灵，不仅是輝格党人的代表人物，而且是历届輝格党内閣或联合内閣的国庫的忠实附庸）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一直肯定地认为：确切地說，不可能允許任何个人或某些个人有要求独自占有国家土地的权利。

紐曼先生在“政治經濟学讲演集”（1851年倫敦版，他公开承认这本书的主旨是駁斥社会主义）中肯定：

“任何个人，只要不亲自經營土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天然的**土地**权。他的权利只涉及使用土地，此外再没有什么权利。任何其他权利都是人为的法律（用“泰晤士报”的話來說就是議会法令）的产物…… 如果到那个时候，**土地不够用了**，那末私人占有者把土地据为已有的权利也就完結了。”¹⁴⁸

爱尔兰的情况正是这样，紐曼先生也毫不含糊地证明了爱尔兰租佃者的要求是有根据的，虽然他的讲演是讲給有地位的不列顛貴族听的。

最后让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靜力学”一书（1851年倫敦版）中引用几段話，这本书也是妄想完全駁倒共产主义的，并且被公认为对現代英国的自由貿易学說的最詳尽的闡述。

“誰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撓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允許占有土地，否則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沒有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 妄談現有的这种财产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沒有根据的。如果誰要这样想，那就不妨看一看历史。最初的文契是用劍写成，而不是用笔写成的。公证人不是律师而是兵士；捶楚就是付通用貨幣；印記用血而不是用蜡。以这些为根据而产生的要求是否

有效力呢？未必。如果沒有效力，那末此后的占有人，占着用这种方式取得的地产的人，还有什么权利可言呢？难道在先前沒有所謂权利的地方通过买卖和世代授受就能生出权利来嗎？…… 既然一次授受不能造成权利，那末多次授受就能做到嗎？…… 这种沒有效力的无理要求根据什么标准每年都取得这种效力呢？…… 整个人类对地球表面都有权利，这个权利仍然有效，不管各种各样的文契、习惯和法律如何。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能使大地成为私有财产的方法…… 我們的立法每天都在否认大地主所有制。怎样才能开凿水道，鋪設铁路或大道呢？我們并不拘泥，需要多少英亩土地就占多少英亩。我們并不等任何人同意后才这样做…… 現在需要进行的变革无非是变革土地的占有者…… 土地不应当是个别人的财产，而应当屬於大团体——社会。务农的人不应当向个人占有者租佃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用。不应当向約翰爵士或公爵的代理人交地租，而应当把地租交給社会的代理人或下級代理人。地产管理人应当从私人的职员变成社会的公僕，而租佃制度则应当成为单纯的使用土地…… 已經发展到极端程度的独占土地的无理要求，造成了土地占有者的专制。”¹⁴⁹

由此可見，甚至从現代英国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顛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8 日

載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16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英国的工人运动¹⁵⁰

1853年7月1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status quo [现状] 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有打破 status quo 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也好，好使它们能够继续中立，不致于非去阻擋俄国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说它的“神圣君王”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来掩盖西方各国当局的那种不可掩盖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很宽大，没有把它一口吞完，而是一块一块地吞吃。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致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谈判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①最近向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发出了一项敕令，凡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所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經很清楚。但是，“綏靖希腊”¹⁵¹ 是否就是进行干涉的重大借口呢？当年，德·維萊尔先生为了消除苏丹^① 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議“盟国首先簽訂一項条約，以保证奧斯曼帝国維持其現狀”，这个提議遭到了俄国駐巴黎的大使^② 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对土耳其政府是寬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願望是无限尊重的，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御前會議的分歧的权利；向奧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賴以产生的原則，更不用說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¹⁵²

現在，俄国要求允許它占領多瑙河各公国，并否认土耳其有权把这个步驟看做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1827 年，俄国曾要求允許它“以三强的名义占領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

1828 年 4 月 2 日，俄皇在宣战书中声明：

“我的同盟者会看到我时刻准备和他們同心协力地履行倫敦条約¹⁵³，会看到我非常想帮助他們完成我們的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我們关怀的那項工作；他們会看到我时刻准备純粹为了使 7 月 6 日的条約更快地得到履行而利用我的地位。”

1829 年 10 月 1 日俄国的宣言宣称：

“俄国一向就沒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擴張意图。”

同时，俄国駐巴黎大使却給涅謝尔罗迭伯爵写信說：

“当帝国当局討論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問題时，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驟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奧斯曼帝国的

① 馬茂德二世。——編者注

② 波茨措-迪-博尔哥。——編者注

首腦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

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度显露出一种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体力組織和精神組織的萌芽。如果說苏丹在現在，在他剛剛为实现新的改革和改良計劃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經能够向我們进行更坚决更有組織的反抗，那末，如果他有了時間来巩固这种基础，对我們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已成这样，那我們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还来得及在危險性增大以前轉入进攻。任何迟延都只能使我們的处境恶化，并給我們造成我們不會遇到的重大困难。”

現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驟，然后才談論它。1829年，利文公爵給涅謝尔罗迭伯爵写信說：

“我們將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問題的具体报道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險。如果我們要同我們的同盟国一道商討同土耳其政府簽訂的条約的条文，那也只有在他们自以为使我們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牲的时候才能滿足他們的这个要求。和約只能在我們自己的陣营內簽訂，只有在和約締結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約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經晚了，欧洲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經无法阻撓的局面。”

現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断然行动，以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則有致命危險的非战非和的局面。在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个时期內，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茨措-迪-博尔哥曾就这一点发表过这样的意見：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說来，人們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而且現在还以武力威逼它做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揚他对“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友誼”，和他对“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責任”推到苏丹身上，說苏丹違抗他的“公正要求”，說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

誼和他的感情”，拒絕他的“照会”，拒絕他的“保护权”。

1828年，查理十世曾問过波茨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俄軍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茨措-迪-博尔哥回答說，是因为俄皇不願意在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就进行 à l'outrance [决死] 战争，俄皇希望苏丹能抓住他表示寬大的机会，但是这种試驗未能成功。

在俄国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冲突以前不久，俄国曾試圖在政治流亡者問題上組成大陆列强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一試圖不成功时，它便极力复活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在1826—1828年期间，俄国曾經用普魯士的“野心勃勃的計劃”来威吓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魯士并助长其野心，以便使普魯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作用。俄国在它現在的周知照会¹⁵⁴中把波拿巴說成是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禍首。在1826—1828年时期，俄国曾經由波茨措-迪-博尔哥出面证明：

“籠罩欧洲的惊惶不安應該归罪于梅特涅公爵的阴謀”，并且，俄国极力“向威灵頓公爵本人示意，說他对維也納当局的关注可能損害他对所有其他各国当局的影响，并且会造成这样一个轉折：謀求法国同大不列顛協議的就不是俄国，而是早先为了靠攏維也納当局而拒絕同法国結盟的大不列顛自己了。”

現在，俄国如果让步，就会大大貶低自己。它在1828年第一次战役失敗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我們让它自己的外交官來說吧：

“为了取得順利进行談判所必需的那种优势，第二次战役是必要的。在进行这次談判以前，我們必須做到能够迅速而有力地迫使对方接受我們的条件……陛下在掌握較大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将只限于提出較小的要求。在我看来，达到这样的优势，应当成为我們的全部努力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优势現在已成为我們应当在全世界面前保存和保持的那种政治存在的条件。”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嗎？当然是怕的。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公布的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联合参加的战争，俄国就絲毫沒有取胜的希望，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或者，至少使英国同意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让我们再看一看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报告吧：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压倒其他一切問題的时候起，英国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險来使苏丹不同意作某些让步，特别是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的那个时候。这些情由使我們有根据設想，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担心大不列顛会公开同我們决裂。它只会建議土耳其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談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丹拒絕，或者我們坚持己見，英国也不致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驟。”

至于涅謝尔罗迭对那位曾在 1828 年当大臣和 1853 年当大臣的“善良的”阿伯丁的看法，可以从利文公爵如下一段报告中看出：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說，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生爭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內閣的立場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微妙。輿論总想向俄国大肆进攻。而不列顛政府又不能經常向輿論挑战。而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見密切关联着的問題上挑动輿論是很危險的。但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見作斗争的英国內閣的友好态度。”

如果說涅謝尔罗迭先生的 6 月 11 日的照会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那末，值得惊奇的并不是“无耻之极地混合了为事实駁倒的声明和被詞藻掩飾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敬畏和頌揚，而是为过去感到羞愧，并且輕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

足的野蛮无耻之极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謝尔罗迭的周知照会和6月16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謝尔罗迭伯爵也和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自然科学家，其中一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就问道：这种动物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另一位比较熟悉些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 *en passant* [顺便] 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咨文以119票对28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1849年6月5日宪法第四条，同意按照国王1853年6月13日再次提出的1852年10月4日的王位继承咨文，在整个丹麦王国执行国王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诏令。”

工人的罢工和联合正以飞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生和扩展着。我现在有以下各地工人罢工的报告书：斯托克波尔特各行各业工厂工人的罢工；曼彻斯特铁工、纺工、织工等等的罢工；基台尔明斯特织毯工人的罢工；布里斯托尔附近林格伍德各煤矿矿工的罢工；布莱克本和达尔温织工的罢工；波士顿红木细工工人的罢工；波尔顿及其近郊的漂白工、研光工、染色工和机械织布工的罢工；班斯里织工的罢工；斯比脱菲尔兹丝织业工人的罢工；诺定昂花边编织业工人的罢工；北明翰区及许多其他地方各行各业工人的罢工。每班邮递都会带来罢工的新闻。停工带有传染性。每一次大罢工，如斯托克波尔特和利物浦等地的罢工，都必然产生一连

串較小的罢工，因为大部分工人若不向王国其他各地的工人伙伴請求支援，就不能胜利地反抗厂主，而其他各地的工人为了援助自己的同行，就要求提高工資。此外，对于每一个地区來說，不同意恶劣条件，以免自己的工人伙伴在斗争中孤立，已成为有关荣誉的事情和共同的利益。所以，一个地方的罢工就会得到最远地区的罢工的响应。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資只不过是意味着要求处理厂主的旧有欠債問題而已。在斯托克波尔特大罢工时就是这样。

1848年1月，斯托克波尔特的工厂主把各种工人的工資普遍降低10%。工人们同意了这种降低，条件是一当情况好轉就恢复这10%。因此，1853年3月初工人们向厂主們提起他們所答应的10%的增加額。他們同企业主們沒有达成協議，于是宣布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3万多人。在大多数場合下，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明說：国家，特别是他們的厂主在繁荣时获得的收入，他們有权享有一份。

現在罢工的特点是：罢工先在下层不熟练（非工厂）工人，即現在直接受人口外流影响的工人中开始，換言之，是在各种普通工匠中开始，然后才把大不列顛各大工业中心的工厂无产阶级卷进来。以前的罢工正相反，总是先在工厂工人上层，即在机械工人、紡紗工人等等之中开始，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巨大的工人群的下层，最后才把工場工人卷进来。这个特点完全是由于人口外流的影响而产生的。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們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保证固定平均工資額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額——这一点且不去說它。我

反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間經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現代生产組織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們团結到一个統一的偉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統治階級的殘害，使他們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鈍的、被馬馬虎虎喂飽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階級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誰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須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們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們的經濟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到它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現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經過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間不是进行着經常的、与工资和利潤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顛和全欧洲的工人階級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羅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們不應該忘記，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會是中世紀市鎮的来源，而中世紀的市鎮又是現在当权的資產階級的搖籃。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已經指出目前工人的斗争对英国宪章运动可能具有的意义^①。我的預測业已被宪章派領袖厄內斯特·琼斯再度掀起的运动于头两个星期获得的成果所证实。大家知道，第一次露天群众大会原定在黑石山脊举行。在上月19日，郎卡郡和約克郡宪章派的地方小組的代表到了那里，并成立了代表會議。

^① 見本卷第151—154頁。——編者注

厄內斯特·琼斯提出的要求实行宪章的請願书，以及以这两个郡召开的會議的名义提出的請願书，都得到一致的贊同。會議决定委托那位同意轉达宪章派的一切請願书的南威克的議員阿普斯利·佩拉特先生呈递郎卡郡和約克郡的这份請願书。至于群众大会，当时就連最乐观的人都认为开不成了，因为天气太坏，雷声越来越大，傾盆大雨下个不停。起初只有少数一些人爬上山丘，但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群出現，从高处向周圍的溪谷望去，在透过密密层层雨帘所能看到的地方，可以看見一条条蜿蜒如带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沿着附近村落的大小道路伸展过来。到原定的开会时刻到来的时候，已經有 3 000 多人集合在这座离开村鎮很远的山丘上，而且在发言人長時間的講話过程中，尽管大雨如注，与会者仍然一直在原地坚持到最后。

爱德华·胡桑先生提出的決議案指出：“压在英国工人階級身上的社会重担是階級立法的产物，接受人民宪章是对付这种階級立法的唯一办法”。这个決議案得到宪章派执行委員會¹⁵⁵ 委員盖米季先生和厄內斯特·琼斯先生的支持。現在让我从这两位发言人的講話中摘录几段。

盖米季先生說：

“決議案认为人民身荷重担的原因在于階級立法。我想任何一个注意事件进程的人都不会反駁这种意見。所謂众議院，对于群众的一切申訴一直充耳不聞；而当人民大声申述自己的災难时，从那些冒充国民代表的人們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嘲笑和愚弄；即使人民的呼声偶尔例外地在議院得到反应，也势必被我們那些占多数的强盜般的階級立法者的起哄声所湮沒。（热烈鼓掌）下院不但拒絕滿足人民群众的公正要求，而且甚至还拒絕調查他們的社会状况。諸位一定还記得，前不久斯雷尼先生曾向議院提議成立一个常設委員會，調查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拟定救济办法，但是議院竟坚决迴避討論这一問題，

当上述提案提出时，仅有 26 名議員在場，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議院會議改期。（高喊声：“真可耻，真可耻！”）当这一提案再次提出时，斯雷尼先生不但沒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据发言人（盖米季先生）的記憶，656 名可尊敬的紳士中仅有 19 名在場的議員表示願意討論这一問題。如果我給你們談一談人民的实际状况，我想你們会同意我的意見：对这一問題进行調查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的了。經濟学家們确定，我国每年的产值估計为 82 000 万英鎊。假定联合王国的工人家庭有 500 万户，每户的平均收入每周为 15 先令，其实这个数目我觉得比实际收入高得多（呼喊声：“太高了！”），但我們还是把平均数定为 15 先令，这样我們就会看到工人們从他們的巨額年产值中仅取得很少的一部分，即 19 500 万英鎊（呼喊声：“真可耻！”），而其余的全部装入寄生的大地主、高利貸者和整个資本家階級的腰包……还用得着证明这些人就是掠夺者嗎？最可恶的盜賊并不是那些囚禁在我們監獄里的人；最大最狡猾的盜賊是那些借助于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掠夺人民的人，这种大掠夺就是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小掠夺的真正原因……”156

盖米季先生接着分析了下院的成分，他指出，如果注意到这个議院的議員們是屬於哪些階級和代表哪些階級，就决不会想到在他們和千百万劳动者中間还会有某种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諒解。发言人最后說，人民應該认清自己的社会权利。

厄內斯特·琼斯先生說道：

“今天我們的要求是使我們的宪章成为法律。（热烈鼓掌）我号召你們回到偉大运动的行列中来，因为我深信，时机已經成熟，胜利現在就靠你們，所以我热烈地希望你們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現在，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使你們暂时有了力量，但你們将来如何却要•看你們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你們利用这种力量只是为了滿足你們目前的需要，那末，現在的情况一旦改变，你們就会遭到失敗。但是，如果你們利用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巩固現在的地位，而且也为了保证将来，那你們就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固然是你們力量的源泉，但这种力量必然会随着商业复苏和居民外迁的中止而消失的，所以你們現在如果不为自己作打算的話，那就会陷入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糟糕的奴隶地位。（呼喊声：“对，对！”）而且，現在使你

們力量增強的那些因素，很快就會變成使你們力量削弱的原因。使勞動力數量減少的那種人口外流現象很快就開始在更大的程度上減少對勞動的需求量…… 停滯局面會到來的，請問，你們應付這個局面的準備怎麼樣？你們參加了工人爭取縮短勞動時間和提高工資的光榮運動，並且實際上在這方面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請注意：這些成果你們並不是通過議會得到的！請注意企業主們的這樣一種陰謀：給他們一點小恩小惠叫他們高興高興，但法律卻一條也不能給他們！不能讓議會通過工資法，但可以在工廠里實行議會的某些要求。（呼喊聲：“注意！”）於是僱傭奴隸會說：我們用不着靠什麼政治組織來爭取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或調整工資的法律。我們用不着通過議會，而是依靠自己達到自己的要求。是的，但你們能否不通過議會把爭得的東西保持下來呢？是什麼原因使你們得到勝利呢？是工商業復蘇。是什麼原因會使你們失掉勝利的果實呢？是工商業停滯。你們的廠主們曉得這一點。所以他們才縮短你們的工作日，增加你們的工資，或者把他們扣留的那部分工資發還你們，他們所以這樣做，是想叫你們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來實行這些措施。（鼓掌）他們縮短工作日，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很快就要減少他們工廠的生產；他們增加你們的工資，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很快就要根本不給你們當中成千的人發任何工資。與此同時，他們，特別是中央各郡的工廠主們，還對你們說：即使那些於他們不利的法律能夠通過，也只不过是迫使他們尋找其他掠奪你們的手段而已，——這就是他們的真意。這麼說，第一，你們不可能獲得你們所需要的法律，因為你們沒有人民議會；第二，即使這些法律能夠通過，工廠主們也會像他們自己斷言的那樣，還是要迴避實行這些法律。（高喊聲：“對！”）那末我就要問，你們對將來怎麼辦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呢？你們對自己現有的巨大力量利用得怎樣呢？因為，如果你們不在現在就做好準備，那就會變得毫無力量，就會失去所爭得的一切。我們今天在這裡集會，就是要向你們說明如何才能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成果。有些人認為憲章派的組織會妨礙工人運動。天曉得！只有憲章派的組織才能把工人運動引向勝利…… 一個工人如果不能自己為自己謀得工作，那他就不能離開企業主。但工人如果不掌握土地、信貸和機器等勞動資料，那他就不能自己為自己謀得工作。工人如果不消滅土地、貨幣、商業等等的壟斷，是決不可能掌握這些勞動資料的；而要做到這一點，不掌握國家政權是不行的。為什麼你們要力爭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呢？如果不需要用政權來保證工人的

自由那又何必进入议会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活动立即转向工厂呢？这是因为，你们知道，感觉到，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默默地证实：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热烈鼓掌）所以，我现在请你们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掌声如雷）……也许有人会說：‘为什么不等危机到来，千百万人自动同我们联合起来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危急感和一时的激动所产生的运动，而是建筑在稳固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不要依靠感情的冲动，而是遵循理智的呼声。所以我们号召你们把我们的组织恢复起来，以便使你们不受自发势力的支配，不受这种自发势力的任意摆布。商业停滞会再一次引起大陆上的革命，所以必须矗起宪章运动的牢靠灯塔，让它在暴风雨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照亮道路。总之，我们今天宣布恢复我们的运动；同时，为了获得正式的承认，我们选择向议会请愿的方式——这倒不是我们指望议会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作最适当的传声筒，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死而复活了。那些在不久以前曾宣布我们已死的人们，现在将不得不接受宣布我们复活的荣幸了，我们的请愿书就是宣告我们再生的证明书。”（掌声如雷）¹⁵⁷

胡桑的决议案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在这次集会以及在这个星期内举行的后几次集会上，都一致而且热烈地通过了。

在黑石山脊的集会上，厄内斯特·琼斯还宣布了7年前在这个地方召开的宪章派大会¹⁵⁸的主席——工人本杰明·腊斯顿的逝世。琼斯提议把腊斯顿的葬仪变成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把这次葬仪同西莱丁的宪章派大会结合起来，以利于宪章被接受。他说，这样做是安葬已故的老战士的最好的方法。必须指出，在英国的民主运动史上还从未有一次游行示威像上个星期日在西莱丁举行的恢复宪章运动大会和本杰明·腊斯顿的葬仪那样声势浩大；在哈里法克斯集会的人有20万以上，——这种情况甚至在运动的最盛期也是没有过的。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易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

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負有摧毀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

联合內閣在印度問題的初步交鋒中取得了胜利：斯坦利勋爵关于延期采取立法措施的提案被 184 票的多数所否决。紧急事务使我不得不把我对这次投票的評述先放一放。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7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19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土耳其战争問題。——“紐約論壇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¹⁵⁹

1853年7月5日星期二于倫敦

6月24日，信使把列施德-帕沙拒絕俄国的紧急最后通牒的通知送达彼得堡，三天以后，哥尔查科夫公爵接到了特派信使送来的命令：强渡普魯特河，并占領多瑙河各公国。

奥地利当局特派居萊伯爵去謁見沙皇；他无疑是要警告沙皇，要他注意任何全欧洲性的战争都孕育着革命的危險。至于俄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能作怎样的答复，可以根据它在1829年对同一个国家的类似說法所作的答复作出判断。下面就是这个答复的内容：

“据此，奥地利当局再一次列举了各种理由來說明騷动十分可慮，根据它的看法和它所掌握的情报，这种騷动决不是仅仅在一个国家里蔓延着；同时，它还列举了革命密謀近来取得的成就。这些担心在弗兰茨国王的信中（給尼古拉的）反映得特別明显。我們决不想否认奥地利向我們指出的危險。由于土耳其政府在外国的影响下所作的抗拒帶有执拗的性质，致使目前的危机迟迟不能結束（这違反我們的意图和願望），甚至迫使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并且准备去作新的牺牲，因此，俄国不得不比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直接关系到它的荣誉和它的臣民的福利的一切利益。这样一来，俄国本来可以用来对付欧洲其他部分的革命暴乱的手段，現時迫于必要将受到牵制。因此，奥地利在这

种情况下比其他强国更关心締結和約，但是未来的和約对我皇必須崇敬，对我皇之帝国必須有利。如果要我們签字的条約不具备这种性质，那末俄国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将受到致命打击；俄国将丧失它作为强国的威信，而且，它在不可預知的情况下应对友好同盟国家所作的道义支持也可能变得沒有力量，收不到效果。”（涅謝尔罗迭伯爵于 1829 年 2 月 12 日从圣彼得堡寄給塔提舍夫先生的秘密信。）¹⁶⁰

据上星期六的“新聞报”报道，沙皇对英国，特别是对阿伯丁勋爵的行为異常恼怒，特指示布隆諾夫先生不要再同这个“善良的”老头子保持任何关系，只同外交大臣作官方的交往。

奥地利銀行巨头的机关报——維也納的“劳埃德氏报”¹⁶¹极力鼓吹奥地利联合英法来对付俄国的侵略政策。

諸君大概还記得，联合內閣在 4 月 14 日表決廢除广告稅的建議时曾遭到失敗^①。7 月 1 日，联合內閣在这个問題上又遭到了两次失敗，就在这一天，格萊斯頓先生建議把广告稅由 1 先令 6 辨士降为 6 辨士，并扩大范围，使广告稅适用于所有书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建議取消現有一切广告稅的米尔納·基卜生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以 109 票对 99 票被否決。在这以后，当格萊斯頓先生的拥护者认为已經取得胜利，紛紛离开議院去出席宴会或宮廷舞会的时候，布莱特先生起来发了言，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說，反对征收知識稅，特别是反对征收印花稅和广告稅。我从他的发言中引用几段諸君可能感到兴趣的話。

“他（布莱特先生）說，他手里現在拿着一份篇幅大小同倫敦的任何一家沒有附刊的日报相同的报纸，他认为，这份报纸一点也不比在倫敦出版的任何报纸差。这份报纸的鉛字比任何倫敦的日报都要讲究。紙張是上好的，完

^① 見本卷第 66、80 頁。——編者注

全符合報紙的一切要求。就印刷來說，未必有比它更好的了。它的材料比倫敦任何一家同樣開本的日報都充實。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登滿了廣告。在這一號上登載的有：一篇關於美國美術協會的研究成果的長篇文章，一篇綜合論述歐洲各種最近事件的社論，一篇關於漁場問題的辯論的社論，另外還有一篇他完全贊同的社論，這篇社論證明，社交宴會是社會的災難。（座上喊聲：“對，對！”笑聲）他過去也曾看到過一些從風格的角度來看寫得較好的文章，但是語調比這更貼切更有益的文章他是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的。此外，該報還載有以下一些文章：‘歐游歸來三日記’、‘“亞洲號”輪船的到來’以及一篇歐洲新聞簡述。從大不列顛收到的是一篇詳細分析高貴的紳士^①提出的預算的文章。這個預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贊同，其他的部分沒有得到贊同，而牽涉到曼徹斯特學派的論點的部分則完全沒有得到贊同¹⁶²。（笑聲）此外，還有關於斯托女士訪問愛丁堡的報道，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關於裁縫的困難處境的長文，几篇來自希臘、西班牙和其他大陸國家的通訊，還有一篇文章專談阿思隆的選舉和女王陛下的法律顧問官被整整 189 票選入議會的事情——這件事對美國讀者來說是非常有趣的！然後還有几欄簡訊和一些非常周詳的說明貿易和市場情況的表格。該報不斷地反對酗酒和奴隸制度，他[布萊特]敢說：目前在倫敦恐怕沒有比這更好的報紙了。這個報紙的名稱就是‘紐約論壇報’；每天早上，它準時地出現在每一個願意花費 1 辨士買它的紐約工人的飯桌上。（座上喊聲：“注意，注意！”）發言人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問題：為什麼，為了什麼有益的目的和為了什麼財政的理由要使倫敦的工人付 5 辨士才能買一份晨報，而他在紐約的直接競賽者只要 1 辨士就能買一份報呢？我們正在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國公開進行競賽；但是，如果我國工人被迫根本不看報，要看就得花 5 辨士買一份，再不就是上小酒館裏去看，而美國的每一個工人只花 1 辨士就能買一份報，在這種情況下，難道談得上兩國工人在平等原則上的競賽嗎？同樣也很難說，根本不看價目表的英國商人能夠像每天都能利用這種好處的商人那樣順利地經營自己的事業。（座上喊聲：“對，對！”）……如果財政大臣要反對的話，那末發言人就要直截了當和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提出反對是因為自己內心裏害怕出版自由；高貴的紳士曾說有財政困難，發言人說，這只是一種偽裝，是為了掩飾內心的恐懼，唯

① 格萊斯頓。——編者注

恐人民有出版自由和比較廣泛的政治情報來源。(座上喊聲：“對！”)而死死抓住6辨士的廣告稅不放，硬說這一項稅收為補充印花稅所必需，只不過是因為害怕出版自由而已。”

接着克羅弗德先生建議用0辨士這個數字代替6辨士的數字。科布頓先生支持這個建議；並且針對格萊斯頓先生所說的廣告稅不會嚴重地影響報紙以低廉價格發行的話，提醒格萊斯頓先生注意霍拉斯·格里利對1851年討論這個問題的委員會所說的話。

“格里利先生當時是大展覽會的特派員之一，是他的尊敬的朋友布萊特先生剛才引用的那份報紙的所有人。格里利在回答如果在美國實行廣告稅將會產生什麼後果的問題時曾說：這項稅收將置美國的新報紙於死地。”

於是約翰·羅素勳爵起來發言，他用相當生氣的語調說，在這麼多議員缺席的情況下企圖取消已經通過的決定，這未必是誠實的做法。顯然，約翰勳爵忘記了：正是在這個關於廣告稅的問題上，他的同僚們曾經被總共只有40票的多數擊敗，而現在也只得到10票的多數。儘管約翰勳爵就“憲制”嚴格性說了一番訓詞，格萊斯頓關於每個廣告徵稅6辨士的建議仍然以68票對63票被否決，克羅弗德先生的修正案則以70票對61票被通過。迪斯累里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表決時是同曼徹斯特學派站在一起的。

看來下院好像是特別強調問題重要和內容豐富似的，它所進行的關於印度的辯論拖得特別長，扯得特別廣泛，雖然這些辯論說不上有什麼深刻性和重大意義。表決情況（這次表決使內閣以322票對142票得到了多數）同辯論情況形成了一個對照。辯論給內閣帶來的只是滿路荊棘，查理·伍德爵士就扮演了被官方放出來吞食掉這些荊棘的驢子的角色。而表決的結果卻是一束玫

瑰，同一位查理·伍德爵士則被宣布为**摩挲**第二。正是那些根据自己的理由駁斥过內閣的草案的人，投了贊成票使它通过了。在法案的支持者当中，沒有一個人敢于从实质上为这个法案辯护；相反，他們都为自己支持这个法案作辯护：一部分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毕竟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另一些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根本不是措施。前者說，他們将在全院委员会里对法案作修改，而后者說：他們将去掉它的所有假改革的裝飾。

內閣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托利党反对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散了，而其余的相当一部分托利党人則在赫里斯和英格利斯的率領下投到了阿伯丁营垒里去；至于反对法案的 142 票，其中有 100 票屬於迪斯累里派，42 票屬於得到某些抱不滿情緒的爱尔兰人和某些“野人”支持的曼彻斯特学派。反对派內的反对派又一次挽救了內閣。

东印度公司的官員之一哈利戴先生，在回答調查委员会的問題时說：

“在印度居民看来，特許狀賦予东印度公司 20 年租借权这个事实，就等于把他們自己租出去了。”

至少，这一次特許狀的效力沒有恢复到一定时期，因此可以根据議会的願望随时予以廢除。这样一来，一直处在世襲租借人这个穩固地位的东印度公司，势必下降到沒有租期保障的租借人 [tenant at will] 这个不穩定的地位。印度的居民从这里只能得到好处。关于印度的管理問題，同所有其他問題一样，終于被联合內閣擱置了起来。而下院則又一次地暴露了自己的可怜相：它在同一次表决中既表明了自己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項法律，又表示出自己不願意把制定法律的事情拖延下去。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起，世界上就充滿了大量有些是出色的，有些是胡說八道的学术著作，一齐来研究这个題目：誰应当被赋予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一个統治民族（它統治着另一个拥有 15 600 万人口和 1 368 113 平方英里的民族）的賢明立法者的議會，在它的庄严和公开的會議上想来解决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問題：在这些賢明的立法者中間是誰执掌管理 15 000 万人口的異民族的实际权力？在不列顛的賢人議會中，並沒有出現能解决这一難題的奥狄浦斯。所有的辯論都是圍繞着這個問題进行的，但是，进行了表决之后，关于印度的管理問題仍然是一笔胡塗賬。

印度的財政連年亏空；它的軍費負担过重，而公共工程方面的支出却等于零；在那里实行着可恶的苛捐杂稅制度，司法和法律也同样可恶。以上这五点可以說就是东印度公司特許狀上的五个主要章节。所有这一切，在 1853 年的辯論中都被肯定了，完全沒有爭論，同 1833 年的辯論、1813 年的辯論、甚至所有过去关于印度問題的辯論的情况一样。唯一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就是哪一个政党应当对这一切負責。

不錯，在印度設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督。但是这个总督也是由設在英国的管理机关 [home-government] 来管理的。那末，又是誰代表着这个管理机关呢？是督察委員會主席这个普通头衔掩盖下的印度事务大臣呢，还是东印度公司的 24 位董事？在印度教的庙宇的門口，我們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而在管理印度的庙宇的門口，我們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东西，只不过不是神罢了。

如果暫且不談总督，那末我們提出的問題归結起来就是一个

双重管理制度的問題——这是英国人慣用的形式。內閣和議院一个用法案一个用表决表明了，它們是非常坚持这种二元論的。

英国商人冒險家的公司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錢財，当这个公司开始把自己的海外商館网扩大到整个帝国范围的时候，当它同荷兰和法国的私商之間的竞争开始具有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当然就开始干涉起来，于是，管理印度的双重制度，即使沒有經過正式的手續，但实际上已經产生了。1784年的皮特法令規定同东印度公司妥协，使它受督察委员会监督，同时又使督察委员会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屬物，这个法案从手續上和事实上批准、确认并且整頓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双重管理制度。

1833年的法令加强了督察委员会，把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变成了純粹的債权人——东印度进項抵押券的持有者，并且命令东印度公司卖光自己的商品儲备，停止了公司的商业活动，另外，鉴于公司仍然作为一个政治組織而繼續存在，就把它改組为純粹的王室代办；总之，这个法令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东印度公司自己对东印度王公慣用的手法：取代以后，暫時仍以他們的名义进行管理。自1833年到現在，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在被允許的範圍內存在。由此可見，一方面，完全摆脱这个公司看来并不困难，而另一方面，無論英国是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义統治印度，还是用傳統的挂名公司的招牌統治印度，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看起来，全部問題似乎只是沒有什麼重大意义的形式問題。但实际上問題完全不是这么簡單。

首先必須看到：設在坎楠路的政府机关即督察委员会，像一般人认为設在萊登霍尔街的东印度公司本身一样，也是一个虛設的

机构。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虛有其名，最高权力屬於委員會主席。主席本身虽然是帝国内閣的独立成員，但仍然不过是二等角色。据说在印度一般人有这样的看法：派不了用場的人最好是让他当法官，用这种办法把他打发走。在大不列顛，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以后不知道該怎样来安插它的某一个第十等“国家活动家”的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当督察委員會的主席、大莫臥儿的继承人——teste Carolo Wood [查理·伍德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从法律字面上来看，督察委員會，事实上也就是該委員會的主席，

“有全权来領導、监督和檢查东印度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印度領地的管理及領地收入的一切法令、业务和事务”。

公司董事不准

“在沒有得到督察委員會批准的情况下，发出任何命令、指示、报告、公函以及任何涉及印度或印度的管理的通訊”。

公司董事必須

“在督察委員會发出指令之日起的两星期內，拟好一切有关問題的指示和命令，或者是根据委員會的委任，轉发委員會的有关印度事务的命令”。

督察委員會有全权檢查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一切信件和所有发往印度和来自印度的报告，并檢查它們的公文处理情况。最后，董事会任命一个机密委員會，由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和一名最有資格的董事組成，他們必須宣誓保密，督察委員會主席可以通过他們把他个人关于一切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指令发往印度；这个委員會所起的只是普通聯絡站的作用。关于同阿富汗和緬甸作战和侵占信德的命令，就是通过这个机密委員會轉发出去的，而董事会对这些命令所知道的并不比广大公众和議會多。因此，督察委員會的主席

看起来一直就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大莫臥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为非作恶的无限权力，例如，策动耗費极大的战争，而且每一次都是用毫无責任的董事会的招牌做掩护。但是另一方面，董事会也并不是沒有实际权力。由于在行政措施方面通常是由董事会負責，由于它是一个比督察委员会更固定和稳定的机构，有傳統的活动方式，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一切日常的內部行政事务自然都归它处理。它經過国王批准任命印度的最高当局——总督及其参事，此外，它还拥有罢免高級官員，甚至罢免总督的无限权力，例如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时期，董事会就曾經这样对付过埃倫伯勒勋爵。然而这还不是董事們的最主要的特权。他們的年薪一共只有 300 英鎊，但是实际上他們是靠卖官鬻爵得到收入，他們可以保荐所有的文职和軍职人員，印度总督和各管区的省督都必須从这些被保荐的人中間挑选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因为印度居民是禁止担任这些官职的。在确定一年的出缺数字后，这一数字就被分成 28 等份，其中有两份給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份給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其余每个董事各得一份。每份卖缺所得的收入，每年不下 14 000 英鎊。

坎伯尔先生說：“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任命似乎都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这些任命都是在董事之間进行分配的，董事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分得的那一份。”¹⁶³

因此，十分清楚，整个印度的高級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董事会的精神行事，它的代表都是阿迪斯康和海利貝里学校的学生，都是靠着董事的提携而被任命的。同样十分清楚，这个年年把总值达 40 万英鎊的职位在大不列顛上等階級中进行分配的董事会，不会受到这些階級所操纵的輿論的严重攻击，甚至根本不会受到攻击。至

于董事會的精神是什麼樣的，我將在下一篇關於印度現狀的文章中說明。現在只談一點，即在這次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時，馬考萊先生曾經用一種特別的方法為董事會辯護，說什麼董事會即使有心作惡也沒有力量去做；例如，所有的改進辦法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担的省督們不顧它的反對並且同它作鬥爭之後實施的。通過這樣的途徑，禁止了撒提¹⁶⁴的風俗，廢除了可惡的過境稅，准許了東印度的出版自由。

所以，督察委員會主席是以董事會為掩護把印度拖入耗費巨大的戰爭，而董事會則以督察委員會為掩護敗壞印度的行政機關。

如果我們更深入地考察一下這個畸形管理機關的結構，就會發現在它的基础中還有一種比督察委員會和董事會更強大的第三種力量，這種力量更沒有責任，更不容易看出，更不容易受到輿論的監督。可以更換的督察委員會主席靠這個位於坎楠路的機關中的固定的官員們辦事，而在這些官員們看來，印度並不在印度，而是在萊登霍爾街。那末誰是萊登霍爾街的主宰呢？

2 000 位上年紀的女士和有氣無力的紳士（他們掌握着印度的股票，他們關心印度僅僅是因為可以按期從印度的收入中得到紅利）選出 24 名董事，這些董事唯一的美德就是他們是 1 000 英鎊股票的持有者。商人、銀行家和各種公司的董事都千方百計想鑽進董事會，以便更好地安排私人的事業。

布萊特先生說：“倫敦西蒂區有一個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擁有 300 票，在選舉董事時，他的話幾乎是絕對的法律。”

因此，董事會不過是英國金融巨頭的**從屬機關**。用這種方法選出來的董事會，除了上面說到的機密委員會外，還建立了三個委員會，這就是：（1）政治和軍事問題委員會；（2）財政和內政委員

会；(3)收入、司法和立法問題委員會。这些委員會的成員每年都互相輪換，这样，某个金融家今年如果参加司法委員會，下年就参加軍事委員會，任何人都可能一直在一个部門里管事。选举董事的办法本身就已經使担負这些职务的都是根本不懂如何办事的人了，而輪換制度又彻底毀灭了某个人可能偶然表現出来的最后一点点办事能力。那末究竟是誰以董事会的名义从事实际的管理呢？这就是印度大厦¹⁶⁵里的一大堆不負責任的秘书、視察員和官員，在这些人当中，正如坎伯尔先生在他的“印度管理方案”¹⁶⁶中所指出的那样，也許仅仅只有一个人曾經到过印度，并且还是偶然去的。因此，如果把卖官鬻爵的交易撇开不談，也就談不上董事会活动的政治方向、原則或任何制度了。真正的董事会，英国管理印度的真正的机关等等，就是那个位于萊登霍尔街的常設的、不負責任的**官僚机关**——“办公桌和裙带風的养儿”。这就是說，管理着一个龐大帝国的，还不像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著名的貴族所組成的自治公所，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办事員和一些同样的夤緣幸进的人。

因此，世界上沒有一个政府像印度政府这样写得多而做得少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当东印度公司还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团体时，它当然像所有的貿易公司一样，要求印度商館的經理人員对每个問題都做出最詳細的报告。但是，当商館变成了一个帝国，而商业报告变成了一大堆信件和公函时，萊登霍尔街的官員們就占了这样的优势，以致董事們和督察委員會都从屬于他們了；他們終于把印度政府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打字机。布罗頓勛爵在向公职人員薪俸委員會所作的证詞中曾經透露，有一次发出的报告竟长达45 000頁。

为了使諸君多少能够想像出印度大厦办公室在办事时是如何消耗時間的，我現在来引证一段狄金逊先生的著作。

“当印度来了一份报告的时候，首先就把它交給有关的視察員办公室 [Examiners' Department]；然后主席們^①就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一起进行討論，商量好回信的内容；他們再把回信草案送交印度事务大臣¹⁶⁷；所有这一切用行話來說就叫做初报——初步报告 [previous communication]。在这个所謂初报的初步阶段中，主席們完全依賴着官員。这种依賴性如此之大，甚至在主席作了開場白之后股东会进行討論时，还可以看到这样可怜的情景：主席經常向秘书請教，秘书坐在他的旁边，帮助他主持會議，不时向他耳語，作提示，打断他的发言，他完全像是一个傀儡；处在这个制度的相反的一端的印度事务大臣的处境也同样困难。如果在初报阶段对草案发生了意見分歧，那就要进行討論，而問題几乎始終都是通过大臣和主席友好地交換意見而得到解决。最后，大臣批下回信草案，或者贊成，或者做些修改之后，就連同一切有关文件送給董事会中負責监督有关办公室的委员会审查和討論；經過該委员会通过或修改后，再送交董事会全体會議履行同样的手續。只是在这一过程之后，它才第一次作为正式公文送給大臣，然后重新經過同样的一道道层次发回来。”¹⁶⁸

坎伯尔证明：

“当印度討論关于某項措施的問題的时候，如果听说問題已經提交董事会，大家就认为問題的解决已遙遙无期了。”¹⁶⁹

这种官僚机关所造成的腐臭恶劣的气氛，受到伯克的下面一段著名的話的痛斥是应当的：

“这一群卑劣的小政客不折不扣是人类的渣滓。政府工作在他們手中变成了一种最卑鄙、机械的行业。他們根本不作好事。一切仅仅根据良心和人格而做的事都会使他們发火。他們把开闊的、自由主义的和有远見的对国家利益的看法都看做浪漫主义精神，把与这些看法相适应的原則看做精神不正

①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編者注

常的囁語。做買賣賺錢的算計使他們失去了思維能力。丑角的詔笑使他們把一切偉大和崇高的事物都當作耻辱。目的和手段的貧乏在他們看來就是思想健全和頭腦清醒。”¹⁷⁰

萊登霍爾街和坎楠路的辦公機關使印度人民付出的東西極為有限——每年 16 萬英鎊。政治寡頭為了使自己的小兒子有事可做，連年把印度拖入戰爭；金融寡頭像拍賣一樣地出賣印度，地位較低的官僚則癱瘓它的管理制度，使營私舞弊永遠存在下去，把這當作使自己永遠存在下去的必要條件。

查理·伍德爵士的法案一點也沒有改變現存的制度。這個法案擴大了內閣的權力，但絲毫沒有加重它的責任。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7 月 5 日

載於 1853 年 7 月 20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824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累亚德的质詢。——圍繞着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1853年7月8日星期五于倫敦

多瑙河各公国实际上的被占領以及早在意料中的危机日益逼近，迫使英国报界显然放低了好战的調子。因此，“泰晤士报”在两篇社論中連續发表的意見才沒有引起什么重大的異議，它的意見是：“既然俄国人不能克制自己在野蛮国家里进行文明活动的意图，那末对英国來說，最好是讓他們自由行动，不要由于无益的固执而破坏和平。”

关于当前議事日程上的土耳其問題，政府一心一意不願提供任何情报，因此在上下两院中同时演出了一場可笑的滑稽剧。在下院中，著名的古尼尼微修复家¹⁷¹累亚德先生发表一項声明，說他要在今晚提出一个議案，要求內閣向下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和俄国的詳細情报。这项声明提出以后，在下院就出現了如下的一个場面。

累亚德先生。——已經宣布我在明天质詢。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求我把质詢延到本月11日(星期一)提出，当时我不可能作出答复，事实上在今天早晨以前作答复也办不到。使我惊奇的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我到下院来过，因为我在同投票結果一块印发的提案簡报中看到，說累亚德先

生已經把他的发言从本月 8 日(星期五)延至本月 11 日(星期一)! 用这种态度对待独立的議員,我认为未必公道。

格萊斯頓先生。——我不知道是誰下指示和授权在下院的公报上刊登延期发言的声明。我只能向敬爱的議員先生保证一点: 已經做的一切, 都是出自绝对的 *bona fide* [善意]。

累亚德先生。——我想知道是誰把延期发言的声明弄到公报上去的; 是什么原因使你們把我的发言推迟到星期一?

格萊斯頓先生。——是約翰·罗素勋爵的身体不舒服。

于是**累亚德**先生同意推迟到星期一提出自己的議案。

迪斯累里先生。——我认为, 这件事需要政府作出解釋, 尤其是在簡报中也不顾協議把印度法案的討論弄到明天去了。

休息以后,**查·伍德**爵士很謙遜地承认, 这两个小岔子都是他的过錯。但是他利用**格萊斯頓**的暗示, 馬上又說, 他对**累亚德**先生是完全出自善意。

在上院却揭开了相反的一面。可怜的罗素身体不舒服, 無論如何与**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沒有任何关系。侯爵的提案与**累亚德**先生的提案类似, 也是在大臣們要求之下一再延期后定在星期五提出。

布魯姆勋爵提出保证說, 他没有同任何一个閣員討論过这个問題。但他认为, 把**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提案定在明天提出, 在当前情况下是非常不恰当的。他要找外交大臣談这个問題。

克拉倫登勋爵声明說, 显然, 他不能下断語, 在目前詳細討論問題不会产生危害, 不会造成困难。談判还在繼續。但在多次延期之后, 他感到自己已經沒有权利再請求他的高貴的朋友收回自己的提案。但是, 他保留他有权在自己的答复中提出不超出他的社会职责范围的意見。尽管如此, 他还是想問一問他的高貴的朋友, 是否同意把自己的提案最早延至下星期一提出, 因为在上下两院同时辯論这个問題方便些, 何况約翰·罗素勋爵現在身体很不好。

埃倫伯勒伯爵。——坐在对面的侯爵閣下如果能够把他原定明天提出

的提案不仅延至星期一以前，而且討論的日期一般也不指明，那就是十分明智了。

得比勳爵对于高貴的侯爵提出這個問題表示惊奇，并且說，他完全同意伯爵閣下(埃倫伯勒)的意見。

格雷伯爵。——在克拉倫登勳爵声明之后，关于必須延期討論的問題，想必每个人都清楚了。

在此以后，克兰里卡德侯爵便收回了自己的质詢。

菲茨威廉伯爵詢問，6月26日俄国关于对土耳其进行神圣战争的宣言是否与原文无异。

克拉倫登伯爵回答說，这个文件他是从女王陛下駐圣彼得堡大使那儿收到的。

馬姆茲伯里伯爵。——为了上院議員們的尊严，政府應該向他們保证，政府不让下院在星期一举行这样的辯論，这是政府能够办到的。

阿伯丁伯爵說，他和他的同僚正运用他們的全部影响，不让举行这些辯論。

現在讓我們来总結一下：先用欺騙的方法使下院延期辯論；然后借口下院已延期辯論，使上院也照办，于是“高貴的”上院議員們就决定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ad infinitum* [不定期]；最后，为了“世界上最高貴的會議”的尊严，要求下院也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ad infinitum*。

在回答利德耳先生的质詢时，帕麦斯顿勳爵在下院的同一次會議上說了下面一段話：

“多瑙河口的苏利納支流不久前所以停止通航，是由于河水上漲，溢出河岸，結果水流量減少，淺水处淤泥增多。我必須指出，虽然多瑙河三角洲的占有者俄国政府始終都承认，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它有責任保持苏利納支流能够順利通航，但是多少年以来，我国政府却不得不一再向它提出意見，責备它不負責任。当多瑙河口是土耳其領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水淺的地方都保持着16呎的深度，而現在，由于俄国当局的疏忽，已減至11呎；而且这11呎的深度只保持在一条很狹小的航道內，这条航道所以这样狹小，是由河岸冲

下來的沖積土、淺灘的形成以及遇險沉沒至今尚未撈出的船隻造成的。由於這一切，船舶在此通航，如遇天氣不好或缺乏熟練的領港員，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上述這種情況，都表明了敖德薩的競爭，敖德薩方面是想阻止沿多瑙河運出商品，而使商品都盡量通過敖德薩本港運出。”

看來，英國內閣是希望等到多瑙河各公國成為俄國領土的時候重新開放多瑙河口，因為到那個時候，敖德薩就不會競爭了。

幾個月以前，我曾經有機會指出，在各工廠區，關於十小時工作日的鼓動取得了成績¹⁷²。從那時以來，運動就沒有停止，最後，終於得到立法人士的反應。本月5日，代表奧爾丹的議員科貝特先生，請求允許他提出一項關於限制工廠勞動日的法案，規定每星期前5天限為10小時，星期六限為7小時半。他得到允許提出這項法案。在預先辯論的時候，帕麥斯頓勳爵突然心血來潮，竟然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果找不到別的方法保護從事工廠勞動的女工和童工，他就要提議限制機器轉動的時間。他的這句話剛一脫口，就掀起了一陣反對這位輕率的國家活動家的風暴，反對他的不僅僅是工業巨頭的直接代表，主要的還是他們和帕麥斯頓勳爵本人的朋友輝格黨人，如喬治·格雷爵士、拉布謝爾先生等。約翰·羅素勳爵把帕麥斯頓拉到一旁，同他作了半小時的私人 *pourparler* [商談] 以後，便來全力平息這場風暴。他向議員先生們極力解釋，說“他認為這完全是沒有正確理解他的可敬的朋友的意思，他的朋友主張限制機器轉動的時間，實際上所指的是**反對**這種限制”。這種愚蠢的通融，是聯合內閣的活命丸。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聯合內閣的代表人物**都有權說的是這回事，指的是另一回事。至於說到帕麥斯頓本人，我們不要忘記，這位老牌的爱穿自由主義時裝的人物在幾年以前曾經用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對待愛爾蘭氏族的成員那樣

的方法¹⁷³，从自己的“領地”上驅逐了几百家爱尔兰人。

提出上述法案的科貝特先生，是有名的威廉·科貝特的儿子，是他父亲当年当过代表的那个城市推举出来的議員。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当选证书，也继承了政治信念。因此，尽管这些信念带有独立的性质，但仍然同現代各党派的立場很不合拍。威廉·科貝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更确切点說，是它的創始人。他曾經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和輝格党之間傳統的党派斗争的秘密，撕下了寄生性的輝格党寡头政治虛有其表的自由主义的伪装，进行过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地主統治的斗争，嘲笑过英国国教教会的伪善貪婪，攻击过两个机构，金融寡头政治的两个最鮮明的化身——“針綫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銀行）和“馬克沃姆先生之流”（国家債权人）¹⁷⁴。他曾經建議廢除国債，沒收教会領地，取消各种紙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犯地方自治的权利，并且譴責这种侵犯，认为它破坏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这就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結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在人民宪章里，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者而是工业小資產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理性認識上却很少超出資產阶级改良的范围。一直到1834年，他去世以前不久，在頒布了新的济貧法¹⁷⁵之后，他才开始猜測到，現在的工业巨头如同大地主、銀行家、国家債权人以及英国国教教会的僧侶一样，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果說，威廉·科貝特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驅，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頑固的約翰牛。他是大不列顛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純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預告者。他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

国人民的意气从 1688 年所謂光荣革命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向新天地过渡，而是回到古老的世界，不是新紀元的开端，而是“美好的古老时光”的复还。他恰好沒有看到，他所想像的英国人民衰退的时期，正好是資產階級地位开始提高、現代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时期，并且随着現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地方自治消亡，让位于政治集权。从十八世紀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心里充滿苦悶。他看到了事物的后果，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創自己事业的那些新的社会力量。他沒有看到現代資產階級，只看到一部分貴族世世代代壟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立法手續来批准資產階級的新需要、新野心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沒有看到使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1688 年以来的一切变化應該完全由輝格党人負責，他們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民退化的禍首。因此他才对輝格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揭露輝格党的寡头政治。因此才出現这样一个使人惊奇的事实：威廉·科貝特是一位本能地保卫人民群众、反对資產階級侵犯的卫士，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他是維護工业資產階級利益、反对世襲貴族的战士。作为一位作家來說，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如今的科貝特先生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繼續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滾到自由派的托利党人队伍里去了。

“泰晤士报”力图用加倍橫蛮地对待英国工人的办法来奖賞自己对俄国沙皇的順从，因此便針對科貝特先生的提案，发表了一篇自以为会一鳴惊人，但实际上却成了純粹胡說的社論。“泰晤士报”无法否认，限制机器轉动的時間是迫使大工厂主服从現有的关

于工厂工作时间的法律的唯一方法,但是它不能理解,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唯一适用的办法来。现有的**十小时半工作日**的法律¹⁷⁶,同所有其他工厂法一样,只不过是統治阶级对工人虛假的让步而已,工人们不滿足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敢于要求把这种让步变成现实。“泰晤士报”从来就沒有听到过有比这更可笑或更古怪的事。如果議会禁止老板让工人每天工作 12、16 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末,“泰晤士报”說,“英国将不再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了”。这就像南卡罗来納的某紳士一样,这位紳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倫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憤怒地大叫:“这里不許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說是自由的国家嗎?”如果一个人到工厂当工人,同厂主簽訂合同,每昼夜出卖自己 16 或 18 小时,沒有办法像普通人在較好的条件下那样睡觉,那末,“泰晤士报”断言,这是由于:

“人們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供与求两方面不断协调,并且使他們去选择对他們最愉快最适当的职业。”

自然,法律不應該干涉 travail attrayant [誘人的劳动]。如果你們要把机器轉动的時間限定在一昼夜的某个時間內,比方說,限定从早上 6 时起至晚上 6 时止,那末,“泰晤士报”說,你們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完全禁止使用机器;如果你們在日出之后把街灯熄掉,那末你們到夜里也应当熄掉街灯。“泰晤士报”不允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緣故,它才坚持保留紙張稅、广告稅和报纸印花稅,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損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設法要議会廢除报纸附刊稅来減輕本身的事业的負担。“泰晤士报”对議会干涉厂主老爷們的神圣利益表示深恶痛絕,而不管这种利益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它又不擇手段地設法

使馬車夫和小車主的事务受到最无耻的干涉，虽然在这里除了西蒂那些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可能还有印刷所广场¹⁷⁷的紳士們的舒适受些影响以外，威胁不到任何东西。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在对我们說，机器的主要好处是它能代替和减少体力劳动，減輕体力劳动的負担。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現存的阶级制度下，机器并不会縮短工作日，而是延长工作日；机器先剥夺个体劳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工人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損失。这样，工作日就越来越长，白天工作又加上夜間工作。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过程中断，那时候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工厂向工人紧閉大門，工人要么充分休息，要么上吊，那只好随他的便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7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2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俄土糾紛。——不列顛內閣的
詭計和詭辯。——涅謝尔罗迭最近
的照會。——东印度問題

1853年7月12日星期二于倫敦

上星期四开演的議會鬧劇，在星期五即本月8日的下院會議上繼續演出，最后作了結束。帕麦斯頓勳爵要求累亞德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再提出，而且还想叫人們根本不再提起这个提案。“星期一应当遭到同星期五一样的命运”。布萊特先生趁这个机会祝賀阿伯丁勳爵采取了謹慎的政策，同时还表示自己对他的一切完全信任。

“晨报”指出：“即使內閣是一个和平协会¹⁷⁸，它也不可能比最善良的阿伯丁更多地去鼓励俄国，挫折法国的銳气，使土耳其处于危險的境地，破坏英国的威信。布萊特先生說的話就等于是曼彻斯特派支持胆小怕事的閣員的一个宣言。”

大臣們极力阻撓累亞德提出預定的质詢，因为他們完全有理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內閣的内部分歧就不可能再向公众隱瞞了。土耳其应当分崩离析，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联合內閣分崩离析。俄国的陰謀不仅得到阿伯丁勳爵的最大寬容，而且也得到阿盖尔公爵、克拉倫登勳爵、格兰維耳勳爵、悉尼·赫伯特先生、卡德威尔

先生和“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等大臣的最大寬容。据說，阿伯丁勋爵一度曾以提出辞职相威胁。显然，帕麦斯顿的“精力飽滿”派(*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羅馬公民]¹⁷⁹派)正需要这么一个借口以便后退。于是就决定，向君士坦丁堡宮廷和圣彼得堡宮廷发出內容相同的照会，建議“由列强会同訂立一項保障条約，把沙皇为正教徒要求的特权也賦予居住在土耳其屬地上的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可是同样的建議在緬施科夫公爵动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已經向緬施科夫公爵提出了，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建議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因此，指望重提这种建議能得到什么結果，真是太可笑了，何况，正是俄国坚决力求同列强也就是同奥地利和普魯士締結条約(現在这一点已經毫無疑問)，而这件事也不再遇到阻撓。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是俄国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的内弟，他的步調和俄国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联合內閣中的两派(昏昏欲睡派和“精力飽滿”派)通过上述决定的同一天里，“祖国报”上刊登了下面的一段話：

“奥地利駐君士坦丁堡的新任使臣馮·布魯克先生一上任就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500万披亚斯特賠款，并要它答应交出克列克和苏托林两个港口。这个要求被看做是对俄国的一种支持。”

这并不是奥地利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的唯一的一次支持。必須提醒的是，在1848年，当国王們需要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时候，他們曾不断制造“誤会”。現在这种手法又被用来对付土耳其了。士麦那的奥地利領事用武力把一个匈牙利人^①从一家英国的咖啡館綁架到奥地利的軍艦上；为了报复这种行动，流亡者打死和

① 科斯塔(他是根据韋克貝克尔領事的命令被捕的)。——編者注

打伤了奥地利軍官各一名，事后馮·布魯克先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 24 小时內雪耻¹⁸⁰。星期六的“晨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援引了奥地利人进入波斯尼亚的傳聞。不言而喻，当联合內閣的代表們昨天在两院的會議上被問到這項傳聞是否屬实的时候，結果是“还没有接到情报”。只有罗素一人大胆地推測說，隱藏在这种傳聞后面的恐怕不会是什么別的事情，只会是奥地利人在彼得瓦尔登集結自己的部队这个事实。塔提舍夫先生在 1828 年曾經說，到将来問題要彻底解决的时候，奥地利一定会貪婪地抓住自己的一份战利品，这个預言就这样正在应驗着。

上月 26 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急电說：

“鉴于目前謠傳整个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开往 博 斯 普 魯 斯 海 峽，苏丹詢問法国大使和英国大使：如果俄国人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示威，联合舰队是否准备开进达达尼尔海峽？两位大使做了肯定的答复。現在，一艘載有英法軍官的土耳其蒸汽舰剛剛从博斯普魯斯海峽出发到黑海进行偵察。”

俄国人占領了两个公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閉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关于东方問題的文章。同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們前次（1848—1849 年）占領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时規定的年貢的第一批貢款。从 1828 年以来，俄国的保护制度使这两个公国花費了 15 000 万披亚斯特，而搶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損失还不算在內。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法作战的費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費用，波斯为它支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費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的費用；現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各公国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的費用了。

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謝尔罗迭伯爵于 1853 年 6 月 20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沒有同意沙皇的全部要求、英法舰队沒有离开土耳其海面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簡直就是对英法两国的侮辱。照会中說：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場是海上占領，因此我們有权利占領一定的軍事障地，以恢复双方地位上的均勢。”

請大家注意一下，貝捷克灣离君士坦丁堡有 150 哩。沙皇坚持它有占領土耳其領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經沙皇特許而占据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寬宏大量，沙皇允許土耳其政府在選擇放棄主权的形式的自由，允許土耳其政府“通过协定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約，甚至通过签署一个普通照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凱納吉条約虽然只給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的权利¹⁸¹，但 *eo ipso* [这样一来] 就宣布了俄国是东羅馬。他对于西方不了解俄国在外国的宗教保护制度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遺憾。他用历史事实，即用“他在 1829 年利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現的那种真正的温和”来证明自己关心保持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他当时沒法表現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英国海軍上将又揚言不管有沒有本国政府的允許都将轰击黑海沿岸的每个居民点；他当时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之所以能得到，完全是西方各国的当局“寬宏大量”，土耳其舰队在納瓦林附近被背信棄义击潰的結果。

“在 1833 年他是欧洲唯一使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1833 年沙皇通过簽訂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同土

耳其訂立了**防禦同盟**，根据这个条約，外国舰队禁止駛近君士坦丁堡¹⁸²。由此可見，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全部独吞。

“在1839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由于共同努力实行这些建議，才使苏丹的王位免除了被新的阿拉伯帝国所取代的危險。”

換句話說，在1839年，他使列强担任主动消灭了埃及的舰队，并使那个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丧失了一切力量。

“圣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力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 *status quo* [现状]。”

說得对。沙皇一貫处心积虑地想使土耳其的腐烂过程完全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

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敢于直接向西方提出过更有侮辱性的照会。照会的作者真不愧是涅謝尔罗迭，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兼有蕁麻和鞭笞^②的意思。的确，这个照会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的鞭笞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向沙皇祝賀他有这样的杰作。如果說这是欧洲的退却，那末这还不单是在一般的失敗之后的退却，而是通过卡夫丁峽谷¹⁸³。

正当英国女王隆重接待俄国的公爵夫人，有教养的英国貴族和資產階級向野蛮的专制君主伏地求恩的时候，只有英国的无产階級反对統治階級的无能和退化。7月7日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了一个贊成和平的群众大会。哈里法克斯的議員克罗斯利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所有其他“大人物”从

① 穆罕默德-阿利。——編者注

② 俏皮話：«Nessel»(涅謝尔)意为“蕁麻”(德文)；«rod»(罗迭)意为“鞭笞”(英文)。——編者注

“城里”^①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大厅里坐无虚席，好几千人还呆在門外。厄内斯特·琼斯(他在各工厂区进行的鼓动很受欢迎,这可从向議會提出的大量的要求实行大宪章的請願书和地方資產階級报刊对他的攻击中看出。)这时正在德勒穆。哈里法克斯(琼斯在这里曾两度被选为下院議員候选人,并两次在举手表决¹⁸⁴中当选)的宪章派打电报叫他回来,刚好在大会开始前他赶回来了。曼彻斯特派的先生們这时完全相信他們的決議将被通过,他們向自己善良的阿伯丁表示了工业区对他的支持后,准备回家了,正在这时,厄内斯特·琼斯突然登上了讲台,并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它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并且宣布,在自由沒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于是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是,琼斯的修正案仍然被多数通过。

印度法案的条文正在逐条通过,除了所謂“印度改革派”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論据外,辯論中几乎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例如,乔斯林閣下,这是一个依靠定期地揭露印度現有的弊端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罪恶統治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資本之类的議員。諸君以为他的修正案的結論是什么?就是把东印度公司特許状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幸好他的主張只是以自己的难堪而告終。此外,还有一个职业“改革家”約瑟夫·休謨先生,他在自己的长期議會生活中甚至能够把反对內閣变成一种支持內閣的特殊方法。他提議不要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数目由24人减少到18人。唯一明智的、現在已被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他提議,关于政府任命的董事必須是东印度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持有者这个要求應該取消,这个要求本来是股东会选出的董事必須具备的条

① 倫敦。——編者注

件。請看一看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¹⁸⁵ 出版的那些小册子，諸君就会感到好像是在讀正統主义者、奥尔良派、藍色和紅色共和派，甚至还有最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共同起草的反波拿巴的长篇檄文。这些小册子的唯一功劳在目前來說只是在于，它們一般地引起了公众对印度問題的注意，此外再也不能期待什么，因为在这些小册子所反映的反对派观点中現在有着折衷主义的性质。例如，它們一方面批評英国貴族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反对消灭印度的貴族，即印度的王公。

自从英国掠夺者一到印度，并坚决决定要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們除了用武力或阴謀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就沒有別的办法。既然他們在对待当地王公方面处在古羅馬人对待自己的同盟者那样的地位，于是他們就用了羅馬政治家的办法。一个英国作者說：“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同我們在吃牛肉之前，要把牛喂肥一样。”东印度公司用古羅馬的方法把自己的同盟者誘入自己的罗网之后，就像在交易所街¹⁸⁶ 所做的那样，用現代的方法来惩治他們了。当地的王公为了履行自己对东印度公司所承担的义务，曾經不得不向英国人借貸大笔重利貸款。当他們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債权人就板起面孔，“擰紧螺絲”，这时王公只好或者簽訂“友好的协約”把自己的領土让給东印度公司，或者开战。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們都变成了靠自己的篡夺者的贍养費过活的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們就要被当作叛逆削去王位。現在，各土邦所占的面积为 699 961 平方哩，人口为 52 941 263 人，但是，現在它們已經不是英国政府的同盟者了，而是被各种奴役条件、一整套軍費補助条約和形式繁多的保护制度束縛起来的英国政府的藩臣了。这些条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土邦放棄自卫的权利，放棄

外交独立的权利，放棄不受总督干涉而解决它們相互之間的爭端的权利。它們全都必須納貢，或者是現金，或者是供养英国軍官指揮下的武装部队。关于彻底并吞或兼并这些土邦的問題，現在已成为一个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改革派声称实行兼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商人則认为兼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問題的提法本身就完全是錯誤的。各土邦作为**国家**，自从它們同东印度公司簽訂軍費補助条約，或者受它保护时起，实际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在两个政府中間进行分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損于其中一国的資源和两国的管理制度。在現行制度之下，各土邦被双重負擔即自己原有的行政机构和东印度公司对它們所課的賦稅以及軍需特捐压得喘不过气来。允許他們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条件，同时也就是使他們不断衰落和根本不可能改善处境的条件。机体虛弱，——这是各土邦存在的基本規律，正像任何一种仅仅在被容許的範圍內存在的有机体一样。因此，这里指的不是保存作为**国家**的土邦，而是保存当地的**王公**和他們的宮廷。那些厉声指責“英国王室和貴族穷奢极侈”的人，今天却因印度的納瓦布、拉札和札吉达尔¹⁸⁷（它們大多数甚至还没有資格夸說自己世系远古，因為它們是靠英国的陰謀而飞黃騰达的根底很淺的篡夺者）的破产而痛哭流涕，这岂不怪哉！世界上再沒有比这些“一千零一夜”中的沙宰曼和山魯亚尔的专制更可笑、更荒謬和更幼稚的专制了。威灵頓公爵、約翰·馬尔科姆爵士、亨利·罗素爵士、埃倫伯勒勳爵、布里格斯將軍和其他的权威人士都贊成保存 status quo [現狀]。但是，他們的見解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必須馴养英国人指揮下的印度軍隊去同他們自己的同胞进行小型战争，以便阻止他們調轉枪口反对他們的欧洲老爷

們；獨立國家的存在可以使英國軍隊有時得到一些事做；世襲的王公是英國專制制度最馴服的工具，他們是阻止勇敢的軍事冒險家（這種冒險家無論過去或將來在印度是很多的）露頭高升的障礙；獨立地區是庇護印度居民中一切不滿足的和有雄心的分子的安全地帶。所有這些理由都太囉嗦，它們的實質是：當地的王公是當前丑惡的英國統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進步的最大障礙。現在撇開這些理由不談，讓我來談談托馬斯·曼羅和埃耳芬斯頓勳爵，這兩個人有一副至少是不平凡的頭腦，並且滿心同情印度人民。他們認為，沒有當地的貴族階級，任何一個社會階級都將沒有充分的生命力，消滅這個貴族階級並不會抬高全體人民，相反地，只會壓低全體人民。如果注意到在英國人直接統治的地區本地人一向不許擔任任何要職（軍事的和民政的）這一情況，那末他們的話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凡是人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成為大人物的地方，就應當有一類依靠出身而成為大人物的人，以便使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哪怕是一点点的偉大。但是這種不讓本地人在英國地區擔任要職的做法，只有由於在所謂獨立地區保存了世襲王公才有可能。於是這兩種恩典中的一種不得不給了印度軍隊，這支軍隊的軍事實力是英國在印度的整個統治的支柱。我認為，我們可以相信坎伯爾先生說的話：印度的本地貴族最沒有能力擔任要職，為了滿足新的需要，必須造成新的階級，“由於下層階級具有機靈和易于接受知識的特點，這在印度比在任何其他國家更容易做到”¹⁸⁸。

當地的王公由於他們的王朝人丁衰微，幾乎已經退出了舞台。但是從本世紀起，英國政府開始允許他們用收養子的辦法來任命自己的繼承者，或者用英國人的親信作為傀儡來填補他們的空位。著名的總督達爾豪西勳爵第一個公開反對這種制度。如果不是用

人为的办法抑制了事态的自然进程，那末消灭当地的王公既无须用战争，也无须花钱。

至于**靠赡养费过活的王公**，英国政府从来自印度的收入中撥給他們当作薪俸的 2 468 969 英鎊，对人民來說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人民的全部食物只是大米，沒有別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說这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話，那末他們的用处仅仅是展示已經完全腐烂和十分可笑的君主政权。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¹⁸⁹大莫臥儿^①來說，他的年薪是 12 万英鎊，他的权力超不出宮牆的範圍，成了白痴的王族子孙在宮里像家兔一样听其自然地繁殖着。甚至德里的警察也被英国人从他的监督下弄走了。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色焦黃，老态龙鍾，穿着一身綉金的同印度舞女的服飾一样的戏剧服装。在国家庆典的日子里，这个鍍金的傀儡便走出来使忠心的臣子高兴一下。外国人要想見他，必須付出几个基尼，就像是看某个 saltimbanque [丑角] 的公演要买門票一样，而他也回敬客人們头巾、钻石等。皇家的这些钻石就近一看就看出原来是一些胡乱塗了些油漆的、仿造宝石仿造得非常粗糙的小块玻璃，做的是这样粗劣，放在手里就像是块姜汁餅干一样碎裂了。

英国的高利貸者和英国的貴族对于剝夺王权这一套艺术是很內行的，他們在國內使王朝变成立宪制下的廢物，在外国則使王朝变成一套空洞的礼仪。現在，激进派看到这种情景正在大为不平哩！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7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2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編者注

卡·馬克思
緬甸戰爭。——俄国問題。
——外交官的有趣信件¹⁹⁰

1853年7月15日星期五于倫敦

最近来自印度的一批陆邮傳來消息說，緬甸的全权代表拒絕了葛德文將軍提出的和約，葛德文將軍給他們24小時的時間讓他們再考慮一下，但10小時以後，這些緬甸人却開路了。沒有盡頭的緬甸戰爭的第三次爆發，看來有不可避免之勢¹⁹¹。

英國在東方進行的歷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緬甸這樣師出無名。這裡的情況和印度西北邊界的情況不同。在孟加拉和緬甸之間，隔着一條軍隊不能越過的山脈，緬甸根本不可能入侵印度。為了向緬甸開戰，印度統治者不得不從海路到緬甸去。認為緬甸人會從海上進攻印度的設想，和那種認為緬甸的淺水帆船能夠對抗東印度公司的軍艦的荒謬說法一樣可笑。也沒有任何事實能說明，美國佬有并吞勃固省的強烈意圖。因此，除了要給破落貴族找些營生，像一個英國作家所說的那樣，要“在東方修建一座固定的貴族收容所或東方的漢普敦宮¹⁹²”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在安赫斯特勳爵的唐·吉訶德式統治年代發動的第一次緬甸戰爭（1824—1826），雖然只有兩年多一點，但卻使印度國債增加1300萬英鎊。英國在東方的租借地上——新加坡、檳榔嶼和馬六甲——

所花的費用，不算兵餉，每年支出還超出收入 10 万多英鎊。1826 年從緬甸奪來的領土的代價則大得多。勃固這塊領土的開支更是負擔不起了。英國究竟為什麼在歐洲要避免最必要的戰爭，即對俄國的戰爭，而在亞洲却年復一年地投入最沒有道理的戰爭呢？英國在歐洲所以在採取胆怯的立場，是因為有國債逼着，而它在亞洲的戰費卻可以讓印度居民來負擔。但是我們會看到，孟加拉的鴉片帶來的收入即將停止，再加上又一次的緬甸戰爭的花費，必然會使印度財政發生嚴重危機，結果導致印度帝國的激烈的改革，其激烈程度，將超過英國議會里的改革家在演說里、在文章里所高唱的一切改革。

昨天，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質詢大臣們，問他們在收到俄國當局最近的周知照會之後，是否認為現在正是累亞德先生提出自己提案的合適時機。約翰·羅素勳爵回答說，在他看來，現在最好是不聽取累亞德先生的發言，因為在照會公布以後，談判比任何時候都重要。“這位可敬的議員認為現在談判已陷入僵局的意見是錯誤的”。約翰勳爵實際信奉的是阿伯丁的 *credo* [信條]，同時他又想用下面一段話來挽救 *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羅馬公民] 派¹⁹³ 的面子：

“我當然不會料到，像涅謝爾羅迭伯爵這樣有經驗有遠見的人會簽署這樣一個公然聲稱俄國政府要在聯合艦隊撤走的條件下才撤離多瑙河各國的文件。”

接着就進行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布萊特先生提議修改一下第九條，把“6 名非國王任命的公司董事應由以王國職員或公司職員的身分在印度居滿 10 年的人來擔任”里的“以王國職員或公司職員的身分”這些字刪去。這個修正案被通過了。這裡值得注意的

是，在历次关于印度問題的辯論中，沒有一个修正案曾經得到內閣的支持从而被議會通过，只有布萊特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例外。和平內閣現在正尽一切努力同和平派即曼彻斯特学派保持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協商]，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贊成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

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时期在外交部做高級办事員、被上司认为办外交条件不够的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如今正在尽量和涅謝尔罗迭伯爵互换照会和周知照会来过癮。昨天的“通报”刊登了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对俄国大臣的最近一次(第二次)周知照会性的函件的复信¹⁹⁴，复信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法国的温和态度，使它卸掉了一切責任，并且使它有权利希望：法国为保持东方的安宁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将不徒劳，俄国政府終将找到办法把自己的企求同苏丹的主权所产生的最高权利調和起来，对于那么多人都想得到解决的爭端将定出不使用武力而得到解决的原則。”

我在前面有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維萊尔先生当年曾向俄国建議，由各强国簽訂保障条約来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①。当时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对这项建議的答复是这样的：

“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賴以产生的原則，更不必用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

虽然如此，在1841年，俄国却同意参加这种不平常的条約¹⁹⁵，而且涅謝尔罗迭本人还曾經在6月20日(7月2日)的照会中引用过这个条約。为什么俄国会一反自己的傳統政策而同意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条約并不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保障”，可以說，它

① 見本卷第184—185頁。——編者注

是对付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穆罕默德-阿利統治的埃及——的工具；这个条約至少从俄国的最初意图来看相当于一个反法同盟。

我剛才收到今天的巴黎“新聞报”，上面刊登了已故的法国駐倫敦大使塞巴斯提昂尼將軍和路易-菲力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两人未曾公布的信件。这些信件清楚地說明了当时的外交关系。它們确凿地证明，1841年的条約最初絕对不是由俄国設計的，像涅謝尔罗迭在他的照会中所說的那樣，而恰好相反，它是法国和英国針对俄国而設計的，只是到后来它才被俄国变成了对付法国的工具。我在時間許可的範圍內从这些重要信件中譯出了下面几段：

I

“今天我和帕麦斯顿勋爵会談了两小时。这次談話使我非常滿意。我會向您保证这位勋爵是列奥波特国王的朋友，而且首先是英法結盟的有力的拥护者，在这方面我总算沒有弄錯。帕麦斯顿勋爵关于东方問題和我談了許多事情。他推測埃及帕沙已經決定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他希望英法两国以出动海軍为凭借，提出新的条件来威胁穆罕默德-阿利，希望我們两国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同时通知苏丹，說他們已收到本国宮廷的命令，讓他們向苏丹保证：在苏丹不首先采取軍事行动的条件下，英法將援助苏丹来抵禦埃及帕沙。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方針，英法两国都应当按这个方針办事。我們必須支持土耳其政府，不让埃及、叙利亞和克列西利亞这些省份脫离土耳其。俄国現在一心等待有利时机来向苏丹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却是奥斯曼帝国的末日。”

1835年6月12日于倫敦

II

“現在英国各党派一致認為必須好好注意俄国的行动。我觉得托利党在

这方面比輝格党坚决一些,至少是看起来比較坚决,它迫于形勢,不能抱比較克制的态度。”

1835年4月21日于倫敦

III

“英国人相信关于东方問題能够达成一个全欧協議。他們正渴望巴黎的答复。我不认为,我在某一問題上会違背国王同我数次談話当中所指出的那种行动方針。只要在原則上一达成協議,就可以根据情况来解决每个强国的行动方式和障地問題。俄国如果参加,它的行动自然应在海上,同法英两国一样;同时,为了防止由于舰队在黑海行动而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險,必須使俄国同意从波罗的海調来分舰队加入联合舰队。”

1838年7月6日于倫敦

IV

“英国并没有采纳俄国的建議¹⁹⁶,而且帕麦斯頓勋爵以政府的名义通知我,說英国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英国要忠于英法同盟。由于同样的感情,英国还同意让穆罕默德-阿利世袭埃及和部分叙利亚的領地,叙利亚这部分領土定出明确的边界,即从圣让得阿克到提韦里阿德湖。我們取得英国对这些建議的同意不是很容易的。我想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不会拒絕这样的協議。东方問題簡單化了,它将在列强的协助下,在保障奧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所有原則都被遵守了。欧洲的国际法規会推广到土耳其政府。俄国的**唯一保护权要取消**。我不明白法国的共和派为什么对穆罕默德-阿利那样有好感,为什么那样热烈地維護他的利益。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革命原則,——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导致推翻各国現存政府的行动。我认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上这种圈套。”

1839年10月3日于倫敦

V

“我从可靠处获悉,帕麦斯頓勋爵在最近一次內閣會議上做关于东方情况和英法政策分歧的报告,使用的語气非常温和,对两国同盟非常爱护,值得我們感謝。他甚至还建議他的所有同僚注意一种与我所指出的体系相类

似的體系。在報告最後，他在形式問題上作了讓步，並且對於採取堅決行動和必然引起糾紛的政策表示反對。”

1839年11月30日於倫敦

VI

“我拜會了帕麥斯頓勳爵，因為我想要從他那里聽到一點不久前他告訴我的那個問題的消息。他把涅謝爾羅迭先生給俄國代辦的信念給我聽了，信的內容和他告訴我的話完全相符。布隆諾夫先生的到來將向我們揭開聖彼得堡當局的陰謀。帕麥斯頓勳爵在外表上和實質上都做得極出色。他對法英兩國內閣恢復友好關係和繼續結盟非常高興。請您相信，我絲毫沒有誇大。我十分信任地告訴他，新情況完全符合法國一貫的希望。他自己也應該承認這點。埃斯特哈濟公爵給他的代辦寫信說，他對元帥^①非常滿意，又說，他現在正試圖使法國內閣回到與奧地利和解的道路上來，但他發現國王不肯讓步。我認為這一點完全可能。這些不現實的、有害無利的方案是會使國王着迷的。這一點我只是對您一個人談。我完全同意殿下您的看法，**俄國正陷入自己設下的圈套。**”

1839年12月12日於倫敦

VII

“今天早晨，我接到元帥發來的一封異乎尋常的急電。這是對我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中，我向他報告了我已經把布隆諾夫先生的新使團及其使命的消息在巴黎引起的印象告訴了帕麥斯頓勳爵。我把元帥急電的有關章節念給帕麥斯頓勳爵聽時，是 *textuellement*〔逐字逐句〕念的。但是，我在向帕麥斯頓勳爵就這個問題作聲明時，用了幾個表達同樣的思想但和元帥的原話不一樣的詞句。現在，元帥一方面相當客氣地向我保證我的話和他的原話並沒有任何分歧，同時又勸告我要加倍小心，努力在會談時復述他的電文的原話。從我這方面來看，我只能認為這件事不過是 *querelle allemande*〔字面的意義是：德國人的口角；轉義是：雞毛蒜皮之爭〕，不過是 *grec du*

① 法國總理大臣(1839—1840)蘇爾特。——編者注

Bas-Empire〔东羅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拜占庭人〕的精細，否則我就錯了…… 在外交上，元帅还是一位新手，因此我很担心他是否认为外交艺术就在于灵巧。事实上外交艺术仅在于真誠和直爽，他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

1839年12月18日于倫敦

VIII

“昨天帕麦斯頓勋爵和整个 Corps Diplomatique〔外交使团〕出席了午宴…… 他对我說，英国政府打算請求議会增加海軍撥款，但他补充說：他将建議自己的同僚，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用法国已加强海軍作为理由，因为即使用一点点暗示牵涉到盟邦都不是我們的目的。霍兰德勋爵和約翰·罗素勋爵为維持同盟所尽的努力是值得称贊的。”

1840年1月3日于倫敦

IX

“帕麦斯頓勋爵把預定提交各强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草案通知我…… 这不是五强国彼此之間的协定，而是这些国家同土耳其政府之間的协定…… 布隆諾夫先生反对这种形式〈請看一下涅謝尔罗迭7月2日的照会中关于俄国倡議的那段話吧！〉…… 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序言和八項条文。序言說得十分明确，原文大致是这样：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为維持欧洲和平所必需，因此五强国准备向它提供所要求的援助，并把它包括到欧洲国际合作的范圍中。在条文中安排了援助問題……

附言：我剛才获知，布隆諾夫和奈依曼对帕麦斯頓勋爵提出的协定极为不滿。”

1840年1月20日于倫敦

X

“我想，帕麦斯頓勋爵所拟的协定草案，将被俄奧两国代表拒絕。奈依曼先生的妄求特別激烈，我敢說，也是特別愚蠢。他泄漏了本国宮廷政策的机密。力图掌握住均势的梅特涅公爵公开地承认他痛恨俄国。他主观上希望布隆諾夫的建議将被无保留地接受，但他和布隆諾夫都失望了，因为他們碰

到帕麥斯頓勳爵這樣的真誠希望同法國結盟並努力同法國一致行動的大臣。”

1840年1月21日於倫敦

XI

“今天我和一位堅決主張同我國國王結盟的墨爾本勳爵會談很久。他再三請求我給他指出一種能使英法兩國的建議配合起來的辦法。

他對俄國意圖的看法和我們一樣，而在一個會議上他還對我說，**對維也納當局是不能相信的，因為它到最後總是成為俄國的忠誠的擁護者。**”

1840年1月24日於倫敦

XII

“東方情況最近出現的轉折使我很擔心……毫無疑問，俄國正使局勢演變為戰爭，奧地利利用一切辦法支持俄國……它們用‘法國在地中海上的計劃’把英國吓住了。阿爾及爾和穆罕默德-阿利——這是它們現在使用的兩個工具……我盡一切努力使布隆諾夫的建議遭到拒絕，但剛要達到目的，却被它們發覺了，現在奧地利把布隆諾夫的建議當作自己的建議拿了出來。這顯然是一個騙局。雖然如此，這裡仍然召開了內閣會議來討論奧地利建議。會上的主張有分歧。一方面是墨爾本勳爵，霍蘭德勳爵和拉布謝爾先生；另一方面是帕麥斯頓勳爵，約翰·羅素勳爵和敏托勳爵。其餘的內閣成員在這兩種觀點間搖擺不定。”

1840年1月27日於倫敦

XIII

“內閣暫時只討論了帕麥斯頓勳爵草案的一項。它決定，本協定應該是六強協定，而不應該是五〈強〉協定，像布隆諾夫先生所建議的那樣，這位先生對於保證本國的私利可以說不遺余力〈這是所謂關心奧斯曼帝國〉。土耳其政府不會同意它沒有參加擬定的協定。**如果它同五強簽訂了條約，它就置身於歐洲國際法的保護之下了。**”

1840年1月28日於倫敦

XIV

“难道国王的政策和利益都做了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报纸的任性妄为的牺牲品了吗？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冒一切困难持续十余年的体系注定要灭亡了。”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5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7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3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战争問題。——議會动态。——印度

1853年7月19日星期二于倫敦

沙皇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經結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綫不仅越过了普魯特河，而且推到了多瑙河沿岸。可是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們劝苏丹，就是說，他們强迫苏丹把战争看做和平。他們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們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談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內閣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內弟”^①匆忙間草拟的。他們希望沙皇开恩，从这些 *embarras de richesses* [財宝多得难以挑选的宝庫] 中选择一個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魯安·德·路易斯在对涅謝尔罗迭伯爵的照会（第二个照会）的答复（第二次答复）¹⁹⁷ 中，极力证明“首先采取示威行动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像人們把骨头扔給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許多照会，唯一的目的是讓他們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贏得時間。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鉤。他們受了屈辱还嫌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些照会加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上最爱好和平的評語，例如，“帝国报”¹⁹³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德·拉·格隆尼埃尔先生署名，然而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仔细校閱的。这篇文章认为俄国有权提出“不在普魯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談判”的不客气的要求。文章几乎把涅謝尔罗迭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做“謀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涅謝尔罗迭伯爵現在談的只是道义保证，并且宣布道义保证只应暂时地由物质保证来代替；由此可見，他是直接要求举行談判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外交途徑已經无能为力了。”

“国民議会报”（这是巴黎的“俄国日报”）以开玩笑的口气祝賀“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无故吵嚷表示遺憾。

英国报纸則完全失去了自制。

“沙皇根本不能理解西方列强对他表示的礼貌……他在同其他列强进行談判的时候在态度上做不到有礼貌。”

上面是“晨报”所說的話。“晨邮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的内部 embarras [困难] 而大发脾气。

“仅仅由于狂妄任性而提出没有什么迫切性的要求，并且在这样做时又絲毫不考虑随时都有可能燃燒起来的欧洲的状况，那就是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輕率的毛病。”

“經濟学家”杂志上論述金融市場問題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現在人們从自己的切身經驗中看到：由于世界的〈即交易所的〉最深处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古怪脾气所左右，結果产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啊。”

但是，在 1848 年和 1849 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同 veau d'or [金牛犢] 本身却是紧挨在一起的。

然而苏丹^①的处境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困难和更复杂了。它的財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来反对沙皇,而是轉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受到发生宮廷政变的威胁,而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則有引起人民起义的危險。今天的报纸上登載了关于密謀杀害苏丹的消息,策划这个密謀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阿吉茲即位的老年土耳其党的穆斯林大学生¹⁹⁹。

昨天波門特勳爵和馬姆茲伯里勳爵在上院要求克拉倫登勳爵报告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經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克拉倫登勳爵只是簡短地报告說,英国贊同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照会,他以在最短期間一定向議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諾言为掩护,迴避作进一步的說明。当有人問到俄国人也攫取了处在他們的軍事占領制度下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一事是否屬实时,克拉倫登勳爵当然也是“避不作答”。“由于他是以前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²⁰⁰为根据的,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对此,波門特勳爵宣称,他觉得克拉倫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

約翰·罗素勳爵在回答乔·华姆斯萊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②的問題时說,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利領事^③綁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④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

① 阿卜杜-麦吉德。——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219 頁。——編者注

③ 韦克貝克尔。——編者注

④ 科斯塔。——編者注

关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約翰勛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問。到头来总是他沒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沒有在报纸上讀到諸君看来他可能或一定讀到的东西。

“科倫日报”²⁰¹ 在一封7月11日的維也納来信中援引了下面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的报告。

“舍基布-埃芬蒂已被派往士麦那去調查这个乱子的禍首，在这个乱子发生时哈克貝尔格先生遭到杀害。舍基布也得到了把奥地利籍或托斯卡納籍的流亡者引渡給奥地利的命令。美国代办布朗先生就这个問題同列施德-帕沙进行了談判，結果如何現在还不知道。我剛剛得知，杀死哈克貝尔格男爵的凶手已从駐士麦那的美国領事那里获得了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不受土耳其当局制裁。这一事实說明：美国打算干涉欧洲事务。另外还有一件不用怀疑的事：在波斯普魯斯海峡的土耳其舰队中有三艘美国軍舰，有一艘美国的‘坎伯兰号’巡航舰为土耳其政府带来了8000万披亚斯特。”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它們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計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①和領事的行为在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贊同，“一个英国人”^②在昨天的“晨报”上还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美国国旗，让“骯髒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現在我們就东方問題的实质做一个簡短的結論。沙皇的这样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滿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計劃——开辟一

① 英格拉哈姆。——編者注

② 阿·理查兹。——編者注

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一个一个地从奥斯曼帝国身上割下来，而且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看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侵入这个国家。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过分地提高自己的要求，以便到后来得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就止步，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 status quo [现状] 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反动政府的卑躬屈膝，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 1849 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生的纯粹的东方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 6 月 9 日到 7 月 14 日，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 220 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最近 3 个月的增长总和。

印度法案是否在议会全院委员会里通过，人们并不太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內閣的代表們現在正在設法否決一切修正案，並且同托利黨人一起投票反對自己在曼徹斯特學派中的同盟者。

印度的現狀可以用以下幾個事實來說明。設在英國的管理印度的機關要吞掉整個印度純收入的 3%，每年支付的內債利息和支付給東印度公司的股東的紅利占 14%，這兩項一共占 17%。除了這些每年由印度轉到英國的款項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約有 $\frac{2}{3}$ 即它的收入的 66% 作為軍事費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則不超過總收入的 2.75%，或者說，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 1%，在阿格拉占 7.75%，在旁遮普占 0.125%，在馬德拉斯占 0.5%，在孟買占 1%。這是東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數字。

另一方面，整個純收入中將近 $\frac{3}{5}$ 來自土地， $\frac{1}{7}$ 左右來自鴉片， $\frac{1}{9}$ 多來自鹽。這些收入來源一共占全部進項的 85%。

至於一些次要的收入和支出項目，只要談談在馬德拉斯管區還保留着的莫土爾法稅就夠了，這是一種向小店鋪、織機、羊、牛、各種行業等等征收的稅，每年有 5 萬英鎊左右，即約等於東印度大廈每年花在宴會上的費用。

收入的主要部分來自土地。由於近來關於印度土地占有制的各種類型問題大家已經寫得很多，並且也都通俗易懂，所以我在這個問題上只就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談幾點一般的意見。

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是英國人用命令實現的兩個性質相反的土地革命。一個是貴族性質的，另一個是民主性質的，一個是對英國大地主占有制的拙劣摹仿，另一個是對法國的農民占有制的拙劣摹仿。但是，這兩種制度都是貽害無窮的，都包含着極大的內在矛盾，都不是為了耕種土地的人民群眾的利益，也不是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從土地上徵稅的政府的

利益。

由于实行柴明达尔制度，孟加拉管区的居民立即被剥夺了自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让地方的包稅人即所謂柴明达尔得了这些权利。由于在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行了萊特瓦尔制度，本来有权利占有土地的地方貴族即米拉达尔和札吉达尔等等，都同老百姓一起，下降到小块土地掌管人的地位，为东印度公司的收稅官²⁰²耕种小块土地。說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們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交給政府。而印度的萊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农民的摹仿啊，他們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們必須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繳納不同数量的捐稅。最初的柴明达尔階級尽管曾經殘酷地和不受監督地掠夺过无权的、曾經是世代相承的土地掌管人群众，但是現在他們在东印度公司的压迫下也很快地退出了舞台，由商业投机者占据了他們的位置，現在，除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外，孟加拉的所有土地都由这些商业投机者掌握。这些投机者造成了一种柴明达尔制度的变种，叫做**帕特尼** [Patnee]。他們充当英国政府的中介人的角色并不滿足，他們还造成了一种叫做**帕特尼达尔**的“世襲”中介人階級，帕特尼达尔又設立了副帕特尼达尔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善的中介人的等級制度，这种等級制度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不幸的农民身上。至于在馬德拉斯和孟买的萊特，在他們中間实行的制度很快就变成了强迫耕种制度，土地失去了任何价值。

坎伯尔先生說：“在这里，土地本来可以像在孟加拉一样，因欠租而由收稅官卖掉，但是他們通常都不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誰也不願意买地。”²⁰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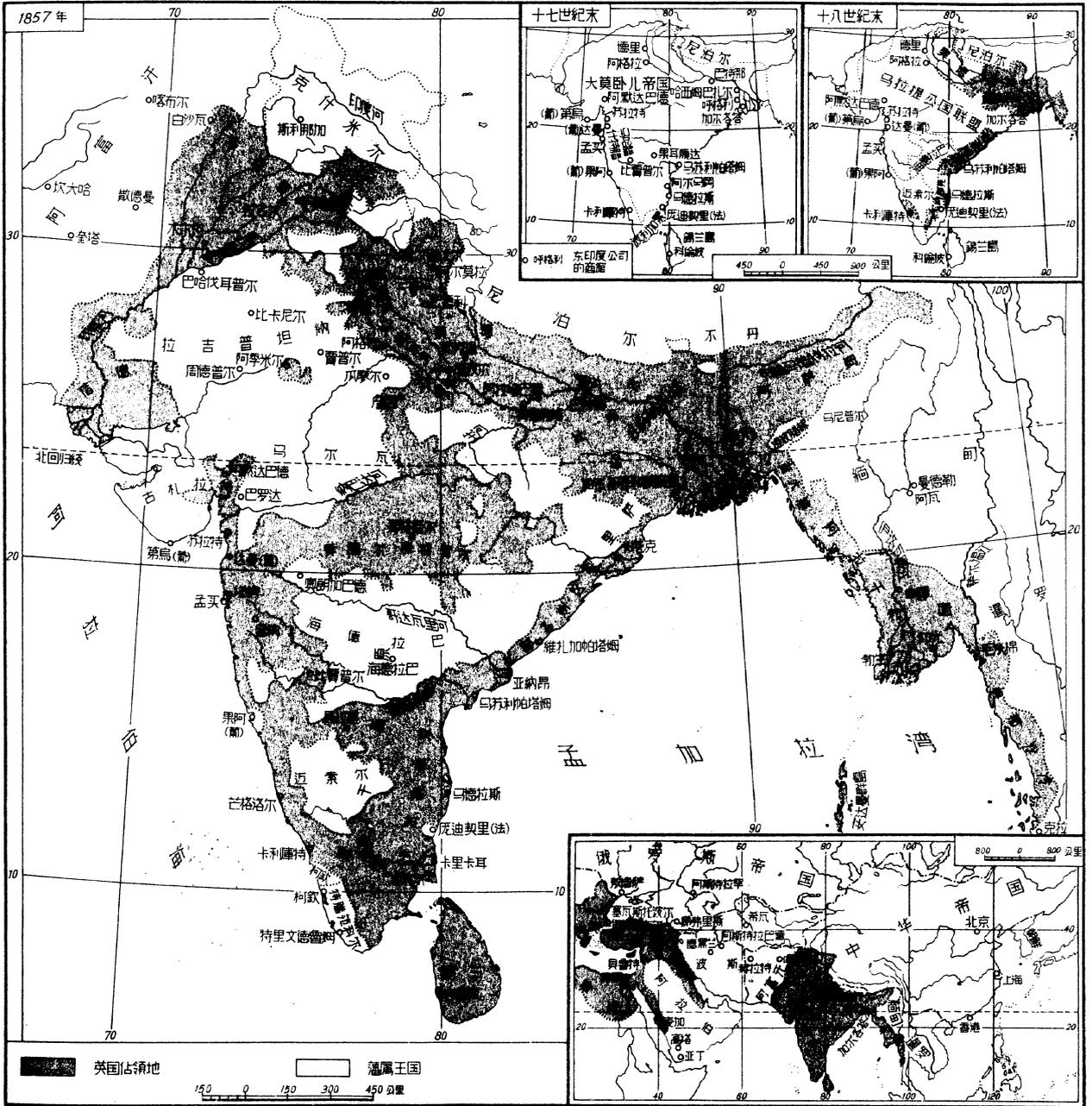
这样，在孟加拉我們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大地主占有制、爱尔兰的中介人制度、奥地利的使地主变成包税人的制度和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混合物。在馬德拉斯和孟买我們看到的，是法国式的农民私有者，但是，他們同时又是农奴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métayer]。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但是却享受不到这些制度的任何一項好处。萊特和法国农民一样，是私人高利貸者敲詐勒索的牺牲品，但是他們不如法国农民，他們对土地沒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沒有任何永久性权利。他們和农奴一样被强迫耕种土地，但是他們又不如农奴，他們在极端困苦时得不到保证。他們和分成制农民一样必須把自己的产品分給国家，但是国家对待他們却不像对待分成制农民那样，担負供給資金和农具的責任。無論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馬德拉斯和孟买的萊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萊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貧化。如果說他們事实上还没有下降到爱尔兰的貧佃农[cottiers]那样低的水平，那应该归功于印度的气候，因为南方国家的居民比北方国家居民的需要少些，而空想多些。

除了田賦以外，还应当看到盐稅。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掌握了盐业壟断权，它的盐的售价高于市場价格两倍。而这种事情却是发生在一个海洋、湖泊、山岳、甚至普通的土地都能大量提供这种产品的国家里。請看看阿耳比馬尔伯爵关于盐业壟断权实际实行情况的描写：

“大批发商以每蒙特^①不到4卢比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买进国内需要的

① 这是印度量顆粒体的单位，大小在各地区不一样，平均为12公斤左右。——編者注

英国占领印度图(十九世纪中叶)



大部分食盐；然后从达卡河西南数哩的地方弄来一些沙子掺在盐里，再以5至6卢比的价格把这种混合物卖给第二个（如果政府算第一个，那就是第三个）专卖商。后者再在盐里掺上土或灰。经过许多道这样的手續，盐从大城市运到乡村时，价格就提高到了8至10卢比，而杂质增加到25—40%。結果，居民买一蒙特食盐要支付21英鎊17先令2辨士到27英鎊6先令2辨士，換句話說，要比富裕一些的大不列顛居民付的价錢高29—35倍。”²⁰⁴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鴉片壟断权可以妨碍中国人过多地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鴉片壟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壟断权可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費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壟断权（印度的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是英国資产階級道德的典型。

柴明达尔制度和萊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稅，同印度的气候結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9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3年8月5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83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倫敦

在這篇文章里，我打算歸納一下我對印度問題的意見。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大莫臥兒的無限權力被他的總督們打倒，總督們的權力被馬拉提人²⁰⁵打倒，馬拉提人的權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這樣混戰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既然在一個國家里，不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着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既然一個社會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均勢上面，——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戰利品嗎？即使我們對印度斯坦過去的历史一點都不知道，難道這樣的一個巨大的不容爭辯的事實，即英國甚至現在仍然用印度出錢豢養的印度人軍隊來奴役印度這個事實，還不夠說明問題嗎？所以，印度本來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話，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历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历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历史，不過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征服者的历史，這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

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規律。不列顛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們。他們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統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么內容了。他們的建設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廢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設性的工作总算已經开始做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臥儿統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統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劍实现的这种統一，現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顛的教练班长組織訓練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 and 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 of 土著居民中間，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識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

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經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輪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時間計算縮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話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結在一起了。

大不列顛的各个統治階級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問題表示一点兴趣。貴族只是想降服它，財閥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現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們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們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內地的交通工具。現在他們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們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英国下院的委员会曾經证明：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6—8先令，而在普納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正餓死在大街上，无法从坎迪什运粮食来，因为泥路根本不能通行。”

铁路的敷設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庫，給铁路沿綫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 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現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的山

區，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積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多納兩倍的稅，多用 9—11 倍的人，多得 11—14 倍的利益。

鐵路可以縮減軍事機構的人員和開支。威廉堡司令沃倫上校曾在下院的特別委員會中作過如下的說明：

“如果不是像現在這樣，要用好些天甚至幾個星期才能從國內遙遠地區收到情報，而是用幾小時就能收到，如果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把命令連同軍隊和給養一同送到目的地，那末，這種重要情況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駐軍也可以駐紮在彼此的距离比現在更遠和更合衛生的地方，這樣就可以避免許多因病而死的損失。倉庫里的給養也用不着儲存得像現在這樣多，因而就能避免由於腐爛和天氣不好而造成的損失。軍隊的人數也將因效率提高而相應地減少。”

大家都知道，農村公社的自治制的組織和它們的經濟基礎已經被破壞了，但是，農村公社的最壞的一個特點，即社會分解為許多模樣相同而互不聯繫的原子的現象，却一直殘留着。農村公社的孤立狀態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狀態長久存在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一直處在那種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幾乎沒有來往，沒有希望社會進步的意向，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現在，既然不列顛人已經把農村公社的這種自給自足的惰性打破，鐵路就會使互相交際和交換的新要求得到滿足。此外，

“鐵路系統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將把其他國家的各種改進辦法和實際設備的知識帶給它所經過的每一個村莊，使這些地方能夠仿效，這樣就將使印度世代相傳的、領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業者既能夠充分顯示自己的才能，又能夠彌補自己的缺陷。”（查普曼著“印度的棉花和貿易”206）

我知道，英國的工業巨頭們之所以願意在印度修築鐵路，完全是為了要降低他們的工廠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價格。但是，

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識。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动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了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毅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确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²⁰⁷。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

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復興起來。這個國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薩爾梯柯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低階級里的人民 «sont plus fins et plus adroits que les italiens» [“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²⁰⁸]；這個國家里的人民的沉靜的高貴品格甚至抵消了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性；他們看來好像天生疲沓，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的軍官們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札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²⁰⁹。

要結束印度這個題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結論性的意見。

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資產階級自命為財產的捍衛者，但是難道曾經有什麼革命黨發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當資產階級在印度單純用貪污不能滿足自己的掠奪欲望的時候，難道不是都像大強盜克萊夫勳爵本人所說的那樣，採取凶惡的勒索手段嗎？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家公債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札^①所應得的股息嗎？當他們以保護“我們的神聖宗教”為口實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禁止宣

① 參看本卷注 187。——譯者注

傳基督教嗎？他們為了從朝拜奧里薩和孟加拉的神廟的香客身上榨取錢財，難道不是把札格納特廟²¹⁰里的慘殺和賣淫變成了一種職業嗎？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個大小和歐洲相仿、幅員 15 000 萬英畝的國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國家，英國工業的毀滅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令人吃驚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作用只是全部現存的生产制度所產生的有機的結果。這個生产是建立在資本的萬能統治上面的。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作為獨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這種集中對於世界市場的破壞性影響，不過是在大範圍內顯示目前正在每個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內在規律罷了。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7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8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840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政府在財政問題上的失敗。——
馬車夫。——愛爾蘭。——
俄國問題²¹¹

1853年7月29日星期五于倫敦

在昨天舉行的下院會議上，格萊斯頓先生提出了一項決議案，規定採取建立國家統一基金的措施，以支付未按格萊斯頓的財政計劃換回的南海公司證券。格萊斯頓先生提出這個決議案，就承認了自己的變更公債條款的計劃完全破產。除了這個不大的失敗外，在印度法案方面，內閣也遭到了頗為慘重的失敗。約翰·帕金頓爵士提出一項補充案，規定取消鹽業壟斷權，鹽的產銷在印度應該完全自由，只徵收消費稅或別的某種稅即可。補充案以 117 票對 107 票通過，儘管查理·伍德爵士、約翰·羅素勳爵、詹·霍格爵士、赫·馬多克爵士和麥先生（代表“泰晤士報”）拚命反對。政治寡頭在把督察委員會主席的薪俸增加到 5 000 英鎊的問題上得勝以後，現在打算把東印度公司的完美無瑕的董事們的薪俸從 300 英鎊增加到 1 000 英鎊，而把董事會主席和副主席的薪俸增加到 1 500 英鎊。顯然，政治寡頭以為，印度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同印度斯坦傳說中生長在喜馬拉雅山頂峰上的那棵神樹上的樹葉一樣，凡是碰到這樹葉的東西都會變成黃金；差別只在於，輕信的

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从印度居民的血液中榨取黄金。

在“一千零一夜”中，描写了一个中国皇帝，一天早晨起床以后，他走到窗旁欣赏阿拉丁的宫殿，但是除了一块空场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大吃一惊，便把宰相叫来问他是不是看到了宫殿。宰相举目四望，什么也看不出来，而且他比皇帝更吃惊。皇帝于是大怒，便命令卫士把阿拉丁抓起来。伦敦的公众在星期三早晨睡醒以后，也碰上了和传说中的中国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伦敦仿佛不再是一个城市了。在我们已经习惯地看到有什么东西的那些地方，竟然是而且继续是一块空场子。广场上的荒凉景象使你的眼睛很不习惯，而死一般的沉寂使你的耳朵很不习惯。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车夫闹革命了！**马车夫和他的车辆好像奇迹一样，从街上、从自己的停车站上、从火车站的广场上不见了。出租马车主和马车夫都起来反对关于马车夫的新法律，反对“群贤内阁”的这项伟大的、差不多是“稀世之珍”的法令。他们罢工了。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不列颠公众的道德感有时容易冲动，而且每隔六七年，他们的德性就由于想同坏事大干一场而变得难以抑制。现在，这种道德心和爱国心冲动的对象是**贫穷的马车夫**。据说，他们对西蒂的无人保护的太太们和大腹便便的商贾们的勒索应该结束了，车费应该从一英里1先令降低到6辨士。6辨士道德已经风靡一时。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一个对付马车夫的残酷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他们公众应尽的义务，同时把他们的车费、他们的“马车”、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道德都置于议会的立法控制之下。看来这是要强迫把马车夫变成不

列顯高尚品德的標本。現在的一代人至少要造就一批品德高尚、舍己為群的公民，否則就活不下去，為此就選中了馬車夫。“群賢內閣”是如此熱烈地希望實現自己的立法傑作，以致馬車夫管理法剛剛在議會一通過，而實施法律的必要條件連一部分都不具備的時候就生效了。誰也不關心讓倫敦的法官們的手頭有一份距離和定價的新規定和一覽表確切的副本；治安法官只是得到了解決馬車夫和公眾之間發生的一切糾紛的最一般的指示。於是，兩個星期以來，我們親眼看到了在法官面前不斷發生的六辨士漢普敦派大軍²¹²和“凶惡的”馬車夫之間激烈鬥爭的種種大場面；前者是為德性而戰，後者是為金錢而戰。馬車夫們天天受到訓誡，受到判決，被關進監牢。最後，他們確信，按照新的價目表，他們是無法向自己的主人繳納原來的租金的。馬車主和馬車夫齊集於 monsacer²¹³——霍耳博恩的國民大廳，在這裡作出了一項很厲害的決定，結果使倫敦大街上3天不見馬車夫的影子。他們已經得到了兩個東西：第一，以菲茨羅伊先生為代表的內閣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幾乎等於廢除；第二，東方問題、丹麥的 coup d'état〔政變〕、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亂流行病，——所有這一切都在堅持一英里6辨士的公德和堅持一英里12辨士的私利之間的大鬥爭面前消失了。

現在日程表上是“罷工”兩個字。這個星期罷工的有：北部煤區的5000名採煤工人，400—500名倫敦的軟木塞切削短工，約2000名為太晤士河上的各商業碼頭主扛活的工人；赫爾的警察也罷工了，西蒂的警察和首都的全體警察也作過這樣的嘗試，最後，在議會旁邊，在聖斯蒂凡小教堂里做工的泥水工人也罷工了。

“泰晤士報”驚嘆說：“世界成了勞動者的真正天堂，人值錢了！”在1849、1850、1851和1852這些年份里，商業不斷發展，工業

高漲达到了空前的規模，利潤不斷增加，但工資大體上沒有變動，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還保持在 1847 年危機時規定的更低的水平上。自從居民外流使人口減少，生活必需品漲價使人民的生活要求更迫切之後，罷工就爆發了，工資因此才有所增加。于是在“泰晤士報”看來，世界就成了工人的真正天堂。郎卡郡的工業大王們為了把天堂的條件降低到塵世的條件，便成立了一個協會，以便互相支持，共同反對人民群眾的要求。但是，資產階級用自己的聯合來對抗工人的聯合還嫌不夠，他們還要請法律干涉，而法律是他們自己制定的。這一點將怎樣實現，可以從自由主義的、討人喜愛的帕麥斯頓的機關報“晨郵報”的下面一段惡狠狠的話里得出結論。

“如果說在種種無道德的表現中有特別值得用鐵腕加以嚴懲的東西，那末這就是罷工的办法…… 必須迅速嚴懲這些聯盟的領導人和首腦。即使這些人受到赤身抽打的懲罰，也不是破壞出賣勞動的自由…… 硬說這是侵犯了出賣勞動的自由，那是胡說。只要供應勞動市場的人拒絕採取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那就可以允許他們自行與僱主談判受僱的條件。”

在以環境為轉移的一定範圍內，可以讓勞動者認為自己是生產上的自由締約人，認為自己與老板的合同是依照雙方的協議簽訂的。但是，只要他們一越出這些範圍，那就要公開強迫他們在議會這個統治階級對付人民的常設聯合委員會所規定的條件下工作。帕麥斯頓的機關報思想的深刻和它的智慧在它昨天的發現中暴露得很有趣。根據它的這個發現，“在這個國家的所有階級中，生活最困難的是上流社會中的窮人”，即那些乘僱傭馬車而不是乘自己的“轎式馬車”出行的窮貴族。

有人要我們相信，整個世界，特別是愛爾蘭，由於飢荒和居民的大量出境，成了勞動者的真正天堂。如果說愛爾蘭的工資真的

那么高，为什么爱尔兰的劳动者成批地搬到英国，定居在“池塘”²¹⁴这一边呢？而他們从前在田間工作完了之后每次都是要回去的。既然爱尔兰人民生活的社会条件已大大改善，那末从 1847 年起，特别是从 1851 年起，在爱尔兰人民中間精神病发展得这样厉害又当作何解釋呢？請看下列摘自“爱尔兰地方刑事犯疯人病院和私办疯人病院第六次报告”的統計数字：

	收容病人 总 数	其 男	中 女
1851 年.....	2 584	1 301	1 283
1852 年.....	2 662	1 276	1 386
1853 年 3 月.....	2 870	1 447	1 423

这就是有名的綏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²¹⁵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 90 个疯人的那个国家！

由厄內斯特·琼斯恢复起来的宪章派的宣傳鼓动正在大力开展；本月 30 日将在肯宁頓广场露天举行倫敦宪章派的大規模集会，这恰好就是 1848 年 4 月 10 日举行的那次著名的大会²¹⁶的地方。

科貝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关于工厂工作日的法案，同时暗示他打算在下届議會开始时再把它提出来。

至于英国財政和整个英国的前景，本月 27 日“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論中充分证实了我所作的預測，社論写道：

“我国商业界充滿足以引起**不安**的丧失信心的因素，这可以說是在历史上少有的現象。我們有意使用这个**綏和**的字眼。如果在谷物法廢除以前和一般采取貿易自由政策以前的任何时期，我們就会使用比較强烈的說法——**严重的惊慌失措**。这些因素是：第一、預料中的歉收，第二、銀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外流，第三、战争很有可能发生。”

1848 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現在由于丹麦国王完成了

coup d'état [政变] 而被廢除了。国家得到的是一个具有俄国精神的宪法,并且由于廢除了 Lex Regia [王位法],丹麦便淪为俄国的一省²¹⁷。我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評述这个国家的現狀^①。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4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說来,人們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5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这是1828年11月28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給涅謝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說的話,而涅謝尔罗迭伯爵現在正是按照这条規則办事。俄国继軍事占領多瑙河各公国以后进而攫取了这些国家的民政管理机构,派遣一支又一支的軍隊到貝薩拉比亚和克里木去,同时又向奥地利暗示,可能接受它的調停,而对波拿巴則表示,他的建議可能得到沙皇良好的反应。对于巴黎和倫敦的大臣們,則描繪了这样一幅可喜的前景:尼古拉終究会慈悲为怀地接受他們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宮廷正像苏丹王后一样,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不知那位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寬宏大量的主宰要把他的手帕拋給她們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他們如此緊張地期待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奥地利也好,普魯士也好,都不應該干涉他和土耳其的冲突,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和土耳其进行談判。显然,正是为了同土耳其順利进行这些談判,他才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在他声明列强不應該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法、英、奥、普的代表們却在維也納會議上消磨時間,細細斟酌解决东方問題的方案,而且,在这种滑稽的会談中,既沒有土

① 見本卷第269—270頁。——編者注

耳其大使參加，也沒有俄國大使參加。7月8日，蘇丹指定主戰派組織政府，以便擺脫軍事停戰狀態，但是，雷德克利夫勳爵却迫使他在當天晚上讓這個內閣辭職。這使蘇丹發了慌，以致打算派一位奧地利信使到聖彼得堡詢問沙皇是否想恢復直接談判。要等這位信使回來以後，再根據他帶回的答復決定列施德-帕沙本人是否作聖彼得堡之行。列施德-帕沙應該把新照會草案從聖彼得堡寄到君士坦丁堡；然後，這些新照會再寄回聖彼得堡，而且在最後的答復從聖彼得堡轉回君士坦丁堡以前，將不作任何決定。那時，就是第5個月了，任何艦隊都將不能進入黑海。沙皇就可以悠游自在地在多瑙河各公國過冬，在那裡，他的開支可以用債券來支付，這些債券從1820年他幾度占領這些國家時起一直流通到今天。

大家知道，根據俄國的堅決要求，塞爾維亞大臣加腊沙寧被解職。俄國由於這第一次的勝利而增加了勇氣，現在又要求免除全體反俄軍官的職務。而且還打算用這個辦法來對待在位的亞歷山大公爵，以使用米哈伊爾·奧布廉諾維奇公爵這個俄國和俄國利益的馴服工具來替換他。亞歷山大公爵為了竭力避免這一災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於奧地利的影響），于是就反對蘇丹，並且宣布他願意嚴守中立。巴黎的“新聞報”用下面的話描寫了俄國在塞爾維亞的陰謀：

“大家都知道，俄國領事館所在地沃尔肖伐是一個衰敗的村莊，這裡沒有一個俄國的臣民，它位於塞爾維亞居民最稠密的地方，這裡的俄國領事館過着非常可憐的生活，但仍然不失為目前俄國宣傳的中心。法院的偵察斷定，俄國既參與了1840年布來洛夫案件，也參與了1850年約安·卢特措案件以及不久前逮捕14名俄國軍官的案件（這個案件成了加腊沙寧政府辭職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緬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職君士坦丁堡期間，曾通過自己的代理人在布魯薩和士麥那進行了陰謀活動，在薩羅尼加、阿爾巴尼亞和希臘

也进行了这样的活动。”

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傳統的守恒性。在現在的东方問題上，沒有一次糾紛，沒有一次談判，沒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帶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記。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凱納吉条約为依据，虽然这项条約並沒有規定沙皇对他的教友实行保护，而仅仅是給予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呼吁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利。列施德-帕沙在他 14 日的照会中反駁沙皇的时候，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 1774 年簽訂这个条約的时候，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約，就像在 1853 年这个条約被它曲解的这样。当时奥地利駐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 1774 年向本国宫廷上书說：

“今后无論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特別准备就能从自己的港口派出登陆队到黑海去对付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实行同正教教会的首腦們事先共同策划的阴谋，而苏丹除了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宮廷，逃到亚洲复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給比較有經驗的統治者以外，別无其他办法。首都一被占領，俄国的統治在恐怖手段和正教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島、小亚細亚和直到亚得利亚海岸的整个希腊的沿海地区。俄国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将使俄国强大到这种程度，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偉业的一切奇迹都为之逊色。”

同現在一样，早在 1774 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爾維亞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擴張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妒忌的。其原因在

于：只要奧斯曼帝國的其餘部分落入俄國之手，那末奧地利合併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等地（這在其他的情況下對俄國來說非同小可），對俄國來說無所謂。須知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和正教徒；前者是會被容許在這裡定居的，而後者考慮到鄰近東方俄羅斯帝國，會毫不延遲地搬到那裡去；如果他們仍留在原處，那末他們對於奧地利的不信任將成為長時期混亂的原因。因此，擴張領土而不加強內部，不僅不會鞏固奧皇的權力，反而會使它削弱下去。”

政治家們要揭示俄國的整個傳統政策，特別是要揭示它對君士坦丁堡的意圖的時候，通常援引彼得一世遺囑²¹⁸。但是他們還可以追溯更遠的歷史。遠在八百多年以前，當時還是多神教的俄羅斯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召集群臣宣布說，“由俄羅斯來統治的不僅應該有保加利亞，而且還應該有歐洲的希臘帝國，以及波希米亞和匈牙利”。斯維亞托斯拉夫於公元 968 年占領了錫利斯特里亞並且進窺君士坦丁堡，像尼古拉在 1828 年所做的那樣。在俄羅斯帝國建立後不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從諾夫哥羅德遷到基輔，以便更靠近拜占庭。在十一世紀，基輔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因此，人們稱它為**第二個君士坦丁堡**；這個稱呼反映了俄國幾世紀的願望。俄國的宗教和文明是起源於拜占庭，因此，俄國那時想使像現在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處於沒落狀態的拜占庭帝國從屬於自己，比起德皇想占領羅馬和意大利要自然得多。所以，俄國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單一性，是由它的歷史的過去、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是由於它必需在阿希佩拉哥群島（像在波羅的海一樣）有四通八達的港灣，以便在歐洲保持領導地位這種情況決定的。但是，俄國用來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那些傳統手法，遠遠值不得歐洲的政治家們那樣贊揚。這一傳統政策的成功證明了西方列強的軟弱，而它的單一性和公式化則證明了俄國本身的野蠻。如果法國

想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黎塞留遺教或查理大帝敕令²¹⁹的基础上，那誰會不覺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細致地、巧妙地、熟練地和靈活地找到歐洲的君主、大臣和宮廷的弱點，儘管它非常高明，但是，由於它不了解西歐各國人民自己的歷史運動，所以它總是走進死胡同。利文公爵指望善良的阿伯丁對沙皇讓步，顯示出他對阿伯丁性格的了解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在1831年展開的議會改革運動的前夕預言托利黨將繼續執政，這樣他對英國人民的判斷就根本錯誤了。波茨措-迪-博爾哥伯爵曾經對查理十世作出過完全正確的判斷，但是他慫恿自己的“神聖君王”同這位國王在他被趕出法國的前夕舉行瓜分歐洲的談判，這樣他對法國人民的估計就完全錯誤了。俄国的政策以其傳統的詭計、奸詐、狡猾可以把歐洲的宮廷（它們自己也只不過是過去的傳統罷了）捉進自己的圈套，但是，它在對付革命人民的時候却是完全無力的。

在貝魯特，美國人從奧地利的鷹爪里又搶走了一個匈牙利人。美國干涉歐洲事務正是從東方問題開始，這是令人高興的。除了君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貿易和軍事意義外，還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歷史原因，使占有這個城市的問題成了東西方之間經常激烈爭執的主題。而美國就是西方最年輕最有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的城市，是東方的羅馬。在古代希臘皇帝統治時代，西方的文明和東方的野蠻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土耳其人統治時代，東方的野蠻和西方的文明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致使這個神權帝國的 center 成了歐洲進步的嚴重障礙。當希臘的皇帝們被伊康尼蘇丹²²⁰排擠出去的時候，古老的拜占庭帝國的精神卻不管這種改朝換代的變化而繼續存在，而蘇丹如果被沙皇所取代，Bas-

Empire〔東羅馬帝國〕也將再生。到那個時候，它會產生比在古代皇帝統治下更壞的影響，會成為比在蘇丹時代更富有侵略性的力量。沙皇將為拜占庭文明提供支持，正像組成東羅馬帝國皇帝們的武裝力量的 *corps de garde*〔近衛軍〕的俄國冒險家們在幾世紀中為這些皇帝們提供了支持一樣。西歐和俄國爭奪君士坦丁堡的鬥爭包含着這樣一個問題：是拜占庭主義在西方文明面前衰落下去呢，還是它們之間的對抗將採取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厲害、更帶有暴力性質的形式而再度尖銳化起來。君士坦丁堡是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西方文明好比太陽，不經過這道橋就不能繞過世界；而不同俄國進行鬥爭也就不能通過這道橋。君士坦丁堡在蘇丹的手裡只不過是暫時歸他占有留待革命來取的抵押品，而西歐現在的這些統治者們——他們認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也只能使問題懸而不決，一直到俄國面對着他的真正的敵人——革命為止。推翻西羅馬的革命也將戰勝東羅馬的邪惡勢力。

讀過我在大約兩年前為“論壇報”寫的關於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文章²²¹ 並且想對革命有一個具體的認識的讀者們，不妨看一看現在陳列在紐約水晶宮的哈森克萊維爾先生的繪畫；這幅畫描繪了 1848 年工人向杜塞爾多夫市政當局遞交請願書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東西，杰出的藝術家以豐富的戲劇性和生命力再現出來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7 月 29 日

載於 1853 年 8 月 1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844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在下院中。——報刊論東方問題。
——沙皇宣言。——丹麥

1853年8月2日星期二于倫敦

倫敦街頭又出現了馬車夫。在上星期六，馬車夫放棄了他們的消極反抗方式。同時，議會正在繼續設法廢除本屆會議的偉大法令，逐步取消馬車夫和下院之間的一切 *casus belli* [宣戰的理由]①。

在內閣提出的關於提高董事會董事、主席和副主席薪金的提案被否決以後，在把董事們的薪金減低到 900 英鎊、而把主席和副主席的薪金減低到 1 000 英鎊以後，在星期五，印度法案在最後一讀中通過了。上星期五舉行的東印度公司股東會特別會議，氣氛非常低沉。無精打彩的叫喊和演說，明顯地暴露了可敬的所有主—股東們的憂慮心情，原來他們已經感覺到：印度帝國曾經是他們的財產的那種美好時代，看來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有一位可敬的紳士談到他打算把一項決議案提交下院審查，該決議案否認目前的法案，並以股東和董事們的名義宣布他們要拒絕充當內閣的這一措施給他們指定的那種角色。可敬的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和董事們

① 見本卷第 254—255 頁。——編者注

罢工了！可不是嗎，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場面呵！英国下院在取消了公司盐业壟断权以后，就实现了对印度財政进行直接管理的第一步。

昨天，在議會全院委员会會議上通过了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海軍志願兵的法案。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有 1 万人的兵团，他們每年要受 4 个星期防卫不列顛海岸的軍事訓練。正像在民軍里服役一样，这些志願兵将領到为数 6 英鎊的特別津貼。他們的服役期限将有一定的限制，和平时期为 5 年，战争危險时期为 6 年。在服役期間，他們将按一等水兵的待遇領取軍餉，而在最后一年当中，每天还能領到两个辨士的补助金。在和平时期，不得使他們远离海岸 50 哩^①，在战争危險时期，不得使他們远离 100 哩。

昨天晚上，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也在三讀中通过。增加了一项有利于租佃者的重要修正条款，即禁止地主强占和出卖租佃者的青苗。

科布頓先生发表了一个論緬甸战争的起因的小册子²²²。

在法国，害怕歉收的情緒非常强烈，以致路易·波拿巴政府同巴黎面包店主公会已經商定：在 8 月上半月把面包价格稍微降低一些，尽管 Halle aux blés [粮食市場(巴黎)] 上的面粉价格在不断提高。面包店主以后必然会提高价格而得到补偿。

“經濟学家”周刊写道：“这是法国政府的阴谋，其目的是想用欺騙手段使人民相信，收成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坏。”

在报刊的各栏上，天天都有大量矛盾百出的关于东方問題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維也納和柏林，其中一部分是俄国的代理人制

① 1 哩等于 5.56 公里。——編者注

造出来的，其目的是迷惑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使他们对俄国的行动发生错觉；还有一部分是按照巴黎的特别定单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有利于交易所的投机。可是，“晨邮报”上发表的一段话却值得注意——这里要假设这家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并不是常常滥用这类威胁，并不是今天采取，第二天就收回。

“不是8月10日以前通过和平方式完全解决问题，就是联合舰队奉命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也可能开往黑海。有力的行动将代替耐心的谈判，对危险的恐惧将不再有碍于采取可能成为维护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如果沙皇接受现在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从多瑙河各公国立即撤兵将成为首要的条件。”

接着，“晨邮报”断言：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①已在7月24日就最后通牒的各点达成协议，并且已经立即送往圣彼得堡²²³。可是，这种说法是同克拉伦登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发表的声明相矛盾的，他们所提到的只是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照会；同时，这种说法根本不为法国报刊所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至少意味着：在内阁中，帕麦斯顿派已向善良的阿伯丁提出了最后通牒，他必须在8月10日提出答复。

看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已被认为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从“国民报”²²⁴获悉，现在又要在柏林举行会议。为了保证这一会议有必要的讨论“材料”，俄皇就开恩作了一项声明：他虽然非常愿意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这种占领是确保他的教友们的利益的物质保障，但是，他现在仍然不得不把这些公国把持在手里——这是补偿目前占领这些公国的支出所需的保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他的告示中曾宣布，俄国决不干涉各公国的合法当局的

① 威斯特摩兰、布尔克奈、布奥尔-绍恩施坦和阿尔宁。——编者注

特权，但沙皇却頒布命令禁止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国君向土耳其政府繳納任何貢品或同它保持任何关系。瓦拉几亞的国君接到这一指令后，就告訴俄国駐布加勒斯特的領事說，他已給苏丹送去了貢款，領事回答說：c'est de l'argent perdu [这是丢掉了的錢]；这就是說：国君需要再給俄国送去这一笔錢。

昨天的“祖国报”报道：莫尔达維亞大臣中間最有权势的三个大臣，已由国君特別許可，从雅西启程到彼得堡，向沙皇报告俄国士兵的行为，訴說他們違背对土耳其政府許下的庄严諾言，在多瑙河流域各个省份里胡作非为，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一样，并且在那里干出了一系列敲詐勒索的勾当。当然，对俄国人來說，說他們要通过在各公国贏得声誉的办法而在那里追求某种宣傳目的，这样的罪名是加不上的。

俄国在繼續武装自己，同时像过去一样公开地宣傳这一点。“汉堡消息报”²²⁵ 登載了俄皇于7月23日在彼得堡頒布的下列宣言。

“受命于天尼古拉一世，茲根据我在1834年8月1日(13日)頒布的规定每年在国家部分地区招募新兵的宣言，命令如下：

1. 为了补充陆軍和海軍，应在帝国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实行第十次招募，招募人数应与1852年在西部地区各个省份里曾經招募的人数相等，即从每1000人中間招募7名新兵。

2. 除此以外，还应在东部地区各个省份从每1000人中間招募3名新兵，补入这一地区在过去的招募中比西部地区少招募的6个名額中。

3. 根据1845年10月31日和1846年9月26日发表的宣言，普斯科夫省、維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曾經因为歉收而免于提供新兵，而1853年，应在这三个省份从每1000人中間招募3名新兵。从維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的犹太人中間，同其他各个省份的犹太人一样，应从每1000人中招募10名新兵。

4. 新兵的招募工作，从 11 月 1 日开始，到 12 月 1 日結束。

尼古拉一世公布于圣彼得堡”

除宣言外，还发布两项命令，规定了进行这一新的非常的新兵招募工作的细则。根据第二项命令的规定，除了在上述各个省份里招募新兵以外，也将在基辅省、波多尔斯科省、沃伦省、明斯克省、格罗德诺省、维尔纳省和柯夫诺省的独户农²²⁶和城市居民中间进行招募。

“汉堡消息报”的通讯员报道：

“帝国内部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武装。第四步兵军的各个后备营集中在土伦附近。我们从给一支部队的命令中获悉：近卫军和掷弹兵仍然驻扎在离加契纳不远的红村一带和普多斯齐附近。这两个数达 10 万人的军的野外演习在继续进行。”

斯德哥尔摩的“邮报”在 7 月 16 日的一号中报道：俄皇已颁布了一项命令，要装备由 20 艘战列舰和 15 艘巡航舰组成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供给它储备物资。7 月 29 日的“科伦日报”写道：

“丹麦-瑞典舰队在结束演习以前就提前返航的原因是：司令官接到了一项立即把军舰开到波罗的海修理的命令。”

今天，法国各家报纸和“纪事晨报”都登载了维也纳 7 月 3 日的电讯，该电讯报道：美国表示愿意给土耳其政府以金钱帮助和有效支持。

俄国的威胁性立场再加上由于预计到歉收而引起的不安在大陆公众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家”周刊的下面一段话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沙皇又在欧洲惹起了革命的倾向和希望；我们读到在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法国发生密谋事件的消息。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害怕新的革命混乱更甚于害怕政府的宣战。”

目前，霍亂病在哥本哈根鬧得很厲害，已有4000人傳染上了，至少有15000人要求發給離開丹麥首都的護照；一位消息靈通的因害怕得霍亂病而剛剛到達倫敦的丹麥人士告訴我：關於王位繼承制度的國王詔書之所以被通過，主要是由於埃德爾黨²²⁷的大部分人在表決時棄權，因為這些人希望用自己的消極態度來防止發生危機。可是，他們所害怕的危機還是以欽定憲法的形式搞到了他們頭上，該憲法的矛頭首先是針對着“農民之友”²²⁸——一個過去曾經支持丹麥國王而使他在王位繼承問題上取得成就的政黨。因為我打算另寫專文^①來談這個問題，在這裡就只指出一點：丹麥政府已把同列強就它的建議而交換的照會提交聯合議會（上院會同下院）審查。

英國和俄國的照會是這些文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特別在目前更是如此。“沉默寡言的”克拉倫登不僅贊同國王詔書，而且明顯地向丹麥政府暗示：如果保存原來的、有普選權而沒有上院的民主憲法，那末丹麥政府現在就不會繼續存在下去了。因此，沉默寡言的克拉倫登才積極主動地鼓勵和煽動在丹麥——為了俄國的利益——實行 coup d'état [政變]。涅謝爾羅迭伯爵致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的俄國照會，在簡述了1852年5月8日簽訂的倫敦條約²²⁹的條文以後，用下面的話作了結束：

“5月8日的條約並沒有正式規定廢除 Lex Regia [王位法]；這樣的條文在各個獨立國家締結的條約中恐怕是不可能有的。它將違反外交慣例，尤其是不尊重丹麥國王應有的主權和尊嚴。可是，當客觀情況要求各個強國同意把領土歸還丹麥國王而不拒絕王位法所提出的條件時，當它們答應予以支持時，自然不得不讓國王陛下選擇最適當的手段來通過立法的辦法實現這

① 見本卷第273—274頁。——編者注

一目的。陛下利用国王特权,表示打算为一切归他管轄的領土建立一种王位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如果弗雷德里克三世的父系后裔断絕了,那末,从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中产生的要求将被认为一律无效,并应召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亲王即位。丹麦国王将由他和他同路易莎·黑森公主結婚所生的男性后裔担任。这就是1852年10月4日的国王詔书中所闡明的条件。这些条件所反映的观点,至少对帝国政府来說,已成了目前談判中的基础。从帝国当局的观点出发,它們是一个統一的整体,不能分割开来,因为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样,廢除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不仅是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亲王及其继承者得以被召即位的那种規定的自然結果和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而且是条約的序言中所規定的原則的自然結果和必需的条件,这项原則就是:保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可靠的手段,是在一切目前归丹麦管轄的領土上实行只有父系的代表才能继承王位的規定…… 在条約的 II 条中,各强国宣布:它們永远承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 它們明确地宣布:它們打算用共同的努力阻止去年已不幸发生过的那种糾紛的重演…… 停止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亲王的父系继承王位,无疑就会恢复皇帝陛下在当时为了亲王而拒絕了的那种可能的权利。可是,在这方面有意賦予丹麦国王的主动性,以及三大强国在上述情况下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可能实现),会保护丹麦爱国者,防止任何人实现目前只是在他們的想像中存在的那种虛榮心和野心。”

由此可見,俄国是这样示意的:5月8日的条約所規定的对王位法的暂时廢除,应当解釋为永久廢除,而俄皇对自己权利的永久放棄只不过是暂时放棄,但丹麦的爱国者今后可以指望欧洲列强来保卫本国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們难道沒有看見过,在締結了1841年的条約以后,土耳其的神圣不可侵犯究竟是怎样受到保护的嗎?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8月2日

載于1853年8月16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847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廣告稅。——俄國的行動。——
 丹麥。——合眾國在歐洲²³⁰

1853年8月5日星期五于倫敦

廢除廣告稅的法令昨晚獲國王批准，今日生效。許多晨報已公布降低了的各類廣告價目。

倫敦船塢的工人宣布罷工。公司正努力招收新工人。人們估計老工人和新僱的工人之間會發生衝突。

俄皇找到了把持多瑙河各公國的新借口。他今後需要這兩個公國已經不是由於它們是他的精神要求的物質保障，也不是為了補償占領它們的費用，——不，他現在要把持它們是由於“內部混亂”，是根據巴爾塔利曼尼條約²³¹的條款。由於俄國人確實在各公國鬧得天翻地覆，因此內部混亂的存在是不能否認的。在8月2日上院會議上，克拉倫登勳爵證實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寫的事，即俄國人禁止公國的國君向君士坦丁堡進獻他們應繳納的貢品，根本禁止他們與土耳其繼續保持關係^①。克拉倫登勳爵特別莊嚴並且鄭重其事地聲明，他

“將通過今晚離開倫敦的信使，命令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要求俄國當

① 見本卷第267頁。——編者注

局做出解釋，英國是有權這樣要求的。”

當克拉倫登派遣急使到聖彼得堡要求解釋時，“祖國報”在今天這一號上登載了上月20日從雅西發出的消息：俄國人正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構築工事；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國君已置於由三人組成的俄國監督機關的監視之下；正向居民征收實物軍稅；某些倔強的大臣被抓到俄國軍隊里去了。這就是哥爾查科夫公爵的告示所作的“解釋”，這項告示說，

“神聖君王無意改變該國的政權機構，他的軍隊的駐紮不會使居民承擔任何新的捐稅和負擔”。

在同一天舉行的下院會議上，約翰·羅素勳爵在回答達德利·斯圖亞特勳爵的問題時聲稱，四大強國已經在維也納商定共同向沙皇提出一項俄國和土耳其都“可以接受的”建議，這一建議已送往聖彼得堡。約·羅素勳爵在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時說：

“雖然這個建議最初出自法國政府，但實際上是奧地利的。”

這個出身法國但又入了奧地利籍的建議看來是很成問題的，“新普魯士報”²³² 在一封維也納來信中對此作了如下說明：

“俄奧兩國當局已暗中約定不允許英國影響在東方占優勢。”

“一個英國人”^① 就聯合內閣的解釋指出：這個內閣是“在屈辱中表示偉大，在無力中表示威武，在沉默中表示雄辯”。

一旦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俄國化，加里西亞、匈牙利和特蘭西瓦尼亞都會成為俄國的《enclaves》[“嵌入別國領土的屬地”]。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談過彼得堡銀行的“秘密金庫”，——

① 阿·理查茲。——編者注

即用来保证为数 3 倍的紙币流通的金屬儲备^①。現在俄国陆軍大臣^②申請將該儲备的一部分撥归陆軍部金庫。由于財政大臣^③反对，皇帝便亲自出馬，向正教行政总署——教会财产的維護者商借 6 000 万卢布的貸款。沙皇遭到了錢財困难，而他的士兵的健康也遭受着威胁。据可靠消息：占領多瑙河各公国的士兵在进軍期間飽受酷热之苦，病者极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許多民房都成了病院。

昨天“泰晤士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計劃，但同时又企图掩盖俄国在丹麦的阴谋。“泰晤士报”甚至在假装同它的神圣君王反目时，也为他效劳。

“泰晤士报”說：“我們不相信俄国当局已使哥本哈根宮廷屈服于自己的影响的說法，我們认为，丹麦政府在俄国的影响下正采取廢除或刪削 1849 年宪法的步驟这种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誠然，丹麦政府公布了关于**略事修改現行宪法**的法案或法案初稿，但这一法案将在两院重新开会时提交給它們討論和表决；它决不会通过国王的权力付諸实施。”

把立法會議分割为 4 个独立的封建的省議會，廢除立法會議的自行决定課稅問題的权利，廢除普选权，取消出版自由，恢复閉塞的行会用以代替自由竞争，剝夺所有官員即丹麦唯一有教养階級不經国王特許而可以被选入代議机关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叫做“对宪法的略事修改”！如此說来，也可以把奴役叫做对自由的略事修改了。不錯，丹麦国王沒有敢把这一新的“根本法”作为法律頒布。他只是效法东方的苏丹，把絲繩和勒令自縊的命令交

① 見本卷第 134 頁。——編者注

② 多尔哥魯科夫。——編者注

③ 勃罗克。——編者注

給兩院。這種建議已包含着這樣的威脅：不自願服從，就強行貫徹。“對憲法的略事修改”的情況就是如此。現在談談“俄國的影響”。

丹麥國王和丹麥兩院之間的衝突是怎樣產生的呢？國王建議取消 *Lex Regia*，即丹麥的現行的王位繼承法。誰促使他採取了這一步驟？是俄國。這一點從我上一篇文章引用的 1853 年 5 月 11 日涅謝爾羅迭伯爵的照會中就可看到。廢除 *Lex Regia* 對誰有好处²³³？除俄國之外，沒有別人。*Lex Regia* 允許王朝女系的代表繼承王位。隨着 *Lex Regia* 的廢除，男系親屬就可以拒絕至今仍然堵在他們道路上的所有女系親屬繼承王位的要求。大家知道，丹麥王國除丹麥本土即一些島嶼和日德蘭之外，還包括兩個公國——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丹麥本土和什列斯維希的王位繼承按 *Lex Regia* 的規定，而霍尔施坦公國是德國的封地，根據 *Lex Salica* [舍拉法]²³⁴，它僅由男系繼承。隨着 *Lex Regia* 的廢除，丹麥和什列斯維希的王位繼承制度也和德國的公國霍尔施坦一樣了。俄國皇帝作為霍尔施坦-哥托爾普王室的代表擁有對霍尔施坦的直接權利²³⁵，於是，他作為男系的年齡最大的親屬也就有權直接要求繼承丹麥王位了。1848—1850 年，在俄國照會和俄國艦隊的支持下，丹麥為維護不許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聯合、不許公國脫離丹麥的 *Lex Regia* 而與德國進行了鬥爭。沙皇在維護 *Lex Regia* 的借口下取得對德國革命的勝利之後，便用廢除這一法律的方法來并吞民主的丹麥。因此，斯堪的那維亞人和德國人根據經驗就知道了，他們都不應當把自己的民族要求建立在封建的王位繼承法的基礎上。經驗更清楚地向他們表明，德國人和斯堪的那維亞人——同一個偉大種族的代表——彼此爭吵而不結成同盟，這只會為自己的世世代代的敵人——斯拉夫人鋪平道路。

目前最大事件是美国政策在欧洲地平线上的出现。对于这一事实，虽然一部分人额手称庆，一部分人切齿痛恨，但它已为大家公认了。

“奥地利会力求瓜分土耳其帝国，以弥补它可能遭到的丧失意大利属地的损失，——这个前景，在它很愚蠢地与山姆大叔发生纠纷以后更有可能了。美国的分舰队驻扎在亚得利亚海，在意大利起义时会使情况特别复杂化，而我们将来完全可能看到这种意外事件，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西方还没有死去。”

这是英国贵族的老机关报“先驱晨报”的话。

巴黎的“新闻报”说：“科斯塔事件离结束还远得很。我们听说，维也纳当局已向华盛顿当局要求雪耻，当然，这是不会得到的。目前科斯塔仍处于法国领事的保护之下。”

维也纳的“新闻报”嘟囔说：

“我们应当避免跟美国佬接触，因为他们半是海上强盗，半是绿林英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绅士。”

德国的报纸怨声不绝，据说合众国和土耳其似乎在如下条件下签订了秘密条约：土耳其获得金钱和海军援助，而合众国则取得鲁美利亚的埃内兹港，这就会使北美共和国在地中海得到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商业和军事基地。

布鲁塞尔的报纸“解放”说：“因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而引起的美奥两国政府之间的士麦那冲突，将来会被看做 1853 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多瑙河各公国的被占领，西方外交在君士坦丁堡的手腕和联合舰队的演习，与这件事相比，只能算是次要的。士麦那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君士坦丁堡的事件只不过是解决已接近尾声的老问题而已。”

在意大利的报纸“议会报”²³⁶上刊载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政策

在欧洲”的社論。我从这篇文章中逐字逐句地摘譯了下面一段：

“議会报”說：“大家清楚地知道，合众国早就想在地中海和意大利获得海軍基地，特别是当东方发生糾葛的时候。例如，在1840年，严重的埃及問題提上日程，圣让得阿克遭到攻击，这时，合众国政府曾請求双西西里王国国王^①把巨大的塞拉庫斯港暂时割让給它而未获結果。目前，美国政策干涉欧洲事务的趋势必然会加强起来，而且会越来越頑强。毫无疑问：現在的合众国民主政府正在大声地对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牺牲者表示同情，同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决裂絲毫也不会使它惊慌，它已經在士麦那用大炮的威胁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要对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意图表示憤慨，或說它們不合理和很可笑，这是不公正的。不言而喻，美国人并不想夺取东方和发动同俄国的陆战。但是，既然英国和法国动用自己最强的海軍力量，那末，美国人为什么不照样行动呢，特别是当他們要在地中海获得海軍基地——掩蔽和‘补充儲备品’的地点的时候？对于美国人來說，既然是共和分子与哥薩克分子直接敌对的問題，所以就决定着一項重大的利益。商业和航运已經大大地发展了世界各民族之間合法的交往和联系，以至目前在任何冲洗着旧大陆或新大陆的海洋上沒有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是異乡人，或者在任何类似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这样的大問題上认为自己是局外人。美国的商业和在我们海岸上从事商业的侨民都要求美国旗的保护，而为了使这种保护經常化和常年有效，他們就需要一个港口来停泊他們的已經在世界海軍强国舰队中居第三位的舰队。如果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預有关巴拿馬地峡的一切事务，如果这两个强国中的第一个强国已經这样胡作非为，甚至捏造一个蚊子国王，以便拿領土权来对付合众国的行动，如果这两个强国最終商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孔道應該对所有各国开放并由一个中立国家掌管，——那末，显而易见，合众国就要要求苏伊士地峡的自由和中立化得到同样周密的保护，而且力求实现这种保护，同时它也要密切注視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因为这种瓦解会导致埃及和利比亚全部或部分地轉归某个头等强国統治。苏伊士和巴拿馬是通向东方的两条大道；它們至今仍然封閉着，将来它們会相互竞争。保障自己在橫越大西洋問題上的优势的最好办法，就是参与解决地中海問題。我

^①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們相信，正在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海面上行駛的美国軍艦，将不会放棄在它方便的时候駛入該处的要求，因为它們并不受 1841 年公約簽訂国所同意的限制性条款的束縛，也就是說，它們有一个无可爭辯的理由，即美国政府不是这一公約的参加国。欧洲为这种大胆行为所震惊，因为它从 1783 年和約时起就已习惯于把合众国看做威斯特伐里亚和約以后的瑞士各州，也就是把合众国看做这样的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它的存在，但决不允許它进入老牌强国的貴族圈子，决不让它在一般政策問題上有发言权。但是大洋彼岸的盎格魯撒克逊种族已經高度地富强起来，有了高度的文明，它不可能繼續安于过去給它規定的卑微地位。北美合众国对至今仍裁夺着地球命运的五强最高評議会的压力，是一种新的力量，它必定要促使維也納条約所建立的閉塞体系趋于崩潰。只要合众国还没有取得在决定一般政治問題的會議上的现实权利和正式地位，它就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特別的尊严实施天然权利和 *jus gentium*〔国际法〕的最人道的准則。它的旗帜不分党派地保护着各国內战的受害者，并且在 1848—1849 年大火烛天的时候，美国舰队的好客态度，从来也沒有被任何有伤尊严或耻辱的让步动摇过。”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5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戰爭問題。——英國的人口和商业
報告書。——議會動態²³⁷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今天的“通报”得知：波拿巴为水兵們降低烟价，作为法国舰队在貝捷克灣陷入屈辱地位的賠償。波拿巴用腊腸爭得了王位²³⁸。他为什么不能試用烟草来維持他的王位呢？不管怎样，东方的糾紛都将导致路易·波拿巴的威信在軍隊和法国农民的心目中的 démonétisation [下降]。他們已經懂得，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用在外国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常胜帝国”墮落得甚至不如“群賢內閣”了。

我們从剛剛收到的君士坦丁堡的報紙获悉：苏丹告臣民书是在8月1日发表的；俄国駐阿德里安堡領事从圣彼得堡接到了离开土耳其的命令；其他俄国領事正等待类似的命令；君士坦丁堡的報紙在多瑙河各公国被禁止。在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8月1日登載了下面一則关于波斯的消息：

“波斯沙赫讀了根据他的命令轉交給他的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当局之間有关当前冲突的来往信件之后正式声明，他认为土耳其政府完全有理，一旦发生战争，他将公开站在土耳其政府这一边。这一消息給俄国駐德黑兰大使以强烈的印象，現在人們都說，他正打算申請护照。”

欧洲的整个报界都根据从彼得堡发来的密电紛紛猜測对俄国提出并被沙皇接受的建議的内容。帕麦斯顿的“晨邮报”断言：

“7月25日美廷多尔夫先生轉給本国皇帝的纵然不是正式的建議（維也納會議通过的），无论如何也是关于24日會議情况的报告。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問題会根据維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这样的精神解决，这样說未必会弄錯。处理的方式将是这样的：列施德-帕沙給涅謝尔罗迭伯爵一份照会，照会中附有給予苏丹的正教臣民以特权的敕令，这些特权甚至比俄国为他們所要求的更为广泛。将对沙皇讲許多恭維話，并向他保证，苏丹将以最好的感情对待他的臣民，并且一一列举苏丹已經賜予他們的某些权利。这份照会将由土耳其大使遞交，于是問題就結束了……到9月10日，最后的一个俄国兵士将渡过普魯特河！”

另一方面，来自維也納的私人信件指出，俄国軍舰出現在普魯特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上游，这证实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发表的意見：在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議中根本沒有关于俄国軍隊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这个建議来自奥地利当局，因为在沙皇拒絕法国和英国的建議后，英国駐維也納大使^①这位“真正主張和解的人”曾吁請奥地利当局进行調停；奥地利的这个建議正中俄国之意，让它有可能使結束談判 in infinitum [遙遙无期]。据半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²³⁹的消息，俄国允許奥地利只能向土耳其报道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

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人口的官方材料证明，大不列顛的人口正在緩慢地但却是不斷地縮減。1853年第二季度

各調查区人口死亡数·····	107 861 人
同期出生数·····	158 718 人
人口自然增长数·····	50 857 人

① 威斯特摩兰。——編者注

整个联合王国

出生数超过死亡数.....	79 800 人
同期迁往国外的人数.....	115 959 人
迁往国外人数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数.....	36 159 人

最近的一个报告表明迁往国外的人数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数 3 万人。

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縮减的同时,生产力和資本却空前增长。馬尔薩斯神甫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种影响,并且以为自己已通过精細的核算证明了:即使动用世界上所有的船只运送外流的居民,也絲毫不能影响人口的极度增长。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馬尔薩斯,那末現代政治經濟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暫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搖的規律,經濟学家們称之为自然規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經濟学家們认为是純粹的空想。他們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們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貿易部公布的关于 1853 年上半年到 7 月 5 日止的貿易和航运的材料,与 1852 年同期的出口、进口和航运的材料相比,总的說来有了很大的增长。犍牛、公牛、母牛、牛犢、綿羊和羊羔的进口額大大增加。

1852 年上半年(至 1852 年 7 月 5 日止)谷物

总进口額.....	2 604 201 夸特
而 1853 年同期的总进口額	3 984 374 夸特
1852 年上半年細磨面粉和粗磨面粉总进口額.....	1 931 363 夸特

而1853年同期的总进口额	2 577 340 夸特
1852年咖啡总进口额.....	19 397 185 磅
1853年“ ” “ ” “ ” “ ”	21 908 954 磅
1852年酒类总进口额.....	2 850 862 加侖
1853年“ ” “ ” “ ” “ ”	4 581 300 加侖
1852年蛋类总进口额.....	64 418 591 个
1853年“ ” “ ” “ ” “ ”	67 631 380 个
1852年马铃薯总进口额.....	189 410 公担
1853年“ ” “ ” “ ” “ ” “ ”	713 941 公担
1852年亚麻总进口额.....	410 876 公担
1853年“ ” “ ” “ ” “ ”	627 173 公担
1852年生丝总进口额.....	2 354 690 磅
1853年“ ” “ ” “ ” “ ”	2 909 733 磅
1852年棉花总进口额.....	4 935 317 公担
1853年“ ” “ ” “ ” “ ”	5 134 680 公担
1852年毛类(羊毛和羊羔毛)总进口额.....	26 916 002 磅
1853年“ ” “ ” “ ” “ ” “ ” “ ” “ ”	40 189 398 磅
1852年皮革(熟皮)总进口额.....	1 075 207 磅
1853年“ ” “ ” “ ” “ ” “ ”	3 604 769 磅

可可、海鳥糞、原糖、茶叶等的进口量减少了。至于出口，有下述材料表明：

1852年上半年棉織品出口值.....	11 386 491 英鎊
1853年同期的出口值.....	13 155 679 英鎊

至于棉紗——这里包括亚麻紗和毛紗——出口額在数量方面是减少了，但根据公布的价值，出口額却大大增加，出口价值如下：

1852年上半年亚麻織品的出口值.....	2 006 951 英鎊
1853年同期的出口值.....	2 251 260 英鎊
1852年生絲織品的出口值.....	467 833 英鎊
1853年“ ” “ ” “ ” “ ” “ ”	806 419 英鎊

1852 年毛織品的出口值	3 894 506 英鎊
1853 年	4 941 357 英鎊
1852 年陶器的出口值	590 663 英鎊
1853 年	627 218 英鎊
1852 年玻璃品的出口值	187 470 英鎊
1853 年	236 797 英鎊
1852 年服飾用品和女用頭飾的出口值	884 324 英鎊
1853 年	1 806 007 英鎊
1852 年小五金和刀類商品的出口值	1 246 639 英鎊
1853 年	1 663 302 英鎊
1852 年機器裝備的出口值	476 078 英鎊
1853 年	760 288 英鎊
1852 年長方鐵、螺釘和條鐵的出口值	1 455 952 英鎊
1853 年	2 730 479 英鎊
1852 年熟鐵的出口值	696 089 英鎊
1853 年	1 187 059 英鎊
1852 年金屬綫的出口值	42 979 英鎊
1853 年	106 610 英鎊

在工廠製品的進口方面，鞋、靴和手套增加最多，玻璃商品、鐘表、毛織物和印度綢減少最多。在出口方面，亞麻織品、絲織品、毛織品和金屬製品增加最多。至於食品的進口，如果不算谷物和牲畜，幾乎所有增加了進口的項目都證明英國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消費量增長的比例大大超過工人階級的消費量增長的比例。例如，酒類的消費量增加了一倍，而可可、原糖和茶葉的消費量則顯著地減少。

在關於聯合王國小麥收成的 260 個報告書中，只有 25 個報告書提到收成很好，有 30 個報告書估計是中等年成，有 200 個以上的報告書則直截了當地宣布收成很差或很壞。燕麥、大麥和大豆

的收成看来不坏，因为水分足，有利于这些作物；但馬鈴薯是全国歉收。約·斯特治先生和查·斯特治先生的公司在他們最近的一个关于小麦收成的通报里指出：

“小麦总收成大概是从1816年起所有年份中最低的，如果1854年的收获不早，我們就一定要輸入甚至比1847年还要多的各种谷物和面粉，——可能不少于1500万夸特。但是，只要法国不在产粮国市場上和我們竞争，我們現在的价格之高足以刺激如此規模的进口。”

指望1854年的收获很早，看来没有什么特殊根据，因为經驗表明：歉收年份正如丰年一样，通常都是連續的，而从1848年起，好几个丰年已經連續得很久了。英国将向其他国家訂购足够的粮食，这一点沒有絲毫疑問；但是自由貿易派所期望的英国工业品的輸出与谷物的輸入相平却是沒有指望的。此外，在輸入可能超过輸出的同时，国内工业品消費量也将縮減。英格兰銀行的黄金儲备現在已經在逐周减少，并且已降低到17 739 107英鎊了。

上院在上星期五的會議上否決了下院通过的工人結社法案。这一法案不过是1825年旧結社法²⁴⁰的新解釋，其目的是通过取消結社法中一些难懂的和意义含糊的詞句的方法，使工人与企业主在他們結社的合法性被承认方面处于比較平等的地位。每当工人这帮愚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慰問时，多愁善感的貴族們就要大发雷霆，因为他們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順奴僕来看待。所謂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拚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貴族是无产阶级的“一貫仇敌”。我决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讓我們来仔細看一看激进派本身，看一看工人的这些“天然的朋友”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曾向諸君报道，曼彻斯特的紡紗工場的場主和工厂主組織了

一个抵制工人要求的协会^①。这个組織叫做“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騷动厂方合作协会”。建立这个协会是要追求以下的目的：

“1. 根据其他棉紡織工业区的工資額，确定紡紗业和織布业各部門的工資額；

2. 在实施这些工資額时，如遇到某一會員企业內工人的反抗，全体會員相互支持；

3. 为了有利于工人，保证全城及郊区实行划一的工資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組織系統，其办法是成立地方的紡紗工場場主和工厂主协会，由中央委員會领导。

“这些协会的會員将抵制工厂工人的有組織的集团的一切要求，因为对它們的任何让步有損企业主、工人和一般工业的利益。”

他們不願让他們的工人建立同类的組織与他們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組織分庭抗礼。他們想用組織集团的壟断权来巩固資本的壟断。他們将作为一个有組織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他們爭論。他們想成群結队地进攻，但希望別人单枪匹馬地反抗。用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典型的自由貿易派的語言來說，这叫做“誠实的竞争”。

上院 8 月 9 日會議本来是要决定下院經過 10 个月討論后通过的 3 个爱尔兰法案的命运。地主和租佃者法案廢除了有关不动产典契的法律。这在目前就給合法出卖小地产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在典地产法令不适用于小地产。租佃权法案修改并概括了 60 个以上的禁止簽訂为期 21 年的租佃契約的議會法令，处理了租佃者根据相应的合同作了改良設施的补偿費問題，并且不

① 見本卷第 256 頁。——編者注

許采用轉租制。最后，**租佃者改良設施补偿費法案**規定，租佃者在沒有与地主簽訂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所作的改良設施应予补偿，还有一条規定这一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当然，上院是不可能反对議會干涉地主和租佃者之間的关系的，因为从爱德华四世时起到現在，上院从未中止把处理这些关系的立法法令大量载入法律汇编，而且上院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有关地产的法律为基础的，**继承法**就是一例。但是，在自己事务中一向以公断人身份出現的各位上院議員，这一次却暴跳如雷，这在这个养老院中是很难遇到的。

克兰里卡德伯爵叫道：“据我所知，像租佃者补偿費法案这样的法律草案，这样完全違反和輕視所有合同的事，还从来没有提交議會批准过；至于这一法律有回溯效力，至今我也从来没有听說过哪个政府敢于提出类似这条規定的措施。”

貴族們竟然以拒絕封建的效忠誓²⁴¹来威胁王室，并且暗示有可能发生爱尔兰地主的叛乱。

上面这位勋爵閣下声称：“事情几乎牵涉到关于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对英国政府**保持忠誠和信任的全部問題**。如果他們看到如此处理爱尔兰地产，那末，我倒想知道，什么东西能保证他們**忠于王室和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

閣下，請平靜一些，平靜一些！什么东西能保证他們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呢？——一名治安法官，两名警察。大不列顛地主叛乱！誰听說过比这更希奇的古董！不过，寒酸的貴族們早已只靠古董生活了。他們为了反抗下院和輿論，当然要自我振作一番。

圣萊昂納茲老勋爵煞有介事地說：“希望諸位勋爵閣下不要因为避免发生与另一院的所謂‘**冲突**’，或是因为取得名声，或是由于外来压力，而通过这样一些极不完善的措施。”

罗登伯爵叫道：

“我不屬於任何党派，但我极其关心爱尔兰的幸福。”

換言之，勛爵閣下是认为爱尔兰极其关心罗登伯爵的幸福。“这不是党派的問題，而是所有貴族的問題”——这就是上院的一致呼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两党之間，在輝格党貴族和托利党貴族之間，在屬於联合內閣的貴族和屬於在野派的貴族之間，一开始就暗中商妥不让上述法案通过，而整个激烈的爭論不过是一幕为报界采訪員上演的鬧劇而已。

如果回想起：成为激烈爭論对象的这些法案的原作者不是联合內閣，而是得比內閣中的爱尔兰首席檢察官納皮尔先生；再回想起：在爱尔兰最近一次选举时，托利党人曾引用他們所提出的这些法案，那末，就会十分清楚这个內幕了。下院在托利党政府草案中所作的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禁止因欠租而夺取租佃者的青苗。馬姆茲伯里伯爵大叫：“这不是那些法案”，并問紐卡斯尔公爵能否在这方面相信他。公爵回答說：“当然，不。”“那您相信誰的話呢？”——公爵的回答是：“相信納皮尔先生的話”。伯爵說：“这就是納皮尔先生的信，它确证这不是那些法案。”公爵反駁道：“这是納皮尔先生的另一封信，它确证这就是那些法案。”

如果托利党人仍然执政，那末現在屬於联合內閣的貴族們就会投票反对爱尔兰法案。但是，既然是联合內閣执政，那末，反对自己的提案的任务就落在托利党人肩上了。联合內閣从托利党那里继承了这些法案，并使爱尔兰派的代表参加了自己的內閣，当然不能在下院投票反对这些法案。但是，它相信上院不会让它们通过。紐卡斯尔公爵的反抗本来就怯弱，但阿伯丁勛爵声明，他同意法案通过二讀的正式程序，即事实上在本届會議仍然不予通过。結果正是这样。前內閣的首脑得比勛爵，本届內閣的挂名大臣兰

斯唐勋爵以及爱尔兰的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都很聪明地推說身体不适而没有出席。

在同一天，下院在三讀中通过了**出租馬車稅法案**，恢复了十四世紀的馬車官价，并通过了弗·斯卡利先生提出的出租馬車主組織罢工应予法办的条款。我們現在不能細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的問題。只想指出，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貿易派的議院中实现的。不錯，議院断言，在运載业领域中存在着壟断，而不是自由竞争。奇怪的邏輯！起先向私人行业課以所謂的特許稅，并为它制定特別的警察条例，然后又声明，这一行业正是由于稅重，所以失去了自由的性质，变成了国家壟断。

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也在全院委员会通过。除为数不多的已被判服苦役的罪犯仍将流放西澳大利亚之外，流放到苦役移民区的刑罰被这一法案取消。罪犯先服一定时期的监禁，然后可获得假釋（但可能取消）和在大不列顛的居住权；他們将被用于公共工程并得到政府規定的工資。最后这一条的慈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竞争，在劳动力市場上人为地造成剩余；同时，这些慈善家們又禁止习艺所的貧民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他們害怕造成对私人資本的竞争。

迪斯累里先生所指导的最熟悉內閣的一切秘密的倫敦周报“新聞报”，在上星期六——可見是在彼得堡急电到达之前——刊登了下面一則有趣的报道。

“我們得知，大臣們在得到他們信任的私人中声称，現在不仅沒有任何战争威胁，而且任何危險（如果說这种危險曾經一度存在过）也早就消除了。看来，正式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議是預先征得俄皇同意的；英国政府在其公开言論中唱着对国家經濟生活极为有害的調子，而在私下里却把混乱状态說成

是疑神疑鬼的結果，嘲笑关于某某强国一度认真想要进行战争的任何想法，并且要人相信一时的誤会‘已在最近三周内彻底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整个这种做法的秘密何在？…… 现在已在圣彼得堡的并在发出之前就得到俄皇同意的建議的主旨就是要土耳其完完全全接受俄国的要求，因为现在两国之间的战争是由于拒絕这些要求而引起的。土耳其政府拒絕这些要求是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慫恿。它现在又要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慫恿按上述建議同意这些要求。这里在形式上稍有更改，而在本质上一仍其旧。事实上已經对欧洲土耳其基本居民群众确立了保护制度的俄皇，只要声明一下他这样做并不是侵犯苏丹的最高权利就好了。多么寬宏大量的恩賜呵！”

君主权在大不列顛被认为是徒有空名的，——正因如此，所有党派才不和它計較。如果你們問英国的激进派，为什么他們的党放棄反对王室特权的斗争，他們会回答你們：这种特权不过是装装門面，同我們没有什么关系。他們会告訴你們，維多利亞女王只有一次大胆表現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为御前女官而起的冲突，这次冲突使她遭到戏剧性的失敗。当时，她想把輝格党的御前女官留在身边做 *entourage* [近臣]，但后来不得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让步，辞退了她們。但是，与东方問題有关的許多情况，——內閣的政策不可理解，外国报界提出責难，俄国大公和大公夫人在英国似乎处于和俄国专制君主开战前夕的时刻接踵訪問，——证实了下述傳聞：在整个东方危机繼續期間，英国宮廷都是同俄国串通的，所以它使善良的老阿伯丁留任首相，使摆出来給人看的与法国的同盟瘫痪，并抵制正式采取的反对俄国侵犯的措施。人們暗示說，英国舰队完全是为了科堡王室的利益而支持葡萄牙的反革命²⁴²。盛傳帕麦斯顿勳爵也是由于宮廷的陰謀而被解除了外交部的职务。又說，維多利亞女王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友誼是尽人皆知的。人們还記起，女王的丈夫是一位科堡王室的

人^①，她的叔父也是一位科堡王室的人^②，后者作为比利时国王和路易-菲力浦的女婿，非常希望波拿巴垮台，并且在他的儿子和奥地利公主結婚后已被正式接納入神圣同盟。最后，人們还把英国对俄国客人的接待同俄国最近对英国旅行者的逮捕和挑剔作比較。

几个星期之前，巴黎的“世紀报”写文章反对英国宮廷。一家德国报纸也发表了一篇詳細論述科堡-奥尔良派的密謀者的文章，說这些密謀者为了王朝的利益，通过列奥波特国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迫使英国內閣实行危害西方各国、鼓励俄国阴謀的方針。布魯塞尔的“民族报”²⁴³刊登了关于在倫敦举行的內閣會議的长篇报告，說女王在这次會議上正式声明：妄图圣地的波拿巴是当前糾紛的唯一罪人；俄国皇帝想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屈辱，要比他的法国敌手所想的少；她决不为了某某波拿巴的利益而发出同意对俄国进行任何战争的王令。

关于这些傳聞，“晨报”說得非常委婉。这些傳聞在公众中間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每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审慎的評論。

“先驅”²⁴⁴写道：“我們不想作过于广泛的推测，只要看一看事实。奥里珈女公爵携同她的丈夫和姐姐，俄皇的最善于外交的女儿之一洛伊希頓堡公爵夫人来到英国。她受到布隆諾夫男爵的欢迎，并馬上受到宮廷內的亲切接待，她被英国上等社会的代表人物所包圍，其中也有阿伯丁勋爵。”

甚至在第一流倫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²⁴⁵，也用簡洁的标题“又是俄国人”发表了关于俄国客人光临的报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社論中有如下的話：

① 阿尔伯特亲王。——編者注

② 列奥波特一世。——編者注

“目前根本没有什么原因阻碍和平协会在阿尔伯特亲王殿下庇护下以最有威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像“观察家”这样的报纸也不能提出更明显的暗示。我上面引证的那篇文章在结束时把英吉利君主国同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作了如下的比较：

“如果美国人力图在欧洲占有我们一度占有过的地位，那末，这与我们无关。目前，他们巩固国际法并作为扶弱除强者而赢得尊敬，就让他们从中博得荣誉，归根到底从中获得好处吧！英国将只关心统一公债按票面价值计算和保护本国海岸以防外国军队直接进攻。”

关于本年度（截至 1854 年 3 月 31 日止）拨款 5 820 英镑用来抵偿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建筑工程费、修理费、家具费等等的问题，魏兹先生在表决时问道：最近 30 年来按规定每年拨出的 1 100 英镑的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维修费到哪里去了？威廉·摩尔斯沃思爵士不得不承认，公款滥用掉了；还承认，根据政府派往巴黎的建筑师阿耳巴诺的报告，英国大使的官邸破败不堪。房子周围的游廊坍了；墙也倒了；房子好几年没有粉刷；楼梯不稳；污水井发出恶臭；房间里满是寄生虫，并且在桌上乱爬；家具和窗帘上幼虫密布，而地毯被狗屎猫屎弄得污七八糟。

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关于消除煤烟措施的法案通过了二读。如果这一提案能实行，英国的首都将焕然一新，市内除上院和下院外，将不再有一所骯髒房子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

載于 1853 年 8 月 24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854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烏尔卡尔特。——貝姆。——

土耳其問題在上院

1853年8月16日星期二于倫敦

戴維·烏尔卡尔特就东方問題发表了四篇文章²⁴⁶，目的是消除下述四种誤解：第一，是认为东正教教会和俄国教会是一回事，第二，是认为英俄之間存在着外交冲突，第三，是认为英俄可能发生战争，第四，是认为英法之間似乎存在着同盟。这几篇文章，我打算将来再比較詳細地談談²⁴⁷，因此現在只向諸君报道一下貝姆給列施德-帕沙的信。这封信最先是由烏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

“閣下！因为我尚未得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认为有責任把一些意見报告給閣下，我觉得这些意見是非常要紧的。我首先要說的是，我所看到的土耳其軍隊——騎兵队、步兵和野战炮兵是非常优良的。軍容、軍訓和士气都再好沒有了。騎兵要胜过欧洲任何一支騎兵。意义最大的是，全体官兵都要求同俄国人作战。带着这样的軍隊，我敢去进攻数量一倍于我的俄国軍隊，并且有十分把握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既然能够出动超过俄国所能抵擋的数量的部队，那末很明显，苏丹会滿意地看到，被莫斯科的沙皇們背信棄义地从他的祖上手里夺走的所有省份将收复回来归他管轄…… 貝姆”

奥地利外交大臣^①就美国巡航舰“圣路易号”在科斯塔事件中

^① 布奥尔·紹恩斯坦。——編者注

的行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照会。在照会中，他譴責美国的整个政策。奥地利坚持自己有权用武力逮捕在中立国居住的外国人，否认美国有权采取軍事性质的措施去保护他們。

馬姆茲伯里伯爵星期五在上院提出质詢，但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維也納會議的秘密和这个會議向沙皇提出的建議的內容，整个目前談判的情况他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大可以說是古董鉴赏式的兴趣。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翻譯一下”俄皇在5月和6月給本国外交使节的两个通知(公布在“圣彼得堡消息报”²⁴⁸上)；他还想鉴赏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两个文件的內容应已作出的”答复。馬姆茲伯里伯爵不是古羅馬人，当着 *patres conscripti* [元老，古羅馬議員的尊号] 的面公开听外国使节陈詞的羅馬風俗是最使他反感的。同时，他自己也指出：

“俄国的两个通知已由俄皇用本国文字向全欧公开发表，在英法文的报刊上也已披露。”

把这两个文件从新聞記者的語言譯成外交部官員的語言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

“法国政府对这两个通告立即十分巧妙地作了答复…… 据报道，继法国之后英国随即也作了答复。”

馬姆茲伯里伯爵显然是急于知道，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平淡文字譯成克拉倫登伯爵的优雅文字是个什么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向“坐在对面的高貴朋友”指出，約翰牛經過了30年的和平、經商、工业活动以后，对战争已經“有点神經過敏”；这种神經過敏从去年3月“由于政府长期一直对自己的行动和談判情况严守秘密而更加厉害了”。因此，馬姆茲伯里伯爵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提出质詢，但政府同样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持

沉默。

俄国对欧洲土耳其实行侵略的最初迹象使伯爵閣下比誰都伤心。他从来沒有猜疑过俄国对土耳其有什么阴谋。他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俄皇的荣誉”。但是，难道俄皇的荣誉曾經因扩大帝国版图而受損嗎？其次，在他的心目中，“沙皇在 1848 年革命時曾坚决奉行保守政策”。的确，专制君主同这些敗坏人心的革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是在 1852 年，当伯爵閣下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君这样一再保证遵守約束着欧洲的各项条約和維護这么多年来为欧洲造福的各项領土协定，没有一个国君对此表示过更多的誠意。”

毫無疑問，布隆諾夫男爵在慫恿馬姆茲伯里伯爵簽訂 1852 年 5 月 8 日丹麦王位继承条約的时候，是用再三保证他的神圣君王非常喜欢現有一切条約的說法把伯爵誘进了圈套的。而在布隆諾夫劝說剛剛热烈祝賀了波拿巴篡夺王位成功的伯爵同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建立一个反对同一个波拿巴的秘密同盟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过地证明自己維護現行領土协定的誠意。

为了解釋俄皇的突如其来的轉变，馬姆茲伯里伯爵于是就进行心理分析，来研究“影响了俄皇思想方式的情緒”。他肯定地說，“法国政府在圣地問題上的行为伤害了俄皇的感情”。誠然，波拿巴为了安慰俄皇被伤害的感情，曾經派了一个“性格非常温順的人”戴拉庫尔先生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伯爵接着說，“已經发生的事情，看来並沒有从俄皇的脑海中消除”，所以俄皇对法国犹有余怒。應該承认，戴拉庫尔先生在緬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就非常彻底地和令人滿意地把問題解决了。“但是，尽管这样，俄皇的想法並沒有改变”。这些情緒和由此产生的錯誤想法是

这样强烈，以致“俄皇仍然怀疑土耳其政府想向俄国提出它根本无权提出的条件”。馬姆茲伯里伯爵承认，“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英国的勋爵也都包括在内，“都没有本事看见人的思想”；但是“他不能不认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些影响了俄皇思想活动的惊人情绪”。他说，俄国人世代代习以为常地认为“注定要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一天现在已经到来了。他还认为，“现在的俄皇”也有“这种感情”。明智的伯爵起初想用俄皇老是猜疑土耳其政府企图侵犯他的权利的说法来解释问题，现在伯爵则说，俄皇猜疑土耳其只是因为他认为吞并土耳其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伯爵阁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改变他的逻辑议论的路线了。现在他不说什么新情绪影响了俄皇的思想活动，使原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援引某些情况，由于这些情况，沙皇野心勃勃的想法和旧的傳統感情曾经被抑制一个时期，并且压制了“使他受到诱惑的事物的产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馬姆茲伯里伯爵当时“任职”，而后来“不任职”。

当他“任职”时，他不仅第一个承认了布斯特拉巴²⁴⁹，甚至第一个为他的背誓、屠杀和暴政辩护。但在此以后，

“当时的报纸却开始不断攻击它们所说的对法皇采取的屈膝献媚的政策”。

联合内阁上台了，詹·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也跟着出来了，

“这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抨击法皇的政策和法皇个人，同时也抨击法国人民选出了这个王子做国君”。

随后就发生了門的内哥罗事件²⁵⁰，联合内阁

“允许奥地利坚决要求苏丹不要对起义的門的内哥罗人再采取武力措

施，甚至沒有保障土耳其軍隊平平安安地撤退，結果使土耳其折兵 1 500—2 000 人。”

再后，就是罗斯上校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同时，英国政府又表示不願和法国同时把自己的舰队派往貝捷克灣或士麦那。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俄皇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想法，肯定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敌視法皇，英法两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

馬姆茲伯里伯爵細膩地（任何小說家如果这样細膩地描写自己的女主人公变化无常的情感，一定会获得声誉）描写了影响着俄皇敏感的头腦并使他离开正道的原因之后，就自吹自擂地說，由于他同法国人民的暴君建立了密切的同盟，似乎就摧毀了数世紀来使法国人民同英国人民隔絕的成見和反感的壁壘。他庆賀現政府继承了他同西方沙皇建立的这个友好同盟，庆賀它收获了托利党人播种所得的果实。他却忘記补充說，正是在这个友好同盟的庇护下，法皇支持联合內閣的时候，苏丹才被献給俄国做牺牲品，因为这个法国的苏路克急于希望能够踩着穆斯林的肩膀爬上什么維也納會議，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伯爵一方面祝賀內閣同波拿巴結成紧密同盟，同时馬上就开始斥責这个 *mésalliance*^① 所产生的政策。

我們不打算繼續把伯爵的所有宏論再介紹下去了，总之，他大談土耳其領土不受侵犯的重要性，否认土耳其的衰落，不承认俄国的宗教保护权；他还責难政府不把侵犯多瑙河各国事件看做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沒有用出动舰队的行动来回答俄国人渡过普魯特河的事件，这些責难我們也不重复了。他所举出的新东西，只是下面这一封緬施科夫公爵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写給列施德—

① 俏皮話：«close alliance»——“紧密同盟，联姻”；«mésalliance»——“不平等的婚姻”。——編者注

帕沙的“聞所未聞的蠻橫的”信。

“本大使即將離開君士坦丁堡時得知，土耳其政府宣布打算保障東正教教會的僧侶實現屬於他們的宗教權利，這實際上是表示無意保障這個教會所享有的其他特權。不管採取這一決定的動機如何，本大使認為不得不通知外交大臣閣下，任何宣言之類，即使保障了東正教教會的單純宗教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會被用來剝奪自古以來就公認屬於這個教會及其僧侶並且現在仍屬於他們的其他權利、特權和豁免權，因此帝國當局將認為這種宣言是對俄國及其宗教的敵對行為。

順致敬意等等

緬施科夫

5月9日(21日)于比尤克德列”

馬姆茲伯里伯爵“很難相信俄皇贊同緬施科夫公爵的行為或做法”。涅謝爾羅迭在緬施科夫離開之後發出的照會，以及涅謝爾羅迭照會發出後俄國軍隊的出動，證明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

“沉默寡言”的克拉倫登，仍然不得不“總是作同樣的答复”，也就是說，不作任何答复，“雖然這使他感到十分惋惜”。他認為“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是不說”早先沒有說過的“任何一句話”和宣布“他不能提供任何消息和不能提出任何特別報告”。因此，這位伯爵閣下除了說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外不能多說一個字。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在奧俄兩國當局奉行自己的進攻政策的整個時期，他一直同它們保持着“經常接觸”。例如，當奧地利政府把萊寧根公爵派到君士坦丁堡²⁵¹，並且陳兵邊界，“以防邊疆地區的本國臣民騷動”時，他同奧地利政府保持着經常接觸。至少這就是“所援引的理由”，——清白無辜的克拉倫登這樣告訴我們。蘇丹向奧地利作了讓步並撤回自己的軍隊以後，精力飽滿的克拉倫登“重新同奧地利建立了接觸，以便保證條約的認真履行”。

“我认为——勋爵接着說道——条約是履行了的，因为奥地利政府負責地告訴我們，情况就是这样。”

好极了，勋爵大人！至于同法国的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協商]，那是从 1815 年就存在的。在英法政府决定“派遣舰队”方面，也“沒有絲毫分歧”。波拿巴已命令自己的舰队开往薩拉密斯島，

“认为危險很大”，因此，“虽然他（克拉倫登）說危險不那么大，法国舰队沒有必要在那时离开法国碼頭”，波拿巴“仍然命令法国舰队开航；但这个情况并没引起絲毫分歧，因为一个舰队在薩拉密斯，一个在馬尔他，比一个在馬尔他，一个在土倫有利和方便得多”。

克拉倫登勋爵接着說，当緬施科夫对土耳其政府采取蛮横措施施加压力时，

“应当滿意地指出，舰队沒有得到出海命令，这是为了让誰都不能說土耳其政府的行动是受我們指使的”。

在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实际上完全有可能估計：如果舰队当时得到出海命令，苏丹一定会后退的。克拉倫登认为緬施科夫的“告別信”是“适当的，不过他觉得，在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談判时，这样的措詞幸而是少有的，并且，如他所希望的，今后很长时期也会是少有的。”最后，关于入侵多瑙河各公国的事件，据克拉倫登称，法国和英国政府

“曾劝苏丹暂时放棄自己的一項毫无疑义的权利，即不把这些公国被占领看做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关于現在仍在进行的談判，他只能說一点：

“今晨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那里得到正式报告說：圣彼得堡将接受各国大使在維也納协商好的建議，如果这些建議稍加修改的話。”

不过克拉倫登宁死也不願透露一点協議的条件。

波門特勛爵、哈德威克伯爵、克蘭里卡德侯爵和埃倫伯勒伯爵回答了勛爵閣下。沒有一個人表示庆賀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次談判中所採取的方針。人們紛紛表示极大的忧虑：內閣的政策是不是錯誤的呢？內閣是不是做了帮助俄国而对土耳其不加保护的調停人呢？如果法国和英国老早就采取强硬政策，內閣的处境是不是会比現在好呢？頑固的老阿伯丁回答了他們：“如果事过之后再來推測当时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只是議論不那么做又会怎样，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是他下面的声明：

“各位勛爵閣下应当記得，自己是沒有受任何条約約束的；我否认英国受什么条約約束而必須参与任何支持土耳其帝国的軍事性行动。”

当英法第一次表示要干涉当前的土耳其問題时，俄皇曾断然否认 1841 年条約对他同土耳其政府的关系的約束力和由这个条約产生的西方列强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同时他却依据同一个 1841 年条約坚持其他强国的軍艦不得駛入达达尼尔海峽。現在阿伯丁勛爵在公开的隆重的議會會議上竟然同意了对这个条約的这种粗暴的解釋；而这个条約是俄国专制君主只有在把大不列顛趕出欧克辛海^①时才会同意承認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86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黑海的古称。——編者注

卡·馬克思 土耳其問題在下院

1853年8月19日星期五于倫敦

約翰·羅素勛爵一再拖延他對土耳其問題的解釋，終於很幸運地拖到了議會會議的最后一周。上星期一，他突然宣布，他將在星期二作出拖延已久的報告。原來是勛爵閣下確知迪斯累里先生在星期一早晨已離開倫敦。查理·伍德爵士也是用同樣的方法，他在获悉約翰·帕金頓及其支持者不出席議院的消息后，突然提出了自己的印度法案和上院的修正案，利用出席的議員人數不多，達到了一致同意恢復鹽業壟斷權的目的。這類卑劣的騙術，就是輝格黨的議會策略的樞紐。

下院對東方問題的討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場面。羅素勛爵用一種十分適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聲調開始了演出。這個被看做曾經盛極一時的輝格黨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的小矮子說得很枯燥，他壓低了嗓門，語調平淡呆滯，不像一個大臣說話，倒像一個刑事新聞采訪員，用一套陳辭濫調和官場用語，沖淡人們對他所描寫的慘象的印象。他所說的話不是“辯護詞”，而像是懺悔。如果有什么東西可以使這樣的演說得到原諒，那就是它的直率了，好像小矮子力圖這樣來平抑某種內心的痛苦似的。甚至“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不可侵犯”這些不可避免的詞句，听起来也好像是在這個帝

国墓前致悼詞时偶一不慎而夹杂进去的往事回忆。这篇以宣布东方糾紛已經解决为目的的演說的影响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断：一当这个演說电报发到巴黎，巴黎的有价证券就下跌了。

約翰勛爵說得对，他說，政府不需要他来辯护，因为誰也沒有攻击它；相反，議院明白表示完全由执行机关去进行談判。的确，沒有一个議員曾經提出要求大臣們参加辯論的提案，議院外也沒有举行过一次集会要求議員們提出这类提案。如果說內閣的政策充滿了神秘，那是得到了議會和公众默許的。至于在談判結束之前不公布文件，照約翰勛爵的說法，这是議会的傳統所形成的永久的法律。約翰勛爵列举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的叙述里并不是更有味道，因为他不是讲述什么，而是开清单；如果把他所讲的話介紹下去，会令人厌倦的。但是，仍然有几个重要之点，在約翰勛爵讲出之前还没有人正式讲过。

还在緬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就通知約翰勛爵，說沙皇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限于就圣十字架問題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問題提出建議。英国駐彼得堡大使和英国政府並沒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在3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腊特弗德勛爵說，緬施科夫公爵提議簽訂一項同土耳其独立絕不相容的秘密条約²⁵²（据累亚德先生說，罗斯上校和其他許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物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和英国知道了这个建議，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視俄国的行为。同时也知道了（不仅根据傳言，而且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和敖德薩大量集結軍隊。

至于維也納會議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魯安·

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根据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²⁵³的内容写出的。过了一些时候，奥地利接受了这个照会，修改了一下，在7月24日作为它自己的建議提出，而照会的定本是在7月31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轉交俄国駐維也納大使，大使則在7月24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寄到圣彼得堡了。只是在8月2日，即沙皇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見，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大强国給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大强国給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約翰·罗素勋爵肯定說，这个照会“在形式上不是同緬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完全吻合的”，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要达到。”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問題連提也沒有提。

約翰勋爵說：“即使土耳其和俄国終于在这个照会的基础上达成協議，从各公国撤兵这个重要問題仍是悬案。”

同时他补充說，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請允許他不談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問題。尽管如此，他仍然相当明白地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許在哥薩克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离开貝捷克灣。

“我們不应当同意这样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舰队無論在什么情况下駛近达达尼尔海峽，都可以被看做无異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領土的行動。但是不言而喻，当問題得到解决，和平得到保证时，貝捷克灣对英国和法国将不再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絕對不会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应当永

远留在貝捷克灣，或者英国和法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来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因此，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有点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薩克一答应撤出各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約翰勳爵說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各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 1841 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

阿伯丁勳爵则与此意见相反，他几天以前在上院说过，——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 6 月间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的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1841 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但是却有暂时拒绝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政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自行决定，是采取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

阿伯丁勳爵否认对土耳其有任何义务，无非是不愿有反对俄国的权利而已。

約翰·罗素勳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圆满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是，在目前，在维也纳写成的俄国照会（应由土耳其转交沙皇）还没得到苏丹赞同，西欧列强提出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即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是太乐观了。

累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約翰勳爵，他的讲演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这篇讲演大胆，紧凑，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薩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代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傳

說一樣。

累亞德先生對阿伯丁“無論何時何地都宣稱他的政策的實質是和平”表示遺憾。英國如果迴避用武力維護自己的榮譽和利益，就是鼓勵俄國這個肆無忌憚的國家的野心，它的這種野心遲早必然導致戰爭。俄國現在的行为不應當看作偶然的一時的現象，而應當看作廣泛的政治計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至於對法國的“讓步”和拉瓦累特先生的“詭計”，俄國甚至不能拿它們作借口，因為

“土耳其政府在頒布作出引起俄國不滿的讓步的敕令之前好些天，甚至幾星期，就將這個敕令草案遞交提托夫先生了，當時敕令本文並沒有引起任何反對”。

要說猜不透俄國對塞爾維亞、莫爾達維亞-瓦拉兒亞以及土耳其基督教居民的存心，那是很難說得過去的。緬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作正式訪問，剛剛到達就要求免去加腊沙寧的塞爾維亞大臣職務。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儘管塞爾維亞正教最高會議提出抗議。加腊沙寧先生是在 1842 年的起義中湧現出來的活動家之一，這次反俄的民族運動趕走了當時在塞爾維亞執政的米哈伊爾公爵（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過是俄國的工具）。1843 年，俄國要求有干預塞爾維亞內政的權利。絕對沒有任何條約使俄國有這樣的權利，但是，它從當時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那里得到了這種全權，阿伯丁勳爵當時宣布，“**俄國有根據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自己的各項條約的權利**”。

累亞德先生說道：“俄國在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爾維亞的主人，它可以阻撓任何民族爭取獨立。”

至於多瑙河各公國，俄國首先利用了 1848 年這些省份的民族

运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張和独立主張的人从这里驅逐出去。随后它又迫使苏丹簽訂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約；这个条約确定了俄国干預各公国一切內政的权利，“各公国現在被占領也证明，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

現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流行起一种批判的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們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貿易联系，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不安。俄国的不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傳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个比較重要的城市沒有新教的核心，这应当說主要是美国傳教士的影响和傳教的結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傳教士撑腰的正教僧侶竭尽全力阻撓这个运动，但一切迫害都无济于事，于是緬施科夫公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來說，特別要紧的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現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的精神。”

累亚德先生談到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所謂希腊帝国的計劃，他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正教徒，而是指有别于斯拉夫人的民族）总共不过 175 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們的任何联系，不許希腊族僧侶到自己那里去担任神甫和主教；塞爾維亞人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教堂，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教堂；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賣給俄国。

有些下院議員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問題沒有多大意义，累亚德先生反駁他們說：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領，土耳其版图內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亞細亞、叙利亞、美索不达米亞都将陷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掌握了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統治。占領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視之为世

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深信，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

“它力图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是实实在在地剝蝕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抗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抗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一句话，它要使土耳其不能有其他政府，而只能有俄国的政府。这一次，它的这类阴谋已经完全成功了”。

累亚德先生声称，在緬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薩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错过了机会，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魯特河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没有声明它决不許俄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締結任何条约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魯特河。”

随后，累亚德先生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如果成为独立国，同貝薩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坦丁堡以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为两部分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俄国终将撤出各公国。

“俄国明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的。俄国本来就已經不費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使土耳其受到屈辱；迫使土耳其負担全部軍費，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此外，也是重要得多的一点，它已经貶低了英国和法国在它們本国臣民和东方各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累亚德认为，維也納會議拟定的照会将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絕接受它，俄国就会把矛头轉向我们，要我們当它的

盟国，一起反对土耳其，迫使它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建議。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它，那就意味着英国直接批准俄国有干預土耳其政府 1 200 万基督教臣民的事务的权利…… 我們对这个問題無論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們在这个問題上所占的是二等国的地位，而起头等国作用的只是俄国…… 我們错过了适当解决这个东方大問題的也許是不可复得的机会…… 相反，却让俄国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但这不是我国政策唯一的結果。瑞典、丹麦以及迄今一直指望能够得到我国支持的一切欧洲弱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侵犯是毫无用处的。”

累亚德讲完之后，約翰·帕金頓爵士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見，其所以重要，因为这些意見代表托利党反对派的观点。他对約翰·罗素勋爵不能向議会和全国提供比較令人滿意的消息表示遺憾。他向政府保证說，如果政府决定把撤出各公国当作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这“不仅会得到下院的支持，而且还会得到英国人民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支持”。在文件沒有公布之前，他对于劝土耳其不要把占領各公国看作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的政策，对于在早期阶段上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而使談判长达 6 个月之久，造成沒有信心的气氛，从而使土耳其和大不列顛的利益和貿易遭到損失的政策，将不作評論。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温情脉脉的民主派宏論，这种宏論通常是讲的人比听的人更过癮。如果把这些輕气球似的虛夸詞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們膨脹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沒有。达德利·斯图亚特再一次重复他經常重复的論調，說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說苏丹的統治不論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貿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統治有多得多的自由主义特色。他公正地指出，当多瑙河各公国的不幸居民实际上正遭受着战争災难的时候，大談其和平是沒有用处的。

他要求歐洲保護這些省份的居民免受他們現在遭受到的殘酷壓迫。他從議會史中引用一些事實，證明議員甚至在談判尚未結束時也有權發表言論。總之，“每日新聞”的每一位細心的長期讀者所熟知的事情他恐怕一件也沒有忽略。在他的演說中有兩點“精華”：

“勳爵閣下〈約·羅素〉的解釋雖然不很充分（因為他告訴議院的事情恐怕只是議院以前已經知道的事情），但是遺憾的是，從他所閉口不談的東西中仍然可以得出結論：勳爵閣下干出了他應引以為恥的事情。”

至於阿伯丁伯爵，

“他雖然也會告訴我們，和平已有 30 年的保證，這對歐洲的自由和繁榮大有好處，但是我〈達德利·斯圖亞特〉否認和平對歐洲的自由產生了什麼好處。我要問，波蘭、意大利、匈牙利、還有德國現在處在什麼狀況？”

這位民主派勳爵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完（這是這種第三流演說家的致命的喜好），從大陸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國臣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女王方才罷休。

蒙·米耳恩斯先生，內閣的信徒之一，在他的額頭上寫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罷了。”^①

他不敢完全按照政府的精神說話。他的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湊成的。他一方面認為，大臣們沒有把文件告訴議院是“做得非常聰明謹慎”的；另一方面又向大臣們示意，如果他們採取別的做法，他們的行動會更有力和堅定。他一方面認為政府屈從俄國的要求是對的，另一方面又表示懷疑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等於英國政府叫土耳其採取某種政策而又不準備支持它，諸如

^① 莎士比亞“裘力斯·該撒”第四幕第一場。——編者注

此类，不一而足。最后他說，“这个問題他越想越感到非常难办”，而他越是不大明白，就越是觉得政府的观望政策有道理。

听了蒙克頓·米耳恩斯先生这番支支吾吾，躲躲閃閃，思想混乱的話以后，門茨先生的有点粗魯的直率使我們有一种真正清新的感觉。門茨先生是北明翰的議員，1831年实行議會改革的头脑之一。

“有一次荷兰大使向查理二世提出一个不体面的建議，查理叫道：‘呵，上帝！您从来没有向奥利弗·克倫威尔提出过这类建議’。大使答道：‘当然不会向他提出的，但是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奥利弗·克倫威尔’。如果我国現在有一个像克倫威尔的人，我們就会有另外一些大臣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政府，俄国就絕不会侵入多瑙河各省了。俄皇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促使英国进行战争，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英国現在不过是收获它对这些国家的行为的果实而已。既然談到英国的对外政策，我认为，英国的地位是极其薄弱和不能令人滿意的。我还认为，英国人民感觉到，国家的威信降低了，政府丧失了一切荣誉感，只注意几个英鎊，几个先令和几个辨士。政府目前所关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开支多少，战争对本国各种商人是否有利可图。”

北明翰是軍火生产和枪炮貿易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的代表对于曼彻斯特派的爱好和平的棉織业团体自然要抱譏笑态度了。

太恩河上的新堡的議員布萊克特先生不相信俄国人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他警告政府，“不要陷在任何从王朝观点出发的爱和憎中”。

大臣們受到各派代表四面圍攻，神色阴沉，滿臉頹喪，灰溜溜地低头坐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理查·科布頓走上了讲台，他像狂信者一样異想天开而信仰坚定，像思想家那样矛盾百出，像小店主那样胆怯而精明，用这种态度对大臣們大加贊揚，說他們接受

了他的和平學說，並且在目前情況下加以運用。他宣揚內閣公開實施的、議會默許的東西，宣揚統治階級允許政府實行和議會通過的東西。對戰爭的恐懼心理使他第一次產生了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意味的思想。他暴露了資產階級政治的秘密，因此被當做叛徒拋棄。他使英國資產階級好像在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這鏡子裡的容貌看起來很不雅觀，於是他便恥辱不堪地被人噓了一陣。他反復無常，但是他的這種反復無常本身則是有常的。從過去的貴族那裡繼承下來的傳統的好戰詞令，同現在的交易所經紀人的胆小怕事的事實是不相和諧的，但這難道是他的過錯嗎？

他一開始就宣稱，從這個問題的實質上看，各種意見是沒有分歧的。

“但是，很明顯，土耳其問題仍然引起了極大的不安。”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近 20 年來，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歐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歐洲的外來民族，他們沒有成為歐洲的土著居民，他們的祖國是亞洲；在文明國家裡不能有伊斯蘭教；我們不能捍衛不能自衛的任何國家的獨立，此外，像現在人所周知的，在歐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數是 1 對 3。

“我們應當奉行的政策就是：只有在絕大多數居民都同我們一樣希望阻止任何其他國家占領土耳其的情況下，才能保障歐洲土耳其對俄國的獨立地位……毫無疑問，我們是可以派遣我們的艦隊到貝捷克灣和迫使俄國人有所節制的，因為俄國不想同一個海上強國衝突；但是我們這樣做只會增加巨大的軍備，而仍然解決不了東方問題……問題在於，土耳其和它的基督教居民前途如何？伊斯蘭教不可能保存，而我們若是充當維護歐洲伊斯蘭教的鬥士，我們是會感到十分遺憾的。”

達德利·斯圖亞特勳爵說，為了貿易的利益，土耳其應當得到

支援。他(科布頓)則絕不會為了稅率而進行戰爭。他太堅信貿易自由的原則了，以致認為這些原則的實施無須用戰爭的方法。對土耳其的出口額許多人都估計得過高。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各國所消費的只不過是最小的一部分。

“我們在黑海進行的全部貿易，都要歸功於俄國推進到了土耳其的沿海地區。我們現在得到的糧食和亞麻，不是來自土耳其，而是來自俄國。即使俄國將來還要繼續進攻土耳其，難道俄國就不像以往一樣，樂於給我們送來自己的大麻，自己的糧食，自己的咸肉了嗎？我們在波羅的海也在同俄國進行貿易……而同土耳其的貿易的前景又如何呢？這是一個沒有道路的国家。而俄國人是經商條件好得多的人：不妨看看聖彼得堡，看看它的停泊碼頭、貨物碼頭和貨棧……我們同土耳其這樣的國家能有什麼國家聯盟呢？……人們也談到力量的均勢。這是問題的政治方面……關於俄國的实力，關於一旦俄國占領博斯普魯斯海峽地區對英國產生的危險，人們談得很多。但是認為俄國會進攻英國是非常荒謬的！俄國不向西歐借債，就不能派遣自己的軍隊走出國門一步……這個國家如此貧窮，同英國相比，老實說，只不過是個大鄉村而已。既缺資本，又無資源，永遠不可能損害我國或美國、法國這樣的國家……英國現在比以往強10倍，有多得多的力量來對抗像俄國這樣的國家的進攻。”

接着，科布頓證明，目前，戰爭對英國來說，危險比以往要大得多。英國工業人口增加了許多。英國人對商品的輸出和原料的輸入的依賴性大大增加。他們已不再擁有工業壟斷權。自廢除航運法²⁵⁴以來，英國就不僅要在海運方面，而且要在其他一切部門，經得起世界競爭。

“我懇請布萊克特先生想一想，受苦最大的恐怕是他現在在這裡所代表的港口。政府不理睬不明事理的人們的大聲要求，是英明的……我不想譴責政府維護土耳其帝國的完整的言行，因為這是政府繼承下來的傳統政策……現政府應當受到信任，因為它在人民允許的範圍以內表現了愛好和平。”

理查·科布頓是一個真正的戲劇式的英雄，作為戲劇式的英雄，他同一切真正的英雄一樣，其命運只能是悲劇性的。而接着走上講台的，是一個假英雄，一切騙局的庇護者，製造精美的謊言和恭順的諾言的大師，任何往往在溜之乎也的時候說出來的大話他都能說。這就是帕麥斯頓勳爵。這個老奸巨滑、飽經世故的辯士第一眼就看出，被告如果背棄自己的辯護律師，就可以逃避判決。他明白，現在四面受敵的內閣，如果激烈抨擊敢於替自己辯護的唯一的人，如果放棄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替自己政策辯護的唯一的理由，就能夠根本扭轉局面。再沒有比在科布頓先生那里找出一系列矛盾更容易的事情了。帕麥斯頓指出：科布頓先生開始時表示完全同意上面發言者的意見，而結束時却每一點都同他們的意見背道而馳；他主張維護土耳其的完整，後來却竭力證明，土耳其不應受到任何保護；他，和平的聖徒，替俄國的侵略行動辯護起來了；他肯定說，俄國是弱國，但他認為同俄國打仗必然使英國破產。的確，俄國只不過是個大鄉村，但聖彼得堡既然是一個比君士坦丁堡美的城市，因此俄國就應當有權利統治這兩個城市。科布頓先生雖然是一個貿易自由的擁護者，但他卻不喜歡土耳其的自由貿易而喜歡俄國的保护關稅制度。不管土耳其自身是否消費運到它那里去的商品，或者它只是一條把這些商品運往亞洲其他地方的過道，——難道這些商品能否自由過境對英國是無所謂的嗎？科布頓先生是不干涉原則的熱烈擁護者，現在却想用議會的決定來確定穆斯林、希臘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國內的民族命運。說到這里，帕麥斯頓勳爵大談起土耳其取得的進步和它現在擁有的實力。“的確，土耳其沒有波蘭和切爾克西亞”。但是土耳其相當強大，因此，帕麥斯頓勳爵當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同意俄國

占領若干省份。强大的帝国能够經受得住一切。帕麦斯顿勋爵向理查·科布顿证明了，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根据能适用于帕麦斯顿勋爵及其同僚所奉行的政策。这位老喜剧演員的每一句話都被狂喜的掌声所打断，当他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的时候，却說了这么几句厚顏无耻的同全篇讲话相矛盾的話：

“土耳其本身存在着生命的和繁荣的因素，使我感到滿意，因此我认为，女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健全的政策，应当受到全国信任；遵循这一政策，在今后也应当是每一届英国政府的职责。”（掌声）

用莎士比亚的話來說，帕麦斯顿在“虛声夺人”^①方面是偉大的。用悉尼的話來說，他表現了“一种怯弱的勇气，只敢做明明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事情”。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6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莎士比亚“裘力斯·該撒”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卡·馬克思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²⁵⁵

1853年8月23日星期二于倫敦

德国和比利时的报纸根据本月13日君士坦丁堡电讯，断言土耳其政府已同意維也納會議的建議。法国报纸也收到了当天发自君士坦丁堡的电报，可是它們只报道說，御前會議表现出接受这些建議的傾向。維也納收到最后答复大概不会早于8月20日。所以，土耳其政府在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以前或以后派专使到圣彼得堡去这个非常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决。

据黑海地区的最近报道，已經刮起的东北風开始破坏正常的航行。停泊在平德列克利和沿海地区其他地点的有些船只，为了不被刮到岸上擱淺，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停泊地。

諸君都已知道，由于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发生的事件，苏丹^①已命令这两位国君^②离开公国，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两位国君拒絕执行他們的宗主国君主的要求。此后，苏丹便以瓦拉几亚国君接待并支援了俄国军队为口实把他革职了。革职敕令于8月9日在貴族會議上宣讀，會議决定要求瓦拉几亚国君在現在这个紧急关头不要放棄政权。公爵就这样做了。外交大臣曼努和內务

① 阿卜杜-麦吉德。——編者注

② 吉卡(莫尔达維亚)和施梯尔貝(瓦拉几亚)。——編者注

部司长伊万迪斯也被召赴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們也托詞說他們离开可能引起混乱而拒絕执行命令。因此法国和不列顛的領事都立即断絕了与叛乱政府的一切联系。

塞爾維亞的事态轉趨复杂化。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在上星期五登載了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消息說，奧地利利用苏丹的困难处境向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不久前視察了波斯尼亚和塞爾維亞的奧地利总領事向塞爾維亞公爵亚历山大声称，奧地利准备出兵占領塞爾維亞，鎮压居民中的一切危險活动。公爵拒絕了总領事的建議，并且立即派出专门信使把关于奧地利这一建議的消息通知了君士坦丁堡。列施德-帕沙請求德·布魯克男爵解釋这件事情。后者回答說，总領事曾經与公爵預先商談过关于奧地利附近发生的令人不安的情况，居住在塞爾維亞接壤的边境上的奧地利臣民有可能被誘参加将在这个省爆发的暴乱。列施德-帕沙回答說，奧地利軍隊对塞爾維亞的任何占領都将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一种敌对行动，因为土耳其政府自己負責保卫这个省的安宁；此外，列施德-帕沙答应馬上派专人赴塞爾維亞考察当地現狀并提出报告。

一天以后，在几家倫敦報紙上发表了奧国軍隊进入塞爾維亞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是沒有任何根据的。昨天，也是这些報紙报道，塞爾維亞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也并不更可靠，因为它們根据的是德文 Auflauf〔集会、暴乱、騷动〕一詞的錯誤譯法；实际上只不过发生了小規模的騷动。德国報紙今天发表了8月9日君士坦丁堡的报道，据称，御前會議召开了几次会议討論塞爾維亞局势。亚历山大公爵采取的行动获得了完全的贊同并且通过了下述决定：如果奧地利軍隊企图占領塞爾維亞，那末在必要

时将用武力把他們从那里赶走。一个师已被派往波斯尼亚边境。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私人来信中已經获悉，亚历山大公爵由于与奥地利領事发生冲突，已要求法国和英国領事表示意見，并暂时离开了貝尔格萊德。据說他是前往尼薩等待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

烏尔卡尔特先生在他今天发表于“晨报”上的文章中談到塞尔維亚的复杂情况时写道：

“俄国目前不想同土耳其作战，因为它如果与奥地利一致行动，便会失去自己的正教盟友；可是它却正在把奥地利拖入一場正在爆发的冲突中去，冲突的結果将使塞尔維亚陷入与多瑙河各公国相似的境地。这将是天主教徒与正教徒之間的宗教战争的序幕…… 俄国可以利用背景的突然变化使它 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領为土耳其所接受，让土耳其把这看做是保卫土耳其人、使塞尔維亚免遭奥地利占領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奥地利或土耳其都拖进瓜分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計劃，并且在这方面支持它們。”

为了支付各公国被占后的特別費用，莫尔达維亚国君正打算向俄国的銀行家借債。

保加利亚各要塞粮食奇缺，因此正在厉行節約，各卫戍部队的生活也极困苦。

“君士坦丁堡报”²⁵⁶ 援引了来自阿勒頗的下面一段报道：

“不久以前破获了一个由图謀不軌的土耳其人組成的匪帮，这个匪帮准备像 1850 年那样，袭击城市的基督教居民。可是，由于省长帕沙和阿勒頗駐軍司令阿利·阿斯米-帕沙并未放松警惕，这一企图被鎮压下去了，社会秩序也維持住了。因此希腊派总主教德美特里和阿尔明尼亚派总主教瓦西里代表自己的教区联名写信給列施德-帕沙，感謝苏丹政府对基督徒的保护。”

德文的“圣彼得堡报”²⁵⁷ 在关于东方問題的社論中写道：

“如果說，和平之友在7月初只能抱着一种希望的話，那末近来他們已产生了信心。俄国和土耳其之間的調停現在已完全轉入奧地利手中。維也納将要拟定解决东方問題的办法，这个問題最近引起了从黑海至大西洋整个地区的不安，它也是妨碍欧洲外交家們欢度例假的唯一原因。”

应当注意，这里极力強調調停者不是四大强国而只是奧地利一国，并且用真正的俄国風格把各国人民的不安同外交官們停止休假相提并論。

柏林“国民报”发表了一封7月15日的格魯吉亚来信，信中說俄国打算在月底对高加索人发动一次新战役，阿速夫海上的舰队已进入备战状态，以便支援陆軍的行动。

1853年的議會會議已于上星期六結束（議會休会到10月27日）。委员会宣讀了一篇极其平庸而且內容貧乏的演說詞，这就是女王的詔书。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时，帕麦斯頓勋爵向議會担保說，議会对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問題不用耽心，但是除了說“他信任俄皇的誠实和个人品质”，据說个人品质会使俄国皇帝自願地把軍隊撤离各公国以外，在这方面他沒有做任何别的保证。这样一来，由于帕麦斯頓发表演說反对科布頓先生^①，联合內閣便自作自受，不得不迫使帕麦斯頓郑重声明他“信任”沙皇的“誠实和个人品质”了。同一个帕麦斯頓在同一天接見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貴族团体及其倫敦分支的代表团²⁵⁸，代表团向勋爵閣下贈送了賀信和有亚当·查尔托雷斯基肖像的金质、銀质、銅质紀念章，大概是为了表示感激1846年勋爵同意把克拉科夫沒收²⁵⁹以及他在其他場合对波兰的事业所表示的同情吧。这个巴黎团体的倫敦分支的保

① 見本卷第311—312頁。——編者注

护人、无所不在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当然是扮演着典礼官的角色。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晋见他的傻子们说，“他对波兰的历史极表关切，这真正是充满苦难的历史”。同时，勋爵阁下也没有忘记特意指出他不是以一个阁员的身分说话，而只是以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私人的身分接见他们的。

现在的这次被拖得很长的议会会议的前半期，是被得比内阁的最后挣扎、联合内阁的成立和取得最后胜利以及议会的复活节假日占满了的。至于谈到会议的实际内容，那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所有旧政党的腐化、议员们的行贿以及所有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的完全麻木。这一切都暴露在政府的非常有趣的活动中，这个政府收容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收容了官场的有所有贤人；它把拖延宣布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它企图用各种治标办法来回避困难；它许下种种诺言；它宣称，“所谓执行，就等于某种遗嘱或遗言，表明留遗言的人曾经十分轻率”；它在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后又马上把它收回、更改、推翻；它靠着曾经被它严加斥责过的前任的遗产过日子；它把实行自己的各种措施的主动权交给应受它领导的议院；不多的几个无疑是由它拟定的法案也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例如，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和法权方面的改革（不算个别的细节）都拖延下去了。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航运法案等等，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加拿大预备基金法案提出几天以后便被政府自己改得面目全非。至于预算，那末，关于遗产税的法律在财政大臣提出以前，他本人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这种税。广告税法案也只是在议院两次推翻了财政大臣的提案以后才被财政大臣设法通过的。许可证制度的新条例经过各种各样的修改以后最后被束之高阁。格莱斯顿先生雄心勃勃地作为一个庞大计划提出来的、与

整个預算的气魄相适应的这个条例，被議院通过时已成为一块可伶的补丁，成了各种不相干的、毫无联系的、彼此矛盾的瑣碎条款的簡單混合物了。印度法案唯一重要的特征——不更換东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只是在內閣預先宣布特許狀延期 20 年以后才由內閣提出来的。兩項的确完全是由“群賢內閣”一手拟就的法律，即关于馬車夫的法律和关于國債条款变更的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出議院的門坎就被公众嗤之以鼻了，这证明兩項法律已經破产。“英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政府”的对外政策，連这种政策的拥护者都承认是 *nec plus ultra* [极端] 沒有办法、不穩定和軟弱无力的。但是，在国外的事件具有了威胁性、國內暴露出更加可怕的人民不滿征象的形势下（这种不滿的表現就是空前剧烈和大規模的罢工运动以及宪章派鼓动的复活），皮尔派官僚、輝格党政治寡头以及假激进主义者在切舍姆街締結的同盟²⁶⁰ 更加巩固了。在估計統治階級和內閣的对外政策时，我們不應該忽視一点，即同俄国的战争会酿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大火，現時这大火很容易会在大不列顛的人民群众中得到避免不了的响应。

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簡單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犹太人法案，暴露了它的伪善；它埋葬了工人結社法案，暴露了它对工人階級的敌視；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打入了冷宮，暴露了它对爱尔兰人民的利己仇恨心；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壟断，暴露了它袒护印度的貪賊枉法風气的頑固立場。上院始終同政府暗中勾結，它們商量好如果有过什么进步措施要在下院通过，那末就由开明的上院議員們把它否决掉。

在議會休会前提交議會的文件中，有一批英俄政府之間关于多瑙河苏利納支流航行遭到破坏問題的連篇累牘的来往函件。这

批函件是从1849年2月9日开始的,到1853年7月止,沒有取得任何实际的結果。事情曾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奥地利政府也被迫宣布,多瑙河口已不能通航,它寄往君士坦丁堡的邮件今后将取道的里雅斯特。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是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侵略采取纵容姑息态度的結果。1836年英国政府默认了俄国无理强占多瑙河口的行为,虽然在承认以前它还指示一个商行抵抗俄国政府官員的干涉。

同緬甸簽訂的所謂和約(这个和約1853年6月30日由印度总督的文告宣布,女王还就这个和約向議會祝賀),实际上只是一种休战。阿瓦国王^①为飢餓所迫只好屈服,表示願意停止軍事行动,他釋放了英国俘虏,請求解除河道封鎖,并且禁止他的軍隊进攻英国政府卫戍部队占領的密卡岱和东吁这两个地区,正像土耳其政府禁止它的軍隊进攻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軍隊一样。可是阿瓦国王拒絕承认英国想得到勃固或緬甸帝国的任何别的地区的无理要求。英国在与緬甸作战中所获得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建立了一条危机四伏并且存在着爭論的边界,而不是可靠的和得到承认的边界。英国极力冲破自己的印度領地的人种边界、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現在,天朝帝国也已經不是英国侵略力量的天然障碍了。英国在亚洲失去了重心,它要进行无止境的侵略。它再也无法控制自身的运动,只有到陆地尽头面临大海的地方它才会止步。因此,英国大概要打开东方最远的国家使它們同西方交往,但它是不能占有这些国家,把它們保持在掌握之中的。

南威尔士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不仅尙在繼續进行,而且引起了

① 門登。——編者注

铁矿工人們的新罢工。預料在商务航运法案生效之际不列顛的海員也将实行总罢工,因为这一法案允許招收外国水手,正如海員們所說,这純粹是为了降低他們的工資。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讀者諸君注意正在发生的罢工的意义,現在,連倫敦的資產階級刊物也开始了解这种意义了。例如,“泰晤士周报”²⁶¹ 上星期六曾指出:

“雇主与工人之間的关系特別尖銳起来了。劳动正在全国各地大胆地反对資本,并且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由此引起的斗争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工人階級已坚决要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目前运动暂时还只限于一系列分散的小战斗,可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这些分散的战斗行动轉变成有步驟地、普遍地、联合一致地进攻資本的日子已經不远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23 日

載于 1853 年 9 月 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64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米哈伊尔·巴枯宁

致“晨报”編輯

閣下!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 1848 和 1849 年編輯的“新萊茵报”卷入他們和“弗·馬·”^①之間关于巴枯宁的論战²⁶²。他們向英国公众宣称,对巴枯宁的誣蔑发端于我們的报纸,說什么这家报纸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詆毀絲毫沒有触动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助于解决有关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爭論,所以,請允許我說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1848 年 7 月 5 日,“新萊茵报”收到了两封巴黎的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訊社的通訊原稿,另一封是与这个通訊社完全沒有联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的私人通訊。在这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說,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 月 6 日,“新萊茵报”发表了駐巴黎通訊員^②的信。

巴枯宁本人則在“新奧得报”²⁶³(布勒斯劳出版的报纸)上声明,早在“新萊茵报”发表这篇巴黎通訊之前,类似的謠傳就在布

① 弗兰西斯·馬尔克斯。——編者注

② 艾韋貝克。——編者注

勒斯劳秘密地散布；这些謠傳来自俄国大使館，他将写信給乔治·桑，这是他对这些謠傳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給乔治·桑的信与他的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馬上在“新萊茵报”上轉載了（見1848年7月16日“新萊茵报”）。1848年8月3日，“新萊茵报”接到巴枯宁通过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轉来的乔治·桑給“新萊茵报”編輯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語：

“本报第36号會报道巴黎謠傳乔治·桑掌握有一些信件，信件把俄国流亡者巴枯宁說成皇帝尼古拉的間諜。我們所以报道了这件事，是因为两位完全沒有联系的通訊員同时向我們送来了这个消息。我們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應該表现出高度警觉的。在这同时，我們也給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我們甚至沒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新奧得报’轉載了他的声明和他給乔治·桑的信。現在我們发表乔治·桑給‘新萊茵报’編輯的的直接譯文，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一偶发事件。”（見1848年8月3日“新萊茵报”）

1848年8月末我路过柏林时，会見了巴枯宁，恢复了我們二月革命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誼。

1848年10月13日，“新萊茵报”譴責了普魯士內閣驅逐巴枯宁出境，譴責了它所发出的如果巴枯宁敢于回到普魯士就把他交給俄国的威胁。

1849年2月15日，“新萊茵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发表了社論，开头两句話就是：“巴枯宁是我們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們批評他的小册子”²⁶⁴。

在发表于“紐約每日論壇报”的題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們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頓起义給予了应有的評價²⁶⁵，同时也指

責了德国报刊和德国人，指責他們极度怯懦，竟然对于把巴枯宁交給他們共同敌人一事表示容忍。

至于說到“弗·馬·”，既然他頑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陰謀，那末，如果他想立論严整的話，他就不仅應該譴責巴枯宁，而且也應該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間諜加以譴責。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給俄国作間諜，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卡尔·馬克思

1853年8月30日于倫敦

載于1853年9月2日“晨報”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晨報”

卡·馬克思
粮价上漲。——霍乱。——
罢工。——海員中的运动²⁶⁶

1853年8月30日星期二于倫敦

据“布勒斯劳报”²⁶⁷报道，瓦拉几亚的粮食出口已被完全禁止。

現在，一个在一定意义上比东方問題更为重要的問題，即粮食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在科尼斯堡、施特庭、但澤、罗斯托克、科倫、汉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粮价都已上漲；不言而喻，在所有較大的市場上情况都是这样。在英国內地的主要市場上，小麦价格由每夸特4先令漲到6先令。比利时和法国小麦和黑麦价格不断上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面包价格騰貴，已引起严重不安。法国政府正在英国、敖德薩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购粮食。关于英国收获量的最后材料最早要到下星期才能得到。在英国各地，馬鈴薯所遭的病害比爱尔兰更加普遍。意大利各地政府，其中包括倫巴第当局，都禁止粮食出口。

上星期在倫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們还听說，霍乱已蔓延到柏林。

劳动与資本之間，工資与利潤之間的战斗尙在繼續。在倫敦的运煤工人、理发师、裁縫、女鞋鞋工、雨伞工、衬衣女工以及所有

衬衣工人中間，另外，在服装商店和出口批发公司的工人中間，都又发生罢工。昨天，許多磚瓦工人以及用駁船把停在太晤士河的大船的貨物搬运到碼頭上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南威尔士煤矿工人和冶金工人的罢工尚在繼續。除上述一系列的罢工之外，还有雷佐温煤矿工人以及許多其他地方的新罢工。

我每个星期都得到各种罢工的消息，如果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把它們一一列举出来，那会令人感到厌烦。因此我今后只是不时地报道其中一些具有特別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罢工。从这方面来看，值得提出的是警察和他們的长官理查·梅恩爵士之間持續已久的冲突，虽然这还不是罢工。理查·梅恩爵士在給首都各警察分局的指令中禁止警察举行大会和結社，同时宣布他准备亲自审理每一項个人的申訴。警察回答他說，他們认为集会的权利是英国人不可剝夺的权利。梅恩爵士要他們注意他們的薪水是在食品比現在貴得多的时候确定的。他們回答說，“他們提出要求的根据不仅是食品价格，而且是他們确信現在的活人已不像先前那样不值錢了”。

在这所有各次罢工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海員联誼会”印发并被他們称为英国海員权利法案的宣言。宣言牵涉到商务航运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廢除了航运法中的一条关于不列顛船主必須使本船海員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不列顛臣民的規定。新法案使外国海員甚至在那些不允許外国船只通行的地方都能参加近海航运。宣言的作者們宣布，这不是海員权利法案，而是船主权利法案。在通过这一法案时除了船主以外同任何人都沒有商量过。关于招收船員的那一条規定曾經对船主起了約束作用，使船主不得不对船員好些，不得不关心他們的給养。新法律把船員交給任何一个坏

船长全权支配。这个法律所根据的一个原则是：“17 000 个船主全是品德高尚、宽宏大量、慈善为怀的人，而海员全是蛮不讲理、行为乖戾、天生凶恶的人。”海员们又说，船主可以把他的船开往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而海员的劳动却只能在本国范围内使用，因为政府废除了航运法，但是政府并没有事先设法也使他们取得受雇于外国船只的权利。

“由于议会使海员作了船主的牺牲品，我们作为一个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采取自卫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海员们打算捍卫招收船员的条款中与他们有关的那一部分。同时他们又宣布：

“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员应当被看做不列颠人，我们将吁请他们支持我们的联盟。鉴于在 10 月 1 日上述法律生效后以英国臣民的身分航行不再有任何优待，而以外国人的身分于和平时期在不列颠船上服务反而可以保证在战争时期不应征到女王陛下的海军中服役，并且没有这种义务，又鉴于在和平时期享有美国的自由有更多的保障，海员们将在到达这个共和国的任何港口以后设法取得合众国的公民证书。”²⁶⁸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9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73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致“人民报”編輯²⁶⁹

閣下!

本月3日“晨报”发表了附在本信之后的“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一文,同时却拒绝刊登我对这位“外国通讯员”的答复。閣下如能把这两篇文章——俄国人的文章和我对它的答复一并刊登在“人民报”上,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

9月7日于倫敦

“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間諜,——巴枯宁不是俄国間諜。巴枯宁在什呂謝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經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沒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軍,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沒有被充軍,他仍然被关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这就是輪流在报刊上出現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

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揚的今日,我們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沒有領俄国軍事部門的津貼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們不知道,人道使人們处在互相制約的关系中;他們不知道,我們使德国摆脱俄国現時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

要使他們相信巴枯寧是進步的世界主義的最純潔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費氣力的。

法蘭西有句諺語：‘誹謗，誹謗，總會留點影響。’巴枯寧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對他的誹謗，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

還有一句諺語：‘只有自己人才出賣自己人，寧願和聰明的敵人打交道，也不願和愚蠢的朋友講來往。’不是那些保守派報紙散布對巴枯寧的誹謗，而是一家朋友的報紙表示了這種關切。

誰能夠哪怕是在一剎那間忘記——就像馬克思先生那樣忘記——巴枯寧並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頭，這樣的人的革命感情顯然是非常淡薄的。為什麼他不至少是像英國報紙通常所做的那樣，不發表一位波蘭流亡者告發巴枯寧的信呢？他的名字已與誣告聯繫在一起，對於這一點，他不必有什麼遺憾了。”

關於在星期六“晨報”上發表文章的 一個外國通訊員

“寧願和聰明的敵人打交道，也不願和愚蠢的朋友講來往。”完全正確。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見相反才有爭論，只有從相互矛盾的論斷中才能得出歷史的真實，因而把這當作一種發現而表示大驚小怪。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認為在1853年有必要對1848年巴枯寧本人已表示滿意的解釋吹毛求疵；正是“愚蠢的朋友”，才“重新把俄國推向”它從未擺脫過的“專制制度的懷抱”，另外還把一個日常慣用的拉丁諺語叫做法國諺語。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要別人相信，似乎一家報紙刊登了它的外國通訊員寫的一篇報道而編輯未作任何評價，就是“支持”他的

报道。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保守派报纸”抬作“革命感情”的典范，这种感情曾經在最紧张的关头发明了 lois des suspects [嫌疑犯处治法]，甚至怀疑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阿那卡雪斯·克罗茨这样的人生就一副卖国贼的“骨头”；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敢用巴枯宁的名义去攻击第三者，而不敢用自己本人的名义为巴枯宁辩护。

最后請让我对陈腐諺語的爱好者声明，我同他以及巴枯宁的諸如此类的朋友的爭論就到此为止。

卡尔·馬克思

1853年9月4日于倫敦

載于1853年9月10日
“人民报”第7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維也納照會。——美國與歐洲。
——蘇姆拉來信。——
皮爾的銀行法令

1853年9月9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在8月30日的文章中曾向諸君報道²⁷⁰，土耳其政府實質上已拒絕了維也納照會，因為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見和立即先行撤退的要求²⁷¹無異是拒絕滿足俄國的貪欲。當時我的這個看法與所有的報刊都有分歧，它們都斷言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見問題不大，根本不值一提，並且說總的說來可以認為問題已經解決。沒有過上幾天，“紀事晨報”就使輕信的交易所經紀人大吃一驚，它報道，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見十分嚴重，要使問題解決還很不簡單。現在只有一種意見了，即認為整個東方問題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雖然昨天各報都全文發表了列施德-帕沙1853年8月19日致奧地利、法國、大不列顛和普魯士代表的正式照會，這種印象也絲毫沒有減弱。

俄皇一定會拒絕土耳其的“修正意見”，這一點是用不着懷疑的。俄皇在巴黎的《Moniteur》^①“國民議會報”就已經向我們報道：

① 官方機關報。——編者注

“據今天巴黎收到的消息稱，彼得堡當局的第一個印象是完全不利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見的。不管彼得堡當局將作出什麼樣的決定，我們都應該準備以冷靜態度對待之，並且不要表現出不安。我們應當注意到，即使俄國當局不同意接受土耳其政府對維也納照會提出的修正意見，那也還有一條在君士坦丁堡重開談判的出路。”

這裡暗示俄國將企圖再一次拖延解決爭端，柏林報紙“石印通訊”也證實了這一點：

“奧地利政府向尼古拉皇帝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對修正意見一事有新的建議，它現在正採取步驟，試圖用完全不同於前此一切嘗試的辦法來消除危機。”

維也納報紙“漫遊者”²⁷²刊登了一封8月26日敖德薩的來信，信中說，“東方問題的解決還不像某些人所料想的那樣快”。喀琅施塔得的“衛星報”則斷然肯定，俄國軍隊在多瑙河各公國將駐扎到冬季營地中去。

貴報編輯部關於英格拉哈姆艦長的評論²⁷³，甚至比華盛頓發來的照會還要震動歐洲。倫敦幾乎每一家週報、法國的許多報紙、布魯塞爾的“民族報”、都靈的“議會報”、“巴塞爾日報”和德國所有的自由主義報紙都加以轉載，有的加了評論，有的未加評論。由於一系列的德國報紙同時也轉載了貴報關於瑞(士)美(國)同盟的文章，所以諸位會看出，柏林“石印通訊”報上一篇文章中的下面一段話部分地也是針對貴報而發的：

“曾經有一個時候，報界借各種理由表示了自己對美國的干涉論的看法。最近，由於士麥那的科斯塔事件，爭論又起。這一事件還沒有了結，而外國報紙和地方報紙已經在研究瑞士一旦遭到侵略威脅合眾國站在瑞士方面進行干涉的可能性了。今天我們得到消息說，某幾個強國打算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抗議合眾國提出的國際法理論；還說，這些國家的內閣會取得完全一致的

意見。美國的干涉論如果不最堅決地予以否定，在歐洲根絕革命精神就將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除這項報道之外，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法國是準備簽署這一抗議聲明的強國之一。”

星期二的“立憲主義者報”不辭辛苦地使最後這段話變得明白：

“必須毫不含糊地把一切談清楚。美利堅共和國的代辦們不是把科斯塔當作合眾國的公民，而是把他當作革命者來保護，不許奧地利逮捕的。但是沒有一個歐洲強國會把合眾國政府有權用武力保護歐洲革命的說法當作國際法的一個原則來接受。當某個國家的政府行使它的司法權的時候，無論如何都不能容許用罪犯已改變國籍這個可笑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這個罪犯是反對本國政治制度的）加以阻撓。美洲聯邦的艦隊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的；像‘聖路易號’輪船船長那樣的橫蠻行為，在另一種情況下可能造成極為可悲的後果。”

在我們今天收到的士麥那出版的“公道報”上，有幾封很有意思的蘇姆拉來信：

“總司令奧美爾-帕沙把軍隊配置得很好，一有必要他就能在24小時內把65 000名步兵和騎兵及180門火炮集中到多瑙河的任何地點來。據我收到的瓦拉幾亞來信說，傷寒正在使俄國軍隊大量減員，戰局開始以來已損失不下13 000人。死屍都盡量在夜間埋葬。馬匹也大批倒斃。而我們的軍隊什麼病都沒有。在多瑙河的对岸，時時出現穿着莫爾達維亞制服的俄國兵，30人至60人一群。他們的一切行動我們的將軍都知道。昨天來了1 000名阿爾巴尼亞天主教徒。他們是一支13 000人隊伍的先頭部隊，這支隊伍將在日內開到。他們全是優秀射手。昨天還來了3 000名騎兵，全是久經戰場的，武器和裝備都好得很。我們軍隊的人數正在一天天增加。阿罕默特-帕沙昨天動身到瓦爾那去了，他將在那里等候埃及軍隊的到來，以便把他們派到預定的地點去。

1853年8月8日寄自蘇姆拉

8月9日，蘇丹近衛軍的兩個步兵團和一個輕炮兵連已開向腊茲格腊特。

8月10日我們得到消息說，5 600名俄軍已在多瑙河岸土特腊坎港附近扎營，這樣一來雙方軍隊的前哨彼此相距僅在步槍射程之內。英勇的團長伊斯甘德-貝伊已帶軍官數人去此處。奧美爾-帕沙已安排好電訊聯繫，多瑙河任何一個地區發生的事情無論在白天和黑夜隨時都能報告給司令部。

最近幾個星期不停地下雨。雖然如此，築城工程仍大力進行。每天兩次在黎明和黃昏鳴放禮炮。對岸完全沒有這種聲勢。

埃及軍隊在君士坦丁堡經過防疫檢查以後，就將乘船前往瓦爾那，從那里再開往巴巴達格山。准將伊塞特-帕沙在那里等着他們。在多布魯甲-奧瓦西地區已集結兩萬名韃靼人，準備參加對俄戰爭。他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俄國占領克里木時從克里木出走的流亡者。由於陸續開來新軍（包括正規的和非正規的），奧斯曼軍隊的人數正一天天增加，他們倦於無仗可打，渴望戰役開始。恐近日不待上級下令就會強渡多瑙河，現在這種可能性特別大，因為俄軍不時在對岸出現使我軍更為激怒。幾天前有一批醫生，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前往普勒夫那、腊茲格腊特、維丁和錫利斯特里亞等地去建立歐式軍醫院。11日從瓦爾那來了兩位英國高級軍官。他們與奧美爾-帕沙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在幾個土耳其軍官的陪同下，他們參觀了工事，並且認為構築得很好，有足夠數量的火藥庫、面包房和清水庫等等。所有防禦工事修築得極為牢固。我軍紀律執行得十分嚴格。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寄自蘇姆拉

英國將軍奧當奈爾於13日從君士坦丁堡來此。他與奧美爾-帕沙作了兩小時的談話，第二天在總司令副官陪同下參觀了工事。昨天從瓦爾那開到三個炮兵連，另外還有大量軍需品。明天有一個炮兵連、兩營步兵和1 000名騎兵去增援拉索瓦港。在拉索瓦，工兵部隊正大力修復1828年被俄軍破壞的工事。土耳其可以絕對信任自己的軍隊了。

1853年8月15日星期一寄自蘇姆拉”

上星期四，菲茨威廉伯爵曾寫信給設菲爾德的鉗工大會，他在这封信中表示反對勇敢的帕麥斯頓在議會會議閉幕時所提出的“應該依靠俄皇的誠實和個人品德”的荒誕主張。

迪斯累里先生決定在9月14日會見他的艾爾斯貝里選民。

昨天的“每日新聞”刊登了一篇长而无味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駁斥該报預測中的迪斯累里先生要向他的选民所說的話。我以为，“每日新聞”如果能让它的老前輩倫敦“笨拙”杂志²⁷⁴去完成这桩大事业，恐怕合适得多。

現在，英格兰銀行第四次（从1月份算起）提高了貼現率。9月4日規定貼現率为4%。倫敦的“太阳报”²⁷⁵对此大嚷：

“这是又一次縮減国家流通資金的嘗試，又一个阻碍人民福利发展的設施。”

另一方面，这家报纸又用这样一种設想来安慰自己，即认为英格兰銀行在皮尔立下了1844年法令之后已丧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害的实力。

“太阳报”害怕也怕錯了，希望也寄托錯了。英格兰銀行像其他任何銀行一样，沒有多大的能力来增加或减少国家的貨幣流通量。1844年的皮尔法令不仅沒有削弱这个銀行所拥有的实际的有害的实力，而且相反地加强了它的这种实力。

由于一般人对1844年的銀行法令理解得不正确，同时这个法令的影响在危机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商业世界都将十分严重，所以我想简单地說明一下这个法令的实质。

1844年皮尔銀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屬的貨幣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貨幣流通；流通中的貨幣量能調节价格；在純粹金屬貨幣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內流，貨幣量就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貨幣量就要减少；銀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屬貨幣的流通完全一样；因此，英格兰銀行地下室里的黄金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銀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銀行券的发行量應該增加，外汇行

市不利時則減少；最後，英格蘭銀行對流通中的它的銀行券數量實行監督。

所有這些前提，沒有一個不是完全錯誤和違背事實的。即使假定存在着純粹金屬貨幣流通，流通中的貨幣量也不能決定價格，正像它不能決定純粹商業交易和工業交易的數量一樣；相反地，價格將決定流通中的貨幣量。外匯行市不利和黃金流失也不會造成甚至純粹金屬貨幣流通量的減少，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受到影響的不是流通中的貨幣量，而是儲備的，即作為銀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儲藏的形式存在的貨幣量。另一方面，外匯行市有利以及隨之而來的黃金內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貨幣量，而是銀行里儲存的和私人儲藏的貨幣量。因此，以純粹金屬貨幣流通的錯誤觀念為出發點的皮爾法令，很自然地就導致在紙幣流通中也不正確地套用這種法令。要發行銀行對它所發行的銀行券數量實行監督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的。銀行發行可兌成黃金的銀行券，或者，一般憑商業擔保預付的銀行券，但是它無法使自然流通額增加或減少哪怕是一張銀行券。當然，銀行可以發行任何數量的銀行券，只要它的顧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這些銀行券也只能或者以存入銀行的方式，或者以償付債務及兌成金屬貨幣等方式回到銀行里來。另一方面，如果銀行要強制減少發行數量，那末就將有為了填補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數量的存款被提回去。所以，不論銀行有怎樣的可能去濫用別人的資本，它對流通中的貨幣量都沒有任何支配權力。例如在蘇格蘭，雖然銀行事業的發展在1845年以前實際上並沒有受到限制，而且從1825年起銀行增設了很多，但那裡的貨幣流通量卻減少了，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只有1英鎊（紙幣），而英格蘭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是2英鎊，同時英格蘭

5 英鎊以下的貨幣單位基本上還是用金屬貨幣流通，而蘇格蘭則用紙幣。

認為流通中的貨幣量應該與黃金儲備相符合，這種想法是十分虛妄的。如果銀行地下室里的黃金儲備增加，不言而喻，這個銀行就將竭盡全力擴大它的銀行券的流通，但是，經驗教導我們，這是沒有用處的。英格蘭銀行在 1841 年至 1843 年這一時期內的黃金儲備從 3 965 000 英鎊增加到 11 054 000 英鎊，可是它的流通券總額卻從 3 566 萬英鎊減少到 34 094 000 英鎊。法蘭西銀行截至 1845 年 3 月 25 日發行的銀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 25 600 萬法郎，黃金儲備是 23 400 萬法郎，而到了 1846 年 3 月 25 日，它的銀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 249 404 000 法郎，但黃金儲備只相當於 9 535 000 法郎。

認為在黃金外流時國內貨幣流通量就要減少的假定也同樣是錯誤的。例如現在黃金繼續外流，但造幣廠又到了 300 萬美元，加入國家的貨幣流通。

但是，最主要的錯誤是這樣一種假定，即認為如果需要貸款即需要借貸資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貨幣的流通資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證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貨幣流通完全無關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業交易。衡量銀行償付能力的最好尺度是市場貼現率，而確定實際由銀行進行的業務量的最準確的指標是貼現期票的周轉額。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雙重衡量方法。在 1845 年 3 月至 9 月的時期中，虛擬資本隨着投機熱曾經增長到最高峰，各種各樣的大宗成交的業務簡直淹沒了全國，那時，貼現率約為 2.5%，而銀行券的流通量幾乎沒有任何變動；但是稍後在 1847 年時期中，當貼現率達到了 4.5%，股票價格極度下跌，到處都

拒絕貸款的時候，銀行券的流通量却達到了最大的數字。

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流通量截至1847年4月17日共計21 152 853英鎊，1847年5月15日是19 998 227英鎊，1847年8月21日是18 943 079英鎊。但是，在流通量這樣減少的同时，市場貼現率卻從7%和8%下降到5%。從1847年8月21日起至10月23日止，銀行券的流通量從18 943 079英鎊增加到21 265 188英鎊，而在同一時期市場貼現率從5%提高到8%。10月30日，銀行券的流通量共計21 764 085英鎊，而在倫巴特街支付的利息卻上升到10%。現在讓我們再看看另一個例子。

英 格 蘭 銀 行

	貼現期票	流通中的銀行券
1846年9月18日……	12 323 816 英鎊	20 922 232 英鎊
1847年4月5日……	18 627 116 英鎊	20 815 234 英鎊

可見，1847年4月的銀行貸款比1846年9月多600萬英鎊，但是這些借貸業務所用的流通中的銀行券是極少的。

說明了皮爾的銀行法令的基本原則以後，現在讓我來談談它實際方面的細節。這個法令預定，貨幣流通量的最低必要數字是1 400萬英鎊銀行券。英格蘭銀行所發行的超過這個數字的全部銀行券，都應該有相應的黃金儲備作保證。羅伯特·皮爾爵士自以為他發現了一個自動起作用的發行銀行券的原則，能夠以機械的準確性確定流通中的貨幣量，使貨幣量的增減完全與黃金儲備的增減成比例。為了實際推行這個原則，銀行就分成兩個部門——發行部和銀行部。第一個部門純粹是銀行券製造廠，第二個部門才是真正的銀行，它接受國家和公眾的存款，付股息，貼現期票，發放貸款並根據共同的原則辦理對其他任何銀行機構的一切業務。

发行部把它所发行的、总数等于 1 400 万英鎊加銀行地下室中現有黃金儲备总值的銀行券移交給銀行部。銀行部便把这些銀行券向公众散发。为抵銷已发行的超过 1 400 万英鎊的銀行券所必需的黃金儲备留在发行部,多余部分則归銀行部。如果黃金儲备减少到不够抵銷流通中的超过 1 400 万英鎊的銀行券的程度,那末作为偿还貸款或作为存款回到銀行部的銀行券便不再发行和轉換,而是予以注銷。假如流通中的銀行券有 2 000 万英鎊,而黃金儲备只有 700 万英鎊,那末,只要再外流 100 万英鎊的黃金,全部現存的黃金儲备就只够发行部用的,銀行部就会連一个金币也沒有。

从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整套算計,一方面帶有虛妄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帶有极为有害的性质。

可以拿英格兰銀行在上星期五的通报上发表的报告作一个例子。在报告的“发行部”一栏中,你們可以看到下面的統計数字:流通中的銀行券共計 30 531 650 英鎊,或者是 1 400 万英鎊加 16 962 918 英鎊——后一个数字是与上星期的黃金儲备相符合的数字。但是再看“銀行部”一栏的数字,你們便可以在这一栏的资产項下发现有 7 755 345 英鎊的銀行券。这是总数 30 531 650 英鎊中沒有被公众接受的部分。可見,自动起作用的原則所管的只限于发行部把 30 531 650 英鎊的銀行券移交給銀行部这一件事。即使移交了,这些銀行券也沒有流动。而銀行部只要一与公众接触,那时調节流通中的貨幣量的便不是皮尔法令,而是实业生活的需求了。因此,自动起作用的原則的影响不能超出銀行地下室的范围。

另一方面,英格兰銀行由于它据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不仅对英国貿易,而且往往对世界貿易也发生实际的影响。在普遍感到貸款

不足的時期就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在這樣的時期中，如果根據皮爾法令，隨着黃金外流相應地提高最低的貼現率并拒絕貸款，銀行就會使國家證券貶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極大程度上加重商業危機的破壞性。為了阻止黃金外流并改變匯率，銀行就會使任何商業停滯變為對貨幣流通的威脅。英格蘭銀行在 1847 年就曾經這樣做過，而這是被皮爾法令逼迫着做的。

可是這還不算完結。在任何銀行機構中，最沉重的負擔并不牽涉到一定數量的流通中的銀行券，而是牽涉到一定數量的作為存款的銀行券和金屬貨幣。例如荷蘭的銀行，據安德森先生在下院委員會上說，在 1845 年以前有存款 3 000 萬英鎊，而在流通中的只有 300 萬英鎊。

亞·貝林先生說：“在歷次商業危機時期，例如在 1825 年危機時期，最可怕的要求不是銀行券持有者的要求，而是存款人的要求。”

現在，由於皮爾法令規定要把黃金儲備儲存起來作為保證銀行券兌成黃金的後備，銀行經理們便有充分的可能随心所欲地處置存款了。而且，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正是這個法令所立下的制度，才會使銀行部停止發給存款和股息，同時某種數量的黃金却存放在發行部的地下室里。在 1847 年就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當時銀行部危急萬分，只是由於政府的參預，負責於 1847 年 10 月 25 日使皮爾法令暫停生效，銀行部才免遭破產，而在這樣的時候，發行部卻擁有 6 100 萬英鎊的黃金儲備。

所以，實行皮爾法令的一個後果，就是英格蘭銀行在 1847 年危機期間改變了 13 次貼現率，而在 1825 年危機時期卻只改變了兩次；其次，就是這個法令在危機最深的時候引起了一系列的財政混亂（在 1847 年 4 月和 10 月）；最後就是：如果不是使法令本身停

止生效，銀行部就得被迫停业。因此，皮尔法令将加深日益逼近的危机的恶变性和尖锐性，是没有什么疑問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9 日

載于 1853 年 9 月 2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1853年9月13日星期二于倫敦

最近一号的“星期日时报”²⁷⁶公布了克拉倫登勳爵給汉·西摩尔爵士的一封电报，作为对涅謝尔罗迭伯爵7月2日的照会的答复。发电日期注明是7月16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答复的«doublière»〔“复制本”〕。在上星期六“先驅”上有一篇通訊，作者以无所顾忌的方式对阿伯丁和帕麦斯頓两位勳爵之間的“对抗性”发表了以下的言論。

“阿伯丁勳爵从来都不能理解帕麦斯頓勳爵的假惺惺姿态；他看不到，多亏采取了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帕麦斯頓勳爵才能够毫无痛苦地执行了亲俄政策，甚至比阿伯丁勳爵本人执行得更好……帕麦斯頓勳爵用倾向于和解的假面具掩盖着自己的厚顏无耻……阿伯丁勳爵則和帕麦斯頓勳爵相反，他公开地表示自己的信念……帕麦斯頓勳爵懂得大談干涉而实际上不干涉的好处，而阿伯丁勳爵則不懂得这种好处……阿伯丁勳爵由于和統治阶级极为亲近，所以知道如何謀取席位，如何买到选票，因此他才不把英国宪制看做人类的种种法規中最完善的法規；阿伯丁勳爵认为，欧洲大陆的居民并不比大不列顛的居民更和善、更正派，所以他在大陆各国政府面前不坚持廢除家长式专制制度以实行統治阶级的自治……阿伯丁勳爵知道，大不列顛的实力是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基础的，所以他鄙視那种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正在战斗的民族的对政策。阿伯丁勳爵看不出，曾經占領和掠夺印度、而且現在正以印度本身的福利为名压迫着印度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痛恨沙皇尼古

拉——后者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善良的专制君主，而且正以波兰的福利为名压迫着波兰。阿伯丁勋爵不了解，曾经扼杀了爱尔兰多次起义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极端痛恨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同时，由于他知道英国强迫爱尔兰接受异教，所以他很能理解教皇想把红衣主教魏兹曼安置在韦斯明斯特的热烈愿望。他知道我们同卡弗尔人打过仗，所以他不把那位不断和高加索人打仗而断送自己军队的尼古拉看做一个恶棍；他知道我们经常把造反的密契尔和奥勃莱恩这一类人发配到凡迪門島去，所以他对于路易-拿破侖在凱恩建立了苦役区并不感到震惊。当他迫于必要给那不勒斯政府写信谈到西西里島事务的时候，他也不会陷入热狂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没有忘记大不列颠在科尔富島上也有总督……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这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妥贴，既有采取亲俄行动的阿伯丁勋爵，又有以百蒙得錫政策的精神来讲话的帕麦斯顿勋爵。”

为了证明我并没有过分低估瑞士的勇敢精神^①，我可以引证瑞士联邦委员会给德森州当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写道：

“卡普勤教士的问题²⁷⁷纯粹是州的问题，因而德森州应当自己决定怎样做对自己最好：是进行反抗并继续受奥地利的严厉措施的打击，还是向政府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瑞士联邦委员会企图把它和奥地利的争端归结到单纯一州的范围中去。联邦委员会最近还颁布了一项把意大利人克莱門蒂、卡索拉和格里倫佐尼驱逐出境的命令，虽然庫尔的陪审官们已经承认了他们无罪，承认他们并没有穿越德森州的边境运送武器去帮助米兰起义²⁷⁸。

英国人给予札格納特庙的援助，看来还没有完全停止。董事会在1852年5月5日曾经给印度总督发出下面一封电报：

“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使英国政府完全摆脱与神庙的任何关系，所以，我

① 見本卷第124—125頁。——編者注

們全权委托您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不容許給神庙以任何定期的金錢援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另一方面，应当結算补偿費，凡是根据过去的約定或協定在加以相当广泛的解釋的情况下有此权利的人，都应得到补偿費。”

但是，直到 1853 年 4 月 11 日，印度当局在这方面还什么都沒有做，問題到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政府已經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時間来調查北明翰監獄中的犯人遭到殘酷虐待的事情——这种虐待已經达到他們当中的一些人自杀而另一些人也企图自尽的程度。被发现的暴行不亚于在奥地利或那不勒斯的任何一个 *carcere duro* [刑訊室] 里所干出来的事情，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另一方面，視察監獄的官員們对当事方面的口供百說百信态度和对受害者极其冷淡的态度也不能不使人大为惊異。他們对野蛮的獄吏的关怀已經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視察之前总是先通知獄吏。暴行的主犯奧斯丁中尉，就是卡萊尔在他所写的“模范監獄”²⁷⁹ 一书中叫做流浪汉和罪犯的真正指揮官的那号人。

关于**铁路公司的道德問題**是一个比較突出的問題。約克郡—郎卡郡铁路管理局在它們的火車票上特別印着这样一个告白：

“本管理局对于它未能預防或因職員疏忽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或損失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同时，北明翰—希魯茲布里铁路管理局在星期六以欺騙股東罪在副大法官法庭受审。西方大铁路和西北铁路都想并吞上述的北明翰—希魯茲布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大多数股東主張同西北铁路合并，而管理局的委員們則主張加入西方大铁路，于是他們就决定利用委托給他們結算的一部分股票来取得虛假的票数。为了这个目的，他們把股票分发到許多名义上的股票持有者的名下（有些人

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們的名字是被拿来頂替的；有一个竟然是9岁的小孩)，这些股票持有者既然不偿付股票价值，于是以后就把股票还给管理局委員們，同时以名义股东的資格給这些委員們一定数量的票来保证他們取得多数，好与西方大铁路合并。博学的法官已經看出，“很难設想有比这更可恨更无耻的欺騙，而达到預定目标的方法尤为可耻”。他做了这样一番說教以后，就釋放了被告，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如果罪犯是資產階級就釋放，而貧窮的无产者如果偷了5英鎊以上的錢而被拿获，那就非判处苦役不可。

看一看英国的公众怎样时而对工厂巨头、时而对煤矿主、时而对贩卖假麻醉药的小商人、时而又对代替了已經吃不开的拦路大盜的铁路主的道德，总之就是对資本家的道德表示憤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从整个階級來說，資本显然有它自己的、如同根据 *raison d'état* [国家利益] 而制定的最高法律那样的道德，至于普通的道德，那仅仅适用于穷人而已。

曼彻斯特学派队伍中的議會改革者看来已經陷入很有意思的境地。在最近一屆議會會議期間揭发出来的选举舞弊行为所牵涉的几乎都是城市选区，而且是赫尔、利物浦、劍桥和坎特布里这样的大城市。自由派的选举事务經紀人柯波克先生一时坦率，竟承认了“圣阿尔班怎样，其余所有的城市选区也就怎样”。現在，政治寡头打算利用这些被揭发的事件来实行一种削弱城市选区而加强各郡的改革。而曼彻斯特学派的改革者并不是要普遍扩大选举权利，他們只不过要在城市选区中扩大选举权利，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个主張，他們当然有苦难言了。他們的机关报“每日新聞”正极力企图摆脱这种困境，看样子怪可怜的。

1846年1月14日英格兰銀行的貼現率曾提高到3.5%，1846

年1月21日提高到4%，只是到1847年4月才达到5%。但是，大家知道，在1847年4月的最后三周中，几乎一切信贷业务都停顿了。1853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提高更快得多。贴现率从1852年4月24日2%到1853年1月8日就已提高到2.5%，同月22日达到了3%，到6月4日达到了3.5%，9月1日达到了4%，而现在已经四处谣传很快就要到5%。1846年11月，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56先令9辨士；1853年8月后期已涨到65—66先令。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储备是：

去年.....	21 852 000 英鎊
而現在.....	16 500 068 英鎊
差額.....	<u>5 351 932 英鎊</u>

前个星期黄金储备又减少208 875英鎊，而上星期则减少462 852英鎊。这种情况马上对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影响，有价证券的牌价一直在下跌。在上星期三“泰晤士报”的金融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尽管不景气，在有价证券的市场上国库期票仍然继续以2厘的贴现率外加1厘附加利息兑现，但现在有一种印象是：财政大臣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价格，已命令由政府出钱加以收购，同时抛售由储金局担负损失的三厘证券，因为现在手边已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其他有价证券。”

这真不愧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杰作！按低价抛售统一公债，按高价收购国库期票，宁愿失掉三厘证券带来的一半收入，把它们换成利息只略高于一厘五的期票。

外汇行市不利，黄金储备减少，但是不列颠的出口却空前增加，到年底甚至要超过1852年的出口1 600万英鎊，这两方面的情况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既然我国在出口商品时是給全世界信貸，进口时支付現金，所以单纯扩大我国的貿易有一天是必然給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額造成相当不利的情况的，但是，当偿付我国出口商品的信貸期滿，货币汇給我們的时候，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回来的。”

这是“經濟学家”杂志的話。按照这种理論，如果 1854 年的出口再超过 1853 年，那末外汇行市一定要和过去一样对英国不利，于是商业危机就将成为唯一的調节手段了。“經濟学家”认为談不上会发生 1847 年那样的破产，因为目前很大一部分資本并没有像那时候那样投入铁路等部門。它忘記資本正在投入制造厂、机器設備、輪船等部門。另一方面，“观察家报”則埋怨“不該毫无意义地投資于**外国铁路**和其他很成問題和不能令人相信的企业”。“經濟学家”认为，业已扩大的貿易活动，在欧洲範圍內，由于粮价很高，会出现有利的停滞，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是非常可靠的**。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則肯定地說，紐約货币市場上的緊張将导致美国貿易活动的**有利的停滞**。“先驅”則大嚷：

“我們不應該指望能从美国得到以前那么多的訂貨。”

現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观察家报”写道：

“出口已經达到了違反常識的极限。关于目前已运到倫敦准备发往南方殖民地的 74 000 吨海运貨物，我們从阿得雷德、墨尔本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不利的消息正在不断证实。不能否认，現時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

至于中国市場，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很急于出售，不願买进，因为金銀都已被收藏起来；而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革命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这种状况絕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末国内市場怎样呢？

“在曼彻斯特及其近郊，使用机床的大批織工仿效斯托克波尔特的榜样

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10%……工厂的头目们大概到冬末就会发现，问题将不是同意和不同意增加10%，而是工厂主是否同意在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的条件下重新开工的问题。”

“纪事晨报”就这样毫不含糊地预告国内市场即将缩小。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关于大规模扩建工厂和空前迅速地兴建新工厂的情况。我也曾向诸君报道过某些新建成的企业，这些企业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个工业城市了。我曾指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游资直接投入了工业生产²⁸⁰。现在，一方面，诸位可以把这些事实同国内外市场上货物过剩的征兆对照一下看，另一方面，请不要忘记，不利的外汇行市是使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过剩过多的可靠手段。

但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的因素早就在积累）爆发的力量首先将是歉收。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随涨价而来的是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缩小。而欧洲南部、意大利、比利时、莱茵普鲁士今年的收成往好处说也像1846—1847年那样不好；在欧洲西北部和东北部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好收成。至于英国的情况，上星期的“粮食交易所快报”²⁸¹——伦敦粮食交易所的官方机关报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疑问，今年联合王国的小麦收获量将是许多年来最少的。王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收成都将大大低于中等收成；此外还要看到，今年的播种面积由于播种期间天气不好而比往年至少要少 $\frac{1}{4}$ 。”

对于这种情况，幻想无济于事。有人认为貿易自由就能一举而消除商业衰落、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那家“粮食交易所快报”指出，“农场主仍然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貿易的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儲备。如果困难迫使我們大量运进粮食，我們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錢”。

昨天的“粮食交易所快报”又补充說：

“国外还有这么多的庄稼尚未收割，所以下几周的天气情况会对貿易发生巨大影响。沒有收割的庄稼的质量已經受到近日雨水的損害，如果潮湿的天气再繼續一个时候，就可能带来大禍事…… 最后的收获量可能比一两周前所能想像的还糟…… 我們最近几天得到的关于**馬鈴薯**情况的**消息**，比前些日子更不好…… 尽管上星期从国外得到大量供应(88 833 夸特)，但粮食价格受的影响很小，每夸特粮价与最高点相比降低不到1—2先令…… 波罗的海各国的收成估計也普遍不好…… 根据最近的材料，小麦的船上交貨价格在但澤是60先令，在科尼斯堡是56先令9辨士，在施特庭是54先令，在罗斯托克是58先令。”

物价騰貴的后果也像1847年那样，已經开始影响到政治方面。在那不勒斯，市当局沒有經費雇用工人**为公共工程做工**，国庫里沒有錢支付官吏的薪俸。在教皇国的托倫蒂諾、特尔尼、腊万納和特拉斯德韦尔，已經发生了一系列搶粮風潮，这些風潮絕不是用前此不久的逮捕办法，或利用奥地利人的入侵和棒打的威胁所能平息的。在倫巴第，斯特拉索尔多伯爵虽然实行了加稅办法，要所有的直接稅納稅人到今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每一弗洛林金币多繳6个半克勞澤銅币（包括所得稅和薪俸稅），但是他也防止不了物价騰貴和工业停滯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奥地利，这次发行新公債时照例說了一番仅仅是因为裁减軍隊花費多了国家才需錢

用的老調，而現在却暫停發行，這種情況就說明了奧地利普遍貧困。法國政府則偽造關於收成的報告，在巴黎實行人為的糧食定價，在各個市場上大量收購糧食，從這裡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焦急。外省不滿意波拿巴拿它們的糧食來养活巴黎；資產階級不滿意波拿巴假借無產者的名義來干預實業；無產者不滿意波拿巴在農工行將斷炊的時候給士兵白麵包而不是黑麵包吃；最後，士兵們也對法國在東方問題採取卑躬屈膝的反民族立場表示不滿。在比利時，已經爆發了一系列搶糧風潮，來回答科堡王室為奧地利公主舉行的豪華而荒唐的慶祝會。在普魯士，政府是那麼恐慌，表面上不得不逮捕了幾個糧商，另一些糧商則被警察總監傳去“要求”他們按“公道”價格賣糧食。

最後，我還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煽動家的詞藻和權謀家的廢話決不能使局面發生危機；日益迫近的經濟災難和社會動蕩才是歐洲革命的可靠預兆。從1849年起，商業和工業的繁榮曾經是反革命高枕無憂的臥床。

卡·馬克思寫於1853年9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53年9月30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886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西方列強和土耳其。
——日益迫近的經濟危機。——
印度的鐵路建設²⁸²

1853年9月20日星期二于倫敦

我在7月19日的那篇文章中写过：

“西方列強**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擴張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結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①

現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为俄国对付土耳其。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无条件接受維也納照会的穆斯林。

戴·烏尔卡尔特說：“9月13日，四位外交大臣^②平心靜气地在唐宁街开了会，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要土耳其政府放棄欧洲會議在先前条件下所通过的修改意見。这还不够，他們还命令舰队开往博斯普魯斯海峡，准备在苏丹不能抵抗本国人民的憤怒的时候支援苏丹对付本国的臣民。这仍然不够，他們还向奥美尔-帕沙发出书面指示，不准他在本国国君的領地上从这一个省份向另一个省份走动。因而他們也預料到，由于他們提出这些要

① 見本卷第241頁。——編者注

②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倫登以及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的阿伯丁、帕麦斯頓和罗素。——編者注

求将会爆发起义，所以他们就考虑到镇压起义所必需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联軍舰队。”²⁸³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辯論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这家报纸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 13 日带着一份給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急电从倫敦动身，14 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所携带的指示的内容告訴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根据这项指示，英国大使应当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維也納建議并且放棄 8 月 19 日所提的修改意見。英国大使应当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威胁，說如果由于它拒絕让步而发生战争，它就会得不到四大强国的支持；此外，英国大使应当表示願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接受維也納照会而可能爆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奧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違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話。在接到星期日的“辯論日报”以前我們就已經知道，維也納會議在得知俄皇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議苏丹收回自己的話，签署他从前拒絕簽署的照会，并且滿足于下面的保证：會議将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釋。“泰晤士报”避而不談“辯論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臉的事情。“紀事晨报”、“晨邮报”和所有倫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邮报”却斥責君士坦丁堡平民的狂热。“紀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調描繪在欧洲土耳其怎样到处都是凶暴殘忍和毫无紀律的亚洲土匪，奧美尔-帕沙的軍队怎样正在靠这些土匪大量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愚蠢的讀者；英勇的“地球报”逐日地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上精心摘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一来，到必要的时候，英国的各高尚階級就要下定决心“鏟除異教”，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万岁！正教徒的神万岁！”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土耳其問題已成为純粹的詞句問題”。从这个前提中应得出的結論就是，为了一些空話而甘願冒打破普遍和平的危險的苏丹，應該由头脑比較健全的帕麦斯頓之流和阿伯丁之流用暴力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訴我們，沙皇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絕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河各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貝捷克灣去，这两大国的代表在維也納同奥地利和普魯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們在維也納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泰晤士报”回答說。

“他們不仅沒有任何想要强迫奥斯曼政府的願望，而且也沒有如此行事的任何理由。”

可見，如果說四大强国現在有了强迫奥斯曼政府的願望，那仅仅是由于“現在有了”理由“如此行事”。如果說維也納會議以及帕麦斯頓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理由，好使他們对俄国仅仅虛張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設想必不算是錯誤吧？

“泰晤士报”繼續写道：“俄国的要求被其他的强国认为是不公正的，是和苏丹的主权不相容的”，因此，四大强国才拟定了一个照会，苏丹应当把这个照会送交沙皇，这个照会答应沙皇的一切要求，甚至有些超过。

“泰晤士报”写道：“这份文件的措詞，可能使不正确的解釋有所借口，但有两点是写得十分清楚的：第一、四大国願意支持土耳其政府的領土权和行政权；第二、一旦发生冲突它們将认为自己是受这种願望約束的。”

既然苏丹可以相信，他将得到四大强国的善良“願望”的支持，四大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认为自己受这种神秘的“善良願

望”的約束，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簽署這份侵犯他的主權并把對他的1200萬臣民的保护權送給俄國專制君主的照會呢？蘇丹已經有可能体会到，四大強國是不認為自己是受國際法約束的，它們也不受那些明文規定一旦同俄國衝突它們就应当受各種保卫蘇丹的條約的約束；那末，在這個賦予俄國明確權利而賦予土耳其“神秘願望”的照會造成了衝突的時候，蘇丹有什么理由不指靠四大強國的無畏精神呢？

“泰晤士報”說：“我們就舉個萬一的情況來說吧。假定在 *pur et simple*（無條件地）接受了最初的維也納照會之後，沙皇利用了一般人所設想的這份照會給他的那些機會。”

這時會怎樣呢？

“蘇丹就會提出抗議，於是衝突就是因執行1853年的協定而起的了。”

似乎因執行1840、1841年協定和巴爾塔利曼尼條約²⁸⁴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似的！似乎那種被克拉倫登勳爵本人稱為“海盜行為”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也未曾造成任何衝突似的！

“泰晤士報”說：“含糊只會使俄皇產生誤解。”

完全像1841年的條約使他“產生誤解”那樣，他援引這項條約，不許聯合艦隊開進達達尼爾海峽，同時自己却占領了多瑙河各公國。

但是，蘇丹的態度十分強硬。他拒絕同意照會，因為照會的起草人只是以出賣土耳其給俄國的行為來表達他們對土耳其的善良願望。蘇丹建議對這項照會作某些修改，同時，用“泰晤士報”的話來說，“四大強國接受土耳其提出的這些修改意見，這就表明它們認為這些修改是和它們的建議一致的”。但是，由於俄皇堅持反對

的意見，由于“泰晤士報”已完全確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所以“泰晤士報”就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如果俄国不願意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末，土耳其就應該同意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而且

“一个由于本身无力而每逢外侵或內乱就不得不寻求欧洲保护的國家，就应当为自己的貧弱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至少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援助，要在保护国負担最輕的条件下提供”。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大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大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反对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現有的各項条約的規定向四大强国請求援助，那它就应当“为自己的貧弱付出代价”。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四个卖国賊（阿伯丁、克拉倫登、帕麦斯頓和罗素），或者是让俄国沙皇統治全世界。”

这是戴·烏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論，这一类独白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应当由誰来审判四个卖国賊呢？議會。这个議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呢？是由交易所商人、工业巨头和貴族的代表組成的。这些代表所主張的对外政策是什么政策呢？是 *paix partout et toujours* [無論如何要保持和平] 的政策。而誰来貫徹他們的对外政策的綱領呢？也就是天真的“晨报”认为必須当作卖国賊来加以审讯的那四个人。不过至少有一点應該是很清楚的，即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交易所商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資產階級正在把欧洲出賣給俄国，因此，为了击退沙皇的挑畔，首先必須推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顏婢膝的 *veau d'or* [金牛犢] 崇拜者的可耻的統治。

土耳其政府在維也納照会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馬上就征集

了8万名列季弗²⁸⁵入伍。根据9月5日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訊，土耳其政府在总理大臣^①官邸召开了會議之后，决定不顾战争危險，坚持自己最近的照会。穆斯林居民的热情达到了极点。苏丹在檢閱埃及部队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而在檢閱完毕以后，人群把他扶下馬來，隆重地举着他走过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他重新給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国君发出了命令，要他們維持公国的安定。列施德-帕沙就君士坦丁堡的几名俄侨被揭发进行反对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活动一事，向俄国領事提出了警告。据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报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献給苏丹100万披亚斯特，以补帝国的备战开支。据报道，士麦那的犹太人也作了类似的决定。从登載在維也納“新聞报”的通訊中我們知道，在加拉茲逮捕了几名俄国貴族，因为他們与奥美尔-帕沙秘密通信，极其詳尽地把俄国部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情况告訴了奥美尔-帕沙。还发现了奥美尔-帕沙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建議这些俄国貴族尽量多招些外国人来担任軍职。

9月13日，緬施科夫公爵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維也納，向欧洲列强递交尼古拉皇帝的一項新的声明，这项声明为他拒絕土耳其的修改意見作了解釋。俄皇本人也将在本月21日由涅謝尔罗迭伯爵和美延多尔夫男爵陪同到奧里繆茨来。他通过利文男爵邀請普魯士皇帝到奧里繆茨开会，但普魯士皇帝拒絕了，理由是在目前局势下他这样做会引起太多的 *éclat* [喧嚷]。俄国的一个約有3万人的兵团目前已在保加利亚边境上的克拉約瓦駐扎下来。在此以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8个軍需站。現在在布加勒斯特建立

① 穆斯塔法-帕沙。——編者注

了第九个常設的軍需站,这个迹象說明,俄国人根本不打算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9月15日,英格兰銀行把貼現率提高到4.5%。“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同样写于9月15日的关于金融問題的文章說,“这项措施博得了普遍的滿意”。但是这篇文章又說:

“下午2时左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而不久就得到了貼現率已提高到4.5%的消息,这时有价证券的行市兌成現金跌到95%,兌成10月13日还本付息的证券則跌到95.125—95.25%。普遍的意見是,如果貼現率不是提高到4.5%,而是提高到5%,那末,市場大概还不会受到这样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时公众将认为类似的措施今后已不可能再有了……铁路公司的股票买卖在銀行董事会會議結束后跌得最厉害,而其他各种股票的行市截至当天为止也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

“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銀行的經理們祝賀,說他們在自己的政策中遵循了皮尔法令。

“經理們根据黃金外流而使流通中的貨幣量减少的情况,要求提高剩余黃金的卖价,这样一来就保证了自由实行罗·皮尔爵士的关于英格兰銀行特許状的法令,只有通过自由实行,才能证明这项法令的正确性,而在1847年,由于受到經理們不明智的行为的阻撓,这一点就沒有能够做到。”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說明,經理們在1847年的不明智行为恰巧正是他們过分奉行了皮尔法令,以致政府为了挽救銀行部不致停止支付,不得不停止了这项法令的“自由实行”^①。在“地球报”上我們看到:

“造成我国現時繁荣局面的那些原因,很有可能不会繼續这样起作用了。消极的后果在曼彻斯特已經表現出来;那里的某些大公司不得不縮减自己的

^① 見本卷第339頁。——編者注

生产总额…… 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部門都陷于十分蕭条的境地。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籠罩着惊惶不安气氛…… 黄金繼續向大陆外流，最近一两天內差不多有 50 万的黄金将要从海上运往圣彼得堡…… 它(銀行)節約自己的金屬貨幣儲备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它想給財政大臣为数七八百万的援助，因为財政大臣要同南海公司的債券持有者以及其他不滿意的人进行結算，需要这一笔錢。”

9 月 13 日“晨郵報”从曼彻斯特报道：

“布匹和棉紗的交易很不景气，各种工厂制品的价格都很难保持住先前的水平。由于各个国外市場上差不多都没有需求，由于国内面临財政困难，由于这两个主要原因，結果就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把它和到处傳播的繁荣消息对比一下，那末，應該承认它是极不正常的。”

同一家報紙在 9 月 15 日用下面的一段話結束了它的一篇論述日益迫近的危机的因素越积越多的社論：

“我們要警告商界人士：現在我們已經进入一个無論創建企业和經營企业都一定要經常仔細小心的阶段。此外，在我們看来，我們的財政状况充滿着比我們的商业状况更为严重和更难于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举出的“地球報”和“晨郵報”的互为补充的言論中應該得出一个結論：一方面，需求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供应却有剩余。工厂主势必要通过加强他們和工人之間的冲突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退却。一位工商业問題采訪員从曼彻斯特写来一篇通訊，发表在昨天的“紀事晨报”上，通訊說：

“工厂主已开始对达成協議一事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因为他們确信，很大一部分工厂，甚至所有的工厂，在工資問題可能得到調整以前，都将不得不停工。最近几日来，在各个工厂区的不同地方，都就這個問題召开了企业主會議。很明显，工人們提出的过分要求以及他們激烈地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强制性条款的企图，正迫使工厂主想办法建立共同的团体，以求自卫。”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中我們看到：

“企业主正在各个工厂区組織自卫同盟：仅仅在最近5天内，在埃士頓、斯泰里布雷芝、海德和格洛索普，差不多就有100个公司在建立这种同盟的协定上签了字。在普雷斯頓，工厂主已經承担起一项很严重的义务：以关闭工厂3个月的办法对工人进行反抗。”

根据从馬賽发来的电訊，小麦价格每百升又提高到2法郎25生丁。在“通报”宣布了提高国庫債券的利息以后，交易所的反应非常不好；到处都把这项措施看做是政府正缺錢用的迹象。人們已开始談論政府将不得不借款的問題。財政大臣^①已向許多土地占有者发出了通知，建議他們提前半年繳稅，以表示感謝現政府曾經施与他們的大恩德，另外还感謝政府提高了他們的地产价格。“观察家报”指出：“这說明完結已經开始。”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談过铁路对于印度有极为重大的意义^②。現在我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些各报发表的有关铁路网的建設情况和发展前景的最新消息。印度第一条铁路是現在已經通車的孟买—塔納綫。另一条铁路綫将从加尔各答鋪到恒河上的拉吉馬哈尔，全长180哩，然后沿着恒河右岸通到巴特那、貝拿勒斯和阿拉哈巴德，再从阿拉哈巴德經過达普到阿格拉，从这里再通到德里。这样一来，这条铁路綫将穿过1100哩长的空間。預定要在生河和图諾拿河上設立輪渡，以便最后把加尔各答这条綫从德里通到拉合尔。最近几天就要开始建筑从馬德拉斯向西直伸70哩的铁路綫，然后再分两条支綫，一条沿着高止山脉，以卡利庫特为

^① 比諾。——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248—250頁。——編者注

終点站，另一条經過貝拉里和普納到孟买。未来铁路网的这个骨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孟买—巴罗达—印度中部的铁路，为了建筑这条铁路，現在已經由董事会批准进行初步的地质勘测。这条铁路将从孟买經過巴罗达到阿格拉，在这里同加尔各答—德里铁路干綫联接起来，这样一来，印度西部的首府和全印度斯坦同欧洲交往的最好港口孟买，一方面就同加尔各答联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旁遮普和西北各省联起来。这个計划的起草人还想鋪設一些支綫通到內地的各个大产棉区去。与此同时，还正在采取措施建立整个印度斯坦半島的电报网。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20 日

載于 1853 年 10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889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西方列強和土耳其。——
經濟危機的征兆

1853年9月23日星期五于倫敦

9月20日的“地球報”否認“辯論日報”上關於里夫先生的使命的報道，說它是不確實的，“泰晤士報”則在星期三以«Gobemou-cherie»〔“傻子才相信”〕為標題轉載了“地球報”的文章，指責法國報紙散布謠言。但是，我在上次寫的那篇文章^①里所分析的“泰晤士報”社論不是完全証實了“辯論日報”的報道嗎？難道巴黎的“通報”上刊出了什麼辟謠嗎？在“地球報”說“辯論日報”造謠的同一天，“國民議會報”不是又一次這樣說過嗎？——

“雷德克利夫勋爵应当告訴蘇丹，如果他不收回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見，英國艦隊就要開進達達尼爾海峽，法國艦隊也會緊跟着英國艦隊開來。”

“泰晤士報”在轉載“地球報”的辟謠文章的同一天，不是直截了當地講過這樣的話嗎？——

“英國和法國只能根據四大盟國提出的並且已經被俄國接受的條件來干涉俄土衝突，不管這些條件高傲的土耳其是否接受得了。”

“晨郵報”不是在倫敦能看到“辯論日報”以前就向我們作了如

① 見本卷第352—354頁。——編者注

Name Train

- 16 August
1848
1 Monday House of Commons
2 Friday 19 August
Palmerston's
Cabinet
3 Monday 23 August
Palmerston's Cabinet
4 Monday 30 August
5 Friday 9 September
Peel's
etc. Thorneley
6 Monday 13 September
James Graham
etc.
7 Monday 20 September
coercing Turkey
rain
etc.
8 Friday 23 September
Appendix
Vive Alexandre
9 Monday 27 September
Turkey
Munich
10 Friday 30 September
Militaire
11 Monday 4 October
Guernsey
12 Friday 7 October
Appendix
13 Friday 14 October
II Palmerston

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的一頁，上面記有發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
章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日期

(部分日期為卡·馬克思所記)

下的報道嗎？——

“列強代表在接到俄皇對維也納照會的修改意見的答复以後，立即舉行了會議，並在本月4日派信使去君士坦丁堡，給御前會議帶去了**某種通知**，看來，土耳其政府將**不能不接受維也納照會。**”

最後，我們還從今天的一份晨報上看到：

“里夫先生已被派去君士坦丁堡了；他將把克拉倫登勳爵的几封急電送給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里夫與外交部關係最為密切，因為他是唐寧街和印刷所廣場之間的聯絡者。”

不過，自從法國報紙最近揭露了一些事情以來，東方問題又一次來了一個完全新的轉折，情況的變化可能違背英國內閣的一切打算和願望，推翻它的那些可耻的決定。

奧地利已經拒絕了和它的假同盟國共同行動。維也納會議至少在最近一個時候是開不起來了。俄國感到假面具已沒有用處，因此把它撕了下來，於是英國內閣就從它的最後一個防禦工事里被趕出來了。

“利物浦信使報”公正地指出：“阿伯丁勳爵的勸告是：蘇丹採取露骨而無耻的欺騙手段；維也納會議的參加國在照會裏面做一個**沉默的保留**；蘇丹**歪曲地**理解這個照會（因為照會的條文是清楚而明確的）；列強要準備在俄皇堅決拒絕同意蘇丹提出的修改意見時，**權當他已經同意**那樣去辦事。”

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建議維也納會議給土耳其政府送去一份同樣虛偽的解釋性照會，但是布奧爾伯爵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說這個建議“對土耳其政府友好得過分了”；又說，“共同行動的時機已經過去了，現在每個強國可以各行其是”。這樣一來，英國內閣就失去利用歐洲最高裁判所的共同決定來作掩護的可能了——這個最高裁判所是一個股份公司，它是由奧地利大臣一陣咒語念活的，所以現在他說一句話就又不見了。當初，俄國軍隊越過普魯

特河以前，奧地利就根本不需要開什麼會議。在俄國進入多瑙河各公國以後，奧地利就更不需要開什麼會議了，至少不需要在先前的基礎上召開會議。另一方面，涅謝爾羅迭伯爵也發表了兩個通知，由於這兩個通知，再想用那種神秘的“善良願望”為最初的維也納照會作辯護，或者不按照照會的字面的意思來解釋照會，就根本不可能了。

所有的政府報紙都會大叫大嚷地說：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見使全部問題成了一個“純粹的詞句問題”。

涅謝爾羅迭聲明：說的完全不對。沙皇對最初的照會原文的解釋和蘇丹是一樣的；最初的照會並沒有別的意思，也不想有別的意思，它就是緬施科夫照會的再版，所以我們堅持原文，堅持全文，而且僅僅是這個原文。政府機關報“地球報”當然感到吃驚：原來沙皇和蘇丹都同樣認為最初的照會的意思就是“完全承認俄國提出的、被土耳其拒絕的、而四大國也不打算（？）支持的那些要求”；原來“俄國是堅持要**無條件地**滿足它一開頭就提出來的要求”。為什麼俄國不堅持呢？既然它在四個月以前就有勇氣提出這些要求，那末為什麼要在現在，在已經贏了第一個戰局以後，放棄這些要求呢？

同一家“地球報”在幾天以前還說土耳其提出的修改意見是煩瑣式的吹毛求疵和添加用不着的細節，現在却不得不承認，“俄國的解釋證明這些修改是必要的”。

涅謝爾羅迭的**第一份**急電還沒有公布，但是“晨郵報”就肯定地告訴我們，在這份急電里宣布“維也納照會和緬施科夫公爵的照會有同等價值”。“地球報”（晚報）又補充說，這份急電的意思是：

“俄皇認為，維也納照會向他保證了承認他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承認他對土耳其政府的影响，這是土耳其政府在四大國支持下一直都拒絕的，而且是為了抗拒這些，它才去請求四大國仲裁；我們還獲悉，俄皇從來不想放棄他不要仲裁國而直接同土耳其打交道的權利，他只不過表面上承認仲裁國而已。”

俄皇即使表面上也從來沒有承認過四大國是仲裁國。他只允許其中的三個國家跟着奧地利跑，而讓奧地利以一個溫順的求情者的身分求上門來。

在第二份急電里（9月7日從聖彼得堡發出，9月18日公布在柏林的“時代報”上，是寄給維也納的美延多爾夫男爵的），涅謝爾羅迭完全正確地告訴俄國公使，最初的照會是由奧地利公使作為“**最後通牒**”交給了他的，在土耳其政府**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照會這個必要條件下俄國不能不表示同意。“還有誰能夠不把這一點看做是皇帝體諒別人的表現呢？”誠然，他對多瑙河各公國有過一點點“海盜行為”：他侵入了多瑙河各公國，占領了它們，在那裡抽稅，統治、掠奪、霸占了它們，可以說，吞併了它們，不管哥爾查科夫出了什麼告示。但是要知道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難道他另一方面不是“在剛剛接到照會的第一個草案的時候，**不等得到倫敦或巴黎是否予以批准的消息，馬上就通電表示完全同意了嗎？**”他已經通電表示，由俄國大臣在維也納口授的照會決不會被聖彼得堡的俄國大臣拒絕，難道還能要求他做得比這更多嗎？他甚至不等巴黎和倫敦批准就同意這項照會，難道還能要求他為巴黎和倫敦做得比這更多嗎？然而他仍然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寬宏大量通電表示接受的照會草案，在巴黎和倫敦被“**修改**”了。即使如此，“他收回了自己的同意嗎？他製造過哪怕是一點點障礙嗎？”不錯，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項照會從它“最後的模樣”看來完全和“緬施科夫公爵的照會有同等價值”；但是具有同等價值的這一份照會畢竟與原本“有所不同”。難道他“沒有提出過不作任何修改地接受緬施科夫的照會這個條件”嗎？難道他本來不是可以“僅僅根據這一個理由就拒絕考慮新的照會”嗎？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不是表現了最大的愛好和平的精神嗎”？維也納會議的**最後通牒**同他毫不相干，這是維也納會議本身的事情。“**他的事情是考慮**”由於蘇丹拒絕接受最後通牒“而造成的**拖延**”。從他自己這方面來說，他一點也不準備反對把多瑙河各公國再占上幾個月，他的軍隊在那裡不花錢就得到軍裝和軍糧。

敖德薩並沒有因為多瑙河口被封鎖而蒙受損失；如果由於多瑙河各公國被占領而使倫敦馬克蘭²⁸⁶的小麥漲價，那末這只會促使不潔的帝俄金幣更快地回到神聖的俄羅斯去。因此奧地利和其他強國應當

“直截了當地並且強硬地向土耳其政府聲明，它們已經盡力為土耳其政府开辟了能够使它立即恢復和我們的關係的唯一通路，但是白費了氣力，以後他們就**洗手不管這事了**”。

列強為蘇丹做的事情已經够多了，——它們為沙皇开辟了進入多瑙河的道路，擋住了聯軍艦隊進入黑海的道路。涅謝爾羅迭伯爵的“神聖君王”接着就痛斥“那些**好戰**意圖，這種意圖看起來目前正影響着蘇丹和他的大多數大臣”。從他這方面來說，他當然希望蘇丹不要急躁，希望蘇丹用和平建議來對付炮艦，用溫文有禮的談話來對付哥薩克。“他已經做了一切可能的讓步，但是土耳其政府還沒有作一點讓步。沙皇陛下不能再沿着這條路往前走了。”毫無疑問，如果不越過多瑙河，沙皇是**不能往前走的**。涅謝爾羅迭把

他的全部論据总括为以下的巧妙的二者擇一的說法，无論如何也逃不出这个范围。或者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这些修改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土耳其政府还要坚持这些意見？如果这些修改具有某种意义，那末“我們完全有理由拒絕接受”。

克拉倫登勳爵宣称：“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是訂立任何協定的先决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涅謝尔罗迭反駁道，恰恰相反。“訂立協定”，就是說，让土耳其大使前来递交沒有作任何修改的奧地利照会，“是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先决的 *sine qua non*”。

总而言之，寬宏大量的沙皇不准备再和維也納會議白費時間了，因为維也納會議对他結束第一个战局已經再沒有用处；但是他将更紧地把多瑙河各公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他开始第二个战局所必需的。

我們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說要恢复維也納會議，如果这是确实的話，那末列强将把下面一首巴黎庸众曾用来頌揚亚历山大的歌送給尼古拉：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 ①

可是，沙皇对于东方糾紛已經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全权处理了。苏丹已經被迫去喚起旧时的宗教狂热，鼓动粗野好战的亚洲部落

① 万岁！亚历山大王，
万岁！王中之王，
你恩賜我們法律，
却不要一点补偿。——編者注

重新向欧洲进军，这些部落不是外交照会或老一套的謊言所能安撫的；甚至俄国人在他們的蛮不讲理的照会中也透露出，他們对于弥漫在伊斯坦布尔的“好战精神”也有点儿担心。苏丹已經向他的穆斯林发布詔书，宣布对俄国将不再作任何让步。据报道，烏列瑪²⁸⁷代表团謁見苏丹，要求苏丹要末退位，要末毫不迟疑地宣战。御前會議里的意見分歧已經达到了极其尖銳的程度，而希望御前會議去讲和的列施德-帕沙和穆斯塔法-帕沙这派势力已开始向陆军大臣穆罕默德-阿利这派势力让步。

倫敦的一家所謂激进派的报纸表现出簡直难以相信的輕率。“晨报”在几天以前还声称“应当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懲办四个卖国賊”(阿伯丁、克拉倫登、帕麦斯顿和罗素)，而在昨天的一篇社論里最后却說了这么一段話：

“阿伯丁勋爵因此应当让位于他的继任者。誰是继任者还要提嗎？現在全国都认为在这个严重关头只有一个人配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帕麦斯顿勋爵。”

如果“晨报”的編輯們沒有能力观察事件和事实的話，那末他們至少也应当注意他們自己的报上天天刊登的烏尔卡尔特先生的文章。

星期二晚上，根据設菲尔德居民向市长提出的請求，召开了一个設菲尔德居民大会，“討論目前得不到解决和令人不滿的东方問題的状况，并考虑就这个問題向政府递交請願书的問題”。在斯泰福也要举行这样的大会。此外，还在进行許多准备来組織反对俄国和“群賢”內閣的公众示威。但是社会上的注意力目前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貼現率、粮价、罢工和商业前景不妙等問題上，而更使人关心的是霍乱，这种疫病在新堡已經开始流行；現在正在倫敦保健

委員會出的解釋性指示的幫助下對付霍亂。女王和樞密院已發布命令，指示今後6個月在全國範圍內執行防疫法的各項規定；倫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準備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對付即將來臨的災難。如果我同意烏爾卡爾特先生的看法的話，我就要說，霍亂是被沙皇派到英國來執行一項消滅最後一點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最近4個星期裡，工業區裡發生了驚人的變化。7月和8月初，在地平綫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晴空——繁榮，只不過是遠遠的有一小塊烏雲——東方問題，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擔心的還是深恐缺少勞動力會妨礙我們的棉紡大王們充分挖掘他們所計劃的好生意的無窮財源。東方衝突似乎已經解決；收成當然可能不夠好，但是另一方面却有貿易自由，可以靠美國的、黑海的和波羅的海的取之不盡的糧食儲備來把價格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對工業品的需求一天天增加。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用大量黃金滋養着不列顛的工業。這時“泰晤士報”就把馬爾薩斯忘了，把它自己前不久大談人口過剩的話也忘了，很認真地討論起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從大陸上不來工人移民，那末，勞動力不夠以及由此而來的工資提高是否會使英國工業家的生產費用按一定比例增加，工商業的繁榮是否會因此而停頓。按照企業主的說法，工人階級的生活是好得過分了，好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他們提要求沒有任何限度，他們的“厚臉皮”已經越來越令人厭惡。但是這樣的事本身就說明國家正經歷着空前的大繁榮；而除了貿易自由以外，還有什麼可以成為這種繁榮的原因呢？但是最可寶貴的還是人們的信心，相信這種巨大的工商業活動整個都是建立在強有力的基礎上的，不容許有交易所的買空賣空和肆行無忌的投機。英國工業家都異口同

声这样說，并且也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們兴建成百个工厂，定购成千匹馬力的蒸汽机，定购成千架織布机和几十万支紗錠。机器和机床制造生产部門在 1853 年比任何一年都有利可图。那些由于 1851 年的大罢工²⁸⁸而在各方面都遭到重大損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如果沒有这一笔空前茂盛的生意，有些头等的、名声很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就永远也恢复不了机器制造工人在上述大罢工期間使它們遭到的損失，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不止一个。

但是，不能不指明，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現了濃重的烏云。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由东方冲突的轉折造成的，但是这种轉折对国内的、美国的和殖民地的貿易的影响仍然是很小的。貼現率的提高不是“丹麦王国里出了坏事”^①的原因，而是它的征兆。至于歉收和粮食漲价，那末毫无疑问，在受到歉收和粮食漲价影响的市場上，首先是在作为不列顛工业支柱的国内市場上，是使工业品需求量减少而且还将大大减少的原因。然而，食品价格的提高目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暂时还由于工資增加而全部得到补偿，或者几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恐怕还不能說消費者的购买力已經大为降低。工資的增加使那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部門的生产費用增加了；但是由于需求量很大，所以到 8 月份为止，几乎所有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額都大大超过了生产費用的增长額。上述种种原因对于生意的清淡当然起了作用，但是，光是这些原因，毕竟还不足以解釋各工业区实业界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惶惶不安的心理。

事实是，自由貿易的幻想的魔力开始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險家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場。——編者注

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識到，經濟震蕩、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現象，还不是像他們所梦想的那樣，絕不可能在自由貿易占統治地位的国家里发生。至于說生产过剩，那末这种現象过去有，現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商品儲备”——这是“曼彻斯特卫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繼續存在，而且有增无已。对商品的需求量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应量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企业中，規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現在才逐渐开工。由于劳动力不足、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設備沒有可能得到滿足，所以这些企业的开工遭到了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擱，早就應該出現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布萊得弗德附近的泰·索耳特先生的工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不少时候該厂的生产能力才能在市場上充分显露出来。在郎卡郡的新的企业中，有許多到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天，甚至更迟一些才能在市場上充分显示出来。据墨尔本和悉尼的最近消息，进口貿易正在显著减少，許多貨物的送貨被无限期推迟。至于不可遏止的投机 [*over-speculation*]，到发表決算报告的时候我們一定还会常常听到。近来投机行为已經扩大到那么多項目的商品，因此尽管十分猖獗，但是不如过去那样引人注意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0 月 7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89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倫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²⁸⁹

1853年9月27日星期二于倫敦

联合舰队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同政府的人事变动和商业遭到困难的傳聞合在一起，星期六在倫敦证券交易所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恐慌。

“要描写英国有价证券現在的情况或刻划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里照例演出的場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緊張的情景是罕見的，所以这种情况不常有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說压低行市的活动現在差不多达到了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的那种規模，大概也不是过甚其詞…… 本周有价证券的行市是 91.5%；自从 1849 年以来，有价证券还不曾下降到这样低的水平…… 铁路股票一直在下跌。”

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就是这样写的。最靠得住的所有铁路股票的售价比上周便宜 68—80 先令。股票突然充斥市場，本身并不說明任何了不起的問題，因为只是投机者可以按照目前行市随时在交易所制造惊慌，恫吓 bona fide〔老实的〕股票持有人而已。但是，有价证券行市的剧烈波动，即使带有純粹投机的性质，可是却同商业危机的一般征兆同时发生，这就要造成非常有害的后果了。至少，金融市場上的这种恐慌一定会使一切預定要发行的国家公債失敗，特别是使奥地利的国家公債失敗。而且，資本家們都还記

得，1811年奧地利對每一英鎊的債券僅僅付1先令 $7\frac{1}{4}$ 辨士的股息；他們還記得，儘管奧地利在1849年以後，通過大大加重匈牙利和倫巴第的稅負的辦法，人為地增加了收入，從1200萬英鎊增加到1800萬英鎊，但是它每年的平均赤字仍然大於它的總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外，從1846年起，奧地利的國債增加了5000萬英鎊，只是由於以色列子孫們從私利出發採取了寬大態度，才使奧地利免於面臨的破產，而他們現在仍然希望把自己裝滿了大堆奧地利鈔票的箱子騰出來。

“觀察家報”寫道：“商業在某種程度上越出了自己的可能性的範圍；我們的商業債務部分地超過了我們的資金。”

“晨郵報”惊呼：

“現在用不着再迴避這個問題了，因為即使面臨的危機將具有1847年所不會有過的某些有利特點，但是每個注意事件進程的深思熟慮的觀察家一定會看到，現在問題至少是轉向了極為不利的一面。”

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又減少338 954英鎊，而它的銀行券準備金，即預定用於貼現業務的有價證券，總共才700萬英鎊，換句話說，只夠財政大臣用來支付那些執拗的南海公司債券持有人。關於糧食市場的狀況，我們從“糧食交易所快報”最近一期了解到下面的情況：

“多年來在中等收成的情況下，我們每年都消費幾百萬夸特的進口小麥。那末我們在目前情況下要消費多少進口小麥呢？今年小麥的收穫量至多也超不過中等收成的四分之三，而且其他任何一種作物都提供不出餘額。馬鈴薯遭到了嚴重的病害；由於它不適於長期儲藏，所以吃得很多，這樣很快就會感到這種食品不足。我們的小麥消費量是這樣大，儘管截至9月5日為止的8個月內已進口3 304 025夸特的小麥和3 337 206公担的面粉，但是小麥儲

备仍很有限…… 当然，我們絲毫也不打算夸大我国可能遭到的困难，但是，**否认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愚蠢的……** 各地的报告都說明小麦收成**非常不能令人滿意**；許多已經打了場的地方收获量都不到估产的一半。”

在工商业繁荣的晴空中出現了預告暴風雨的阴霾了，而**罢工**仍然是，而且将在一个相当久的时期中仍然是我們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固然，罢工的性质已开始随着国家現在总的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柏立的紡紗工人又要求每一千紗錠增加 2 辨士的工資。由于老板們拒絕了他們的这一要求，他們便停工了；織布工人一俟織完他們手上現有的棉紗，也会仿效他們的榜样。普雷斯頓的織布工人，在临近地区的工人的支持下，繼續要求增加 10% 的工資，現在有 6 家企业主已經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其余的大概也要仿效他們的榜样。这样一来，2 000 工人就失业了。在布萊克本，狄金逊先生的鑄铁厂的机械工人仍在罢工。在威根的一家工厂里，繅絲工人罢工，要求每 20 碼增加 1 辨士的工資；在另外一家工厂里，紡紗工人決定在工資增加以前拒絕上工。这两家工厂都关闭了。在同一个地方，約有 5 000 名采煤工人举行罢工。星期三晚上，克罗弗德伯爵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大矿主解雇了自己的全部工人。此后，采煤工人在斯凱尔斯-奥尔查德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5 000 台織布机仍然停着不动，染布工、染紗工、毡帽制造工等等举行的一些小罢工就不用說了。波尔頓的棉紡紗工开大会要求提高工資。在特林泰姆和布黎紀瓦特以及其他城市有制鞋工人罢工，在格拉斯哥有馬車工人罢工，在基耳馬尔諾克有泥水工人罢工，在奥尔丹警察声言要罢工等等。北明翰的制釘工人要求增加 10% 的工資；烏尔未汉普頓的木工要求每天增加 6 辨士的工

資；倫敦的木工也同樣要求增加這樣多的工資，等等。同時，郎卡郡、柴郡、得比郡和其他各郡的主要工業中心的工人們，都紛紛公開集會，並且作出有關援助他們的飢餓兄弟的措施的決定。老板們堅決要把自己的企業關閉一個時期，以使用飢餓迫使自己的工人們屈服。

“星期日時報”寫道：“我們看到，一般說來，工人要求的工資增加額，不超過每天 6 辨士；如果算算現在的食品價格，那就很難說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了。我們知道，有人認為，好像現在的罷工者所抱定的目的之一，是想從企業主的實際利潤或預期利潤中取得某種**共產主義份額**，但是**所要求的工資提高和日用必需品的漲價**，這兩者之間的比較完全駁倒了這種指責。”

當工人們的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多一點的時候，當他們希望從他們用勞動創造出來的利潤中得到“份額”的時候，他們就被斥為有**共產主義**意圖。食品的價格與“永恆的和至高無上的供求規律”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在 1839、1840、1841 和 1842 年，即在食品價格不斷上漲的年份，工資不斷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餓的水平。當時那些工廠主們說：“工資不取決於食品的價格，而取決於永恆的供求規律”。“星期日時報”說：

“工人們的要求只有用**恭敬**的方式提出的時候，才能得到滿足。”

恭敬與“永恆的供求規律”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有誰聽見過，明辛街²⁹⁰的咖啡價格是由于“用**恭敬**的方式提出了”這類要求才上漲的呢？買賣人的血和肉的方法，也同買賣其他任何商品的方法一樣，就是說，至少也要根據同樣的條件來做這種買賣。

爭取提高工資的運動已經持續 6 個月了。我們且來用企業主們自己所承認的標準——“永恆的供求規律”衡量一下這個運動。政治經濟學的永恆的規律大概不應當像俄國同土耳其簽訂的永恆

的和約那樣解釋吧？

6 个月以前，工人們（即使他們那時還沒有認識到：由于對他們勞動的需求增長，由于人口向金礦和美洲不斷外流，他們的地位加強了）僅僅根據百般頌揚貿易自由的實惠的資產階級報刊普遍宣揚繁榮這種現象，就已經可以看到，工廠主們的利潤是增加了。很自然，工人們要求從這種被鼓吹得如此響亮的繁榮中得到自己的份額，但是老板們給予他們的却是無情的反擊。于是工人們便結成團體，聲言罷工，用比較和氣的口吻堅持自己的要求。凡是發生罷工的地方，企業主和他們的走狗們，在教會的讲坛上、會議讲台上和報刊上，一齊破口大罵那些“用這種方式企圖迫使別人接受條件”的人“厚顏無恥和無理取鬧”。但是罷工證明了什麼呢？不是僅僅證明了工人們寧願用自己的方法來檢驗供求關係，不願輕信僱主們的偏私的擔保嗎？在某種情況下，對工人說來，唯一能驗證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勞動的市場價值²⁹¹的方法，就是舉行罷工或聲言要舉行罷工。1852 年原料價格與成品價格之間的差額——例如，原棉價格與棉紗價格之間的差額，棉紗價格與棉布價格之間的差額——平均大於 1853 年的差額，可見，紗廠主和工業企業主的利潤一般要高于 1853 年的利潤。無論棉紗價格或成品價格直到不久以前還沒有趕上棉花價格的上漲。那末為什麼企業主在 1852 年不馬上提高工資呢？他們硬說，供求關係沒有證明 1852 年有必要提高工資。是這樣嗎？一年前沒有工作做的工人的確比現在多，但是這個差距同企業主們從那時起由于供求規律（它的意義已經由罷工向他們闡明了）發生作用而被迫進行的突然的、不止一次的提高工資是完全不相當的。當然，現在開工的工廠比去年的多，並且有許多有專門技能的工人在過去一年內外流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們的“工业蜂房”还从来没有像最近 12 个月来这样，由于早先在农业或其他部門就业的人紛至沓来而补上了这样多的工厂工人。

問題在于，“干活的”像往常一样，迟至很久才发现他們的劳动价值在好多月以前就已經增加了 30%，只是在那时——不早于去年夏季——他們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 10% 的工資，后来又要求增加 10%，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当然，他們的要求是在他們能够得到的范围以內。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工遍及全国，另一方面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規律的；而在同一个工业部門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資充分說明，按照供求規律，工人們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資，他們之所以沒有得到更高的工資，只是由于企业主們钻了工人們不熟悉劳动市場状况的空子罢了。一旦工人們終于弄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揚着“永恒的供求規律”的企业主們就回到了“开明专制”論，并且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財產的权利；他們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們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對他們是好，什么對他們是坏。

总的經濟前景的改变，也要引起工人和雇主互相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的突然到来，正是許多罢工已經开始的时候，又是更多的罢工正在酝酿的时候。即使是蕭条时期，这些罢工无疑也将繼續下去，并且同样还要在提高工資的口号下进行，因为工人們将以物价上漲为凭据来回答企业主不能增加工資的声明；而这两个理由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是，如果像我所推測的那樣，蕭条持久地拖延下去，那末工人們将因此而受到最大的痛苦，那时他們就不得不为反对降低工資而斗争了，虽然斗争沒有成功的希望。但是，那时

他們的活動將迅速轉到政治領域，而在罷工過程中爭得的新的組織——工聯，對他們將有重大的意義。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9 月 27 日

載於 1853 年 10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900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俄軍在土耳其

因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自欧洲的每艘輪船都能带来一些有关軍隊調动和交战結果的消息，所以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仔細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各种情况。这种需要促使我們对双方的攻防能力以及可能影响交战双方統帅部决心的主要战略問題，作一簡略分析。

占領多瑙河各公国的俄軍，最初有 2 个步兵軍和通常数量的預备队騎兵和炮兵。俄国步兵軍有 3 个步兵师，即 6 个旅，几个輕騎兵团和一个炮兵旅，一共約有 55 000 人和将近 100 門火炮。每 2 个步兵軍有“一个預备队騎兵軍”和一定数量的預备队炮兵，包括重攻城炮兵。因此，按編制定額，占領軍最初約有 125 000 人。現在第 3 个步兵軍已开始渡越普魯特河。所以，除去一切必要的削減，可以确定，俄軍集中在多瑙河上的兵力为 14—15 万人。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需要时能投入战斗，这决定于当地的卫生状况、俄軍軍需部門的工作效率，以及其他一些不在当地就无法估計的类似情况。

根据我們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軍对峙的土軍，最多不超过 11—12 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軍的总数据一般估計不超过 9 万人。因此，就我們所能判断的，土軍在数量上

显然弱于俄軍。至于双方军队的真正的素质和战斗力，那末应当承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軍方面。誠然，由优秀的法国和普魯士軍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則以射击不大准确而聞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进，却仍不能与俄軍的擲彈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騎兵还缺乏在第一次冲鋒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鋒所必须具备的那种严守紀律和頑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領都是比較新的人物。关于俄軍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軍事才能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們已經和讀者談过²⁹²。他为人忠实，热心維護俄国的“特殊使命”。然而，他是否善于进行像現在所开始的这种規模的战争，还有待事实证明。土軍总司令奧美尔-帕沙是一位比較有名的人物。关于他的情况，据我們所知，一般都是好的。他向庫尔迪斯坦的出征，尽管条件困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門的內哥罗的出征，也計劃得非常周密，毫无疑問，如果沒有外交上的干涉，大可以不战而胜²⁹³。因此，土軍的主要王牌，可能在于軍事指揮的优越。在其他一切方面，几乎都是俄軍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們可能比俄軍更加狂热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較弱一方的土軍來說，采取防御的行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軍則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沒有把由于一方司令官犯严重錯誤而可能出現的获胜机会估計在內。假如土軍有力量采取进攻，那末他們的战术就会明显地看出来。土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軍，在錫利斯特里亚和希尔索瓦之間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陣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交界的狹窄地带

采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軍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驅逐在莫尔达維亚的一个軍，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的另一个軍。但是，由于土軍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們只有在俄軍司令官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軍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末在他們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心臟以前，必須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尔干山脉。强渡大河，甚至在敌前强渡，这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侖战争时期常建的战功，以致現在任何一个尉官都能說出，应当如何强渡大河。采取几次佯动，备有齐全的舟桥纵列，拥有几个掩护桥梁的炮队，縝密計劃保障退却的措施，并派出勇敢的前卫，——大概这就是强渡大河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但是要越过高山，尤其是要越过山口有限、能通行的道路也不多的巴尔干山脉，却是艰巨得多的行动。而当山脉又与河流平行，其間隔不超过40—60英里——这正是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的距离——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在山地遭到失败的軍队，可能由于敌人的坚决追击而被切断通往自己的桥梁的道路，并在援軍开到以前就被赶下河去。在大規模会战中遭到这样失败的軍队，不可避免地要全軍复沒。土耳其的天然的軍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馬其頓-塞爾維亞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即巴尔干山主脉(«Veliki Balkan»),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于大路(在土耳其叫驛道)上。这就是伊赫吉曼山口和多勃拉尔山口。伊赫吉曼山口位于由貝尔格萊德經索非亞、菲力浦堡、阿德里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而多勃拉尔山口則位于錫利斯特里亚到苏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山口之間，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輜重

队都不能通行，只有較小的部队，頂多还有輕野炮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作为入侵軍主力的作战綫和交通綫。

俄軍于 1828 和 1829 年曾在錫利斯特里亚—多勃拉尔山口—阿德里安堡—艾納德什克这一方向上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北方、有絕對控制黑海的舰队作支援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而迅速結束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軍队所必經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俄軍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苏姆拉和瓦尔那）从翼側掩护的坚固陣地，封鎖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脉。土軍于 1828 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陣地上冒险，結果在庫列夫查附近被击潰；瓦尔那和苏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弱，因而俄軍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軍已疲憊不堪，但并未遇到更多的抵抗，因为土軍已完全瓦解，他們甚至沒有一个旅的兵力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了极大的錯誤。每个軍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陣地設在山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鎖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应当在山脉的后面占住中央陣地，对各山口进行監視，等到看清敌人的意图后，就在他們的先头纵队从隔断山脉的狹谷中走出时，向他們进行集中攻击。土軍本应集中更多的兵力，在敌人必然因疾病和某些部队掉队而削弱的情況下，只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而他們却由于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間的地区有一道横断俄軍作战綫的坚固陣地，便决定在那个地区进行这一决战。

因此可以看出，在錫利斯特里亚—阿德里安堡方向进行防御时，应防守多瑙河渡口，而不应冒险决战。在这以后，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的后面进行抵抗，而不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之間进行抵

抗，而且只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大**时，才可进行决战。尔后，则应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同时必须留下一些部队防守山口，留下的部队必须尽可能只抵抗而不决战。这样，俄軍将把自己的兵力消耗在圍攻要塞上，而且，如果他們还像以前那样行动的话，他們还要以强攻夺取要塞，也就是說，将在那里遭受重大的損失，因为可以說明俄軍特点的，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軍迄今**从未**在无外援的情况下**順利地**进行过**正规的圍攻**。缺乏有經驗的工程师和炮手，在野蛮的国家里不可能筹备大量軍用物資和必需的圍攻器材，甚至現有的物資也因路途遙远而不可能运来，——所有这一切都經常使俄軍不得不在进行短時間的、猛烈的、但是很少充分产生效果的炮击后，用强攻夺取据点。苏沃洛夫曾采用这种方法攻占伊茲馬伊尔和奧查科夫²⁹⁴，1828 和 1829 年俄軍又用同样方法强攻过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要塞，1831 年攻占华沙时也是用这种方法。不管怎样，俄軍到达巴尔干山口时兵力总要受到削弱，而土耳其則有足夠的时间从各方面調集自己的軍队。如果土軍用全力还未能击退企图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入侵軍队，那末就可能在阿德里安堡城下进行决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軍仍遭失敗，那末至少可以肯定，他們已尽其所能了。

但是在現在的情况下，俄軍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任何决定的意义。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正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在这样的兵力面前，任何一个俄国的司令官都将无法向这个首都进軍。在阿德里安堡受阻并失去舰队(舰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支援的俄軍，很快就会遭受重大牺牲，会因疾病而損失成千的人員，并被迫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北。因此，俄軍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争的主要目的。但是还有一条作战綫可供俄軍选择，而且可能对

他們更为有利。这条作战綫就是从維丁和尼科波尔經索非亚到阿德里安堡的道路。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俄国將軍也不会想起走这条路。但是，只要俄国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奥地利身上，只要俄軍在塞尔維亚边境附近的出現加上俄国在塞尔維亚的阴谋活动能够在这个国家，在門的内哥罗，在占波斯尼亚、馬其頓和保加利亚人口大多数的希腊-斯拉夫人中激起暴动，只要由于君士坦丁堡停泊有欧洲舰队，俄国还談不上进行最后的单纯軍事行动，还談不上夺取君士坦丁堡，那末这个計劃就是俄軍可能采取的、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的計劃；采取这一計劃，他們就可以避免英法因俄軍过于公开向君士坦丁堡进軍而采取坚决的軍事行动。

从俄軍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計劃的。俄軍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約瓦，而且俄軍的战斗队形全都是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的。因为这样的机动使人完全不能設想作战綫将通过錫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所以这种机动的目的可能只是企图与塞尔維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奥地利給予支持，如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末在多瑙河下游扼守防御陣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把握的事；而俄軍向土耳其斯拉夫地区的中心进軍，是必然会引起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沙皇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輕而易举地、比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組成如現在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維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如果苏丹在保加利亚、門的内哥罗和馬其頓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

保护,那末土耳其在欧洲的領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这对俄国来說是最大的成功,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之后它的軍隊就可能无法前进了。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俄国就是企图取得这种結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能都起来反对土耳其,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俄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是否犯錯誤,就很难說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9 月 29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0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帕麥斯頓勛爵²⁹⁵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10 月—12 月初

載于 1853 年 10 月 22 和 29 日, 11 月 5、12 和 19 日, 12 月 10、17 和 24 日
“人民報”第 77、78、79、80、81、84、85
和 86 號, 署名: 馬克思博士; 一部分
作為社論發表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
11 月 4 和 21 日及 1854 年 1 月 11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902、3916、
3931 和 3973 號, 並以單行本形式于
1853—1854 年在倫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報”, 原文
曾與“紐約每日論壇報”
和單行本核對

THE PEOPLE'S PAPER.

LORD PALMERSTON.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by Dr. Marx, and communicated by him to us.

FIRST ARTICLE.

RUGGERO is again and again fascinated by the false charms of Aletta, which he knows to disguise an old witch—

Same teeth, same eyes, same taste, same everything and the knight-errant cannot withstand falling in love with her anew whom he knows to have transmuted all her former seducers into ashes and other beasts. The English public is another Ruggero, and Palmerston is another Aletta. Although a septuagenarian, and since 1847 occupying the public stage, almost without interruption, he contrives to remain a novelty, and to evoke all the hopes that used to centre on an untired and promising youth. With one foot in the grave, he is supposed not yet to have begun his true career. If he were to die to-morrow, all England would be surprised at learning that he has been a Secretary of State half this century.

If not a good statesman of all work, he is at least a good actor of all work. He succeeds in the comic as in the heroic—in pathos as in familiarity—in the tragedy as in the farce: although the latter may be more congenial to his feelings. He is no first class orator, but he is an accomplished debater. Possessed of a wonderful memory, of great experience, of a consummate tact, of a never-failing presence d'esprit, of a gentlemanlike versatility, of the most minute knowledge of parliamentary tricks, intrigues, parties, and men, he handles difficult cases in an admirable manner and with a pleasant volubility, sticking to his prejudices and susceptibilities of his public, secured from any surprise by his cynic impudence, from any self-consciousness by his selfish dexterity, from running into a passion by his profound frivolity, his perfect indifference, and his aristocratic contempt. Being an exceedingly happy joker, he ingratiates himself with everybody. Never losing his temper, he imposes on an impassioned antagonist. When unable to master a subject, he knows how to play with it. If wanting of general views, he is always ready to utter elegant generalities.

Endowed with a restless and indefatigable spirit, he abhors inactivity, and pines for agitation, if set for action. A country like England allows him, of course, to busy himself in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What he aims at is not the substance, but the mere appearance of success.

If he can do nothing, he will devise anything. Where he dares not interfere, he intermeddles. Not able to vie with a strong enemy, he imprudently weakens a weak one.

Being no man of deep designs, pondering on no combinations of long standing, pursuing no great object, he embarks in difficulties with a view to disentangle himself in a showy manner. He wants complications to feed his activity, and when he finds them not ready, he will create them. He excels in show-conflicts, show-battles, show enemies, diplomatic notes to be exchanged, ships to be ordered to sail, the whole movement

the net of piracy, while admitting that Denmark had evidenced no hostility whatever towards Great Britain, he contended that they were right in bombarding its capital and steering its fleet, because they had to prevent Danish neutrality from being, perhaps, converted into open hostility by the compulsion of France. This was the new law of nations, proclaimed by my lord Palmerston.

When again speechifying, we find that English minister *par excellence*, engaged in the defence of foreign troops, called over from the continent to England, with the express mission of maintaining forcibly the oligarchic rule, to establish which William had, in 1688, come over from Holland, with his Dutch troops. Palmerston answered to the well-founded "apprehensions for the liberties of the country," originat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a very flippant manner. Why would we not have 16,000 of those foreigners at home, while you know, that we employ "a far larger proportion of foreigners abroad."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0, 1812.)

When similar apprehensions for the constitution arose from the large standing army, maintained since 1815, he found "a 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very constitution of our army," a large proportion of its officers being "men of property and connections" (House of Commons, March 8, 1816.)

When the large standing army was attacked from a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he made the curious discovery that "much of our financial embarrassments had been caused by our former low peace establishments." (House of Commons, March 8, 1816.)

When the "harden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isery of the people" were contrasted with the lavish military expenditures, he reminded parliament that these hardens and that misery "were the price which we (viz. the English oligarchy) agreed to pay for ou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House of Commons, May 16, 1828.)

In his eyes, military despotism was not to be apprehended from the exertions of "those self-called, but misled Reformers, who demand that sort of reform in the country which, according to every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must end, if it were acceded to, in a military despotism." (House of Commons, June 14, 1820.)

While large standing armies were thus his panacea for 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 flogging was his panacea for 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rmy. He defended it in the debates on the Mutiny Bill, on the 5th of March, 1824, he declared it to be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on March 11, 1825, he recommended it again on March 10, 1828; he stood by it in the debates of April, 1833, and he proved an amateur of flogging on every subsequent occasion.

There existed no abuse in the army, he did not find plausible reasons for, if it happened to foster the interests of aristocratic parasites. Thus, for instance, in the debates on the Sale of Commission.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2, 1828.)

載有卡·馬克思的“帕麥斯頓勳爵”這組文章的

第一篇的“人民報”原版的一部分

第一篇^①

魯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風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風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沒有眼睛，沒有牙齒，沒有味覺，沒有一切。”^②

这位游俠騎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驢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魯杰罗，帕麦斯頓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頓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 1807 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們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經踏进了坟墓，可是人們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話，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

① 在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本文开头有两段話是“人民报”上沒有的。这两段話是这样的：“东方的糾紛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各党派的情况沒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麦斯頓勳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紅人。人人都談論他，說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的人；大家都默认，一旦內閣改組，无疑將由他出任首相，而托利党人、輝格党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輿論，无不大声疾呼要求改組內閣。

帕麦斯頓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現象，以致时时有人推測这也許是一种純粹的虛构，这种虛构的用途不在国内，而是像出口貨一样向国外銷售的。然而，这种推測毕竟是錯誤的。”——編者注

② 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場。——編者注

他已經做了半个世紀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員。喜劇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語、悲劇和鬧劇，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鬧劇。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說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辯論家。他有惊人的記憶力、丰富的經驗和无比的精細，他永远保持着 *présence d'esprit* [鎮靜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圓活，熟諳議會里的一切陰謀詭計、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見，利用他們的感情。厚顏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腸和圓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輕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貴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說十分巧妙的俏皮話，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沒有本領搞通某个問題，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詞句編出一套漂亮話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閑，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当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使他自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間調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人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謀，沒有任何偉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

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糾紛，因为糾紛使他可以維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糾紛，他就制造糾紛。他非常喜爱虛假的冲突，同虛假的敌人进行虛假的战斗，交換外交照会，調遣軍艦，忙来忙去，直到在議會中引起激烈的辯論，而且这种辯論一定能使他获得暫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貫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緊張。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閣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①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詞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負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說，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見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宮廷心目中的 *bête noire* [可憎恶的东西]^②，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費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輝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虛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詞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調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貴族的傲慢語言来掩盖資产階級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別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別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討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爭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說大話的本事。

①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还有下面一句話：“他就是托馬斯·卡萊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領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編者注

② 字面的意思是：“黑色动物”。——編者注

有人罵他拿俄國的津貼，但也有人疑心他是燒炭黨。1848年，他曾經不得不為自己辯護，以免因被控像是沙皇尼古拉的大臣而遭法辦；使他深感滿意的是，1850年，他遭到了外國大使們的陰謀反對，這個陰謀在上院獲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敗²⁹⁶。他出賣別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禮貌，因為禮貌是魔鬼用來換取受騙的傻瓜的鮮血的小錢。壓迫者永遠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實際幫助，被壓迫者從他那里則從來不會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詞令。每當波蘭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國人遭到鎮壓的時候，帕麥斯頓總是在執政，但是屠殺他們的暴君却老是懷疑帕麥斯頓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聯繫，其實暴君的屠殺還是經過帕麥斯頓首肯的。到現在為止情形一向是這樣：誰要是把他當做敵人，大概不會得到好處，誰要是把他當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這種外交手腕雖然沒有使他和外國的談判獲得怎樣輝煌的結果，可是在另一方面成就却非常輝煌：他有辦法使英國人民相信他對談判結果所做的一套解釋，使他們把空話當作實際，把幻想當作現實，只聽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齷齪的動機。

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子爵（他的封號來源於愛爾蘭貴族），1807年波特蘭公爵組閣時被任命為海軍部部務委員。1809年任軍務大臣，這個職務他一直擔任到1828年5月。1830年他非常機靈地轉到輝格黨人方面去，於是他們就讓他做輝格黨永久的外交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這兩段托利黨執政的時期外，從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國的全部對外政策都是由他負責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寧先生、葛德里奇勳爵、威靈頓公爵等托利黨人領導內閣的時期，曾經進行了反雅各賓戰爭，大

举国债，颁布谷物法²⁹⁷，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²⁹⁸，人民——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默思勋爵的话来说——常常“出血”，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人身自由和正常的诉讼程序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訶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却一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替一国对另一国的空前无耻的暴力行为辩护，这次暴力行为，就是英国正当它宣称和丹麦非常和睦的时候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²⁹⁹。关于办外交要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给了他们责任？〉保守秘密。”

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这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所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英国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得对，因为英国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 *par excellence*〔道地的〕英国大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从

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 1688 年威廉带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而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告诉这些人:既然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用的外国军队比 16 000 人多得多”,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雇用这 16 000 人的外国军队呢?(下院,1812 年 3 月 10 日)

当人们由于 1815 年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同样为宪制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结构本身就是宪制的足够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下院,1816 年 3 月 8 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1816 年 4 月 25 日)

当有人向他指出“全国人民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甘愿付出的代价”。(下院,1820 年 5 月 16 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的危险之存在只能归罪于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1820 年 6 月 14 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内秩序的万应灵丹,那末体罚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 1824 年 3 月 5 日关于惩治叛乱法案³⁰⁰ 的辩论中他为实行体罚进行辩护;1825 年 3 月 11 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1828 年 3 月 10 日,他再度建议采用体罚;在 1833 年 4 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行体罚的

办法，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了对这种惩罚制度的热烈爱好。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下院，1828年3月12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战士；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³⁰¹的议案。为什么他要反对呢？原来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³⁰²“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1828年2月26日）

为了证明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责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而

“英国国教方面独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自己的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1824年4月9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的巨额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³⁰³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許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 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絕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剝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須这样做的话…… 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們只有在立法机关——換句話說，也就是統治階級——认为适当的限度內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种錯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別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爱尔兰不住在本地的大地主所造成的苦难，并且能代替济貧法。（下院，1829年3月18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領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家，一刻也不能准許爱尔兰人貧困的烏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們晴朗的天空^①。

他說：“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沒有享受到所有英国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福。〈請想一想，每星期只有7个先令收入的家庭能享受什么幸福吧！〉然

^①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大地主和金融巨头們晴朗的天空”作“大地主和金融巨头們的議会上的晴朗的天空”。——編者注

而，——他接着說，——爱尔兰农民也有他們的幸福…… 他們有足够的燃料，沒有吃的也只是偶然的事（6天中只有4天!）。”

多么幸福啊！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們有一种比他們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1829年5月7日）

像談論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談到爱尔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嘻皮笑臉：

“有人說，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閣下，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国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1829年3月7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怪呢？

第二篇

当改革运动³⁰⁴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便脱离了托利党，投到辉格党方面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英国本土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但他在1828年仍然很大方地赞成把选举权扩大到北明翰、里子、曼彻斯特等工业大城市，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我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所做的某些让步，可以成为防止“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1828年6月27日）。他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圈子了；正相反，改革会使宪法有力和牢靠，使资产阶级背离人民的反对立场。

“资产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大贵族们，叫他们相信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土地贵族们说，宪法并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土地占有制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以下一些无意中道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道：“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

們沒有誠意讓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權”；有時又說：“有人還斷言我們不過是想用另一種形式來保持貴族和地主的勢力”。他甚至承認：在勢必向資產階級作某些讓步的同時，“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導的原則”就是“取消選舉特權”，即取消托利黨人舊有的“腐朽的市鎮”的選舉特權，以利于輝格黨人的新選區。（下院，1831年3月24日及1832年3月14日）

現在我們還是來談談勛爵閣下在外交方面的業績吧。

1823年，法國軍隊根據維羅那會議的決定進入西班牙，要取消西班牙的憲法，把人民交給波旁昏君^①及其周圍的偽善僧侶進行殘酷報復，當時，帕麥斯頓勛爵堅決拒絕任何“為了抽象原則而進行唐·吉訶德式的十字軍征討”的主張，拒絕採取任何“有利于人民”的行動，雖然這個國家的人民當年曾英勇抵抗拿破侖而拯救了英國。他在這個問題上對他當時的對手輝格黨人所說的話，生動而正確地反映了自從他當上了他當年的政敵的永久外交大臣之後一直奉行的對外政策。他說道：

“有人想叫我們在談判中就進行威脅，而不管談判一旦失敗我們並沒有進行戰爭的準備這一點。如果我們老談戰爭而實際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們拿軍隊來威脅一下就在某種官方文件後面躲藏起來，如果我們在討論問題時只是挑逗式地揮動寶劍，而到要打起來的時候卻抓起筆來大寫特寫抗議書，那我們就成了愛吹牛的胆小鬼，就會遭到整個歐洲的鄙視，成為他們嘲笑的对象。”（下院，1823年4月30日）

最後，我們來談談關於希土問題的辯論，因為這次辯論使帕麥斯頓勛爵第一次有機會表現了他無論在內閣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堅

^① 斐迪南七世。——編者注

定不移地維護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的，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俄国慣用的什么土耳其人的野蛮、希腊正教的文明、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等等詞句。但是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他以外交大臣的身分极力反对任何譴責“海軍上将科德林頓的可嘉行动”的企图（由于这种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納瓦林被击潰），同时他又承认：“这是同一个与我們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进行的战役”，这是“令人痛心的事件”。（下院，1828年1月31日）

他后来退职后，便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說他执行俄国命令太慢。

“在履行我們对希腊的义务时，我們的速度和毅力表现在哪里呢？已經快要到1829年7月了，却还没有履行1827年7月签订的条約…… 不錯，土耳其人是被赶出了摩里亚…… 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海峽的軍事行动中止了呢？…… 由于英国及其狹隘政策的干預，他們的繼續挺进被阻止了…… 为什么联軍沒有对海峽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沒有立即占領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領土呢？我认为，联軍同土耳其就希腊問題談判得太多了。”（下院，1829年6月1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因此俄国外交官受命——請回忆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急电——把奥地利描繪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交的唯一目的据說就是解放希腊和拯救欧洲文明。勋爵閣下自然也依此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淺及倒霉的偏見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了。”

由于阿伯丁政策的搖摆不定，英国看来已成了

“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馬茂德組成的那个鏈条上的主要一环……

人民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是由于刻骨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1829年6月1日）

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①：

“就自己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急电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急电，无疑地，读起来很动听，措词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感情，使有关方面看起来很容易觉得这些急电比原作者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我希望英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也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即在這一战争中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声明这一点……世上有3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1830年2月16日）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斯在1828年2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俄国200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

^①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作“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保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在1830年2月5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保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完整推崇为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一次又一次地抨击了阿伯丁”。——编者注

雷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不在里海駐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像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³⁰⁵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对爱拉多^①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維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³⁰⁶，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个阿克尔曼条约³⁰⁷，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

① 即希腊。1833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进展”中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这笔赔款的抵押……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康波第斯特里亚伯爵。”³⁰⁸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描绘这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1830年2月16日）

帕麦斯顿成为辉格主义在外交部的体现者之后，又把这一观点完善化了：

“可敬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认为俄国从1815年到现在的行为一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着重指出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说俄国的势力由于波斯战争而增强，这并不是因为俄国本来就要这样……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也不是进攻的一方。我不想一一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来使议院厌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部条款，并且在得到多次通知之后拒绝赔偿损失——这种种事实，我认为决不能否认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末俄

国就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領土，——至少是在欧洲。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領（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黑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訂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致它在欧洲的領土的任何扩張。”（下院，1832年8月7日）

讀者現在該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的公开會議上要對勛爵閣下說“他不知道帕麦斯頓是代表誰”了吧。³⁰⁹

第三篇^①

远近皆知子爵閣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十分乏味的”达德利·斯图亚特^②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过一次机会向他们表示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也是一位

“值得尊敬的人，他发表演说，执行决议，表决呼吁书，陪伴代表团，随时随地都对相当的人抱着相当的信任，必要时还会三呼女王陛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于1830年11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而到1831年8月8日，汉特先生就代表韦斯明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王国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英国内閣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极为愤怒的听众的呵叱，不得不默不作声。显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閣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閣下；这时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閣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他的假相所迷惑，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极力阻挠人类自由事业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为此我们打算以近25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阐述这个老练演员在欧洲时代剧中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② 俏皮话：«dear, dully deadly»意思是“亲爱的、十分乏味的”，“乏味的”一詞与达德利(Dudley)这个名字同音。——编者注

生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閣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結論：政府“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理”。帕麦斯顿勋爵反对这种說法，他說，“現存条約赋予我們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末，在他看来，現存条約赋予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問題他本人回答說：

“俄国領有波兰的权利有維也納条約作了規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但該条約規定領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維也納条約这一事实，并不說明我們必須保证俄国不違反这个条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总之，保证条約决不是說保证条約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回答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薩的：“我們确实向您宣过誓，但請回忆一下，我們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³¹⁰

不过，維也納条約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締約一方的不列顛政府

“有权对任何違反条約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見并表示这种意見…… 維也納条約各締約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而我个人的意見也是这样，这一点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隱瞞过。早在华沙被占領和軍事行动的結果明朗化以前，我就預先把这个意見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知。但是俄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抱着另一种看法”。（下院，1833年7月9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靜地估計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發揮他对維也納条約某些条款的意見，因为他已經确信，寬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剿灭波兰人民只不过是為了給波兰的宪法作一个应有的安排，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还

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閣下还谴责了波兰人，說他們不該“采取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无法为之辯解的步驟，即推翻了皇帝”。（下院，1833年7月9日）

“我甚至还可以說，波兰人是进攻的一方，因为斗争是他們先开始的。”（下院，1832年8月7日）

当人們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称：

“無論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來說，要消灭波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試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1832年6月28日）

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設想，但他却硬說人們誤解了他，实际上他說这些話并不是从政治上說的，而是从人們的生活上說的，他的意思是說俄国皇帝

“無論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百万人”。（下院，1836年4月20日）

当議院在援波运动期間打算进行干預时，帕麦斯顿就說他應該負起他的大臣职责。可是当人們耽心的事情終于发生时，他却冷冷地說，

“議院的任何表决絲毫打动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殘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顿却建議議院要对俄国皇帝尽量温和。他說，

“他对辯論时使用的某些詞句比任何人都感到遺憾”（下院，1832年6月28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說在某些場合，俄国政府对波兰人曾經过于殘暴，那我們可以把这看做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遭到

忽視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那种場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經不起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波兰命运业已决定，而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利的叛乱而势将崩潰的时候，帕麦斯頓却要議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般令人非常滿意”。（下院，1832年1月26日）

当有人提議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不愉快地表示反对給这些人金錢补助；因为，尽管自然的、自发的感情会使每个慷慨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但給这些不幸的人任何金錢补助都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我們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如此心慈的人却让不列顛人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閣下竭力要向議會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但尽管如此，仍有人在下院作了声明，这些声明充分說明了他在那严重关头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声明却从未试图加以反駁。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領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英法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問題进行商談。土伊勒里宮^①宣称，“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計劃，它願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頓勋爵拒絕了这项建議。1831年法国駐圣詹姆斯宮的大使达来朗先生正式提出英法共同行动的計劃，但遭到勋爵閣下十分明确的拒絕，并接到勋爵閣下的照会，照会中說，

“在波兰問題上进行友好調停会遭到俄国拒絕。各大国不久以前就拒絕了法国的这项建議。在調停遭到俄国拒絕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宮廷的干涉只

^① 即法国宮廷。——譯者注

能带有强制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的亲切友善关系不允许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对付一位有**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君主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这还不算。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在下院作了如下声明：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于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被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接到勋爵阁下反对这一计划的指示，于是瑞典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为着同样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德黑兰宫廷的大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耳爵士马上就去追赶皇太子，尽管他同大本营有三天路程的距离，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并以英国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边界进一步，英国便立即参战。在阻挠土耳其恢复战争一事上，勋爵阁下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它那在俄波战争中中立伪装的材料提供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反驳这个要求时说，

“大不列颠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将极为满意。”（下院，1831年8月16日）

当然，他想看到这一斗争尽快地结束，而普鲁士和他也有同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亨利·加利·奈特先生曾把勋爵阁下对波兰起义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奇异的不彻底性**……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总是让我们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做些于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波兰的事业和我们的不平的正义性，但却对我们说：诸位现在千万要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要派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只会妨碍进行谈判，所以我

請諸位听我劝告，現在要保持鎮靜；請諸位相信，这样做会大有好处的。我們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問題进行过談判，我們就再也知道了。我們所得到的只是勳爵閣下的漂亮話而已。”（下院，1840年7月13日）

所謂的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逝之后，波兰的民族独立性还剩下一个幻影，这就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潰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仅是想征服华沙大公国，而是干脆把它沒收；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連同被波拿巴划归大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領有克拉科夫的奥地利很想把它收回。沙皇一看，他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但他又不甘把它让与奥地利，所以就提議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城市。为此維也納条約第六款曾規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屬地区永远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保护下的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維也納条約第九款規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三国宫廷都应尊重，并要求別国永远尊重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屬地区的中立。任何軍隊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一地区”。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剛剛結束，俄国軍隊馬上出乎意外地开进克拉科夫，占領該城达两月之久。然而这种行为当时被看做因战争关系而采取的临时必要步驟，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就被人遺忘了。

1836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魯士的軍隊以所謂必須強迫克拉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領克拉科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廢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駐当地的領事所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參議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大学由于附

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城市同周围各国的贸易也中断了①。

1836年3月18日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行动的解釋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連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适可而止，必须截断自己流畅的讲话，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步骤。我所以要提这些事实，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即使不能证明强占克拉科夫是对的，那末也许可以使之得到一些谅解……”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然而然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作了应有的估价，因为它们预计到我們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1836年4月20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领事。英法两国领事同时到达克拉科夫将是一件大事②：子爵阁下看到下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建议，就向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这几句话作“勋爵阁下仍以他在1836年及1840年所断言的‘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效’为依据拒绝对此提出任何抗议。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他却认为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②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一件大事”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会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会在克拉科夫进行的阴谋”。——编者注

議院郑重担保說，政府有“想派一个領事級的代表去克拉科夫的意图”，从而迫使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收回自己的建議。1837年3月22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的这个諾言，勋爵閣下却回答說，他“改变了自己的意图，沒有派領事級的代表到克拉科夫去，現在也沒有这种意图”。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声明，他要提出建議，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釋；但是子爵閣下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提案无法通过：他不出席議院會議，使會議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①。

1840年，“暂时”占領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請願书，就中提到：

“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災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們的同市居民現在只有指望英法两国政府能給以强有力的、文明的保护。他們現在的处境使他們有权呼吁維也納条約的每个締約国进行干涉。”

1840年7月13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請願书向子爵閣下提出質問，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顛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問題只是時間問題。”

談到維也納条約遭到破坏的問題，他的話是：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維護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閣下說了这話以后的第三天就同俄、奥、普三国簽訂了使英国軍艦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約³¹¹，——大概是为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以及在1853年倫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話：“他就这样始終沒有作出解釋，說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他的諾言，并且順利地擋回了每一个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的书面材料的嘗試”。——編者注

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在勋爵閣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貿易因克拉科夫被占領而受到的損失时，勋爵閣下推諉說“向德国輸出的总額并未减少”。这个論据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問題以及派領事級的代表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真实意图，他說，

“可敬的反对派代表們利用了他打算派英国領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成功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閣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緒的議院的斥責而于1836年作的），这种手段使他得到了惨痛的教訓，因而他有权坚决拒絕對这类問題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1846年8月17日他說，

“欧洲各大国是否遵守并履行維也納条約，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領事級的代表駐在克拉科夫。”

1847年1月28日人們再次要求他提出书面材料來說明他**拒**不委派不列顛領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他声称，

“这个問題同克拉科夫被吞并問題的辯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看不出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端重新展开激烈爭論有什么好处。”

可見，他是一直坚持着他早在1837年3月17日对于向議会提出官方文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問題，那末提供出来是危險的；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問題，那末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貿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列顛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駐华沙的領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說：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莫尔达維亞、加里西亞以至的里雅斯特运来的大宗商品的貯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

再分运到周圍各国去的。铁路綫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魯士、奥地利……的重要铁路干綫連接起来。它还是亚得利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間重要铁路綫的中心点。它还要敷設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可以有把握地預期，列万特^①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利亚海連接起来，因此决不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連接东西两大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貿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下院承认 1846 年的克拉科夫起义³¹²是三强国故意挑撥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軍隊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請求开进克拉科夫領土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軍隊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釋。克拉科夫政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們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1846 年 8 月 17 日）

1846 年 2 月 22 日奥地利軍隊占領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魯士的軍隊也随之侵入。同月 26 日泰尔諾夫的地方长官貼出告示，号召农民打杀地主，并答应給他們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錢報酬”。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里西亚人的大破坏，杀死了近 2 000 名地主。3 月 12 日出現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里西亚人起来維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 4 月 28 日官方的“日报”³¹³上，弗里德里希·馮·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发生的事件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沙皇的僕从普魯士按照共同的計劃行动的。在所有这些丑事做出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該是在下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根据公正的原則办事并尊重权利，实在沒有料到它們会有意对克拉科夫采取这种做法，这不是克拉科夫根据条約載明的义务有权指望的做法。”（下院，1846 年 8 月 17 日）

① 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总称，大致相当于現在的“近东”。——譯者注

勋爵閣下当时心中記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結束會議的議會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顛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維也納条約各項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謨先生对于“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軍隊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疑时，勋爵閣下要求議會不必重視休謨先生的意見，因为最可靠的情报掌握在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領是“暫时的”。1846年的議會就和后来1853年的議會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但奥地利1846年11月11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快也就发表了出來。1847年1月19日議會重新召集，这时議會从国王敕語中知道，克拉科夫已經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英勇的帕麦斯顿的抗議书。但为了使这种抗議不起任何作用，勋爵閣下这时想出一条妙計，使英国在西班牙的婚姻問題³¹⁴上卷入同法国爭执的旋渦，——这场爭执几乎酿成两国的冲突。这一政策遭到斯密斯·奥勃萊恩先生的严厉批評。法国政府曾建議帕麦斯顿共同抗議克拉科夫的被侵占。对此，諾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閣下的指示回答說，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吞并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为蒙潘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因为前者違犯的是維也納条約，后者違犯的則是烏特烈赫特条約³¹⁵。可是，烏特烈赫特条約虽于1782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被彻底廢除，从1792年起就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議會里誰也不比勋爵閣下知道得更清楚，在辯論墨西哥和布宜諾斯艾利斯被封鎖的問題时他本人就曾向議會宣称³¹⁶：

“烏特烈赫特条約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蕩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法屬圭亚那之間的境界一节例外，因为該节已直接列入維也納条約。”

勋爵閣下为反对俄国侵犯波兰所做的努力，还不止于此。

英、荷、俄三国訂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謂**俄荷貸款协定**。反雅各宾战争期間，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过款。波拿巴失敗以后，尼德兰国王^①“想給同盟国以适当报酬，答謝它們使他的国家获得了解放”和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沒有任何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議同俄国——其他列强都照顾俄国而放棄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財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簽訂条約；条約規定他分期代俄国偿还欠霍普公司的2500万盾的債款。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地、以及迭麦拉拉、埃塞基博及貝尔比斯等地，于是也加入这一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維也納条約，但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所有債務未偿清以前，一旦荷兰和比利时的联合遭到破坏，則貸款立即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³¹⁷而脫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不再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②。另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证实的那樣，俄国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提出要英国方面繼續代为偿还債務的任何要求”。（下院，1832年1月26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是由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分裂而得到酬报。”（下院，1832年7月16日）

他悲伤地呼叫要忠实于条約，首先是維也納条約。他极力設

① 威廉一世。——編者注

② 在1853年11月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以及在1853年倫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話：“因为貸款协定規定比利时各省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領土，但現在荷兰已經不再享有这些省份的主权了”。——編者注

法同俄国签订了1831年11月16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說，該协定是“根据維也納會議通过的現在仍然完全有效的一般性決議”签订的。

当俄荷貸款协定列入維也納条約时，威灵頓公爵曾大加贊揚：“这是卡斯尔里勛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債務迫使俄国遵守維也納条約”。之后，当俄国拒絕遵守維也納条約，占領了克拉科夫的时候，休謨先生建議不再从不列顛國庫中撥款給俄国。但是子爵閣下认为，尽管俄国可以对波兰違反維也納条約，而英国对俄国仍旧應該繼續遵守条約。

但这还不是勛爵閣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爆发以后和議會批准給俄国新的貸款以前，帕麥斯頓就已經以偿还英国在1815年欠的旧債務为名，承担了俄国在对波战争中的开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現在的圣萊昂納茲勛爵愛·薩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在这个問題上沒有絲毫疑問，政府沒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1832年1月26日），但他仍然这样做了。我們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如下的一句話：“勛爵閣下沒有法定权力支付这笔款項。”（下院，1832年7月12日）

总之，我們現在明白了勛爵閣下为什么不論在什么場合总要重复說：“再也沒有什么能比波兰問題的辯論更使一个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头疼了”^①。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以及在1853年倫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麥斯頓与俄国”中，本篇是以下面这样的話結尾的：“他目前对于他始終不渝地維護其利益的那个大国的侵略意图所要进行的反对究竟有几分真实，諸位讀者現在可以作一公正評價”。——編者注

第 四 篇^①

子爵閣下有一个永远說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話題，那就是他对整个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貢獻。的确，多亏了他的发明創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 3 个“立宪”王国——3 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納博士的何蒙古魯士^② 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堡氏^③ 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瑪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牙

“应被看做是欧洲的**独立国**之一”。（下院，1837 年 3 月 10 日）

就在子爵閣下說这話的同时，有 6 艘英国战列舰在里斯本海

① 在 1853 年 11 月 21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話：“許多人期待着英国政府在現已开始的俄土战争期間最終会放棄那种敷衍办法和毫无結果的談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掠夺者放棄他們的掠夺物以及他們幻想統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看，这种期待不能說沒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認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实，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而这些事实，正是那位被看做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对欧洲进攻的英国大臣过去干出来的。的确，英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們不滿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但他們却深信事情一旦由帕麦斯頓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希望这些人注意子爵閣下的生平，讓我們有可能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1832—1847 年这一充滿事件的阶段，使他們从中得到教訓”。——編者注

② 何蒙古魯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納用中世紀的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頸玻璃瓶里面的能发光的胎儿形，从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也不能发育。——譯者注

③ 斐迪南-奧古斯特。——編者注

港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彼得鲁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委托给另一个玛丽亚^①（她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所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可畏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 1837 年 3 月 10 日在下院的演说）

当然，对西班牙有价证券持有者来说是可畏的国家。甚至把伯利克里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小孩来挂名统治，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1832 年 8 月 8 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巴士底狱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其他一些铺张的修辞，例如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牙是个“独立国家”等等词句的 *licentia poetica* [诗的特权]。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到头来无非就是让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割走了它的卢森堡省并把科堡王朝强加在它头上。谈到同法国的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可以说，这种诚意协商从 1834 年帕麦斯顿想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建立了四国同盟³¹⁸ 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商关系，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东西。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 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①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编者注

俄国的宿願終於實現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博斯普魯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領了东羅馬。

“俄軍占領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領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經飄揚在塞拉尔宮^①的上空也不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 1834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說)

土耳其政府在 1828—1829 年的戰爭中打了敗仗，因而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們就成功地造起反来。1831 年 10 月，苏丹^②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之間就已开始冲突。1832 年春，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帶領軍隊开进了叙利亚，經過霍姆斯会战占領了該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其最后一支軍隊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 年 2 月 2 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2 月 17 日，法国海軍上将魯散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絕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魯散沒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③ 2 月 20 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軍在博斯普魯斯海岸登陆，包圍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軍官去通知特拉比曾德和

① 土耳其皇宮。——譯者注

② 馬茂德二世。——編者注

③ 莫札特的歌劇“唐璜”中騎士团长的雕像所說的話。——編者注

埃尔斯倫的帕沙說，一旦伊布拉希姆的軍隊要向埃尔斯倫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軍隊保卫。1833年5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說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紙片請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們商議，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駐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8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条約規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經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簽訂任何新的条約，并确认以前的各項俄土条約，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約。附在条約中的一項秘密条款規定，土耳其政府必須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鎖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軍艦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簽訂而把奧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應該感謝誰呢？不是別人，而是爱尔兰貴族、皇帝陛下樞密院委員、巴尼大十字荣誉勳章荣膺者、議會議員、陛下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約翰·帕麦斯顿子爵閣下。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是1833年7月8日簽訂的。1833年7月11日，亨利·利頓·布尔韦尔先生提出一項建議，要求向議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亞問題的文件。勳爵閣下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問題尚未結束，而这一問題的性質如何完全要看結局如何而定。既然結果还不知道，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1833年7月11日）

布尔韦尔先生責备勳爵閣下不該不去保卫苏丹 反对穆罕默德-阿利，让俄国軍隊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勳爵

閣下就第一次运用了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辯解与自供交織在一起的独特体系。現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 membra disjecta [断片] 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能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請求过援助。”(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間土耳其政府正式請求援助。”(下院，1833年8月24日)

不，不是8月間。

“土耳其政府請求給予海軍援助是在1832年10月間。”(下院，1833年8月28日)

不，不是10月間。

“土耳其政府請求援助是在1832年11月間。”(下院，1834年3月17日)

勛爵閣下如此輕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像福斯泰夫把他背后襲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綠衣裳的家伙們的人数改来改去^①一样。是的，他不能否认土耳其政府曾拒絕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絕了土耳其政府的請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勛爵閣下。土耳其政府先是派馬夫罗格尼先生去倫敦，后来又派納梅克-帕沙請求派一支海軍分舰队援助，并且答应苏丹将負担这支分舰队的全部費用，将来还要給予不列顛臣民以新的貿易特权和优先权来报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勛爵閣下会表示拒絕这一点拿得这样准，竟至附和了向勛爵閣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請求。这是勛爵閣下本人对我们說的，他說：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說，俄国对英国政府給予这种援助根本沒有表現任何嫉妒和猜疑；当請求书尚在审查的时候，俄国大使就正式来見我，說他已經

^① 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編者注

知道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并且说，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得到支持，保存下来，因此诸位大臣如有意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做出决定，俄国将深感满意。”（下院，1833年8月28日）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代它求情的人，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恍然大悟要它走哪条路了。它知道，它已注定非要请狼来看守羊不可。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3个月，它才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勋爵阁下说道：

“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助而感到高兴。”（下院，1834年3月17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不能不做如下的自供：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罕默德-阿利之间的冲突早在1831年10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1832年12月21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就没有时间吗？伊布拉希姆-帕沙在1832年7月的大会战³¹⁹中赢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11月3日才提出来。我们要同罗伯特·皮尔爵士一起来问：

“难道他对列万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下院，1834年3月17日）

而且，从提出正式請求的 11 月起到 2 月底——俄国出兵最早不过 2 月 20 日——为止一共也有 4 个月之久。那末究竟是因为他在这时期毫无作为呢？

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不合体統的。”（下院，1833 年 8 月 28 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閣下去阻止伊布拉希姆的军队。也是礼仪不許他指示駐亚历山大里亚的領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默德-阿利。勋爵閣下像西班牙大貴族一样，宁願让女王被燒成灰烬，也不願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閣下在 1832 年就曾未經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領事和外交代表，并且同穆罕默德-阿利簽訂条約，修改了現存的貿易和关稅規章及協定，并且做了新的規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沒有考虑要預先征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沒考虑事后土耳其政府是否批准。（下院，1848 年 2 月 23 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閣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訴我們說，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利有广泛的商业来往，破坏这种关系于英国不利”。（上院，1834 年 2 月 4 日）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来往！

但是大家要知道，勋爵閣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霍河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鎖些耳德河，要起催生婆的作用，来減輕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誕生时的痛苦。所以他当时連一艘軍艦也派不出去。（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和 1834 年 3 月 17 日）

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軍援助。我們姑且就承认勋爵閣下的論据吧，假定他确实連一艘軍艦也沒有。但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們說，勋爵閣下一艘軍艦也不用派，只要他說一句話^①。这些权威人士中有那位曾經在納瓦林消灭了土耳其舰队的海軍上将科德林頓。他证实：

“当年，在土耳其面对着撤出摩里亚半島的問題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利就曾体会到我們出面說話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亚半島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来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适当的抗拒，但毕竟明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半島。”（下院，1836年4月20日）

其次，威灵頓公爵声言，

“如果在1832或1833年議會开会期間就明确地告訴穆罕默德-阿利，不許他在叙利亞和小亚細亚进行斗争，战争就会結束，我們也不会冒险让俄皇获得派海陆軍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机会了。”（上院，1834年2月4日）

但是还有一位更可靠的权威人士，这就是勋爵閣下本人。他断言：

“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滿足苏丹关于給予海軍援助的請求，但是英国毕竟給了他以道义支持。不列顛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統率小亚細亚埃及軍队的伊布拉希姆-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協議（在居塔希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結束了战争。”（下院，1834年3月17日）

最后，得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閣同僚——声言他可以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只要他說一句話”這句話后面是：“以便約束穆罕默德-阿利的野心，阻止伊布拉希姆-帕沙的軍队的推进。这是海軍上将馬洪說的，他說這句話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期間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編者注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利的繼續推进所以停了下来，完全是由于英法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許他的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总之，照得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說法，并不是俄国的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軍隊，而是不列顛駐亚历山大里亚的領事的**明确声明**，迫使伊布拉希姆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进军，促成了居塔希亚的協議，協議的結果是穆罕默德-阿利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轄区阿达納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勋爵閣下认为可以准許他的駐亚历山大里亚領事作这一明确声明，只是在土耳其軍隊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經到处都是哥薩克，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口袋里去了。

如果說時間不够和軍艦缺乏使勋爵閣下不能給苏丹以援助，而过分的拘礼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末他至少可以給他的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反对俄国势力过分加强，并竭力把俄国势力限制在更狹小的範圍內。他是否这样做了呢？沒有！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閣下竟然要在最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駐大使。

“在到7月8日为止的6个月过程中，駐土耳其大使的地位和权威比駐任何一国的大使的地位和权威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有效地利用。”（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說）

帕麦斯顿勋爵告訴我們說，不列顛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1832年9月間，当时駐那不勒斯的公使龐森比勋爵在11月間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然而接他赴任的軍艦是在等着他

的；“由于天气恶劣，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沒有能早于 1833 年 5 月底”。（下院，1834 年 3 月 17 日）

由于俄軍还没有到，所以龐森比勋爵就受命用 7 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①

况且，勋爵閣下又何必要阻碍俄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在俄国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说来会有任何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

是啊，当然沒有！俄国并不想瓜分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麦斯顿勋爵从这个怀疑中获得了信心，此外，由于他“怀疑俄国的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立刻达到这一目的”，就使他产生了第二个信心，而第三个“信心”是他从第三个“怀疑”中得来的，即：

“俄罗斯民族〈试想一下吧！俄罗斯民族！〉把它的势力、居住中心及政府机关移到南方各省，乃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閣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陛下政府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被俄国武装力量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 俄国政府援助苏丹的时候是以它的名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无限信任的。”^②（下院，

① 在 1853 年 11 月 2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俄軍还没有到……”这一段话作“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 9 月间，而龐森比勋爵接到委任状是在 11 月间。但是，既然伊布拉希姆-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所以龐森比勋爵就受命用 7 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编者注

② 在 1853 年 11 月 2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但是沙皇颁布了 1832 年的组织法，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此，勋爵閣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

1833年7月11日)

勳爵閣下所怀抱的信任是那样玄妙和坚定，是那样充分、固定、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难以医治，是那样无限、无畏和无先例，以致他在1834年3月17日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已經成为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时仍然确信无疑地說，“大臣們並沒有**信任錯**”。的确，如果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

第五篇

1833年8月21日，“先驱晨报”发表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内容。8月24日，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下院询问帕麦斯顿勋爵：

“俄土之间是否果真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我希望勋爵阁下能在议会本届会议闭会前不仅把所缔结的条约的本文，而且把有关土俄之间缔结这些条约的全部情报提交议院。”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不列颠政府一旦肯定所提到的条约确实存在，一旦获得这一条约的本文，那时它就会决定它应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新闻界有时先于政府获得消息，决不能因此责难政府。”（下院，1833年8月24日）

过了7个月，他要议会相信，对他来说

“要在8月间获得9月间未能在君士坦丁堡最后批准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正式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院，1834年3月17日）

诚然，条约他是知道的，但只不过是而非正式而已。

“不列颠政府得知俄军是带着这项条约撤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奇。”（帕麦斯顿勋爵1848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不仅如此，勋爵阁下早在条约签字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它。

“土耳其政府刚一收到它（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草案），就把它交到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并请求英国保护它对付伊布拉希姆-帕沙和尼古拉这两方面的逼迫。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这件事还被极端背信弃义地通知了俄国大使。于是第二天俄国大使就把土耳其政府交给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份条约副本递交土耳其政府，并且讽刺地建议下次

要挑选一个比較可靠的受托人。”(下院, 1848年2月8日)³²⁰

但是子爵閣下毕竟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部目的。他在下院被质詢到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事是1833年8月24日,那时他对这一条約是否存在还不能肯定。8月29日,議會就宣布休会,这时議會从国王敕語中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快慰的担保:

“破坏土耳其和平的軍事行动已經結束,議員們可以相信,国王对于有可能使土耳其帝国的現狀或它将来的独立受到損害的任何事件,都是极密切地注視着的。”

这样,我們就找到了解决俄国有名的七月条約之謎的钥匙。条約是在7月間簽訂的,到8月間,公众通过报纸得知了有关条約的某些消息。在下院有人就质詢帕麦斯顿勋爵这件事情;当然,他是一无所知的;議會也閉会了,等到議會复会时,条約已成往事,或者像1841年那样已經不管輿論的反对而生效了。

議會于1833年8月29日閉会,1834年2月5日复会。在这閉会和复会之間发生了两件互相有密切联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英法联合舰队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峽,在那里显示了一下三色旗和联合王国的国旗之后就开到士麦那,然后又回到了馬尔他。第二件事是1834年1月29日俄土两国在圣彼得堡締結了一个新条約³²¹。这一条約剛一签字,联合舰队就返航了。

这一联合行动的用意在于愚弄英国人民和欧洲,要他們相信,在土耳其領海及土耳其沿岸举行敌意示威是針對着土耳其政府的,因为它締結了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而且由于这个行动,俄国才被迫在圣彼得堡簽訂了上述的那項新条約。这个新条約显然为土耳其政府解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强加給它的某些义务,因为俄国在条約中答应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土耳其应付的賠款

縮減为規定數目的三分之一。其他各項條款无非是確認阿德里安堡條約，根本沒提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並且一個字也沒有提軍艦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的問題。相反地，條約為土耳其減輕的負擔，還成了俄國為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所規定的達達尼爾海峽對歐洲封鎖付出的代價。

“在〈不列顛艦隊〉舉行示威的當天，勳爵閣下向俄國駐英大使担保說，艦隊的這種聯合行動對俄國決無任何敵意，不應當把這種行動看做是對俄國的敵對示威，其實這種行動根本沒有什麼用意。我這樣說是根據勳爵閣下的同僚、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龐森比勳爵的權威性証詞。”（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說）

聖彼得堡條約最後批准之後，勳爵閣下對於俄國所堅持的條件的不過分表示滿意。

議會復會之後，在外交部的機關報“地球報”上登出一則簡訊，斷言聖彼得堡條約

“不是證明了俄國考慮問題時穩健和明智，就是證明了英法同盟以及兩強國使用的強硬而一致的言詞對聖彼得堡最高當局產生了影響”。（1834年2月24日“地球報”）

這樣一來，輿論界就會不去注意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了，該條約在歐洲所引起的對俄國的敵意也就會削弱了。^①

但是這種詭計不管多麼巧妙，卻仍然沒有成功。1834年3月17日希爾先生提議

① 在1854年出版的單行本“帕麥斯頓與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中，這段話作“這樣一來，一方面，阿伯丁勳爵和威靈頓公爵抗議過的阿德里安堡條約就從英國方面得到了帕麥斯頓勳爵的事後承認，因為勳爵閣下對聖彼得堡條約正式表示滿意，而聖彼得堡條約只不過是最後批准阿德里安堡條約；另一方面，輿論界就會不去注意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了，該條約在歐洲所引起的對俄國的敵意也就會削弱了”。——編者注

“把俄土两国締結的一切条約以及英、土、俄三国政府間有关这些条約的一切往来文件的副本提交議院。”

勛爵閣下拚命地反对这一提案，硬要議院相信“只有議院完全信任政府”并拒絕这项提案，“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結果这项提案被否决了。但是他拒絕提交文件的理由是这样荒謬和笨拙，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用自己的議會語言把他叫做“使用完全不合邏輯的論据的演說家”，而他的崇拜者伊文思上校也止不住这样叫了起来：

“勛爵閣下的这次演說是他曾經听到过的历次演說中最不能令他滿意的一次。”

帕麦斯頓勛爵竭力說服議院，要它根据俄国的**保证**把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看做是“建立在相互原則上的条約”。据說这种相互原則就表現在，一旦战争爆发，达达尼尔海峽不仅对英国封鎖，而且也对俄国封鎖。这种断言本身就不对；即令是这样，那末这种相互原則也无非是英国-爱尔兰式的，即一切好处都被一方独占。因为达达尼尔海峽并不是俄国到黑海去的入口，相反地，而是从黑海出来的出口。

希尔先生断言“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后果必定就像土耳其政府把达达尼尔海峽让給了俄国一样”，帕麦斯頓勛爵无法駁倒这种說法，他承认条約对不列顛軍艦封鎖了达达尼尔海峽，并且承认一旦英俄之間发生战争，則“根据該条約的条款，事实上很可能甚至对商船也封鎖进入黑海的入口”。但是，如果政府能保持“鎮靜”，如果政府“不表示不必要的不信任”，即默默地贊同俄国今后的一切掠夺行为，那末他

“可以认为，甚至这一条約生效的事情也有可能不发生，因此，条約实际

上将等如一紙空文”。(下院, 1834年3月17日)

此外他还断言,不列颠政府从締約双方得到的“保证和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政府拒絕反对这个条約。可見,在帕麦斯顿看来,应当注意的不是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条款,而是俄国在条約这件事情上所作的保证,不是俄国的行动,而是它的言詞。但是就在当天,有人提起他注意法国代办拉格兰奈先生对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抗議以及涅謝尔罗迭伯爵在“圣彼得堡报”³²²上作答时所說的“俄皇該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当拉格兰奈先生的照会中的声明不存在”这种傲慢无耻的話,这时勋爵閣下就否认了自己說过的話,轉而發揮相反的道理来了,他声称,

“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首先必須重視外国的行动,而不是它們在个别場合下对某一件事情所使用的言詞”。

这样,他忽而叫人注意俄国的言詞,不管它的行动,忽而又叫人注意它的行动,不管它的言詞。

1837年他仍然对議院肯定地說,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間的条約”。(下院, 1837年12月14日)

而10年以后,当条約早已不存在,勋爵閣下剛剛准备好要扮演真正的英国大臣和«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羅馬公民”]³²³的角色的时候,他才老老实实对議会說,

“无疑,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伯爵在那种使土耳其难于拒絕的情况〈正是勋爵閣下所造成的〉下强加于土耳其的……实际上,条約使得俄国政府可以干涉土耳其的事务并迫使它接受条件,这是和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相容的”。(下院, 1848年3月1日)

在議会关于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整个辯論过程中,勋爵

閣下像喜劇里的小丑一樣，有一個能夠滿足任何要求和回答任何問題的無所不包的現成答話，隨時可以使用。這就是：英法同盟。當人們對他縱容俄國大加嘲笑的時候，他很鄭重其事地回答說：

“如果這些嘲笑針對的是目前英法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那末我要說，我對於我能參與促成這種誠意協商感到非常自豪和滿意。”（下院，1833年7月11日）

當有人要求他提交有關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的文件時，他回答說：

“英法兩國現在鞏固了它們之間更加親密的友好關係。”（下院，1834年3月17日）

羅伯特·皮爾爵士在發言時大聲叫道：

“我只想指出一點：勛爵閣下只要由於我們歐洲政策的某一問題而陷入窘境，馬上便使用一個現成的脫身之法，即向議院祝賀英法之間的親密同盟。”

但是同時勛爵閣下也使他的反對者托利黨人越來越有理由猜想，“英國是不得已才縱容對土耳其的侵犯行為的，這種侵犯行為的直接鼓勵者是法國”。

由此可見，在這個時期拿出同法國的同盟給人看是要掩蓋暗中聽命於俄國的事實，與此相仿，1840年大嚷大叫同法國決裂是要掩蓋同俄國的正式同盟。

勛爵閣下大量提供已經發表的就比利時立憲王國問題談判情況的文件，大量提供關於“獨立國”葡萄牙情況的許多口頭上的和文字上的解釋，數量之多，已使人為之厭倦，可是到現在為止，誰也不能使他拿出任何一份有關第一次敘土戰爭和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的文件來。1833年7月11日人們第一次要求他把有關這一問題的文件提交出來的時候，得到的回答是“提案提得過早，事

情尚未結束，結果还不知道”。1833年8月24日他說，“條約尚未正式簽字，他尚未弄到條約的全文”。1834年3月17日他斷言，“談判尚在进行……，爭論——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尚未結束”。甚至在1848年，當安斯提先生告訴他，要他提交文件是因為確信這些文件可以證明勳爵閣下同沙皇進行秘密勾結的時候，我們這位英勇的大臣却寧肯用5個小時的演說來消磨時間，也不願用那些一目了然的文件來消除懷疑。這些還不算，1837年12月14日他還厚顏無耻地对托馬斯·阿特伍德先生斷言^①，“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條約的有关文件早在3年前”，即1834年當他聲言只有不把这些文件轉交議院“和平才能得到保證”的時候，“就已經提交議院了”。同一天他還对阿特伍德先生說，

“這個條約現在已經成了往事；條約的簽訂是有期限的，這個期限已經滿了。可尊敬的議員提出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必要的，是完全不適當的”。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條約的有效期限按照原來的規定應該到1841年7月8日滿期。1837年12月14日帕麦斯顿勋爵就对阿特伍德先生說，這個期限已經滿了。

“現在你還能想出什麼詭計，什麼花招，什麼藏身的窟窿，可以來掩蓋你這場公開的眾目所見的耻辱嗎？傑克，你現在還能想出什麼詭計？”^②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這句話是這樣：“1837年12月14日他在反駁托馬斯·阿特伍德先生關於提交文件的決議案時，他的那一套謊言、托詞、矛盾、詭計和謬論已經達到了頂點，竟說……”。——編者注

② 莎士比亞“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对福斯泰夫說的話）。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文章的結尾不是莎士比亞劇作的這段台詞，而是下面這樣一段話：“這就是那一位為俄軍做開君士坦丁堡的大門、使達達尼爾海峽對英國艦隊封鎖、幫助沙皇占領君士坦丁堡數月、幫助他建立了对土耳其的多年控制的英國大臣用來給自己筑成最後一個藏身之所的一套卑劣的騙術。如果設想他現在會來個180度的轉變，挺身而出反對他長久為之效忠的朋友，那就非常荒唐了”。——編者注

第 六 篇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說：“什么是 honneur? 这是法国人的 chimère”^①。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閣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紀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的“荣誉”作保。1853 年的議会閉会时他这样做了，1833 年的會議閉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閣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賴沙皇会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經对西方保密，看了它們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沒有任何疑問，——如果这种疑問曾經有过的話。这时，勋爵閣下甚至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韃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韃靼人被他弄到了手^②。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們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略的計划，輕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宮廷和大臣們的愚蠢的輕信，恣意嘲笑所有这些維萊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頓之流。他們

① «honneur»——“荣誉”，«chimère»——“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編者注

② 双关語：«to catch a Tartar»(弄到一个韃靼人)轉义是“娶了一个泼妇”、“弄到一个燙手的東西”。——編者注

抱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們互相傾軋，把他們全都变成單純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宮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們和大使們从本世紀初到 1830 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給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們忘記了。子爵閣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顛議會和全世界特別热狂地宣布他“无限信賴俄国皇帝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 1835 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閣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維·烏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謀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詔諭勋爵閣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立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閣下强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負責編印这些文件的发行人所发表的东西，沒有一句話不是經勋爵签署或簡签的。我本人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閣下的簡签，但勋爵閣下却否认这些事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給烏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后者正是‘文件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說）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絕向印刷所主人支付印刷“文件集”的費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曉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

巴克豪斯先生在这份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1839年1月26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烏尔卡尔特先生同奉子爵閣下之命来取代这个职务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們虽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們对于被看做紳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即‘文件集’所发表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得到帕麦斯顿勋爵許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对国内外政界負責的国家活动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对印刷者和发行者的負有債務的主顾，勋爵閣下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負責的。”

土耳其在1828—1829年的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弄得財源涸竭，阿德里安堡条約又使它対俄国負着債務，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大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只允許那些向政府购买了許可证的人卖东西，几乎所有商品的发卖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貸者的手里。烏尔卡尔特先生建議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締結一項通商条約，这项条約要能保证不列顛貿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力的发展，整顿它的財政，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羈絆。这个条約的有趣的经历，在安斯提先生的下面一段話里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烏尔卡尔特先生之間的一切斗争都是圍繞着这个通商条約进行的。1835年10月3日烏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給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当地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商条約。但是他一直拖到1836年6月，甚至到7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議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条約完全取得貿易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我将亲自把它帶到土耳其，設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約，条約随即送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龐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絕對

不要叫烏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談判，把談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違背了同烏尔卡尔特先生談妥的協議。但是，一当烏尔卡尔特由于勋爵閣下的陰謀而被調离君士坦丁堡，条約立即就被擱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閣下又提起这个条約，这时他在議會里把烏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維了一番，称他为条約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閣下歪曲了这个条約，各項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約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貿易的条約。烏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約是把住在大不列顛的臣民置于同最惠国的国民（即俄国人）平等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窜改了的条約却把大不列顛的臣民和身負重重稅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放到了一起。烏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約除条約本身規定的一切捐稅外，廢除了各种过境稅、专卖制、捐稅及其他一切關稅。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約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政府有頒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貿易規章或限制法令的絕對权利。在烏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約中，进口稅率仍照旧为 3%；在勋爵閣下的条約中，进口稅率却从 3% 提高到 5%。烏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約調整 *ad valorem*（从价稅）如下：如果純屬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在专卖制度下所規定的价格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銷售的話，則土英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規定的出口稅率可以充分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潤的同时还增加國庫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港口的售價不足以抵偿高額稅率，則出口稅率可以适当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約却为各种商品定出了一个 20% 的固定的从价稅，不管商品受得住这样的稅率与否。原条約也赋予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以貿易自由的特权，伪造的条約却絲毫也沒有提到这一点…… 我抗議勋爵閣下的这种伪造，我抗議他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議他欺騙議院，硬說什么这就是烏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約。”（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說）

被勋爵閣下窜改了的条約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顛却是这样有害，以致列万特各国的某些英国商人決定从此以后要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貿易，而另一些商人，正如烏尔卡尔特先生所报道的，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沒有这样做。

关于勋爵閣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間的秘密关系，安斯提先生

向下院讲了下面一段話：

“国王要勋爵閣下重視俄国日益加紧进逼土耳其的問題……我可以证明，勋爵閣下在这个問題上是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当时他是否对君王的意志让步决定着他的去留問題……勋爵閣下有时也斗胆找个机会试图进行反抗，但是事后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悟，或者迎合奉承一番。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閣下是否果真被解除过一天或几天的职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閣下是有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险的。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閣下在任命英国駐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时竟同俄国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来被委任了这个职务的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撤职了，而让已故的德勒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人去做这个大使。”（下院，1848年2月23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閣下的亲俄政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爵閣下却同他的輝格党的同僚一起，在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托利党的信徒——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臣所作的反俄努力。托利党人是倾向于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现在把这种倾向加在国王身上，帕麦斯顿的政策自然就可以得到唯一的一个解释了。輝格党的寡头们有一次在议会里曾神秘地微笑，因为这时亨利·利顿·布尔韦尔正对议院說，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駐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在談到东方問題时說，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們又一次微笑了，这一次是在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向勋爵閣下提出如下质問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约签订后来英国时，朝廷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国王临终之前，曾会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士，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刻为威廉四世恢复名声”。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勋爵阁下和辉格党的一切当权人物的以往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公众照例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所作的夸口、空话以及它所提出的所谓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势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 20 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估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是帕麦斯顿的唯一的一个死对头，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而让步，因利诱而屈膝。可是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被帕麦斯顿用时而恭维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安斯提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一段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们：

“很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提先生〉亲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提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的进展”³²⁴）

而 1848 年 2 月 8 日这位安斯提先生则把子爵阁下比喻了一下，说他像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三世的大臣——无耻的卡马登侯爵”。（下院，1848 年 2 月 8 日）

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提先生的谴责的有谁呢？这里有希尔先生，也就是那位在 1833 年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 1848 年安斯提先生那样谴责勋爵

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他一度曾經是勋爵閣下的死对头，而在 1850 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議院的信任投票。有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他曾經整整 10 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閣下纵容沙皇，而当給他調了一个工作，把他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就心滿意足了。甚至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他是勋爵閣下十分心爱的人，只因他冒昧地站在勋爵閣下的反对派方面，曾經被勋爵略施小計一連好几年进不到議会里来，而当他再度进入議会时，就成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 *âme damnée* [忠实的伙伴] 了。还有科苏特，他本来是可以从藍皮书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閣下，然而在到达南安普頓时却称勋爵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

第七篇³²⁵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約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說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庫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綿延 700 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貿易，主要是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貿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鎖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統治地位則使它可以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貪婪的眼光注視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这种統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魯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饒的省份隔开。这样，龐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軍用的道路，从莫茲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滿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各部族的襲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軍事首領把它們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薩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

克斯人由一个首領联合而可能給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而慄”，——德国人庫普費尔先生于1829年率領一个学术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將軍考察厄尔布魯士山時曾这样感叹地說过³²⁶。

現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們的注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領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魯吉亞的危險。俄国占領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約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約中得到承认的。

該条約第四款規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間沿格魯吉亞、依麦列梯亞和古里亞的軍事分界綫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庫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碼头的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圣尼古拉碼頭在內，統屬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約有如下的規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島屿統屬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治和苏利納两条支流的分叉处起，距多瑙河两小时路程（6英里）以內的地区規定为非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屬俄国宮廷所有的諸島也依此規定。在这些島屿上除設立檢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設施或工事。”

这两項条款确保了俄国“擴張領土和获得貿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頓公爵在圣彼得堡簽訂的1826年4月4日的議定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倫敦締結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約³²⁷。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絕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約。威灵頓公爵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約提出抗議。（达德利·斯图亚特勳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說）

据馬洪勳爵說，阿伯丁勳爵也曾对这个条約提出过抗議。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海茨貝里勳爵的急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約

的許多章节都大为不滿，并且特別注意有关多瑙河諸島屿的規定。他否认这个和約〈阿德里安堡条約〉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領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簽訂的。”（馬洪勋爵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說）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經說过，

“如果这个条約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 1834 年 2 月 4 日在上院的演說）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訴我們說：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擴張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絕對不符合的。”（下院，1837 年 3 月 17 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統治暫時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实现这种統治，只有当它封鎖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彈药的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什么詭計得以封鎖了多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顛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約，而且同意俄国自己違反这个条約呢？

这些問題在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閣下的面前，这时下院已經收到倫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許許多多的請願书，紛紛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財政措施，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撓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貿易的規章和限制。俄国在 1836 年 2 月 7 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沙洲上設立了一个檢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檢疫条例，說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檢查，强迫它們納稅，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違抗的船只，把它們解往敖德薩。早在檢疫所建立以

前，更确切些說，早在以建立檢疫所为名而設立海关和筑起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武揚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英国貿易受到阻撓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議。

“他奉命去見涅謝尔罗迭伯爵。涅謝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見新俄羅斯的省长；新俄羅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見駐加拉茲的領事；后者同不列顛駐布来洛夫的領事作了接触，建議不列顛領事把那些被征稅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現場来，以便进行調查；当然，当时是已經知道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1836年4月20日）³²⁸

俄国 1836 年 2 月 7 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顛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許多船只已經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們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許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檢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議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見，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議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少有 5 000 吨的不列顛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薩，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說）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中的一項条款，提出要求領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澤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違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 1827 年締結的条約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設置炮台，則違反了明确規定不許在离河 6 英里以內的地区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約本身。征收稅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則違反了維也納条約，因为該条約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稅額无論如何不得超过現行的稅額”，即 1815 年的稅額；“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有絲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辯护的唯一論据就是：違反 1827 年的条約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約，阿德里安堡条約又被俄国自己違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維也納条約被人違反所致。

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贸易从 1834 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兹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前几乎没有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像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预

防措施”呢？帕麦斯頓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決議，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絲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議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別的国家說我們是有意挑衅，或給它們这种說法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辯論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顛商人写了一封信給外交部，控訴上面所說的那項俄国的法令。大臣助理給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頓子爵命我通知閣下，他已請皇家法律顧問就俄国在 1836 年 2 月 7 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見。同时帕麦斯頓助爵还命我通知閣下，关于閣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沒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稅款；閣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絕繳納任何这类稅款，这样做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助爵閣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給了俄国：据烏尔卡尔特先生說，駐倫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領事現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稅，而且“在萊蒂島上仍設有檢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設立檢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捐稅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的規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苏利納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屬於土耳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 14—16 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度；自从轉屬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 8 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維也納条約的参加国，該条約

第一一三款規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資維修綽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暢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維持苏利納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淺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逐漸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違背維也納条約的行为以外，俄国还違背那个除檢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許在苏利納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約。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稅来維持；这些商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錢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为俄国强征捐稅的借口。

“Cum principia negante non est disputandum [同否认原則的人不必辯論]。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則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 1823 年 4 月 30 日的演說）

于是，子爵閣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滿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則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1840 年 7 月 6 日，他肯定地告訴議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維也納条約作保证”；1840 年 7 月 13 日，他向議院訴苦說，虽然俄国占領克拉科夫是違背維也納条約，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維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在說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間”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①封鎖的条約。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了

① 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軍艦”。——編者注

“以强力維護”維也納條約的唯一可能，歐克辛海^①也就的的确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閣下就假装出向輿論让步的样子，一連串发射了許多紙上声明的空炮，用規劝的和多情的語調提醒那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說，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許多国家貿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給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負了責任和义务，它應該把遵循这些責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謝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頑强地強調抽象原則所作的答复是这样一句老話：“問題将仔細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們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遺憾”。

这样，由于勋爵閣下的关照，1853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納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則受着饥餓的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話說，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屬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歐克辛海之間的铁門”。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应当受到懲罰，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②

① 黑海的古称。——編者注

② 在1854年1月1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本文是以下面兩段話結尾的：“然而，帕麦斯頓同俄国之間在俄国的多瑙河計劃的問題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結，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亞的辯論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才說明：‘子爵閣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約’，即承认威灵頓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議的那个条約。

至于帕麦斯頓勋爵是怎样尽其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亞出卖給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³²⁹。——編者注

第 八 篇

1836年4月20日下院收到的請願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請願书而提出的議案，不仅有多瑙河問題，而且有切尔克西亚問題，因为商业界盛傳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鎖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許多港口卸貨。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說：

“如果議會信任我們，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給我們去办，我們一定会維護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年4月20日）

数月以后，即1836年10月29日，乔治·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倫敦开往切尔克西亚。11月25日該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灣被俄国軍舰截去，理由是“該船被用来同被封鎖的海岸联系”（俄国海軍上将拉札列夫1836年12月24日給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貨物和人員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年1月27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經不談什么“封鎖”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賊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輸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卡列灣，即在俄国的港灣，又沒有設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該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奖賞。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換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員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薩，又从敖德薩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許他們从那里返回

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小的舰艇现在是在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1827年7月6日的条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1827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亚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

耳其也不能把不屬於它的東西讓給俄國。切爾克西亞對土耳其政府始終是獨立的，所以還在阿納帕駐有土耳其帕沙的時候，俄國就曾經同切爾克西亞的首領數次簽訂沿海貿易的協定，因為當時正式規定土耳其的貿易只限於阿納帕港口。既然切爾克西亞是個獨立國家，那末俄國人認為自己有权要它實施的地方管理法、衛生條例和關稅法令等等，它是否應當遵守，就像坦比哥是否應當遵守俄國的法律一樣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爾克西亞是一個同俄國處於敵對狀態的外國，那末俄國只能在它能夠實際實行封鎖，而不是紙上談兵的時候，即在俄國擁有能夠強行封鎖的海軍艦隊，並且真正控制了海岸的時候，它才能向切爾克西亞宣布這種封鎖。但是，在全長 200 英里的海岸綫上，俄國只有 3 個孤立的炮台，其餘的切爾克西亞領土完全掌握在切爾克西亞人的手中。在蘇茹克-卡列灣，連一座俄國炮台也沒有。封鎖實際上不存在，因為並沒有實行封鎖的海軍力量。兩艘英國船——“雌狐號”和另一艘於 1834 年曾到過這個海灣的船的船員們曾經要提出確凿的證據，證明海岸根本沒有被俄國人占領，而且這一點也為兩個於 1837 年和 1838 年到過這個海灣的英國旅行家公開聲明所證實。（“文件集” 1844 年 3 月 1 日第 8 號）

當“雌狐號”開進蘇茹克-卡列灣時，

“無論從船上還是從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國軍艦……‘雌狐號’拋錨以後又過了 36 小時，正當船主和幾個高級職員上岸同切爾克西亞當局就貨值稅率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俄國軍艦才駛進港灣……這艘軍艦並不是沿岸行駛的，而是從公海上開來的”。（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說）

既然借口違犯封鎖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又借口違犯關稅規章而把“雌狐号”沒收了，那就沒有必要再举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來說看来是特別有利的，因为他們的独立問題同黑海航行自由問題、英国貿易的保护問題以及俄国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盜行为問題合到了一起。他們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沒有疑問，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經過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許多个星期的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 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說）

誰能想到高尚而俠義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財產的海盜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約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好机会呢？

1837 年 3 月 17 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沒收的問題提出一項議案，要求向議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間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約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約締結后占領黑海沿岸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协商和談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別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腸和从抽象原則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謂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們的貿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請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給侵略者以懲罰。”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誰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着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³³⁰，——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他任何贸易

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倫敦官报”。

“我介紹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說——“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鎖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沒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談不到承认不承认的問題。”

帕麦斯顿勋爵介紹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顛承认俄国的封鎖，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的一部分領土，因为“官报”**并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領土实行封鎖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領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規章。可見，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說的来看，他在給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鎖**切尔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貿易限制。誠然，从他的整个演說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議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結論，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擴張，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說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終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經不堪負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責备：

“勋爵閣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現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譴責。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顛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前后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閣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顛和損害英国貿易多久呢？勋爵閣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

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誰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責罵了一頓呢？不是別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 1836 年 11 月 25 日被劫走的。我們剛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辯論是在 1837 年 3 月 17 日进行的。但是 1837 年 4 月 19 日勋爵閣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質問，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顛臣民的商船”。

1837 年 5 月 17 日勋爵閣下收到駐圣彼得堡的不列顛大使德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閣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 *de facto* [事实上]存在着軍事占領的問題，我應該向閣下稟報：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軍駐防。

永远忠实于您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連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請她参观的紙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說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 5 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經俄国根据 1783 年的条約承认屬于土耳其，而現在，正如涅謝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約而屬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沒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沒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異議。”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 6 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交涉結束了。他上面那一封 1837 年 5 月 23 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

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庫楚克-凱納吉条約的簽訂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4月19日到5月23日这段時間內,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轉变:以正式抗議开始,但却以表示滿意告終。看来,涅謝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經說服了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把我們所說的那个海岸割让給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詔令沒有提出抗議呢?”(下院,1838年6月21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閣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談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常。而他突然打断談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閣下对外交部已經独断独行,好像已成了大不列顛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約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閣下則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輕輕地一揮就以国王的名义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承认了俄国領有切尔克西亚和沒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閣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貝尔先生我們已經說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一等秘书的烏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誘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險”。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頓勋爵是不敢公开反对这次冒險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随后才出現了經勋爵閣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着才有他給貝尔先生写的模稜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議院所作的含

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年12月14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年，各党派的位置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月21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

“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統轄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別国遵守的关税規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問題，無論哪一个商人都沒有权利要求王国政府表示意見。”

休謨先生問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勛爵閣下繼續說道：

“据說，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給他的回答而上了我所設下的圈套。談到圈套，則这个圈套不是別人給貝尔先生設下的，而是貝尔先生給別人設下的。”

这里指的是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頓勳爵提出的那些問題。

在这次辯論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終於暴露了。即使勳爵閣下在1836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簡單：早在1831年他剛一上台就首先承认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約。正如斯坦利勳爵（現在的得比勳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曾通知它駐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說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間的自由交往規定卫生檢查条例”，还說，大使必須“把上述条例通知駐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

允許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謂卫生条例及关税規章，就等于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約。

斯坦利勳爵說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續交給了駐君士坦丁堡的

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閣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則“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沒有让也不敢让“劳埃德委员会³³¹ 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閣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閣下仅以 16 票的多数——184 票反对，200 票贊成——而幸免于罪。但是这 16 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們靜默下去；他們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謝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

卡·馬克思
戰爭問題。——金融狀況。
——罷工³³²

1853年10月7日星期五于倫敦

“紀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則電訊，报道苏丹^①已对俄国宣战。而巴黎“祖国报”在昨晚的一則半官方消息中报道，根据来自东方的消息，“紀事晨报”的这个报道尚不能证实。另一家政府报纸“立宪主义者报”报道，由于奥地利使臣德·布鲁克先生屡次提出通知，御前會議于9月25日开会討論了維也納照会，会后声明土耳其将坚持列施德-帕沙最近照会³³³中的意見。第二天又召开了参政会。这个由各大臣、顧問、帕沙和最上层僧侶等120名显貴組成的参政会决定：

“如果签署这份沒有包括御前會議提出的修改意見的維也納照会，对苏丹的主权來說，就是一种耻辱，而且极为有害。既然沙皇声称完全不能接受这些修改意見，并且拒絕撤回他要奧斯曼帝国承担有損帝国独立的义务的要求，参政会只有建議苏丹立即采取保全帝国的必要措施，并从侵略者手里解放自己的屬地。”

至于是否已經正式宣战，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消息。这

① 阿卜杜-麦吉德。——編者注

次至少是土耳其政府害苦了西方的外交官。本来，英法两国政府不敢撤回它們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貝捷克灣保持自己那种可笑的立場已不可能，又不願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所以它們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險为理由請求把貝捷克灣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絕了这个建議，指出这种危險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險，它不靠外国援助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結束以前它絕不請求来軍舰。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剛剛駛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它这时已經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要战。談到战的問題，实际上3个月以前俄軍越过普魯特河时就已經开始了。俄軍到达多瑙河岸实际上是第一个战局結束。現在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但突尼斯的貝伊^①以及波斯的沙赫^②仍从他們的优秀部队中抽出6万人給苏丹。因此，可以肯定，土耳其軍隊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徒現有的全部軍事力量。两个早就在爭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軍隊現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制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則受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們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会排斥先定論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論。

今天在倫敦要举行两个會議：一个是在唐宁街，另一个是在“倫敦飯店”；一个是大臣們举行的會議，另一个則是反对他們的會議；一个替沙皇說話，另一个則替苏丹說話。

如果有誰对于联合內閣的意图仍然有些認識不清，那末看了

① 阿罕默德。——編者注

② 納斯尔-埃德-丁。——編者注

“泰晤士报”和“紀事晨报”的社論就会很清楚：联合內閣将用尽最后一分力量来防止战争，恢复談判，消磨時間，拖垮苏丹的軍隊，使沙皇繼續占据多瑙河各公国。

“泰晤士报”根据可靠的材料兴高采烈地报道：“沙皇主張和平”。沙皇在奧里繆茨³³⁴“亲口表示了爱好和平的心願”。不錯，沙皇不会接受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見，他要坚持維也納照会的最初条文，但他会允許維也納會議用照会中**完全沒有的意思**来解釋这个照会，尽管这个意思与他的大臣涅謝尔罗迭所解釋的正好相反。他会允許西方列强专心举行會議，如果西方列强同时允許他繼續占領多瑙河各公国的話。

“泰晤士报”在爱和平的感情冲动之下，竟把俄皇和奧皇同非洲內地野蛮人的首領相提并論，以便最后得出这样的結論：

“俄皇由于自己政治上失策而要发动战争，这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都灵、巴黎、柏林和華沙的銀行，都提高了自己的貼現率。根据上周发表的銀行报告，英格兰銀行的黄金儲备又减少 189 615 英鎊，目前总共只有 15 680 783 英鎊。有效流通的銀行券總額約减少 50 万英鎊，而期票貼現却增多 40 万英鎊，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证实了我在一篇談皮尔法令的文章中所申述的意見，即流通中的銀行券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銀行业务做成多少成正比^①。

多恩貝克先生在他的商业月报最后說了这么一段話：

“上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地助长了由于小麦歉收、馬鈴薯病害流行、輪船吨位不足的消息頻傳而引起的粮食投机活动。在貼現率的提高已經接近 5 % 的情况下，城市的面粉价格每 280 磅上漲为 70 先令，新小麦的价格則

① 見本卷第 334—340 頁。——編者注

上漲到 80 先令。現在糧食買賣極為緊張。東方可能爆發戰爭，埃及禁止谷物出口，英國小麥連年歉收，馬鈴薯病害流行，從國外（特別是從南歐）來的輸入量減少，法、比、荷等國的需求量不斷增長——所有這些，是使小麥價格再度上漲、使幾個主要省份市場的小麥價格於上週每夸特從 1 先令漲到 6 先令的主要原因…… 往年從收割後直到聖誕節，價格總是看跌的，今年的情況却正好相反…… 最近幾個月以來價格一直在上漲。目前，我國任何地方都還不是糧食真正不夠。許多谷倉、倉庫和干燥房都已經裝不下了，某些海港的堆棧也不夠用。所以，近來糧價上漲並不是由於現在糧食不夠，而是由於人們怕歉收造成將來的糧食不夠，人們都認為時候一到，歉收的後果就要開始顯示出來。即將來臨的冬天很可能是一個最難熬最困苦冬天…… 大多數意見仍認為糧價還要繼續上漲，而且因為大多數投機商繼續搞‘收購和囤積’，所以糧價看樣子在明春以前仍然要保持上漲的趨勢…… 預料中的高價看來將延續今年一冬。這種高價在明春大概會大大地吸引那些往常由於路途遙遠、運費昂貴而和英國不相接觸的遠方國家加緊向英國輸出糧食。可以預料，明春世界各地，只要通行無阻，都會增加對英國的糧食出口，所以，同一個原因會引起兩種結果，現在是人們存糧不售，以致糧價上漲，而一旦糧價開始回跌，糧商就要極力拋出存糧，糧食的身價就要隨之下降。現在的守則是買進，將來的口號就是要賣出。來年會像 1847 年那樣，是一個危險的災難年。”

曼徹斯特市場上的普遍蕭條仍在繼續。來自奧地利和中國的消息以及關於東方糾紛的消息越來越壞，棉紡廠主、工廠主和商人也越來越心驚。同兩個月以前的最高價格相比，普通棉紗的價格每磅下跌 $\frac{7}{8}$ —1 辨士，比同等皮棉的跌價多出約一倍，後者的跌價並未超過 $\frac{1}{2}$ 或 $\frac{5}{8}$ 辨士。但是，即使是打一個最大的折扣，減價 1 辨士，仍然感到很難賣出去。存貨——我們敏感的經濟學家用來吓人的東西——正繼續增多。自然，不能認為存貨的增加會非常迅速。現在，儘管許多市場都已過分膨脹，但商人和廠主仍然有可能以托賣的方式，把自己的商品運到其他市場上推銷掉，而且他們

恰好是現在正在最广泛地利用着这种可能性。但适合出口的不列顛工业品数量很大，經過几段時間就能充斥全世界，如果把這些产品全都拋到几个容量有一定限制的市場上去，必然会使那些目前尚称健全的市場发生同样的过分膨脹現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場动蕩。例如，那些报道印度情况有某些好轉的消息，仍旧沒有說向印度輸入可以获利，只不过使人可以指望向印度出口亏蝕要少些，——即使这样的消息，就已經使向印度的出口业务增加得相当多。这些业务，有些是那些素日与印度有貿易来往的公司做的，有些是曼彻斯特的棉紡厂主和工厂主直接做的，这些厂主連一点点向印度做投机性出口生意而得到比較有利的推銷机会都不放过，怎么也不願意承担在日益縮小的市場上銷售貨物而招致的損失。在这里要补充說明一句：曼彻斯特的棉紡厂主和工厂主从1847年起就經常把大宗商品自家运到印度和其他国家，用卖来的錢在那里购买各种殖民地貨物，然后再自家出卖，或者在北美洲的不列顛屬地上出卖，或者在欧洲各港口出卖。当然，这一类投机生意不屬於厂主的合法經營范围，从事这种投机的厂主对市場情况的了解自然还不及港口商人的一半；但这种投机生意却很受不列顛棉紡厂主們的欢迎，他們在远方的国家里做这些生意，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自己主宰世界工商业命运的宿願。假如这种投机活动不把相当大的一笔工业游資抽走一年到一年半，那末近五年来英国工厂的数目的增加无疑会快得多。

本国产品在紡織品市場上最不景气。虽然大量織布机已停止轉动，但存貨仍然繼續增加。当然，也不能說其他商品的处境就好一些。

在里子和布萊得弗德，在萊斯特和諾定昂，也都出現了这种停

滯局面。在諾定昂，花邊生產的勞動時間已減為 10 小時，甚至 8 小時。針織品的生產早在去年 6 月間就已發生蕭條，那時，諾定昂的產量一下子就減少了三分之一。看起來還在不斷繁榮的唯一部門是北明翰及其郊區的金屬製品的生產。

倫敦小店主破產的事情開始越來越多。

我在 8 月 12 日那篇文章中曾指出，紡紗場場主和工廠主們成立了“制止曼徹斯特工業區工人騷動廠方合作協會”，該協會由各地方的協會組成，統一由一個中央委員會領導，它要“抵制工廠工人的有組織的集團的一切要求，用組織集團的壟斷權來鞏固資本的壟斷，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集團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條件。”^①

這個計劃，大約在兩個月以前我就向諸位作了報道，而且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悄悄地實現，在普雷斯頓、波爾頓和曼徹斯特現在正在實施，但是直到現在，倫敦的報紙一次也沒有提到過這個計劃，這不是很稀奇嗎？顯然，倫敦報界是在竭力向大家隱瞞這樣的事實，即工廠巨頭們正在有步驟地組織本階級進行反對工人階級的戰爭，他們系統採取的那些措施並不是偶然情況自發產生的後果，而是事先周密策劃的，是有組織的反工人聯盟暗地里陰謀追求的目的。法國的天主教聯盟曾經碰到他們的历史學家——十六世紀末“麥尼普的諷刺”³³⁵的作者，十九世紀英國的資本家聯盟也會碰到自己的历史學家的。

工人們為實現自己的要求，自然要採取這樣的方式，即當一部分工人罷工的時候，另一部分工人工作，直到罷工工人取得勝利。在工人採取這種行動方式的地方，廠主們便共同約定關閉他們的

① 見本卷第 283—284 頁。——編者注

所有企业，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陷于极端贫困。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首先这样做的是普雷斯頓的厂主們^①。現在有 13 个工厂已經关闭，到下周末所有工厂都将停工，因此就要有 24 000 多工人会被抛到街头。織工向老板們递交了請願书，請求举行談判，或者把这种爭执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但他們的建議遭到了拒絕。普雷斯頓的織工得到了周圍各区——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斯托克波尔特、柏立、惠特奈尔、布莱克本、切尔奇-帕里什、阿克頓、艾尔威尔-魏尔、恩菲耳德、貝恩利、柯恩、貝凱普等地——工人每人捐一辨士的援助，所以工人們确信，抵抗資本专权的唯一手段就是联合他們自己的队伍。普雷斯頓的工厂巨头們于是就对外派出密使，其任务是去破坏对罢工者的援助并鼓动貝恩利、柯恩、貝凱普等地的工厂主关闭他們的企业，用这种办法造成总停工。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恩菲耳德，已經命令监工們向老板报告誰是互助运动的发起人，結果有許多从事募捐的工人被解雇了。一方面，普雷斯頓周圍各区的工人們号召普雷斯頓的工人保持坚定和团结，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厂主为普雷斯頓的厂主大鼓其掌，称赞他們是时代的真正英雄。

柏立的情况和普雷斯頓一样。波尔頓的術被工人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誰先罢工。該行业的老板們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关闭了他們的企业。

厂主們除了同时关闭工厂以外，还采取其他一些协同的步驟。例如在基特利，倫德先生厂子里的織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資；促使他們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付給他們的工資少于宾格利的安

^① 見本卷第 358 頁。 — 編者注

德頓先生厂子里的織工所得的工資。織工代表團請求倫德先生接見，可是当代表們到他家見他的時候，却吃了一个有礼貌的閉門羹。过了一个星期，安德頓先生厂子里就貼出布告，通知工人要降低他們的工資——織工每匹布工資降低 3 辨士，羊毛刷梳工每磅工資降低 1 法寻。倫德先生和安德頓先生这时簽訂了一个攻守同盟，其目的是用降低那一家織工工資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家織工。因此，或者是倫德先生的厂子里的織工被迫屈服，或者是安德頓先生的厂子里的織工被迫也举行罢工，而后者罢工之后，負担更重，这样就使罢工者得不到任何支援，于是两家工人都将不得不接受工資的普遍降低。

还有些厂主竭力拉攏小店主来对付工人。例如，得比的主要煤矿的矿主，煤炭大王霍斯福耳先生，当他的工人由于工資降低而罢工的时候，便去找附近各个矿工常去买东西的肉鋪、面包鋪和食品雜貨鋪的店主，劝他們不要賒給工人們任何东西。

在設有“制止工人騷动”协会的地方，加入了組織的厂主們議定，这个組織的成員如違犯了他們的联盟章程，或向“干活的人”的要求让步，就課以高額罰金。例如，在曼彻斯特这种罰金高达 5 000 英鎊，在普雷斯頓达 3 000 英鎊，在波尔頓达 2 000 英鎊，等等。

目前的冲突具有一个和过去历次冲突不同的最大特点。在以前各个时期，例如在 1832、1839、1840 和 1842 年，所謂**全体过节** [*general holiday*] 即在整個王国普遍同时停工的主張，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主張，也是他們力求达到的一个偉大目标。而現在却是資本家用全体解雇来威胁工人。目前是厂主們企图普遍关闭工厂。大家是否认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是一个非常危險的試驗呢？他們是不是想叫英国人民来一个六月起义³³⁶，以便把人民日益增长的

憤慨鎮壓下去，使人民在多年內無力行動呢？

不過，我們還是沒有可能去更細密地觀察英國日益顯著的內戰徵兆，特別是因為，倫敦報界有意裝作看不見這些重大的事實，用一些瑣碎事情來轉移讀者的注意力，例如，報道約克郡的一個工業大王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在他的工廠宮開幕的時候舉行宴會，像皇家那樣招待了當地的貴族，同時還招待了他的工人。首都的報紙向讀者報道，這位工業大王曾舉杯祝“工人階級的興旺、健康和幸福”。但報紙卻沒有報道幾天之後他廠子裏的織半毛織品的工人們就接到**再度降低工資**的通知，工資從2先令3辨士減為2先令1辨士。他的一個受害者在“人民報”上說：“如果這就意味着織工們的健康或興旺，那末至少我個人是不要的。”

大概諸位都從“泰晤士報”上看到，有一位麥克唐奈太太由諾依達爾特去格連加里，她仿效薩特倫德公爵夫人的做法，着手“清掃”自己的領地，用綿羊來代替那里的人。“人民報”根據當地的一位采訪員關於這件事的報道，對這種馬爾薩斯式的辦法作了如下一段鮮明的描寫：

“在這位太太的領地上住著一些貧苦的佃農；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交不起地租；有人告訴我們，某些人還欠下了很多地租賬。因此，這位太太便命令他們統統滾蛋，於是他們就不得不到山洞和樹林里去安身，從那時起他們就住在那里，或者確切點說，一批批死在那里，而麥克唐奈太太的馬却在溫暖舒適的房屋里享福。同時，她要給被趕走的佃農們去加拿大的路費，——路費比救濟窮人的樂捐還少，並且允許他們賣掉他們‘不大的家當’，但是他們除了隨身穿的衣服、破舊的桌子和患風濕症的貓以外，就沒有什麼家當可賣。最後，她慷慨免除了他們所欠的地租賬——這筆賬她反正是不能收到手了。這就是所謂‘高尚的慷慨’。”

看來，這種趕走居民的事情又在蘇格蘭山區開始干起來了。

例如，苏格兰的一个土地占有者查理·福尔布斯爵士就曾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养羊是这样有利，以致我们英国饲养羊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现，繁殖羊群，出钱把那些妨碍他们这样做的人赶走，是很合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馬克思

*土耳其宣言。——法国經濟狀況³³⁷

1853年10月18日星期二于倫敦

10月1日交給四大国的土耳其宣言，是一个为苏丹对沙皇宣战作辯护的文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的价值要高于1853年5月以来充斥欧洲的大堆大堆的官方文件。

宣言說：苏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糾紛的任何口实。在圣地問題解决以后，就不再有糾紛的借口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約，而土耳其方面則用尽了一切和解手段。各强国自己都认为，苏丹不应当同意緬施科夫公爵的照会。那末，怎么能够期望苏丹会贊同內容大致同緬施科夫的照会没有什么差别的維也納照会呢？維也納會議的解釋信根本不可能改变形势。既然俄国甚至对凱納吉条約的明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去冒風險，“把模稜两可、含糊不清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有要求宗教保护权的严重借口嗎？”此外，苏丹所提出的修改意見，已完全被后来公布的涅謝尔罗迭的解釋证明是合理的。占領多瑙河各公国本身就构成了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所以土耳其政府現在决定承认这是 casus belli。因此，要求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各省。如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后的15天內給以否定的答复，那末奧美尔-帕沙就应开始軍事行动，俄国代表就应离开奧斯曼帝国国境，

两国之間的貿易关系就应停止。但是，对俄国商船将不扣留，而只是命令它們离开土耳其港口。海峽将对各友邦的商船开放。

苏丹宣言的要点就是如此。

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是本月 9 日通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所以，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是到本月 25 日为止。不过，对于开始軍事行动的威胁，仍然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奥美尔-帕沙决不会离开他的强大陣地去进攻俄軍。

昨天的“先驅晨报”证实了我对俄軍向西运动和这种运动所证明的它同奥地利有秘密协定^①的說法。

忠于一套旧的亚洲式的欺騙和小陰謀的俄国，又利用西方世界的輕信散布謠言，說什么沙皇“已經火急地向維也納派出信使送去声明，表示願意完全接受調停国提出的一切条件了”，可是很遺憾，他忽然“获悉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消息”。于是，俄国人的圣主自然就收回了他以前曾經做过的一切让步，并且叫嚷說：“現在除作殊死战 [guerre à l'outrance] 而外已別无他法”。这样一来，結果就是苏丹迫使沙皇进行战争。

奥地利使臣馮·布魯克先生似乎質問过土耳其政府，它是否想建議政治流亡者組織一个外籍軍团。列施德-帕沙回答說，尽管有人不断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建議，他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不过，如果土耳其被它的同盟国拋棄，它将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为了自卫而采取一切手段，并且吸收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服役。

我們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讀到：

“我們有理由认为，目前巴黎和倫敦已經接到土耳其政府請求英法方面

① 見本卷第 384—385 頁。——編者注

給予援助的正式呼吁。”

報紙上有消息說，奧皇^①將自己的軍隊縮減了將近10萬人。然而，只有這個數目的人放了假這一點是符合實際的，但是他們隨時都可以應召重新入伍。維也納當局採取這個步驟，一方面是由於財政困難，另一方面是希望用這種方式爭取借債的人。

下面是一份倫敦商業通報關於法國糧食貿易的文章摘錄，在我們看來，讀者會感到興趣：

“根據各地的廣泛通訊所報告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法國小麥的平均收成將減少三分之一，而且在不同的地區將有所不同，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將是法國南部。誠然，受政府影響的各家報紙，企圖使公眾相信事情並不是這樣，但是，政府本身所採取的措施，同報界的這種保證卻是相當矛盾的。政府先減輕了航海法令的效力以有利於英國，後來就把它們徹底取消了；其次，政府規定了減低關稅（稅額由調劑調整）；現在它規定了最低稅率（不顧法國劃分地區實行不同稅率的作法），而且為外國輪船開放了港口，免交噸稅。這以後，政府又允許載運糧食的外國輪船在一切內河和運河自由航行，並且建議各鐵路公司按照降低了的稅率托運糧食。它開放了自由進入阿爾及利亞的通路，並且允許任何噸位的阿爾及利亞輪船駛入法國境內；政府禁止了馬鈴薯和蔬菜的出口，而且不惜對許多市場上的買賣雙方的關係任意干涉。所有這一切清楚地表明，不是收成不佳，就是這些預防措施完全多餘。法國貿易最近處於驚惶不安的狀態。問題不在於整個帝國的商對收成有所懷疑，而在於政府規定了固定的糧價，這種錯誤的措施在商人中間引起恐懼，使他們害怕簽訂合同。大家知道，相應的法令剛一公布，取消糧食合同的電報就如雪片飛來。不可能預測政府的這一措施最終會對價格產生怎樣的影響。據初步估計，法國小麥的平均總收穫量將是8000萬百升（約2800萬夸特）。最近25年中產量最高的一年是1847年，總量是9700萬百升，而最低的一年是1830年，總量是5200萬百升。小麥的產量特別在最近幾年增長了，它

① 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編者注

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小麦儲备目前仍然完全用光,这证明,居民的飯食大有改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

下面是最近 25 年内人口增长和小麦产量增加的統計表:

年份	人 口	小麦在 5 年期間的平均年产量 (单位:百升)	
1831	32 569 223	从 1827 年到 1831 年	57 821 336
1836	33 540 910	从 1832 年到 1836 年	68 684 919
1841	34 240 078	从 1837 年到 1841 年	71 512 258
1846	35 400 486	从 1842 年到 1846 年	72 015 564
1851	35 781 821	从 1847 年到 1851 年	86 124 123

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消費增加,将使歉收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本来可以动用的那部分旧的小麦儲备沒有了,不言而喻,进口小麦的儲备也沒有了。”

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頓先生在爱丁堡的鼓吹中,从格莱斯頓在曼彻斯特的演說中,以及从若干报纸所做的一旦俄土开战阿伯丁勋爵将由帕麦斯頓勋爵这位豪俠仗义的俄国对头来代替的暗示中,可以看出英国統治階級对土耳其心怀叵測。

关于監獄情况的調查报告在报刊上一直不停地刊登着。已經揭发出来的材料表明,北明翰的現行監獄制度規定使用頸枷和鎖在墙上拷打,萊斯特郡規定使用铁鐐,而汉普郡則規定使用飢餓这种比較不那么狠的折磨办法,“这就叫自由的国度!”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說过,同緬甸簽訂的所謂和約只是一种休战;不列顛侵略者这次所取得的将是一个新的糾紛的无尽的泉源^①。果然,最近一批陆上邮件带来消息說:緬甸的主战派加强了;新領土上簡直到处都有为数众多的土匪队伍,它們受阿瓦政

① 見本卷第 228—229 頁。——編者注

府的唆使,要求大大加强卑謬的武装力量;“在不列顛軍隊中,疾病流行,有強烈的不滿情緒,兵營找不到一處合乎衛生的地方”。

印度的不列顛統治者對有關水利工程的一切事情抱着可耻的漠不關心態度,這就在巴特那地區又引起了該區常見的霍亂和飢荒(這是長期干旱的後果)。

我從報刊上剛剛披露的報告里摘錄一份關於不列顛和外國的輪船在聯合王國海岸附近遇險的統計資料如下:

年 份	遇險船舶	因漏水或 互撞而沉 沒的船舶	觸岸擱淺 船 船	人員傷亡	遇險船舶 總 數
1850	277	84	304	784	681
1851	358	—	343	750	701
1852	—	—	—	約 900	1 100
3 年間遇險船舶總數·····					2 482
人員傷亡·····				2 434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10 月 18 日

載於 1853 年 10 月 31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912 號

署名: 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德勒克呂茲被捕。——丹麦。
——奥地利。——“泰晤士报”談
对俄战争的前景

1853年10月21日星期五于倫敦

賴德律-洛兰先生的私人秘书德勒克呂茲先生被捕，是最近在巴黎的逮捕声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是被派到巴黎来执行秘密使命的，据报道，在他身上发现了于他不利的文件。不能理解的是，賴德律-洛兰先生怎么能够信任一个直到现在还没有洗清在1848年轰动一时的里斯康士事件³³⁸中出卖过比利时軍团的嫌疑的人。

看来，哥本哈根的 coup d'état [政变]不可避免要做出最后一步了，因为內閣不肯让步，而議會又反对在政府向它提交整个丹麦王国的宪法草案以前取消現行宪法。出现了为什列斯維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制定的两个单独草案。这两个草案是对旧普魯士省議會組織法的拙劣模仿：代表名額在几个“等級”之間分配，选举权以占有土地多少而定，选举权的运用受相应选举区的“固定住所”的条件限制。这些宪法草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条規定，廢除法院旧有的取消行政决定的权利；另一条規定，凡是由于参加1848—1850年革命斗争而破坏了自己名誉的人，不管后来是否被

赦免，一律剝奪其投票權。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奧地利的裁軍法令只是为了引誘借債的人而編造的；現在，當取得貸款的任何希望已消失的時候，當政府宣稱它本來就不打算舉借任何貸款並且採取了再次發行紙幣的辦法的時候，我們聽到了這樣的消息：

“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執行奧皇關於裁軍的法令，相反，指揮駐倫巴第、匈牙利和克羅地亞的部隊的所有將軍們，由於這些國家里存在的某種情緒，都毫無例外地要求增加兵員。”

“晨郵報”駐巴黎通訊員就俄皇最近訪問奧里繆茨和柏林期間的行動報道如下：

“沙皇的主要目的是在北方列強之間締結一個新的聯盟…… 俄皇為了克服普魯士的抗拒，採取了種種論據，我要說的是提出了種種賄賂，因為他曾經表示，一旦他被允許進入土耳其領土並且把它保持在自己掌握之中，他願意給普魯士一些好處，即放棄占領華沙和對波蘭的軍事統治。”

至於俄軍戰勝沙米爾的消息，據巴黎得到的報道，這些消息不過是臆造的產物，因為從5月份起，在高加索並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戰鬥，那時，沙米爾在門多赫附近告捷，企圖在馬爾卡河進攻的俄軍被擊退。

“我們完全理解，為了波蘭人或匈牙利人的利益對俄作戰將多麼受人歡迎，——即使我們的干涉除了政治同情以外沒有別的原因…… 但是，我們不理解為了土耳其人的利益去進行戰爭。”

10月12日的“泰晤士報”就是這樣寫的。過了一個星期，我們又在這家報紙上讀到：

“英俄兩國軍隊的第一次交鋒就會成為整個大陸革命的信號。我國的貴族的、財閥的、專制的（隨便怎麼說，絕不是民主的）領袖們有時是能夠考慮到

这一点的，我們决不认为他們考虑到这一点是不可能，而且也不认为这样的考虑有什么不体面…… 在为了维护土耳其对某些实际上独立的省份的有名无实的主权而对俄作战以前，我們应当作周密的通盘考虑，因为我們那样做会引起奥地利帝国中的起义。”

总之，它一会儿說，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这样做就是去保护土耳其人，而不是保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会儿又說，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为了土耳其而进行任何战争同时也是有利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战争！

維也納“新聞报”說，苏丹建議阿布德-艾尔-喀德在一旦发生对俄战争时出任土軍司令之职。談判是通过伊斯兰教总教长进行的；这位艾米尔声明，如果事先对此能得到波拿巴的批准，他同意赴土耳其就职。預定給他的职位是亚洲的土軍司令。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1 月 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91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近来在土耳其战场上有几次重要的军队调动，因而有可能更清楚地判断双方的阵地和计划。俄军——我们首先谈谈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是进攻的一方，所以必须认为主动权是属于他们的，——继续向西延伸作战线。整旅整旅的部队相继派往多瑙河上游的维丁方向；现在可以说，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法特延伸到希尔索瓦对面的奥腊什，它不仅威胁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且也同样威胁着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军第一次向卡拉法特运动后就已非常明显：他们无疑地要侵入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居住地区的中心。同时这种调动还使我们可以预测，俄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直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采取防御和单纯的佯攻，而在通往索非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上采取坚决的进攻。然而，当俄军这样调动时，土耳其人还没有宣战。宣战是在以后；看来沙皇对宣战一举极为愤怒，所以很可能促使军队采取比原来所预期的远为坚决的行动。不仅帕斯凯维奇公爵被任命为俄军统帅，而且据说还从驻波兰的俄军即从俄国仅次于近卫军和掷弹兵的精锐部队中抽调4万人由他率领。这些援军可以保证俄军取得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上游和下游都采取攻势。同时，这些援军也可以看做是用来对抗据说可能前来援

助土耳其的英法军队的。但是俄国的这些援军无论如何不可能迅速开到多瑙河，在今年就参加作战。从华沙经杜布诺、霍亭和雅西到布加勒斯特，约有 800 英里，而部队的每日行程却不能超过 8—10 英里。因此，这些生力军最早也要过 3 个月后，即在明年 1 月初才能占领自己的阵地；如果考虑到季节的影响，这些部队行军的时间很可能还要长。因而，在明年春季的战局开始以前，这些部队将完全位于作战地区以外。

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现在约有 13—15 万人。俄军即使由于疾病和逃跑减少 2—3 万人，总数仍将超过与它对抗的土军。关于俄军兵力的真实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它派往土耳其的师和旅的数量以及这些部队的编制定额进行判断，而关于多瑙河土军的数字却可以从英、法和皮蒙特三国政府派往该地的军官的报道中知道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报道都一致认为，甚至在埃及部队到达后，奥美尔-帕沙指挥的土耳其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 11 万人，其中只有 8 万人是正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后方，阿德里安堡有一支由 8 万列季弗（重新应召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预备队，不过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情况的可靠情报。因此，情况仍将是：在打响第一枪时，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将少于自己的敌人，除非敌人严重失策，或者他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无懈可击，否则奥美尔-帕沙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失败。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和防御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确凿的情报。土军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多瑙河，用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那到苏姆拉；第三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的后方，相距约数英里的卡姆契克河畔，那里有一个要塞，可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外国军官的记述，这些工事非常坚

固，敌人攻占它们的任何企图几乎注定都要遭到失败。虽然我们非常尊重有重要意义的野战筑城法和这些军官的见解，但是我们认为，接受这一类意见时必须非常谨慎。曾有多少被认为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列斯-维德拉斯防綫³³⁹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因为它有威灵顿的 10 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森纳却只有 3 万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效的，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统帅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此外，几乎一切都决定于防守野战工事的方法；如果军队缺乏训练或者完全没有训练，那末当敌人以霰弹进行猛烈的射击时，即使有工事的胸墙可以掩蔽，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土军所设的三道防綫。第一道防綫是沿多瑙河建立的。沿多瑙河构筑这道防綫的全部意图，就是阻止俄军强渡。从希尔索瓦到黑海的一段多瑙河约长 600 英里。要在这样宽阔的正面构筑有效的工事并保证这些工事都有守军，就需要有一支超过土军司令官现有兵力 5 倍的军队；即使土军司令官拥有这样的兵力，如果这样使用，他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道防綫——这只不过是从鲁舒克到希尔索瓦之间的几处防御工事，顶多只能增加强渡多瑙河的困难，但是不能真正阻止强渡。

第二道防綫是从苏姆拉到瓦尔那，也就是土军 1829 年在那里被击溃过的一道防綫。如果土军在这里进行决战，无疑又要被歼灭。看来，这道防綫在防御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并且容易用人工来

大大加强。在瓦尔那和苏姆拉后方的卡姆契克河防线可能更为坚固，同时还具有迫使敌人必须留下部分兵力封锁上述要塞的优点。但是这两道防线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在后方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这是唯一的退路。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这个缺点就压倒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兵力较弱的军队，如果不能像英军在滑铁卢会战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翼侧进行突击³⁴⁰，而决定在这里会战，那就会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我们不能断定，奥美尔-帕沙究竟想怎样利用这些工事。毫无疑问，他很明白他在这次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基本上是取守势的一方，所以他用尽筑城学中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加强防线，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企图用这些工事使俄军望而生畏，从而迫使他们不敢在最能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地点渡过多瑙河呢，还是打算就在这里进行决战。据说，他的部队是这样配置的：不论俄军在苏姆拉方向的任何一点渡河，都能随时痛击其主要一路的先头部队，并在其援军到达前将它击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失利，第二道防线就可保证土军安全退却。但是，老实说，在这三道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进行大规模的防御战都是错误的，因为当俄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时，奥美尔-帕沙就很少有机会获得胜利，俄军如果分兵数路进攻，他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防线以攻击其中的一路。对他来说，利用这些工事的最好方法——符合现代战术的唯一方法，就是趁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时候利用这些工事作为攻其一路的临时基地，利用每道防线的比较顽强的防御阻滞俄军前进，以及凭借第三道防线尽一切可能扼守巴尔干山脉最主要的山口，而不进行决战。同时也不能否认，任何军队，尤其是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战而放弃这些工事，必然会士气沮丧。因为，他们

有要塞圍牆和护城壕还不能据守，那在平地战中怎么能击潰俄軍呢？普通兵士，尤其是当他还未經過严格訓練时，往往正是这样推論的。所以，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是起土軍要它們起的作用，那我們就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事对土軍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軍更大。

但是，俄軍在瓦拉几亚不是也設防了嗎？当然是設防了，不过这里所談的是另一回事。俄軍是进攻的一方；他們的工事只是用于失利时掩护軍队退却和阻滯追击的敵軍；而且他們的退路連續被形成四道防綫的四条河流所橫断。这四道防綫是多瑙河、阿尔哲什河、布澤烏河和塞勒特河。这里有构筑中間防綫的良好条件。这几条天然防綫对欧洲軍队來說并不是退却时的障碍，而且，只要稍加修筑就可成为追击部队的严重障碍。而主要的是，俄軍由于在后方只有一条退却路綫，所以无意于在这里进行决战。就我們所能判断的，俄軍的工事无疑是符合欧洲战术的，土耳其的工事則大多具有亚洲的特点。这种考虑不周之处，也是土軍总的部署的主要特点。土軍为了防守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通往該城的最近的道路附近，看来俄軍并不打算将首次攻击指向該城，而是指向巴尔干半島的中部，因为土耳其在那里的統治最弱，而且归根到底在那里有一条俄軍通往土耳其首都最近的道路。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不应当忘記。俄軍的調动不論現在和过去向来是緩慢的、謹慎的，在冬季他們大概不会采取行动。由于一方企图夺取对方在多瑙河上的某个沙洲而发生一些小規模的战斗，是可能的。但是只要沙皇不下令采取特別积极的行动，——这种命令很可能因將軍們的消极和謹小慎微而不能执行，——就很少有可能在春季以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誠然，强渡多瑙河是可能的，但翻越巴尔干山脉却不会成功，这样，俄軍在多瑙河和巴尔干

山脉之间的障地可能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同时土耳其已向瓦尔那派遣了自己的舰队。指挥该舰队的斯雷德将军（英国人）看来是非常乐观的。但这也是非常冒险的步骤。的确，俄国舰队除数量而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如土耳其舰队，但是，当俄军的火炮和战列舰还比土军多一倍的时候，土军就不敢在自己岸防炮台的射程以外进行会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舰队就应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较好较安全的障地，俄国舰队大概不会在那里进行封锁。在瓦尔那，土耳其舰队要冒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的危险，但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就可以用于向特拉比曾德和高加索沿岸出征，就可以用于进攻个别的俄国海军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至于奥美尔-帕沙这位公认的能干的土军统帅能不能靠他个人的才能来改变兵力对比，还有待于证实。然而帕斯凯维奇这位老将军，虽然动作迟缓，但是经验丰富，要捉弄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

战争终于在多瑙河上开始了，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果然不出所料，奥美尔-帕沙首先开始了真正的军事行动。按职责来说，他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表明自己决心用武力把入侵的敌人驱逐出奥斯曼帝国。但是，像维也纳的谣传那样，他已把3—5万人派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有理由担心他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他所放弃的这个河岸能保证他有一道很好的防线和多种多样的防御手段；而在他所要占领的那个河岸上，他所拥有的进攻的兵力将少于敌人，而且战败时没有退路。因此，关于他率领这样的兵力渡过多瑙河的报道，在没有接到更确实的消息以前，是值得怀疑的。

在欧洲，战争是在对土耳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亚洲情况就不同了。在亚洲，从军事观点来看，土耳其和俄国的交界地区分成了两个完全隔离的战区。山脊，更确切些说，山脉把高加索同中央阿尔明尼亚高原连接起来，并且在流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和流入里海的阿腊克斯河以及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这条以前把阿尔明尼亚同欧克辛海隔开的山脉，现在成

了将在其中进行战争的两个独立地区的分界线。山脉到处是悬崖绝壁，几乎寸草不生，只有很少几条道路可以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拉比曾德和巴士姆到埃尔斯伦的两条道路。因此，这些高山差不多是任何军事行动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使敌对双方都不得不在山脉的两面各有一支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的独立部队。

黑海沿岸地区横贯着许多河流和山溪，形成一道一道的防线。俄军和土军在最重要的地点都设有据点。在这个主要是起伏地的地形上（只有里昂河流域近乎平原）进行防御战，只要敌军没有相应的舰队协同作战，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战果，挡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因为是山地，只有很少几道防线可以从陆地上迂回）。如果舰队开近沿海地区，必要时运送部队在敌人翼侧登陆，而陆军则进行正面攻击，那末舰队就可以逐个迂回所有这些坚固的障地，孤立或摧毁国境线任何一面的威力不大的要塞。因此，谁掌握制海权，谁便占有黑海沿岸；换句话说，如果联军舰队不积极协同土军作战，黑海沿岸便很可能为俄军占领。

山脉背面的远离海岸的地区，是幼发拉底河、阿腊克斯河和库拉河的发源地。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省位于国境线的这一面，俄国的格鲁吉亚省位于那一面。这个地区也是山岭交错，一般说来，军队是通不过的。土耳其方面的埃尔斯伦和俄国方面的梯弗里斯可以算做两个直接的作战基地，基地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邻近区域丧失。因此，俄军曾由于强攻埃尔斯伦获胜，决定了1829年的亚洲战局³⁴¹。

但是，某一地点，对于一方是直接的作战基地，对于他方便是直接的作战目标。因此，连结梯弗里斯和埃尔斯伦的道路将成为敌对双方的作战线。道路有三条：一条沿库拉河上游通过阿哈尔

齐赫，一条沿阿腊克斯河上游通过埃里温，一条在前两者之间翻山到卡尔斯。这三条道路双方都有设防城市和据点防卫，因而很难断定哪一条对土军最有利，哪一条对俄军最有利。只要指出这个情况就够了：通过阿哈尔齐赫的道路，是土耳其军队直趋高加索起义地区的捷径，而俄军如果从巴士姆经过乔罗赫流域由沃耳特向埃尔斯伦前进，就可能迂回向前推进了的土军。来自巴士姆的道路与来自梯弗里斯的道路在距埃尔斯伦仅 15 英里的地方会合，因此在上述方向前进的俄军，就有可能截断土军的交通线，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占领埃尔斯伦，因为这个城市的工事は纯粹亚洲式的，不可能成为严重的障碍。

因此，巴士姆是控制山脉两侧的亚洲战区的锁钥阵地。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巴士姆在通商方面的意义，那就不必奇怪，沙皇为什么总想侵占它了。不仅如此，巴士姆还是土耳其整个亚洲部分的战区的锁钥，因为它控制着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唯一孔道，这条路可以迂回土军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一切阵地。黑海的两国舰队，谁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回海港，谁就能控制巴士姆。

俄军十分明了这个据点的重要性。他们分水陆两路增援南高加索沿海地区。不久前我们就已相信，土军在欧洲虽然比较弱小，但在亚洲却占很大优势。据报道，亚洲土军司令官阿勃迪-帕沙拥有 6—8 万人，有的甚至说有 12 万人，并且每天还有数以千计的贝都英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好战的非正规部队投到他的麾下。据说，已为高加索起义者储备了武器装备，一旦宣战，土军就将向这个反俄基地的中心突进。在这方面，必须指出，阿勃迪-帕沙未必能有 3 万以上的正规部队；他在到达高加索之前，必须用这支兵力——也只能用这支兵力——同顽抗的俄军部队作战。骑马的贝都英人

和庫尔得人可以出色地用于山地作战，以迫使俄軍大大地分散兵力，从而削弱其主力；他們还可以使俄国境内的格魯吉亚人的村落和俄罗斯族移民的村落遭受許多損害，甚至可以和高加索的山民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但是，如果阿勃迪-帕沙的正規部队不能封鎖住从巴士姆到埃尔斯倫的道路并击潰俄国人可以集中的作战部队的主力，那末非正規部队的战果仍然是保不住的。在我們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規的軍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規軍，就必须有正規軍的支援。土軍在这个边境上所处的地位頗似威灵頓在西班牙所处的地位；我們將看到，阿勃迪-帕沙是否善于用兵，就像英国將軍一样，善于对付在正規作战和必需物資方面都大占优势的敌人。1829年集結在埃尔斯倫前面的俄軍共18 000人；考虑到自那时起土軍已进行了改革（虽然在亚洲的那部分土軍改革最少），我們认为，如果俄軍現在能在这个地点集中3万人成为一支突击力量，他們便有很大把握获胜。

現在，有关亚洲俄軍的可靠材料比欧洲俄軍的少，而謠傳却比較多，在这种时候，誰能預言他們是否做得到这一点呢？高加索俄軍按滿額数字名义上是20万人；21 000名黑海哥薩克已派往土耳其边境；据說，有几个师已由敖德薩乘船前往高加索南部海岸的列杜特-卡列。但是大家知道，高加索俄軍尚不及正式編制人数的一半，派往高加索山脉以南的援軍显然不可能达到俄国报纸所报道的那个数字。根据我們收到的一些互有出入的消息，根本不能够哪怕是大概估計出亚洲边境上俄軍的兵力。但是我們可以指出，双方的兵力很可能大致相等（高加索人立即普遍起义的情况不算在內），也可能土軍稍多于俄軍，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战区采取攻勢。

土軍在亞洲成功的希望的確要比在歐洲大。他們在亞洲只需守住一個重要的據點——巴士姆。向高加索山脈北面的進軍，無論從巴士姆出發或是從埃爾斯倫出發，如果成功，便可以和他們的同盟者——山民取得直接的聯繫，還可以至少由陸上一舉截斷南高加索俄軍與俄國的聯絡，這樣就可以全殲這一支軍隊。另一方面，土軍如果失敗，頂多只會失去巴士姆、特拉比曾德和埃爾斯倫，即使是這樣，俄軍仍然沒有足夠的兵力繼續前進。土軍的得將大大超過失敗時可能的失，因此，根據這些明智的和正確的看法，土軍看來已經決定在這個地區打進攻戰了。

弗·恩格斯寫於 1853 年 10 月 2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作為社論載於 1853 年 11 月 15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925 號

卡·馬克思 战争。——罢工。—— 生活費用上漲

1853年11月1日星期二于倫敦

伊薩克查炮战³⁴²的消息剛傳到倫敦，就有一則電訊從維也納傳到巴黎和倫敦，這則電訊說，土耳其政府按照四個強國的代表的要求，已經下了命令：如果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就推遲到11月1日。雙方在伊薩克查打炮是否應看做是軍事行動的開始呢？這就是證券交易所和報界極為關切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不管情況怎樣，休戰期到今天就滿了。

據傳土耳其軍隊已在維丁和曼成，即在保加利亞東南和西北邊境，越過多瑙河。這個消息是非常靠不住的。據今天巴黎的“新聞報”報道，塞拉斯基拉特³⁴³在10月15日或16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上作了決定，一旦得知哥爾查科夫公爵正式拒絕從多瑙河各公國撤兵的消息，就在亞洲的兩個不同地點開始軍事行動：從黑海和格魯吉亞邊境攻打波提要塞。這家報紙還報道，剛被任命為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巴拉蓋·狄利埃將軍已經帶了一個由工程部隊和炮兵部隊的軍官組成的參謀部動身到土耳其去了。巴拉蓋先生是以蹙腳的將軍和高明的陰謀家而出名的。諸君可以回想一下他在著名的普瓦提埃街俱樂部³⁴⁴中的豐功偉績。

在俄国对欧洲的战争响起第一陣炮声的同时，目前在工业区中猛烈展开的資本对劳动的战争也发生了第一次流血。星期五晚上，威根发生了風潮，風潮是由煤矿工人和煤炭大王之間的冲突引起的。据报道，星期六城里完全平靜，但是，今天电报給我們带来的消息是：在克罗弗德勋爵或巴卡勒斯伯爵的矿上，煤矿工人进行了襲击，結果招来了军队，士兵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由于我要从出事地点的私人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我要迟发一些，只希望讀者对于“每日新聞”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多加檢点，因为这两家报纸头一家直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津貼，而后一家正如“先驅晨报”公正地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疯狂的、不可調和的和无情的敌人”。

在 1842 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貿易自由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并且在危險的时刻出卖了它³⁴⁵，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也曾向科布頓派的先生們公开地談过。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派的口号是：“**廉價食品和高額工資。**”但是谷物法剛一廢除，曼彻斯特派所理解的那种貿易自由剛一实现，他們的战斗号召就变了：“**低額工資和高价食品。**”由于政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貿易制度，工业巨头就在自己的肩上担起了一項在他們統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保证工业不停的发展和商业不停的繁荣。这样一来，曼彻斯特派就把自己遇到灾难时的一切退路都截断了。現在已經不能像在 1831 年时那样用議会改革来愚弄群众了；議会改革运动为资产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响已經完全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同时，工人阶级也造成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現在已經不能把工业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現象和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那些可怕冲突

都归咎于貴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貿易自由几乎已經存在了 8 年，实行貿易自由的条件非常有利，而且还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仿佛是被現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創造出来的藏着金子的世界。工业資產階級就这样逐漸地、一步一步地、亲手毀灭了它精心培育出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却可以在危急的时候利用这些幻想把激憤的工人階級誘开，使他們不去反对自己的真正的敌人，并且把工人階級的激憤情緒轉移到工业巨头自己的敌人身上，即轉移到土地貴族身上。在 1853 年，厂主所采取的虛伪的欺騙办法行不通了，工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被打消了。这两个階級之間的战争具有了尖銳的形式，它成为公开的、官方承认的和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了。厂主們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現在已經不是工資問題，而是应当由誰来統治的問題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終於从自己身上剝下了獅皮。他們現在只力求做到：让資本來統治，让劳动受奴役。

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訴訟，這場訴訟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一整批工业大軍，7 万多名工人被解雇，流落街头。除了普雷斯頓和威根的歇业的工厂以外，在貝凱普区，其中包括貝凱普、紐切尔奇、罗坦斯塔尔、沙恩弗德、斯坦福等地的工厂也都歇业了。貝恩利的工厂已在上星期五停工，帕迪罕的工厂在上星期六停工；在阿克林頓，厂主們正在計劃宣布同盟歇业；在柏立，已有 1 000 人不去做工，厂主們对工人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停止为本城和普雷斯頓的罢工者募捐，就要宣布同盟歇业”；在金德利，星期六下午已經歇业了 3 个大工厂，这样一来又有 1 000 多人失去了工作。

伪善的、巧言粉飾的、凶恶的曼彻斯特派騙子集团一方面在爱

丁堡大談和沙皇講和³⁴⁶，另一方面却在曼徹斯特對自己的同胞進行戰爭。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國和歐洲之間進行**仲裁**，另一方面却高傲地拒絕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舉行**仲裁**的建議。普雷斯頓的工人曾在一次露天群眾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說，“工廠工人的代表建議市長召集廠主和工人的公開會議來和平解決目前的爭端”。但是廠主們不要**仲裁**。他們只要**獨裁**。正當歐洲的戰火燃燒起來的時候，這些親俄的宣傳家大叫裁減軍隊，同時則為內戰擴充軍隊，——在郎卡郡和約克郡擴充警察力量。如果我們要对工人說話，那我們只能贊同“人民報”的意見：

“如果他們要使郎卡郡的工廠全都歇業，那末就派代表到約克郡去，去向西萊丁的英勇工人求援。如果西萊丁的工廠也要歇業，那末就到諾定昂和得比去，到北明翰和萊斯特去，到布利斯托爾和諾里奇去，到格拉斯哥和基台爾明斯特去，到愛丁堡和伊普斯維奇去！讓你們的呼聲越來越響亮、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出去吧！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勞動部門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如果企業主存心拿出他們這個階級的全部力量來對付你們，那末就號召你們的整個階級組成戰鬥隊伍去對付他們。如果他們想要進行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那末就讓他們如願以償，且看這場大搏鬥會有怎樣的結局吧。”³⁴⁷

一方面，廠主和工人之間正在進行鬥爭，另一方面，貿易正在同市場商品過剩的現象進行鬥爭，而人的愛好勞動的要求也正在同自然帶來的災難進行鬥爭。

在中國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曾經提醒讀者注意中國革命對大不列顛的社會狀況所可能發生的那種破壞性的影響^①。

現在“觀察家”報道：“中國發生的起義正在產茶地區不可抑制地擴展；結果，倫敦市場上茶葉的價格上漲，而上海市場上的細竹布的價格下跌。”

① 見本卷第109—116頁。——編者注

在利物浦巴什比股份公司的通报中，我們可以看到：

“上海的茶葉市場的開市價格比前季要高40—50%。存貨不多，而新貨到得很慢。”

根據廣州最近的消息，

“起義運動漸漸蔓延全國，貿易有完全被破壞的危險；工業產品幾乎全都跌價，有時跌得很厲害。存貨數量很大，而且越積越多，所以我們擔心將來情況也未必能夠好轉。在廈門，除了幾箱鴉片以外，進口貿易目前顯然已經停頓下來”。

關於上海市場的情況，是這樣報道的：

“紅茶和生絲都是自由售賣的，但是物主提出的條件却大大地限制了業務；沒有人願意換取工業品，因此，成交主要是靠價格很低的鴉片和從廣州帶來的銀錠。從廣州已運出大量金銀，儲存很快就會用光，所以我們不得不到別處設法籌借銀錠和銀幣，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很快就無法採購產品，除非在進口貿易中情況發生顯著的好轉。進口貿易的業務極受限制，現在主要是用拍賣的方式銷售次品。”

10月21日曼徹斯特基卜生公司的貿易通報指出，當前蕭條的最主要原因在於：

“不僅在目前從我們巨大的中國市場上不斷傳來壞消息，而且今後還會繼續得到這類消息，因為人們對錢財交易抱着不信任心理，這種情況在長時期內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在這個大帝國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看來將要實行的普遍的和根本的變革的結果。”

關於澳洲市場，“墨爾本商業通報”作了如下的報道：

“一個月以前採購的並且當時就如約到手的貨物，賣出後獲利至少有100—150%，而現在賣貨的款項連開支都不夠。”

上星期接到从菲力浦港来的私人信件，也带来了关于市場状况十分不好的消息。大批商品继续从世界各地运来，但是这些商品的售价极低，以致弄了大批船舶充当仓库，免得当时就亏本。

因此，各家貿易通报继续报道工业区市場停滞和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从10月21日曼彻斯特弗烈伊捷尔父子公司的通报上，我们看到：

“国内貿易和对外貿易的业务范围都大受限制，价格或多或少地普遍下跌。目下可以肯定，以下几种貨物价格已继续下跌：7号印花布每匹下跌8辨士，印度白棉布每匹下跌1½—3辨士；长50—66里德^①寬34—36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4½—6辨士；36—72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5¼—6磅的39英寸的低級衬衫料子每匹下跌約4½辨士；寬39英寸和长60—64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45—54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4½—7½辨士；5—8号的低級薄棉布每匹下跌1½辨士，而14—16号的方格薄棉布每匹則下跌3辨士；«T»字布每匹下跌1½辨士，长布每匹下跌3辨士，而各种家庭手工織的料子每碼則下跌約1—16辨士。紗綫落价的有波紋紗，主要是低級和中級的波紋紗，看来比上个月的单价要低¼—½辨士。40号細紗价格跌得特別多，售价比今年最高价格每磅足足减价1辨士。其他各种紗，价值在20先令到60先令以內的，也都落了价。”

关于粮食市場的情况，倫敦“每周快訊”³⁴⁸作了如下的报道：

“至于小麦，据已經打場和計算产量的农場主說，收成将比他們預計的更低。他們甚至把它称为**半个收成**。”

此外，一連約有两星期，天气阴冷潮湿，这对于小麦的播种和已經播种了的小麦极为不利，使人們极为担心1854年的收成。

来自牛津郡的消息說：

① 1里德約等于3米。——編者注

“总的來說，小麦收成特別差；往常每英亩产 40—44 蒲式耳的农場，今年只产 15—20 蒲式耳，而某些耕种得很好的小麦田和豆田每英亩总共只产 8—10 蒲式耳。馬鈴薯由于遭受严重的馬鈴薯病害而收成很低。”

来自約克郡的消息說：

“由于阴雨連綿，一切农活都完全停止了，而目前还未收割的庄稼——真可惜，其中包括全部豆子、大部分春麦和一部分燕麦——由于对坏天气沒有很好防备，受潮很厉害，即使經過干燥的春風吹过以后，能不能打谷还成問題。同时，这些谷子有很多都发了芽，无疑的，这些最后的物資将損失很大一部分。至于这里所說的損失究竟多大，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見一斑。从提斯一直到卡帖里克，到斯托克斯利，然后到克利夫兰的整个低地，再到从条尔斯克起到沿海的东部，到从哈罗格塔、哈姆貝尔起到沿海的西部，大量禾谷受到雨淋，并由于潮湿而腐坏了；至少有 50% 的馬鈴薯得了病，收成无望；不仅如此，还需要增补种子，可是旧种子儲存不多。十分明显，国内所有产麦区遭到了在我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的災荒和歉收。”

来自哈特福郡的消息說：

“今年我們这地方到这个时候庄稼还没有收割完，这种情况是完全反常的。然而这是事实；許多田里的燕麦还没有运走。相当大一部分春播豆子也没有运走，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大麦也还没有运走；还有一些田甚至连早春麦也还没有收割。”

上星期六，在“經濟学家”上刊登了下面一張表格，表明在 1853 年 1 月 5 日—10 月 10 日期間联合王国輸入的小麦和其他各种谷物以及各种粗磨粉和精磨粉的数量。

輸 出 国	小 麦 (单位: 夸特)	小麦面粉或 上等面粉 (单位: 公担)	各 种 杂 粮 (单位: 夸特)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 的总 数 (单位: 公担)
俄国經過北方的港口……	69 101	64	307 976	65
俄国經過黑海港口……	704 406	—	1 029 168	—
瑞典……	3 386	13	8 809	13
挪威……	—	1	561	1
丹麦……	220 728	5 291	733 801	5 291
普魯士……	872 170	3 521	899 900	3 521
梅克倫堡-息維林……	114 200	—	123 022	—
汉諾威……	19 187	—	146 601	—
奧登堡……	2 056	—	19 461	—
汉撒城市……	176 614	53 037	231 287	53 066
荷兰……	58 034	306	132 255	308
比利时……	15 155	353	20 829	353
諾曼底群島(外国产品)……	526	4 034	629	4 034
法国……	96 652	857 916	470 281	858 053
葡萄牙……	4 217	4	21 657	4
亚速尔群島……	630	—	14 053	1
西班牙……	13 939	177 963	48 763	177 985
直布罗陀……	—	9	4 368	9
意大利:				
撒丁領地……	7 155	2 263	8 355	2 263
托斯卡納……	48 174	67 598	45 597	67 598
教皇國……	39 988	—	41 488	—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8 618	2	11 977	2
奥地利領地……	44 164	370	106 796	370
馬尔他……	28 569	—	56 281	—
伊奥尼亚群島……	82	—	16 220	—
希腊……	1 417	—	10 221	—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亞……	209 048	—	601 481	—

輸 出 国	小 麦 (单位: 夸特)	小麦面粉或 上等面粉 (单位: 公担)	各种杂粮 (单位: 夸特)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 总数 (单位: 公担)
叙利亚.....	21 043	—	24 686	—
埃及.....	297 980	—	543 934	—
其他的土耳其領地.....	218 407	7 370	689 703	7 370
阿尔及利亚.....	—	—	21 661	—
摩洛哥.....	3	3	13 451	—
英屬东印度.....	—	205	—	205
英屬北美.....	45 587	232 216	62 626	232 493
美利坚合众国.....	434 684	2 388 056	630 324	2 389 283
巴西.....	—	3	237	320
其他国家.....	1	148	8	148
总计.....	3 770 921	3 800 746	7 093 458	3 802 743
3 800 746 公担小麦面粉 的等价物.....	1 085 927			
全部小麦(麦子和面粉)...	4 856 848			
3 802 743 公担的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等价物.....			1 086 522	
麦子和精磨粉和粗磨粉 的总额.....			8 179 980	

“经济学家”为了消除西蒂的商人的忧虑，就从上面的表格作出以下的結論：

“在 1847 年，尽管实行高价輸入这种特殊的刺激办法，我們在全年內輸入的小麦(麦子和面粉)只有 4 464 000 夸特。在今年的 9 个月內，我們沒有用这种刺激办法，而且不把上两个月計算在內，就已輸入了 4 856 848 夸特。因此，关于这样大量的輸入對我們國內供应的影响，完全可以从下面两点中肯定一点：或者是把大部分輸入的小麦用于消費，从而在相等程度上把我們本国的产品保存下来，或者是把它存在仓库里，以备后用。”

然而，这种二者擇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由于大陆各国已經实行或即将实行禁止輸出粮食的措施，粮商认为，目前在英国把自己的儲备粮放在仓库里是恰当的，以备英国的粮价上漲到比大陆粮价更高的时候再用。此外，与 1847 年的情况相反，在那些可能受到俄土战争影响的国家中的儲备粮达 2 438 139 夸特谷物和 43 727 公担面粉。11 月 30 日以后埃及也将禁止輸出。最后，英国在今年只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通常的**每年**余粮，而在谷物法快要廢除的时候，它可以在缺粮时期手里有外国在丰收时期积存的粮食。

“泰晤士周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情况作了以下的估計：

“4 磅重的大圓面包的价錢是 1 先令，天气一直是这么坏，像目前这样坏的天气是 50 年内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都卷入了罢工的热潮，亚洲霍乱又在我国流行起来，战争狂热又支配着我們。我們只是欠缺軍事稅和饥饿这两項，不然的話，英国的灾难就算齐备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92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波斯進軍阿富汗和俄國進軍中亞。
——丹麥。——多瑙河和亞洲的
軍事行動。——威根的礦工³⁴⁹

1853年11月4日星期五于倫敦

波斯駐聖詹姆斯宮廷大使沙菲汗突然被沙赫從英國召回。這次召回同波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³⁵⁰ 巧合在一起（據說，波斯在阿富汗占領了赫拉特），而且也同俄國進軍希瓦汗國的首都希瓦這事件³⁵¹ 巧合在一起。波斯和俄國的進軍可以看成是一路從西一路從北向旁遮普（英國東方領地的北部前哨）的兩路進軍。俄國的進軍由彼羅夫斯基將軍指揮，他就是那位在1839—1840年進軍希瓦時曾遭到失敗的將軍。近幾年來，俄國在咸海建立了一支區艦隊，現在能夠溯阿姆河而上了。

俄國的一支很大的分艦隊正在波羅的海巡邏，不久以前，它在这里曾經有機會偵察過瑞典哥特蘭島的斯利特工事和港口；俄國渴望像占領阿蘭群島（阿蘭群島位於瑞典沿海，1836年俄國在此構築了強大的工事）那樣占領哥特蘭島。俄國艦隊離開哥特蘭以後接着就開赴卡特加特和松德，目的是支持丹麥國王策劃的 coup d'état [政變]，因為哥本哈根的議會很有可能會拒絕馴服地接受寬大的沙皇欽定的所謂全國憲法（Gesammt-Staats-Verfassung）。

哥本哈根的局势是这样的：丹麦政府由于得到农民联盟的成員的支持，廢除了 Lex Regia [王位法]，实行了新的王位继承法。农民联盟是以切尔宁上校为首的政党，它主要是力求变 Feste Gut (一种封建性的农民掌管的地产) 为自由财产，力求頒布有利于农民和改善他們状况的市政法。民族-自由派的政党(丹麦的叫法是埃德尔丹麦人党，它在 1848 年曾組成“卡集諾”內閣³⁵²，迫使国王接受了 1849 年的宪法，并且进行了反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主要由一些从事知識分子的职业的人組成，它同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視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人民的影响，政府几乎完全不让它参加本届下院的事也做成了，現在該党在下院里的代表不过寥寥十来个人。然而，統治集团借农民联盟的成員的帮助摆脱了它所仇視的埃德尔丹麦人党这个反对派以后，便撕下了假面具，任命了厄斯特德先生这位两党都不欢迎的人物当首相；他們不仅不再巴結农民政党，而且还利用国王的否决权禁止公布政府自己当年提出来誘騙农民的新市政法。受政府欺騙和侮辱的农民联盟的成員，便同埃德尔丹麦人党組成了联盟，并且任命蒙腊德(牧师、埃德尔丹麦人党的領袖之一)为宪法委员会副主席。随着这个联盟的成立，一切想用宪法廢除宪法的希望都沒有了，于是——既然整个計劃都是俄国人制定的，并且是为了他們的利益——在危急关头，俄国的分舰队就出現在丹麦的領水上。

維也納和柏林的所有報紙都证实了关于土軍用大量兵力强渡了多瑙河的消息。据“奧地利通訊”报道，俄軍在小瓦拉几亞击退了土軍。电訊中有一条消息說，10月21日两軍在亚洲进行了一场重大的会战。在得到比較詳細可靠的消息以前，我們对于是什

么情况促使土军统帅在維丁附近渡过多瑙河暂不发表意见；乍看起来，这种机动似乎是一个大错误。“科伦日报”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在瓦拉几亚查封了所有的金库（没有指明哪些金库，官家的还是其他的）；另一家德文报纸说，这位将军命令把集中在多瑙河准备出口的全部粮食储备运往腹地。

今天的各家法文报纸证实了沙米尔在同沃龙佐夫公爵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的消息。据“阿格拉姆报”报道，丹尼洛公爵接到俄国来的一封信，他读了信以后，就命令把集中在門的内哥罗境内的全部粮食都运到扎勃利亚克。在門的内哥罗，正在准备弹筒和铸造弹头。据说，俄国通知了門的内哥罗统治者，俄土两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将是爱国的圣战，門的内哥罗人有责任警觉地保卫自己的疆界，使邻省不可能帮助土耳其政府。

維也納報紙“漫游者”在10月27日說：据圣彼得堡来信，俄皇尼古拉頒布了建立后备军的命令，其司令部将設于沃倫。

上星期二在布萊克本，由于圣彼得区教会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发生了骚动；并且調来士兵进行干預。

普雷斯頓的工人領袖考威尔先生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就威根发生的骚动宣称：

“他对威根发生的事件深表遺憾。他很惋惜，威根的工人觉悟不到不当到平均主义体系里找出路。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把他們創造的财产加以毁坏，这对他們没有任何意义。财产本身根本不会給他們带来損害；占有这种财产的人才是僭夺者。希望工人们尊重财产和人的生命。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才能有把握取得有利于他們的斗争結局。”

我决不认为威根矿工付出了七个人的鮮血的代价的盲目暴力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明白，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

的下层(矿工无疑是工人阶级的下层)来说,当极端的贫困和老板的无以复加的横蛮逼得他们作绝望的挣扎的时候,要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该是多么困难呵。老板们常常特意挑起骚动,以便有可能调来武装力量,并且根据地方当局的指令驱散一切工人集会,像他们在威根所做的那样。星期五白天在威根城发生的骚动,就是煤炭大王们制造的,他们大批人集合在怀特塞德皇家旅馆开全区大会,讨论矿工的要求,并且通过了拒绝同工人作任何妥协的决定。星期一在威根附近的海格发生捣毁锯木厂事件,其目的在于反对外来的矿工,他们是拜尔凯利斯伯爵的代理人皮斯先生从威尔士运来代替正在罢工的煤矿工人的。

矿工对自己的工人兄弟使用暴力来阻止他们干矿工已放下不干的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老板们互相约定彼此大量罚款迫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同盟歇业的时候,再看到工人们以更加赤裸裸但是并不虚伪的方式使用强力来进行自己的罢工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约瑟夫·休谟先生本人在他写给普雷斯頓工人的一封信中说:

“在那些主张用仲裁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人当中,我看到有许多是现在同自己的工人开战的工厂主。”

普雷斯頓企业主协会公布了一个为普遍同盟歇业作辩护的宣言。写这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诚,可以根据下面的事实来判断,这就是:宣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工厂主的秘密联盟(联盟的纲领我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向读者诸君介绍过了^①),因此,蓄意造成的密谋,结果就被涂上了一层老板们似乎不能逃避的必然性的色彩。他们

^① 見本卷第283—284頁。——編者注

責难工人硬要增加 10% 的工資，少一点儿都不干。但是他們却不告訴公众，老板們在 1847 年縮減工資 10% 时曾答应一旦复苏时期到来就恢复原来的工資；他們也不談工人們从布萊特先生、科布頓先生之流所描繪的五彩繽紛的图景中，从整个資產階級报界的一片頌揚声中，从議會开幕式上的国王敕語中，已經不止一次地了解到，实业是复苏了。老板們也不提从那时起粮食上漲了 40% 以上，煤炭上漲了 15—20%，肉类、蜡烛、馬鈴薯以及工人階級的一切其他日用品約上漲了 20% 左右，也不提工厂主們在“**廉價粮食和高額工資**”的口号下已經取得了对自己的敌人的胜利！企业主們非难工人們，說他們繼續坚持同一个城市的同类企业的工資要平等。难道他們的老板們的全部学說，即李嘉图和馬尔薩斯的学說，不就是从全国存在着这种平等的假設出发的嗎？企业主們硬說，工人們是按照某某委員會的命令行事的。工人們好像在受“異乡人”、“自封的領袖”、“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煽动。在反谷物法同盟³⁵³时期，保护关税派也是这样說的，那时他們責难这些工厂主服从布萊特先生和科布頓先生“这两个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領導，責难他們按照曼彻斯特革命委員會的指令盲目行事，这个委員會征收会費，指揮讲演人和傳教士大軍，使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在全国泛濫，形成一个国中之国。最有趣的是，老板們自己在責备工人們“按照某某委員會的命令行事”的时候，却給自己取了一个“厂主联合会”的名字，以**委員會**的名义公布自己的宣言，同曼彻斯特、波尔頓、柏立等等地方的“異乡人”暗中勾結。其实，老板們的宣言中談到的“異乡人”，只不过是邻近工业区的工人罢了。

同时我也不认为工人們会达到他們罢工的直接目的。相反，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过，不久的将来，工人們罢工将不是为

了提高工資，而是反对降低工資^①。現在降低工資的事件日益頻繁，正在引起同样多的罢工。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整个运动的真正結果将是“工人階級的活动将迅速轉入政治領域，而在罢工过程中爭得的新的組織——工联，对他們将有重大的意义”。厄內斯特·琼斯以及宪章派的其他領袖重新展开了斗争；上星期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如下的決議：

“鉴于企业主階級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采取联合进攻，抗拒合理的劳动日付給合理的工資的原則，大会认为，只有企业主階級的壟断消灭了，劳动者階級通过人民宪章的实行在議會下院的代表名額爭得了，工人現在的斗争才能以胜利告終。只有那时，这个階級才能頒布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只有那时，它才能廢除不公正的法律，掌握劳动資料，获得高额的工資、廉价的食品、稳定的商业，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4 日

載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28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① 見本卷第 377 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多瑙河上业已开始军事行动，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丝毫疑问了。奥美尔-帕沙在維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占领了卡拉法特（对岸的一个市镇），并向克拉約瓦派出了前卫；在另一个地方，土军正在从魯舒克向对岸的茹尔日沃城进攻。据说，土军还在第三和第四个方向上，向布来洛夫和都諾进攻。同时，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也发生了会战，不过俄军是进攻的一方。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道之一来看，这次会战持续了3小时之久，结果俄军被击退；但是11月8日晚上收到的維也納的另一个报道又说，会战持续了28小时之久，还是不分胜负。看来，前一个报道比较属实。

关于其他战斗的结果，也是传说纷纭。从各个报道来看，茹尔日沃的战斗是没有结果的。布来洛夫和都諾战斗的结果，我们毫无所知。至于从卡拉法特发动的进攻，有的电讯说，土军取得了某些成功，并迫使俄军退却了；有的电讯却说，土军在进攻之初即受阻，并被击退到卡拉法特。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实际上只有一点是可靠的：根据下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奥美尔-帕沙放弃了原来我们认为土耳其在这一边境上理当采取的战术即防御战术^①。他采取了进攻行动，并且趁俄军自小瓦拉几亚

^① 見本卷第380、483頁。——編者注

退却的时机，于10月28日在自己防綫最左翼的維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但是兵力有多少，我們完全不能断定。然而，在此以后，据我們所知，土軍在其他地点只进行佯攻或局部攻击，同时，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少量兵力渡过多瑙河这样的大河又极不明智，所以我們可以认为，奧美尔-帕沙率領的部队按道理自然是作战兵力的大部分。除非绝对可靠的情报才能使我們相信：他像某些报道所說的，只带7000人冒险渡过了多瑙河，除远在150英里以外的索非亚有8000人外，再也没有援軍和預备队。但是，由于不久前土軍主力还集結在瓦尔那、苏姆拉和魯舒克，所以我們也很难說明，奧美尔-帕沙是用什么方法把軍隊的基本兵力这样突然地集結到远离上述三地平均为250英里的維丁地区的。

这个問題最可能的答案是：奧美尔-帕沙考虑到俄軍向維丁方向推进，因而改变自己軍隊的防綫，把它稍向左移。他責成魯舒克、錫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等地的守軍防守直通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后，就選擇魯舒克作为右翼的据点，選擇維丁作为支援左翼的据点，以尼科波尔为中路軍隊的集結地点。这道从魯舒克到維丁的防綫长约200英里。他在这道防綫的左翼集結了所能集結的全部軍隊，并率領他們渡过了多瑙河，这样显然是迂迴俄軍的右翼。他企图襲击俄軍的先头部队，并把他們击退到席尔河对岸；这一道河，他可以从正面强渡，也可以派遣另一支部队在拉索瓦附近渡过多瑙河来繞过去。至于横断維丁到布加勒斯特通路的多瑙河第二支流阿留塔河，土軍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渡过，即以中路軍隊的另一部分在阿留塔河口下方的尼科波尔和都諾附近渡过多瑙河。最后，沿多瑙河而下，在茹尔日沃和布来洛夫附近进行佯攻，迷惑俄軍，使它无法判断土軍实际进攻的地点。

如果暂时撇开政治原因不谈，几乎可以不必怀疑，奥美尔-帕沙的计划就是这样。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土军在茹尔日沃附近“渡过了河”，这显然是一个假消息。在已集中兵力的强敌面前，分兵两路在相距 250 英里的两个地点强渡欧洲最大的河流，而且是在最宽最难渡的地方强渡，这样的错误是任何一支稍经训练的军队中的准尉也不会犯的。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奥美尔-帕沙所采取的机动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企图从翼侧迂迴敌人，并从翼侧和正面同时攻击，打乱敌人的整个战斗队形。如果能以主力突然攻击敌人翼侧，如果不受到敌人正面攻击的威胁，如果在失利的情况下能够退却，如果在整个正面的所有障地上击溃敌人后能够切断这些障地与作战基地的交通线，那末，这样的机动是完全正确的。目前，这些都是不能实现的。奥美尔-帕沙一旦退却，在瓦拉几亚的右翼军队就有被敌人迂迴的危险，他同卡拉法特的联系也就有可能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奥地利退却）；而土军自卡拉法特向布加勒斯特的进攻，相反地，却无论如何威胁不到俄军退却的道路。读者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我们曾据此断言：对土军说来，唯一适当的进攻方向，是沿着贝萨拉比亚和奥地利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带从多瑙河到塞勒特河的这一方向^①。土军本应采取一种使俄军的交通线马上受到威胁甚至会被切断的机动，但是他们却在战线的另一端发动了进攻，在这里他们即使获胜，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土军不致遭到正面攻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主要的战斗行动是在维丁和克拉约瓦或斯拉廷纳之间进行的，而俄军也因此未必会在多

^① 见本卷第 380—381 页。——编者注

瑙河下游渡河，——除非他們的战略比我們想像的更要大胆。但是同时在中丁到魯舒克正面的地段上，土軍的行动也因有一条大河与敌相隔而受到限制，所以在这个地区行动一定是比較消极的。

在目前情况下，土軍这次行动的主要条件無論如何是不具备的。

耶拿会战³⁵⁴ 可以作为这种机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范例。拿破侖以其主力突然猛扑普軍左翼，8小时內就打乱了普軍的队伍，切断了它退却的道路，并消灭了它，从此这支普軍就不再存在了。但是这次会战是在20平方英里的地区內进行的，会战持續的时间为20小时。而現在作战的地区却长达200英里，寬达50英里，又沒有道路，所以軍队每次移动就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拿破侖在耶拿会战中，由于出敌不意，兵力强大，行动迅速，所以大获全胜。現在土軍的进攻，即使經過一些努力，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挫敗。所有这些情况看看地图就更清楚了。土軍必須从卡拉法特前往克拉約瓦。在这里阻碍土軍前进的是从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山流向多瑙河的数条河流中的第一条河流，这些河流由北而南穿过瓦拉几亚，形成好几道进攻軍队必須通过的防綫。在这方面地形很像倫巴第，这里所說的席尔河和阿留塔河也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相似。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軍事意义一向是受到重視的。

假定土軍强渡席尔河，并且可能已經成功，那末他們在斯拉廷納附近的阿留塔河上将遇到首次严重的抵抗。阿留塔河又寬又深，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障碍；此外，俄軍只要稍微發揮运动性，就可以在那里集中一支軍队，不仅能够击退土軍的一切攻击，而且能够

立即扩大战果。实际上，俄军在克拉約瓦取得胜利——只要不是很大的胜利——并不会有很大意义，因为土军强行军3天就可以到达卡拉法特和多瑙河，从而摆脱追击。如果土军在斯拉廷納失败，则不仅是比較惨重的失败（因为俄军調集到那里的兵力較多），而且在失败后还会遭到俄军5—6天的追击。誰都知道，战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軍复沒。因此，只要哥尔查科夫願意在阿留塔河上进行抵抗，奥美尔-帕沙恐怕什么时候也渡不过这条河，因为甚至在对土军最有利的时机，奥美尔-帕沙也无法向河岸調集25 000人以上的兵力，而哥尔查科夫毫不費力就可在那里及时集中35 000人。至于土军自多瑙河南岸进行翼側攻击，如果没有大量的舟桥和其他器材（在土军中这些器材很少見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土军强渡了阿留塔河，甚至渡过了阿尔哲什河（更东面的一条大河），誰又能設想，奥美尔-帕沙能够夺取俄军在布加勒斯特的防御工事，并在决战后击潰兵力无疑将比土军約大三分之一的俄军呢？

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俄军只要稍能遵循軍事原則，奥美尔-帕沙就輸定了。然而，如果战争不是按照軍事原則进行，而是按照外交原則进行，結局就可能两样。

俄军在向卡拉法特附近的軍事重地派出足以威胁塞尔維亚的部队之后，又主动撤离了这一軍事重地；奥美尔-帕沙沒有阻碍地渡过了多瑙河；他的部队在小瓦拉几亚（阿留塔河以西地区）比較自由而且非常緩慢地移动；土军在其他各地的攻击，就我們所能判断的，都无关紧要；最后，从維丁进攻在战略上是个破綻，大家确认奥美尔-帕沙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这些事实似乎給某些权威人士所作的結論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我們认为，他們的結論与真相

是相距很远的。他們的結論是：敌对双方的司令官之間似乎有一个秘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俄軍應該把小瓦拉几亚让給土軍。支持这种說法的人說，阿留塔河是一道非常合式的天然屏障，在外交家們重新寻求出路以摆脱現狀之前，双方軍队在整個漫长的冬季可以隔河相望。俄国人采取这种让步，据他們說，不仅可以显示一下他們寬宏大量和爱好和平，而且还可以为占領所掠夺的地区获得某种法律根据，因为俄国和土耳其共同占領多瑙河各公国是完全符合各項現行条約的精神的。俄国人如果在欧洲作出这种寬宏大量的样子，就可以摆脱在亚洲的真正危險，看来，他們現在在亚洲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坏，而主要的是，这样一来，他們就有足够力量随时把土耳其人从多瑙河北岸地带赶走，夺回这块让給了土耳其人的地盘。得到宮廷信任的維也納各报公开闡述这种論調，这一事实可以看做这种論調的論据，这个論据很能引人注意，但决不能說明全部問題。过不几天就可以看出，是这种論調正确，还是应当預期有一場真正的大战。如果情况有另一种变化，那末我們就預期不到什么了。

現在已开始明显地看出，双方在亚洲的兵力比原来推断的少得多。据“君士坦丁堡报”报道，10月9日，土軍在埃尔斯倫有1万人的預备队；在巴士姆有4000人的正規部队和2万人的非正規部队，看来这是用来組成作战軍队的；在靠近波斯边境的巴雅澤特有3000人；在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个靠近俄国边境的仅次于巴士姆的重要据点——有总数約16000人的前卫部队。这些部队几天之內应得到叙利亞10000—12000生力軍的补充。这些数字比原来我們听說的要小得多：总共不是10万人，而是65000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相信通过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报道，那末，把梯

弗里斯、格魯吉亞同俄國連結起來的高加索山脈的主要山口，現在正被山民控制着；俄軍在沙米爾的猛攻下退却了，現距梯弗里斯差不多有 9 英里，而駐格魯吉亞的俄軍司令官沃龍佐夫將軍宣稱，一旦與土耳其交戰，如果得不到 5 萬人的援軍，他是不能守住這個地區的。這些報道是否可靠，我們無法判斷，但是俄軍從海上向杰爾庫姆-卡列、列杜特-卡列和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其他地點的倉促增援表明，俄軍在這裏的處境並不很妙。關於這些援軍的數量傳說不一。開始有人說，俄軍已經派出了 24 000 人，但是他們哪裏有船運這樣多的軍隊呢？現在已經弄清楚，俄軍派去的是第十三師——利迭爾斯將軍第五軍的第一師；該師共有 14 000 人，這是非常可能的。另外又有人說，似乎有 24 000 名（這大概是俄國人愛用的數字）黑海哥薩克從陸路繞過了高加索西部邊境，在這個又陡又仄的海岸地帶沒有遇到抵抗就順利地到達了列杜特-卡列。對於這種說法，我們越想越覺得不真實。黑海哥薩克防守庫班河到捷列克河一綫已够繁忙，而要派出這樣多的騎兵，既無任何支援，也不遭到任何襲擊，就在敵對的居民區內通過了長達 150 英里的隘路（在這裏，很少的人就可以阻止一個縱隊前進，或者將它截成兩段），——這樣的事只有在俄國才可以聽到，直到今天，俄國還有人硬說馬森納在蘇黎世會戰中曾被蘇沃洛夫擊敗³⁵⁵。

由此可見，這就是土軍行動最有利的地區。假使土耳其能集中正規部队的兵力向通往梯弗里斯的唯一交通干綫進行猛烈迅速的攻擊（如果能打海戰，可沿海岸進攻，如果不能，可在卡爾斯或阿爾達漢的內陸地區進攻），同時非正規部隊按照自己特有的戰法採取頑強、堅決、突然的行動，那就可能很快使沃龍佐夫陷入絕境，就可能與沙米爾建立聯繫，并使整個高加索普遍起義。但是在這裏，

比在多瑙河更需要大胆、迅速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地区的土
軍司令官是否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待将来证明。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2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軍的失敗³⁵⁶

为了尽可能搜集有关俄軍和土軍在瓦拉几亚的軍事行动的消息，我們仔細研究了由“加拿大号”輪船带来的各种欧洲报纸。現在可以对上星期五我們評論过的由“华盛顿号”輪船带来的消息^①补充若干重要事实。据我們所知，会战已經进行几次，但是会战的詳情，我們現在知道得很少。我們掌握的材料仍然是片片段段、互有出入、极不充分的。在沒有得到土耳其將軍們的官方报告以前，这种情况可能繼續存在。然而我們至少已經知道，土軍的作战指揮相当巧妙，士气一直旺盛，沒有辜負热烈推崇他們的人的贊揚——大多数比較冷靜而客观的观察家們曾經认为这种贊揚是夸大的結果。因此大家普遍感到惊奇。人們对奥美尔-帕沙这位統帅的才能都相信会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是，对于他的軍隊的长处，西方的新聞界人士和国家活动家們却估計不足。他的軍隊固然都是土耳其人，但是这些人已經完全不是 1829 年为吉比奇击潰的那些兵士了。尽管土軍条件不利，俄軍在数量上又大占优势，土軍还是打败了俄軍。可以认为，这只是土軍获得更有决定性的胜利的預兆和开端。

現在我們第一次听說，君士坦丁堡的軍事會議曾經在索非亚集中了約 25 000 人的部队，以备必要时在塞尔維亚作战。不論这

^① 見本卷第 507—514 頁。——編者注

有多么奇怪，但是关于这支部队及其任务的任何消息以前似乎都没有传到西欧，只知道奥美尔-帕沙正在十分妥善地使用着他们。在索非亚集中这些部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塞尔维亚人不发动起义（在现在的公爵^①执政时期，他们未必会起义），不倒向俄国，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军队留在这个地区；如果塞尔维亚人起义，土军要么开进这个国家镇压起义，为此，在瓦拉几亚驻有俄军的情况下，25 000人将不够用；要么占领边境山口，不让塞尔维亚人出国门一步，为此，有上述四分之一的兵力即绰绰有余。在这个问题上，奥美尔-帕沙所持的显然正是这种观点，因为他把这支部队直接调到了维丁地区，并与那里原有的部队合并。这些援军对奥美尔-帕沙不久前战胜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俄军右翼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胜利，除了俄军被击毙和被俘的军官数目而外，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这次胜利想来一定是很全面的，它在精神上给土军带来的好处，甚至将比在物质上带来的好处还要大。

现在我们还知道，在土尔图凯（位于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之间）渡河并占领了沃耳特尼察的这支土耳其部队，是由伊斯马伊耳-帕沙指挥的。伊斯马伊耳-帕沙就是盖昂将军（他虽在苏丹军队中担任要职，但并未脱离基督教），由于在匈牙利战争中勇敢善战，博得了大胆、坚决和机智的指挥官的声誉。他没有卓越的战略才能，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次以白刃格斗击退了进攻的敌人那样成功地执行命令。巴甫洛夫将军在沃耳特尼察的失败，会大大有利于土军进入阿留塔河东岸地区，并且为土军开辟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道路，因为有消息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并没有像传说的那

① 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编者注

样向斯拉廷納进军，他很謹慎地不願分散兵力，因此現在仍然呆在多瑙河各公国的首都^①。这一情况又一次說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十分保險。大概不久便在該地区发生了决战。如果哥尔查科夫不是光說大話的人，如果他能在這裡集中7—8万人(从官方宣布的俄軍数字中作了有理由的各种扣除之后，他仍然拥有这么多兵力)，那末优势无疑在他这方面。但是，考虑到俄軍报告中的数字材料往往有些虛假和夸大，考虑到奧美尔-帕沙的軍隊的实力和战斗力比原来想像的要强得多和善战得多，應該承认，双方的作战条件比原来想像的就更加相近了，哥尔查科夫也就完全有失敗的可能。当然，如果土軍总司令能集中受到胜利的鼓舞的5—6万人来进行决战(我們看不出有什么会妨碍他这样做)，那末他成功的机会无疑很大。我們在評論中肯定这一点时力求慎重，因为虽然我們同情土耳其人，但是也沒有理由把土耳其的处境說得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研究瓦拉几亚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从軍事观点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想到倫巴第。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及其支流和倫巴第的波河及其支流，各自形成南面和西面的边界。土軍采取的作战計劃也頗似1849年在諾瓦拉会战³⁵⁷中遭到毀灭的皮蒙特軍隊采取的計劃。如果土軍取得胜利，他們就更有理由博得我們的称贊，而俄国人的完全无能也就更加明显。無論如何，哥尔查科夫并不是拉德茨基，而奧美尔-帕沙也不是拉莫里諾。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11月11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1853年11月28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39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布加勒斯特。——譯者注

卡·馬克思 工人問題

1853年11月11日星期五于倫敦

內容丰富而思想深邃的“經濟學家”杂志在“**黃金般的机会与这些机会是怎样被利用的**”这个标题下發揮了它的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論之一³⁵⁸。不言而喻，“黃金般的机会”是貿易自由造成的，而“利用”这个机会，或者确切些說，“濫用”这个机会，当然就和工人階級有关系了。

“工人階級破天荒第一次把自己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王国的人口的确是**减少**了，人口外流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額。而工人們是怎样利用了他們的机会呢？他們做了些什么呢？他們所做的就是他們往常在每一次生活状况得到暂时改善时所做的事情：他們紛紛結婚并尽可能快地生育。如果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外流很快就会完全被抵銷，而黃金般的机会就会錯過。”

黃金般的**不結婚和不生育的机会**——这完全符合馬尔薩斯和他的門徒們所規定的正統标准！这就是黃金道德！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据“經濟學家”承认，人口还是在减少，人口外流却仍然沒有被抵銷。可見，現在种种不幸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剩。

“劳动階級應該从为它們提供的难得机会中取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多事积蓄，成为資本家。可是，他們中間有誰上升到或者开始上升到資本

家的行列中呢？这种情况大概連一个也沒有。他們错过了提供給他們的机会。”

成为資本家的机会！与此同时，“經濟学家”又向工人們指出，即使他們最終爭取到使他們原先的工資增加 10%，每星期他們也只不过得到 16 先令 6 辨士以代替 15 先令罢了。这里它把每星期的平均工資算作 15 先令，已經偏高很多了。然而問題还不在这里。每星期拿 15 先令怎样就能成为資本家呢？这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据說，工人們的想法不正确，认为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当設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經濟学家”写道，“他們罢工了，想用这种方法爭到比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多的收入”。他們每星期掙 15 先令时，有成为資本家的现实机会，而掙 16 先令 6 辨士时，这种机会倒会消失！一方面，工人們应当力求使干活的人少，而使資本尽可能增多，以便有可能迫使資本家提高工資。但是，如果資本过多，而干活的人少，那末工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利用这种机会，因为为了这种机会他們就應該不結婚、不生育！“他們过起更奢侈的生活来了”。在实行谷物法的时期，正像同一个“經濟学家”向我們报道的，他們吃不飽、穿不暖、差不多沒有死掉。只要他們想活下去，那末他們怎么能敢过比那时更不“奢侈”的生活呢？“經濟学家”常常登載有关进口的資料統計表，以证明人民的福利的不断增长和經濟状况的日趋繁荣。当时称之为貿易自由带来的空前福利的标志，現在却斥之为工人阶级不合理的浪費的表現。可是，我們照样无法理解：如果人口减少和消費縮减，进口怎么能够繼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怎么能够繼續增加；进口和出口都縮减，工业和商业又怎么能够扩大？

“第三，工人們必須利用这个黄金般的机会以便使他們自己及其子女都

受到他們可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从而使自己變得與他們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更為相稱，並且學會從這種改善中取得最大的好處。不幸，我們不得不承認，入學的情況非常糟糕，繳學費的情況也非常糟糕。”

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隨着商業復蘇而來的是企業擴大，機器採用增加，成年工人日益為婦女和兒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延長。在工廠里做工的母親和兒童愈多，入學人數就愈少。而且，你們到底給父母及其子女提供了受哪一種教育的機會呢？“經濟學家”回答說，是受這樣一種教育的機會：學會把人口增長保持在馬爾薩斯所規定的水平上。科布頓先生說，教育會向工人們表明，又擠又髒，空氣又不流通的住宅不是保護健康和精力的最好手段。同樣，只要你們向人說清楚，自然規律要求人的機體經常依靠營養來維持，大概你們也就能夠使人不致餓死了。“每日新聞”宣稱，教育能使我們的工人階級學會怎樣從干骨頭中提取營養物，怎樣用淀粉烤制點心，怎樣用扔掉的菜根熬湯。

總之，歸納起來，被工人階級錯過的黃金般的機會就是黃金般的不結婚的機會，就是更少奢侈，不要求提高工資，每星期掙 15 先令就成為資本家，學會以更加粗糙的食物為生並以馬爾薩斯的害人理論摧殘心靈的機會。

上星期五，厄內斯特·瓊斯來到普雷斯頓城，向遭到同盟歇業的工廠工人發表有關工人問題的演說。在預定的時間內舉行了不下 15 000 人（“普雷斯頓舵手”³⁵⁹ 報道的數字是 12 000 人）的露天集會，前來參加大會的瓊斯先生受到了極為熱烈的歡迎。我從他的演說中摘引幾段如下：

“為什麼過去進行這種鬥爭？為什麼現在仍在進行這種鬥爭？為什麼將來還要重新出現這種鬥爭呢？因為你們生命的源泉被資本一手堵住了，資本

把它的金杯吸干，給你們剩下的只是一些渣滓。为什么工厂向你們宣布了同盟歇业就等于威胁你們的生命呢？因为再沒有别的工厂可以让你們去做工了，你們再也沒有别的办法掙錢糊口了。是什么东西給資本家这样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他掌握了雇用劳动的一切手段…… 可見，劳动手段是人民的未来賴以建立的基石…… 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的群众运动，只有整个工人階級的全国性运动，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如果你們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在各行各业，分散到单个地区去进行斗争，你們就可能遭到失败；如果你們进行全国規模的斗争，你們就一定取得胜利。”³⁶⁰

接着，乔治·考威尔先生以十分贊許的措詞拟出了一个受到約翰·馬修斯先生支持的建議，建議对厄內斯特·琼斯來訪普雷斯頓以及他对工人階級事业作出的劳績表示感謝。

工厂主們花了很大力气阻撓厄內斯特·琼斯訪問普雷斯頓；有他参加的群众大会找不到會場，因此不得不在曼彻斯特登廣告，通知群众大会在露天举行。一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拚命散布謠言，說琼斯先生反对罢工并在工人中間制造不和；此外，还四处寄恐嚇信，說琼斯的普雷斯頓之行对他本人可能不大安全。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1 月 2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93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繁榮。——工人問題

1853年11月15日星期二于倫敦

“經濟學家”以“商業報告和金融市場”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力求證明存在着普遍繁榮和商業發展的有利前景³⁶¹，雖然同一期還報道，“糧食儲備量大，而糧價仍然上漲”，“小麥每夸特的價格快達到80先令”，“棉花貿易的情況並不能激起工廠主們任何復工之意”。至於進口資料統計表，“經濟學家”寫道：

“在這一串數字中有許多有教益的東西，有許多能證實作為激烈政治鬥爭的對象的偉大原則的東西，有許多能解釋不久前金融市場發生的事件並闡明未來前景的東西；有許多對國家活動家、金融家、銀行家和商人極有教益的東西，他們從這些數字中將有可能準確地認清目前形勢並正確地判斷自己的未來。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幫助就是讓大家注意這些報告列舉出來的某些基本事實和探討它們同當前其他最重要的特點的聯系。”

讓我們坐到這位預言家跟前來領教領教他那嚶嚶嚶的預言吧。這次引用進口資料統計表要證明的不是工人階級的浪費行為，而是這個階級由於貿易自由而得到的空前福利。我們就來看看這些統計表吧。

統計表一
1月5日至10月10日的消費量

	1852年	1853年
可可.....	2 668 822 磅	3 162 233 磅
咖啡.....	25 123 946 磅	28 607 613 磅
茶叶.....	42 746 198 磅	45 496 957 磅
糖.....	5 358 967 公担	5 683 228 公担
烟草.....	21 312 459 磅	22 296 398 磅
酒.....	4 986 242 加侖	5 569 560 加侖

只要浏览一下这个统计表，马上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的论断是虚假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列商品的全部情况并不是像统计表所指出的，它们已被消费掉，而是说这些商品已经上市供应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概不会有这样无知的店主，连运进他店里的商品储备量与那些已经真正卖给了居民并被居民消费掉的商品量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吧。

“经济学家”写道，“这份一览表可以看做工人阶级消费的主要奢侈品的清单。”

下面“经济学家”还把这些奢侈品进口的增长也算在工人阶级的账上。其实，像咖啡这种东西，在英国工人中的消费量小到了极点，而酒他们根本就不消费。也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老板们1853年比1852年消费了更多的酒和咖啡，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得到改善了吧？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产生，是由于对未来感到忧虑，而不是由于现在的日常需要。至于糖，截至1852年10月的进口量与截至1853年10月的进口量之间的总差额只不过是324 261公担；这里我不打算和无所不知的“经济学

家”杂志較量知識的淵博，这家杂志当然曉得，这 324 261 公担中沒有 1 公担滯留在店主的地下室中或用于上等階級的糖果点心，这些糖一定全部都叫工人沏茶了。既然面包貴，工人們当然让他們的孩子多吃了一些糖，——瑪丽-安东尼达在 1788 年饥荒时期还曾建議法国人民吃杏仁点心哩。至于烟草的进口增加，那末，随着工人們的失业和他們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他們对烟草的需求量确实是在不断增长着。

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决定了 1853 年 10 月进口的商品量的，并不是这个月的实际需求量，而是根据国内市場上完全不同的情况估算出来的需求量。第一个統計表及其“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系”，情况就是这样。

統計表二

1月5日至10月10日輸入

	1852 年	1853 年
熏 肉.....	62 506 公担	173 729 公担
腌牛肉.....	101 531 公担	160 371 公担
咸猪肉.....	77 788 公担	130 142 公担
火 腿.....	6 766 公担	14 123 公担
脂 油.....	14 511 公担	102 612 公担
共 計.....	263 102 公担	580 977 公担
大 米.....	633 814 公担	1 027 910 公担
馬鈴薯.....	238 739 公担	820 524 公担
谷物和面粉.....	5 583 082 夸特	8 179 956 夸特
干 酪.....	218 846 公担	294 053 公担
奶 油.....	205 209 公担	296 342 公担
蛋 类.....	89 433 728 个	103 074 129 个

无疑是“經濟学家”杂志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偉大的发现：即

在旱災和必不可免的饥荒年份食品輸入比常年有相对的增长，与其說是证明这些产品特別减产，倒不如說是证明消費量突然增加。某些物品出乎意料的漲价，无疑是进口奖励金。但是，难道誰曾断言过，消費品愈貴，就愈能找到热心的消費者嗎？現在我們看看第三类进口商品——工厂原料：

統計表三

1月5日至10月10日輸入

	1852年	1853年
亚麻.....	971 738 公担	1 245 384 公担
大麻.....	798 057 公担	788 911 公担
生絲.....	3 797 757 磅	4 355 865 磅
拈絲.....	267 884 磅	577 884 磅
棉花.....	6 486 873 公担	7 091 999 公担
羊毛.....	63 390 956 磅	83 863 475 磅

既然 1853 年的生产大大超过了 1852 年的生产，所以需要的原料也就更多，輸入和加工的原料也就更多。

可是，“經濟学家”沒有断言，1853 年剩余的工业产品都供国内消費了。它把这些剩余产品归之于出口：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們的出口有巨大增长。截至 10 月 10 日止，只不过一个月，出口价值增长額就不下 1 446 708 英鎊；在 9 个月中这一价值的增长額总共达 12 596 291 英鎊；今年的出口总值是 66 987 729 英鎊，而在 1852 年相应的月份中是 54 391 438 英鎊…… 单以不列顛生产的商品出口計算，我們这一年的增长不少于 23%。”

但是，这些价值 12 596 291 英鎊的增多的出口商品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出口商品中相当大一部分尚在运往市場的途中”，而这些商品到达那里，正好使这些市場彻底混乱。“这些增多的出口商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运往澳大利亚”，那里本来就已商

品充斥了；“运往合众国”，那里现在就已商品过剩了；“运往印度”，那里正处于萧条状态；“运往南美洲”，那里根本就吞不下什么在别的市場上找不到銷路的增多的进口商品。

“經濟学家”写道，“大量輸入并消費掉的增多的商品，英国已經付过了款，或者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按购买这些商品的到期期票付款…… 但究竟什么时候把出口商品的錢付給我們呢？过6个月，过9个月，过12个月，某些商品要过一年半或两年。”

“經濟学家”声称，这“只不过是時間問題”。多么荒謬！

如果你們把这一大堆剩余工业品投入已經为你們的出口商品所充斥的市場，那末你們所期待的时刻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你們統計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想財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損失的清单，成为世界範圍的破产的清单。統計表三和成为这种吹牛对象的出口統計資料究竟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們每个人早就意識到的情况，即大不列顛的工业产值在1853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超过了常規，它的扩大的趋势正是在市場紧縮的时候日益加强。

当然，“經濟学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結論。

它對我們說：“金融市場的困难和利率的提高，只不过是大宗进口商品要馬上付款、而大量剩余出口商品除銷所产生的暂时性的后果。”

在“經濟学家”看来，金融市場的紧张状态只不过是增多的商品出口的結果。可是我們也可以同样有权利說，最近这几个月来出口的增加只不过是金融市場困难的必然結果。这些困难发生的同时，还出現黃金流入和外汇行市不利的情况；但是，难道不利的外汇行市不是国外期票奖励金嗎，換句話說，不是出口奖励金嗎？正是由于这个規律，英国在它的金融市場发生困难的时期就使世界所有别的市場混乱起来，并且周期性地破坏別国的工业，用低价

出售的英国工业品去轰击別的国家。

“經濟学家”好容易找到了工人們根本不对、根本应该受到指責和根本愚蠢的“两点”。

“第一，他們投身于爭論的起因在絕大多数場合只不过是出于可怜的几文錢。”

为什么他們会这样呢？让“經濟学家”自己来回答这个問題吧：

“爭論的性质改变了：爭論由关于合同的問題变成了爭取政权的斗争……

第二，工人們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是根据那些不負責任的，甚至可能完全是自封的領袖們的指示行动…… 他們利用組織起来的蛮不讲理的俱乐部統一行动…… 工人階級本身的政治信念不会引起我們的不安，但是，有些人，工人階級讓他們把自己誘入圈套并讓他們代表自己講話，这些人的信念的确引起我們的不安和抗議。”

工人們建立他們自己的階級組織，用以回敬他們的老板們的階級組織的建立。而“經濟学家”却向工人們說，如果他們要自己的將領和軍官們辞职并采取匹馬单枪进行斗争的决定，它就不再“感到不安”了。在法国革命最初几次搏斗时期，北方的联合起来的专制君主的喉舌有时就与此一模一样，也想使全世界相信使他們“感到不安”的不是法国人民本身，而是殘暴的 Comité du Salut Public〔社会拯救委员会³⁶²〕、蛮横无理的俱乐部和不守本分的將領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我曾对“經濟学家”杂志指出，工人階級不利用繁荣时期来受教育并使他們的子女受教育是毫不足怪的。現在我可以告訴諸君下面的事实（在我所得到的消息中这些事实的人名和細节都有，并且这些事实很快就将提交議會）。在18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离……4英里的……城，在一个叫

做……的为……先生所有的布匹漂白和最后加工的企业中，我們提到的这些人一連干了 60 个小时，而休息一共只有 3 小时！

姑娘和女孩	年齡
姆·斯·	22 岁
阿·布·	20 岁
姆·布·	20 岁
阿·赫·	18 岁
克·恩·	18 岁
布·斯·	16 岁
特·特·	16 岁
阿·特·	15 岁
姆·赫·	15 岁
赫·欧·	15 岁
姆·耳·	13 岁
布·布·	13 岁
姆·欧·	13 岁
阿·特·	12 岁
克·欧·	12 岁
斯·布·	10 岁！
安·布·	9 岁！
男 孩	
伍·赫·	9 岁
季·克·	10 岁

9 岁和 10 岁的小孩一連工作 60 个小时，一共只休息 3 小时！让老板們再不要提工人輕視教育吧！上面提到的安·布·，是一个只有 9 岁的女孩，在 60 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当别人把她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强迫她繼續干活！

看来，工厂的工人們决定要从曼彻斯特騙子手們的手中把爭取教育的运动夺过来。据称，在市公园举行的普雷斯頓失业者群

众大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瑪格丽特·弗列特切尔太太提醒与会者注意：已婚妇女們丢下自己的子女和不管家务而到工厂做工是不正常的。每个工人都有权利得到合理工作日的合理工資，而这一点，她以为，就意味着工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这种报酬使他有可能很好地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让妻子留在家中履行家庭主妇的責任并教育子女(鼓掌)。发言人結束了她的讲话，并提議通过下列決議：

會議決定：城內所有已婚妇女打算不上工，直到她們的丈夫得到合理的、全部的劳动报酬为止。

艾恩·弗列特切尔太太(前一个发言人的姐妹)贊成这一決議，于是決議被一致通过。

大会主席宣布，在工資增加 10% 的問題解决以后，关于工厂使用已婚妇女的劳动問題將展开我国工厂主們未必意料得到的鼓动工作。”

現在在各工业区訪問的厄內斯特·琼斯正进行爭取成立“工人議會”的鼓动工作³⁶³。他提出一个建議，希望

“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都到运动的中心郎卡郡的曼彻斯特去开会，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工人階級的观点十分有权威和通俗易懂的表达，全世界都会听见，而在圣斯蒂凡召开的會議³⁶⁴也将不得不与这个議會共同占有报纸的篇幅…… 在現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全世界都将比倾听最高傲的議會中尊貴議員的話更加注意地倾听这些代表中最謙遜的代表的话”。

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晨邮报”叫嚷：“說句私下的話，被人大吹大擂的运动实际上已經停止了发展，并且在 4 月 10 日慘敗以后，再也沒有采取进一步的尝试来使工人們成为立法者或使裁縫們成为护民官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1 月 3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3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洪堡号”輪船带来的战場消息证实了早些时候从“欧罗巴号”輪船得到的报道：在沃耳特尼察附近长时间扼守障地、艰苦奋战、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土軍，终于在11月14日左右退过了多瑙河，占领了自己在土尔图凱附近原先的筑垒障地。这一事件，等报纸和信件到来之后就会明朗化，目前我们对这一机动的意图还不十分清楚。官方消息說，这次机动沒有遇到阻碍，因而，如果俄軍司令官已集結比第一次多一倍的兵力再次攻击这个据点的說法得不到证实，那末土軍进行这次机动似乎是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获得了什么决定性胜利的假設就不能成立。只要仔細分析一下我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可以看出，哥尔查科夫实际上沒有45 000人的兵力来实现这个目的。还有人說，土軍重新退回土尔图凱，是为了避免冬季在沃耳特尼察受到突然襲击的危險，因为冬季要退过河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这种說法与土軍一直采取攻势，未遭失敗，而且在数量上占絕對优势的事实有矛盾。此外，土軍的左翼仍在維丁附近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甚至还不断得到援軍，这种情况证明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证明土軍实行总退却。即使考虑到土軍可能企图以强大兵力在布来洛夫或加拉茲渡过多瑙河（这一假設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仍然不明白，奥美尔-帕沙仅仅由于准备采取坚决的机动以另一支部队来对付俄軍左

翼，是否需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沃耳特尼察附近的坚固障地。不过，只要我们把这次战局开始以来的各种事件加以剖析，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土军得以在维丁和土尔图凯两地渡河，而且未遇到严重抵抗。这毫不足怪，因为战争经验证明：要阻止积极行动的敌人过河，甚至很宽的河，是不可能的；此外，趁敌军部分兵力已经过河时对它攻击，即当敌军只有一条拥挤不堪的退却道路时以优势兵力对它袭击，总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土军在多瑙河北岸巩固下来了，他们在各次小规模战斗中都占上风，他们守住了离布加勒斯特不到40英里的沃耳特尼察达10天之久，而俄军不能把他们逐出这一重要障地，最后土军毫无阻碍地主动放弃了这一障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对俄土两军在该地区对峙的兵力对比的判断有重大的差误。

土军拥有多少兵力，我们知道得相当准确，而俄军的人数一直是凭猜测。消息说，俄军有两个军渡过了普鲁特河，紧接着又有一个军的部分兵力渡河。如果是这样，俄军在多瑙河各公国的兵力大概不下15万人。然而，现在，当事实也表明俄军在瓦拉几亚没有这样多军队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维也纳得到了有关俄军在瓦拉几亚的实有兵力的可靠情报。俄军的兵力如下：

1. 由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第四军包括以下3个步兵师：

(1)第十师(由索伊蒙诺夫将军指挥).....	16 000 人
(2)第十一师(由巴甫洛夫将军指挥).....	16 000 人
(3)第十二师(由利普兰迪将军指挥).....	16 000 人
(4)1个猎兵营.....	1 000 人
 2. 第五军第十四师由恩格尔加尔特将军指挥的1个旅..... 8 000 人
-
- 步兵共计..... 57 000 人

3. 由尼罗德將軍和費希巴赫將軍

分別指揮的 2 个輕騎兵师·····	8 000 人
10 个哥薩克团 ·····	6 000 人
—————	
共 計·····	14 000 人

4. 1 个炮兵师(大致按 1 个步兵团有 1 个

炮兵連,每連有炮 12 門) 共計·····170—180 門炮。

还弄清楚了：利迭尔斯將軍指揮的第五軍甚至还没有在敖德薩集中，而是一部分在塞瓦斯托波尔，一部分在高加索；奧斯坦-薩肯將軍指揮的第三軍还在沃倫，至多也不过刚刚渡过普魯特河，最早要在三四个星期后才能到达战区；而俄軍的預备队騎兵(大部分是重騎兵)还在德涅泊河以东，要五六个星期才能把他們調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消息是絕對正确的，如果我們在 6 个星期以前得到这些消息，我們就会断言，奧美尔-帕沙应当渡过多瑙河，在哪儿渡和怎样渡无关紧要，只是越快越好。

可是对俄軍的輕率冒險行为，的确不可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把約 8 万人的軍隊帶到瓦拉几亚这样的 cul de sac [死胡同]，并留在那里好几个月，同时，正如俄国人自己承认的，还有 15 000 个病員在醫院里，又由于得不到补充，只有靠碰运气，——这样的行动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以前誰也沒有理由料想到一向謹慎、从不冒險的俄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要知道，在瓦拉几亚的俄軍除了独立行动的一些部队以外，适于作战的部队总共不过 46 000 人，何况許多不同的地点都需要他們呢！

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我們只能解釋，这是由于俄国人絕對相信他們在英国政府內的朋友們的外交陰謀得逞，由于他們毫无根据地輕視自己的敌人，由于他們企图在距离帝国中心这样远的地区

集中重兵和储备大量物资时显然遇到了种种困难。

另一方面，土军在小瓦拉几亚的卡拉法特现有 25 000 人，而且还在继续向那里增援。关于这些部队最近调动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看来，他们甚至还没有推进到克拉约瓦，直到现在，全部行动仍限于占领附近村庄。什么原因，也不清楚。我们只能假设，奥美尔-帕沙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的限制，该会议起初曾把这 25 000 人集中在索非亚。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根据我们在这样远的地方所能作的判断，这些部队只要还在卡拉法特，就完全无用，而且在那里驻守就是个错误，因为，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即使打算用他们对付塞尔维亚（很少可能），他们驻在那里的人数不是太多，就是太少^①。我们认为，把他们调往多瑙河下游会合适得多，因为他们于 10 月 28 日渡河，到 11 月 15 日还很少前进，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本来这 15 天的时间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把这些部队向多瑙河下游调 150 英里到西斯托夫，在那里与土军主力的左翼建立直接联系，再由此经过几日行程到达土军左翼司令部的所在地鲁舒克。如果能使这 24 000 人与主力会合，他们的作用要比在卡拉法特大一倍，这是无疑的。事件本身就证实了这一意见的正确性，正如前述，我们不知道这些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后的 19 天内对奥美尔-帕沙有什么积极的支援。

土军在尼科波尔和鲁舒克附近进行的攻击只不过是佯动。看来，这些攻击进行得不坏，不仅使用了为这一目的所绝对必需的兵力，而且有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进攻者的真正意图的坚决精神。

^① 見本卷第 515—516 頁。——編者注

主要的攻击是在沃耳特尼察进行的。調往該地的兵力究竟有多少，現在还不知道。有消息說，早在 11 日那天，土軍在沃耳特尼察就有 24 000 人，而与其对抗的俄軍則有 35 000 人。但是，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俄軍真比土軍多三分之一，他們就会立刻迫使土軍退过多瑙河，事实上 11 日是俄軍失敗的日子。

看来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以設想，只有異常拙劣的軍事指揮才会妨碍土軍把哥尔查科夫逐出瓦拉几亚。但是双方都显示了极为独特的軍事指揮。土軍于 11 月 2 日在沃耳特尼察这个显然是主要的渡河地点渡过了多瑙河，并于 3 日、4 日、5 日順利地击退了俄軍的攻击，从而巩固了在多瑙河北岸的优势。在这三天中，他們的援軍应当开到，以便使他們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拿破侖就这样做过，而且此后每个軍事长官都知道，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軍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襲击。正如在商业上說“時間就是金錢”一样，在战争中可以說“時間就是軍队”。但是在瓦拉几亚，这个道理却被忽視了。土軍平靜地扼守沃耳特尼察达 9 天之久（从 6 日到 15 日），除小規模战斗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俄軍有足够的時間来集中兵力，进行部署，尽可能周密地考虑一切問題，而且在退路受到威胁时采取消除威胁和保障这些退路的措施。不过，也許我們應該这样来推測：奥美尔-帕沙只是想将俄軍拖在沃耳特尼察，一直到他的主力在多瑙河下游渡河，并且完全切断俄軍的退路。这样做是可能的，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除在卡拉法特的 24 000 人和在沃耳特尼察的 24 000 人外，还需要在多瑙河下游希尔索瓦地区有 5 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如果奥美尔-帕沙在那里有这么多軍队（这完全可能），这支軍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時間，而不把時

間消耗在所有这些故作巧妙的机动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使7—8万人馬上在布来洛夫附近渡过多瑙河，并一举截断俄軍在瓦拉几亚的交通綫呢？如前所述，看来他現在打算实现这一机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机动拖延这样久，而且还要在事先进行这样复杂的准备？在拥有了已在作战綫上作好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优势兵力以后，迷惑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行动就未必有什么意义了。应当馬上切断他的退路，消灭他的軍隊。

至于土耳其兵士，他們在到目前為止所参加的几次小規模战斗中都表現得很好。炮兵处处表明，沙皇尼古拉把他們列为欧洲勁旅之一并非过誉。一个在軍事行动开始前10个星期才組成、并以剛从法国得到的米涅式步枪装备起来的猎兵营，在这一短時間內已能十分熟练地在散开队形中进行射击，并培养出善于掌握这种威力很大的武器的第一流射手；他們在沃耳特尼察得到了以实际行动显示本領的机会，几乎击毙了俄軍的全部高級軍官。土耳其步兵看来大体上都很好地掌握了成橫队和成纵队运动的一般方法，此外，在沃耳特尼察的多次攻击中都表現了高度坚定和勇敢的精神；要知道，在沃耳特尼察的3天战斗中，至少有两天是由土耳其步兵的攻击来决定战斗結局的，而且是以白刃格斗来决定的；而当一用上刺刀时，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俄国步兵就是不可輕視的对手。

根据最近的报道来看，亚洲的情况对土耳其人來說比在欧洲更見好轉。有消息說，切尔克斯各部族发动了反对俄国人的普遍起义，他們联合行动，不仅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門，而且切断了沃龙佐夫伯爵后方的交通綫，而此时土軍則从正面向沃龙佐夫进逼。于是，沙皇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处失敗。我們期望这种情况就这样

繼續下去，让战争教会俄国人和他們的政府收斂一下自己的野心和驕橫，并促使他們从今以后只管自己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3 年 12 月 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4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
高尚意識的騎士³⁶⁵

卡·馬克思寫于 1853 年 11 月
21—28 日左右

1854 年 1 月于紐約以單行本刊印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單行本

Der Ritter

von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von

Karl Marx.

卡·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

第一版的扉頁

小型战争（見德克尔“小型战争論”³⁶⁶）的英雄可能沒有高尚身分，但他倒是有高尚意識。按黑格尔的說法，高尚意識不可避免地要轉化为卑鄙意識³⁶⁷。为了說明这个轉化，我举一身兼扮隱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的維利希先生的吐露为例。我只談談 cavaliere della ventura [冒險騎士，雇佣軍首領]；至于拥戴他的 cavalieri del dente [寄食騎士]，我就讓他們听自己的命运摆布了。

为了从剛一开始就使人感觉到高尚意識的特色是用“普通的”謊言表达“高超的”真理，維利希先生对我的“揭露”³⁶⁸的答复是用下面的話开始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在‘新英格兰报’和‘刑法报’上刊载了关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

我从来沒有在“刑法报”上刊载关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大家知道，我在“新英格兰报”³⁶⁹上刊载过“揭露”，而維利希先生在“刑法报”上刊载过希尔施的自供^①。

在“揭露”第 11 頁上談到：“从在維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維利希—沙佩尔派对罗伊特的破門行窃的行徑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魯士警察当局手里。”这一段在第 64 頁也簡要地重复过³⁷⁰。

① 此处可参看本卷第 44—48 頁。——編者注

維利希先生回答說：“馬克思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些文件大部分是偽造的，而部分是凭空虛構的。”

大部分是偽造的，就是說，不完全是偽造的。部分是凭空虛構的，就是說，不全部是凭空虛構的。可見，維利希先生承認，在羅伊特行竊之後，以及在此之前，屬於他的集團的文件，已通過某種途徑落入警察當局之手。我要肯定的正是這一點。

總之，維利希先生之所以高尚，就是因為能在可靠事實後面嗅出虛假意識。“馬克思先生知道”。維利希先生從哪里知道馬克思先生所知道的事情呢？上述文件中有一些我知道是真的。但是，我却不知道其中哪一個文件在庭審時被認為是偽造的或是凭空虛構的。我照理應該知道得“較多”，因為，據說“維利希近旁的友人中有一個勃魯姆”是“馬克思的情報員”。總之，勃魯姆^①是在維利希近旁開放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同我更遠了。我与勃魯姆從未談過話，甚至這方面的暗示都沒有^②。我只知道勃魯姆的出身是俄國人，職業是皮鞋匠；他還以莫里遜的身分出現，大力推銷維利希的莫里遜氏丸，現在大概在澳大利亞³⁷¹。關於維利希-金克爾派傳教士的活動，我是從馬格德堡得知的，而不是在倫敦。因此，高尚意識本來是可以免除一次非常疼痛的手術，不必僅僅根據有嫌疑這一點而當眾侮辱自己的一個懺悔者的。

高尚意識先是自欺欺人地硬說我有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情報員；然後它又同樣自欺欺人地否認我所引用的一封真信。它引用了“‘揭露’第69頁注A³⁷²，貝克爾的一封信中的一段”。

① 雙關語：Blum——姓；«blume»——“花”。——編者注

② 原文是翻譯不出的雙關語：«durch die Blume sprechen»——用暗示、譬喻說話。——編者注

維利希先生太高尚了，竟然不能設想像貝克尔这种“具有如此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会认不清像維利希这种人身上的高超精神和性格。因此，他把貝克尔的信变成假信，而把我变成伪造者。不言而喻，这是出于高尚。但是，假信总还在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手中。在审判时我把它寄给了科倫的辯护人，因为它駁斥了貝克尔参予維利希的蠢举的說法。除了信是貝克尔亲手所写之外，科倫邮局和倫敦邮局的邮戳表明了发信和收信的日期。

“但是，在此之前金克尔夫人写給我〈維利希〉一封詳細的、訂正了所有事实的信；貝克尔在科倫担任了轉寄工作。他告訴她信已轉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見。誰隱藏了这封信：馬克思先生，貝克尔，还是邮局？”

維利希证明这与邮局无关。可能是貝克尔？但是当貝克尔处于自由状态时，維利希却不想去向他质問。因此，剩下的就是“馬克思先生”。維利希先生又玩弄他所固有的背后搞鬼的伎俩，把事情說成这样：我公开了貝克尔**不是**写給我的信件，隱藏了他托我轉寄的信件。但是，遺憾得很，貝克尔是最客气的，**从来**不麻煩我轉寄信件，無論是轉寄約翰娜太太的信还是轉寄約翰·哥特弗利德先生^①的信。不管是獄官，或是暗檢室³⁷³，都无碍于就这个无足輕重的問題去問貝克尔。維利希先生說謊說糊塗了：他捏造这种卑鄙的誹謗，竟是出于一种純洁动机，即鼓励美德，表明善人之間、金克尔派和維利希派之間的同德心同德胜过了恶人散布敌意的任何方术。

“……无产階級內部各党派之間，馬克思派和維利希—沙佩尔派——根据馬克思先生而不是我所給予的名称——之間的关系。”

① 戏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他的妻子約翰娜·金克尔。——編者注

高尚意識要用別人的倨傲來證明自己的謙虛。所以，它把“科倫起訴書所給予的名稱”(見“揭露”第6頁³⁷⁴)變為“馬克思先生所給予的名稱”。由於同樣的謙虛，它把我談過的(見1. c.^①)某一個秘密的德國團體³⁷⁵內部各派之間的关系變為“無產階級本身內部各黨派之間的关系”。

“當1850年秋天泰霍夫來到倫敦時，馬克思委託德朗克寫信給他自已，即馬克思，說什麼泰霍夫對我做了極端鄙視的評論，這封信宜讀了。泰霍夫來到了；我們作為男子漢大丈夫，彼此開誠布公地談了一下；原來信中的傳言是臆造的！！”

當泰霍夫來到倫敦時，我委託德朗克寫信給我，我收到信，宜讀了它，然後泰霍夫來到了。consecutio temporum〔時間順序〕的不对頭反映了高尚意識的張皇失措，因為他企圖在我、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來到之間建立虛假的因果联系。在德朗克的信中——順便提一下，這信是寄給恩格斯而不是寄給我的——被指控的地方原話是這樣的：

“今天我使泰霍夫有點折服，儘管這一次我還是頭一遭和他以及和席利——席利當時在倫敦——發生激烈的爭論；後來，泰霍夫不止一次地聲明，對濟格爾的攻擊是維利希個人的花招，此外，他否認維利希有任何軍事才能。”

可見，德朗克所說的不是泰霍夫做了一般的極端鄙視的評論，而是他對維利希先生的軍事才能做了極端鄙視的評論。因此，泰霍夫即使說某某東西是臆造的，這也決不是指德朗克信中的傳言，而是高尚意識關於德朗克傳言的傳言。泰霍夫在倫敦並沒有改變他在瑞士所發表的關於維利希先生的軍事才能的意見，雖然他可

① loco citato——上述引證之處。——編者注

能改变了他对这位伪修道者的其他看法。由此可見，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的到来同我的关系仅限于我宣讀了德朗克的信；我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應該宣讀所有信件。例如，宣讀过卡尔·布龙的信，他在信中也嘲笑了維利希的軍事才能。那时維利希先生已經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布龙写的。但由于布龙与泰霍夫不同，他还没有到澳大利亚去，所以，維利希先生就很有預見地不提“我的策略的这一范例”。再例如，我曾經不得不宣讀罗特哈克尔的信，信中写道：

“我願意屬於其他任何支部，但是我**决不願屬於**这个支部（即維利希的支部）。”

他讲到：仅仅是由于反对維利希关于“引人注目的普魯士武装”的观点，就給他带来了多么不幸的后果。維利希的一个帮手

“要求立即把他开除出盟，而另一个帮手則主張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罗特哈克尔是怎样入盟的，說这事**很可疑**”。

維利希先生已經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罗特哈克尔写的。但由于罗特哈克尔不是在墨尔本附近寻找黄金，而是在辛辛那提办报纸，所以維利希先生又认为这另一个“我的策略范例”也是不宜公諸于世的。

高尙意識的本性是一向自我陶醉，并且到处认为自己已得到公认。因此，如果它碰到有人对它的自我欣賞不表同意，如果泰霍夫否认它的軍事才能，罗特哈克尔否认他的政治才能，或貝克尔称它簡直是“蠢材”，那末，它就要武断地說諸如此类的反自然的事实是由于阿利曼即馬克思和恩格斯与奥尔穆茲德即維利希之間存在着策略矛盾，据此，高尙意識就醉心于最卑鄙的勾当，企图苦思出，引伸出，臆想出这种虛构的策略的秘密。我們看到了，正如黑格尔

所說，這種意識是如何不在崇高的東西上下工夫，而在最卑鄙的東西，即自己身上下工夫。

維利希先生勝利地高呼：“這就是馬克思先生的策略的幾個範例。”

“當居于倫敦的、當年曾起過相當顯著作用的革命活動家送來請帖邀請我們參加會議時，馬克思、恩格斯與我之間的第一個矛盾便暴露出來了。我想赴會；我要求：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黨的立場和組織，但是，關於流亡者中間的內部爭執的 *éclat* [消息] 不應超出這些人的範圍。我居于少數派；邀請被拒絕了，於是從這一天起，就開始了倫敦流亡者內部的令人討厭的內訌，內訌的後果至今還存在，儘管這些內訌在公論中已經顯然地失去任何意義。”

維利希先生作為一個戰時的“游擊隊員”，認為他在和平時期的使命也是從一個黨派轉到另一個黨派^①。他懷抱著高尚的聯合願望而居于少數派，這完全符合真情。但是這種招認聽起來令人感到特別幼稚，因為維利希先生後來竭力散布流言，似乎流亡者從自己的幫會中把我們開除了。而在这里，他就承認了我們從我們中間開除了這幫流亡者。這就是事實。而事實還有自己的變容哩。高尚意識需要證明，只是阿利曼妨礙了他去完成高尚的事業，妨礙了他去預防流亡者遭到的種種不幸事件。因此，它又得造謠，純粹像福音書編者那樣地去歪曲世俗的編年史（見布魯諾·鮑威爾“復類福音作者”³⁷⁶）。阿利曼——馬克思和恩格斯——聲明退出大磨坊街工人協會，並在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聲明與維利希決裂³⁷⁷。從這一天起，他們就避免參加任何公開組織、游行和示威。總之，是從1850年9月15日起的。1851年7月14

① 雙關語：《parteilöser》有“游擊隊員”之意，也有“任何一個黨派的信徒”之意。——編者注

日，“各派有名望的活動家”被邀請到菲克勒爾公民那里去開會，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動者協會”，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國流亡者俱樂部”。正是從這一天起，即從高尚意識的秘密願望得到滿足時起，才開始了“倫敦流亡者”內部的令人討厭的內訌，正是從這一天起，才開始了“流亡者”和“鼓動者”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在大洋兩岸展開，這是偉大的老鼠與青蛙之戰³⁷⁸。

誰使這架小小的豎琴發出響聲？
那是我吸取振奮人心的詞匯的泉源，
為的是我能夠用鮮明的色彩，
來描畫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戰鬥。

同命運注定要我歌唱的這次戰鬥相比，
一切以往的戰鬥都只是大宴會上的花朵：
因為一切有不可思議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這次光榮的戰鬥中拔劍相鬥。

(博雅多, Orlando innamorato, canto 27
〔戀愛中的羅蘭, 第二十七首歌〕)

這些“令人討厭的內訌在公論中”從來沒有“意義”，它們只是在老鼠與青蛙的私見中才有意義。但是，“內訌的後果至今還存在”。維利希先生之居留美國，就是這些後果之一。從美國匯到歐洲的貸款³⁷⁹變成維利希，從歐洲又回到了美國。他在那里初建的功勳之一就是……成立了某秘密委員會，以便為布爾昂的哥特弗利德和隱士彼得^①保障聖杯³⁸⁰，保障民主黃金，保存它，不讓阿爾諾德·文克里特-盧格³⁸¹和梅蘭希通-隆格奪去。

儘管“高尚人物們”已經各得其所，而且用愛德華·梅因的話

① 戲指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和奧古斯特·維利希。——編者注

來說，所有的人，“直到布赫爾”，已構成一個統一聯盟，但是，不僅在主力軍中，而且在每一個兵營內部，瓦解過程進行得如此迅速，以致鼓動者協會不久便成了一個殘缺不全的北斗星，而流亡者俱樂部雖有高尙意識的聯合力量，但也變成了維利希、金克爾和飯館老板謝特奈爾的三位一體了。甚至三位一體對貸款的統轄權——高尙意識具有如此的吸引力——也歸屬了某種甚至不能稱之為二元論的東西，即歸屬了金克爾—維利希。賴辛巴赫先生是一個過分受到尊敬的人，以致不能繼續作為第三者呆在這個同盟內。他曾有可能在實踐中領教高尙意識的“個人性格”。

高尙意識的與恩格斯有關的一些經歷，也是它所引用的“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我在這裡引用恩格斯本人的一封信。

“曼徹斯特，1853年11月23日。在奧古斯特·維利希先生為了自我辯護而發表於‘紐約刑法報’（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小說中，我很榮幸地被提到。因此，我不得不就這個與我有關的問題正式地講幾句。

朋友維利希把純粹的自擾與純粹的活動混為一談，因而忙來忙去只是為了朋友維利希。他對於有關他個人的一切具有極好的記憶，他簡直有一套卡片，把別人談論他的話，甚至別人在把酒閑談時說過的話全都編了進去，——這一事實對於任何有緣和他認識的人來說，早就不是秘密了。但是，朋友維利希一向都是善于使自己的記憶和自己的一套卡片得到最充分的應用的。隨便什麼細小的曲解，隨便什麼看起來屬於無意的遺漏，每次——當人們重新提起這類小事的時候——都把他變為一場戲劇的主人公，變為某一幅人物圖、某一幅生動圖畫的中心人物。在維利希的小說中，無論是就細節或就整個而言，鬥爭每時每地都是圍繞着白璧無瑕的

并因此遭到迫害的維利希。在每一个单独插曲中，我們在收場時都可看到：威武的維利希发表演說，而他的有罪的敌人則由于感到自己渺小而垂头丧气，痛不欲生。Et cependant on vous connaît, o chevaliers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但是我們仍然看透了你們，无畏又无瑕的騎士們!]

因此，在維利希的小說中，高尚人物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不信上帝的人的过失而受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凱旋时期，因为每一次他都胜利地惩治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每一次新的凱旋都胜过一切以往的凱旋。朋友維利希一方面把自己描繪为受苦受难的基督，以身承受了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伴的罪孽，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描繪为到此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朋友維利希能够同时一人充当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誰能同时演出这两个阶段，誰当然就該被人信仰。

这些自我陶醉的幻想充塞了这个上年紀的单身汉的不眠之夜，对于这些幻想我們早就熟知了；但我們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些特異反应現在仍然通过 1850 年那样的形式流露出来，沒有变化。但是，还是讓我們来談談細节吧。

朋友維利希除了把施梯伯先生及其一伙变为从很久以前迫害蠱惑者³⁸² 时代起就已不存在的某个德国‘中央联邦警察局’的爪牙，并且叙述了一大堆同样神奇的‘事实’之外，还以他慣有的准确性硬說我写了論述 1849 年巴登运动的‘小册子’。朋友維利希曾以罕見的認真态度考究过我的著作的一部分，即其中談到他的那一部分，因此，他清楚地知道，我从未出版过这种‘小册子’。实际上，我只是在‘新萊茵报。1850 年汉堡和紐約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論述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談到从我在普法

尔茨-巴登运动时期的个人經驗中得出的观感³⁸³。在这篇文章中当然也提到朋友維利希，并且正如他所說的，給予他‘非常贊許的評价’，但是，这馬上使他与他通常所固有的謙虛发生了冲突，因为这篇文章好像把他变成了‘为数如此之多的其他偉大的国家活动家、独裁者和統帅的匹敌者’。

从我这方面說，現在使維利希的高尚心灵乐不可支的这种很高的‘評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評价’是：維利希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很不坏的营长，因为他曾任普魯士尉官20年，掌握了这方面必要的知識，他不是沒有能力領導小型的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最后，他还有一个优点，即担任一个600—700人的志願队队长完全能够胜任，而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的高級軍官都是这样一些人，他們沒有任何一般的軍事素养，即使有一些軍事素养，也与他們所居的职位完全不相称。說維利希先生比不管什么大学生、軍士、学校教师或皮鞋匠能够較好地指揮700人，这对于一个在这方面有20年素养的普魯士尉官來說，当然是‘非常贊許的評价’！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 le borgne est roi〔盲人国里独眼称王〕。不言而喻，他担任从屬的职位，負責較少，因而就能比指揮几个师的或担任高級將領之职的‘他的匹敌者’少犯錯誤。誰敢否认，当了‘总司令’而完全沒有能够胜任的济格尔，要当起营长来不也是一个不坏的营长嗎？

而謙虛的維利希——大概是由于我的过失，某些美国報紙因他服役多年而称之为‘將軍’——伤心地埋怨，似乎是我的‘評价’使他也有成为 in partibus^①的將軍的危險，不仅成为將軍，而且有

① 非現實的，海外的；直譯是：“在不信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主教在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头衔上都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成为統帥、國家活動家、甚至獨裁者的危險！朋友維利希想必有非常獨特的想法，認為共產黨對他這個靠攏它的大致過得去的營長和志願隊隊長是 *in petto* [暗地] 給予這樣出色的嘉獎的。

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我只是把維利希當作一個軍人來談的，因為他只有作為軍人才能使公眾感興趣，而在此之後他就成為‘國家活動家’了。如果對他有仇恨，——在他看來，我和我的朋友們對他充滿仇恨，——如果我有興趣給他作個人鑑定，那末講出的插曲就無奇不有了！如果我只談可笑的方面，難道我能放過蘋果樹事件嗎？在蘋果樹下，他和他的伯桑松人³⁸⁴ 曾寧願高歌而死，不願重離德國國土，並且在那裡莊嚴宣誓。難道我能不談邊界上所演的滑稽劇嗎？當時，朋友維利希裝腔作勢地想真個準備實現這一意圖；當時，有一些好心人到這裡來，十分認真地要我去勸說威武的維利希放棄他的決定；最後，維利希集合了隊伍向大家提出問題，他們是不是願意死在德國土地上而不願出去流亡，在長久的共同沉默之後，一個唯一的視死如歸的伯桑松人高呼：‘留在这里！’在此之後，令大家心滿意足的是，大伙兒歸根到底還是攜帶着全部武器和輜重轉移到瑞士境內。最後在輜重上發生的事又是多麼引人入勝的插曲。這件事到目前還是饒有興味的，因為維利希本人正號召半個世界就他的‘性格’發表意見。順便提一下，誰願意知道這方面的詳情細節和其他趣事，只消問問他的300名在當時沒有能為自己找到溫泉關的斯巴達人³⁸⁵ 之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隨時都願意背着有性格的那個人敘述極其丟丑的事。在這方面我有很多的見證人。

關於我的‘勇敢’的事，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令我驚訝的是，那時我在巴登發現，勇敢是一種不值得一談的最普通的品質，僅僅一

种单纯的勇敢并不比单纯的善良意志有价值。因此，常有这样的事，每个单独的人是英雄和勇士，而整整的一营却像一个人一样，逃之夭夭。維利希的队伍向卡尔斯多尔夫的进军就是一例，这次进军在我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时已作了详细的说明³⁸⁶。

維利希硬說，他似乎因此向我宣讀过不可違抗的道德訓条，并且正是在 1850 年的新年之夜。我没有这样写日記的习惯，即标上几句我如何从这一年跨到那一年，所以我不能担保这个日期。无论如何，維利希决沒有宣讀像他在报刊上所闡述的那种訓条。

維利希想使人相信，在流亡者委员会³⁸⁷，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对偉大的人物行为‘不恭’。Shocking〔真可怕呀〕！但是，当維利希这位惩罚罪人的雷公突然对普通的‘不恭行为’束手无策时，这些不可違抗的道德訓条到哪里去了呢？让我认真地去談这些蠢事，大概是沒有必要了。

在施拉姆和維利希之間鬧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會議³⁸⁸上，我似乎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間’，因而这就是通盘策划了这件事。

以前，似乎是馬克思‘唆使’施拉姆，而現在为了多样化，我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經驗的普魯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沒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間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頂好办法。朋友維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訴說——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我們想枪杀他。

我和施拉姆同时离开房間，这十分可能（某种需要使我离开房間，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写入日記）；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从我所保存的当时中央委员会會議記錄中看到，那天晚上施拉姆和我是輪流做記錄的。施拉姆仅仅是被維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

出同維利希决斗，使我們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的行动。維利希在这里又說，似乎他曾經声称：‘施拉姆，給我出去！’事实上是維利希要求中央委员会赶走施拉姆。中央委员会則认为沒有必要滿足他的要求。施拉姆只是应馬克思的个人請求才离开的，因为馬克思希望不要再繼續胡鬧。在我这一边有記錄，在維利希先生一边有他的个人性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維利希先生又說，他在工人教育协会上叙述了流亡者委员会的“不恭行为”并为此而提出建議。

高尙意識叙述說：“当反对馬克思及其一伙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时，我投票贊成中央委员会对問題进行审查。这件事就做了。”

做了什么事？是維利希投票呢？还是中央委员会对問題进行审查？多么厚厚啊！他的命令式的一票把他的敌人从达到最高峰的人民怒潮中挽救了出来。維利希先生只是忘了：中央委员会是秘密团体的秘密委员会，而工人协会却是公开的大众的团体。他忘了，中央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审查的問題由于上述原因是不可能出现在工人协会中提付表决的，也不可能出現一个慈悲人排难解紛的場景，由他充当这个場景中的英雄。朋友沙佩尔会帮助他恢复自己的記憶。

維利希先生把我們从公开的工人协会引到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又从中央委员会引到安特卫普的一場决斗，即他和施拉姆的决斗：

“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軍官陪同下来到奥斯坦德，这位軍官，据他說，是

在匈牙利革命期間轉到匈牙利人這邊的，在決鬥結束後，他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位“前俄國軍官”不是別人，而是亨利克·路德維希·米斯科夫斯基。

我們在發給這位前俄國軍官的證件中看到：«This is to testify, that the bearer Henri Lewis Miskowsky, a *Polish* gentleman, has served *during the late Hungarian war 1848—1849* as officer in the 46th. bataillon of the Hungarian *Honveds*, and that he behaved as such *praiseworthy and gallantly*.

London, Nov. 12, 1853. L. Kossuth, late governor of Hungary»^①.

說謊成性的高尚意識！但目的是高尚的。善與惡之間的对立要用鮮明对照的手法來描繪，让它像一幅生動的圖畫。多么藝術的一幅人物畫呵！一邊是這位高尚人物，身旁圍繞着

“目前在澳大利亞的泰霍夫，那時在流亡中而現在坐在阿爾及爾監獄中的法國驃騎兵上尉維迪爾，以及法國報紙所宣揚的一位最堅決的革命者巴特爾米。”

簡言之，一邊是維利希本人，身旁圍繞着兩個革命的精華；另一邊是施拉姆，他是罪惡的化身，為一切人所不齒；和他在一起的只有一個“前俄國軍官”，這位軍官不是真正參加過而是“據他說”參加過匈牙利革命，並且在決鬥之後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即歸根到底原來是一個魔鬼。接着是藝術性的描繪：美德下榻在奧斯

① “本證件持有人亨利克·路德維希·米斯科夫斯基，波蘭貴族，在1848—1849年匈牙利戰爭期間曾任匈牙利護國軍第四十六營軍官，為人忠勇可嘉，特此證明。

匈牙利前執政者拉·科蘇特，1853年11月12日於倫敦”。——編者注

坦德的一个“头等旅館”內，那里曾住过一位“普魯士亲王”，而罪恶和俄国軍官則“住在私人房子里”。不过，俄国軍官看起来又不完全是“在决斗结束后消失”的，因为根据維利希先生的繼續叙述，“施拉姆和俄国軍官留在小河边”。但是，俄国軍官並沒有像我們高尙的騎士所希望的那样在大地上消失。这从下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来：

“在12月28日‘刑法报’上刊载着維利希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还專門記述了他于1850年在安特卫普与施拉姆的决斗。遺憾的是，这篇記述並沒有在所有各点上都真实地向公众报道。那里談到：‘决斗已經約定，云云，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軍官陪同下来到，云云，他如何如何消失。’这是不真实的。我从来没有为俄国效过力；如果用同样的理由，就可以像叫我一样，把参加匈牙利解放战争的所有波兰軍官都叫做俄国人。从1848年战争开始到1849年战争在維拉戈什全部結束，我一直在匈牙利任职。我也沒有消失得无影无踪。施拉姆从发射地点只挪了半步，就向維利希射击，但沒有命中，于是維利希从自己的位置向施拉姆射击，他的子弹擦伤了施拉姆的头部。在此之后，我就留在施拉姆身边，因为我們那里沒有医生（决斗是維利希先生組織的）；我洗淨了施拉姆的伤口并把它包扎起来，因而我也不去注意到有7个人在离我們不远的地方一面收割干草，一面注視着决斗，而他們对我來說可能是危险的。維利希和他的同伴們急急忙忙跑了，施拉姆則和我从容地留在原地看着他們离去。他們不久就在我們的眼帘中消失。我还應該指出，当我們到达决斗地点时，維利希和他的同伴早就在那里了，他們为决斗量好了距离，而且維利希还为自己选择了一块背光的地方。我叫施拉姆注意这一点，但是他說：‘就让他这样吧！’施拉姆表現得勇敢无畏，十分冷靜。我被迫留在比利时的事实，对于参加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的。关于形式如此独特的这次决斗的更細情节，我不想談了。

亨利克·路德維希·米斯科夫斯基

1853年11月24日于倫敦”

高尙意識的机器开动了。他发明了某个俄国軍官，馬上又使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現在我又一定要代替这个軍官，像薩米爾那樣在戰場上出現了，尽管不是以实体出現。

“次日清晨〈在維利希先生到奧斯坦德之后〉，他〈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国公民〉把布魯塞爾的‘先驅者報’給我們看，上面登載着一篇私人通訊，其中有如下这一段：‘有許多德国流亡者来到布萊頓。从那个城市給我們來信：賴德律-洛蘭和来自倫敦的法国流亡者准备于日內在奧斯坦德与比利时的民主派举行代表會議。’誰能追求称这个思想为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呢？它不是出自法国人，不然，它就太 *à propos* [湊巧] 了。这个荣誉完全屬於馬克思先生，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执行，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創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創造出来的。”

“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国公民”把布魯塞爾的“先驅者報”給維利希先生及其一伙看。他給他們看的是不存在的東西。实际上只有安特卫普的“先驅者報”³⁸⁹。在地形学和年代学領域內系統地歪曲和捏造，是高尙意識的重要职能。只有这样的背景，即理想的時間和理想的空間，才适合于他的理想的作品。

为了证明这个思想，即布魯塞爾的“先驅者報”中的文章“出自”馬克思，維利希先生想使人相信：“它不是出自法国人”。这个思想本来就不会出自某某！“不然，它就太 *à propos* [湊巧] 了”。*Mon dieu* [我的上帝]，为什么維利希先生本人用法語才能够表达的思想就不可能出自法国人呢，我的高尙意識？这里又怎么突然出現了一个法国人呢？維利希、施拉姆、前俄国軍官和布魯塞爾的“先驅者報”跟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高尙意識的思想的傳播器开始高叫得很不是时候，泄露了高尙意識曾 *à propos* [湊巧] 认为必須拋棄一个必要的中間环节。讓我們把这个环节再安装上来吧。

还在施拉姆惹起維利希先生的决斗之前，法国人巴特爾米已

約定与法国人桑让决斗；而后者应该在比利时进行。巴特尔米选择了維利希和維迪尔作助手。桑让启程赴比利时。这时候发生了与施拉姆的冲突。于是，两个决斗定在同一天进行。桑让沒有到决斗地点。巴特尔米在回到倫敦后公开断定，安特卫普的“先驅者报”上的文章出于桑让之手。

在高尙意識把巴特尔米的思想轉移給自己，而把桑让的思想轉移給我之前，它是长久地猶豫了一陣的。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倫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說的，最初，它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发高尙人物回阴曹地府，并且它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經過三思之后，它确定了，慣于运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維利希先生。因此，它便抓住了“不是出自法国人的”思想。

命題：“这个荣誉完全屬於馬克思先生”。**证明：**“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不言而喻，“思想”在我們的无瑕的騎士那里是中性而不是阴性^①〉执行〈执行思想！〉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創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創造出来的”。**因为如果！**好一个**因为如果！**維利希先生为了证明馬克思臆造出“那个东西”，便假定馬克思的一个朋友执行了，或者更确切些說，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Quod erat demonstrandum〔如此就得到所需要的证明〕。

高尙意識說：“如果确定，馬克思的朋友瑟美列把匈牙利王国出卖給了奥地利政府，那末，这就是可靠的证明，云云。”

假定說，确定的适得其反。但是这与本題无关。**假如**瑟美列有了出卖行为，那末，这对維利希先生來說**就是**“可靠的”证明，即

① 在原文中，“那个东西”是中性，“思想”是阴性。——譯者注

证明馬克思是布魯塞尔的“先驅者报”上一文的作者。但是**如果連前提也不确定**,那还是得坚决确定結論,換言之,就是坚决确定:如果瑟美列出卖了圣者斯蒂凡的王国,那末,馬克思就出卖了圣者斯蒂凡本人。

在俄国軍官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維利希先生又出現在倫敦的“工人协会”上,在那里,

“工人們一致譴責馬克思先生”,这位先生“在他退出协会后第二天,倫敦区部全体會議就一致把他开除出盟”。

但是,还在此之前

“馬克思和中央委員會多数派一起做出了关于中央委員會迁出倫敦的决定”,

并且不顾沙佩尔的善意警告,成立了自己的特別区部。根据秘密团体的章程,多数人是有权把中央委員會迁往科倫并暫時开除整个維利希区部的,而这个区部則**无权作出**关于中央委員會的决定。惹人注目的是:高尚意識一向偏爱小小的戏剧場面,在这样的場面里,維利希先生担任大雄辯家角色,而这次却連慘剧、爆发的場面都沒有利用。誘惑力是很大的,但可惜,白紙黑字的記錄摆在那里,它表明:一貫得胜的基督一連好几个小时如坐針毡,啞然无声地听取恶鬼的指控,然后,突然溜走,让朋友沙佩尔去听天由命,只是在正統的“区部”中才重新获得了說話的能力。En passant〔順便提一下〕,当維利希先生在美国一本正經地談論“由于尊重和信任而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协会”是如何美妙时,甚至連沙佩尔先生也认为有必要暫時退出維利希先生的协会。

高尚意識从如此嫻熟的“策略”行为的領域向理論領域上升了一小会儿。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他是繼續提供“馬

克思先生的策略范例”。我們在“揭露”第8頁上看到：“沙佩尔—維利希派（維利希先生引证的是：維利希—沙佩尔派）从来不追求具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他們只有別出心裁地曲解別人的思想的本領”³⁹⁰。維利希先生为了在公众面前摆出他自己的思想儲备，于是便述說小資產階級如果掌握政权就会“創立”“哪些机构”，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最新发现以及对恩格斯和我的观点的反駁。恩格斯和我所写的、被薩克森警察局从毕尔格尔斯那里查获的通告³⁹¹——它曾刊载于最流行的德国报纸，并构成科倫起訴书的根据——非常詳尽地叙述了德国小資產階級的善良願望。維利希的布道詞就是从那里弄来的。让讀者去比較原稿和抄本吧！美德做事是多么醇厚啊！竟在罪恶那里从事抄写工作，尽管也有“別出心裁的曲解”。恶化的風格被从善的願望弥补了。

在“揭露”第64頁上談到，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把組織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組織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³⁹²。維利希先生由于高尚而抛掉了句子的前一段：“不是未来的执政党”，而抓住后一段：“未来的反对党”。他在如此巧妙地把这个句子劈开之后，就证明說，真正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追逐地位的人的政党。

維利希先生出产的另一个“自己的”思想是：高尚意識和它的敌人之間的实际矛盾也可以从理論上表达为“人类之分为两类”，即分为維利希派和反維利希派，分为高尚的一类和高尚的一类。关于高尚的一类，他使我們知道，他們的主要特征是：“他們彼此器重”。当高尚意識不再用它的策略范例来使我們开心时，令人感到乏味就是它的特权。

我們看到：高尚意識是如何歪曲或顛倒事实，或用滑稽的假設

冒充严肃的命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际上**宣布与他相矛盾的一切都是不高尙的，卑鄙的。因此，我們看到，他的整个活动完全可归結为发明卑鄙的东西。这一活动的另一面是，高尙意識把他和世人之間发生的一些实际誤会——不管它們如何有損名誉——变为确证自己高尙的实际证明。对于純洁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純洁的，而敌人如果用高尙意識的所作所为来評价高尙意識，恰好证明了自己是不純洁的。因此，高尙意識用不着**自我辯白**，它要做的只是对迫使它自我辯白的敌人表示道义上的憤怒和驚訝。因此，維利希先生的似乎是**自我辯白**的插曲本来就可以不做，不做也是一样，每一个把我的“揭露”、希尔施的自供和維利希先生的答复比較一下的人，都会深信这一点。因此我只举几个例子来表明高尙意識的人物們是些什么貨色。

尽管希尔施的自供的最初目的是歌頌維利希先生，把他捧作从自己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救星，但是，这个自供比我的“揭露”更甚地有損他的名誉。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希尔施的自供。如所周知，希尔施是普魯士警察当局反对我所屬的党的工具。維利希先生不顾这一事实，却假設希尔施**本来**是我为了“毀掉”維利希的党而委派的。

“很快他〈希尔施〉就和馬克思的某些拥护者，特别是和某某罗赫納一起，开始阴謀活动，企图毀掉协会。因此大家开始注意他。他被揭发了，云云。根据我的建議，把他开除了；罗赫納袒护他，也被开除了…… 希尔施**現在**又开始了反对奧·迪茨的阴謀活动…… 阴謀又被迅速地揭穿。”

根据維利希先生建議把被当做密探的希尔施逐出大磨坊街工人协会一事，是我在“揭露”第 63 頁³⁹³上談的。这种驅逐在我心目中沒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知道，驅逐的原因并不是确凿的事实，

而是猜疑希尔施和我搞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谋活动。现在这一点連維利希先生本人也已承认。我知道希尔施是没有犯这个罪的。至于谈到罗赫納，他曾要求拿出希尔施的罪证。維利希先生回答說，不知道希尔施是靠什么生活的。罗赫納問道，維利希先生是靠什么生活的呢？由于这个“不恭的”責問，罗赫納受到了公意审判，并且因为他不听所有的告誡，不想低头认罪，所以被“开除”。在希尔施被开除以及罗赫納接着他被开除后，希尔施的阴谋活动

“现在主要是反对奥·迪茨，并且串通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前薩克森警探，后者对迪茨提出了指責。”

施泰翰逃出汉諾威的一个监狱到达倫敦后，参加了維利希的工人协会并对奥·迪茨提出指責。施泰翰既非“可疑的”，也非“前薩克森警探”。促使施泰翰对奥·迪茨提出指責的原因是，法院偵查員在汉諾威曾經向他出示了許多他私人的信件，而这些信件是他寄給倫敦的維利希委员会³⁹⁴書記迪茨的。与施泰翰几乎同时出現的有：罗赫納，刚从汉諾威监狱获釋并被驅逐出境的埃卡留斯第二，根据参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事件一案的逮捕令被到处搜捕的吉姆佩尔，以及1848年由于一首革命小詩而曾在汉堡被拘并假装又受到警察当局迫害的希尔施。他們和施泰翰一起組成了某种反对派，并由于在协会的公开辯論会上反对維利希先生的教义而犯了褻瀆圣灵罪。使他們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对施泰翰指責迪茨的答复是維利希开除希尔施。不久他們都退出工人协会并和施泰翰組成一个单独的协会，这个协会也存在了一些时候。他們和我建立联系只是在他們退出維利希先生的协会之后。高尙意識顛倒了年代順序，完全无视施泰翰，拋棄这个必要的、但不怎么令人舒服的中間环节，从而暴露了自己說謊的习性。

我在“揭露”第 66 頁上談到：“在科倫陪審法庭开庭前不久，維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縫的帮工^①充当特派員前往德国”，³⁹⁵云云。

高尚意識憤怒地叫道：“为什么馬克思先生強調这是裁縫的帮工呢？”

我决沒有“強調”这是裁縫的帮工，沒有像高尚人物所做的那样，例如，他強調皮佩尔是“路特希尔德家里的家庭教师”，虽然皮佩尔已由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而失掉在路特希尔德那里的工作去做英国宪章派机关报^②的編委。我只不过是把裁縫的帮工叫做裁縫的帮工。为什么？因为我應該不提他的名字，同时應該向金克尔先生和維利希先生表明，我完全了解他們的特使的人格。因此，高尚意識指責我对所有裁縫的帮工犯了叛国大罪，并对裁縫的帮工高唱品得式的頌歌，以此来爭取他們的选票。高尚意識为了顾全裁縫的帮工的善良名声，寬宏大量地不提埃卡留斯——他談到埃卡留斯时就像談到一只被驅逐的大山羊——是裁縫的帮工，其实，这个职业至今絲毫也沒有妨碍埃卡留斯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的大思想家，絲毫也沒有妨碍他用自己載在“紅色共和党人”、“寄語人民”³⁹⁶和“人民报”上的論文博得甚至在宪章派中的威望。維利希先生反駁我对他和金克尔派往德国的裁縫的帮工的活动的揭露，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現在我談談亨策的事情。高尚意識企图对我冲刺一下来掩护自己的障地。

“順便提一下，他〈亨策〉會借給馬克思 300 塔勒。”

① 奧·格貝爾特。——編者注

② “人民报”。——編者注

1849年5月，我告訴雷姆佩尔先生，“新萊茵報”的財政困難隨着訂戶的增加而增加了，因為開支一定要用現金支付，而訂費總是遲遲來到；除此之外，由於發表了維護巴黎六月武裝起義者的文章以及抨擊法蘭克福議員、柏林妥協派和三月同盟的文章³⁹⁷，幾乎所有股東都逃開了報紙，因而造成了巨大赤字。雷姆佩尔先生讓我去找亨策，他以我的借條為據借給了“新萊茵報”300塔勒。那時亨策本人正被警察當局追捕，所以他認為有必要離開哈姆，於是他就和我一同到科倫去；到了科倫，我就得到關於我被驅逐出普魯士國境的消息。我向亨策借來的300塔勒，我通過普魯士郵局收到的訂戶寄來的1500塔勒，我的一部高速平板印刷機，等等——這一切都用來抵償了“新萊茵報”對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紙商、辦事員、通訊員、編輯部人員等等所欠的債務。沒有誰比亨策先生更清楚地知道這件事，因為他本人曾借給我的妻子旅行包，用來裝她的銀器，送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以便我們能夠弄到私人所需的費用。“新萊茵報”的賬冊保存在科倫的商人斯蒂凡·璫特那里，我可以授權給高尚意識到那里取得這些賬冊的經過正式核對的抄本。

在談了一些離題的話之後，現在言歸正題。

“揭露”絲毫也不認為維利希先生是亨策的朋友以及從亨策那里得到資助是不可解的。它認為不可解的是（第65頁³⁹⁸），在科倫案件接近尾聲時，在普魯士警察當局的警惕性達到頂點並對德國和英國每個稍有可疑的德國人嚴密注視時，亨策竟得到當局的許可，前往倫敦，並在那里毫無阻礙地同維利希會晤，然後又回到科倫來提供反對貝克爾的“假證詞”，要知道，亨策家里曾被搜查並有文件被查獲，他曾被查出在柏林窩藏正在執行一項秘密任務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并且“自认”曾参与同盟的活动。一定的时期使亨策先生和維利希先生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性质；上述的情况理应使維利希先生本人也感到奇怪，尽管他不知道亨策从倫敦用电报和普魯士警察当局联络。这里談的是一定的时期。維利希先生正确地感到这一点，因此他用自己的高尚方式声明：

“他〈亨策〉在审判之前来到倫敦〈这一点我也肯定〉，他不是到我这里来，而是来参观工业博覽会的。”

高尚意識像有自己私人的布魯塞尔“先驅者报”一样，也有自己私人的工业博覽会。真正的倫敦工业博覽会是在 1851 年 10 月閉幕的，而維利希先生說亨策在 1852 年 8 月来“参观它”。席利、海澤和金克尔-維利希貸款的其他担保人都可证实这一情况，亨策先生曾低声下气地請求他們当中的每一个人同意把美国的款項从倫敦轉移到柏林。

还在亨策先生住到維利希先生那里之前很久，他就接到了出庭科倫案件的傳票，但他不是作辯护人一方，而是作为起訴人一方的見证人被傳的。一当我们知道維利希先生指示亨策如何在科倫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貝克尔（“揭露”第 68 頁³⁹⁹）——“具有如此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我們立即就把相应的情报寄給貝克尔的辯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信恰好在訊問見证人亨策这一天到达。他的证詞的性质不出我們所料。因此，貝克尔和施奈德尔就公开質問他与維利希先生的关系。信保存在科倫的辯护人的文件中，訊問亨策的报告发表于“科倫日报”。

我不作这样的推論：**假如**确定亨策先生如何如何，那末**这就是**維利希先生的活动的可靠证明；**因为如果**朋友亨策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創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創造出来

的。这种辯证法我情願让給高尙意識。

但是，我們还是回到維利希先生的本題上来吧：

“为了充分評价这个〈馬克思所采取的〉策略，这里还有几个范例。”

在黑森消极抵抗、普魯士招募后备軍以及普魯士与奥地利之間表面上冲突⁴⁰⁰时，高尙意識恰好准备在德国掀起軍事暴动，方法就是寄送“成立后备軍委员会的簡要方案給在普魯士的某些人”和維利希先生**准备“亲赴普魯士”**。

“正是馬克思先生从自己人那里得知此事后，把我**意图前往**的消息告知了別人，并且后来夸耀說，他用**来自德国的假信件**戏弄了我。”

Indeed!〔确实如此!〕貝克尔寄給我一些維利希的狂妄信件以及他对这些信件的有趣評論，这些信件貝克尔已在科倫公开了。如果我剥夺自己的朋友閱讀这些信件的乐趣，那我就太殘忍了。施拉姆和皮佩尔为了逗趣，曾回信戏弄維利希先生，但回信不是“**来自德国**”，而是通过**倫敦市邮局**寄的。我們的高尙人物加意小心，不把邮戳給人看。他硬說“收到**一封**用伪造的笔迹写的信，并认出它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信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維利希先生“夸耀說”，他发现了据說是伪造的笔迹，并从封封皆真的信件中认出有**一封**是假的，同时他过分高尙了，竟认不出用亚洲式的夸張手法对他个人的頌揚、对他固执思想的非常滑稽的称贊、对他个人奢望的小說式的夸張，都是戏弄。即使維利希先生的出行是經過認真考虑而决定的，那末，阻碍他成行的也不是我“把消息告知了第三者”，而是別人告知了維利希先生本人一个消息。原来，他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揭掉了本来就是透明的外皮。他为自己的虛荣心所驅使，至今还认为那封使他陷于失望的信是

假的，而那些愚弄他的信是真的。高尚意識不是认为，由于自己是有美德的，所以世界上尚能存在的大概是 sect and cakes [愛情和“吃喝”，但不应当有幽默呢？我們高尚的騎士不让公众享受閱讀這些信件的愉快是不高尚的。

“至于談到馬克思所提到的和貝克尔的通信，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

至于談到这种捏造的通信、維利希先生大駕亲赴普魯士的意图和我把这消息告知第三者，那末，我认为寄一份“刑法报”給前尉官施特芬是适宜的。施特芬是为貝克尔辯护方面的見证人，貝克尔曾把自己的所有文件交他保管。警察当局迫使施特芬离开科倫，他現在住在切斯特，在那里教书，因为他属于不高尚一类的人，甚至在流亡中还掙錢謀生。高尚意識是超凡的人，他不靠資本生活，因为它沒有資本，也不靠工作生活，因为它不工作，它是靠社会輿論这种天降食物生活的，靠别人对他的尊敬生活的。因此它才像为自己唯一的資本而搏斗一样为此而搏斗。

施特芬写給我这样一封信：

“維利希非常恼恨您引用了貝克尔信中的片断。他把这封信从而也把那段引文叫做捏造。我現在用事实来駁斥这种荒謬的論断，以使用确凿的证据证实貝克尔对維利希的看法。有一天晚上，貝克尔笑逐顏开地递給我两封信，并且建議我在情緒不佳的时候閱讀；他說它們的內容定会使我解悶，說我由于以往的地位可以从軍事观点予以評判。我反复閱讀了奧古斯特·維利希写給貝克尔的这些信，果然找到了非常滑稽可笑的庄严命令（用相称的普魯士王国的术语來說），在这些命令中大元帅和社会的救世主从英国发出指示：占領科倫，沒收私有财产，建立巧妙地組織起来的軍事独裁，实施軍事社会法典，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他报纸一律禁止，还有许多其他的細节。維利希非常体谅下情，竟答应，如果在科倫和普魯士萊茵省完成了这部分工作，他一定亲自蒞临，以便区分母羊和公羊，审判活人和死人。維利希断言，他的‘簡要方案容易实现，只要某些人

表現出主动精神’，并且說‘它具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誰？〉。为了扩大視野，我很想知道有哪些深謀远慮的‘后备軍軍官’‘后来’向維利希先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也很想知道，在普魯士后备軍集中期間，这些据說是相信‘簡要方案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先生們都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英国，还是在預定的嬰兒出世的地方即普魯士。維利希非常亲切地把嬰兒誕生的喜报寄給了‘某些’人，并且做了描述；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貝克尔、‘具有高超智慧和性格的人’之外，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願意成为教父。有一次維利希派来一位名叫……^①的副官。这位副官給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計，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視事实的人估計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訴他，普魯士軍隊的軍官們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維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們根本无意于 *citissime*〔匆忙地〕宣布成立維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对我就很看不起。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沒有物色到一个那么沒有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軍官书，告軍官书号召軍官們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馬克思奴役的科倫’〈他对我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廢話并散发給許多軍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魯士軍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貞般的秘密。

維利希声称，他决不相信，具有‘貝克尔式的高超性格和精神’的人們会嘲笑他的方案。因此，他把說出了这一事实的話叫做荒謬的捏造。如果他讀过关于科倫案件的报告，——当然，他是理当一讀的，——那末，他就会发现，貝克尔就像我一样，已經**公开地**对他的方案表示了您所发表的那封信中的意見。如果維利希願意得到一个**从軍事观点**对那时情况的正确的描写，而不是根据幻想的灵感对那时情况的描写，那末，我能够在这方面为他效劳。

應該遺憾地指出，在維利希的以往的伙伴中，拒絕按照他的需要对他的軍事天才和他对事物的实际了解五体投地的人，还不仅是魏德迈和泰霍夫。

維·施特芬

1853年11月22日于切斯特”

^①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引用这封信时指出这人是席梅尔普芬尼希，而不是用省略号。——編者注

最后，还是“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

維利希先生离奇地記述了 1851 年 2 月路易·勃朗举行的一次宴会，这个宴会是賴德律-洛兰的宴会的对台戏，同时又是为了抵御布朗基的影响而举行的反示威。

“不言而喻，馬克思先生沒有被邀請。”

不言而喻，沒有。每个人花两先令就可拿到“請帖”，并且过了沒有几天，路易·勃朗就不厌其烦地問馬克思为什么不到。

“随后〈随在什么之后，随在宴会之后嗎？〉就有傳单在德国工人中間散发了，傳单上刊印了未經宣讀的布朗基献詞，还附有嘲笑紀念会的按語，把沙佩尔和維利希叫做瞞哄人民的騙子。”

“未經宣讀的布朗基献詞”⁴⁰¹ 构成了高尚意識的历史的重要部分，而高尚意識充分相信他的話具有最高意义，通常都是断然声明：“我从来也不說謊！”

在宴会后过了沒有几天，巴黎的“祖国报”就刊登了布朗基应紀念会組織者的請求从貝耳島監獄寄来的献詞全文。在献詞中，布朗基用他所固有的清晰的形式痛斥了 1848 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員，特別是宴会的組織者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驚訝地問道，为什么这篇献詞沒有在宴会上宣讀。路易·勃朗立刻在倫敦的“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陰謀家，他根本沒有給紀念会筹备委員會寄来这样的献詞。路易·勃朗、朗道夫、巴特米、維迪尔、沙佩尔等先生和維利希本人，以紀念会筹备委員會的名义給“祖国报”送去一項声明：他們从来沒有收到上述的献詞。但是，“祖国报”在公布这个声明之前，曾問过把献詞全文轉寄給它发表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它把安都昂的回信发表在上述先生們的声明全文下面，安都昂在回信中說，他确实把献詞寄給了

巴特爾米，並且收到了他的關於獻詞已收到的通知。隨後，巴特爾米先生就聲明，雖然他收到獻詞，但是，他認為這篇獻詞不妥，所以把它壓了下來，沒有把這件事通知委員會。但是不幸，還在此之前，聲明簽署人之一，前上尉維迪爾在“祖國報”上寫道，軍人的榮譽感和對追求真理的心情迫使他承認，他和路易·勃朗、維利希以及其他在委員會的第一個聲明上簽了名的人都撒了謊。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是上述 6 個而是 13 個。他們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獻詞，大家討論了這個獻詞，經過長久的辯論之後，以 7 票對 6 票的多數決定不宣讀這個獻詞。他，維迪爾是投票贊成宣讀的 6 個委員之一。

“祖國報”收到了維迪爾的信之後又收到巴特爾米先生的聲明，它的得意可想而知。它發表了這一聲明，並且給它寫了下面的“前言”：

“我們常常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而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在蠱惑民心者身上什麼東西更發達一些，是吹牛還是愚蠢？我們收到的從倫敦來的第四封信，使我們更難回答這個問題。這些可憐蟲在那裡有多少呵！他們是這樣迫切地渴望寫作和看到他們的名字被登載在反動的報紙上，甚至甘心蒙受無窮的恥辱和自輕自賤。公眾的嘲笑和憤慨同他們有何相干——只要‘辯論日報’、‘國民議會報’、‘祖國報’將刊載他們的作文練習就行了。為了得到這種幸福，這個世界主義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由於對寫作的同情心，我們刊載了公民巴特爾米的下面這一封信，這封信是一個新的、我們希望也是最後的證據，它證明從今以後出了名的布朗基獻詞是真實的。他們起初全都否認這個獻詞的存在，而現在卻為了爭着確認這個獻詞的存在，而互相辱罵以至廝打起來了。”

這就是布朗基獻詞的歷史。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流亡者協會] 由於“未經宣讀的布朗基獻詞”而撕毀了與維利希先生的組織的協議。

与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同时, 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 也分了家。它的一部分表现了可疑的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即赖德律-洛兰主义的趋向的会员们声明退出, 并且事后被开除。或许高尚意识告诉了**这个**协会, 像它现在告诉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 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阻撓这个协会的会员投入资产阶级民主的怀抱, 阻撓他们和“所有由同情的纽带联结起来的革命参加者”留在一起吧? 或许高尚意识对他们说, “革命发展观的不同在分裂时没有任何作用吧”? 不, 高尚意识所说的恰好相反, 它说两个协会中发生分裂是由于**同样的**原则性的分歧, 恩格斯、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代表上述德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 就像马迪耶及其一伙代表法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一样。我们高尚的人物甚至害怕, 只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稍一接触, 就可能损害“真正的教义”, 因此, 他以肃穆伟大的气概提出建议禁止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作为访问者”出现在 proscrits [流亡者] 协会中。

捏造! 撒谎! ——高尚意识发出了它充满伟大道义的短促喊声。所有这一切, 都是我的“策略的范例”! Voyons! [让我们看一看吧!]

«Présidence du citoyen Adam. Séance de 30 sept. 1850.

Trois délégués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de Windmill-Street sont introduits. Ils donnent connaissance de leur mission qui consiste dans la communication d'une lettre dont il est fait lecture. <大概, 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 Le citoyen Adam fait remarquer l'analogie qui existe entre les événements qui viennent de s'accomplir dans les deux sociétés: de chaque côté l'élément bourgeois et le parti prolétaire ont fait scission dans les circonstances identiques etc. etc. Le citoyen

Willich demande que les membres démissionnaires de la société allemande (正如記錄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說:«expulsés») ne puissent être reçus même comme *visiteu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xtraits conformes au texte original des procès verbaux.)

L'archiviste de la 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J. Clédats^①

动听的、神奇的、夸張的、前所未聞的、真正的和充滿冒險情节的关于举世聞名的高尚意識的騎士的故事就此結束。

An honest mind and plain, — he must speak truth,
And they will take it, so; if not, he's plain.
These kind of knaves I know. ^②

卡尔·馬克思

1853年11月28日于倫敦

① “公民亚当任主席。1850年9月30日开会。

会上介紹磨坊街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三个代表。他們声称,受委托递交一封信,信宜讀了。〈大概,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公民亚当指出两个协会中剛剛发生的事件之間共同点:两个协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资产阶级成分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間的分裂,云云。公民維利希要求,退出德国协会的會員〈正如記錄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說:“被开除的會員”〉不准甚至作为訪問者进入法国协会。〈摘录与原記錄相符〉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档案室保管員

約·克列达”。——編者注

② 坦率而正派的人說話句句是真,
相信了,他兼有二者;不相信,他总还坦率。
我知道这样的无賴。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場)。——編者注

卡·馬克思
*曼托伊費尔的演說。——普魯士
的宗教运动。——馬志尼的宣言。
——倫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
——工人議會

1853年11月29日星期二于倫敦

昨天早晨普魯士議會會議開幕，首相曼托伊費尔先生发表了演說。根据电訊判断，演說中談到东方糾紛那部分所用的措詞，显然是有意要消除人們对圣彼得堡、柏林和維也納各宮廷之間存在密謀的怀疑。这一点特別突出，还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根据各种理由，通过同一个曼托伊費尔向他忠实的人民郑重宣布，議會并不負有干預对外政策問題的使命，因为国家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像国王的私人領地一样，是专门由王室管理的。演說中的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对人民的呼吁，这表明普魯士政府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俄国和法国威胁着它，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臣民也威胁着它，而且恰好是在它被昂貴的粮价、极度的商业停滯所困扰，并且回想起可怕的背誓行为⁴⁰²将遭到报复而无法安宁的时候。但是，普魯士政府自己使自己失去了通过議會訴諸輿論来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議會是国王有意作为

一个簡單的虛設机构建立起来的，大臣們自觉地把它們当作一个簡單的虛設机构，人民也非常肯定地把它們看成是一个簡單的虛設机构。时至今日，已不能使人民相信这些虛有其表的机关應該毫无来由地被看做是“祖国”的支柱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决不能說，普魯士人表现了头脑清醒和卓有見識的品质（这些品质一度曾經引起人們对他們的尊敬），因为他們以不應該的鄙視态度对待議會，让根据現行宪法选举出来的議會垮台。”

相反，普魯士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头脑清醒的，因为他們甚至拒絕承认那些背叛了革命、希图篡夺革命果实的人們表面上的权勢，他們叫政府知道，他們是不会受政府的騙术愚弄的，他們认为，如果議會还算个什么东西的話，那也无非是加在国家的旧官僚机构上面的新官僚机构。

在其他方面平靜无事的德国社会生活面上，一再被宗教爭論掀起風波，这种情况会使任何一个不太熟悉德国过去历史的人大惑不解。时而是所謂德国教会⁴⁰³的殘余分子遭到現政府疯狂的、像 1847 年那样的迫害。时而是天主教派和新教派通婚的問題使天主教教士像 1847 年那样同普魯士政府爭吵起来。时而是夫賴堡大主教同巴登大公之間爆发激烈的斗爭，成为最重要的事件，前者把巴登政府开除出教，并且下令在傳道坛上宣讀把巴登政府驅逐出教的信件，后者則下令封閉不听話的教堂，逮捕教区牧师，結果使农民紛紛集合，武装起来保卫他們的牧师，赶走宪兵，像比碩夫斯海姆、科尼斯霍芬、格律恩斯菲尔德、格尔拉赫斯海姆（这些地方村长則不得不逃跑）以及其他許多村庄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把巴登的宗教冲突看做純粹是地方性的冲突，那就錯了。巴登只不过是天主教会特意选来进攻新教徒君主的斗爭舞台。在这个冲

突中，夫賴堡大主教代表德國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巴登大公則代表所有大大小小的新教徒君主。但是，一個一方面以它對一切宗教傳統抱徹底、大胆和無比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國家，另一方面又不斷重新爆發十七世紀的宗教糾紛而使整個歐洲吃驚，這樣的國家是怎麼一回事呢？這裡的秘密不過是，政府使任何一個剛剛產生但暫時還在暗中活動的人民反對派起初都不得不採取一種神秘的、幾乎不受任何監督的宗教運動形式。而僧侶們也甘心用這種幌子來欺騙自己，他們還以為自己利用人民的热情去反對政府只對自己的團體有利，然而實際上却是事與願違，不自覺地起着革命工具的作用。

倫敦的日報對馬志尼起草的宣言用盡平生之力擺出一副驚恐萬狀和義憤填膺的樣子。這個宣言是在被派到路易吉安那——這個地區包括了摩地那、帕爾馬和皮蒙特王國一部分領土——去發動起義的第二民族支隊的領導人費利切·奧爾西尼那里查獲的。宣言號召人民“採取突然行動，就像米蘭人過去做過並且現在還要再做的那樣”。宣言又說：“短劍如果用來作突然的狙擊，它就能夠很好地為我們服務並代替槍杆。”倫敦報刊把這一點說成是公開號召“進行卑怯的暗殺”。我只希望知道，在意大利這個不存在任何公開反抗手段和到處都是密探的國家里，革命運動不利用突然性怎能指望得到什麼成就呢？我希望知道，如果真的戰鬥起來，意大利人民除了使用還沒有被奧地利奪走的唯一武器——短劍以外，還能用什麼武器去同奧地利軍隊戰鬥呢？馬志尼遠不是想建議意大利人用短劍去對手無寸鐵的敵人進行卑怯的刺殺活動，——他是號召他們用短劍行動起來，誠然，是“突然”行動，但却是公開地行動，是效法米蘭的榜樣，在米蘭，手里只有刀子的一小群愛國者

曾經襲击了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卫戍部队的守卫所。

“泰晤士报”写道：“但是，立宪制的皮蒙特将遭到羅馬、那不勒斯、倫巴第的命运！”

为什么不呢？难道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不是撒丁国王^①出卖的嗎？难道皮蒙特国王阻碍意大利成为共和国比不上普魯士国王阻碍德国成为共和国嗎？馬志尼宣言从道义方面来看，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政治价值，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問題了。在我看来，馬志尼無論在他对皮蒙特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錯誤。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實現无須凭借欧洲的糾紛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謀家們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諸君从各家倫敦報紙上已經知道，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調查最受尊敬的大名鼎鼎的倫敦市政厅这个机关的貪污事件，同时也考察这个机关的全部組織。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結束。下面就是委员会的报告所举出几个事实。

倫敦市政厅的收入，即使有几項除掉不算，总数共达 40 万英鎊，官員的薪俸总额非常可观——共 107 000 英鎊，即占总收入的 25% 以上。法官薪俸的支出規定为 14 700 英鎊，其中市首席法官得 3 000 英鎊，法庭顧問得 1 500 英鎊，郡法院的法官得 1 200 英鎊。总务官得 1 892 英鎊，秘书得 1 249 英鎊，代表倫敦市政厅出席各議會委员会的官員得 1 765 英鎊。市长官邸和市政厅的高級官員每年各得 1 250 英鎊。执权杖侍从官得 550 英鎊，执劍侍从官得 550 英鎊；典礼官得 450 或 500 英鎊，典礼次官得 200 或

① 查理·阿尔伯特。——編者注

300 英鎊。此外，這些要人們還領 70 英鎊的服裝補助費，14 英鎊的靴子補助費，20 英鎊的三角禮帽補助費。本諾克先生在他的証詞中說：

“倫敦市政廳所屬各機關的支出總額大大超過合眾國聯邦政府的支出總額；也許更驚人的事實是：倫敦市政廳本身的經費和它的財政管理費用超過了它所得到的租金、賦稅和經紀人繳納的款項的收入總額。”

約翰·羅素打算開給英國人吃的改革藥丸的偉大秘密終於揭曉了。他建議：一、取消議員的財產資格限制（這種限制早就名存實亡了）；二、重新劃分選區，辦法是廢除城市若干小選區，另成立較大的選區；三、在农村選區把財產資格限制由 20 英鎊降低到 10 英鎊，即降低到城市選區現行限制的水平。但是他拒絕提出第四條關於把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降低到 5 英鎊的建議，因為，用“泰晤士報”的話來說，這樣做的結果，

“現在的選民們實際上就會被剝奪投票的權利，因為被允許參加投票的那個階級在人數上大大超過所有其他階級的總和，這個階級只要團結一致就足以占上風了”。

換句話說，甚至賦予小業主和商人階級的大多數人以選舉權就會把少數人的選舉權剝奪掉。這真是一個妙不可言的理由。可是，目前只模糊地顯出一些輪廓的新的改革法案，其最重要的特征並不是這一條，甚至也不是他提出的所有各條的總和。最重要的是，關於這個法案的消息傳出以後所遇到的普遍的十分冷淡的反應。警察局的每一個報告都比這個“偉大的措施”、這個新改革法案、這個“群賢內閣”的集體創作更吸引公眾的注意。

厄內斯特·瓊斯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只要宣布建立人民的群眾性運動、宣布建立以工人議會為首的全國組織的第一句

話一傳开，就会在有产階級中間引起惊慌，就会迫使倫敦的資產階級報紙把注意力投向这一句話。“泰晤士报”馬上就懂得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并且首先登載了有关宪章派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召开的报道。“泰晤士报”的所有同行也开始不断发表社論，評述工人运动和早被认为已經沒落的宪章派所提出的工人議會。“經濟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不下四篇文章。可是，报上关于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曼彻斯特群众大会的报道，根本沒有正确說明它的性质和会上討論的問題。因此，我认为我提出自己的报道是合适的。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下列決議：

“1. 大会深信，各个单独的工人团体分散地爭取保持合理的工資水平和爭取劳动解放是沒有效果的，因此，大会认为，只有依靠一个全国組織并受一个統一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工人階級联合的群众运动，才能保证給予那些現在正遭到同盟解雇或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們以应有的帮助，才会使工人們有可能在将来把劳动从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来，現在，这样的时刻已經到来了。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和全国組織的建立并不要求，也不應該要求干預現存的工联和工人团体的事务；这个組織的活动，目的應該是把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整个工人階級的一切群众集中起来，集聚起来，联合起来。

2. 为了實現上述決議，亟需尽快召开工人議會；这个議會應該由每个城市的工人在專門召集的公开會議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組成。这个議会的义务應該包括下面几点：組織一个机构，通过在全国最广泛地征求签名的方式，来帮助現在正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工厂主同盟解雇的工人；制定一个领导工人階級对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專門的行動計劃；提出各种措施，使工人能够从資本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不必非举行罢工才能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3. 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本着上述目的与各城市和各區进行联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召开工人議會，起草并公布代表們开会所必需的各种文件，同时拟定提交代表討論的各项問題。”

在所有发言中最精彩的是琼斯先生的发言。現在我摘引其中

的几段：

“企业主通过倫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潤不干你們的事。說什么你們應該只数一数你們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潤。人头一多，即使想多得也是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規律。他說，調节你們的工資的只是这个規律。是这样嗎？不！既然在他的利潤很高的时候你們不應該要求提高工資，那末在他的利潤下降的时候他們也不應該降低你們的工資。然而，即使工人的数目一个也沒有减少，他也会對你們說：‘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潤减少了，我不能照数給你們发工資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們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規律的調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潤規律的調节。供給的規律可能有道理，但生活的規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規律很厉害，但飢餓的規律更厉害！我們說，如果資本的一种形式——貨幣——有权获得利潤，那末資本的另一种形式——劳动——也有权获得它；而且劳动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劳动創造貨幣，而不是相反。什么是利潤呢？这就是扣除了全部生产費用以后剩下的資本。你們到現在为止所領取的工資，只是生产費用的一部分。这一份勉强維持活命的工資根本不是劳动的報酬。它只不过是維持活人这架机器处在适于工作的状态所必需的費用。可是除了維持这部由肉和血做成的机器的費用以外，你們总該有一点剩余。你們需要有精神和腦子的食粮，就像你們需要有口和胃的食粮一样。企业主害怕你們得到較高的工資；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資，最近7年来資本增加了100%以上，而你們只不过要求从你們劳动所得的100%中拿出10%来增加你們的工資。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資会給你們开辟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資会給你們开辟走向受教育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民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們会不同意干这許多个小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們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獄去挑那奴隶劳动的重担；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們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你們的妻子都呆在家里，而孩子們又上学，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工厂，那末現在促使工資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劳动力就会摆脱他的控制，劳动就会成为鑲嵌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現在問題不同了。現在問題已經不只是要在企业主的利潤中得到多少份額或者增加10%的工資，現在問題是不許把工資降低20%。生意是好是坏，形势不会因此有

多大变化，生意好，企业主們要掠夺外国人民，生意坏，他們就要掠夺本国人民。对你們說来，問題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資高低的問題，而是餓死还是活下去的問題，是在工厂地獄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門口死的問題。資本家們，这些西方的哥薩克，首先越过了工人权利的多瑙河疆界；他們实施了受黄金支配的战时法律，他們从他們那些叫做壟断組織的炮垒里向我們的队伍发射餓死的炮火。各城市相继宣布戒严。失业現象挖着战壕，而飢餓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貧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綫。資本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們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規模。你們准备抵抗这个运动嗎？你們的运动却是混乱不堪。既然同盟解雇工人的現象越来越普遍，而你們还在繼續分散行动，那末很快就会发现，你們将开始冲进彼此的禁区：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将在同一个地点碰上另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在本来應該作为同盟者握手言欢的地方，你們将像仇人相逢；在本来應該彼此帮助克服各自的弱点的时候，你們将互相削弱預定为某一方而作的帮助。威根的采煤工人們离普雷斯頓、斯托克波尔特、曼彻斯特、奥尔丹不远，但是，他們由于沒有得到任何支援而遭到了失敗。威根的工厂工人也罢工了。他們对他們的兄弟，煤矿工人的失敗是怎样看的呢？他們认为，那些人很幸运地脱身了。如果互相擋道，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們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种利益的小圈子里了。你們的雇主們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們的反抗也應該成为这种全国性的反抗。在現在的情况下，等待着你們的是无政府状态和死亡。你們不要以为我对工联的明智有異議，不要以为我在攻击它們的行为和不可侵犯性。

但是，引着小孩学步的帶子，对大人來說，会成为絆绳。在工人运动的幼年期起过作用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做法，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年期便成为致命伤了。让各行各业都来参加吧，我們需要它們的帮助。不要把工人階級的事业委托給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應該把它委托給工人的議會。”⁴⁰⁴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2 月 1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94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土軍自沃耳特尼察的退却，看来标志着俄土战争第一阶段的結束⁴⁰⁵。这次退却，看来至少是从卡拉法特附近渡河开始的、显然成为一个阶段的初期战斗行动的結束；此后，双方不是平靜地留在冬季营地，就是执行新的尙未定案的計劃。因此，評論到目前为止的战局的适当时机似乎已經来到了，尤其是因为剛剛获得了关于多瑙河上唯一的一次大会战——俄軍对土軍沃耳特尼察 tête-de-pont〔桥头堡〕的攻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

10月28日，部署在維丁的土軍渡过多瑙河，攻占了卡拉法特。土軍在攻占这一地点时，除了与兵力不大的偵察队的小战斗以外，大概沒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正当俄軍准备在克拉約瓦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卡拉法特时，傳来了使他們不安的消息：土軍在另一方向作更有威胁性的推进，11月2日在沃耳特尼察附近渡过多瑙河，严重地威胁着俄軍的交通綫。同时，土軍还在維丁至沃耳特尼察沿多瑙河一綫进行了一連串佯攻和次要攻击，不过这些攻击有的因俄軍預有防范而未能得手，有的則因兵力过少而未能迷惑俄軍，使其行动发生严重錯誤。

因此，卡拉法特的土軍沒有受到任何惊扰，他們陸續得到了援

軍的补充，据报道兵力已增加到将近 24 000 人。这些土軍既沒有向前推进，也沒有受到襲击，所以我們可以暫時不去注意他們。

根据奧美尔-帕沙的报告，土軍在沃耳特尼察渡河的情况如下。沃耳特尼察是阿尔哲什河与多瑙河汇合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多瑙河上与阿尔哲什河口相对的地方有一个沙洲，在高达 600—700 英尺的陡峭的多瑙河南岸，是土尔图凱村和要塞，这个要塞就建筑在这个高耸的河岸的頂端。因此設在土尔图凱的火炮可以最有效地支援在該处渡河的任何部队。11 月 1 日，土軍渡到多瑙河中的那个沙洲上，并于一夜之間修起了坚固的战壕。11 月 2 日，土軍又从沙洲渡到阿尔哲什河以东，登上了瓦拉几亚的河岸。乘船渡到瓦拉几亚的有 2 个营，配有 100 名騎兵和 2 門火炮。土軍在土尔图凱的火炮进行了几次齐射，迫使俄軍前哨放棄了离河岸不远的医院建筑物，于是土軍馬上攻占了这个以后給他們带来很大益处的建筑物。这个有拱形墙的厚实的建筑物几乎不要什么加修就具备了內堡(最常用的野战筑城工事)的一切优点。土軍立即开始在阿尔哲什河和多瑙河之間挖掘战壕。經常約有 400 人参加这一作业，束柴和籃筐都是預先准备好的。根据我們得到的全部报道，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就是这些战壕已形成一道綿亘的防綫，完全切断了俄軍从陣地通往土軍登陆地点的所有通路。虽然形成綿亘的战壕綫的工事早被人們否定，被认为沒有用处，但是，由于这些战壕具有桥头堡那样的特殊作用，由于土軍找到了現成的坚固的內堡，由于土軍工兵不足以及与土軍特点有关的其他情况，所以采用这种过时的工事体系可能仍然是适当的。土軍在阿尔哲什河找到了一些船只，馬上用来同原有的船只一起在多瑙河上架桥。这些作业于 11 月 4 日拂曉几乎全部結束。

可見，土軍在沃耳特尼察就有多瑙河北岸的一个桥头堡。土軍沒有过河，而且直到目前也沒有这样做。但是，他們在多瑙河北岸已有了一個可靠的登陸場，一俟在土尔图凱集中了足够的兵力就馬上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土軍有可能占領阿尔哲什河的西岸或东岸，而且他們在該河附近的一切行动，都可得到配置在土尔图凱高地的 10 門重要塞炮的掩护。由于火炮陣地很高，这里的河面又狹窄，所以它們的射击范围至少可达到桥头堡半英里之外的地方。

桥头堡內的兵力为 3 个基干营（2 400 人）、2 个近卫連（160 人）、2 个猎兵連（200 人）、100 名騎兵和配置在医院建筑物內的 12 門重炮的炮手。战壕綫的右翼可得到土尔图凱的火炮纵射和側射火力的掩护，此外，土尔图凱的火炮还可对桥头堡正前方的整个平地射击。与阿尔哲什河相接的左翼由設在沙洲上的一个炮队从翼側掩护。不过这里有些地方灌木林密布，可以作俄軍向前移动时的絕好掩蔽物。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俄軍于 11 月 4 日向土軍战壕綫攻击时，有 20 个步兵营、4 个騎兵团和 32 門火炮，共計約有 24 000 人。俄軍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12 个步兵营和 14 門火炮对付桥头堡的中央部分；2 个步兵营和 2 門火炮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边（从俄軍方面看是右边）的森林里；*en échelon*〔梯次配置的〕6 个步兵营連同 4 門火炮对付土軍右翼；俄軍战壕綫向多瑙河方向延伸并由騎兵从翼側支援。俄軍在火炮进行了一定時間的射击后，先在中央組成了强攻纵队，而两翼則随后跟进；然后，原来在距土軍工事的胸墙几乎达 1 200 碼的陣地上射击的炮兵轉移到霰彈的有效射程（600—700 碼）內，而强攻纵队則急速前进。正如可以預見

的一样，距多瑙河最近的俄军左翼纵队，被土军在土尔图凯的火炮打散了；中路纵队也马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靠阿尔哲什河的右翼纵队被沙洲上的火力消灭了，而且，看来，这个纵队的兵力本来就太弱，无法取得什么战果。攻击重复了两三次，但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奋勇齐心了，这以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他们曾经勇敢地冲到土军战壕的最边缘（当然不应过于按字面理解这一点），但是土军火力猛烈，致使俄军无法转入白刃格斗。

在战斗中，奥美尔-帕沙将正规军 1 个营派过了河，作为预备队。这就可以算出，土军投入战斗的共有 3 600 名步兵和 44 门重炮。

俄军的兵力比较难以肯定。奥美尔-帕沙说俄军参加战斗的兵力为 20 个营，而在奥美尔-帕沙军队中的两个英国军官则一致认为真正参加战斗的只有 8 000 人。然而这两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俄军可能在战场上有 20 个营的兵力，但是由于地形关系或轻敌的缘故，每次攻击时，强攻纵队的实有兵力可能都不超过 8 个营。有一个情况两位英国军官没有提到，但奥美尔-帕沙谈到了，这一情况是，俄军拥有庞大的预备队。所以俄军每次攻击时都有从预备队调来的 1 营生力军走在前面。此外，在两位“女王陛下近卫军军官”的报道里，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愚昧无知和盲目自信，这正是一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的下级军官所固有的特色。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奥美尔-帕沙的报道是可信的。在整个作战期间俄军在当地的兵力可能有 18—20 个营，其中可能有 10—12 个营相继投入了战斗，因而，在每次攻击时向土军战壕同时推进而未获得成功的部队可能是 6 000—8 000 人。俄军的损失至少应为 1 500—2 000 人，这也说明俄军可能投入战斗的兵力。

俄軍終於被击退了，500支枪、大量彈药和大批軍用物資落入土軍之手，伤亡800人，而且有些部队退却时秩序紊乱。

如果研究一下双方在这次战斗中的战术，我們可以看出，令人惊讶的是俄軍犯了严重的錯誤，他們不得不罪有应得地付出惨敗的代价。他們輕敌的程度是罕見的。他們所要攻击的是設有巨大內堡的相当坚固的障地，这个內堡不仅可以得到沙洲上10門重炮从翼側的支援，而且处在土尔图凱的22門火炮的射程以內（这些火炮还可控制障地前面的地段）。土軍共有44門（至少38門）火炮，而且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重炮。現代的每个軍官都知道，当向敌人野战工事进攻时，首先，必須以自己的炮兵压制敌人可能用来支援野战工事的火炮和炮队；然后，应当根据可能，破坏敌人的土堤、圍柵和其他障碍物；再后，应当将自己的炮队調到离所要攻击的工事更近的地点，以霰彈猛击敌人胸牆；最后，只有这时，才能决定派出强攻纵队向半遭破坏的野战工事和士气沮丧的守軍进攻。为了做到这一点，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必須占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我們看到，俄軍企图怎样做呢？他們用12門12磅炮和20門6磅炮进行了短時間的射击以后，就向在数量上和口径上占优势、技术上更占优势的炮兵掩护的桥头堡进行强攻了！俄軍的这次射击可以說簡直是形式，好像是对土軍表示的一种礼节，因为这次射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目的。此外，如果像所有报告一致所說的，俄軍的炮队果真曾接近到距桥头堡650碼的地方，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被击毀的火炮的数字一点也沒有提到。不过我們必須承认俄軍的勇敢精神，他們在被敌人优势火力的猛烈射击击潰以前，虽然是在敌人火力下，而且可能还是第一次处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却仍然能够接近到距土軍战壕綫50碼的地方。

至于土軍，我們也不能特別稱贊他們的战术。当俄軍强攻时，奧美尔-帕沙在桥头堡集中了不超过防守所需的兵力，这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在土尔图凱所在的桥这头和沙洲上配置任何預备队，特别是騎兵預备队呢？为什么当俄軍的敗局已定，他没有立刻用騎兵攻击被击潰的敌人呢？最后，为什么他满足于精神上的战果，而忽視夺取全部战果从而决定整个战局的可能性呢？我們只能找出两个原因：第一、野战筑城中的綿亘防綫体系使防御者在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不容易实现坚决的进攻，因为綿亘的防綫没有留下比較大的余地供大批軍队突然猛烈出击之用；第二、奧美尔-帕沙不是不相信自己軍队在平地作战的能力，就是没有掌握足以扩大战果的兵力。

这使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与这一行动有关的战略問題。如果奧美尔-帕沙把在卡拉法特无所事事的那些部队調到沃耳特尼察，那末他的行动不是会更坚决些嗎？为什么要把一支12 000人的部队連同人数与此相等的預备队派往卡拉法特，去威胁从俄軍观点看来正是他們陣綫中迎击敌人攻击的最合适的地方呢？为什么这24 000人没有被調到土軍能够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地方呢？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現在絲毫不必怀疑，俄軍在10月底以前不可能在瓦拉几亚集中50 000—55 000人以上的兵力。如果考虑到道路缺少和地形起伏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使兵力分散），再考虑到每支作战部队通常可能遭受的损失，那末俄軍在任何一个地点都絕對不可能一下子集中3万人以上的兵力。毫无疑问，土軍如果能在瓦拉几亚任何一地集中4万人的兵力，都可能击潰俄軍。可以肯定地說，土軍如果想取得这样的結果，并且能够适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那末就可能比較容易地集中这样多的兵力，

甚至比这多一倍的兵力。但是，欧洲外交的干涉，土耳其御前会议的犹豫不决，土耳其对塞尔维亚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其他类似的各种情况，看来使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措施，把奥美尔-帕沙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置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境地。他知道俄军的弱点，他自己掌握有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他们求战心切。但是他的军队被分散在长 350 英里、宽 50—100 英里的地区内。他在 11 月初的行动所受到的约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必然后果。因此，在卡拉法特渡河，虽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个错误，但这时却有特殊必要了，因为维丁必然是集中了将近 2 万人的地点，如果不在卡拉法特渡河，这将近 2 万人的部队便可能因距主力太远而毫无作用。土军的这次渡河，至少可箝制俄军的部分兵力，而且还可鼓舞土军的士气。

在沃耳特尼察附近的渡河，显然是打算作为一次主要突击，通过这次突击攻占布加勒斯特，并切断被卡拉法特战斗引向西面的俄军的退路，但是这次渡河毫无成果，看来，这是因为没有能够调集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所必需的兵力。沃耳特尼察会战对士气的鼓舞作用，自然是一个大收获，但是土军获胜后 9 天之久毫无行动，又因雨季开始而主动退过多瑙河，这就起了另一种作用。这种毫无行动的表现和这一退却，虽然可能不会削弱胜利对土军士气的鼓舞作用，但是会损害土耳其统帅的威望，而且可能远远超过其应受损害的程度。不过，即令造成这种情况的祸首是土耳其御前会议，奥美尔-帕沙也仍然不能辞其咎。在多瑙河北岸呆了 12 天，占有桥梁和足以抗击俄军集中的兵力的桥头堡，拥有大批求战心切的部队，但是没有找出调动 3—4 万人的办法，——的确，如果统帅没有一定的过失，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俄军可以庆幸自

已得了救。俄军还从来没有只遭受这样少的物质损失就摆脱了严重程度甚至比这轻一半的窘境。俄军本来可能全军复没，但是他们却安然无恙。俄军是否还会让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情况重演就很成问题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

1853年12月2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我写上一篇文章以来，在土耳其沒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軍事行动，但是俄国的外交——比它的軍事学术还要危險的外交，又开始活动了起来；拉芒什海峽两岸的政府报纸已相当明确地透露，著名的1840年和1841年的倫敦會議即将复活，而当年的这种會議的結果就是把安吉阿尔-斯凱莱西条約稍加修改而加以批准。“泰晤士报”甚至暗示，会采取“坚决的綏靖措施”，換句話說，即自命保护土耳其的国家要采取某种武力的綏靖手段来反对土耳其。現在已經采取了一个重大的、其含意不可能曲解的外交行动，即英国内閣最近把一項照会送往君士坦丁堡由英国大使送交土耳其政府，但被11月14日的土耳其御前會議认为不能接受而拒絕。這項照会，干脆就是列施德-帕沙对5月間緬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的答复的翻版。帕麦斯頓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苏丹示意：在他們看来，局势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土俄之間的关系是什么变化都沒有的；在西方外交界看来，从5月以来土耳其什么都沒有赢到，而俄国也什么都沒有輸掉。

由于塞尔維亚公爵亚历山大不許土耳其軍隊通过他的領土，要求俄国总領事回到塞尔維亚，而且在他致苏丹的声明中把土耳

其和俄国說成是两个对塞尔維亞公国具有同等权利的保护国，所以土耳其和塞尔維亞之間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如果放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对土耳其有致命的危險，但現在却可能成为土耳其使自己免遭西方外交毒手的唯一手段。無論发生什么事件，只要能够加剧目前的糾紛，迫使破产的奥地利放棄它那危險的中立，增大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并迫使土耳其去同革命派結盟，那末这种事件必然会有利于土耳其，至少有利于它同俄国的冲突。当然，如果土耳其在欧洲的統治不加根本改变，以抵銷那些使土耳其衰落的內部因素，那末这些因素还是要繼續起作用的。

現在讓我們放下在多瑙河各公国内进行的土俄战争，来談談在英国各工业区厂主和工人之間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諸位还記得，厂主曾經疯狂地反对工人爭取縮短劳动时间的运动，百般誹謗这种运动。而現在情况却改变了。正如我当时曾經預言的那樣，厂主自己正在把劳动時間縮短的制度强加在工人身上^①。同盟歇业的真正意义已暴露出来，它是厂主所采取的**財政措施**，是医治“价格史”⁴⁰⁶上从未有过的工业生产过剩病症的办法。罗契得尔区(貝恩利、貝凱普、紐切尔奇)，柏立区和埃士頓区(埃士頓、斯泰里布雷芝、格洛索普、海德、牛頓)的工厂从上星期一起都已恢复工作，但是每周只开工4天。波尔頓很快也会走上这条道路。曼彻斯特正在討論**什么时候**这样做，而不是**要不要**这样做。再过两三个星期，除了少数拥有有利条件的工业部門以外，就将普遍实行这种劳动時間縮短的制度了。当然，对繼續反抗的普雷斯頓工人的援助此后就会停止。但即使在这种每周4个工作日的情況下，商

① 見本卷第466—467頁。——編者注

品的产量仍然要超过需求量。不妨回忆一下：3个星期以前普雷斯頓的企业主們就已經有了相当于20个星期的产量的存貨，而且这批存貨几乎无法銷售。其实，工业危机已經談不到是否开始的問題——事实上已經是工业危机了。

“泰晤士报”写道：“随着劳动時間的縮短，工人的工資已降低到最近工資增加以前的水平。”

“經濟学家”杂志一时过于坦率，竟声称：

“叫化子是不能提出条件的，他應該接受人家向他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工人的罢工开始得过迟了；在空前繁荣所造成的有利条件消逝之后，从經濟方面或者从达到罢工的直接目的方面来看，罢工都已不能成功。但是，罢工仍然起了自己的作用。它使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化；它同粮价高昂和劳动报酬低微这些刺激因素一起，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些政治后果到适当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即使現在，关于工人議會的主張（这一主張实际上是意味着号召所有的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已經引起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恐惧。

“經濟学家”杂志說：“‘人民报’的編輯厄內斯特·琼斯先生被看做非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后继者，正像奥康瑙尔先生曾是汉特先生的后继者一样……工人們追随汉特和奥康瑙尔的结果，除了严重的失败和巨大的損失外一无所获，但是他們对这些大王的后继者仍然同样信任，他們現在把琼斯看做自己的救星。”

諸位可以从以下两段引文中看出，受党派动机驅使的英国統治阶级报纸，如“先驅晨报”，以及受帕麦斯頓这个厚顏无耻但頗有眼力的观察家指导的报纸，如“晨邮报”，都能正确判断目前的实际情况，并能适当地对待繁荣的罗宾逊⁴⁰⁷所說的那些粗鄙无聊

的話。

“如果現在听一听厂主們的話，就会觉得，他們簡直被賦予了上帝一般的权威，帝国的安危全看是否讓他們享有比法皇逊色不多的权力…… 郎卡郡 6 万名左右的工人現在飲食之差几乎不能活命，不过他們沒有搶劫或使用暴力的念头，尽管他們是生活在节儉的厂主不設警察保护的城市中。不管他們对不对，這些人們总都是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忠于他們的領袖的；像这样和平而又有成效的运动，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

这是“先驅晨报”的話。

“我們的經濟学家會一再吹嘘什么貿易自由将带来巨大的、我們梦想不到的福利；但是冬季已經来了，来年一回春瘟疫就要流行，現在正是我們的貧民迫切需要比平常好一点的食物和暖一点的衣服的时候，这样才能維持健康，更能抵御疾病；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異乎尋常地高昂，簡直是在要他們的命。那种要使全国人民幸福的人間天堂根本談不到，而那种种預言物价永远低廉和产品永远丰富的說法看来也应当同那些在人民中散布的无数幻想归在一起，某些人正是用这些幻想，才使我們的社會走入迷途…… 英国社会是一个腐化的、害人的、不道德的、无知的、殘酷的、充滿錯觉的、憤憤不平而生活非常困苦的社会。”

帕麦斯頓閣下的沙龙報紙，他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是这样說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5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1853年12月9日星期五于倫敦

貴報讀者對於聯合內閣所耍的各種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視的，因此帕麥斯頓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借口保護土耳其和保障歐洲和平而支持沙皇的任何新嘗試都不會使他們感到奇怪，甚至維也納會議或倫敦會議復活也完全不會使他們感到突然的。上星期五，首都的證券交易所首先從“紀事晨報”上獲悉，英國已成功地說服了奧地利和普魯士支持西方列強調停交戰雙方的新嘗試。隨後，“晨郵報”發表了關於“這一嘗試”的消息，並且寬慰人心地宣稱：

“這次嘗試是力求取得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合作，這種合作已經取得了，四國簽訂了議定書，議定書規定，四國無條件地承擔義務保持現時的歐洲領土劃分，對交戰國則通過召開歐洲會議的辦法邀請它們來友好地解決他們的爭端。按照這個四國協定將要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判明土耳其的觀點，弄清楚它在哪些基本條件下同意進行解決東方衝突的談判。在弄清楚土耳其的立場以後，四國將請俄國表示它對於所建議的進行解決的基本條件的意見，然後就建議這兩國派全權代表出席大國會議，會議的期限和地點待以後另行確定……沙皇的尊嚴將予以保全，土耳其的利益也將得到完全的保障，辦法是：第一，土耳其和俄國簽訂友好、和平和通商條約，規定兩國在對方領土上的臣民應當受到的保護；第二，蘇丹和五大國簽訂一項條約——類似1841年關於達達尼爾海峽的協定的條約，這項條約規定蘇丹必須遵重多瑙河各公

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和特权，而且还承担保护属地上的基督教的特殊义务，就像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那样，不过这次是对欧洲承担义务，而不是对俄国。”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①说话了，他在第一期上宣布，四大国已经最后缔结了联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强迫”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交易所投机商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期上却报道，虽然四大国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们丝毫没有承担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下跌了。“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死尸——谈它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同时，有一封电报也证实了下面的消息：

“12月6日维也纳四国会会议已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以新草案为基础的另一个关于解决争端的建议；即使军事行动不停止，关于议和的谈判也要继续进行。”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做预言的皮蒂娅⁴⁰⁸——恰好是建议土耳其接受緬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在俄国第一战失败以后，英国和法国回到了列施德-帕沙给緬施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中的立场上。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议的新建议反映了四大国“防止战争”的愿望。这确实是惊人的消息！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 status quo [现状] 已经发展成 status

① “泰晤士报”。——编者注

belli〔战争状态〕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都不应该忘记，这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草案，透露了英国政府的心思；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今天甚囂尘上的无根据的謠傳已經不止一次地預料到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是无疑的：英国曾經提出四国联盟，目的是要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大国行将做出的决定，即使奥地利拒絕参加联盟也要这样做。如果說联盟沒有締結，那末，四大国至少也簽訂了“議定书”，規定了进行談判的原則。同样明显的是，曾經阻碍土耳其行动，让俄国军队占領了多瑙河各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的維也納會議复会了，并且已給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維也納會議到倫敦的欧洲會議仅有一步之隔，这一点在 1839 年穆罕默德-阿利起义时期就已經证明了。如果在俄国繼續进行反土战争时却召开从事“綏靖”的會議，那末这种會議只能是 1827—1829 年倫敦會議的重复，而那次會議的結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納瓦林附近被消灭以及由于簽訂了阿德里安堡条約而使土耳其丧失独立。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已明白地指出了英国内閣提出、其他大国同意的进行談判的基础是什么。它們建議保持“現时的欧洲領土划分”。如果把這個建議看做是简单地回到維也納和約的条款上去，那就大錯了。波兰王国消失，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这些“領土調整”从来没有經一个欧洲會議批准过。因此，批准“現时的欧洲領土划分”并不单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維也納条約，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而更主要的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 1830 年起对这个条約所做的种种破坏。“俄国和土耳其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約”——我們在庫楚克-凱納吉条約、阿德里安堡条約和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序言中能找到与此完全相同的詞句。

帕麦斯顿的报纸^①宣布，“这是一个类似 1841 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的确如此。这是一个类似曾经对欧洲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把黑海变成一个俄国内湖的协定的条约。然而，“泰晤士报”说，为什么我们不把军舰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航行自由作为条件提出来呢？但是读一读帕麦斯顿勋爵 1839 年 9 月间给当时的驻巴黎大使布尔韦尔先生的信吧，你们就会看出，他们那时也抱有类似的希望。

“苏丹必须尊重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最高权力是由沙皇和苏丹分掌的，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的会议会使欧洲批准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实际保护权。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自己属地上的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部分，并且，一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因为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获得权利，可以随意解释苏丹属地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定并经它的各机关报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 1830 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 10 天来出人意料地发生的”改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末，不管他的心思是什么，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王朝的行列中，对于这个暴发

^① “晨邮报”。——编者注

戶皇帝就是一件很如意的事情。

联合內閣的观点在內閣的机关报之一，周报“卫报”⁴⁰⁹上清楚地表述出来了：

“以为俄軍在沃耳特尼察战壕附近被击退，在黑海又有几个堡垒被拿下，就把俄国当作一个被打败了的对手来看待，就认为我們卡住了它的脖子，——这簡直是可笑的。这些不大的損失本身只能触伤俄国的自傲心，只能使它不爭到更好的条件就不进行談判而已。然而，君主們也同其他的人們一样，也受各种不同的意念支配。沙皇是个驕傲、激烈的人，但是他也很謹慎。他卷进了一場他只能輸，不能贏的爭端中。他的政策就是他的先輩們的政策，而他的先輩們到处用战争威胁的办法，获得了比进行战争更多的好处，同时，他們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侵略体系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这使他們能够避免大的失敗，甚至能够**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四大国預先决定欧洲的領土分配不應該作出或不應該容許任何改变，看来，就是以对沙皇的立場及其政策的特点的**这一明智的看法**为根据的。认为沙皇已經被踩在英国脚下的人，或者使自己受了**保护关税派**的报纸的胡說八道的騙而走入迷途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問題**不在于使俄国屈辱**，而在于綏靖欧洲（当然是根据俄国所說的意思），在于尽可能确立法国士兵大使^①以他主子的名誉向苏丹担保法国十分关心的持久和平。**即将簽訂的条約**——这是可以确信不疑的——将不是简单地恢复現狀，而是退一步试图在某种固定的基础上来調整土耳其同欧洲的关系和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系。这将只是一种嘗試，因为**任何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的协定**，不管它如何牢靠，从基础上来說，**总是暫时的**。可是，这种**暫时的协定**現在是可以實現的，而且是必要的。”

可見，各大国所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和不容許“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喻，既然暫时的协定一般說来“現在是可以實現的”，它就將有助于实

① 巴拉盖·狄利埃。——編者注

現这个最終目的。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內閣的政治家們的算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魯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傳来了。另一方面，有人又言之凿凿地說，波兰境內的全部軍隊都接到了开往普魯特河的命令，而发自波兰边境的消息只說是：“上月23日深夜宣布了‘布朗卡’（即征兵），那些以前只征一两名的地方，現在征了八——十名。”这至少证明沙皇不太相信四大国和事佬的天才。奥地利正式声明，“四国宮廷之間沒有締結任何联盟”，这证明，奥地利方面虽然很想把条件强加于土耳其，但是甚至做一做样子，表示要强迫沙皇服从为他的利益着想而拟定出来的条件都不敢。最后，苏丹給法国大使的复照宣称，“如果俄国不完全放棄它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立即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現在簽訂友好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像晴天霹靂一样使那些靠會議为生的政治家們大吃一惊，而老奸巨滑、飽經世故的帕麦斯頓的机关报現在就毫不掩飾地向其他的同伙报道了下面一点儿真相：

“俄国不可能同意立即撤出各公国和完全放棄一切要求而又无損于自己的尊严和威望，所以，如果认为如此堂堂大国不經决死之爭就同意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很遺憾，我們只能預言目前这种举行談判的試图会归于失敗。”

敗了一仗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談判的建議的，因而就要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贏得時間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時間，它需要有足够的時間来募集新的軍隊，在全国部署好，集中軍隊，在止住土耳其的軍事行动以后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希望就能增加，于是举行談判的試图就“能得到成功的結局，因为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敗者”。因此，据維也納“东德意志邮

报”⁴¹⁰和內閣机关报“紀事晨报”报道，英国才一再向土耳其指出应当同意停战3个月。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5小时的会谈，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們曾反对停战），结果是召开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要同意也不可能，除非它公开背叛了土耳其人民。

今天的“泰晤士报”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下，要使土耳其政府的要求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

据说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3个月的停战，以便将自己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的人”。然而签订3个月停战的希望还没有完全被放棄。

“泰晤士报”写道：“假如停战的建议是由四大国提出的，结果可能比较顺利些。”

好心腸的“晨报”断言：

“很难设想关于这些建议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大胆设想的人，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试图把土耳其的事业出卖给沙皇的事情，或者说，会有这样合乎这个目的的尝试。”

激进派的“晨报”对帕麦斯顿“知荣誉和守信用”的自信心和它对英国外交史的无知，看来都达于极点。既然这家报纸为有权出售酒类的小酒店主的联合会所有，我怀疑这些小酒店主本人是不是常常为它写社论。

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維也納就这样扮演着俄国前卫的角色，我们且来看一看俄国方面是怎样在英国安排自己的事情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正当联合政府装

出一副在黑海威胁着俄国的样子的时候，俄国军舰的两艘巡航舰——“曙光号”和“纳瓦林号”却在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厂得到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上星期六我们从“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上获悉：有6名水兵从俄国“曙光号”巡航舰上逃跑了，他们好不容易到达了吉耳弗德，但是被俄国巡航舰“曙光号”的一名军官和英国警局督察员扣住，送回朴次茅斯，交到了“胜利号”船上，这是一艘英国船，“曙光号”的全体船员在该舰进行装备期间就是被安置在这艘船上的。他们在这里遭到残酷的体罚，并且戴上了镣铐。当这件事在伦敦传开时，某些先生们通过律师查·罗诺兹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一份发给海军少将马丁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以及俄国舰长即“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的关于引渡被捕者的指令。按照这个指令，他们应该将6名水兵送交英国的大法官。英国港口当局拒绝执行这个指令，而且英国舰长找海军中将，海军中将找海军上将，而海军上将认为有必要请示一下海军部部务委员，有名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此人10年前由于邦迪埃拉事件使邮政主管部门为梅特涅效劳⁴¹¹）。至于俄国船长，尽管女王署名的指令在“胜利号”英国船上递交给了他，指令内容也由翻译准确告诉了他，他却轻蔑地把这张纸扔到船外，而当这张纸又从舷孔塞进来时，又被扔掉了。俄国船长声明：“假使指令的确是女王陛下发的，那就应该送交我国大使或领事。”由于领事不在，副领事拒绝过问此事。12月6日，又将一份女王署名的新指令下达朴次茅斯海军当局，新指令命令朴次茅斯海军当局向大法官不仅要交出上述6名水兵，而且也要交出俄国船长。海军部不但没有执行指令，反而尽一切努力使军舰出港，第二天“曙光号”在众目共睹之下不顾引渡被捕者的命令，由伊斯拉马托夫船长指挥驶往太平洋去了。与此同

时，我們从昨天的“每日新聞”获悉：

“俄国‘納瓦林号’輕巡航舰仍然停在船塢上仔細檢修。許多港口工人都在于这件事情。”

現在，請注意內閣的一些机关报是怎样报道这件“令人发指的”事情的。

皮尔派的机关报“紀事晨报”完全保持緘默，因为皮尔派的首領格莱安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是最丢臉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打破緘默的是帕麦斯頓的“晨邮报”，因为勋爵閣下是不会错过机会来显示自己把最伤脑筋的事情形容成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技能的。該报說：整个这件事情夸大得太厉害，吹得太厉害了。它根据會命令无情鞭打逃兵并給他們戴上镣铐的俄国船长的說法指出：“据6名逃兵本人的口供，他們开小差不是出于自願，而是受了在大街上結識他們的人的引誘。”这些居然違背自己的意志和不顧俄国船长的命令在朴次茅斯离船上岸的水兵們“被灌得酩酊大醉，并被一辆轎式馬車送到內地去了”；在那里，这些人“告訴逃兵們怎样到倫敦，并且給他們留下了几个人的地址，好讓他們到后去找”，然后就离开了逃兵們^①。帕麦斯頓的报纸捏造这个荒誕不經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公众相信，“逃兵們是自己投到警察当局手里来的”，然而这个故事假得太粗暴了，連“泰晤士报”也沒有加以重复。最后，“邮报”散布了如下的誹謗，同时大大地表示了一番义憤，它說，整个事件是一些波兰流亡者暗地里搞出来的，他們大概是想刺伤一下他們的慷慨的东道主帕麦斯頓勋爵的感情。

內閣另一家机关报“地球报”承认：

① 俏皮話：«deserted»——“离开了”，«deserters»——“逃兵們”。——編者注

“外国人只应执行本国代表发出的指示的說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則英国港口的任何外国人都可以違反我們的法律，而且沒有大使过問就不能追究他們的責任了。”

因此“地球报”在它的結論中就要持重一些了，它指出：俄国船长向轉去引渡逃兵的指令的官員所作的答复，“决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滿意的”。但是，在人类事务中寻找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枉然的。

“泰晤士报”大叫：“假如俄国船长第二天早晨把他們〈即被抓住的水兵〉統統在自己巡航舰的極端上吊死，他对英国的法律也完全沒有責任。”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1840 年俄国和（在帕麦斯顿领导下的）大不列顛簽訂的航海条約里面有一条規定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締約双方的領事、副領事和商务代办在駐在国捉拿本国軍舰或商船上的逃犯时，应得到地方当局的法律許可的帮助。”

然而，可爱的“泰晤士报”，問題正是在于，英国当局按照法律应当給予俄国船长什么样的帮助。談到“在政治危机时期把自己的船开到英国修理”的俄国当局本身，“泰晤士报”认为它这样做是“最不客气和最无風度的表現”，因此，“这些船上的軍官在这里都被列在間諜一类”。但是，“泰晤士报”声称，“不列顛政府不能对这种政策表示更厉害的鄙視”，它只能像它所做的那样，就是：“尽管公众有些看不順眼”，它还是让俄国間諜上皇家船塢，把英国軍舰交給他們支配，用英国人民的錢为他們雇碼頭工人，并且，在他們踐踏了英国法律后溜走的时候，給他們鳴礼炮欢送。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2 月 2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96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俄国的胜利。——英国和 法国的地位

1853年12月13日星期二于倫敦

“使土耳其苏丹吃惊的是，尽管黑海駐有法国和英国舰队，一艘土耳其軍舰还是被俄国軍舰劫走而未受懲罰。春天将給苏丹带来更甚的意外。”

这是“新聞报”在上星期六写的。但是，預料只有明年春天才会带来的“更甚的意外”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經来了。12月5日俄国发自敖德薩的消息說，俄国舰队在黑海的西諾普附近击毀了土耳其的分舰队⁴¹²。这个消息随即为法国的“通报”所证实。虽然我們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詳情細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国的报道把事情极端地夸大了；只不过是一批土耳其的巡航舰和載有軍队、粮秣、彈药和武器到巴士姆去的若干运输船只遭到了突然襲击；俄国的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土耳其的兵力；虽然如此，土耳其人也只是在持續了一个钟头的殊死战斗以后才屈服的。

“一个英国人”^①写道，“我們的舰队駐在那里無論如何不是为了阻碍俄国人去襲击土耳其。舰队駐在那里不是为了妨碍俄軍和他們的武器运往高加索。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防止使黑海变成一个俄国的內湖。舰队在那里

① 阿·理查茲。——編者注

不是为了帮助我們的盟国或是把它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預防著名的納瓦林事件的重演…… 我們认为,俄国的海軍将官們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大炮射程以外进行軍事演习;而英国的各种压力手段将像阿伯丁勋爵本人的第一个压力手段一样,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人民会长久地让这种代价高昂的滑稽剧演下去嗎?”

联合內閣感到恼火的是,沙皇在海面上而不是在 terra firma [陆地]上打敗了土耳其人。內閣希望俄国人在陆上取胜。俄国在海上的胜利則使內閣的地位有动搖的危險,而且这恰好是发生在布奥尔伯爵要苏丹相信沙皇只要防御以及雷德克利夫勋爵竭力强迫苏丹休战3个月的时候。看一看联合內閣的各种出版物怎样分担安定憤激的輿論的义务,是十分有趣的。

“泰晤士报”作为整个內閣的代表,表达了內閣对于沙皇的忘恩負义行为的一致憤慨,甚至敢于提出某些威胁来。

不言而喻,“晨邮报”更是气势汹汹;它还向讀者暗示,要是帕麦斯顿勋爵当首相,或者哪怕是当外交大臣,那末西諾普的“不利”事件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发生的。

“邮报”宣称:“無論如何很明显,派往土耳其海岸作战的俄国海軍是能够給土耳其政府的本錢以突然的沉重打击的,而且恰恰是在御前會議有一切理由期待盟國會公开答应(如果的确意味着某种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吹牛)給它提供的帮助将被证明有价值有效力的地方。在多瑙河各公国已經演出了被称为‘物质保证’⁴¹³的外交喜剧,如果以为黑海是演出新的一幕的合适舞台,那末我們觉得,这样說恐怕沒有根据。总之,可以认为,俄国人已經不再把他們的立場虛伪地描繪成防御性的了。使人不得不深以为憾的是,我們〈应讀作阿伯丁〉在綏靖政策上做得太过分了,使我們的盟国遭受了沉重的損失,因而引起了对我們的理所当然的責难。如果由于我們那些專門派去进行援助的軍事裁判力量沒有及时进行援助而再次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我們便会成为經常被譴責的对象,就会耻辱不堪。”

喜欢高談闊論的“紀事晨报”，皮尔派的主要机关报，并不排斥

“一个破坏了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的大国**現在**有可能表现出同意停战的意願。”

尼古拉皇帝借口“他不願意違抗”吉卡和施梯尔貝两位国君要放棄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管理权这种“自动表示出来的願望”，11月8日下詔把他們的职权轉交給馮·布德貝爾格將軍，可是布德貝爾格將軍要受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最高監督。

英国竭力强迫土耳其停火，是在停火只会有助于沙皇贏得時間來集結軍隊和試圖瓦解英法之間的正式同盟的時候進行的；与此同时，尼古拉又正在進行反对波拿巴的陰謀，想把他推翻，代之以亨利五世；最后，列奧波特國王、阿尔伯特親王和奥尔良親王們正在一起談判波旁王朝兩系的“合并”，关于这种“合并”，吹得十分厉害——这些情况迫使公众又把自己的視綫投向温莎城堡^①，并且怀疑它暗中同布魯塞爾、維也納和圣彼得堡的宮廷有勾結。

貴族報紙“先驅晨报”写道：“現在这一代英国人应当注意使他們國家的政策不为奥尔良派的复辟幻想、比利时对于被兼并的恐惧和德国的微小利益所左右。”

“劳埃德氏新聞周刊”写道：“有一些內务部不加以監視的密謀家，这些密謀家的姓名在‘泰晤士报’的‘宮廷新聞’栏上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閃閃发光。他們不是住在圣約翰伍德，也不是住在切尔西。不，他們是在克勒蒙特⁴¹⁴的大厅里过着不知道要舒服多少的生活。在这些密謀家中，有一位被尊为奈穆尔公爵的女王陛下的常客，剛剛从他的英国私邸动身到弗罗斯多夫去修建一座桥——一座深淵上的桥，好让波旁王朝能够从这座桥上回到法国去。毫无疑问，他回来以后又会到白金汉宮和温莎城堡去吃鹿肉的”。

① 英王的夏宮。——譯者注

“先驅”周刊駐巴黎通訊員写道：“你們的大臣們是根据維多利亞的命令行事的。維多利亞女王所要的只是列奧波特国王所要的东西。列奧波特国王所想的又只是尼古拉皇帝所想的東西。所以，尼古拉 *de facto*（实际上）是英国現在的国王。”

波拿巴現在所处的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危險，虽然乍看起来他成功的机会从来也沒有現在这样好。他已經钻进欧洲国王的圈子里去了。尼古拉丧失了多少威望，他也就赢得了多少威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可敬的”人物。曾經和俄国一起把他的叔父从宏偉的宝座上推倒了的大国——英国——也不得不去和他公开結成反俄联盟。环境使他差一点沒有成为欧洲的仲裁人。欧洲大战的前景，会造成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几乎只关心他們民族独立的恢复，他們不会計較他們得到的援助从何而来。看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能够随意指揮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他扮演国王之間的調解人的角色遭到失敗的話。他的前輩們犯了大錯誤，因此他的政策在表面上看来甚至表現了民族力量，因为，他至少还能使一些大国害怕，而他的前輩們——从临时政府起到立法會議的城官們⁴¹⁵止——却只会在一切事情和一切人面前发抖。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事情的反面吧。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不管这种合并实质上有多少价值，它还是在倫敦和維也納宮廷的庇护下，根据尼古拉皇帝的指示完成了。因此，这应当看做是神圣同盟反对波拿巴的第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合并使法国資產階級各个政党暫時和解了，而正是这些政党的內訌妨碍了它們在1848—1851年去反对斯特拉斯堡和布倫的英雄⁴¹⁶所完成的篡位陰謀。在卡諾先生家中开会的藍色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决定，他們

將支持正統主義者推翻波拿巴的任何嘗試。看來，這些先生們斷然決定了再走一下傳統式的循環路綫，即由復辟經過資產階級君主政體再到共和國。對他們說來，共和國從來就只不過是意味着 *ote-toi de là, que je m'y mette* [滾開吧，好讓我佔據你的位置]；所以，如果他們不能佔據自己對手的位置，那末至少他們也要使對手遭到在他們看來是最嚴厲的懲罰——失去位置。誰將扮演什麼角色，都已排定。將軍、大臣、一切高級官吏都已任命。從這方面看，波拿巴面臨着武裝暴亂的危險，這種武裝暴亂即使不會導致波旁王朝的復辟，也可能成為總爆發的導火綫。但是，總的說來，這個依靠着哥薩克支持的馬萊密謀⁴¹⁷ 并不比依靠着土耳其人支持的賴德律-洛蘭密謀更危險。En passant [順便] 我要指出，如果倫敦和澤稷島的所有法國流亡者舉行集會的話，賴德律未必敢露面。屬於社會主義政黨各個不同派別的絕大多數法國流亡者已團結在 *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流亡者協會] 中，這是一個毫不掩飾地同賴德律的野心敵對的組織。據說，賴德律在法國農民中間還有一些威望，但是，政權只能在巴黎奪取，不能在各個省里奪取，而在巴黎，他將遇到他無法戰勝的反抗。

波拿巴應該害怕的嚴重危險，是從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威脅着他的，那就是食品價格昂貴，商業停滯，皇帝的國庫極度混亂和枯竭。盲目地相信“拿破侖”這個名字的魔力和斯特拉斯堡的英雄的誘人諾言的農民，正是首先把波拿巴強加給法國的勢力。由於復辟王朝粗暴地蹂躪了農民的權利，七月王朝使他們成了投機對象，而第二共和國又強迫他們交付二月革命的花銷，所以在農民心目中，恢復波拿巴王朝就等於恢復農民自己的最高權力。現在，

政府的討伐特别是饥饿使农民恍然大悟了。纵火的行动此刻正以空前的速度在法国蔓延。至于资产阶级，它曾经十分愚蠢地猜疑国民议会，认为国民议会由于各种派别倾轧和争吵，由于这些派别对执行机关一致采取反对立场，因而引起了1851年暂时的商业停滞。资产阶级不仅抛弃了它自己的代表，而且有意促成了 coup d'état [政变]，以恢复它所說的“强化的政府”，首先是“正常的实业生活”。现在它才发现，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因此，资产阶级渴望着重新换一个能给它以“强化的政府”和“正常的实业生活”的政权。至于无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把波拿巴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看做是 république cosaque [哥萨克式的共和国] 的破坏者和一种替他们向秩序党⁴¹⁸ 报了仇的报复工具。由于他们在12月2日以前被一系列的失败所削弱，而在1852年和1853年又整个地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需要时间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那时，共同性质的原因和其他一切阶级的普遍不满将使他们有可能重新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

下面这个来自巴黎的商业报告透露了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某些真相：

“最近一个星期巴黎的商业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不算商店老板们定购的新年礼物的生产，另外再加上成衣的缝制，商业的完全停滞似乎已经到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省的粮价昂贵，使基本居民群众无法像往常一样购买东西。小麦、栗子和葡萄在法国中部各省都歉收，所以为了得到粮食已经不得不作了许多牺牲的农民，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都不愿买别的东西。外省的来信证实，运到近日的市集上售卖的绝大部分棉纺织品都找不到主顾，卢昂的商业停滞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了。现

在全部出口貨物都只運往南美各國。有消息說，在紐約和新奧爾良市場上法國貨物也過剩，因此預計那些地方將不再定貨。往常以產品供應比利時和德國的商行幾乎已全部歇業，因為它們的外國主顧完全不向它們定貨了。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法蘭西銀行一發現前來貼現的商業期票的數量大大縮減，那就是意味着巴黎生意蕭條，而現在正好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糧食市場上，10天以來交易情況一直不好，糧價下跌，現在又顯得活躍起來了，擁有小麥的人對自己的存貨有了更大的信心。麵包店主們表現了買進面粉的極大興趣，而東部幾個省份的一些買主的出現，就最終制止了價格的下跌。由於巴黎的糧食經紀人無法完成他們在上星期三接到的定貨，所以買主都到哈佛爾去了，因為那里早先曾經宣布每巴勒降價2法郎。在買主們到了那里以後，面粉價格馬上從每巴勒44法郎上漲到47法郎，而每200公斤小麥由83法郎上漲到86法郎。類似的價格上漲情形在諾爾省的所有市場都發生了。在斯特拉斯堡糧食市場上有大量的糧食，小麥每百升降低1法郎；在里昂，市場不活躍，但價格沒有下跌。巴黎黑麥又漲價了，曾有12000公石的燕麥按每100公斤22法郎9蘇的價格售出。12月2日馬賽的一封信稱，11月1日至30日期間有341艘輪船載着804270百升小麥到達馬賽港。連這些船在內，在近4個月中一共有714艘船向馬賽運來了2102476百升的小麥。”

卡·馬克思寫於1853年12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53年12月27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3961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帕麦斯頓辭職

“阿非利加号”輪船带来的最有趣而重要的新聞，就是关于参加阿伯丁勛爵联合內閣的帕麦斯頓勳爵辭職的消息⁴¹⁹。这位不拘礼数、圓滑灵巧的策略专家使出了最巧妙的一招。那些作为內閣喉舌的倫敦報紙拚命設法使公众相信，这件事不是由东方問題上的困难引起的，而是因为做事一絲不苟的勳爵閣下作为不列顛宪制的忠实捍卫者不能同意实行議會改革，哪怕是在极其細小的程度上(細小是約翰·罗素勳爵之类的輝格党人的特点)实行議會改革他都不能同意，所以只好辞去自己的职务。这正是帕麦斯頓向他的联合內閣同僚們所讲的正式的辭職理由。但是同时他又用尽一切办法，使公众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所以不管官方報紙发表多少声明，人們仍然普遍认为議會改革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內閣对俄国的政策。从某一个时候起，特别是最近这次議會會議閉幕以来，所有亲帕麦斯頓的報紙就都这样讲。它們以各种各样的調門和形形色色的变奏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把帕麦斯頓勳爵描繪成一个反对首相的影响、反对硬要他在东方悲剧中担任不体面角色而不得結果的好汉。关于內閣分裂为两大营垒的傳說沒有断过；什么办法都使了出来，想叫英国公众做好准备，等着看仗义的子爵显示他那独特毅力的好戏。总之，戏是早已排练好

的，一切場面都設計好了，于是在后台等候的勳爵閣下就以他那惊人的敏感選擇了最适当的时机，以便一出台就能产生轰动全場的效果。

帕麦斯頓勳爵与他的联合內閣的朋友决裂恰好是在这样的時候：奧地利热切地抓住了关于举行新談判的建議；沙皇把他那阴謀的罗网撒得愈来愈广，同时，他正在挑起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人之間的武装冲突，并且威胁塞爾維亞的执政的公爵：如果在这场冲突中仍然坚守中立，他就要把他推下王座，用这种办法来把新的力量拖入战争；土耳其人白白等了一场英法舰队，結果是自己的一支区舰队被力量3倍于它的俄国舰队消灭了，而且还損失了5000名水兵；俄国船长們被允許在英国港灣和英国船舶上踐踏英国法律；“无可指摘的女王”和她的“德国亲王丈夫”所策划的王室阴謀已經尽人皆知；最后，素来懶得动的英国人民由于在国外民族自尊心遭到伤害，在國內經受了罢工、飢餓和商业停滯的殘酷考驗而变得憤恨異常，他們的行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而他們仇恨的第一个对象恐怕就是本国可怜政府。帕麦斯頓勳爵在这样的時候辞去自己的职务，就可以把全部責任从自己身上推卸給他以前的同僚們去承担。这一步驟成了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帕麦斯頓馬上就变成了代表着人民反对政府——他已同政府决裂——的人物了。他不仅挽救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使他的同僚們声名扫地以尽。既然現內閣不可避免的垮台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那末他必然要成为任何一个新內閣的成員。他不仅把命运已定的內閣抛开不管，而且还使这一內閣的继承者非接受自己不可。

帕麦斯頓在現在这个紧要关头辞职，除了挽救自己的名声并且在新政府中稳占一个突出的地位以外，还是直接为俄国效劳。俄

国外交界早就在嘲笑联合内阁笨拙，波拿巴一直猜忌联合内阁对科堡家族和奥尔良王室所表示的同情，甚至君士坦丁堡方面也开始认识到联合政府叛卖盟友、懦弱怕事的弱点了；而现在，就连它在国际领导集团中暂时可能还有的一些不大的影响也要消失了。一个丧失了统一和名誉，不被朋友信任，不被敌人尊重的政府，一个被人看做处于瓦解前夜的纯粹暂时性的东西，甚至存在本身也开始被人怀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根本无力使大不列颠在欧洲列强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将使联合政府的作用以及英国本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而对那位专制君主来说，英国的退出政治舞台哪怕是一两个星期所带来的好处，是比任何时候都大的。在大不列颠的统治集团中爱好和平的分子对主战分子占了上风。柏林的、巴黎的和维也纳的宫廷都必然会这样来解释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而土耳其御前会议也将不得不接受这种解释，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本来就已经因俄国最近的胜利而动摇了，它现在是在联合舰队的大炮保护下开会哩。

不要忘记，自从帕麦斯顿勋爵成了联合内阁的成员以来，他的国务活动与国际政治的联系只限于以下几点：他插手制造轰动一时的火药阴谋案件^①，插手于公开利用英国警察跟踪监视政治流亡者的勾当；他发表演说，开玩笑似地把俄国给多瑙河的航行设下的障碍描绘成不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他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作的庄重的演说里要下院相信，政府在东方危机中的活动是无可指摘的，议员们可以安心地散会，因为大臣们仍然各守职位；同时他还担保“俄国皇帝知荣誉和守信用”。

^① 见本卷第96—99页。——编者注

除了上面列举的一般原因以外，帕麦斯顿勋爵所以要用这种爱国的自我牺牲行为使世人震惊，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已经开始被人识破了。他身上的光彩已开始黯淡下去，他以前所做的事情已被公众知道。如果说，在帕麦斯顿公开参预推翻法兰西共和国的12月2日阴谋的时候，在他表演火药阴谋剧的时候，英国人民的错误认识都仍然没有动摇的话，那末，对勋爵阁下作过认真的研究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所进行的揭露就成了一付清醒剂。这位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著作“俄国的进展”，他在英国刊物上登载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在反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传遍整个王国的演说，都打击了帕麦斯顿的政治威信，这种打击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将显示出更大的力量。我们对恢复历史真实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对于英国人重新评价这位诡诈狡猾的国家活动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我们完全出乎意料地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塔克尔先生把两个月以前我们揭露了勋爵阁下的真面目并撕下了他那国务活动的假面具的那篇详尽的文章⁴²⁰翻印了5万份并且免费地散发了。社会舆论已经变得对勋爵阁下不利，所以他显然是想用现在这个 coup〔手腕〕来躲开即将落到他头上的种种谴责，或者挡开这些谴责。我们可以预言，他将遭到失败，他那拖延不止的国家活动家的生涯不久就要得到一个可耻的、倒霉的结局。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16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12月31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5号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⁴²¹

耽擱很久之后，我們终于收到了关于俄国正在大肆吹嘘并且已经得到慷慨奖赏的两次胜利的官方文件。当然，我們指的是俄軍在亚洲的西諾普消灭土軍舰队的海战和在阿哈尔齐赫的战斗⁴²²。这些文件都是俄国的官方报告，但是土耳其的官方报纸对此保持緘默（如果有报道的话，那就应当比圣彼得堡的报道早到我們这里），这一情况使我們毫不怀疑地认为，土耳其政府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报道。因此，我們想根据我們現有的情报来分析一下上述事件，使讀者了解真实情况。

西諾普会战是土耳其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錯誤的結果，所以会这样，只能說完全是由西方外交的恶意干涉或君士坦丁堡某些同法英大使館有联系的集团暗中勾結俄国而造成的。11月，土耳其和埃及的全部舰队都开到了黑海，想借此轉移俄国海軍將領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去注意开往高加索沿岸給起义的山民輸送武器彈药的远征队。但是，舰队在黑海里呆了18天連一艘俄国軍舰也沒有遇到。有一种說法是，俄国軍舰在这期間一直沒有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土耳其派往高加索的远征队得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种說法是，俄軍摸清了土軍的計劃，向东派出了一支舰队，对土軍的运输船只进行一般的監視，結果土軍的这些船只

沒有到达高加索沿岸便折回西諾普，同时海軍主力則回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去了。西諾普艦隊的軍艦上裝有大量火藥，其中有几艘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因火藥爆炸而被焚，看来，这证明后一种說法是正确的。

土耳其的 7 艘巡航艦、2 艘蒸汽艦、3 艘輕巡航艦、1—2 只小型艦船和几只運輸船就这样留在西諾普港灣听天由命了。西諾普港灣仅比普通的暴露的停泊場稍微多一点掩护，它是一个敞开的港口，有几个管理不善和修得不好的炮台。最好的炮台位于早在希腊皇帝时代欧洲可能还没有炮兵的时候修建的城堡內。我們現在还不清楚，怎么会让装备有約 300 門大部分是小口径炮的分艦隊听凭兵力和火炮比它多两倍的艦隊摆布，并且是在距塞瓦斯托波尔很近而最易遭受俄軍攻击的土耳其沿岸的这样一个地点听其摆布，而土耳其艦隊的主力却安靜地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游蕩。但是我們知道，土耳其大本营对这一分艦隊的危險处境非常了解并就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爭論；我們也知道，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海軍將領們曾在軍事會議上大喊大叫地发表过各种互不相同的意見，到处奔忙的大使們也曾干預这一問題的討論；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同时有消息說，一艘奧地利輪船曾向塞瓦斯托波尔报告了土軍这一分艦隊的位置。相反地，俄国的官方消息却說，是納希莫夫在亞洲沿岸巡航时发现了这支分艦隊，并且立即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但是，如果俄軍发现了西諾普的土軍，那末土軍必然会从城塔和清真寺高塔上更早地发现俄軍。为什么土耳其的炮台把本来用几天工夫便可以大致部署就緒的战斗准备工作搞得这样糟呢？为什么土耳其的船只恰恰停泊在妨碍炮台射击的地方，而不把停泊

場改在更安全的地方呢？当时要这样做的话，时间是足够的，因为正如納希莫夫海軍上将所說，他在决定攻击前曾向塞瓦斯托波尔要过 3 艘三层甲板舰。显然，土軍决不会从 11 月 24 日到 30 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白白错过 6 天的时间。逃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塔伊夫号”蒸汽舰的报道相当肯定地指明，土軍遭到了突襲。因此，在这方面决不能认为俄国的报道是确实的。

在納希莫夫指揮下有 3 艘战列舰（其中 1 艘是三层甲板舰）、6 艘巡航舰、几艘蒸汽舰和 6—8 只小型舰船。換句話說，这是一支在火炮数量上至少比土耳其分舰队多一倍的舰队。但是，納希莫夫只是在得到 3 艘三层甲板舰的增援时才决定向土軍发起攻击的，实际上仅仅这 3 艘三层甲板舰就够用了。他只是在兵力上占这样无比的优势后才发动攻击。他利用濃霧，有的还說，他用了英国旗子才无阻地接近到距土軍舰队 500 碼的地方。于是战斗开始了。俄軍舰船为避免一揚帆就被風吹到岸边，便抛下了錨。接着在双方停泊下来的舰队中間进行了 4 小时的炮战，沒有进行任何海上机动，很像一場陆上炮战。由于俄軍黑海舰队的水兵几乎都是“陆地水兵”[«land lubbers»]，特别是其中波兰犹太人占絕大多数，在大海上与拥有优秀水兵的土耳其舰队作战很少有可能获胜，所以这次能够不采取海上战术，不进行任何机动，对俄軍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俄軍仍然用了 4 个小时才压制住占劣势的敵軍舰队。此外，俄軍还占有一种优势，就是他們每发未命中目标的炮彈都可能使岸防炮台或城市受到損失。城市在敌人的舰队被完全压制住前差不多全部受到破坏，这个事实就說明未命中的炮彈比命中的炮彈多得多。根据俄国的报道，只是土耳其人的住区受到破坏，而希腊人的住区則像奇迹似的沒有受到破坏。但是与这个报道相

反，另一份比較可靠的消息证明，全城已变成了一片廢墟。

在战斗进程中，土軍有 3 艘巡航舰被燒毀，有 4 艘擱淺后也与 1 艘蒸汽舰和几只小型舰船一起被燒毀；而“塔伊夫号”蒸汽舰則割断了錨鏈，大胆地突破俄軍封鎖綫，不顾科尔尼洛夫海軍上将指揮的 3 艘蒸汽舰的追击，逃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俄軍舰队的海上机动不够灵活，土軍舰船停泊在自己炮台前面的火綫圈内而位置不利，特别是考虑到**失敗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風向許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許最好是起錨并傾全力向俄軍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当然，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机动，决定的条件是風向；但是奥斯曼-帕沙是否考虑到了这一步驟，这还是疑問。

西諾普的胜利沒有使俄軍得到荣誉。而土軍作战則空前饒勇，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沒有一艘軍舰投降。土耳其海軍損失很大，俄軍暂时控制了黑海，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軍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这一切，土耳其应当完全归功于西方外交的“善意帮助”，因为西方外交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出海保卫或护送西諾普分舰队返航。而俄国的攻击之所以能够这样准和这样稳，应当完全归功于秘密的情报。

俄国人所吹嘘的第二个胜利，是在阿尔明尼亚的阿哈尔齐赫战斗中获得的。不久前土軍在格魯吉亚边境的进攻受阻。土軍自占領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碼頭之后，就沒有攻占过任何一个有什么意义的地点，也沒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胜利。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这样的地区里：在这里，俄軍不得不在难以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这里，通往俄国的陆上交通綫只有陷于起义的切尔克斯人的包圍圈中的两条，而海上交通綫則很容易

被切断或受到威胁；俄军所占領的以梯弗里斯为中心的整个南高加索边区，与其說是强大的帝国的一个組成部分，不如說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末土军停止进攻又当作何解釋呢？土耳其人把这一情况归罪于被召回的阿勃迪-帕沙的叛变。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阿勃迪-帕沙是土耳其在亚洲唯一对俄军取得过几次地方性的局部胜利的将領。但是可以指出土军的两个錯誤，來說明土军在战局开始时为什么战果不大和随后便遭到事实上的失敗。土军把兵力分散展开在从巴士姆到巴雅澤特这条长长的战綫上。沒有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集中进攻梯弗里斯，尽管部分土军当时占領了埃里温城，但它是一座誰也不要并且要了也沒有什么好处的城市。在一个貧瘠的多山的地区，要供养一支龐大的军队是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不让军队挨餓，这就是迅速轉移和尽快集中全部物資。本来两个军就足够了：一个军掩护巴士姆和向沿岸地区攻击；另一个军通过庫拉河谷直取梯弗里斯。但是土军一直在分散兵力，而且分散得毫无必要，以致每个独立的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舰队由于外交的干涉而沒有采取行动，以致使俄国的两个步兵师（屬第五军）得以在明格列里亚登陆，从而使沃龙佐夫公爵的高加索军队几乎增加了2万人。沃龙佐夫由于得到了这些援军，不仅能在沿岸地区擋住土军，而且还能愉快地以安德朗尼科夫将军的部队解救被圍困的阿哈尔齐赫要塞。安德朗尼科夫将军的部队是在該城附近的平地战斗中击败土军的。俄国人报道說，他們在那里只用了約1万人，就把18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击潰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作为凭据，但是应当承认，在安那托利亚的土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規部队，而且差不多都沒有欧洲人担

任軍官，特別是担任高級指揮官和參謀軍官，所以就使得土軍在雙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仍弱于俄軍。俄國人說，他們繳獲了 10—12 門火炮。這大概符合真實情况，因為在這一難以通行的地帶，戰敗者不可避免地要丟掉大部分火炮。但是俄國人又承認，他們一共抓到了 120 名俘虜。這等于承認，他們在戰場上幾乎殺害了土軍被迫丟下的全部傷員。此外，俄國的報道還證明，俄軍對追擊措施，即便是局部攔截退却的敵人的措施，都考慮得很差。俄軍當時騎兵很多，如果大膽攻擊逃敵，就可能截斷整營整營的敵人的退路。然而至少根據現有的報告可以看出，這次會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重大的意義。

俄軍在多瑙河上除了重復戰局開始時的那些行動，即在曼成要塞（確切些說，是布來洛夫對面的一個突出的峭壁）的行動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看來，他們在那里收獲很少。現在我們根據可靠的材料，還可對土耳其集中在維丁的兵力進行更精確的計算。土軍有 34 000 名步兵，4 000 名騎兵，2 000 名炮兵和 66 門野炮，這里不包括維丁工事中的和卡拉法特多面堡中的重炮。因此，土軍的 4 萬兵力被用于占領由布加勒斯特直達塞爾維亞的道路。被箝制在他們所要防守的這樣長的戰綫上的 4 萬軍隊，如果用來抵抗大部隊的進攻則嫌太少，而用來對付小部队的襲擊却又過多。如果這 4 萬人和已集結在蘇姆拉的部隊一起用在別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起雙倍的作用。由於在需要的地方沒有這些部隊，再加上外交的干涉，土軍在沃耳特尼察的行動便遭到了失敗。不能設想奧美爾-帕沙會不知道，如果他能帶 10 萬人駐守在錫利斯特里亞和魯舒克之間，俄國人決不會試圖派出足以重創土軍的兵力在他面前通過和向塞爾維亞山區挺進。現在奧美爾-帕沙軍隊的部

署不可能符合他的想法，因此他一定对那些迫使他这样部署的有害势力感到非常愤怒和恼火。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 月 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71 号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从本文起，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着 1853 年俄国和西欧列强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島上的矛盾尖銳化和后来爆发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对东方問題作系統的闡述。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和通訊一样，本文在作者生前沒有翻印过。“土耳其”这一节曾同其他一些关于东方問題的文章一起，收入由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編輯的文集——卡尔·馬克思“东方問題。1853—1856 年关于克里木战争事件的論文翻印本”1897 年倫敦版(Karl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897)。由于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时署名馬克思，有时沒有署名，所以这本文集以馬克思为所有文章的作者。只是到 1913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才知道，馬克思寄到“論壇报”去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有的是整篇，有的是部分。

本文中“不列顛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馬志尼在倫敦”几节是馬克思写的，“土耳其”这一节是恩格斯写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缺第一段。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 年出版。該报由著名的美国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創辦，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站在进步的立場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該报編輯之一。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 1862

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寫的文章，涉及國際和國內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時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病態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有時竟然還刪改文章的內容。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馬克思不得不減少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通訊。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關係，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奴隸占有制各州妥協的人勢力加強和報紙離開了進步立場。——第3頁。

- 2 1853年3月，自1848年起擔任托利黨下院領袖的迪斯累里去職，帕金頓接替了他的位置。這個變化是主張在財政和貿易政策上對自由貿易派的工業資產階級作一定讓步的迪斯累里和保護關稅派的托利黨人之間長期的黨內摩擦的結果。儘管後者暫時獲勝，可是迪斯累里的路線後來仍然占了上風，這個路線反映着把舊的貴族托利黨變成英國資產階級保守派政黨的趨勢。——第3頁。
- 3 1853年3月1日帕麥斯頓在下院會議上詭稱，如果大陸上的強國要求把政治流亡者逐出不列顛群島，英國是不答应的。但是，不久阿伯丁却在上院的演講中允諾在流亡者問題上可以向大陸上各強國政府作讓步。馬克思在以前一些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通訊里曾談到這個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1、627頁）。——第4頁。
- 4 “奧地利通訊”（*«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是奧地利政府石印的半官方機關報；1850—1863年在維也納出版。——第4頁。
- 5 “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國的日報，政府的官方

机关报；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5頁。

- 6 提尔西特和約 是拿破侖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魯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条件对普魯士极为苛刻,使普魯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俄国沒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魯士割让給它的別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須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領的地方和拿破侖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侖对伊奥尼亚群島的統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鎖(即所謂大陆封鎖)。在提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調停下开始同自1806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談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簽訂了停战协定,但和約沒有談成;1809年軍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敗。——第5頁。
- 7 指神圣同盟(1815年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建立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的反革命勢力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对那不勒斯、皮蒙特和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820年10月在特劳波(奥帕瓦)开幕,1821年5月在来巴赫(柳布梁納)閉幕的一次神圣同盟會議,公开宣布了神圣同盟强国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可以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的原則。据此,来巴赫會議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地利軍隊到意大利去的决定,而維罗那會議(1822年)則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結果,这些国家里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便被鎮压下去。——第5頁。
- 8 四十年代初,由于1839—1841年土埃战争和因土埃战争各大国間的矛盾加剧,东方問題尖銳化了。土耳其苏丹的軍隊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在1831—1833年占領的叙利亞,但被击潰。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决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1839年7月27日),声称所有各大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間在近东、特別是在埃及的勢力范围問題上有爭執,結果只有英、俄、奧、普四国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軍事援助办法的倫敦公約(1840年7月15日),法国沒有参加。法国虽然已打定主意利用穆罕默德-阿

利，但不久就不得不让步，抛开穆罕默德-阿利不管了。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軍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棄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領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第6頁。

9 所謂的“正統主义原則”（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达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維也納會議（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則的內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过程和拿破侖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維也納條約都是以这个原則为基础的。同时，战胜拿破侖法国的各国統治者違反各国人民的意志，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他們所根据的与其說是复辟的“正統”君主的要求，倒不如說是他們本身的、往往互相冲突的利益。——第6頁。

10 貝朗热在“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 les funérailles d'Achille»）这首歌曲中，以隱喻的方式描繪了猥瑣低能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統主义的拥护者。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个双关語：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是傳說中在南特薩利亚的一个部落，該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統率下作战；mirmidon 也有矮胖、侏儒之意，借用指猥瑣、无能的人。——第6頁。

11 土耳其軍隊曾两次圍攻維也納，一次在1529年，一次在1683年，这两次都沒有成功。1683年波兰国王楊·薩比斯基的軍隊打退了入侵的土耳其軍隊，解救了奧地利的京城。

庫列夫查会战（保加利亚）发生于1829年5月30日，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进行的时候。結果是土耳其軍隊被击潰。——第7頁。

12 “种族”（«race»）一詞在这里是根据当时一般人对这个詞的理解而用的，当时一般人都把“第二級种族”（基本种族內的集团）同人类的各个語言上和人种上的分支混为一談。——第7頁。

13 阿尔納烏特人 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7頁。

- 14 加利埃哥人是加利西亚的山民，自古以来就住在比利牛斯半島的这个地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許多城市中，加利埃哥人形成了自己的居民点。——第9頁。
- 15 指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1849年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运动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在革命前夕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匈牙利王国的版图。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命政府拒絕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独立权。奥地利的反革命利用了这种情况，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起义軍拉过来同匈牙利人的革命軍作战。但是，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却使特兰西瓦尼亚居民受害无穷，因为在那里又恢复了匈牙利大地主的統治。——第10頁。
- 16 卢西人是資產階級人种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維納的乌克兰人的叫法，流行于十九世紀。这些地方的居民那时被强迫同乌克兰人民的基本部分分割开来。
1846年2月，当波兰试图举行起义爭取民族解放和克拉科夫的起义者取得了暫时的胜利的时候，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仇視波兰貴族的心理，往往很成功地唆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部队。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鎮压下去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殘酷的鎮压。——第10頁。
- 17 指1848年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力爭完全脫离土耳其帝国，消灭农奴制度和資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次革命被国内反动派勾結苏丹土耳其和沙皇俄国进行武装干涉鎮压了下去。——第10頁。
- 18 指克罗地亚和捷克民族运动中的地主資產階級右翼分子，这些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对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民族問題，主張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反动的哈布斯堡帝国范圍内。在1848年于阿格拉姆(薩格勒布)召开的克罗地亚沙布尔的決議中，在1848年6月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温和自由派(帕拉茨基、沙法里克)維護

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場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态度。与此相反，这个代表大会的民主左派(薩賓納、弗利契、李別尔特等等)則力爭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共同行动。——第12頁。

- 19 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于1812年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約，和約規定貝薩拉比亚割給俄国。和約还規定給予塞尔維亚以內政自治权，为塞尔維亚后来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第12頁。

- 20 加腊沙宁所領導的塞尔維亚反俄的党派的立場，是指望西方各强国的援助。1853年初，塞尔維亚公爵亚历山大根据俄国駐君士坦丁堡特使緬施科夫公爵的要求，革去了加腊沙宁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的职务。立場不同的各党派的斗争，导致了1853年塞尔維亚国内政治局勢的尖銳化。——第13頁。

- 21 1838—1842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这次战争以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計劃破产而告終。

1843年英国殖民者占領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間，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統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們的領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于1843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屬，并在摧殘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屬印度。

英国和錫克教徒战争(1845—1846年、1848—1849年)的結果占領了旁遮普(北印度)。錫克教是十六世紀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的平等教义成了十七世紀末起来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农民的指导思想。以后錫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領導了十九世紀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的錫克教徒国家。1845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錫克教显貴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錫克教徒的冲突，于1846年使錫克教徒国家变成了一个藩屬。1848年錫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1849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領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15頁。

- 22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周刊，1843

- 年于倫敦創辦；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刊物。——第16頁。
- 23 指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的擁護者1853年2月6日在米蘭發動並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義。起義者大多數是意大利的愛國工人，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奧地利的統治。可是由於起義是建立在密謀策略的基礎上，又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所以很快就失敗了。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3、624—625頁）對這次起義作了評價。——第18頁。
- 24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頭兩段。——第20頁。
- 25 “先驅晨報”（《*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國保守派的日報，1780—1869年于倫敦出版。——第20頁。
- 26 指鑄有埃及“聖”牛（阿皮斯）的錢幣；在古希臘，類似的鑄有動物的錢幣主要是在公元前五世紀流通。——第21頁。
- 27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保守派最大的日報，1785年于倫敦創辦。——第21頁。
- 28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是英國保守派的日報，1772—1937年于倫敦出版，十九世紀中葉是以帕麥斯頓為核心的輝格黨右翼分子的機關報。——第22頁。
- 29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國自由派的報紙，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46—1930年以這個名稱在倫敦出版。——第22頁。
- 30 “紀事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日報，1770—1862年于倫敦出版，輝格黨的機關報；五十年代初是皮爾派的機關報；後來是保守派的機關報。——第22頁。
- 31 “晨報”（《*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國的一家日報，1794年于倫敦創辦，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激進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第22頁。
- 32 “誠意協商”（《*sentente cordiale*》）是表示1830年七月革命後法國和

英国之間的和好的一种用語。尽管是 «entente cordiale», 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 英法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 特别是在东方問題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銳化。——第 22 頁。

- 33 “立宪主义者报” («*Le Constitutionnel*») 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15 到 1870 年于巴黎出版; 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 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核心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1851 年 12 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22 頁。
- 34 “国家报” («*Le Pays*») 是法国的一家日报, 1849 年于巴黎创办; 在第二帝国时期 (1852—1870 年) 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 該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 («*Journal de l'Empire*»)。——第 23 頁。
- 35 指 1821 年春天开始的希腊起义。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組織——赫特里准备的。1821 年 3 月, 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 (在俄国服务的希腊軍官, 在敖德薩领导一个赫特里) 的部队过普魯特河到达多瑙河各公国, 以便打进希腊, 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軍以失败而告終, 但是它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 年 1 月, 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議會宣布希腊独立, 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 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相助, 穆罕默德-阿利的軍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指揮下侵入摩里亚半島 (伯罗奔尼撒半島), 到处殘害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 神圣同盟各国, 特别是沙皇俄国, 对起义抱根本否定的态度。但是, 由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 而主要的是, 由于有可能利用这种斗争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島南部的影响, 就使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給予軍事援助。俄国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 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結果, 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按照欧洲列强統治集团的决定, 反动的君主制度被强加到了希腊人民身上。——第 24 頁。
- 36 法納尔人 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 法納尔区有錢有势的希腊人, 他們大部分是拜占庭貴族世系的后裔, 他們依仗錢財和政治联系, 在奥斯曼 (奧托曼) 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 24 頁。

- 37 1804 年的塞爾維亞起義，是塞爾維亞人民世代反對土耳其封建主統治所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史上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起義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的近衛軍對塞爾維亞人的大屠殺。1804 年 2 月，塞爾維亞人民在农村資產階級的代表、做過海杜克的格奧爾基·彼得羅維奇（格奧爾基·車爾尼）的領導下群起投入反對土耳其侵略者的鬥爭。在 1806—1812 年的俄土戰爭時期，俄國軍隊在巴爾干的順利挺進給塞爾維亞人的運動以重大支持。在這次戰爭期間，塞爾維亞人趕走了土耳其侵略者之後，於 1811 年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管理機構。按照 1812 年的布加勒斯特和約，土耳其應該讓塞爾維亞享有內政自治權，但是，蘇丹乘拿破侖軍隊入侵俄國之隙撕毀和約，於 1813 年征討塞爾維亞，並在那裡暫時恢復了自己的統治。由於 1815 年塞爾維亞人又一次實行了勝利的起義，以及俄國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鎖終被打碎。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後，土耳其在 1830 年蘇丹的特別敕令中被迫承認塞爾維亞的自治（事實上的獨立）。——第 25 頁。
- 38 納瓦林會戰（納瓦林，現名皮洛斯，是希臘的城市和港口）是 1827 年 10 月 20 日進行的以土埃艦隊為一方和以英國海軍上將愛·科德林頓指揮下的英法俄聯合艦隊為另一方的會戰。後者是歐洲列強為了武裝調停土耳其和希臘起義者之間的戰爭而開進希臘領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絕停止對希臘居民的迫害後而開始的會戰，使土埃艦隊全軍覆沒，並加速了 1828—1829 年俄土戰爭的爆發，俄國在這一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在納瓦林會戰中起了突出的作用的是俄國分艦隊，特別是在米·彼·拉扎列夫指揮下的“阿速夫號”旗艦。——第 26 頁。
- 39 *Magna Charta*——自由大憲章 (*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騎士和市民支持的起義的大封建主向英王“無地約翰”提出的一個文件。這個大憲章於 1215 年 6 月 15 日簽署，它主要是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國王的權利，並對騎士階層和城市居民作了某些讓步，但憲章沒有給基本居民群眾即農奴以任何權利。——第 27 頁。
- 40 指西方列強對俄國和奧地利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引渡匈牙利流亡者（匈牙利革命的參加者）的要求所持的立場。土耳其政府急於利用流亡

者來改組和鞏固軍隊，拒絕了這一要求。西方列強擔心俄國的影響在近東和中歐擴大，決定對俄國加以反擊，它們的干涉使衝突尖銳起來。英國政府向達達尼爾海峽派出了自己的艦隊。尼古拉一世不得不讓步，放棄關於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讓土耳其政府將流亡者驅逐出境了事。——第 27 頁。

- 41 “彼得大帝遺囑”——是西歐的政治家和政論家們用來進行反俄宣傳的一個假文件。有此“遺囑”的說法，早在 1797 年就在西方傳開了；1812 年，法國人列久爾的“論俄羅斯國家從它的產生到十九世紀初葉的發展”一書敘述了這份假遺囑的內容；1836 年，蓋亞爾德的“勳章獲得者德奧的回憶錄”一書，又使這份偽造的東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在西歐普遍都相信真有這份文件。——第 27 頁。
- 42 指奧地利警察當局由於 1853 年 2 月米蘭起義和亞諾什·李伯尼行刺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事件所採取的行動。奧地利當局以這兩個事件為借口，對有參加反政府密謀和參加匈牙利和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嫌疑的人進行了多次逮捕和瘋狂的司法迫害。——第 31 頁。
- 43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劃的陷害案件。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1852 年）的 11 名成員因被控告“密謀叛國”而被審判。罪證是普魯士警探編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偽造文件，以及警察當局從被共產主義者同盟開除的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集團那里偷來的文件。警察局根據偽造的文件和假證據判處 7 名被告 3 年至 6 年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徹底揭露了審判案策劃者的陷害勾當和普魯士警察國家對國際工人運動所採用的卑鄙手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頁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第 32 頁。
- 44 馬克思指路易·波拿巴對萊茵河東岸的要求。法國統治集團的代表從十七世紀起就把萊茵河東岸劃為法國在東方的“天然邊界”。——第 32 頁。

- 45 阿德里安堡條約是1828—1829年俄土戰爭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締結的和約。根据條約，多瑙河口及附近諸島嶼，以及庫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須承认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自治，賦予它們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納年貢），遵守以前就塞爾維亞的自治問題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并用特別敕令把这种自治法定下来。——第36頁。
- 46 指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戰爭，这两次戰爭的結果一次是布加勒斯特和約（1812年），一次是阿德里安堡和約（1829年）。关于这两次戰爭和这两个條約对确立塞爾維亞的独立的意义見注37和45。——第36頁。
- 47 亞尼納帕沙德佩林的阿利，是巴尔干半島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独立的統治者（他的屬地包括伊皮羅斯、阿尔巴尼亞、南馬其頓等及其他地区，以亞尼納城为中心），从1820年起，他同苏丹处于公开交战状态。他对土耳其軍队的作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希腊起义的胜利，但他的斗争与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带有封建分立主义的性质，終于于1822年失败。

納瓦林會戰，見注38。

由于1828年春俄土之間开始了軍事行动，同年8月法国軍队在梅桑將軍率領下开到希腊南方，开进摩里亞（伯罗奔尼撒），几乎没有遇到土耳其埃及軍队的抵抗就占領了这个半島。这次以援助希腊人为名的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英、俄、法三国代表的倫敦會議于1827—1829年举行。这次談判的內容是希腊問題。1827年7月6日，三大强国在倫敦締結了一个公約，确认英俄1826年4月4日（3月23日）在彼得堡簽訂的議定书，并承认希腊的自治权。像議定书一样，在公約中三强協議在外交上承认希腊和武力調停希土冲突。根据这个協議，三强向希腊領海派去了联合舰队，参加了納瓦林會戰。在倫敦會議上还簽署了其他許多有关希

- 腊的文件,其中包括 1829 年 3 月 22 日的議定书,这份議定书确定了希腊的国界,并規定在希腊建立君主政体。但是,这些協議以及英法两国的外交行动(英法力图通过外交途徑解决冲突,以免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被击潰),并没有动摇土耳其政府在希腊問題上的不妥協的立場,只是俄軍在 1829 年战局中的胜利才迫使土耳其政府让步。——第 36 頁。
- 48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刊載的原文中,編輯部曾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如下一段話:“現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責任就是:尽一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揚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賴于此。要想丰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費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第 40 頁。
- 49 “普魯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的周报,1851—1861 年在柏林出版。——第 41 頁。
- 50 “时代报”(«*Die Zeit*»)是德国保守派报纸,从 1851 年至 1858 年在柏林出版。——第 41 頁。
- 51 “新聞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階級自由派日报,从 1848 年至 1894 年在維也納出版;在 1861—1862 年,当該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場时,发表过馬克思的文章和通訊。——第 42 頁。
- 52 “解放”(«*L'Emancipation*»)是比利时日报,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机关报;1830 年在布魯塞尔創刊。——第 42 頁。
- 53 見卡·馬克思“弗兰茨-約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顛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說。——拿破侖的遺囑”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0 頁)。——第 43 頁。
- 54 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間諜活动的受害者”,該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1853 年 4 月第 1、8、15 和 22 期。
“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资产階級流亡者于 1852

年在紐約創办的周报。从1853年3月18日起到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第44頁。

- 55 維多克“回忆录”1828—1829年巴黎版第I—IV卷(Vidocq. «Mémoires». T. I—IV, Paris, 1828—1829)。該书是否即为維多克所作,尚屬疑問。

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謝努的“密謀家。秘密組織。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軍”1850年巴黎版(A. 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

律·德拉奧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誕生”1850年巴黎版(L. De la Hodde.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

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写了一篇书評来分析批判謝努和德拉奧德写的书,这篇书評发表在“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杂志1850年第4期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29頁)。——第44頁。

- 56 菲·庫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驅使而作了間諜工作。——第44頁。

- 57 即希尔施和其他警探根据普魯士警察当局的指示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會議的原本記錄,这个伪造的會議記錄在科倫案件中曾被用来作为控告材料,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对这个伪造材料作了詳細的分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517頁)。——第45頁。

- 58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頁)。这一著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没有发表。1930年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保存在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学遺產中的手稿譯成俄文第一次发表。——第45頁。

- 59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

tisch-ökonomische Revue)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創辦、1850 年 11 月停刊的雜誌。它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的機關刊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的繼續。該雜誌從 1850 年 3 月到 11 月底總共出了 6 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 兩期合刊)。雜誌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誌。雜誌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此外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約·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雜誌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雜誌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辦。——第 45 頁。

- 60 “新的財政把戲或格萊斯頓和辨士”一文，是馬克思在“人民報”上發表的第一篇論述阿伯丁聯合內閣的預算的文章，與此同時，馬克思也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關於同一問題的文章。

“人民報”(«*The People's Papers*») 是憲章派的週報，1852 年 5 月由革命的憲章派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倫敦創辦。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報撰稿，同時對編輯工作也給予幫助。除了專為“人民報”寫的文章外，“人民報”還轉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在這個時期，該報是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由於琼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為“人民報”撰稿並暫時和琼斯斷絕關係。1858 年 6 月該報轉到資產階級投機商人手裡。——第 49 頁。

- 61 本表中的統計資料，馬克思主要取自威·科貝特的著作“紙幣對黃金”1828 年倫敦版第 21—25 頁(W. Cobbett. «*Paper against Gold*», London, 1828, pp. 21—25)。

科貝特根據英國 1752 年前通行的歷法(按這種歷法，新年是從 3

- 月 25 日算起) 确定女王安即王位的日期在 1701 年 (按新历是 1702 年)。在“人民报”发表的文章中, 本表的第二部分即“国家支出”有誤, 即把 1809 年的国家支出总额 (82 027 288 英鎊) 誤为 1801 年。本版根据科貝特訂正。——第 49 頁。
- 62 摘自 1853 年 4 月 8 日下院討論格萊斯頓的預算时迪斯累里的发言。——第 51 頁。
- 63 南海公司 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諸島貿易的名义下于 1712 年前后在英国成立的, 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的特许和壟断权, 其中包括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 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 这种活动在 1720 年以公司破产告終。該公司的活动使英国国債进一步增加。——第 51 頁。
- 64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同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新的財政把戏或格萊斯頓和辨士”原文相同的那一部分被略去 (見本卷第 60—63 頁, 从“1. 每 100 英鎊……”起至“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財政状况的机会”止)。——第 56 頁。
- 65 根据英国議會通常的程序, 在討論某些重要問題时, 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开会, 由下院議長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 主持會議。——第 56 頁。
- 66 指 1853 年 2—3 月下院討論梅努特 (爱尔兰) 神学院的教育制度問題。这个学院于 1846 年創辦, 它的目的是把爱尔兰天主教僧侶吸引到英国統治階級方面来, 以此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 63 頁。
- 67 馬克思引自 1853 年 4 月 16 日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厄內斯特·琼斯的文章“人民之友”。——第 66 頁。
- 68 爱尔兰旅 是大不列顛議會中的爱尔兰議員所組成的派別。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員是民族运动中的右翼和妥协派的代表, 他們代表着爱尔兰資產階級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 在这一派中, 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

在托利党和輝格党勢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派一起,能够动摇議會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議會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第 66 頁。

- 69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論者,主張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論者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紡織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論者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66 頁。
- 70 英国的“知識稅”(«*Taxes on Knowledge*»)包括報紙廣告稅、報紙印花稅和紙張稅。——第 66 頁。
- 71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頓与法国駐倫敦大使会談,贊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馬克思称路易·波拿巴为薩托里广场的英雄,是指 1850 年秋天在凡尔賽附近的薩托里广场的軍事檢閱,路易·波拿巴想把这次檢閱变成拥戴波拿巴的游行)。帕麦斯頓这样做沒有商得輝格党内閣其他閣員的同意,結果使他于 1851 年 12 月提出辞职,而在原則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頓的观点是沒有分歧的,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1852 年 12 月阿伯丁联合內閣成立,帕麦斯頓任內务大臣,他对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发起了司法迫害和警察迫害,并在报刊上进行反对他們的誹謗宣傳。流亡者的往来信件遭到暗中檢查;英國內务部向奥地利及其他反动的大陆国家的警察当局提供有关流亡者的活动和計劃的情报,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監視流亡者。帕麦斯頓用忠于宪法原則和民主原則的伪善詞句来掩飾这些反革命行为。——第 67 頁。
- 72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 1525 年在帕維亞同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交战失败被俘后曾写信給母亲說:“除了名譽以外,一切都丢了。”——第 67 頁。
- 73 指 1818 年德国学者約·賽·埃尔希和約·哥·格魯伯在萊比錫开始

出版的“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1890年完成,共167卷。——第67頁。

- 74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在发表本文时,于同号(1853年5月6日)報紙上就該文加了如下的編者按語:“本报讀者在今日早晨的一期‘論壇報’上发表的本報倫敦通訊員馬克思博士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对格萊斯頓先生預算的巧妙說明以及英国現有各党派对这个預算的态度。我們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碰到更为一針見血的对这个預算及其編制者的批評,我們也沒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两节。——第77頁。

- 75 指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魯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簽訂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倫敦議定书。該条約是以1850年7月4日倫敦會議的上述参加国(普魯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領地不可分割的原則的議定书为基础的。倫敦議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烏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棄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給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呂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覬覦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第77頁。

- 76 指1850年羅馬教皇試图为英国指派天主教主教,此事激起了英国国教会和英国政府的反对。在1851年頒布了一項法律,宣布教皇的指派无效。——第77頁。

- 77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s»)是德国資產階級的日报,从十七世紀至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77頁。

- 78 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德国广泛迷信招魂术。——第77頁。

- 79 馬克思稍加改动援引了1789年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夕出版的艾·約·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級?”(«Qu'est-ce que le tiers-

- état?»)里下面一段話中的第一句。這段話是：“什麼是第三等級？——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麼？——什麼也不是。——它要得到什麼？——一個地位。”——第 81 頁。
- 80 印刷所廣場是倫敦的一個廣場，“泰晤士報”編輯部所在地。——第 82 頁。
- 81 梅費爾派或梅費爾激進派是假激進派（摩耳斯沃思、貝爾納·奧斯本等人）集團的綽號，他們實際上代表向民主派獻媚的那一部分英國貴族。“梅費爾派”一詞從倫敦豪華區之一的名稱梅費爾而來，這個區是貴族的私邸區。——第 85 頁。
- 82 指阿伯丁聯合內閣，特別是這個內閣的內務大臣帕麥斯頓對僑居在英國的政治流亡者所持的反動立場，以及這個政府為奧地利及其他各國的警察當局效勞，幫助它們反對革命民主運動的行為（見注 71）。——第 86 頁。
- 83 根據英國議會通常的程序，在討論有關彌補國家開支的許多重要問題時，下院即宣布作為籌款委員會（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開會。這是下院作為全院委員會開全體會議的一種場合（見注 65）。——第 88 頁。
- 84 “瑞士的暴動”一節本來是恩格斯寫的、由馬克思寄往紐約的另一篇文章的一部分，“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在發表馬克思本文時，把這一部分也加了上去，本版按當時在“論壇報”刊載的形式刊印。恩格斯寫的那篇文章的標題是“瑞士共和國的政治地位”（見本卷第 101—108 頁），由馬克思署名發表在“論壇報”上。——第 96 頁。
- 85 指“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 頁）。這篇文章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寫的（馬克思當時正忙於寫“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這一抨擊性著作），發表在“論壇報”上，由馬克思署名，因為恩格斯不是該報的正式通訊員。——第 96 頁。
- 86 馬克思大概是指另一篇沒有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這篇文章沒有下落。——第 98 頁。

87 宗得崩德是由瑞士7个經濟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为了抗拒瑞士进步的資產階級改革、維護教會和耶穌會教徒的特權而組成的分离派联盟。瑞士联邦議会1847年7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決議，是宗得崩德在同年11月初对其他州发起軍事行动的导火綫。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联邦政府軍击潰。天主教僧侶和城市貴族上层当中領導过宗得崩德的反动分离派分子，在宗得崩德被击潰后仍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第99頁。

88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之后接着又略加刪节以“瑞士”为标题用德文刊載于1853年6月1日和4日的紐約“改革报”。从此以后，“改革报”就常常刊登馬克思在“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譯文或摘要。在“改革报”上轉載馬克思載于“論壇报”的文章的，主要是前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員約·魏德迈和阿·克路斯。

“改革报”(«Die Reform»)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該同盟的多数成員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該报从1853年3月5日至1854年4月26日在紐約用德文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从1853年10月15日改为日刊。該报的編輯之一是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約瑟夫·魏德迈，該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內都保持着激进的性质。該报时常轉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文章，馬克思也約請自己的同志(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該报撰稿。这家报纸也受到編輯部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末期占了上風。——第101頁。

89 指維也納會議(1814年9月—1815年6月)。1815年3月20日，几个大国，即維也納會議的参加国签署了一項关于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宣言。——第101頁。

90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在1851年12月—1852年1月間，这次冲突是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驅逐法国的共和主义流亡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反对者而起的。在1836年，瑞士政府曾受到法国七月王朝的带有軍事行动的威胁，因为当时瑞士政府让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

路易·波拿巴本人，在瑞士避难；这次，瑞士政府又像 1836 年一样，被迫作了重大的让步。

紐沙特尔（德文名是諾恩堡）是瑞士的一个州，这个州同时又是普魯士君主国的藩屬。由于 1848 年 2 月資產階級革命，紐沙特尔州宣布脱离普魯士，成立共和国。因此在普魯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間便发生了尖銳的冲突。这次冲突一直繼續到 1857 年，只是由于其他大国特别是法国进行了外交干涉，普魯士国王才被迫放棄了对紐沙特尔的要求。

奥地利与瑞士在 1853 年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在 1853 年 2 月 6 日米兰起义失敗后从奥地利統治下的那些意大利州，特别是从倫巴第州，流亡到瑞士的德森州居住。——第 102 頁。

- 91 見恩格斯的“瑞士的內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 1847 年 11 月 14 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上，該报从 1847 年秋实际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85—393 頁）。——第 102 頁。
- 92 1851 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义者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軍杀死統治中国的滿族封建主，取消捐稅，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个起义也帶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的农民运动所常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滿清王朝的佛教僧侶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給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外国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开了一个头，但它并没有消灭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封建上层，他們与統治階級妥协，这就成了运动衰落的原因之一。革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是打着“中立”的幌子援助滿清王朝），它們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們的軍隊，于 1846 年把太平軍起义鎮压下去了。——第 109 頁。
- 93 指第一次鴉片战争（1839—1842 年）。这是一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从这次战争开始，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当局在广州焚毁了外国商人的鴉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封建落后的中国战败的机会，强迫中国签订掠夺性的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五个海港（广州、厦門、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島割給英国作“永久的屬地”，給英国巨額賠款。1843年又补充规定，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第111頁。

94 指的是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第112頁。

95 十七世紀初中国开始受到联合起来的滿族各部落的威胁（它們同突厥—蒙古部族一起又叫韃靼人，这个名称来自成吉思汗帝国形成时期居住在蒙古和滿洲东北部的一个部落）。滿族入侵的結果是在中国建立了滿清王朝（1644—1912年）。由于明朝末年封建的国家发生危机，以及一部分中国封建主害怕农民起义而投到侵略者方面去，就使滿族人得到有利的条件征服了中国。但是中国人民进行了頑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在1683年以前一直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性质的。——第115頁。

96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顛国債条款变更”这一部分。——第117頁。

97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参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維尔特，弗·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格·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萊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們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的严重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論，通常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笔的。

“新萊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普魯士政府以及科倫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它在創刊后

的最初几个月里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資產階級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魯士 1848 年 10—12 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萊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 年 5 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取得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被驅逐和“新萊茵报”其他編輯的被迫害，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 年 5 月 19 日用紅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 301 号“新萊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編輯們宣布：“無論何时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第 118 頁。

98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 179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119 頁。

99 印度三管区 是根据英屬印度的行政区划，由东印度公司任命的省督管轄的孟加拉、孟买和馬德拉斯三个地区的名称。根据 1773 年的印度管理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領地的总督。

唐宁街 是倫敦市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所在地。——第 120 頁。

100 指自由貿易論者約翰·狄金逊于 1853 年 3 月創立的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第 120 頁。

101 这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羅馬教会之間一个多年的糾紛，即关于所謂“圣地”即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的基督圣地的管轄权問題。这个糾紛在 1850 年又被路易·波拿巴挑起，不久就扩大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之間的激烈的外交冲突，俄国保护正教教会的特权，法国支持天主教徒。双方都利用这一糾紛爭夺近东霸权。搖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 1853 年 5 月 4 日，在緬施科夫到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別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相应的苏丹敕令是一个月以后頒布的)。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絕了尼古拉一世关于要求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第 121 頁。

- 102 “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的資產階級日報“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稱,1789年在巴黎創刊。七月王朝時期,它是政府的報紙,是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它反映着反革命資產階級即所謂秩序黨的观点。1851年政變以後,它是溫和奧爾良反對派的機關報。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該報的一段話,對於緬施科夫遞交最後通牒的日期報道得不確實,確實日期應該是1853年5月5日,而不是5月7日。——第121頁。
- 103 庫楚克-凱納吉條約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戰爭俄國戰勝後,兩國於1774年7月21日(10日)簽訂的和約。根據這個條約,俄國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間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還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和叶尼卡列,並且迫使土耳其承認了克里木的獨立,為俄國以後合併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國商船獲得了自由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權利。條約還規定蘇丹應給予希臘正教教會一系列特權,其中包括第十四款關於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規定。——第122頁。
- 104 指1853年奧地利同皮蒙特(撒丁)斷絕外交關係一事,斷絕外交關係的原因,是由於皮蒙特當局給予從倫巴第(受奧地利管轄)流亡到撒丁的那些參加過1848—1849年民族解放運動和1853年2月6日米蘭起義的人以保護。——第125頁。
- 105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是法國革命民主派的週報,該報從1789年7月到1794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125頁。
- 106 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是法國皇帝以後,尼古拉一世根據同奧地利宮廷和普魯士宮廷的約定,對路易·波拿巴沒有使用“正統”君主間通常的稱呼“國王陛下和親愛的兄弟”,而使用了“國王陛下和善良的朋友”這個稱呼,並且沒有稱他為“皇帝拿破侖三世”,而稱之為“皇帝路易·拿破侖”。奧地利宮廷和普魯士宮廷則違反約定,對法國皇帝使用了通常的稱呼,但它們也都強調必須遵守維也納會議的決定,以此暗示路易·波拿巴政權不合法,因為維也納會議決定不許波拿巴王朝

- 占据法国王位。——第 126 頁。
- 107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创办于 1841 年；該报 1850 年代表着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謂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126 頁。
- 108 “新聞报”（《*La Presse*》）是一家資產階級日报，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1848—1849 年它是法国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报纸，后来又成为反波拿巴的报纸；該报的編輯是艾米尔·德·日拉丹。——第 126 頁。
- 109 比尤克德利 是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博斯普魯斯海岸的一个別墅区，俄国駐土耳其使館的避暑官邸就在那里。——第 126 頁。
- 110 “世紀报”（《*Le Siècle*》）是从 1836—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它反映一部分只限于要求温和宪制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的观点；在五十年代，它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127 頁。
- 111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这篇文章的前两段缺。——第 132 頁。
- 112 这里所說的那篇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沒有发现。——第 132 頁。
- 113 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它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 年創刊，从 1810 到 1882 年底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133 頁。
- 114 指 1853 年出版的爱·斐·波蒙-瓦西著作的第 6 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是“維也納會議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1843—1853 年巴黎版，共 6 卷（《*Histoir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epuis le Congrès de Vienne*》，t. 1—6, Paris, 1843—1853）。第 6 卷的标题是“俄罗斯帝国”（《*Empire Russe*》）。馬克思在下面引用的是該卷第 346—347 頁。——第 134 頁。
- 115 指戴·烏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这本小册子中的“北方”

(«The North»)篇第二部分 («The Danish succession»)。**馬克思**要写的这篇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沒有出現。——第 135 頁。

116 威利派 或 美以美教派,是約翰·威利于十八世紀在英國創立的一個教派;十八世紀末脫離英國國教會,並作為新教的一個變種在美國和加拿大得到廣泛的傳播。威利教派的特点是要求嚴格地、系統地履行宗教儀式和教會的其他規定。——第 137 頁。

117 馬克思在撰寫本文時用了恩格斯 1853 年 6 月 6 日寫給他的信中所敘述的某些見解。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缺少前兩段。——第 143 頁。

118 林加崇拜 即對濕婆神的崇拜,盛行於南印度的林加崇奉者教派中(“林加”是濕婆的象徵)。這一印度教派不承認種姓的劃分,反對齋戒、祭祀和朝聖。

札格納特 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濕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納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儀式上的十分豪華和極端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表現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殘害。在舉行大祭的日子裡,某些教徒往往投身於載着毗濕奴神像的車輪下讓它軋死。——第 144 頁。

119 莫臥兒 是十六世紀初葉從中亞細亞東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們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臥兒帝國(大莫臥兒是這個帝國的王朝的名稱)。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莫臥兒帝國的創始人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後裔,這就是“莫臥兒”一詞的由來。莫臥兒帝國的勢力擴張得很大,在十七世紀中葉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於農民起義和印度各民族對伊斯蘭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強,以及他們經常的內訌和封建割據趨勢的日益加強,大莫臥兒帝國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紀的上半世紀實際上已完全瓦解。

七國爭雄 是英國史編纂學中用以表示英國在中世紀初期的政治體制的術語,當時英國分為七個盎格魯撒克遜王國(六至八世紀)。**馬克思**在這裡借用這個名詞來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據狀態。——第 144 頁。

- 120 位于孟买北部的薩尔賽达島，以 109 座佛教石窟而聞名。——第 144 頁。
- 121 “听之任之”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經濟學家的信條，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範圍內的任何事務。——第 146 頁。
- 122 馬克思所引用的是 1812 年發表的下院委員會的報告。引文摘自喬·坎伯爾“現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 1852 年倫敦版，第 84—85 頁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84—85)。——第 148 頁。
- 123 “地球報” (*The Globe*) 是英國的一家每天出版的晚報“地球和旅行家” (*The Globe and Traveller*) 的簡稱，1803 年起在倫敦出版，輝格黨機關報，在該黨執政時期是政府報紙；1866 年起是保守黨的機關報。——第 152 頁。
- 124 只適用於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時工作日法律，是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國議會通過的。禁止以實物作工人的勞動報酬的法律是 1831 年通過的。但在實際上許多工廠主都不遵守這些法律。——第 152 頁。
- 125 指 1825 年英國議會通過的結社法或工人聯合法。這項法律重申廢除議會在 1824 年禁止工人團體 (工聯) 的決定，但嚴格限制工人的活動。例如，僅僅宣傳工人結社和參加罷工就被看做“強制”和“暴力”，給以刑事懲罰。——第 152 頁。
- 126 指 1846 年 8 月 2 日在黑石山脊憲章派組織的群眾大會。瓊斯當時要去參加的群眾大會是 1853 年 6 月 19 日舉行的。——第 152 頁。
- 127 “新聞報” (*The Press*) 是英國的一家週報，托利黨機關報，1853 年至 1866 年在倫敦出版。——第 155 頁。
- 128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缺少“預算。——報紙附刊稅。——議會的舞弊”這幾節。——第 160 頁。
- 129 指 1853 年 5 月 4 日“圣地”問題 (見注 101) 解決以後緬施科夫以最後通

- 牒的形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条約草案。草案規定，不仅要保证土耳其帝国的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要实际承认俄国沙皇對他們的保护权。这一草案被苏丹拒絕。——第 161 頁。
- 130** 1812 年俄国和土耳其簽訂的布加勒斯特条約确认两国过去关于承认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自治权所达成的協議，确认早在 1774 年庫楚克-凱納吉条約所規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根据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約的規定，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在內政管理的一切事务中都有自治权，并且实际建立了俄国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俄国还得到了占領这两个公国、干預它們的国家制度和国君人选的权利。——第 162 頁。
- 131** 巴尔塔利曼尼条約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軍隊进駐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鎮压革命运动以后，于 1849 年 5 月 1 日（4 月 19 日）簽訂的協議。根据这一条約，占領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軍隊直到 1851 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則；条約还規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軍事占領的許多措施。馬克思在下文中引用的是条約第四条的內容，文字是經過馬克思通俗化的。——第 162 頁。
- 132** 1841 年公約是 1841 年 7 月 13 日俄国、英国、法国、奧地利、普魯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倫敦簽訂的关于黑海海峽的公約。公約規定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达达尼尔海峽在和平期間对外国軍艦封鎖。公約沒有涉及战时的海峽制度，因而土耳其有理由在战时自行决定是否允許外国軍艦通过。——第 163 頁。
- 133** “国民議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統君主派的日报，1848 年到 1857 年在巴黎出版。——第 164 頁。
- 134** 指涅謝尔罗迭总理大臣 1853 年 5 月 31 日（19 日）給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把緬施科夫使团的失败归罪于土耳其政府，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接受緬施科夫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所提出的关于保证苏丹的希腊正教臣民的特权的要求，即要求实际建立沙皇對他們的保护权。涅謝尔罗迭以采取軍事手段进行威胁，暗

- 示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絕时将出兵占領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在列施德-帕沙 1853 年 6 月 16 日(4 日)的回信中,土耳其在英法兩国的支持下拒絕了沙皇政府的要求。——第 165 頁。
- 135** “馬賽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 是法国資產階級的日报, 1827 年到 1945 年在馬賽出版。——第 165 頁。
- 136** 七年战争(1756—1763) 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間的战争: 一方是英、普, 另一方是法、俄、奥。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和貿易方面的竞争。两国之間的軍事行动, 除海战外, 首先是在这两国的美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領土上进行的。在东方的主要战区是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对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 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并利用战争侵占了許多印度領土。七年战争的結果, 法国丧失了几乎所有在印度的領地(只剩下五个沿海城市, 这些城市的工事都必須毀掉); 英国的殖民势力大大加强了。——第 168 頁。
- 137** 詹姆斯·穆勒“英屬印度史”(J. Mill.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dia*»), 1818 年出第 1 版。在 1858 年的版本中, 馬克思所引用的地方見第 5 卷第 6 册第 60 頁和第 65 頁; 上面关于督察委员会的权限的引文, 也是引自穆勒的这本书(1858 年版第 4 卷第 5 册第 395 頁)。——第 170 頁。
- 138** 指 1832 年 6 月英国議會进行的对选举权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 这次改革为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进入議會开辟了道路。这一斗争中的主力即无产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自由派資產階級所欺騙, 沒有得到选举权。——第 170 頁。
- 139** 馬克思列举的这几次侵略战争, 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侵占印度領土和实行殖民奴役而在印度进行的战争, 这几次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打倒主要的殖民地竞争者——法国东印度公司。

卡尔納梯克(印度东南部的一个王国) 战争从 1746 年起, 停停打打, 直到 1763 年。交战双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都以支持在这个王国中争权夺势的地方人物为名, 进行着征服卡尔納梯

克的斗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胜利，他们早在1761年1月就占领了法国在印度南部的主要据点龐迪契里。

1756年，孟加拉的納瓦布为了防止英国人入侵他的領地，对英国人开战，夺取了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的根据地加尔各答。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克萊夫的指揮下，很快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摧毁了支持納瓦布的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工事設施，并于1757年6月23日在普拉西打败了納瓦布的军队。1763年，在淪为公司附屬領地的孟加拉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英国人在占领孟加拉的同时又占领了屬孟加拉納瓦布管轄的恒河中游省份比哈尔，1803年征服了孟加拉以南的奧里薩，这片領土上的几个封建王国都落到了公司手中。

在1790—1792和1799年，东印度公司同南印度的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迈索尔进行战争。这个王国的首脑是提普·薩希布，他在过去就曾参加过迈索尔同英国人的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死敌。第一次战争的结果，迈索尔的一半領土被公司和与公司結盟的封建王公侵占。第二次战争迈索尔彻底失败，提普死，迈索尔淪为藩屬王国。

軍费补助金制度，或称軍费补助合同制度，是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各王国的統治者变成它的藩臣的形式之一。有的合同規定王公必須供养(补助)駐扎在他们領土上的公司的军队；还有些合同硬把一些附有盘剝条件的貸款强貸給王公，不履行这些条件就沒收領地。上述这些合同是最常見的合同。——第171頁。

140 关于征服信德和旁遮普，見注21。——第171頁。

141 托·曼·“英印貿易論：兼答通常反对貿易的各种異議”，1621年倫敦版(T. M [un]. «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into the East-Indies: Answering to diverse Objections which are usually made against the same». London, 1621)。——第172頁。

142 [J. Child]. «A Treatise Wherein is Demonstrated I. That the *East-India* Trade is the most National of all Foreign

- Trades», London, 1681. 用 *φιλοπατρις* (爱国者) 笔名发表。——第 172 頁。
- 143 [約翰·波累克斯芬]“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 兼答‘东印度貿易概論’一书”。1697 年倫敦版 ([J. Pollexfen]. «England and East-India Inconsistent in their Manufactures. Being an answer to a treatise, intituled, an Essay on the East-India Trade», London, 1697)。——第 172 頁。
- 144 十九世紀初, 英国殖民主义者就着手征服緬甸, 第一次緬甸战争 (1824—1826) 的結果, 东印度公司的軍隊占領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薩姆省和沿海的阿拉干、典那沙冷。第二次緬甸战争 (1852) 使英国人占領了勃固省。由于第二次緬甸战争結束之后沒有簽訂和約以及于 1853 年 2 月即位的新的緬甸国王不承认勃固被占, 所以在 1853 年人們估計会对緬甸采取新的軍事行动。——第 175 頁。
- 145 約翰·狄金逊: “官僚当局对印度的管理”。1853 年倫敦—曼彻斯特版, 第 50 頁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50)。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 (India Reform) 出的第 6 册书。——第 176 頁。
- 146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有关“印度問題”这一节即本文第一段。——第 177 頁。
- 147 馬克思批評的編輯部的文章发表在 1853 年 6 月 25 日“泰晤士报”上。——第 178 頁。
- 148 F. W. Newman.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 p. 137, 141. ——第 182 頁。
- 149 赫·斯宾塞“社会靜力学, 或論人类幸福的重要条件及对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的詳細分析”, 1851 年倫敦版第 114—116、122、123、125 頁 (H. Spencer. «Social Sta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London, 1851, pp. 114—116, 122, 123, 125)。——

- 第 183 頁。
- 150 本文的第二个标题（“英国的工人运动”）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加。——第 184 頁。
- 151 “綏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时期干涉土希冲突时在外交文件中的用語。——第 185 頁。
- 152 引自戴·烏尔卡尔特在倫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資料汇编《Portfolio》中 1826 年 12 月 22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报告。这一套名为“文件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的丛刊于 1835—1837 年出版；另一套名为“文件集。外交評論”（《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丛刊于 1843—1845 年出版。馬克思援引的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信发表于“文件集”1836 年倫敦版第 1 卷第 7、8、9 期，第 2 卷第 13 期及“文件集”1843 年倫敦版第 2 卷第 2 期。——第 185 頁。
- 153 关于 1827 年 7 月 6 日的倫敦条約（公約）見注 47。——第 185 頁。
- 154 涅謝尔罗迭 1853 年 6 月 11 日（5 月 30 日）的照会是发给俄国駐外使节的一份周知照会，它表述了沙皇政府鉴于緬施科夫使团所得的結果而采取的立場。涅謝尔罗迭在严厉抨击土耳其政府的行动的同时，申述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說，如果土耳其拒絕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决措施”。——第 187 頁。
- 155 指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漲年代会员达到 4 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領袖有小资产阶級思想意識。1848 年宪章派失敗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 1851 年的宪章派大会通过的綱領中有所反映。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暂时得势和宪章运动走向低潮，协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 192 頁。

- 156 盖米季于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說中的一段話引自1853年6月25日的“人民报”。——第193頁。
- 157 琼斯于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說中的一段話引自1853年6月25日的“人民报”。——第195頁。
- 158 見注126。——第195頁。
- 159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土耳其战争問題”这一节。——第197頁。
- 160 引自“文件集”1836年倫敦版第4卷第27号第10—12頁。——第198頁。
- 161 “維也納勞埃德氏报”（*«Wiener Lloyd»*）是奧地利保守派报纸，1848年9月起在維也納刊行，一直出版到1854年。——第198頁。
- 162 布萊特指1853年5月6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及这一号上刊載的馬克思的文章“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預算”（見本卷第77—86頁）。——第199頁。
- 163 乔·坎伯尔“現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倫敦版第263—264頁（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263—264）。——第205頁。
- 164 撒提 是印度过去的一种風俗，即把寡妇同丈夫的遺体一起燒掉。——第206頁。
- 165 印度大厦（或东印度大厦）是倫敦东印度公司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在萊登霍尔街。——第207頁。
- 166 G. Campbell. *«A Scheme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London, 1853. ——第207頁。
- 167 这里指参加英国內閣的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印度事务大臣一职是东印度公司1858年撤銷后設置的。——第208頁。
- 168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

- cracy». *India Reform* № VI,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15—16. ——第 208 頁。
- 169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215. ——第 208 頁。
- 170 引自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India Reform* № VI,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15. ——第 209 頁。
- 171 指 1845—1851 年英国考古学家累亚德所进行的古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的发掘工作。——第 210 頁。
- 172 指馬克思的“議會辯論。——僧侶和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餓死”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9—615 頁)。——第 213 頁。
- 173 見馬克思的“选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69—576 頁)。——第 214 頁。
- 174 針綫街 是倫敦的一條街道，英格蘭銀行的所在地。“馬克沃姆”(«muckworm») 这个英国詞的意思是粪蛆，这里諷刺性地用了它的轉义——“守財奴”、“吝啬鬼”。——第 214 頁。
- 175 济貧法 是 1834 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許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貧民，就是将他們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獄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獄”。——第 214 頁。
- 176 1850 年 8 月 5 日議會通过一項法律，規定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为十小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時間。這項法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工人們抗議高等控訴院所作的关于工厂主違反 1847 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一案的決定，這項決定事实上是准許了这种犯法行为。1850 年的法令禁止工厂主采用輪班工作制規避 1847 年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东西。——第 216 頁。

- 177 見注 80。——第 217 頁。
- 178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教派于 1816 年在倫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組織。协会得到了自由貿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貿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貿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第 218 頁。
- 179 暗示帕麦斯頓对 1847 年英希冲突所采取的立場。这次冲突是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以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为借口，把自己的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頓在議会上发表侵略性的演說，为英国的行动辯解，认为必須維護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羅馬的公民相比。帕麦斯頓所使用的“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一語意味着种种特权和羅馬公民身分所給予的尊貴地位。——第 219 頁。
- 180 指所謂的“士麦那事件”，它是 1853 年夏季由于奥地利駐士麦那領事命令逮捕美籍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而发生的。科斯塔被捕后，即被押往奥地利的“驃騎兵号”軍艦。因此，流亡者同某些奥地利的海軍軍官在士麦那发生了一場武装冲突。美国的“圣路易号”軍艦的舰长英格拉哈姆干涉了这个事件，他依照美国駐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布朗的意見，用最后通牒方式要求奥地利軍艦的舰长釋放科斯塔。由于其他强国的領事进行干涉，武装冲突被及时制止。經過几个月的談判，科斯塔获釋，回到美国。——第 220 頁。
- 181 見注 103。——第 221 頁。
- 182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締結的条約。在条約簽訂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波斯普魯斯海峽地区安吉阿尔-斯凱萊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埃及起义軍首領穆罕默德-阿利的軍队。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調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締結了和約，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給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險已經过去，但沙皇的外交利用緊張局势和俄軍駐扎土耳其

- 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締結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中列入了一項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須禁止任何外国軍艦通过海峡,而俄国軍艦除外。这项条文一直生效到1839—1841年新的埃及危机(見注8)发生的时候,这时尼古拉一世同英国以及其他强国商討对付穆罕默德-阿利的共同行动,由于列强的坚持,尼古拉一世才承认在和平期間禁止一切国家的軍艦通过海峡的原則。——第222頁。
- 183 卡夫丁峡谷 (*Furcae Caudinae*) 在卡夫丁城(古羅馬)附近。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薩姆尼特战争时期,薩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羅馬軍隊,并且强迫他們負着“牛軛”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敗軍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語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222頁。
- 184 1872年以前在英国,在候选人提名日,表决是用举手方式进行的,沒有选举权的人也能参加表决。但是在选举日,被举手否决了的候选人还能当选,参加表决的只有极少数符合巨額財產資格、居住時間資格等等条件的“合法”选民。——第223頁。
- 185 見注100。——第224頁。
- 186 交易所街是倫敦的一條街道,南海公司管理机关所在地。它是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場所之一。——第224頁。
- 187 納瓦布和拉札是印度王公的称号。札吉达尔是大莫臥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貴族的代表,他們會得到暫時使用的巨大的領地(札吉),因此,他們必須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額的軍隊。在大莫臥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領主。——第225頁。
- 188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64. ——第226頁。
- 189 大莫臥儿帝国的創始人巴卑尔(1483—1530)认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后裔,而后者則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命。在十八世紀帝国瓦解以后,莫臥儿王朝的皇帝們是个別省督、阿富汗侵略者和印度大封建主的傀儡。

- 在1803年英国人占領德里以后，他們就充当东印度公司的傀儡，領取該公司的贍养費。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顛王国的領地之后，莫臥儿王朝在名义上的一点权力便彻底消灭了。——第227頁。
- 190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緬甸战争”这一节即本文前两段，另外还缺少从“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問題的辯論……”起这一段(見本卷第229—230頁)。——第228頁。
- 191 見注144。——第228頁。
- 192 汉普敦宮是倫敦附近太晤士河畔的一座宮殿，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是英国国王的王宮。——第228頁。
- 193 見注179。——第229頁。
- 194 指1853年6月11日(5月30日)涅謝尔罗迭的周知照会(見注154)和1853年6月25日德魯安·德·路易斯的周知照会，后者論述了法国在东方問題上反对沙皇政府的做法的理由。——第230頁。
- 195 指1841年7月13日以保证土耳其領地不受侵犯为名而締結的关于在和平期間禁止外国軍艦通过黑海海峡的倫敦公約(見注132)。公約廢除了对俄国有利的1833年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这项条約規定向俄国軍艦开放黑海海峡。然而沙皇政府由于从1840年起就承担义务参加四大国(俄、英、奥、普)反对法国支持的穆罕默德-阿利的集体行动，就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提出的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原則，并在1841年的公約上签字。法国深恐形成反法同盟，被迫放棄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也参加了公約。——第230頁。
- 196 在1839年土埃冲突(見注8)时，沙皇俄国政府想利用英法矛盾的尖銳化，于1839年9月通过俄国外交官布隆諾夫建議帕麦斯顿簽訂一項協議，名义上是共同援助苏丹，实际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近东的势力范围。而英国政府力图独占在土耳其的霸权，借口东方問題必須达成全欧協議，拒絕了这个建議。——第232頁。
- 197 指法国外交大臣德魯安·德·路易斯于1853年7月15日对1853年7月2日(6月20日)涅謝尔罗迭發給俄国駐外使节的周知照会的复

- 照。在这些文件中，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挑起冲突上相互指責。涅謝尔罗迭在其照会中斷言，英国和法国首先举行含有敌意的示威，它們还在俄軍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已把舰队派往海峽。德魯安·德·路易斯在复照中則认为，冲突的責任应由俄国承担。——第 237 頁。
- 198 “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是“国家报”（*«Le Pays»*，見注 34）的小标题。——第 238 頁。
- 199 指改革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反对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阴谋。改革政策的基础是阿卜杜-麦吉德于 1839 年頒布的詔书。詔书中答应实行某些改革，調整稅收制度，保障臣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新政策的目的是采取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述的改革极为有限，但在试图实行这些改革时，却遭到以苏丹的弟弟阿卜杜-阿吉兹为核心的反动派的拚命反抗。——第 239 頁。
- 200 指駐多瑙河俄軍司令哥尔查科夫对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居民的告示。告示是 1853 年夏占領公国时发表的。告示說：俄軍进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約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度。——第 239 頁。
- 201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倫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期間，該报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第 240 頁。
- 202 收稅官 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員，他行使地方官、地方首席法官和主管收稅人的职权。——第 243 頁。
- 203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359. ——第 243 頁。
- 204 馬克思引自阿耳比馬尔 1853 年 7 月 1 日在上院就 185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报告所作的发言。——第 245 頁。
- 205 馬拉提人 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紀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臥儿封建主的異族統治，他

們沉重地打击了大莫臥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潰。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紀末，馬拉提邦被封建內訌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紀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統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諸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馬拉提封建主的內部糾紛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諸馬拉提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246頁。

- 206 約·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貿易及其与大不列顛的利害关系，兼評孟买管区的铁道交通”1851年倫敦版第91頁（J. Chapman.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 1851, p. 91）。——第249頁。
- 207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59—60. ——第250頁。
- 208 馬克思引自阿·德·薩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1848年巴黎版第61頁（«Lettres sur l'Inde». Paris, 1848, p. 61）。俄文本于1851年在莫斯科出版。——第251頁。
- 209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軍事封建等級的代表。在十七世紀，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臥儿封建主的統治。
- 婆罗門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侶等級；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侶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有社会地位的人，但不包括貧穷的农民和手工業者。——第251頁。
- 210 奧里薩（东印度）的札格納特庙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納特（見注118）的中心。庙里的僧侶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們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則有一些宗教狂热者

- 自杀和自我摧殘。——第 252 頁。
- 211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第一段“政府在財政問題上的失敗”一節沒有載入。——第 253 頁。
- 212 馬克思諷刺地把那些支持將馬車夫的報酬降低到 1 英里 6 辨士的人同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著名活動家約翰·漢普敦相比。約翰·漢普敦於 1636 年革命開始前 4 年，拒絕向皇家收稅官繳納“船錢”——沒有經下院批准的賦稅，他並且在法庭上堅持英國人有抗繳皇家的非法捐稅的權利。——第 255 頁。
- 213 *Mons sacer*——聖山，根據傳說，公元前 494 年，在古羅馬的貴族和平民鬥爭的時候，平民為了表示反抗貴族的壓迫，都上了聖山。——第 255 頁。
- 214 “池塘”（«Ponds»）是對愛爾蘭和不列顛其他各島之間的愛爾蘭海的戲稱。——第 257 頁。
- 215 卓納森·綏夫特遺言囑咐以自己的全部財產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瘋人院。瘋人院於 1757 年開業。——第 257 頁。
- 216 1848 年 4 月 10 日，憲章派決定在倫敦舉行群眾性的示威遊行，遞交要求接受人民憲章的請願書。示威者集合在肯寧頓廣場之後，本來打算從這裡向議會大廈進發，但是，政府禁止示威遊行，軍警齊集倫敦，阻撓遊行。憲章派的領導人（其中有許多人動搖了）於是決定放棄示威遊行，並且勸說示威者解散。反動勢力便利用這次遊行的失敗來進攻工人和迫害憲章派。——第 257 頁。
- 217 指為了加強國王權力而於 1853 年準備修改 1849 年 6 月 5 日的丹麥憲法。新憲法於 1855 年 10 月 2 日生效。

Lex Regia（“王位法”）是由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於 1665 年 11 月 14 日頒布的丹麥王位繼承法。這項法律確立了丹麥國王的絕對權力，建立了容許按女系繼承王位的制度。根據 1852 年 5 月 8 日的倫敦議定書（見注 75）和 1853 年 7 月 31 日的新王位繼承法，取消了女系的繼承權。由於當時在位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沒有直系繼承人，便

承认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作继承人。新法律間接确认了沙皇王朝的代表即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彼得三世)的男系后裔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第 258 頁。

218 見注 41。——第 261 頁。

219 黎塞留在自己的“政治遺教”(1633)中闡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則，竭力为他擴張法国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野心找根据。

查理大帝敕令 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諭旨。——第 262 頁。

220 十一世紀末，在小亚細亚的东部，由于土耳其奥古兹人占領了該地区，出現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在塞尔柱王朝領導下的伊康尼苏丹王国进行了反对拜占庭和十字軍的斗争。到十三世紀后半叶，由于蒙古的入侵使苏丹王国受到了打击，又由于封建割据日益增长，它实际上已解体，分成了許多单个的独立公国。和拜占庭接壤的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那托里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領袖奥斯曼領導，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核心。在十四世紀，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的領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領土。在 1453 年，即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統治时期，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領了拜占庭皇帝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第 262 頁。

221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論文，載于 1851—1852 年的“紐約每日論壇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115 頁)。这一組論文是恩格斯应馬克思之約而写的，因为当时馬克思正忙于經濟学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章在“論壇报”上发表时是用的馬克思的署名。——第 263 頁。

222 理·科布頓“印度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緬甸战争的起因”1853 年倫敦版(R. Cobden. «How Wars are Got Up in India. The Origin of the Burmese War». London, 1853)。——第 265 頁。

- 223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 1853年7月24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 在維也納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會議, 以便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間实行調停。會議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謂的維也納照会)。照会規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庫楚克-凱納吉条約和阿德里安堡条約, 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會議的決定, 照会首先應該递交沙皇, 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內容, 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釋照会的权利; 但是阿布杜-麦吉德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見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 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第 266 頁。
- 22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的日报, 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該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傾向。——第 266 頁。
- 225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1792年在汉堡創辦。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它反映了爭取帝国宪法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反动年代是普魯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在十九世紀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 267 頁。
- 226 独户农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 他們是过去保卫莫斯科王国边疆的低級軍职人員, 在边疆分成单戶定居, 既是軍人又是农民。——第 268 頁。
- 227 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是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丹麦的自由主义党派, 它坚持什列斯維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同丹麦完全合并。同时这个党派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霍尔施坦公国与丹麦隔絕, 这反映了丹麦資產階級害怕霍尔施坦工业的競争。因此, 这个自由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第 269 頁。
- 228 指“农民之友协会”, 这是丹麦的一个党派, 創建于 1846 年。协会的目的是: 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們的私有財產; 頒布一些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市政法。——第 269 頁。

- 229 关于 1852 年 5 月 8 日的倫敦条約 (議定书) 見注 75。——第 269 頁。
- 230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缺前两段。——第 271 頁。
- 231 关于巴尔塔利曼尼条約 (公約) 見注 131。——第 271 頁。
- 232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是德国的日报, 从 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开始出版。它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叫“十字报”(«*Kreuz-Zeitung*»), 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第 272 頁。
- 233 見注 217。——第 274 頁。
- 234 指一些西欧君主国中所采用的仅由男系继承的王位继承制。这一制度基于“舍拉法”(«*Lex Salica*»)——日耳曼的舍拉法兰克人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 編于六世紀初。“舍拉法”第五十九章取消了女系后裔的土地继承权, 只允許把土地交給男系的继承人。——第 274 頁。
- 235 見注 75。——第 274 頁。
- 236 “議會报”(«*Il Parlamento*») 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 在都灵出版。——第 275 頁。
- 237 本文經删节后轉載于 1853 年 8 月 27 日在紐約出版的德文“改革报”(«*Reform*»)。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缺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以及倒数第二段。——第 278 頁。
- 238 馬克思諷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 用来在軍官和士兵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在路易·波拿巴以共和国总統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閱兵时, 曾經請軍官和士兵大吃腊腸、冷盘禽肉和香檳酒等。——第 278 頁。
- 239 指“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 它是从 1619 年到 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一家德国报纸, 該报在五十年代是联邦議会的机关报, 从 1852 年起用本名出版。——第 279 頁。
- 240 見注 125。——第 283 頁。

- 241 上院議員根据中世紀的傳統必須向王室宣讀庄严的誓言(效忠誓)。同时,中世紀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授权英国封建主在他們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第285頁。
- 242 指英国于1846—1847年葡萄牙人民起义反对国内反动制度期間,支持在葡萄牙統治的科堡王朝的支系。这次起义被殘酷地鎮压了下去。——第288頁。
- 243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报纸,于1848—1856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第289頁。
- 244 “先驅”(«*The Leader*»)是英国資产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創辦于倫敦。——第289頁。
- 245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資产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08—1881年在倫敦出版。——第289頁。
- 246 指戴·烏尔卡尔特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在“晨报”上发表的文章。——第291頁。
- 247 馬克思答应写的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沒有看到。——第291頁。
- 248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的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第292頁。
- 24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綽号,由布倫、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綽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9月30日)和布倫(1840年8月6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1851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294頁。
- 250 1852年土耳其和門的内哥罗发生武装冲突,門的内哥罗在名义上一直是苏丹的藩屬,它力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要調停这次

- 冲突, 但被土耳其政府拒絕。1853 年初, 土耳其軍隊在奧美尔-帕沙率領下侵入門的內哥罗境內。奥地利政府担心門的內哥罗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門的內哥罗的举动会引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的騷乱, 急忙派遣萊宁根伯爵率領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 要求土耳其軍隊从門的內哥罗撤退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軍隊集結在門的內哥罗边境, 于是土耳其政府就被迫让步, 同意接受萊宁根提出的条件, 停止軍事行动。——第 294 頁。
- 251** 見注 250。——第 296 頁。
- 252** 除了俄土条約的草案 (这项条約的条款使沙皇成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 以外, 緬施科夫公爵还向土耳其政府建議单独簽訂一个共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約。这一条約的草案規定: 一旦某强国企图用武力阻撓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 俄皇將給予苏丹武装援助。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德国的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支持下, 拒絕了条約的草案, 也拒絕了秘密防御条約的草案。——第 300 頁。
- 253** 指 1853 年 6 月 16 日 (4 日) 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总理大臣涅謝尔罗迭 1853 年 5 月 31 日 (19 日) 的信 (参着注 134) 的答复。列施德-帕沙在他的答复中拒絕了涅謝尔罗迭信中所提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和指責。同时他通知俄国, 苏丹准备派遣一个特別使团到彼得堡解决冲突, 商定一个不削弱苏丹主权而又确认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权利的办法。——第 301 頁。
- 254** 航运法 (*Navigation laws*) 是 1651 年和以后几年中通过的禁止用外国船只运输英国商品的法令; 这些法令于 1849 年廢除。——第 310 頁。
- 255**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只刊載了本文的后半部, 即从“1853 年的議会會議已于上星期六結束……”起 (見本卷第 316 頁) 的一部分。——第 313 頁。
- 256** “君士坦丁堡报”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是一家土耳其报纸, 从 1846 年起用法文出版, 由土耳其政府給予津貼, 是一个半官方报纸, 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傳导者。每月出版 6 次。——第 315 頁。

- 257 “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是1727—1914年用德文出版的日报。——第315頁。
- 258 指波兰流亡者的右翼保皇派，其中心是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巴黎的私邸——“拉姆倍尔寓所”。波兰的流亡貴族也居住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第316頁。
- 259 指帕麦斯顿在波兰爱国者1846年2月企图在波兰发动起义以实现波兰的民族解放未能成功以后对克拉科夫的地位安排問題所采取的立場。起义的主要发起者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小貴族分子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魯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未能实现普遍起义，只是发生了零星的小的革命暴动。只有在克拉科夫(根据維也納条約，該城于1815年被宣布为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魯士保护的自由城市)，起义者于2月22日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廢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鎮压了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在維也納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約。从1846年7月起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拒絕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議这项条約的建議，并且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維也納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放棄它們对克拉科夫的野心。——第316頁。
- 260 指皮尔派、輝格党人和所謂的梅費尔激进派(关于梅費尔激进派見注81)于1852年春在倫敦切舍姆街的約翰·罗素私邸达成的協議。協議規定了对得比的托利党内閣实行共同的反对派的路綫，并且規定了一旦得比內閣垮台組織联合內閣的条件。1852年12月成立阿伯丁联合內閣时，在切舍姆街締結的同盟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輝格党和皮尔派的首領占据了內閣中最重要的职位，而梅費尔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分到了一些职位。——第318頁。
- 261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是英国自由派的一家周报，1847年至1885年在倫敦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20頁。
- 262 1853年8月23日“晨报”发表了署名为“弗·馬·”(反动政論家、烏尔

卡尔特的拥护者弗兰西斯·馬尔克斯)的短評“俄国間諜巴枯宁”，短評給巴枯宁加上了与沙皇政府有联系的罪名。次日，8月24日，該报刊登了戈洛文(他曾在8月14日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短評，这篇短評成了“弗·馬·”发动攻击的导火綫)、赫尔岑和波兰流亡者沃尔策耳反駁“弗·馬·”的信。“弗·馬·”在8月27日发表声明作答，他在声明中把欧洲发生革命同沙皇間諜的活动联系起来。8月29日，戈洛文和赫尔岑发表了另一封題为“弗·馬·是什么人？”的信。后来戈洛文繼續进行有关巴枯宁的論战，赫尔岑沒有参加。

在上面所說的8月24日的信中提到的“一家德国报纸”，暗指“新萊茵报”，信中說对巴枯宁的指控发端于这家报纸。因此馬克思才决定把現在的这封信寄給“晨报”的編輯。——第321頁。

263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从1846年至1849年3月該报叫做“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是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該报改变了方針和名称，成了德国资产阶級民主派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馬克思在1855年曾經做該报的駐倫敦通訊員。——第321頁。

264 馬克思引证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3頁)，这篇文章批判了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年，克頓版(《*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 in Prag*》. Koethen, 1848)。——第322頁。

265 指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組文章中的第XVIII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05—109頁)，这組文章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要求而写的，于1851—1852年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以馬克思的名字发表。——第322頁。

266 1853年9月17日紐約的德文报纸“改革报”曾加以删节后轉載本文。——第324頁。

- 267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的一家德文日报，该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保守的倾向。——第324頁。
- 268 馬克思所引的“海員联誼会”宣言的全文后来在“人民报”上发表（見1853年11月12日第80号）。——第326頁。
- 269 馬克思給“人民报”編輯部的声明起因于1853年9月3日“晨报”发表了戈洛文的匿名短評“应该怎样写历史”，这篇短評是为回答1853年8月30日馬克思給“晨报”編輯的信（見本卷第321—323頁）而写的，文中对馬克思和“新萊茵报”进行了新的攻击。在发表这篇短評以前，8月31日的“晨报”刊登了阿·卢格的信，公开把有意散布侮辱巴枯宁的謠言的罪名加之于馬克思和“新萊茵报”。馬克思回击了戈洛文，这样也就揭穿了卢格的誹謗性捏造。同这篇声明有关的情况，馬克思在1853年9月3日（原信誤写为9月2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曾作了叙述。另外，这封信还附有为回答“应该怎样写历史”的作者而拟的初稿。——第327頁。
- 270 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马克思1853年8月30日所写的文章（見本卷第324—326頁）中，沒有本文所提到的报道。可能是該报編輯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部分。——第330頁。
- 271 指的是要俄国軍隊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第330頁。
- 272 “漫游者”（《*Der Wanderer*》）是奥地利的資產階級日报，1809至1866年在維也納出版。——第331頁。
- 273 指1853年8月6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編輯部文章“和平还是战争”。这篇文章表示贊同美国“圣路易号”巡航舰舰长英格拉哈姆在士麦那对于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一事（見注180）所采取的行动。——第331頁。
- 274 “笨拙”（《*Punch*》）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年起在倫敦出版。——第334頁。

- 275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起至1876年在倫敦出版。——第334頁。
- 276 “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倫敦出版，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輝格党人的机关报。——第341頁。
- 277 指1852年秋瑞士德森州当局封閉設在洛迦諾的卡普勤教团的天主教堂并把22名意大利的卡普勤教士遣回倫巴第的事件。卡普勤教士是受奥地利保护的，而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在瑞士居留的問題已經很緊張，所以瑞士当局反对卡普勤教团的这些做法使瑞奥关系更加尖銳起来。——第342頁。
- 278 見注23。——第342頁。
- 279 托馬斯·卡萊尔“現代評論。（二）模范監獄”（Th. Carlyle. «*Latter-Day Pamphlets, № 2. Model Prisons*». London, 1850）。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杂志1850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对该书作过分析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42頁）。——第343頁。
- 280 馬克思指他所写的“貧困和貿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餓死事件”两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6—423、559—568頁）。——第347頁。
- 281 “粮食交易所快报”（《*Mark-Lane Express*》）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农业报”（《*Mark-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这个周刊的簡称；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32年到1924年以此名称在倫敦出版。——第347頁。
- 282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缺少本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和印度的铁路建設，从“9月15日，英格兰銀行把貼現率提高到……”（見本卷第356頁）起以下全缺。——第350頁。
- 283 馬克思引用的是戴·烏尔卡尔特发表在1853年9月20日“晨报”上的論文“政治罪人”。——第351頁。

- 284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由英、俄、奧、普四國簽訂的關於幫助土耳其蘇丹對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倫敦條約，以及 1841 年的倫敦條約（見注 132）和 1849 年的巴爾塔利曼尼條約（見注 131）。1840 年的倫敦條約是在沒有法國（它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參加的情況下簽訂的，所以法國面臨着一個反法同盟的威脅，結果不得不放棄了對埃及統治者的支持，參加了 1841 年的倫敦條約。在 1840 年的條約中，除了關於對土埃衝突進行軍事干涉的條款和要求穆罕默德-阿利為了蘇丹的利益放棄埃及以外的全部領地的最後通牒外，還有關於集體保護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條款。1841 年的條約後來就根據這一條宣布兩個海峽對所有國家的軍艦實行封鎖。——第 353 頁。
- 285 列季弗是奧斯曼帝國的後備兵員。——第 355 頁。
- 286 馬克蘭即糧食交易所。——第 366 頁。
- 287 烏列瑪是近東和中東伊斯蘭教國家的最高等級：神學家和法學家；烏列瑪在奧斯曼帝國的政洽生活中有巨大的影響。——第 368 頁。
- 288 指 1851 年 12 月底開始並席卷了英國東南部和中部許多城市的機器製造廠工人的罷工。罷工是機械工人聯合會組織的，其目的是取消加班加點和改善勞動條件。企業主們對罷工的答復是宣布同盟歇業。持續 3 個月之久的鬥爭，以企業主的勝利而結束。工人們不得不在原有的條件下復工。但是企業主也由於罷工和同盟歇業而遭到巨大的物質損失。——第 370 頁。
- 289 這篇文章曾加以刪節轉載於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紐約德文報紙“改革報”，標題為“英國的工人運動狀況”。——第 372 頁。
- 290 明辛街是倫敦的一條街，批發殖民地貨物的中心。——第 375 頁。
- 291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後時期的著作中用更為確切的“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格”的概念代替了“勞動價值”、“勞動價格”的概念，因為馬克思確定，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並不是自己的勞動，而是自己的勞動力（見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 1891 年版所寫的序言）。——第 376 頁。

- 292 指 1853 年 9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社論“俄軍在土耳其的計劃”。對這篇社論的援引，可能是該報編輯部插入本文的。——第 380 頁。
- 293 指 1846 年土耳其軍隊在奧美爾-帕沙指揮下出征庫爾迪斯坦，鎮壓那里爆發起來的反蘇丹的起義。關於奧美爾-帕沙出征門的內哥羅，見注 250。——第 380 頁。
- 294 亞·瓦·蘇沃洛夫曾參加圍攻奧查科夫的戰鬥，但是由於他在圍攻要塞時負傷，以及和俄軍司令官波將金公爵在圍攻方法上意見分歧，而沒有參加 1788 年 12 月 17 日（6 日）占領奧查科夫的戰鬥。俄國軍隊在蘇沃洛夫指揮下用強攻占領土耳其的伊茲馬伊爾要塞，是在 1790 年 12 月 22 日（11 日），這對俄國在 1787—1791 年的俄土戰爭中取得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 383 頁。
- 295 “帕麥斯頓勳爵”這組抨擊文，是馬克思為揭露以帕麥斯頓為最著名代表的英國寡頭政治而寫的，原先計劃作為一組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連續發表。1853 年 10 月初馬克思動手寫這組抨擊文之後，又同意把它在憲章派機關報“人民報”上同時發表。憲章派機關報是把馬克思的這些文章作為一組完整的論文，用一個總標題“帕麥斯頓勳爵”發表的，並且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馬克思博士為‘紐約每日論壇報’而作，兼寄本報”這一句編者按語，而“論壇報”編輯部則從第一篇文章就不署作者姓名把它作為社論刊登出來，於是接着刊登的文章也就成了表面上互不關聯的形式。“人民報”在 1853 年 10 月 22 日—12 月 24 日這段時間內共刊載了 8 篇。最後一篇也和前幾篇一樣，結尾都附有“待續”字樣。從馬克思在 1853 年 12 月 14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本想再寫幾篇文章來談帕麥斯頓在 1840—1841 年倫敦公約簽訂期間的政策以及帕麥斯頓在 1848—1849 年革命時期的立場。但這種想法沒有實現。

“紐約每日論壇報”並沒有把馬克思的文章全部發表，並且往後拖到 1854 年初，儘管馬克思早在 1853 年 12 月 6 日就把最後一篇寄往紐約了。該報共發表了 4 篇，一律是社論形式，標題也各不相同。1853 年 10 月 19 日“論壇報”發表的社論“帕麥斯頓”，相當於“人民報”連載

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論“帕麦斯頓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論“現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論“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論壇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原文也不尽相同。显然，馬克思在給“論壇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估計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对文章稍微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除此以外，“論壇报”发表的文章則带有报纸編輯改动作者原文的痕迹。

这組抨击帕麦斯頓的文章傳播很广。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Glasgow Sentinel》）轉載了“論壇报”的“帕麦斯頓与俄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1853年12月倫敦的出版者塔克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854年初，这个单行本再版，这次再版有馬克思参預，他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单行本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頓与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扉頁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頓，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是翻印“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編入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評論集”（《Political Fly-Sheets》），并于1855年和其他作者的抨击文一起重版。塔克尔在这一版他自己写的序言中提到了抨击文第一、二两号的作者——馬克思的名字（在目录中，抨击文第一号“帕麦斯頓与俄国”的标题改为“帕麦斯頓与波兰”）。其他几篇关于帕麦斯頓的文章，馬克思就不願刊载在塔克尔的出版物中了，因为他不願让他的作品同“政治評論集”所收进的烏尔卡尔特的著作混杂在一起。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給拉薩尔的信中写道：“我不願与这位先生为伍，我們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頓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問題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們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1855年11月17日和1856年1月5日，与帕麦斯頓对立的烏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Sheffield Free Press》）刊载了“帕麦斯頓勋爵”这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編为設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聞’

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第4A号。差不多就在同时,所有8篇还刊载于烏尔卡尔特派的倫敦机关报“自由新聞”(《Free Press》)的五号上(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日和12日、2月9日和16日),并由“‘自由新聞’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斯頓勋爵傳”,作为該丛书的第5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馬克思的这組抨击文早在1853年11月2日就在紐約的“改革报”上用德文发表,譯文是由阿·克路斯从“論壇报”上节譯的。在編輯部的前言中說道:“帕麦斯頓的名字現在又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們决定从‘論壇报’上节譯这些文字。这篇評論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沒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誰写的。”11月2、3、4、8和9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頓”一文,相当于“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两篇。1855年2月,馬克思把題为“帕麦斯頓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給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新奧得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論壇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馬克思的抨击文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曾經由德国政論家艾·費舍在他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的存稿。現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卷(《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中发表。

1893年,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的波兰社会党人在倫敦出版的杂志“黎明”(《Przedświt》)第7期上。第七篇曾在1897年由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論壇报”原文并以同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馬克思論东方問題的文集(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1899年在倫敦又出版了由爱琳娜·馬克思編的8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馬克思“帕麦斯頓勋爵傳記”(Karl Marx.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馬克思的这組抨击文第一次用俄文刊行是在1924年。

馬克思在写这組抨击文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是查考了所謂的“藍皮书”(Blue Books)——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議會資料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議會會議的报告,主要是汉薩德出版的“議會辯論”(《Parliamentary Debates》),以及各种国际条約和外交文件汇集、評論集和大量报刊材料。——第387頁。

- 296 英国議会于 1850 年 6 月討論与所謂“帕西非科事件”(見注 179) 有关的英希冲突問題时, 政府(帕麦斯頓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贊同; 相反, 上院却以 37 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問題上的立場。法国和俄国对这一立場也表示不同意, 并通过它們駐倫敦的大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滿: 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倫敦, 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頓举行的宴会。——第 392 頁。
- 297 1815 年通过一項法律, 禁止当谷物价格在英国本土低于 80 先令 1 夸特时进口谷物。1822 年這項法律稍作改变, 1828 年实行調节制: 国内市場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入口稅, 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入口稅。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閣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工业資產階級在自由貿易口号下反对谷物法, 1846 年終于廢除了它。——第 393 頁。
- 298 馬克思指外国雇佣兵駐在英国一事。这些雇佣兵是在拿破侖战争期間主要在德国各小邦, 特別是在汉諾威——英国汉諾威王朝的国王的世袭領地——募集到英国軍隊里来的。——第 393 頁。
- 299 指英国人于 1807 年 9 月炮轰哥本哈根, 以防止丹麦加入拿破侖宣布的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貿易的大陆封鎖。——第 393 頁。
- 300 惩治叛乱法案 (*Mutiny Act*) 是議会从 1689 年至 1881 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 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軍和海軍, 在陆海軍中实行各种軍事条令和制度, 实行軍法审判, 并制定惩治参加譁变、違抗命令、違犯紀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頒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 394 頁。
- 301 市鎮机关法 (*Corporation Act*) 是英国議会于 1661 年通过的, 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 宣誓法 (*Test Act*) (1673 年) 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員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 但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的任何反对派的武器和維護英国国教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 395 頁。

- 302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 395 頁。
- 303 天主教徒的解放 是指 1829 年英国議會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們获得了被选入議會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資格却被提高了 4 倍。英国統治階級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資產階級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 395 頁。
- 304 指爭取議會改革的广泛运动(見注 138)，这次运动在 1832 年实行議會改革之前曾广泛开展了好几年之久。——第 398 頁。
- 305 法国和沙皇俄国利用“圣地”之爭(見注 101) 来爭夺近东霸权，这次爭执的問題之一是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鑰匙以及保护該寺院的圓頂的权利应屬於天主教徒还是正教徒的問題。——第 402 頁。
- 306 指 1827 年 7 月 6 日倫敦条約(公約)，見注 47。——第 402 頁。
- 307 阿克尔曼条約 是俄国与土耳其于 1826 年 10 月 7 日(9 月 25 日) 簽訂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締結的各项条約，給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領海航行的自由，并放棄領有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后归俄国所有的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这项条約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維亚自治，并規定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要由当地大貴族中选出。阿克尔曼条約沒有提希腊問題。土耳其統治集团根据这一点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前夕違反这个条約而說什么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約放棄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預，俄国帮助希腊人就是違背这个規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的話沙皇政府并不是在簽訂阿克尔曼条約时，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說的。——第 402 頁。
- 308 約·麦克尼耳“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現状” 1836 年倫敦版第 105—107 頁(J. McNeill,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 pp. 105—107)。——第 403 頁。
- 309 在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話結尾，这段話看样子是报纸編輯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斯

- 頓勛爵決不代表自由、榮譽和英國所固有的一切優點。勛爵閣下在那個時候以及在我們所描寫的他的活動的最早期是怎樣一個人，那末他今天仍然是怎樣一個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這樣嚴重的關頭除了看到他對正義和人權採取假熱心的態度外，別的什麼也不用想從他那里得到。我們尚未談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談；遺憾的是這一部分並不是最精彩的。”——第 404 頁。
- 310** 米蘭人由於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羅薩企圖取消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市政自由並使之受制於己而於 1159 年拒絕服從這個皇帝。隨之而來的長期鬥爭使米蘭於 1162 年遭到破壞，但最終勝利的仍是這些城市。——第 406 頁。
- 311**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倫敦公約，見注 284。——第 412 頁。
- 312** 克拉科夫起義，見注 259；以下提到的加里西亞事件，見注 16。——第 414 頁。
- 313** 看來是指“奧地利帝國維也納日報”(«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 1780—1931 年以同名出版的官方政府報紙。——第 414 頁。
- 314** 1846 年基佐政府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兒子蒙潘西埃公爵訂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瑪麗-路易莎-費南達的婚約，破壞了英國所策劃的親王列奧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兩國政府之間為這些婚約而進行的鬥爭達到非常尖銳的程度，法國外交在這個問題上獲勝以後，帕麥斯頓竭力尋找機會進行報復。——第 415 頁。
- 315** 1713 年烏特烈赫特條約是法國和西班牙為一方同參加反法聯盟的國家(英國、荷蘭、葡萄牙、普魯士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為另一方簽訂的結束爭奪西班牙繼承權的長期戰爭(1701 年開始)的一個和約。根據條約，西班牙王位仍留給法國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孫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須放棄他合併法國和西班牙兩個王國的計劃，並放棄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國支系的繼承者對西班牙王位的繼承權。條約批准把法國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許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羅陀割給

英国。

帕麦斯顿于 1846 年譴責法国破坏烏特烈赫特条約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第 415 頁。

316 下面引的帕麦斯顿在下院就法国舰队于 1838—1839 年封鎖墨西哥港口一事的讲话是在 1839 年 3 月 19 日发表的。

英法舰队于 1845 年开始对布宜諾斯艾利斯实行封鎖，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为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及其他河流。英法于 1852 年达到了这一目的，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約。——第 415 頁。

317 指 1830 年比利时的資產階級革命。——第 416 頁。

318 英法于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名之为“誠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 的同盟关系，由于 1834 年 4 月間签订了所謂 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有了条約的形式。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約时英法之間暴露了利害矛盾，这些矛盾后来逐渐尖銳化。条約表面上是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实际上是使英国得以借口給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軍事援助来反对覬覦王位的唐·米格尔(葡萄牙)和唐·卡洛斯(西班牙)而加强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第 419 頁。

319 指 1832 年 7 月底貝兰(叙利亞)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埃及軍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率領下击潰了苏丹的軍队并迫使它完全撤出叙利亞。随后埃及軍队开进小亚細亚，并于 1832 年 12 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其軍队，这就决定了埃及在 1831—1833 年的埃土战争中的胜利。1833 年 4 月，根据在居塔希亚签订的和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实际上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亞的独立的統治者。——第 423 頁。

320 馬克思引的是激进派議員安斯提于 1848 年 2 月 8 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說。——第 430 頁。

321 指 1834 年 1 月 29 日(17 日)的俄土条約，这项条約訂正了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約的某些条款。条約减少了阿德里安堡条約規定的土耳其

每年所应交付賠款的数目，并把賠款总数减少 200 万杜卡特。——第 430 頁。

322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是每日出版的外交部官方机关报；1825—1914 年以同名用法文出版。——第 433 頁。

323 «*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羅馬公民”)，見注 179。——第 433 頁。

324 戴·烏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倫敦版第 406 頁(D. Urquhart.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London, 1853, p. 406)。这一著作在 1853 年曾出过好几版；此处頁碼根据第 2 版。——第 441 頁。

325 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話：“看来，帕麦斯頓勋爵的辞职已經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預期的全部奇迹般的效果。公众对他所舍去的內閣越来越表示不滿，但是这个內閣的政策却是帕麦斯頓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始終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同时那些痛斥联合內閣的党派也竞相頌揚帕麦斯頓。它們一方面号召給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們似乎极其渴望它們所热爱的这位国家活动家回到領導者的职位上来。这样一来，这个最灵巧而不知疲倦的演員就愚弄了全世界。如果这里不是涉及十分重大的事，那末这就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場景。关于誤解是如何根深蒂固我們业已指出过了，現在我們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來說明帕麦斯頓一貫出于某种原因来协助俄国进展并为此而利用英国的真相。凡是想看一看时事的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給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它們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評价的人，我們认为，都会从我們的叙述中获得某种教益。”

这些話不可能是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頓勋爵”这組文章的后几篇，馬克思寄給“論壇报”編輯部不迟于 1853 年 12 月 6 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頓短期辞职(1853 年 12 月 16 日)的前 10 天。报纸編輯部拖延很久，即到 1854 年 1 月 11 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借用来的。根据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上的記載，这篇文章于 1853

年12月20日寄往紐約，談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1853年12月20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手稿至今没有找到。——第443頁。

326 引的是庫普費尔“1829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記。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1830年圣彼得堡版第4頁(Kupfer. «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 entre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n 1829. Rapport fait à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St.-Petersbourg, 1830, p. 4)。——第444頁。

327 指1826年4月4日彼得堡議定书和1827年7月6日倫敦条約(公約)，見注47。

在1826年4月4日的議定书中，簽訂这个議定书的沙俄和英国力图掩飾它們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声明它們既不是要損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領土，也不是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屬地上的貿易特权。英、俄、法在締結1827年7月6日倫敦条約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声明。——第444頁。

328 馬克思引的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說。——第446頁。

329 这里所答应文章并没有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而在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馬克思在1853年12月6日就已經寄往紐約了。“人民报”于1853年12月24日刊載了这篇文章，作为“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第450頁。

330 “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1666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455頁。

331 劳埃德委员会是倫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險及登記的团体。——第461頁。

332 这篇文章曾在1853年10月24日和25日紐約的德文报纸“改革报”上以“英国状况”为題加以删节轉載。——第462頁。

- 333 指列施德-帕沙 1853 年 8 月 19 日給奧、英、法、普四國使節的照會。照會中說，土耳其政府只有在對維也納照會作出一系列修改和保留條件下才能接受這個照會（維也納照會見注 223）。列施德-帕沙特別堅持要俄國從多瑙河各公國撤兵。——第 462 頁。
- 334 1853 年 9 月，尼古拉一世和奧皇弗蘭茨-約瑟夫在奧里繆茨（奧羅茅茨）舉行一次會談，會談後，奧地利政府試圖促使西方列強採取新的步驟，在蘇丹無條件接受維也納照會的基礎上調解俄土衝突。尼古拉一世在同弗蘭茨-約瑟夫會談的過程中企圖使後者相信，在多瑙河各公國的俄軍，不會強渡多瑙河，俄軍只在多瑙河北岸採取防禦行動。——第 464 頁。
- 335 “麥尼普的諷刺”是 1594 年在法國發表的一篇匿名的政治性抨擊文，抨擊的對象是天主教聯盟（1576 年在胡格諾教徒戰爭時期創立），這個聯盟的封建貴族首領力圖削弱國王權力，確立天主教上層的無限特權。這一作品的篇名是從羅馬作家瓦龍（紀元前一世紀）那裏借用的，瓦龍曾摹仿古希臘哲學家麥尼普寫成了他的“麥尼普的諷刺”。——第 467 頁。
- 336 指被法國資產階級非常殘酷地鎮壓下去的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的英勇起義。這次起義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第 469 頁。
- 337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里發表的這篇文章，缺少關於法國經濟狀況的部分（見本卷第 474—475 頁）。——第 472 頁。
- 338 指 1848 年 3 月 29 日比利時共和派軍團從法國回國時在法國國境附近的里斯康土村同比利時士兵發生的衝突。比皇列奧波特一世政府利用這個事件製造了安特衛普案件（所謂里斯康土案件）來迫害民主派。德勒克呂茲當時是法國與比利時接壤的諾爾省的政府專員，比利時共和派軍團就是從該省通過的。——第 477 頁。
- 339 指托列斯-維德拉斯城（現在的托列治-維德拉什城，在葡萄牙）附近的營壘，它是 1810 年根據威靈頓的命令為掩護里斯本防備法軍侵犯而修

建的。——第 482 頁。

- 340** 拿破侖于 1815 年在比利时作战期間，于 6 月 16 日在利尼附近击败普軍，企图把普軍从威灵頓的英荷軍隊中分割出来并把盟軍各个击潰。但是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軍攻击威灵頓軍隊并企图包圍其翼側的时候，布魯赫尔指揮的普軍巧妙地摆脱了追击，及时赶到戰場，并且决定了盟軍获胜的会战結局。——第 483 頁。
- 341** 攻占埃尔斯倫——埃尔斯倫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重要要塞，1829 年 6 月被帕斯凱維奇指揮的俄軍攻占。这一事件对于俄軍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中最后战胜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487 頁。
- 342** 在多瑙河軍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俄軍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就命令把多瑙河区舰队的一部分从伊茲馬伊尔調到布来洛夫（布来拉）和加拉茲地区。1853 年 10 月 23 日（11 日），两艘俄国蒸汽舰和八艘炮艇在土軍占据的伊薩克查要塞旁边通过时发生炮战。由于俄国舰炮和岸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守卫部队遭到相当大的損失。——第 491 頁。
- 343** 塞拉斯基拉特 即土耳其的陸軍部。——第 491 頁。
- 344**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員會，即所謂秩序党的領導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統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組織。这个产生于 1848 年的保守派大資產阶级的政党，从 1849 年到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間，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議會中一直占据領導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該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巴拉盖·狄利埃將軍在共和国存在的年代里曾支持普瓦提埃大街委員會，而在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夕倒向波拿巴派。——第 491 頁。
- 345** 1842 年 8 月初，在英国的許多工业区特别是在朗卡郡，爆发了罢工和工人騷动。主張自由貿易的資產阶级由于力图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廢除谷物法，在許多情况下曾經鼓动工人采取行动。但是，資產阶级被大規模的罢工和騷动吓倒，又看到工人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于是便轉而支持对工人的血腥鎮压。在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

階級狀況”和“英國穀物法史”兩文中對這些事件作了詳細的描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522頁和第4卷第563—568頁）。——第492頁。

346 指布萊特和科布頓在自由貿易論者和平協會愛丁堡組織的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會議的總結報告載于1853年10月14日的“泰晤士報”。——第494頁。

347 馬克思引自1853年10月29日“人民報”上發表的“什麼賤和什麼貴”一文。——第494頁。

348 “每周快訊”(《*Weekly Dispatch*》)是英國的一家週報，1801—1928年以這個名稱在倫敦出版；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該報具有激進的傾向。——第496頁。

349 本文一部分曾以“波斯、俄國和丹麥”為標題在1853年11月19日的紐約德文報紙“改革報”上轉載。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發表的這篇文章，缺少有關波斯和俄國的進軍、丹麥事件以及多瑙河和亞洲的軍事行動的部分（見本卷第501—503頁）。——第501頁。

350 指伊朗軍隊為吞併赫拉特所採取的軍事行動。赫拉特是一個商路樞紐，阿富汗和伊朗曾為它進行過多次爭奪戰。英國殖民者利用1856年10月伊朗軍隊攻占赫拉特一事對伊朗發動戰爭，戰爭的結果，沙赫應從赫拉特撤兵。1863年赫拉特被併入阿富汗艾米爾的領地。——第501頁。

351 1853年沙皇政府組織了對哈薩克斯坦的征伐。這次征伐溯錫爾河而上，由奧連堡總督瓦·阿·彼羅夫斯基指揮，目的是反對侵占了哈薩克土地的科坎德汗國（馬克思本文中指希瓦不確），結果使俄軍建立了錫爾河戰綫，後來沙皇俄國進攻中亞的科坎德、布哈拉和希瓦等汗國時就以此戰綫為前進基地之一。——第501頁。

352 指1848年3月22日在全國革命高潮中成立的丹麥政府，這個高潮的表現，就是在哥本哈根“卡集諾”劇院舉行的群眾大會。新政府的成員除保

守党人以外,还包括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党“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的代表。这个党主張丹麦和什列斯維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有一个共同的宪法而把霍尔施坦公国划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区。丹麦三月資產階級政府对什列斯維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場,并且反对这些德語区和德国合并。——第 502 頁。

353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于 1838 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关于谷物法見注 297),其目的是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經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見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在谷物法問題上的斗争,由于 1846 年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結束。——第 505 頁。

354 拿破侖指揮的法軍和普軍之間的耶拿会战 发生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会战以普軍被击潰而告終。普軍战败后,普魯士投降了拿破侖法国。——第 510 頁。

355 1799 年 9 月 25—26 日(14—15 日)在苏黎世附近,馬森納指揮的法軍击败了里姆斯基-科尔薩科夫將軍的俄国軍团。这次失敗使已从北意大利出发与里姆斯基-科尔薩科夫軍团会合的苏沃洛夫指揮的俄軍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尽管敌軍兵力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苏沃洛夫部队却給法軍一系列打击并冲到萊茵河上游地区。恩格斯于 1859 年在自己的著作“波河和萊茵河”里对俄軍的进軍瑞士作了很高的評价,在文章中称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是“現今各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当中最卓越的一次”。——第 513 頁。

356 从燕妮·馬克思的記事簿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俄軍的失敗”是和馬克思的文章“工人問題”(見本卷第 518—521 頁)作为一篇完整的通訊,一同送到“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的。但是該报編輯部把这篇通訊分成两部分发表在該报的同一号上(11 月 28 日)。恩格斯的文章是作为社論发表的,而馬克思的文章是作为由他署名的单独文章发

表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有些不确切之处，原因是他用了不正确的消息。在上述的卡拉法特和沃耳特尼察战斗当中，对多瑙河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俄軍总司令是丹年別尔格，而不是巴甫洛夫；盖昂和伊斯馬伊耳-帕沙是两个人，而不像文章指出的是一个人。稍后，恩格斯根据比本文更确切的消息，不仅估計了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而且估計了土軍的指揮素质以及卡拉法特和沃耳特尼察等战斗的結果（見本卷第 530—536 頁和第 580—587 頁“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和“多瑙河战争”两篇文章）。——第 515 頁。

357 在 1849 年 3 月 23 日北意大利 諾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揮的奧軍使皮蒙特軍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統治恢复起来。在这次战争进程中奥地利司令官巧妙地利用了皮蒙特將軍拉莫里諾分散兵力的弱点。——第 517 頁。

358 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 1853 年 11 月 5 日“經濟学家”上。——第 518 頁。

359 “普雷斯頓舵手”(«Preston Pilot») 是一家英国周报，1825—1888 年在普雷斯頓出版。——第 520 頁。

360 馬克思引的是琼斯在 1853 年 11 月 4 日普雷斯頓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說，其詳細报道发表在 1853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报”上。

馬克思大概还在“人民报”的这一号出版以前就看到这篇演說了，因为他在 11 月 11 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它。——第 521 頁。

361 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 1853 年 11 月 12 日“經濟学家”上。——第 522 頁。

362 社会拯救委员会是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第 527 頁。

363 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漲，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集团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組織“群众运动”的主張，这种組織應該把各个工联与尚未組織起来的工人联合起来，其目的首先是使全国各

个不同地区的罢工能統一行動。这一組織應該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議會領導，而工人議會則由尙未組織起来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参加了“群众运动”的各工联大会选出的代表組成。工人議會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一直开到3月18日。工人議會討論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綱領，成立了由5个人組成的执行委員會。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馬克思寄去了一封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信中他指出建立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的任务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馬克思认为工人議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认为这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狹隘圈子的嘗試，是把經濟斗争同政治斗争結合起来的步驟。

可是，組織“群众运动”的嘗試沒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領袖都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統一的工人群众性組織的主張。1854年夏天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好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議會就再也沒有召开了。——第529頁。

364 指英国議會；从1547年起下院會議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宮）举行的。——第529頁。

365 卡·馬克思的“高尚意識的騎士”这篇抨击文章写于1853年11月，并在阿·克路斯和約·魏德迈的协助下于1854年1月在紐約以单行本出版。这篇文章是对刊載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上的奧·維利希的“卡尔·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回击。馬克思的这篇抨击文反映了无产階級革命家反对工人运动中不坚定的小資产階級分子的斗争。馬克思在該文中駁斥了維利希的誹謗（維利希力图使別人怀疑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所作的批判的公正性）。馬克思在談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时，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冒險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为了写这篇抨击文，馬克思从他和恩格斯于1852年5—6月合写的一部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借用了个别章句，这部著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沒有发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頁）。——第537頁。

366 卡·馮·德克尔“从現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論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和波茲南版（C. v. Decker.

-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und Posen, 1822)。——第 541 頁。
- 367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現象学”1807 年班堡和維尔茨堡版(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参看“教育及其现实性的王国”章第 435—474 頁 («Die Bildung und ihr Reich der Wirklichkeit», S. 435—474)。——第 541 頁。
- 368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条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頁)一文,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底—12 月初。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抨击文。在这篇文章中,馬克思痛斥了普魯士警察国家迫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的卑鄙手段。这篇抨击文于 1853 年 1 月在瑞士巴塞尔以单行本刊印。在美国,这部著作最初連載在波士頓的“新英格兰报”上,1853 年 4 月底,該报出版社以单行本发表。馬克思在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中引自“揭露”的各处引文,都是根据波士頓版的小册子。——第 541 頁。
- 369 “新英格兰报”(«*Neu England-Zeitung*»)是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頓(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 1852 年。約·魏德迈曾为該报撰稿。——第 541 頁。
- 37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70、525 頁。——第 541 頁。
- 371 在 1854 年紐約版中,出版者在該处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勃魯姆先生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費拉得尔菲亚,当美国工人同盟成立时,他是同盟理事会中維利希的代理人。”——第 542 頁。
- 37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9 頁脚注。——第 542 頁。
- 373 暗檢室是法国、普魯士、奥地利和許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門所屬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檢查信件的活动。暗檢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 543 頁。

37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4頁。——第544頁。

375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們在布魯塞尔組織了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頑强斗争中，以及在反对对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組織，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員特別有影响的蒲魯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頑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倫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議他們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組工作并根据他們所宣布的原則草拟同盟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倫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組織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組織带有密謀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則成为同盟組織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倫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們在許多天的論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綱領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以馬克思为首的布魯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員。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

初，中央委員會組織了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擁護者於1848年4月初返抵德國，他們堅信，由於德國落后、德國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覺悟不高等情況，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兩三百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難以對廣大人民群眾產生顯著的影響。鑒於這種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必須參加民主運動的極左的、實際上是无產階級的側翼。他們加入了科倫的民主協會並介紹他們的擁護者參加民主派組織，以便在那裡堅守革命無產階級的立場，批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性和動搖性，推動他們採取堅決的行動。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們的擁護者注意組織工人協會，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為組織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創造條件。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見注97）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領導和指導中心。1848年年底，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試圖恢復中斷的聯繫，派約瑟夫·莫爾為特使，去德國整頓同盟組織。倫敦中央委員會修改了1847年的盟章，削弱了這個文件的原則意義。譬如，不提推翻資產階級，不提確立無產階級的統治和建立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會共和國。莫爾從1848年到1849年冬在德國的使命並沒有完成。

1849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退出了民主協會。工人群眾已經有了政治經驗，他們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大失所望，這一切使當時已經有可能在實踐上提出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計劃。不久，德國西南部爆發了起義。這次起義的失敗成為德國革命的終結。

革命的進程表明，“共產黨宣言”中所闡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同盟是革命活動的一所很好的學校：它的成員堅決果斷地參加了各地的運動，他們在報刊上、在街壘里和在戰場上堅守着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陣地。

革命的失敗沉重地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許多盟員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逃亡國外，地址丟掉了，聯繫中斷了，各地支部的活動停頓

了。德國國外的同盟組織也遭到巨大的損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數領導人聚集在倫敦。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經過改組的新中央委員會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往的組織已經恢復，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也日益活躍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中，總結了1848到1849年的革命，並提出了建立擺脫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告同盟書”中第一次闡明了不斷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宣傳共產主義的新的機關報“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出版了。

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發生的原則性分歧達到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派所提出的無視客觀規律和歐洲的現實政治形勢而立即發動革命的宗派主義的冒險策略。與此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強調，在反動派進攻的情況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宣傳科學共產主義和為未來的革命戰鬥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幹部。1850年9月中旬，維利希—沙佩爾派的分裂活動終於引起了與該派的分離。1850年9月15日的會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頁）根據馬克思的建議，把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移交給科倫區部委員會。德國各地共產主義者同盟支部一致擁護倫敦中央委員會多數派的決定。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在科倫的新的中央委員會於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馬克思加了標記的全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頁）。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經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以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無產階級政黨的萌芽，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
——第544頁。

376 布·鮑威爾“復類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萊比錫版第1—2卷；1842年不倫瑞克版第3卷（B. Bauer,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2, Leipzig, 1841; Bd. 3, Braunschweig, 1842)。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的編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馬克思指鮑威尔书中对福音书上的說法和真实历史事件之間的明显矛盾所作的批判。——第 546 頁。

- 377**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會議(在这次會議上同盟內部发生分裂)記錄全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頁。1850 年 9 月 17 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大磨坊街)的声明全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84 頁。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 1840 年 2 月創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同盟的地方支部在协会中起領導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間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与冒險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派)之間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的一边,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又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被英国政府查封。在二十世紀,許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訪問过协会。——第 546 頁。

- 378** 暗指古希腊的諷諧叙事詩“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馬叙事詩的模拟詩,作者不詳。——第 547 頁。

- 379** 指金克尔和流亡者俱乐部的其他領導人筹办所謂“德美革命貸款”的試图。为了在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間举借貸款,金克尔于 1851 年 9 月到美国。貸款拟用于在德国立即喚起革命。与流亡者俱乐部相竞争的、由卢格領導的鼓动者协会,也派代表到美国募集革命基金。举借“革命貸款”的試图落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險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喚起革命的嘗試。——第 547 頁。

- 380** 圣杯,按照中世紀的傳說,是一只有奇異力量的宝杯。——第 547 頁。

- 381 馬克思把阿尔諾德·卢格戏比为阿尔諾德·文克里特。文克里特是半傳說的瑞士战士，曾参加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相傳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軍隊在森帕赫（属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文克里特以舍身的行动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547頁。
- 382 指与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結束以后德国对参加反政府运动的知識分子的迫害。早在与拿破侖斗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学生会的許多会员，在維也納會議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制度，組織政治示威，在示威中提出統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鎮压“蠱惑者”的借口。“蠱惑者”是1819年8月德国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會議决定中对参加这一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第549頁。
- 383 恩格斯的“德国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論述1849年萊茵普魯士、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史的著作。这一著作在1850年分章載于“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杂志第1—3期。恩格斯所指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章“为共和国捐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90—235頁）。——第550頁。
- 384 指1848年11月維利希从德国流亡者——在伯桑松（法国）做工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中組織起来的队伍。队伍的成員从法国政府領取津貼。1849年初，津貼停发。稍后，队伍加入了志願分队，这一分队在維利希的命令下参加了1849年5—6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軍的行动。——第551頁。
- 385 馬克思指的是：公元前480年希腊-波斯战争期間，由300名斯巴达人組成的队伍在国王勒奥尼达斯指揮下英勇保卫温泉关，抗击波斯的全部軍隊。在温泉关会战中，勒奥尼达斯及其队伍全都战死。——第551頁。
- 38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7—208頁。——第552頁。
- 387 1849年9月，馬克思被选入倫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該委员会是

- 在地方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下成立的。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一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850年9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大多数委员都被维利希—沙佩尔派影响了。——第552页。
- 388 正文中所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850年8月的最后几天内举行的。——第552页。
- 389 “先驱者报”(«*Le Précurseur*»)是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836年起在安特卫普出版。——第556页。
- 3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6页。——第559页。
- 39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559页。
- 3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2页。——第559页。
- 39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8页。——第560页。
- 394 马克思指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中央委员会。根据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一些反动的天主教州的单独联盟的相似之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戏称这个组织为宗得崩德(特别联盟)。——第561页。
- 3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6页。——第562页。
- 396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是1850年7—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在这个周刊上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英译文。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是英国的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该杂志以支持，并参加了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1851年6月到

1852年4月底，他們在該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第562頁。

- 397**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1848年6月巴黎工人英勇起義的文章，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抨擊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的全德國民議會的懦怯政策、普魯士國民議會的妥協政策和三月同盟的活動家的一些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

三月同盟（以法蘭克福中央三月同盟為首）是1848年11月底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翼議員在德國各城市組織的。這些三月同盟宣布其目的是捍衛1848年德國三月革命的成果。它們的領導者是一些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弗呂貝爾、西蒙、盧格、福格特等。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8年12月起就開始在“新萊茵報”上抨擊領導這些同盟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和不堅決的政策，指出這種政策是為革命敵人幫了忙。——第563頁。

- 39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6頁。——第563頁。

- 39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頁。——第564頁。

- 400** 指普魯士和奧地利於1850年秋由於爭奪德國領導權而發生的衝突。衝突的藉口是黑森的革命發動。普魯士和奧地利彼此爭奪干預黑森內政的權利，其目的是鎮壓騷動。普魯士政府為了回答奧地利軍隊之開入黑森，便宣布動員，同時也把軍隊派往黑森。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壓力下，普魯士對奧地利作了讓步，沒有給以嚴重的反抗。——第565頁。

- 401** 指在監獄中的奧古斯特·布朗基寄給“平等者宴會”的獻詞。“平等者宴會”是1851年2月24日為紀念1848年二月革命一周年在倫敦舉行的國際會議。宴會的組織者是：路易·勃朗領導下的一部分法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協會的首領——巴特爾米、亞當等人，還有維利希—沙佩爾派。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獲得情報，派自己的擁護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爾去參加宴會，但是，他們被逐出會場，並遭到維利希和沙佩爾的擁護者的毒打。宴會的組織者故意不讓與會者知道的那篇奧·布朗基的獻詞全文，曾發表在許多法國報紙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篇獻詞譯成德文和英文，並且加上了前言（見“馬克思恩

-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頁)。德譯文會大量印發,流傳在德國和英國。——第568頁。
- 402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違背了他在普魯士1848年三月革命時期對人民的呼喚中所許下的關於建立憲制的莊嚴諾言。——第572頁。
- 403 在1848—1849年革命發生以前的時期,德國各宗教反對派——所謂“德國天主教”和新教的“自由公理會”——的代表們企圖建立全德國的國教。1844年在德意志各邦建立的“德國天主教”,其宗旨是反對天主教中極端的神秘主義和偽善。“德國天主教徒”否認羅馬教皇的領導,反對天主教的許多教義和儀式,竭力使天主教適應德國資產階級的需要。“自由公理會”是在“光明之友”運動(它反對在天主教中占統治地位的偽善的和神秘主義的派別——虔誠主義)的影響下,於1846年從官方新教會中分離出來的。這兩個宗教反對派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的資產階級對德國反動制度的不滿和它要求全國政治統一的願望。“自由公理會”與“德國天主教徒”的公理會在1859年合併。——第573頁。
- 404 馬克思所引的1853年11月20日曼徹斯特憲章派群眾大會的決議及瓊斯在這次大會上的發言全文都發表在1853年11月26日“人民報”上。——第579頁。
- 405 恩格斯可能指他在1853年12月7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土耳其戰爭的進程”一文(見本卷第530—536頁),不過在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論點還沒有作為定論提出。有同樣見解的文章在這一時期的“論壇報”上沒有出現過。——第580頁。
- 406 暗指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托·圖克所寫的一些關於工業、商業和財政的歷史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總稱為“價格史”,它們是:“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793—1837年”1838年倫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38年、1839年”1840年倫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 1840)以及“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第589頁。
- 407 繁荣的罗宾逊是弗·約·罗宾逊, 葛德里奇子爵的綽号。1825年經濟危机前夕他以英国財政大臣的身分預言英国經濟会长期繁荣下去。——第590頁。
- 408 皮蒂娅是德尔斐城內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第593頁。
- 409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 周报, 1846年創辦于倫敦。——第596頁。
- 410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1848至1866年在維也納出版。——第598頁。
- 411 詹姆士·格莱安任大不列顛內务大臣时, 为討好奥地利政府, 于1844年命令英国邮政主管部門让警察局暗中檢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
- 馬克思所說的“邦迪埃拉事件”, 是指以密謀組織的成員邦迪埃拉兄弟为首的意大利爱国者的一个小支队于1844年6月在卡拉布利亚海岸登陆一事。邦迪埃拉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举行起义, 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統治。由于支队中一个隊員的背叛, 当局俘获了远征队的参加者; 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599頁。
- 412 西諾普会战发生在1853年11月30日(18日)。在巴·斯·納希莫夫海軍中將的俄国黑海分舰队查明土耳其司令部准备派一个区舰队把軍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并在西諾普海湾发现这个区舰队以后, 便对这个区舰队发动攻击并把它消灭了。有6艘俄国战列舰和2艘巡航舰参加会战; 海岸炮垒炮火支援下的土軍兵力共有16艘軍舰(其中有2艘蒸汽舰)。可是, 在大炮装备上俄国分舰队比土耳其强。会战进程中土耳其舰队損失惨重: 15艘軍舰被击毀, 区舰队司令、海軍元帥奥斯曼-帕沙被俘。西諾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軍事地位, 同时

- 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俄战争。——第 602 頁。
- 413 尼古拉一世 1853 年 6 月 26 日(14日)就沙皇政府决定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所颁发的宣言,以及沙皇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文件都宣布,占领各公国的目的,是建立“物质保证”来保障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并使苏丹履行其对俄国的义务。——第 603 頁。
- 414 圣約翰伍德和切尔西是倫敦两个人口稠密区的名称;克勒蒙特宫(在倫敦市郊)供 1848 年 2 月流亡英国的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全家居住。——第 604 頁。
- 415 指 1849 年参加立法議會的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 17 个奥尔良分子和正統主义者的首領,由于他們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人們把他們称为城官。这个綽号是从維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紀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統治者。——第 605 頁。
- 416 斯特拉斯堡和布倫的英雄,見注 249。——第 605 頁。
- 417 嘲諷地暗指 1812 年 10 月馬萊將軍反对拿破侖第一沒有成功的密謀。有右翼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参加的这一密謀的策划者指望拿破侖的軍隊在俄国遭到失敗,并企图利用他們所散布的拿破侖已在远征俄国时陣亡的說法。——第 606 頁。
- 418 秩序党,見注 344。——第 607 頁。
- 419 1853 年 12 月 16 日帕麦斯頓宣布退出阿伯丁联合內閣。可是他的辞职沒有被接受,很快又回到他原来的內务大臣的职位上来。——第 609 頁。
- 420 指倫敦出版人塔克尔把 1853 年 11 月 4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帕麦斯頓与俄国”一文印成单行本出版,这篇文章是馬克思的“帕麦斯頓勳爵”那組文章中的第三篇(見注 295)。——第 612 頁。
- 421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是用“西諾普和阿哈尔齐赫”的标题刊載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英国报刊的材料写成的。当时英国报刊沒有客观地闡述克里木战争时期軍事行动的进程，而且別有用心地解說了俄軍的官方情报。这首先說明了，为什么文章中对 1853 年 11 月 30 日（18 日）西諾普会战的評述、对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俄国黑海舰队的战斗素质和行动的估計等方面有些不确切之处。例如，恩格斯从英国报纸上袭用了关于黑海舰队有战略弱点、关于該舰队中大半是“陆地水兵”和非俄罗斯民族人員等不正确的說法。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政論性质（这篇文章是紧接着事件发生后写成的）和該文反对作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政治傾向，对于低估西諾普会战的意义起了一定的作用。——第 613 頁。

422 恩格斯在下面描述的阿哈尔齐赫战斗发生于 1853 年 11 月 26 日（14 日）。——第 613 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3年3月—12月)

1853

3月—4月初

由于西方强国和沙皇俄国之間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尖銳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問題交換了意見。

应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东方問題的实质作了分析，并主張以革命手段解决这个問題，在巴尔干建立民主的斯拉夫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不列顛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馬志尼在倫敦。——土耳其”一文及恩格斯的“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点”、“土耳其問題”和“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等文发表于4月7日、12日、19日和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后三篇文章作为社論发表)。

約3月下半月—4月

馬克思认为制定自己的經济学說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繼續深入地研究政治經济学。他閱讀英国經济方面的书籍，并摘录斯宾塞、紐曼、奥普戴克、班菲尔德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及“經济学家”杂志。他特別注意貨幣流通、土地和地租、人口以及国家在經济生活中的作用等問題。

馬克思把他在探討經济問題过程中所获得的材料广泛应用于他的政論作品。

4月

恩格斯重又着手研究軍事科学，对匈牙利革命战争史及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史极为注意，并制定了革命軍队在反沙俄战争中的策略。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問題很重要，他閱讀了赫尔岑1851年法文版的“論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

恩格斯繼續学习俄語，同时研究南方斯拉夫的各种語言。

4月—5月

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屬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閱讀了麦克-庫洛赫、克列姆、貝尔尼埃、薩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經濟的著作，并作了摘录。由于英国議會要討論印度的管理問題，馬克思研究了議会的藍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4月—1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約·魏德迈和阿·克路斯保持經常联系，并对他們在美国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給以很大帮助。由于魏德迈和克路斯給旅美德国工人的团体（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改革报”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介紹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及其他一些支持他們的人参加报社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为“改革报”所轉載。

4月1日和8日

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揭露柏林警察当局捏造的、英国政府用来加强对在倫敦的政治流亡者的警察監視的所謂“革命密謀”。“柏林密謀”和“柏林密謀。——倫敦警察局。——馬志尼。——拉德茨基”两文发表于4月18日和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4月9日左右—5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設法找出版者来出版他們合写的、揭露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首領的“流亡中的大人

物”一书的手稿，但未能成功。

4月9日

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知道希尔施的“間諜活动的受害者。威·希尔施的辯护书”这本誹謗性文集即将在美国发表，写了“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希尔施同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派头目——維利希的狼狽为奸，同时也駁斥了希尔施所散布的馬克思将“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的手稿交給普魯士警察当局的謊言。馬克思的这篇文章載于5月5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

4月12日

恩格斯在給魏德迈的信中，在分析欧洲的經濟和政治情况的基础上表述了他对大陆上新的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階級政党在德国未来的革命战斗中的策略等問題的一系列看法。这封信的一部分由魏德迈以匿名文章的形式发表于5月4日的“改革报”。

为了繼續給厄·琼斯出版和編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的工作以經常不断的帮助，馬克思为該报写了“新的財政把戏或格萊斯頓和辨士”一文。馬克思的一系列揭露联合內閣的預算的反人民性的文章，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該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人民报”。馬克思把一篇内容与这篇文章相仿的題为“內閣的成就”的文章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于4月27日发表。

4月中旬

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克路斯告訴他，他在1853年2月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于3月28日为德国民主派在美国办的报纸“警钟”(«Der Wecker»)所摘要轉載，其他許多美国报纸也轉載了这篇文章。

4月19日—25日左右

馬克思繼續写評論格萊斯頓的預算的文章。他的“英鎊、先令、辨士，或階級的預算和这个預算对誰有利”和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賄賂。——联合內閣的預算”两文于4月23日和30日載于宪章派的“人民报”。另外两篇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內閣的失敗。——預算”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預算”載于5月3日和6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4月24日左右

在波士頓(美国)出版了馬克思的抨击文“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单行本。

4月26日—29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要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瑞士的政治地位的文章。馬克思为这篇文章增添了关于英国政府迫害流亡者一节，并于4月29日将文章寄出。报纸編輯部把这篇文章分为两篇，先后于5月14日和17日发表，一篇題为“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另一篇題为“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4月26日

馬克思接到一份关于柏林警察局头子施梯伯和普魯士警官戈德海姆到达倫敦以及威·希尔施繼續同他們保持联系的匿名通知。他审查了这份材料的可靠性并把它寄給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工人报刊上发表。这件事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一文中也作了报道。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引用了許多說明英国和法国工商业萎縮及表明資本主义繁荣的不稳定性的材料。

4月底

由于馬克思的著作难于推銷和“紐約每日論壇报”不按时付給稿費，馬克思一家陷于困境。恩格斯給馬克思及其家庭以物质援助。

4月30日—5月19日

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5月—6月

为了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恩格斯学习波斯語，从原文閱讀詩人哈菲茲及历史学家米尔洪德的作品。

- 5月20日** 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太平軍起义的原因和性质，并指出中国事变对欧洲經濟和政治发展的必然影响。該文于6月14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恩格斯把魏德迈寄来的錢轉寄馬克思，請他轉交弗萊里格拉特（在科倫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及其家屬救济金收款人）。这些錢是应馬克思和恩格斯及他們的拥护者的呼吁而在美国捐募的。
- 5月24日** 馬克思着手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一些有关印度的文章，因为这时議会即将討論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許狀期限問題。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顛国債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于6月9日在报上刊登。
- 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閱讀福斯特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一书。
- 5月26日左右—6月1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各国的历史問題交換了意見。在談到东方的社会經濟关系时，馬克思指出那里沒有土地私有制。
- 恩格斯依照馬克思的建議閱讀了貝尔尼埃論述印度大莫臥儿国家的著作。
- 5月27日—6月7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些有关歐洲政治的根本問題的文章，他特別注意俄土冲突的发展及西歐外交界在这一冲突中所持的立場。馬克思的“馬志尼。——瑞士和奧地利。——土耳其問題”、“土耳其問題。——‘泰晤士报’。——俄国的擴張”、“俄国的欺騙。——格萊斯頓的失敗。——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等文于6月10日、14日和22日在报上发表。
- 5月31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在波士頓刊印的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440份。他留下了一些准备在曼彻斯特散发，其余的寄給了馬克思。

- 5月底—6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收到魏德迈和克路斯从美国寄来的关于他們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刊上同維利希展开論战的消息。由于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发表，維利希对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攻击。
- 6月** 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图书馆进行工作，为他写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通訊稿搜集資料。他特別注意查普曼、狄金逊、穆勒、坎伯尔、默里及其他等人有关印度的著作，并将其中有关英国的殖民制度、印度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等問題作了摘录。
- 馬克思研究許多有关丹麦历史的著作，如德罗森、札姆韦尔、奥尔斯豪森的作品，并作了摘录。他在写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通訊稿中，在闡述丹麦的事件时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
- 6月—8月** 馬克思和拉薩尔通信商談在德国秘密轉送和散发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問題。恩格斯建議把小册子夹在紗包里轉送，但是这个計劃沒有实现。
- 6月初—7月中旬** 馬克思得到許多报道，这些报道都证明美国讀者对他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文章评价很高。
- 6月2日** 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对“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未經作者同意就擅自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文章作为社論发表表示不滿。馬克思表示要給报社編輯德納写信抗議这样对待他的文章。
- 6月2日—9日** 为了繼續給自己的战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法給威·沃尔弗和威·皮佩尔安置工作。
- 6月1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揭露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殖民主义統治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馬克思發揮了恩格斯6月6日的信中所說的印度农业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統治而

- 衰落的思想。該文載于6月2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
- 6月14日** 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批評了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的“我國和外國的奴隸制”一書和他的其他一些鼓吹階級利益調和及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著作。
- 6月中旬** 馬克思在給克路斯的信中建議魏德邁和克路斯繼續為“改革報”撰稿，儘管報社編輯部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影響增加。馬克思強調指出魏德邁和克路斯在無產階級革命者在美國尚未掌握其他刊物的情況下參加該報工作的重要性的。
- 馬克思把他對凱里的經濟觀點的批評意見寄給克路斯。克路斯在一篇於9月份發表在“改革報”上的文章里採用了這些意見。
- 6月17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一篇文章，文章一方面評論了英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同時把在英國已經展開罷工運動和憲章派試圖在國內恢復他們的鼓動等消息向讀者作了報道。馬克思從這篇文章開始在他的通訊稿中系統地闡述英國工人運動的問題。“英國的繁榮。——罷工。——土耳其問題。——印度”一文載於7月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
- 6月20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說，在美國工人同盟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關於“改革報”的方針問題多數人贊成魏德邁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和策略原則的精神所採取的路綫。
- 6月24日** 馬克思寫“東印度公司，它的歷史與結果”一文，闡述英國統治階級對印度進行殖民主義奴役和掠奪的歷史。文章載於7月1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
- 6月28日** 馬克思寫了論述愛爾蘭的租佃權的文章，揭露英國大

- 地主对爱尔兰农民进行剝削时所使用的凶恶的方法。“印度問題。——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載于7月1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不早于7月初** 恩格斯閱讀亞·伊·赫尔岑所写的、由倫敦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的反农奴制宣言“尤利耶日！尤利耶日！給俄国貴族”。
- 約7月—11月** 馬克思研究1807—1850年这一时期的議会报告、外交文献和資料，对英国外交史特別注意。
- 7月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土冲突和英国罢工运动的通訊稿，于7月14日在报上发表。
- 7月9日** 德国流亡者、科倫案件中受审的共产党人之一雅科比持馬克思的介紹信来找恩格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为雅科比安排工作。
- 7月12日** 針对俄国侵占多瑙河各公国，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反对沙皇俄国的扩張政策及英国政府在这个問題上所持的立場的文章。馬克思的“俄土糾紛。——不列顛內閣的詭計和詭辯。——涅謝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問題”一文于7月25日在报上刊登。
- 7月19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繼續闡述俄土冲突及西欧外交界的干涉尝试的文章。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論证了他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在巴尔干建立斯拉夫民主国家的思想。他的“战争問題。——議会动态。——印度”一文于8月5日在报上发表。
- 7月22日** 馬克思写“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一文，总结了他关于印度的著述，得出了不列顛在这个国家中的殖民統治必将崩潰的結論。該文載于8月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7月29日—8月12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系列綜合評論，闡述欧洲政治的基本問題。馬克思的“政府在財政問題上的失敗。——馬車夫。——爱尔兰。——俄国問題”、“廣告稅。——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战争問題。——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書。——議會动态”等文自8月12日至24日在报上刊登。
- 7月底—8月初** 恩格斯去倫敦同从德国到此地逗留的母亲相会。
- 8月16日和19日** 馬克思写了两篇談英国議會关于土耳其問題的辯論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这两篇文章載于9月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标题为“烏尔卡尔特。——貝姆。——土耳其問題在上院”、“土耳其問題在下院”。
- 8月19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弗萊里格拉特轉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克·克萊因的來信，信中建議在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前佐林根、爱北斐特及杜塞尔多夫等地同盟支部之間建立联系。馬克思在給克萊因的回信中建議保持工厂工人的独立組織，防止小資產階級分子钻入。考虑到要保守秘密，馬克思建議只通过个人接触同倫敦保持联系。
- 8月23日** 馬克思写“大陆和英国的情况”一文。文中在闡述东方問題的同时，对业已結束的英国議會會議作了总结，揭露联合內閣和英国議會的反动政策。該文載于9月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8月30日** 在“晨报”上圍繞着巴枯宁展开了論战，在論战过程中有人攻击“新萊茵报”，因此馬克思給“晨报”編輯写了一封公开信，說明“新萊茵报”对巴枯宁的态度。馬克思的信載于9月2日的“晨报”。

- 8月30日—9月27日** 馬克思写了一些談欧洲經濟状况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主要欧洲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經濟中有經濟危机日益迫近的迹象。“粮价上漲。——霍乱。——罢工。——海員中的运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等文从9月15日至10月17日刊载于“紐約每日論壇报”。
- 9月3日—4日** “晨报”上又出現了攻击“新萊茵报”的論战短評，因此馬克思給該报編輯部写了第二封信。因为編輯部拒絕刊登这封信，馬克思于9月10日把他的回信发表在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上。
- 9月9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談1844年皮尔的銀行法令的文章，于9月24日作为社論在报上发表。
- 9月29日** 恩格斯針对俄土的备战写了“俄軍在土耳其”一文，分析多瑙河上武装力量的对比。从这篇文章开始，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过程中有系統地写了軍事評論。該文于10月17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把一些有关英国某些經濟部門状况的具体材料告知馬克思。
- 10月4日—12月6日** 馬克思深入分析藍皮书、議會报告、外交文献和报刊材料，并在这一基础上写了一系列揭露帕麦斯顿的文章，描述帕麦斯顿是当权的政治寡头的代表，并对整个英国政府制度給予評价。这些文章以“帕麦斯顿勋爵”为总标题自10月22日至12月24日在“人民报”上連載。其中大部分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个别文章在“改革报”上用德文轉載。
- 10月7日** 馬克思繼續系統闡述英国罢工运动的进程，写了“战争問題。——金融状况。——罢工”一文。該文发表于10月2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10月12日 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分析了法国的局势并建議恩格斯写一篇关于日益迫近的經濟危机可能給波拿巴政府带来的后果的文章。
- 10月21日—27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談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宣战后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战局。“双方軍队在土耳其的調动”、“神圣的战争”两文先后于11月8日和15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約11月 馬克思詢問德納能否在美国刊印德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
- 11月5日 “人民报”編輯部繼續发表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一文，并在一篇专门短評中提起讀者注意該文对揭露英国統治階級政策的重要性。
- 11月8日左右 恩格斯写“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分析了俄土两国軍队之間在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动。該文于11月25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刊登。
- 11月11日 馬克思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一篇通訊稿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該报編輯部于11月28日把其中恩格斯所写部分作为社論发表，标题为“俄軍的失敗”。馬克思所写部分駁斥了英国資产階級报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改善的荒謬論断，于同日单独发表，标题为“工人問題”。
- 11月15日 馬克思写“繁荣。——工人問題”一文，駁斥英国資产階級杂志“經濟学家”所說的英国經濟繁荣具有稳定性的說法。这篇文章还报道了宪章派的領袖厄內斯特·琼斯鼓动召开工人議会的消息。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1月30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1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繼續密切注視俄土之間的战争动态，又写了一篇談土耳其战争进程的文章，于12月7日在“紐約每

日論壇報”作为社論刊登。

11月20日左右

在給阿·克路斯的信中，馬克思对烏尔卡尔特的历史观和他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克路斯在他的“戴維·烏尔卡尔特”一文中采用了馬克思的这些意見，該文发表于12月19日的“改革報”。

11月21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几期載有維利希反对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文章的“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報”。

11月21日—28日左右

馬克思写了一篇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反对維利希，揭露了工人运动中的小資产階級分子的宗派活动和冒險主义策略。

1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馬克思寄来的維利希反对馬克思的文章原文。应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写了一篇駁斥維利希的誹謗的声明，并寄給馬克思，供他在写“高尚意識的騎士”时使用。馬克思把恩格斯的这份声明收进了他的文章。

11月25日

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在“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報”上发表声明，駁斥維利希对馬克思进行的誹謗性攻击。在这一声明中他們使用了馬克思寄給他們的材料。

11月29日

馬克思把他的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寄給克路斯在美国刊行。該文于1854年1月中在紐約发表。

馬克思在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一篇文章中闡述了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領袖們所进行的爭取召开工人議会的鼓动。“曼托伊費尔的演說。——普魯士的宗教运动。——馬志尼的宣言。——倫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議会”一文于12月12日在報上刊登。

- 12月2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軍事評論“多瑙河战争”。該文于12月16日作为社論在报上发表。
- 12月2日—9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文章,分析西歐列强在俄土战争中的立場。“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和“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两文于12月16日和26日在报上刊登。
- 12月13日** 馬克思写“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指出拿破侖第三的帝国的經濟和政治矛盾的增长表明了波拿巴政权的不稳固性。該文載于12月2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12月14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他的亲戚伊·卡·尤塔要他給在开普敦出版的日报“南非人报”(«Zuid-Afrikaan»)撰稿的来信。
- 12月中旬** 恩格斯力求辞掉“歐門—恩格斯”公司办事員的工作,想做倫敦一家报纸的軍事記者,以便能有更多閑暇時間写他已經构思好的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史的著作,并能在倫敦与馬克思生活在一起。这个試图沒有成功。
- 12月下半年** 海·列維以前萊茵省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些支部的代表的資格由杜塞尔多夫来見馬克思。他試图向馬克思证明发动伊塞隆、佐林根和萊茵省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起义的必要性。馬克思向他說明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是不适时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 12月16日左右** “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馬克思的一篇談帕麦斯頓的文章“帕麦斯頓和俄国”由倫敦塔克尔出版社出单行本。整个一版书在几星期內就脫銷了。
- 12月16日** 馬克思写“帕麦斯頓辞职”一文。該文发表于12月3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12月20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寄去一篇談報刊對帕麥斯頓辭職的評論的文章。該文沒有在報上發表。
- 12月23日左右** 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一篇軍事評論“土耳其戰爭的進程”。這篇文章以英國報刊的消息為根據對西諾普會戰和阿哈爾齊赫戰役作了評述，於1854年1月9日作為社論發表。
- 12月底** 馬克思收到德納對他願意寫德國哲學史方面的文章的答復。德納要求這些文章不得對美國人的宗教情感有任何損害，以此作為在美國一家雜誌發表這些文章的條件。馬克思寫這方面文章的打算始終未能實現。
- 1853年12月底—
1854年1月1日**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家作客。

人名索引

三 画

小皮特, 威廉 (Pitt The Younger, William 175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84、169、170、203 頁。

四 画

巴特, 伊薩克 (Butt, Isaac 1813—1879)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組織者之一。——第 66 頁。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法国將軍, 1854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1854); 1854 年为波罗的海法国远征軍指揮官。——第 491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民权主义者, 政論家,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他在第一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他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會議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321—323、328 頁。

巴甫洛夫, 普罗科菲·雅科夫列維奇

(Павлов, Прокоф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796—1868)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第 516、531 頁。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Bahadur Shah II 1767—1862) ——印度大莫臥儿王朝最后一个鉢諦沙赫 (1837—1858)。——第 227 頁。

巴特米, 艾曼紐尔 (Barthélemy, Emmanuel 約 1820—1855) ——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和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为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1855 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 556、568、569 頁。

巴克豪斯, 約翰 (Backhouse, John 1772—1845) ——英国官員, 1827—1842 年任外交副大臣。——第 438 頁。

巴登公爵——見弗里德里希一世。

比彻·斯托, 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Beecher-Stowe, 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 ——美国女作家, 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第 93 頁。

比諾, 让·馬提阿尔 (Bineau, Jean Martial 1805—1855) ——法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公共工程大臣 (1849—1851), 財政大臣 (1852—1855), 波拿巴主义

者。——第 358 頁。

比頓, 約翰·埃利奧特·德林瓦特 (Bethune, John Elliot Drinkwater 1801—1851) ——英國法學家和大官; 1848 至 1851 年是印度總督所轄的參事會參事。——第 140 頁。

比埃特里, 比埃爾·瑪麗 (Pietri, Pierre Marie 1809—1864) ——法國政治活動家, 波拿巴主義者; 曾任巴黎警察局長 (1852—1858)。——第 31 頁。

丹東, 若爾日·雅克 (Danton, Georges Jacques 1759—1794)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動家之一, 雅各賓黨人右翼領袖。——第 329 頁。

丹麥國王——見弗雷德里克七世。

丹尼洛·涅哥什 (Данило Негош 1826—1860) ——門的內哥羅的大公 (1852—1860)。——第 503 頁。

丹年別爾格, 彼得·安得列也維奇 (Данненберг, 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 ——俄國將軍, 克里木戰爭時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第 516、531 頁。

韋克, 路易 (Weck, Louis) ——1853 年反動的弗里布爾 (瑞士) 暴動的參加者。——第 100 頁。

韋克貝克爾 (Weckbecker) ——1853 年奧地利駐士麥那總領事。——第 219、239 頁。

戈洛文, 伊萬·加甫利洛維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 ——俄國自由派地主, 僑居英國, 政論家, 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爾岑和巴枯寧很接近。——第 321、327、328 頁。

戈德海姆 (Goldheim) ——普魯士警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倫敦普魯士諜報機關的領導人之一。——第 96 頁。

牛頓, 伊薩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 ——偉大的英國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力學科學的創始人。——第 109 頁。

尤爾, 安得魯 (Ure, Andrew 1778—1857) ——英國化學家, 庸俗的經濟學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96 頁。

切爾寧, 安東·弗雷德里克 (Tscherning, Anton Frederick 1795—1874) ——丹麥軍官, 政治活動家, 自由主義者, 1848 年為陸軍大臣。——第 502 頁。

日拉丹, 艾米爾·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 ——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斷續地擔任“新聞報”編輯, 以政治上毫無原則著稱。——第 126 頁。

鄧達斯, 詹姆斯·威特利·迪恩斯 (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 ——英國海軍上將, 1852 年至 1855 年 1 月為參加克里木戰爭的英國地中海艦隊總司令。——第 5、129、135 頁。

無地約翰 (約 1167—1216) ——英國國王 (1199—1216)。——第 27 頁。

厄斯特德, 安德斯·桑戴 (Ørsted, Anders Sandøe 1778—1860) ——丹麥法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1853—1854 年任首相。——第 502 頁。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jski, Wladislaw) ——伯爵, 波蘭大地主, 曾參加 1830—1831 年起義, 起義被鎮壓後成為在巴黎的波蘭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團的領導人之一。——第 437 頁。

夫賴堡大主教——見維卡里。

五 画

布龍, 卡爾 (Bruhn, Karl 生于 1803 年)

- 德国記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0年被开除出盟；后为拉薩尔的拥护者。——第545頁。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魯士官員，政論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属于中間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流亡倫敦；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拥护俾斯麦。——第548頁。
- 布奥尔-紹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駐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駐倫敦公使(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219、266、291、301、363、603頁。
- 布魯姆，亨利·彼得(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輝格党的著名活动家，大法官(1830—1834)；五十年代他在政治生活中不起多大作用。——第211頁。
- 布魯克，卡尔·路德維希(Bruck, Karl Ludwig 1798—1860)——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家；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財政大臣(1855—1860)。——第219、314、462、473頁。
- 布罗頓——見霍布豪斯，約翰·凱姆。
- 布萊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閣各部大臣。——第66、141、154、198、206、218、223、229、475、505頁。
- 布朗基，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許多秘密社团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1830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848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階級运动极左翼的立場，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568、569頁。
-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Bourquene, François Adolphe 1799—1869)——法国外交家，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后为大使(1844—1848)；駐維也納公使(1853—1856)，后为大使(1856—1859)。——第266頁。
- 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頓·厄尔(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議會議員(1830—1837)，輝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是英国駐巴黎的代办，后为駐馬德里(1843—1848)、華盛頓(1849—1852)和佛罗倫薩(1852—1855)公使；1858—1865年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第440、459頁。
- 布魯士斯(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士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約85—42)——羅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派陰謀的发起人之一。——第33頁。
- 布隆諾夫，菲力浦·伊万諾維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駐倫敦公使(1840—1854、1858—1860)，后为大使(1860—1874)。——第155、160、161、198、293頁。
- 布里格斯，約翰(Briggs, John 1785—1875)——英国將軍；1801—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供职；1853年为东印度公

- 司股东会成員。——第 225 頁。
- 布萊克特, 約翰·芬威克·伯戈因 (Blackett, John Fauweek Burgoyne 1821—1856)——英國議會議員。——第 143、308 頁。
- 布斯特拉巴——見拿破侖第三。
- 布德貝爾格,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Будбе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8—1876)——俄國將軍; 1853—1854 年為駐多瑙河各公國的特派專員。——第 604 頁。
- 布爾昂的哥特弗利德 (約 1060—1100)——下洛林公爵 (1089—1100), 第一次十字軍遠征 (1096—1099) 的首領之一。——第 547 頁。
- 弗蘭茨-約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奧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126、474 頁。
- 弗略里, 查理 (Fleury, Charles) (真名為: 卡尔·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克勞澤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 1824 年)——倫敦商人, 普魯士的間諜和警探。——第 44、96 頁。
- 弗朗斯瓦一世 (François I 1494—1547)——法國國王 (1515—1547)。——第 67 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 (Friedrich I 1826—1907)——1852 年起是巴登的實際上的統治者, 1856 年起是巴登大公。——第 573、574 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羅薩 (Friedrich I Barbarossa 約 1123—1190)——1152 年起是德國國王, 後為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1155—1190)。——第 121、406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國王 (1840—1861)。——第 32、33、125、237、355、572、575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麥國王 (1848—1863)。——第 257、273、274、502 頁。
- 卡諾, 拉查爾·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 1848 年為臨時政府委員;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1851 年以後成為反對波拿巴主義政體的共和黨反對派領袖之一。——第 605 頁。
- 卡拉-格奧爾基 (Кара-Георгий) (格奧爾基·彼得羅維奇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1752—1817)——1804—1813 年塞爾維亞人民反對土耳其壓迫的鬥爭的領導者, 獨立的塞爾維亞執政者 (1811—1813), 卡拉格奧爾基王朝的奠基者; 1813 年失敗後逃出塞爾維亞, 1817 年秘密回到祖國; 按米洛什·奧布廉諾維奇的命令被殺害。——第 39 頁。
- 卡索拉, 卡洛 (Cassola, Carlo 生于 1814 年)——意大利愛國者, 革命者, 馬志尼的擁護者。——第 342 頁。
- 卡拉德, 尼古拉 (Carrard, Nicolas 死于 1853 年)——反對瑞士資產階級政府的教權反對派領袖之一, 1850、1851 和 1853 年反動的弗里布爾暴動的領導人。——第 99 頁。
- 卡萊爾, 托馬斯 (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國作家, 歷史學家, 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義哲學家, 站在反動的浪漫主義立場批判英國的資產階級, 傾向托利黨, 1848 年後成為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 工人運動的露骨的敵人。——第 343 頁。

- 卡德威尔, 爱德华 (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领袖之一, 后成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5), 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 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第218页。
- 卡尔尼茨基, 弗拉基斯拉夫 (Karnicki, Wladislaw)——伯爵, 奥地利外交家, 1853年任驻伯尔尼代办。——第124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人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69、82、205、288、330、334、335、337—340、356、404、413、417、420、423、432、434、458、459、461、464、492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 议会議員; 前者的儿子。——第154页。
- 皮斯 (Peace)——英国煤矿企业家克劳弗德伯爵的职员。——第504页。
-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語文学家和新聞記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侨居倫敦; 1850—1854年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第562、565页。
- 汉特, 亨利 (Hunt, Henry 1773—1835)——著名的英国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议会議員。——第405页。
- 汉普敦, 約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代表资产階級和资产階級化的貴族的利益。——第255页。
- 汉密尔顿——見西摩尔, 乔治·汉密尔顿。
- 圣馬尔克-日拉丹 (Saint-Marc-Girardin 1801—1873)——法国新聞記者和文艺学家, 奥尔良党人。——第134、135页。
- 圣莱昂納茲——見薩格登, 爱德华。
- “圣者”斯蒂凡一世 (Stephan I 约975—1038)——匈牙利公爵(997年起), 1001—1038年为匈牙利国王。——第558页。
-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副議長和左派领导人之一; 后为进步党人。——第33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 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敗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 主持巴黎大会(1856)。——第408页。
- 尼罗德 (Нирод)——俄国將軍, 1853年任多瑙河俄軍指揮官。——第532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5、19、23、40、126、130、131、133—135、155、161、164、184—186、197、198、215、219—222、237、238、240、258、261、262、266—268、271—274、292—296、298、300—302、306、316、330、350—355、365

—369, 384, 392, 401—403, 406—408, 421, 435, 436, 437, 442, 455, 458, 463, 464, 472, 473, 478, 480, 484, 501, 503, 535, 592, 595—597, 603—605, 610, 611 頁。

卢格, 阿尔諾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階級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階級流亡者領袖之一;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547 頁。

本諾克, 弗兰西斯 (Bennoch, Francis)——美国商人, 1853 年倫敦市政厅委員。——第 576 頁。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1806—1807 年任財政大臣, 后任樞密院院长 (1830—1841), 不管部大臣 (1852—1863)。——第 286 頁。

加腊沙宁, 伊里亚 (Гарашанин, Илья 1812—1874)——塞爾維亞国家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曾任內政大臣 (1843—1852, 1858—1859), 內閣會議主席和外交大臣 (1852—1853, 1861—1867); 五十年代采取反俄方針, 后来又促使塞爾維亞同俄国亲近。——第 13, 259, 303 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36, 130, 457 頁。

六 画

伊索 (Aisopos 公元前六世紀)——半傳說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 60 頁。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軍官, 1846 年起升为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409, 432 頁。

伊万迪斯 (Yvandis)——1853 年瓦拉几亚內政部官員。——第 314 頁。

伊斯馬伊耳-帕沙 (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將軍, 切尔克斯人; 1853 年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第 516 頁。

伊布拉希姆-帕沙 (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的統帥, 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 1824—1828 年曾率領土軍鎮压希腊起义者; 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軍总司令 (1831—1833 和 1839—1841); 1844 年起是埃及的共同攝政者。——第 420, 424, 426 頁。

伊斯拉馬托夫, 伊万·尼古拉也維奇 (Исламато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海軍軍官, “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第 599 頁。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 (1558—1603)。——第 167, 172 頁。

安德森 (Anderson)——苏格兰銀行行长。——第 339 頁。

安德頓, 威廉 (Anderton, William)——英国約克郡的厂主。——第 219, 239 頁。

安斯提, 托馬斯·契澤姆 (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第 409, 435, 438—441, 453 頁。

安都昂, 古斯达夫 (Antoine, Gustav)

-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倫敦的法國流亡者；奧古斯特·布朗基之婿。
——第 568 頁。
- 安赫斯特，威廉·皮特 (Amherst, William Pitt 1773—1857)——伯爵，英國外交家和国家活動家；印度總督 (1823—1828)。——第 228 頁。
- 安德朗尼科夫，伊萬·馬耳哈左維奇 (Андронников, Иван Малхазович 1798—1868)——公爵，俄國將軍，克里木戰爭期間在高加索作戰；格魯吉亞人。
——第 617 頁。
- 米涅，克勞德·埃蒂耶納 (Minié, Claude Etienne 1804—1879)——法國軍官和軍事發明家。——第 535 頁。
- 米爾納·基卜生 (Milner Gibson)——見基卜生，托馬斯·米爾納。
- 米洛什·奧布廉諾維奇 (Милош Обренович 1780—1860)——塞爾維亞的大公 (1817—1839 和 1858—1860)，奧布廉諾維奇王朝的奠基者。——第 40 頁。
- 米耳恩斯，理查·蒙克頓 (Milnes, 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初為托利黨人，十九世紀下半葉為自由黨人，議會議員。——第 307、316 頁。
- 米哈伊爾·奧布廉諾維奇 (Михаил Обренович 1823—1868)——塞爾維亞的大公 (1839—1842 和 1860—1868)。——第 259、303 頁。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維希 (Miskowsky, Henrik Ludvic 死于 1854 年)——波蘭軍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被鎮壓後流亡土耳其，後遷倫敦。——第 554 頁。
- 喬治·桑 (George Sand) (真名為：奧羅拉·杜班 Aurore Dupin 1804—1896)
——法國著名的女作家，著有長篇社會小說多種，浪漫主義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 321、322 頁。
- 喬斯林，羅伯特 (Jocelyn, Robert 1816—1854)——子爵，英國軍官，議會議員，1845—1846 年在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任職。——第 223、224 頁。
- 喬治一世 (George I 1660—1727)——英國國王 (1714—1727)。——第 173 頁。
- 喬治二世 (George II 1683—1760)——英國國王 (1727—1760)。——第 173 頁。
- 喬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英國國王 (1760—1820)。——第 169、173 頁。
- 西摩爾，喬治·漢密爾頓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國外交家，1851—1854 年任駐彼得堡公使。——第 341 頁。
- 西哀士，艾曼紐爾·約瑟夫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國天主教神甫，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第 81 頁。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頓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首相兼財政大臣 (1801—1804)；任內務大臣時 (1812—1821) 對工人運動實施鎮壓措施。——第 393 頁。
- 西爾莫伊 (Szirmay)——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匈牙利流亡者，科蘇特在巴黎的密使。——第 47 頁。
- 西班牙公主——見瑪麗-路易莎·費南達。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他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表现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的理論家。——第 202 頁。

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 古代作家著作中称薩尔达尼拔)——亚述国王 (公元前 668—約 626)。——第 279 頁。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 (1801—1825)。——第 5、367、410、416 頁。

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維奇 (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агеоргиевич 1806—1885)——塞爾維亞的大公 (1842—1858)。——第 259、314、315、516、588、610 頁。

列施德-帕沙 (Reshit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多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1853 年 (5 月 13 日起) 为外交大臣。——第 122、197、259、260、291、295、301、314、330、355、368、462、473、588、593 頁。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125、289、605 頁。

吉卡,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 (Ghika, Gregor Alexander 1807—1857)——莫尔达維亞的国君 (1849—1853 和 1854—1856)。——第 267、313、355、604 頁。

吉比奇, 伊万·伊万諾維奇 (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 俄国元帅,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軍总司令; 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軍队的总司令。——第 7、36、515 頁。

吉姆佩尔 (Gimpel)——德国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曾流亡倫敦。——第 516 頁。

达来朗-貝里戈,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外交部长 (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 (1814—1815), 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原則和唯利是图; 1830—1834 年任駐倫敦大使。——第 408、455 頁。

达尔豪西侯爵, 詹姆士·安得魯·拉姆西 (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曾任印度总督 (1848—1856), 执行殖民地掠夺政策。——第 138、140、226 頁。

艾韦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脫盟。——第 321 頁。

艾曼努埃尔, 格奥尔基·阿尔先也維奇 (Эммануэль, Георг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1775—1837)——俄国將軍, 匈牙利人, 高加索駐軍司令 (1826—1831); 1829 年曾对厄尔布魯士山进行考察。——第 444 頁。

伍德, 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財政大臣 (1846—1852),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2—1855), 海軍首席大臣 (1855—1858), 印度事务大臣 (1859—1866)。——第 89、119、120、132、138—141、143、144、157、200、201、204、209、211、253、294、299 頁。

休謨, 約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产階級激进派領袖之一, 議會議員。——第 57、80、89、143、223、405、415、417、455、460、504 頁。

考威尔, 乔治(Cowell, George)——英国工人, 宪章运动活动家, 1853—1854年普雷斯頓罢工领导者之一。——第503、521頁。

多尔哥魯科夫, 瓦西里·安得列也維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03—1868)——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陸軍大臣(1853—1856); 宪兵头子和第三厅厅长(1856—1866)。——第273頁。

华姆斯萊, 乔舒阿(Walm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議會議員。——第239頁。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政論家, “萊茵报”撰稿人(1842—1843),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成員, “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因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判处6年徒刑, 后为进步党人。——第559頁。

七 画

克奧, 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皮尔派, 議會中爱尔兰派的領袖之一; 在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多次担任最高司法职务。——第137頁。

克罗茨, 阿那卡雪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曾同左派雅各宾党人接近; 革命前是普魯士男爵。——第329頁。

克萊夫, 罗伯特(Clive, Robert 1725—1774)——孟加拉省督(1757—1760和

1765—1767), 不列顛在印度广泛采用强盜手段进行殖民統治的肇始人。——第170、251頁。

克萊門蒂, 魯伊治(Clementi, Luigi)——意大利爱国者, 革命者, 馬志尼的拥护者。——第342頁。

克拉倫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殘酷地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 1865—1866和1868—1870)。——第22、37、155、160、161、211、212、218、239、266、269、271、272、292、296、297、341、353、354、367、368頁。

克倫威尔, 奧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貴族領袖, 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167頁。

克罗弗德伯爵, 詹姆斯·林齐·拜尔凱利斯(Crawford, James Lindsay Balcarres 1783—1869)——英国大地主和煤矿主。——第374、492、504頁。

克罗弗德, 爱德华·亨利·約翰(Craufurd, Edward Henry John 生于1816年)——英国法官; 1852—1853年为議會議員。——第200頁。

克列美尔, 格奧尔基(Кремль, Георгий)——1853年俄国駐倫敦总領事。——第96頁。

克罗斯利, 弗兰西斯(Crossley, Francis 1817—1872)——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議會議員。——第222頁。

克蘭里卡德侯爵，烏利克·約翰·德·巴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 ——英國外交家和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38—1841)。——第 211、285、298 頁。

貝爾，詹姆斯 (Bell, James 死于 1842 年) ——英國商人，三十年代是英國在高加索的間諜。——第 459 頁。

貝爾，喬治 (Bell, George) ——英國商人，詹姆斯·貝爾的哥哥和同伙。——第 451、455—460 頁。

貝坦，路易·瑪麗·阿爾芒 (Bertin, Louis Marie-Armand 1801—1854) ——法國新聞記者，奧爾良黨人，1841—1854 年是“辯論日報”的出版者。——第 135 頁。

貝姆，約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 ——波蘭將軍，民族解放運動活動家，1830—1831 年起義的參加者；1848 年參加維也納革命鬥爭；匈牙利革命軍領導者之一；後在土耳其軍隊服務。——第 291 頁。

貝林，亞歷山大 (Baring, Alexander 1774—1848) ——倫敦的一家銀行經理，托利黨人，議會議員。——第 339 頁。

貝朗熱，比埃爾·讓 (Beranger, Pierre Jean 1780—1857) ——法國最傑出的民主主義詩人，寫有許多政治諷刺詩。——第 6 頁。

貝克爾，海爾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德國法學家和政論家，1850 年起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判 5 年徒刑；後來成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 543、

545、563—566 頁。

貝倫茲，尤利烏斯 (Berends, Julius 生于 1817 年) ——柏林印刷廠主，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左翼。——第 33 頁。

貝克萊，弗蘭西斯·亨利·菲茨哈丁 (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 ——英國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議會議員。——第 154 頁。

貝特曼-霍爾威克，摩里茨·奧古斯特 (Bethmann-Hollweg, Moritz-August 1795—1877) ——普魯士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保守黨領袖之一，普魯士議會第一議院議員，後為第二議院議員 (1849—1855)。——第 32、41 頁。

利文，威廉·卡爾洛維奇 (Ливен, Вильгельм Карлович 1800—1880) ——男爵，俄國將軍，曾多次完成外交使命。——第 355 頁。

利文，達麗婭 (多羅苔婭)·赫里斯托弗羅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ь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 ——公爵夫人，俄國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她在歐洲外交生活中，作為倫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龍的女主人起着顯著的作用。——第 23 頁。

利文，赫里斯托弗爾·安得列也維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 ——公爵，俄國外交家，駐柏林公使 (1810—1812)，駐倫敦大使 (1812—1834)。——第 186、188、262、400 頁。

利德耳，亨利·喬治 (Liddell, Henry George 1821—1903) ——英國議會活動家。——第 212 頁。

利齊烏斯 (Lizius) ——美因河畔法蘭克

- 福的图书出版人。——第 47 頁。
- 利普兰迪, 巴維尔·彼得罗維奇 (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期間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第 531 頁。
- 利迭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維奇 (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 ——俄国將軍, 曾任多瑙河俄軍軍长(1853—1854), 南方軍司令(1855), 1856 年初为克里木駐軍总司令。——第 513、532 頁。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历任內閣各部大臣, 曾任首相(1812—1827)。——第 392 頁。
- 狄金逊(Dickinson)——布萊克本(英国郎卡郡)鑄铁厂厂主。——第 374 頁。
- 狄金逊, 約翰 (Dickinson, John 1815—1876) ——英国政論家, 自由貿易論者; 他著有許多有关印度的著作, 是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的創始人之一。——第 208 頁。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 ——偉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92 頁。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Δημοσθένης] 公元前 384—322) ——古希腊的大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馬其頓党的領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22 頁。
- 沙尔, 雅克·尤貝尔(Charles, Jacques-Hubert 1793—1882) ——瑞士反动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参加者。——第 99 頁。
- 沙米尔(Шамиль 約 1798—1871) ——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斗争的领导人, 苏丹土耳其用来进行侵略的反动狂信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165、478、503、513 頁。
- 沙菲汗——伊朗外交家, 1853 年任駐倫敦公使。——第 501 頁。
- 沙佩尔, 卡尔(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首領之一; 1856 年又重新与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 541、553、558、568 頁。
- 麦克唐奈 (MacDonnell) ——苏格兰女地主。——第 470 頁。
- 麦克尼耳, 約翰 (McNeill, John 1795—1883) ——英国外交家, 1836—1842 年任駐德黑兰公使。——第 402 頁。
- 麦克格萊哥尔, 詹姆斯 (MacGregor, James) ——1852—1853 年英国議会议員。——第 66 頁。
- 亨策, 阿·(Hentze, A.) ——德国軍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原告证人。——第 562—564 頁。
- 亨利, 托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 ——英国法官。——第 96、98 頁。
- 亨利五世 (Henri V) ——見尙博尔, 昂利·沙尔。
- 沃倫, 查理 (Warren, Charles 1798—1866) ——英国軍官, 1858 年起为將軍, 1816—1819 和 1830—1838 年在印度任

- 职；克里木战争参加者。——第 249 頁。
-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謝明諾維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將軍，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駐軍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503、513、535、617 頁。
- 沃依諾維奇，馬尔柯·伊万諾維奇 (Войнович, Марко Иванович 死于 1807 年) ——伯爵，俄国海軍軍官，达尔馬戚亚人，1801 年起为海軍上将；1781 年曾率領一支远征队想在里海东岸一个島上修筑防御工事，但没有成功。——第 130 頁。
-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 181、505 頁。
- 李伯尼，亞諾什 (Libényi, János 約 1832—1853) ——匈牙利裁縫学徒，曾于 1853 年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約瑟夫。——第 33 頁。
- 里德，托馬斯·梅恩 (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 ——著名的英国作家，惊险小說作者。——第 98 頁。
- 里夫，亨利 (Reeve, Henry 1813—1895) ——英国新聞記者和国家官員，1853 年为樞密院秘书。——第 351、360 頁。
- 里子公爵——見奧斯本，托馬斯。
- 苏路克，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約 1782—1867) ——黑人的海地共和国總統，1849 年称帝，号法斯廷一世。——第 295 頁。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 ——偉大的俄国統帥。——第 383、513 頁。
- 坎宁，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領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內閣首相 (1827)。——第 391、392、395、436 頁。
- 坎伯尔，乔治 (Campbell, George 1824—1892) ——1843—1874 年任英国駐印度的殖民官員 (断續地)，著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后为議會議員 (1875—1892)，自由党人。——第 205—207、208、226、243、245、250 頁。
- 伯克，艾德蒙 (Burke, Edmund 1729—1797) ——英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早期傾向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派，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凶恶敌人之一。——第 208 頁。
- 伯利克里 (Perikles 公元前約 490—429) ——雅典国家活动家，曾促进奴隶民主制制的巩固。——第 419 頁。
- 希尔，理查·萊洛尔 (Sheil, Richard Lalor 1791—1851) ——爱尔兰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輝格党人。——第 431、432、441 頁。
- 希尔施，威廉 (Hirsch, Wilhelm) ——汉堡的店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 44、45、47、96、541、560、561 頁。
- 肖雷，約瑟夫 (Chollet, Joseph)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参加者。——第 99 頁。
- 杜普拉，古斯塔烏斯·查理 (Duplat 或 Du Plat, Gustavus Charles) ——英国外交家，1841—1854 年为駐華沙領事。——第 413 頁。
- 辛凱尔迪，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

-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 ——普魯士政府官員,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31—33頁。
- 劳汉瓦尔特(或劳汉高蒂耶)(Gautier, Sans Avoir 死于1096年) ——法国騎士, 第一次十字軍远征(1096—1099)中法国农民支队的統率者之一。——第541頁。
-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奧(1810—1844)和埃米利奧(1819—1844)(Bandiera, Attilio and Emilio)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軍官,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1844)。——第599頁。
- 却尔茨, 托馬斯(Childs, Thomas) ——英国商船“雌狐号”的船长。——第451頁。

八 画

- 阿利-帕沙(Ali Pasha 1741—1822) ——巴尔干半島西南部一个国家的奠基者和执政者, 定都在亚尼納城(1788—1822); 他在跟土耳其苏丹軍队激战两年(1820—1822)之后投降, 被背信棄义地杀害。——第36頁。
- 阿加-穆罕默德(Agha Muhammad 1742—1797) ——伊朗的沙赫(1794—1797), 卡查尔王朝的奠基者。——第130頁。
- 阿勃迪-帕沙(Abdi Pasha 生于1801年) ——土耳其將軍, 1853年任高加索土軍司令。——第488, 489, 617頁。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領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 1841—1846)和联合內閣首相(1852—1855)。——第4, 22, 35, 37, 93, 119, 135, 138, 155, 160—165, 188, 198, 201, 212, 218, 223, 229, 262, 266, 286, 288, 298, 302, 303, 307, 341, 352, 354, 368, 400, 436, 444, 445, 452, 475, 588, 592, 609頁。
- 阿盖尔公爵, 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1823—1900)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为自由党人; 掌璽大臣(1853—1855, 1859—1866, 1880—1881), 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第218頁。
- 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 1808—1883) ——1832—184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領袖; 1847年被法国人所俘, 1852年得到拿破侖第三的許可, 移居土耳其。——第479頁。
- 阿卜杜-麦吉德(Abdul-Mejit 1823—1861) ——土耳其苏丹(1839—1861)。——第122, 184, 186, 220, 221, 237—241, 259, 260, 267, 278, 295—297, 301—304, 306, 313, 314, 350—355, 364—368, 462, 463, 472, 473, 479, 516, 588, 594, 595, 597, 603頁。
- 阿卜杜-阿吉兹(Abdul-Aziz 1830—1876) ——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弟弟, 1861—1876年为土耳其苏丹。——第239頁。
- 阿尔宁,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 Heinrich Friedrich 1791—1859) ——伯爵, 普魯士外交家, 勃兰登堡反动內閣外交大臣, 駐維也納公使(1845—

- 1848、1851—1858)。——第 266 頁。
- 阿罕默德 (Ahmet 死于 1855 年)——突尼斯的貝伊(1837—1855)。——第 463 頁。
-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薩克森-科堡-哥特亲王, 英国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第 289 頁。
- 阿耳巴諾 (Albano)——英国建筑师。——第 290 頁。
- 阿特伍德, 托馬斯 (Attwood, Thomas 1783—1856)——英国銀行家,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資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屬於宪章运动改良主义右翼, 于 1839 年与之决裂。——第 435、440、459 頁。
- 阿耳比馬尔伯爵, 乔治·托馬斯·克佩耳 (Albemarle, George Thomas Keppel 179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二十年代初历任英国駐印度殖民軍指揮官; 后来成为將軍。——第 244 頁。
- 阿黛拉伊德 (Adélaïde, Eugénie Louise 1777—1847)——奥尔良女公爵, 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妹妹。——第 231 頁。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維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 长詩“瘋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389 頁。
-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軍官, 后为元帥; 駐君士坦丁堡代办(1852—1853);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駐克里木法軍司令部代表,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57—1859)的鎮压者之一。——第 5、164、295、300 頁。
- 罗素, 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 56—58、63、91、119、137、138、154、155、157、161、200、211、213、220、229、239、253、266、272、299—302、306、307、354、368、395、576、609 頁。
- 罗素, 亨利 (Russell, Henry 1751—1836)——英国法学家, 1798—1813 年在印度当法官。——第 225 頁。
- 罗登伯爵, 罗伯特·乔斯林 (Roden, Robert Jocelyn 1788—1870)——英国貴族, 保守党人。——第 285 頁。
- 罗諾茲, 查理 (Ronalds, Charles)——英国法学家。——第 599 頁。
- 罗巴克, 約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資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議會議員。——第 442、454 頁。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 541、542 頁。
- 罗赫納,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約生于 1824 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职业是細木工;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拥护者。——第 561 頁。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約翰·葛德里奇子爵 (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23—1827 年任財政大臣, 首相 (1827—1828)。——第 392、590 頁。
- 罗特哈克尔, 威廉 (Rothacker, Wilhelm)——德国民主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

- 亡美国。——第 545 頁。
- 波蒙-瓦西子爵，爱德华·斐迪南·德·拉·蓬尼尼埃尔 (Beaumont-Vassy, Édouard-Ferdinand de la Bonnière 1816—1876) ——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第 134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波特兰公爵，威廉·亨利·本廷克 (Portland, William Henry Bentinck 1738—1809)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之一；曾任內务大臣 (1794—1801)，內閣首相 (1783 和 1807—1809)。——第 392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維奇 (Пот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 ——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人，1814 至 1821 年是駐巴黎公使，1821—1835 年为大使，后来是駐倫敦大使 (1835—1839)。——第 185—189、230、258、262、400 頁。
- 波門特男爵，迈尔斯·托馬斯·斯特普尔顿 (Beaumont, Miles Thomas Steypeltone 1805—1854) ——英国地主，上院議員，自由党人。——第 239、298 頁。
- 波将金，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維奇 (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元帅 (1784 年起)；曾領導俄罗斯南方边区的垦殖。——第 457 頁。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604 頁。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的皇朝 (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第 606 頁。
- 波累克斯芬，約翰 (Pollexfen, John 約生于 1638 年) ——英国商人和經濟問題的作家，主張取消东印度公司壟断权。——第 172 頁。
- 拉·格隆尼埃尔，路易·埃蒂耶納·阿尔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 (La Guéronnière, Louis-Étienne-Arthur Dubreuil-Héliion 1816—1875)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五十年代是波拿巴主义者。——第 238 頁。
- 拉布謝尔，亨利 (Labouchere, Henry 1798—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貿易大臣 (1839—1841 和 1847—1852)，殖民大臣 (1855—1858)。——第 213 頁。
- 拉瓦累特，沙尔·让·瑪丽·費里克斯 (Lavalette 或 La Valette, Charles-Jean-Marie-Félix 1806—1881) ——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1853 年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曾任內政大臣 (1865—1867)，外交大臣 (1868—1869)。——第 303 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奧地利元帅，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奧軍指揮官，1848—1849 年殘酷地鎮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6 年为倫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41、43、517 頁。
- 拉莫里諾，吉罗拉莫 (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 ——意大利將軍，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皮蒙特軍队指揮官，由于采取叛变的策略，使反革命的奧地利軍队获得了胜利。——第 517 頁。
- 拉格兰奈，德奧多斯·瑪丽·美尔基奧·約瑟夫 (Lagrené, Théodose-Marie-

- Melchior-Joseph 1800—1862)——法国外交家；1831—1834年在彼得堡时期是大使館一等秘书，并做了一个时期的代办。——第 433 頁。
- 拉札列夫，米哈伊尔·彼得罗維奇 (Лазаре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788—1851)——俄国杰出的海軍統帥，海軍上将，南极地带的考察家；1833年起为黑海舰队总司令。——第 451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 27、130、131、261 頁。
- 彼得魯一世 (Pedro I 1798—1834)——巴西皇帝 (1822—1831)，葡萄牙国王彼得魯四世 (1826)，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瑪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第 419 頁。
-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謝也維奇 (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俄国將軍，奧連堡軍事总督 (1833—1842)，奧連堡及薩馬拉两省总督 (1851—1857)；1839—1840年为希瓦远征軍指揮官。——第 501 頁。
- 帕金頓，約翰·索美塞特 (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海軍大臣 (1858—1859 和 1866—1867) 和陸軍大臣 (1867—1868)。——第 3、66、85、253、299、306 頁。
- 帕麦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依靠該党的右翼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3、22、29、35、37、67、78、162、164、212、213、218、219、256、266、279、288、290、311、312、316、333、341、352、354、368、387、389—438、439—442、445、447—452、454—461、475、529、588、590—592、595、597—600、603、609—612 頁。
- 帕斯凱維奇，伊万·費多罗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帥，1831年夏天起为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1849年为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的俄軍总司令；1854年为多瑙河俄軍总司令。——第 480、485 頁。
- 佩里埃，斐迪南 (Perrier, Ferdinand 1812—1882)——瑞士軍官和文学家，弗里布尔州国民自卫軍司令 (1849—1852)；1853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第 99 頁。
- 佩拉特，阿普斯利 (Pellatt, Apsley 1791—1863)——英国企业主，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議會議員。——第 192 頁。
- 佩尔采尔，摩里茨 (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將軍，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迁居英国。——第 47 頁。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詩人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魯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監獄后流亡英国；是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 47、543、548、562、564 頁。
- 金克尔, 約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为莫克尔 Mockel)——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 543 頁。
- 門登——緬甸国王 (1853—1878)。——第 319 頁。
- 門茨, 乔治·弗雷德里克 (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激进派, 議會議員; 1832 年爭取議會改革斗争时期, 曾組織一系列群众集会維護改革。——第 308 頁。
- 奈特, 亨利·加利 (Knight, Henry Gally 1786—1846)——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議會議員。——第 409 頁。
- 居萊, 費倫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伯爵, 奧地利元帅, 陸軍大臣 (1849—1850),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奧軍总司令。——第 197 頁。
- 刻卜勒, 約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第 109 頁。
-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 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的孙子, 法国亨利五世王位的追求者。——第 604 頁。
- 图古特男爵, 約翰·亞馬多·弗兰茨·德·帕烏拉 (Thugut, 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 1736—1818)——奧地利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駐君士坦丁堡公使 (1771—1776), 外交大臣 (1794—1800)。——第 260 頁。
-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中亚細亞的統帥和征服者, 东方幅員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 227 頁。

九 画

- 科堡——見阿尔伯特。
- 科里, 阿默尔·劳里 (Corry, Armar Lowry 1792—1855)——英国海軍上将。——第 129 頁。
- 科斯塔, 馬丁 (Kosztá, Martin 死于 1858 年)——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 后迁美国, 入美国国籍; 所謂的“土麦那事件”(1853)的参与者。——第 219、239、291、331 頁。
-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創始人之一; 議會議員。——第 66、154、200、265、308—312、316、475、492、505、520 頁。
-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资产階級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168、214、215 頁。
- 科貝特, 約翰·摩尔根 (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英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 威廉·科貝特的儿子。——第 213、214、215、257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oui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资产階級民主派, 是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 47、66、78、98、442 頁。
- 科堡家族 (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 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屬於这个家族, 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 288、349、418、419、

- 611 頁。
- 科德林頓, 爱德华 (Codrington, Edward 1770—1851)——英国海軍上将, 在納瓦林会战中为俄、英、法联合舰队指揮官。——第 400、425 頁。
- 科尔尼洛夫,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謝也維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杰出的俄国海軍活动家, 海軍上将, 黑海舰队參謀长 (1849—1853),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組織者之一。——第 5、616 頁。
- 科斯策尔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Kosielski, Wladislaw 生于 1820 年)——波兰民主主义者, 流亡者, 后为土耳其軍队的將軍。——第 322 頁。
- 威廉斯, 威廉 (Williams, William)——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 1853 年为議會議員。——第 57、79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28—1830)。——第 225、392、395、417、425、436、444、452、482、489 頁。
- 威尔逊, 詹姆士 (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經濟学家”杂志的創辦人和編輯; 1853—1858 年任財政部秘书长。——第 182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亲王, 普魯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32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72—1843)——荷兰国王 (1813—1840); 1815—1830 年又是比利时国王。——第 416 頁。
- 威廉四世 (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 (1830—1837)。——第 437—441、458 頁。
- 威斯特摩兰伯爵, 約翰·范恩 (Westmorland, John Fane 1784—1859)——英国外交家, 駐柏林公使 (1841—1851) 和駐維也納公使 (1851—1855)。——第 266、279 頁。
- 威斯特华倫, 斐迪南·馮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务大臣 (1850—1858), 反动派, 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的異母哥哥。——第 31、32 頁。
- 施特芬, 威·(Steffen, W.)——前普魯士軍官,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告証人, 1853 年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在五十年代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 566 頁。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警官, 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 (1852) 的組織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証人; 同維爾穆特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一書; 后为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長。——第 31—33、41、96、549 頁。
-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Conrad 約 1822—1858)——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9 年起流亡倫敦,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發行負責人,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馬克思;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52—557、565 頁。
-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維希 (Stechn, Gottlieb Ludwig 約生于 1814 年)——汉諾威的細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 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1851 年 12 月起又成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1852 年 1 月起領導倫敦工人协会。——第 561 頁。
- 施梯尔貝公爵, 巴尔布·德米特利·比伯斯庫(Stirbei, Barbo Demetrius Bibesco 1801—1869)——瓦拉几亚的国君(1849—1853 和 1854—1856)。——第 267、313、355、604 頁。
- 施瓦尔岑堡, 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 Friedrich 1800—1870)——公爵, 奧地利軍官, 后为將軍, 鎮压加里西亚农民起义(1846 年)的組織者之一, 1849 年参加鎮压匈牙利的革命。——第 414 頁。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辯护人。——第 543、564 頁。
- 查普曼, 約翰(Chapman, John 1801—1854)——英国政論家, 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 拥护在印度实行改革。——第 249 頁。
-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 575 頁。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 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167 頁。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 187、262 頁。
- 查理大帝(Charlemange 或 Charles I^{er} le Grand 約 742—814)——法国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第 262 頁。
- 查尔托雷斯基, 亚当·埃日伊(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 波兰大地主, 十九世紀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被鎮压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領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 316、437 頁。
-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 約瑟夫(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奧地利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 著有許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 1796—1835 年做近东的外交工作。——第 24 頁。
- 哈利戴,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Halliday, Frederick James 1806—1901)——英屬东印度公司的官員, 孟加拉省督(1854—1859)。——第 201 頁。
- 哈德威克伯爵, 查理·菲力浦·約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e 1799—1873)——英国海軍軍官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4 年起为海軍上将。——第 298 頁。
-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自 1273 年起至 1806 年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王朝(中有間断), 奧地利帝国王朝(1804 年起)和奧匈帝国王朝(1867—1918)。——第 18 頁。
- 哈森克莱維尔, 約翰·彼得(Hasenclever, Johann Peter 1810—1853)——德国生活写实画家。——第 264 頁。
- 柯尔曼(Kollmann)——德国的书商和出版者。——第 46 頁。
- 柯波克, 詹姆斯(Coppock, James 1798—1857)——英国法学家, 議会选举事务

- 經紀人。——第 344 頁。
- 柯立尔, 罗伯特·波雷特(Collier, Robert Porrett 1817—188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 議會議員。——第 57 頁。
- 柯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 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总监(财政部长)(1665—1683), 实际上是法国外交和內政的領導者; 曾实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政体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80 頁。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 采取同資產階級妥协的立場;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是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導人之一。——第 568、569 頁。
- 勃魯姆, 汉斯(Blum, Hans)——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后流亡美国, 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內战。——第 542 頁。
- 勃罗克, 彼得·費多罗維奇(Брок, Петр Федорович 1805—1875)——俄国国家活动家, 财政大臣(1852—1858)。——第 273 頁。
- 胡桑, 爱德华(Hooson, Edward)——英国工人, 宪章运动活动家。——第 192、195 頁。
- 胡尔施德—帕沙(Churchid Pasha)(理查·德博弗尔·盖昂 Richard Debaufre Guyon 1803—1856)——土耳其將軍, 英国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 1853 年为高加索土耳其軍隊指揮官。——第 516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1871 年受封)(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后为保守党領袖; 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 內閣首相(1868 和 1874—1880)。——第 3、53、59、62、66、68、69、72、80—82、84、85、87、88、93—95、155、200、201、211、229、272、287、299、333 頁。
- 迪茨, 奧斯渥特(Dietz, Oswald 1824—1864)——維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倫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是該集团中央委員會委員, 后来参加美国內战。——第 561 頁。
- 娄, 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輝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曾任財政大臣(1868—1873), 內务大臣(1873—1874)。——第 253 頁。
- 咸丰(1831—1861)——中国皇帝(1850—1861)。——第 111、115 頁。
- 品得(Pindaros 公元前約 522—約 442)——古希腊抒情詩人; 曾写了許多庄严的頌詩。——第 393、562 頁。
- 济格尔, 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軍官,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曾任总司令,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軍副总司令, 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 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內战。——第 550 頁。
- 派西沃, 斯宾塞(Perceval, Spencer 1762

- 18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7—1809年任财政大臣,后任内閣首相(1809—1812)。——第392頁。
- 柳里克王朝(Рюриковичи)——罗斯公爵,后为俄国沙皇的王朝(912—1598),即基輔大公伊戈尔的后裔的王朝;据編年史的記述,伊戈尔是半傳說的瓦利亚基軍队統率者柳里克的儿子。——第261頁。
- 英格利斯,罗伯特·哈利(Inglis, Robert Harry 1786—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201、429頁。
- 英格拉哈姆,邓肯·納薩涅尔(Ingraham, Duncan Nathaniel 1802—1891)——美国海軍軍官,1853年为“圣路易号”軍舰舰长;所謂的“土麦那事件”的参与者。——第204、331頁。
-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維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俄国外交家,1850—1854年任駐維也納公使。——第219、301、355、365頁。
- 拜尔凯利斯——見克羅弗德,詹姆士。

十 画

- 馬丁,威廉·范紹(Martin, William Fanshaw 1801—1895)——英国海軍將軍,1853年任朴次茅斯造船厂厂长。——第599頁。
- 馬森納,安得列(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元帅,拿破侖各次战争参加者之一。——第482、513頁。
- 馬萊,克勞德·弗朗斯瓦(Malet, Claude François 1754—1812)——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1812年反波拿巴密謀的領導者,密謀失敗后被枪毙。——第606頁。
- 馬洪子爵,菲力浦·亨利·斯坦霍普(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1805—187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皮尔派,議會議員;1834—1835年为外交副大臣。——第426、444、445頁。
- 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傳記材料)。——第3、31、32、41、43、44—47、96、98、126、132—135、158、160、177、191、199、206、212、230、257、263、268、271、272、283、291、321—323、325、327、330、342、347、350、356、358、467、475、478、492、494、504、505、527、541—549、552、556—571、589、590、598、612頁。
- 馬克思,燕妮(父姓是馮·威斯特华倫)(Marx, Jenny 1814—1881)——卡尔·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46頁。
- 馬迪耶(Madier)——法国机械工程师,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第570頁。
- 馬修斯,約翰(Matthews, John)——英国工人,宪章主义者。——第521頁。
- 馬考萊,托馬斯(Macaulay, Thomas 1800—1859)——英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在任印度总督所轄的参事会参事期間(1833—1838)曾編有印度刑法典,該刑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第140、206頁。
- 馬志尼,朱澤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1849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1850年是倫敦欧洲民主主

- 义者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第 3、4、41、43、107、124、574、575 頁。
- 馬多克, 托馬斯·赫伯特 (Maddock, Thomas Herbert 1792—1870) ——英国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253 頁。
- 馬尔科姆, 約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 ——英国外交家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員, 著有關於印度的著作多种; 曾任駐德黑兰公使 (1799—1801、1808—1809 和 1810); 1826—1830 年为孟买省督。——第 225 頁。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教士, 經濟学家, 资产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宣傳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第 280、369、505、518、520 頁。
- 馬尔克斯, 弗兰西斯·約瑟夫·彼得 (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 ——英国保守派政論家, 地主; 戴·烏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第 321、323 頁。
- 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 ——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 185、186、402、420—426、438、595 頁。
- 馬夫罗格尼 (Maurogeni) ——土耳其外交家, 十九世紀三十年年代初任駐維也納代办。——第 422 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璽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212、239、286、292—296 頁。
- 格雷, 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之一, 曾任首相 (1830—1834)。——第 424、445 頁。
-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 和 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213 頁。
- 格雷, 亨利·乔治 (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軍务大臣 (1835—1839) 和殖民大臣 (1846—1852); 查理·格雷的儿子。——第 212 頁。
- 格萊夫 (Greif) ——普魯士警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在倫敦的諜报机关領導人之一。——第 44 頁。
- 格魯伯, 約翰·哥特弗利德 (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 ——德国学者, 文学史家。——第 67 頁。
- 格里利, 霍拉斯 (Greeley, Horace 1811—1872) ——美国资产階級記者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报”的創辦人和編輯之一; 后来放棄了激进主义。——第 200 頁。
- 格萊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輝格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內务大臣 (1841—1846), 海軍首席大臣 (1830—1834、1852—1855)。——第 294、599、600 頁。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 ——法国新聞記者, 无原則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的代表, 站在极右翼立場; “立宪主义者报”的撰稿人。——第 22 頁。

格爾拉赫, 威廉 (Gerlach, Wilhelm) —— 在倫敦的德國流亡者, 倫敦郊區威·黑耳火箭工廠的工人。——第 98 頁。

格伯克斯, 沙爾 (Gerbex, Charler 1816—1879) —— 瑞士軍官, 1852 年起為弗里布爾州國民自衛軍司令, 鎮壓 1853 年反動的弗里布爾暴動的組織者。——第 99 頁。

格蘭維耳伯爵, 喬治·魯森-高爾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 ——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後為自由黨的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1870—1874 和 1880—1885), 殖民大臣 (1868—1870、1886); 1852—1854 年任樞密院院長。——第 218 頁。

格萊斯頓, 威廉·尤爾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 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後為皮爾派, 十九世紀下半葉是自由黨領袖之一;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49—55、59—63、66、67—76、78—84、87—94、118、119、132、135—137、138、165、166、198、200、211、253、317、345、373、475 頁。

格麥弗諾, 羅伯特 (Grosvenor, Robert 1801—1893) —— 英國政治活動家, 輝格黨人, 後為自由黨人。——第 70、71 頁。

格貝爾特, 奧古斯特 (Gebert, August) —— 梅克倫堡的工人, 在瑞士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後遷居倫敦, 1850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後屬於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 並為該集團的中央委員。——第 562 頁。

格里倫佐尼, 卓萬尼 (Grillenzoni, Giovanni 1796—1868) —— 意大利愛國者, 革命者, 馬志尼的擁護者。——第 342 頁。

格隆德威格, 尼古拉·弗雷德里克·賽韋林 (Grundtvig, Nicolai Frederik Severin 1783—1872) —— 丹麥神學家和詩人, 下院議員, 反對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復歸德國。——第 117 頁。

納梅克-帕沙 (Namyk Pasha) —— 土耳其政治活動家, 1832 年 10 月被派往倫敦執行外交使命。——第 422 頁。

納迪爾-沙赫 (庫利汗) (Nadir Shah 1688—1747) —— 伊朗沙赫 (1736—1747); 1738—1739 年對印度進行了搶劫性的遠征。——第 140、144 頁。

納皮爾, 約瑟夫 (Napier, Joseph 1804—1882) —— 英國政治活動家, 托利黨人, 1852 年以愛爾蘭首席檢察官身分進入得比內閣, 1858—1859 年任愛爾蘭事務大臣。——第 286 頁。

納斯爾-埃德-丁 (Nasr ed-din 1831—1896) —— 伊朗沙赫 (1848—1896)。——第 463 頁。

納希莫夫, 巴維爾·斯切潘諾維奇 (Нахимов,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02—1855) —— 卓越的俄國海軍統帥, 海軍上將, 在西諾普會戰中為俄國分艦隊指揮官;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 (1854—1855) 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第 614、615 頁。

埃爾希, 約翰·賽米爾 (Ersch, Johann Samuel 1766—1828) —— 德國圖書學家, 哈雷的地理學和統計學教授。——第 67 頁。

埃卡留斯, 約翰·格奧爾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 德國

- 裁縫工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盟員，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562 頁。
- 埃卡留斯，約翰·弗里德里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德国裁縫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1 年起流亡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是前者的兄弟。——第 561 頁。
- 埃倫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印度总督(1842—1844)，海軍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第 205、212、225、298 頁。
- 埃耳芬斯頓，蒙特斯图亚特(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779—1859)——孟买省督(1819—1827)，“印度史”一书的作者。——第 226 頁。
- 烏伊勒，路易(Wuilleret, Louis 1815—1898)——瑞士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弗里布尔州保守党的领导人之一，教权派；曾因参加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嫌疑而被捕。——第 99 頁。
- 烏茨奈尔，奧古斯特(Uzner, August 生于 1818 年)——普魯士軍官，德国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倫敦，在威·黑耳工厂工作。——第 97、98 頁。
- 烏尔卡尔特，戴維(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托利党人。——第 28、29、135、291、315、350、354、368、369、437—441、448、458、612 頁。
- 紐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語文学教授和作家，著有許多有关宗教、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著作，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第 182 頁。
- 紐尔納(Nörner)——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普魯士法官。——第 96 頁。
- 紐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軍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軍大臣(1854—1855)和殖民大臣(1859—1864)。——第 286 頁。
- 索耳特，泰特斯(Salt, Titus 1803—1876)——英国厂主。——第 371、470 頁。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約 497—約 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的作者。——第 419 頁。
- 索伊蒙諾夫，費多尔·伊万諾維奇(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將軍，克里木战争时为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陣亡。——第 531 頁。
- 庫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第 44 頁。
- 庫利汗——見納迪尔-沙赫。
- 庫普費尔，阿多尔夫·雅柯夫列維奇(Купфер, Адольф Яковлевич 1799—1865)——俄国物理学家，矿物学家，結晶学家和气象学家；1829 年担任厄尔布魯士峰科学考察队队长。——第 444 頁。

涅謝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总理大臣 (1816—1856)。——第 185、186、188、218、221、222、230、231、237、238、258、269、274、296、341、355、364—367、433、450、461、464、472 頁。

涅謝尔罗迭, 德米特利·卡尔洛維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Дмитрий Карлович) ——伯爵, 俄国外交家,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涅謝尔罗迭的儿子。——第 5 頁。

涅波科伊契茨基, 阿尔土尔·阿达莫維奇 (Непокойчицкий, Артур Адамович 1813—1881)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参加者。——第 5 頁。

席利, 維克多 (Schily, Viktor 1810—1875) ——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的成員。——第 564 頁。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 ——普魯士軍官,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流亡者, 加入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64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45、46、96、102、263、322、507—509、515、533、544—553、557、559、570、580 頁。

恩格尔加尔特 (Энгельгардт) ——俄国將軍, 1853年为多瑙河俄軍指揮官。——第 531 頁。

泰勒, 赫伯特 (Taylor, Herbert 1775—1839) ——英国將軍, 1830—1837年任国王威廉四世的私人秘书。——第

437、441 頁。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普魯士軍官,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柏林革命事变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軍总司令部參謀长,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年轉赴澳大利亚。——第 544、545、557 頁。

桑让 (Songeon) ——法国民主主义者, 1848年革命时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曾流亡倫敦; 后为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第 557 頁。

桑德斯, 約翰 (Saunders, John) ——倫敦刑事調查局的職員。——第 97 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5、6、399、410、416、510、534 頁。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總統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20、23、31、32、67、102、126、161、187、224、237、239、259、265、278、289、293—295、297、349、479、595、604—607、611 頁。

海澤, 海尔曼 (Heise, Hermann 死于 1860年) ——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論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第 564 頁。

朗道夫 (Landolphe) ——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 侨居倫敦, 属于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第 568 頁。

班迪亚, 亞諾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 ——匈牙利新聞記者和軍官, 匈

- 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貝伊，到土耳其軍隊中供职。——第 44—47 頁。
- 翁格恩-施特恩堡，恩斯特·威廉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 Эрнст Вильгельм) ——男爵，俄国外交家，五十年代任駐哥本哈根公使。——第 269 頁。
- 热那亚公爵——見斐迪南多-阿尔伯特-阿梅德奧。
- 爱德华四世 (Edward IV 1442—1483) ——英国国王 (1461—1483)。——第 285 頁。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俄国將軍，多瑙河俄軍司令 (1853—1854)，克里木駐軍总司令 (1855 年 2—12 月)，波兰王国的总督 (1856—1861)。——第 197、239、266、272、351、365、380、472、473、491、503、511、517、530、534、535、604 頁。
- 倫德 (Lund) ——英国約克郡的厂主。——第 468、469 頁。
- 柴尔德，約瑟亚 (Child, Josiah 1630—1699) ——英国經濟学家，銀行家和商人；重商主义者；1681—1683 年和 1686—1688 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第 172 頁。

十 一 画

- 曼，托馬斯 (Mun, Thomas 1571—1641) ——英国商人和經濟学家，重商主义者，1615 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第 172 頁。
- 曼努，揚庫 (Manu, Johann) ——瓦拉儿亞外交大臣 (1850—1854)。——第 313 頁。
- 曼罗，托馬斯 (Munro, Thomas 1761—1827) ——英国將軍，馬德拉斯省督 (1819—1827)。——第 226 頁。
- 曼托伊費尔，奧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內务大臣 (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32、33、41、572 頁。
- 曼托伊費尔，卡尔 (Manteuffel, Karl 1806—1879) ——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內务副大臣 (1851—1853)，农业大臣 (1854—1858)；奧托·泰奧多尔·曼托伊費尔的弟弟。——第 32、33 頁。
- 梅恩·里德——見里德，托馬斯·梅恩。
- 梅恩，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 ——倫敦警察局局长 (1850 年起)。——第 325 頁。
- 梅因，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 ——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547 頁。
- 梅特涅，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奧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35、102、105、400、436、599 頁。
- 梅兰希通，菲力浦 (Melanchton, Philipp 1497—1560) ——德国神学家，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諸侯的利益。——第 547 頁。
- 理查茲，阿尔弗勒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 ——英国剧作家和新聞記者，他反对科布頓和曼彻

- 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 78、240、272 頁。
- 理查一世(獅心理查)(Richard I Lion-He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第 121 頁。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 120 頁。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22、35、102、105、230 頁。
- 基卜生, 托馬斯·米尔納(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后成为自由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66、71、80、198 頁。
- 基謝廖夫, 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維奇(Кисел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家, 1851—1854 年任駐巴黎公使。——第 132 頁。
- 盖昂——見胡尔施德-帕沙。
- 盖扎(較正确的譯名是哥伊沙)(約 949—997)——匈牙利执政者(972—997), 曾促进基督教在匈牙利傳播。——第 64 頁。
- 盖米季, 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rge 1815—1888)——宪章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 “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第 192、193 頁。
- 悉尼——見赫伯特, 悉尼。
- 悉尼, 菲利浦(Sidney, Philip 1554—158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 内侍官和外交官。——第 312 頁。
- 清朝——1644 至 1912 年統治中国的皇朝。——第 110、114 頁。
- 荷馬(Homerus)——半傳說的古希臘叙事詩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賽”的作者。——第 127 頁。
- 密勒, 約瑟夫(約)(Miller, Joseph (Jo) 1684—1738)——英国馳名的喜劇演員。——第 78 頁。
- 得比伯爵(1851 年受封),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 后成为保守党領袖之一; 曾任首相(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3、212、286、317、425、460 頁。
- 隱士彼得(或亞眠的彼得)(約 1050—1115)——法国修道士和傳教士, 第一次十字軍远征(1096—1099)中为农民支队的統率者之一。——第 541、547 頁。
-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 307、312、370、389、422、435、571 頁。
- 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 1814 年起任波兰軍总司令, 实际上是波兰总督(1814—1831)。——第 130、131、437 頁。
- 累亚德, 奧斯丁·亨利(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第 210、211、218、229、300、302—306 頁。

十二画

- 斯坦利——見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
-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得比伯爵(1869年受封)(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 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 殖民大臣(1882—1885), 爱德华·得比的孩子。——第156、158、167、177、196頁。
- 斯宾塞, 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者, 实证論者, 资本主义辯护者。——第182、183頁。
- 斯雷德, 阿道夫(Slade, Adolphus 1804—1877) ——英国海軍軍官, 后为海軍上将; 1849—1866年在土耳其任职, 克里木战争前夕获土耳其舰队海軍少将銜。——第485頁。
- 斯卡利, 弗兰西斯(Scully, Francis 生于1820年)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1847—1857)。——第287頁。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庫茨(Stewart, Dudley Coutts 1803—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98、272、306、309、317、405、412、442、444、457頁。
- 斯图亚特, 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 ——英国政治活动家, 1835—1836年为議會議員,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411、446、447、451頁。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 ——英国外交家, 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1814—1858)。——第23、126、259、300、351、426、442、459、598、603頁。
- 斯特拉索尔多-格拉芬堡, 米哈埃尔(Strassoldo-Grafenberg, Michael 1800—1873) ——伯爵, 奥地利政府官員, 1850—1853年米兰城的总督。——第348頁。
- 斯維亚托斯拉夫·伊哥列維奇(Святослав Игоревич 約942—972) ——基輔大公(約945—972)。——第261頁。
- 菲茨罗伊, 亨利(Fitzroy, Henry 1807—1859)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1852—1855年是內务副大臣。——第254、255頁。
- 菲利莫尔, 約翰·乔治(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 ——英国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154頁。
- 菲茨威廉, 查理·威廉(Fitzwilliam, Charles William 1786—1857) ——伯爵, 英国議会活动家, 輝格党人。——第212、333頁。
- 菲克勒尔, 約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 ——德国新聞記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委員,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后迁英国。——第547頁。
- 莫帕, 沙尔勒曼·艾米尔(Maupas, Charlemagne-Emile 1818—1888) ——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1851),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

- 者之一,警察总长(1852—1853)。——第31、37頁。
- 莫里逊,詹姆斯(Morison, James 1770—1840)——英国商人,曾出售所謂“莫里逊氏丸”而大发橫財。——第542頁。
- 莫札特,沃尔弗干格·亞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偉大的奧地利作曲家。——第420頁。
- 斐迪南-奧古斯特-弗兰茨-安东(Ferdinand-August-Franz-Anton 1816—1885)——薩克森-科堡-薩尔菲耳德-科哈里亲王,葡萄牙女王瑪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的丈夫,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二世(1837—1853), 1853至1855年为王国摄政者。——第418頁。
- 斐迪南多-阿尔伯特-阿梅德奥(Ferdinando-Alberto-Amedeo 1822—1855)——热那亚公爵,撒丁国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兄弟。——第125頁。
- 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399頁。
- 博德金,威廉·亨利(Bodkin, William Henry 1791—1874)——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1841—1847), 1853年任檢察长。——第97頁。
- 博伊林,詹姆斯(Boylin, James)——倫敦郊区威·黑耳火箭工厂的職員。——第97頁。
- 博雅多,馬提奧·馬利阿(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詩人,长詩“恋爱中的罗兰”的作者。——第547頁。
- 塔克尔(Tucker)——倫敦出版商。——第612頁。
- 塔提舍夫,德米特利·巴甫洛維奇(Татище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家, 1826—1841年任駐維也納大使。——第220頁。
- 莱宁根-威斯特堡,克利斯提安·弗兰茨(Leinigen-Westerburg, Christian Franz 1812—1856)——伯爵,奧地利將軍, 1853年率領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第296頁。
- 萊佛尔斯,托馬斯·斯坦弗德(Raffles, Thomas Stan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員, 1811—1816年任爪哇的总督,“爪哇史”一书的作者。——第144頁。
- 提普·薩希布(Tippu Sahib 約1749—1799)——迈索尔的执政者(1782—1799); 十八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多次进行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擴張的战争。——第171頁。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革命的宪章派領袖之一,“北极星报”編輯之一,“寄語人民”和“人民报”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5、152、191—195、223、257、506、520、521、529、576、577頁。
- 隆格,約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神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資产階級服务,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547頁。
- 賀雷西(昆图斯·賀雷西·弗拉克)(Horatius, Quint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羅馬詩人。——第101頁。

黑耳, 威廉 (Hale, William) —— 倫敦郊区火箭工厂的厂主。——第 96—98、124 頁。

黑耳, 罗伯特 (Hale, Robert) —— 威廉·黑耳的儿子和同伙。——第 96—98、124 頁。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 109、541、545 頁。

腊斯顿, 本杰明 (Ruston, Benjamin 死于 1853 年) —— 英国工人, 宪章主义者。——第 195 頁。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fendi 1814—1869) ——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 56、122 頁。

費希巴赫 (Фишбах) —— 俄国將軍, 1853 年为多瑙河俄軍指揮官。——第 532 頁。

普魯士亲王 —— 見威廉一世。

十三画

奥斯丁 (Austin) —— 1853 年北明翰监狱副獄长。——第 343 頁。

奥斯曼-帕沙 (Osman Pasha 約 1785—1860) —— 土耳其海軍上将, 西諾普会战中为土耳其分舰队指揮官。——第 616 頁。

奥美尔-帕沙 (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1806—1871) —— 土耳其將軍, 克罗地亚人, 克里木战争 中土軍总司令。——第 351、355、380、472、481—483、485、486、507—509、511、515—517、530—534、581—583、585、586、618 頁。

奥斯本, 托馬斯, 1689 年起受封为卡馬

登侯爵, 1694 年起受封为里子公爵 (Osborne, Thomas 1631—171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首相 (1674—1679 和 1690—1695); 1695 年議会控告他有贪污罪行。——第 168 頁。

奥斯坦-薩肯, 德米特利·叶罗費也維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 ——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俄国南部軍队軍长 (1853—1854), 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司令 (1854 年底—1855 年)。——第 532 頁。

奥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 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167、168、173、394 頁。

奥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 —— 巴伐利亚王子, 后为希腊国王 (1832—1862)。——第 419 頁。

奥朗則布 (Aurangzib, Alamgir 1618—1707) —— 印度大莫臥儿王朝的赫諦沙赫 (1658—1707)。——第 144 頁。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 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455 頁。

奥康瑞尔, 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 —— 宪章运动的領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編輯, 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65—66 頁。

奥尔西尼, 費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 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 民族解放和意大利統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侖第三未遂而被处死。——第 574 頁。

奥勃萊恩, 威廉·史密斯 (O'Brien, William Smith 1803—1864) —— 爱尔

- 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青年爱尔兰”社右翼领袖，议会议员(1828—1831和1835—1849)；1848年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而以终身放逐代替，1856年被赦免。——第415页。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伯爵，1856年后受封为公爵；俄国军事及国家活动家，外交家；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第421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的王朝(1830—1848)。——第611页。
-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伦堡-施维林)(Orléans, Hélène, duchesse d'1814—1858)——法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289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4、167、168、188、231、289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80页。
- 路斯达洛，埃利塞(Loustalot, 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第125页。
- 雷姆佩尔，鲁道夫(Rempel, Rudolf 1815—1868)——德国企业家，在四十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563页。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 葛德文，亨利·托马斯(Godwin, Henry Thomas 1784—1853)——英国将军，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中的总司令。——第228页。
- 葛德里奇——见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89、393页。
-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伯爵，法国元帅，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第231页。
- 绥夫特，卓纳森(Swift, Jonathan 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兰人。——第257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47、557页。
- 狮子座——见鲁西扬，列汪。
-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科伦商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563页。

十四画

-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54)——伯爵，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第185、230、436页。
-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

- 官，社会主义者，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員；曾同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第 568、569 頁。
- 維卡里，海尔曼(Vicari, Hermann 1773—1868)——德国天主教高級僧侶，1842年起为夫賴堡(巴登)大主教。——第 574 頁。
- 維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詩人和政論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为“新萊茵报”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6 頁。
- 維多克，弗朗斯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一般认为“維多克回忆录”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騙子手的代名詞。——第 44、393 頁。
- 維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44、47、541—571 頁。
- 維多利亞(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 203、222、288、289、316、319、459、599、610 頁。
- 瑪丽—路易莎—費南达(Maria Louisa Fernanda 1832—1897)——蒙潘西埃公爵之妻，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的妹妹，公主。——第 415 頁。
- 瑪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3)，路易十六之妻，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524 頁。
- 瑪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女王(1829—1833)，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的摄政女王(1833—1840)。——第 419 頁。
- 瑪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 和 1834—1853)。——第 418 頁。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軍务大臣(1845—1846 和 1852—1855)和陸軍大臣(1859—1860)。——第 66、218 頁。
- 赫里斯，約翰·查理(Herries, John Charles 1778—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第 201、416 頁。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論家和作家。——第 321 頁。
- 蒙塞耳，威廉(Monsell, William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領袖之一；1852—1857年为軍械局秘书。——第 137、138 頁。
- 蒙潘西埃，安都昂·瑪丽·菲力浦·路易(Montpensier, Antoine Marie Philippe Louis 1824—1890)——公爵，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西班牙公主瑪丽—路易莎—費南达的丈夫，1868—1869年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第 416 頁。
- 蒙腊德，迪特列夫·哥特哈德(Monrad, Ditlev Gothard 1811—1887)——丹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首相兼财政

大臣 (1863—1864), 教育和宗教大臣 (1848 和 1859—1863); 在五十年代为民族自由党领袖。——第 502 頁。

福尔布斯, 查理 (Forbes, Charles) —— 苏格兰地主。——第 471 頁。

福克斯, 查理·詹姆士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领袖; 1783 年任波特兰联合内阁 (福克斯—諾思内阁) 的外交大臣。——第 138、169 頁。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 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150、418 頁。

十五画

德魯安·德·路易斯, 爱德华 (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 —— 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四十年代是溫和的奥尔良保皇派, 1851 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 (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 230、237、239、292、300、341、363 頁。

德律埃, 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 —— 瑞士国家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联邦委员会委员 (1848—1854), 1850 年是瑞士联邦主席。——第 107 頁。

德克尔, 卡尔 (Decker, Carl 1784—1844) —— 德国將軍和軍事著作家。——第 541 頁。

德勒穆伯爵, 約翰·乔治·兰頓 (Durham, John George Lambton 1792—1840) —— 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駐彼得堡大使 (1835—1837)。——第 446、457 頁。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 德国政論家, 最初是“眞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在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期間, 拥护馬克思和恩格斯; 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45、46、544 頁。

德穆兰, 卡米尔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 —— 法国政論家,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 329 頁。

德利烏斯 (Delius) —— 普魯士官員, 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議員 (1852—1853)。——第 33 頁。

德利烏斯, 卡尔 (Delius, Karl) —— 馬格德堡的商人。——第 33 頁。

德拉修斯, 阿倫·路易·弗雷德里克 (Delasusse 或 de la Susse, Aron Louis Frédéric 1788—1860) —— 法国海軍上將。——第 126 頁。

德拉奧德, 律西安 (Delahodde 或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 —— 法国政論家, 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警探。——第 44 頁。

德勒克呂茲, 路易·沙尔 (Delescluze, Louis Charles 1809—1871) —— 法国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由于遭受迫害而流亡国外; 1871 年是巴黎公社著名的活动家, 属于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 在街垒中牺牲。——第 477 頁。

魯西揚, 列汪 (Лусинян, Левон) —— 阿尔明尼亚大公, 政治冒險主义者, 流亡者; 1853 年住在英国。——第 156 頁。

魯散男爵, 阿尔卜·廉 (Roussin, Albin-

Reine 1781—1854) ——法国海軍上将,海軍大臣(1840、1843);1832—1834年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第420頁。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1585—1642) ——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紅衣主教。——第262頁。

緬施科夫,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 ——公爵,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軍总司令(1853—1855)。——第4、5、43、121、122、126、127、129、133、134、155、161、162、164、219、293、295—297、300、301、303、304、355、364、366、472、588、593頁。

摩耳斯沃思,威廉(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 ——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公共工程部长官(1853)和殖民大臣。——第56、219、290頁。

十六画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論的庸俗化者,“英屬印度史”一书的作者。——第169—170頁。

穆斯塔法-帕沙(Mustafa Pasha 約生于1796年)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53年5月至1854年5月任总理大臣。——第355、368頁。

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1769—1849) ——埃及执政者(1805—1849),实行过許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

年和1839—1840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222、231、408、420—424、426、594頁。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Mechmed Ali Pasha 1807—1868) ——土耳其軍事和国家活动家,1852年至1853年5月13日任总理大臣,后任陆軍大臣(1853—1854)。——第368頁。

霍格,詹姆斯·威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 ——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議會議員;1846—1847和1852—1853年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第141、143、253頁。

霍布豪斯,約翰·凱姆,布罗頓男爵(Hobhouse, John Cam, Baron Broughton 1786—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第157頁。

霍斯福耳,托馬斯·貝里(Horsfall, Thomas Berry 生于1805年) ——英国煤矿主和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托利党人。——第469頁。

諾思,弗雷德里克(North, Frederick 1732—1792)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財政大臣(1767),首相(1770—1782);1783年任波特兰联合內閣(福克斯—諾思內閣)的內务大臣。——第138、169頁。

諾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1797—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爱尔兰总督(1835—1839),陆軍和殖民大臣(1839),內务大臣(1839—1841);1846—1852年任駐

巴黎大使。——第 415 頁。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階級激进主义者;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46、546 頁。

賴辛巴赫, 奧斯卡尔 (Reichenbach, Oskar 生于 1815 年)——伯爵, 西里西亚的地主, 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1850 年起侨居英国, 后迁美洲。——第 548 頁。

賴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員, 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 477、568、606 頁。

十七画

謝努, 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約生于 1817 年)——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奸細和暗探。——第 44 頁。

謝特奈尔, 奧古斯特 (Schärttner, August)——海瑙的制桶匠, 1848 年革命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倫敦, 開設小飯館, 德国小资产階級流亡者常在那里聚集;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为該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員。——第 548 頁。

繆尔納, 阿道夫 (Müllner, Adolf 1774—

1829)——德国作家和評論家。——第 48 頁。

戴拉庫拉, 艾德門 (Delacour 或 de la Cour, Edmond 1805—1873)——法国外交家, 1853 年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第 23、126、293 頁。

十八画

薩德勒, 約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領袖之一, 1853 年任財政副大臣。——第 138 頁。

薩格登, 爱德华, 圣萊昂納茲男爵 (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 年为大法官。——第 285、417 頁。

薩尔达尼拔——見亚述巴尼拔。

薩尔梯柯夫, 阿列克塞·德米特利也維奇 (Салт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6—1859)——公爵, 俄国旅行家, 作家和艺术家, 1841—1843 和 1845—1846 年曾游历印度。——第 251 頁。

薩特倫德公爵夫人, 伊丽莎白·魯森-高尔, 斯泰福侯爵夫人 (Sutherland, Elizabeth Leveson-Gower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第 213、470 頁。

魏茲, 約翰·埃什弗德 (Wise, John Ayshford)——1853 年英国議會議員。——第 290 頁。

魏德迈, 約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曾参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 并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他为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傳播奠定了基础; 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67 頁。

十九画

龐森比, 約翰 (Ponsonby, John 約 1770

—1855)——子爵, 英國外交家, 曾任駐那不勒斯公使(1832), 駐君士坦丁堡大使(1832—1841)和駐維也納大使(1846—1850)。——第 426、459 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三 画

山魯亞爾——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東方的君主。——第 225 頁。

四 画

比爾奇, 哈爾威——菲·庫伯小說“間諜”中的主要人物。——第 44 頁。

文克里特, 阿爾諾德——半傳說中的瑞士戰士, 是為紀念 1386 年在森帕赫戰鬥中瑞士人戰勝奧地利哈布斯堡人而作的史詩“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第 547 頁。

五 画

瓦格納——歌德悲劇“浮士德”中的人物; 崇尚空論、脫離生活的煩瑣學者的典型。——第 418 頁。

札格納特——古印度神話中毗濕奴神的化身之一。——第 144、342 頁。

七 画

沙宰曼——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東方的君主。——第 225 頁。

八 画

阿拉丁——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神燈的所有者。——第 254 頁。

阿利曼——體現世上萬惡之源的古波斯神安赫腊曼紐的希臘名字。安赫腊曼紐同體現眾善之源的阿胡腊瑪士達(希臘名字叫奧爾穆茲德)有着永世不可調和的仇恨。——第 545、546 頁。

阿耳契娜——阿里歐斯托長詩“瘋狂的羅蘭”中的人物; 凶惡的女巫。——第 389、441 頁。

阿基里斯——希臘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臘英雄, 他同希臘人的領袖亞加米農的爭吵和回到自己的營幕去, 構成了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一章的情節。——第 128 頁。

抹大拉的馬利亞——根據福音書傳說, 她是基督的繼承者, 是一個悔過的罪人。——第 419 頁。

九 画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代名詞; 1712 年啟蒙作家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約翰牛傳”

問世后这个名詞就流傳开了。——第 214、292 頁。

柏克司尼弗——狄更斯小說“馬丁·切斯維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第 92 頁。

十 画

埃林杜尔——繆尔納戏剧“罪”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48 頁。

埃披門尼底斯——据古希腊神話的說法，是克里特島上酣睡了半个多世紀的祭司。——第 181 頁。

唐·吉訶德——是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第 89、228、393、399 頁。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小說“唐·吉訶德”中的人物；該小說中有一个情节：他被委任为一个虛构的島嶼巴拉塔利亚（西班牙文是《barato》，即“便宜的”之意，与俄文“便宜得来”之意接近）的总督。——第 89 頁。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第 418 頁。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他的十二件功績之一是馴服并搶走地獄之犬塞卜洛士。——第 83 頁。

十一 画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創始人。——第 549、558 頁。

十二 画

湯姆——比彻·斯托的小說“湯姆叔叔的

小屋”中的主要人物。——第 93 頁。

十三 画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話中看守地獄（亡靈在此受苦）大門的三头犬。——第 83 頁。

奧狄浦斯——古希腊神話特維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据傳說，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謎語，因而使特維城逃脫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 202 頁。

奧尔穆茲德——体现世上众善之源的古波斯神阿胡腊瑪士达的希腊名字。——第 545 頁。

十四 画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溫莎的風流娘儿們”、“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諧謔者，酒徒。——第 422、435 頁。

十五 画

摩拏——傳說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法典”是婆罗門僧侶在一至五世紀內編纂的。——第 120、201 頁。

魯杰罗——阿里欧斯托長詩“瘋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第 389 頁。

十八 画

薩米尔（薩馬伊尔）——据犹太神話說，是众魔之王，也是死神的化身。——第 556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出版。——第 49、55、65、76、95、327、329、387、470、494、562 頁。

三 画

“卫报”（《*The Guardian*》）——伦敦出版。——第 596 頁。

“卫星报”（《*Satellite*》）——特兰西瓦尼亚的喀琅施塔得出版。——第 331 頁。

“士麦那公道报”（《*L'Impartial de Smyrne*》）——第 278、332 頁。

四 画

“巴塞爾日報”（《*Basler Zeitung*》）——第 331 頁。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第 125 頁。

“日報”（《*Gazette*》）——見“奧地利帝國維也納日報”。

“太陽報”（《*The Sun*》）——倫敦出版。——第 334 頁。

“文件集”（《*The Portfolio*》）——倫敦出版。——第 185、437、453、458 頁。

五 画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第 433 頁。

“圣彼得堡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газета*》）——第 315 頁。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 292 頁。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 127、289 頁。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布魯塞爾出版。——第 289、331 頁。

“石印通訊”（《*Lithographic Correspondence*》）——見“普魯士石印通訊”。

“漢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第 267 頁。

“布勒斯勞报”（《*Breslauer Zeitung*》）——第 324 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22、23、128、314、332、462、473 頁。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維也納出版。——第 597 頁。

六 画

“先驅”（《*The Leader*》）——倫敦出版。——第 289、341、346 頁。

“先驅报”（《*Herald*》）——見“先驅晨报”。

“先驅者报”（《*Le Précurseur*》）——安特卫普出版。——第 556 頁。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倫敦出版。——第 20、22、93、129、161、166、275、429、473、492、590、598 頁。

“观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版。——第 289 頁。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倫敦出版。——第 119、163、346、358、372 頁。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見“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倫敦出版。——第 152、163、351、356、360、364、431、600 頁。

七 画

“邮报”（《*Post Zeitung*》）——斯德哥尔摩出版。——第 268 頁。

“邮报”（《*Post*》）——見“晨邮报”。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22、27—29、93、307、334、344、492、520、599、600 頁。

“每周快訊”（《*Weekly Dispatch*》）——倫敦出版。——第 496 頁。

“时代报”（《*Die Zeit*》）——柏林出版。——第 41、365 頁。

“劳埃德氏报”（《*Lloyd*》）——見“維也納劳埃德氏报”。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 315、512 頁。

“利物浦信使报”（《*The Liverpool Courier*》）——第 363 頁。

八 画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 266、316 頁。

“国家报”（《*Le Pays*》）——巴黎出版。——第 23、126、238 頁。

“国民議會报”（《*L'Assemblée nationale*》）

——巴黎出版。——第 164、238、330、360 頁。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 77 頁。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第 279 頁。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阿格拉姆（今薩格勒布）出版。——第 503 頁。

“官报”（《*Gazette*》）——見“倫敦官报”。

“的里雅斯特日报”（《*Triester Zeitung*》）——第 126 頁。

九 画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格斯堡出版。——第 133、452、593 頁。

“总邮报”（《*Ober-Postamts-Zeitung*》）——見“法兰克福邮报”。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5、23、125、278、358、360、602 頁。

“紀事报”（《*Chronicle*》）——見“紀事晨报”。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 22、51、59、93、158、163、268、330、347、351、357、462、464、592、598、600、604 頁。

“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見“国家报”。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240、268、503、564 頁。

“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倫敦出版。——第 341、375 頁。

“紅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倫敦出版。——第 562 頁。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出版。——第 121、134、351、360 頁。

“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 48、541、548、566 頁。

十 画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版。——第 21、22、27、71、78、82、83、87、93、121、127、129、130、133、135、151、155、158—162、163、165、178—181、183、210、215、216、253、255、273、345、346、352—353、356、358、360、369、438、450、464、470、478、492、509、576、588、593、595、600、603 頁。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倫敦出版。——第 320、500 頁。

“馬賽信使报”（《*Le Courrier de Marseille*》）——第 20 頁。

“馬賽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第 165 頁。

“紐約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見“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3、13、19、23、30、34、40、43、64、66、71、86、100、108、116、123、128、131、142、150、159、166、176、183、196、197、209、217、227、236、245、252、263、270、277、290、298、312、320、322、326、340、349、359、371、378、385、387、471、476、479、485、490、500、506、514、517、521、529、536、579、587、591、601、608、612、619 頁。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 126、219、267、272、462、568、

569 頁。

“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 456、458 頁。

十一 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 22、42、67、84、238、240、289、315、321、323、327、328、354、368、598 頁。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倫敦出版。——第 22、67、93、126、163、220、238、256、266、279、351、357、360、364、373、478、590—592、595、600、603 頁。

“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倫敦出版。——第 562 頁。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257、371 頁。

“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334 頁。

十二 画

“普魯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柏林出版。——第 41 頁。

“普雷斯頓舵手”（《*Preston Pilot*》）——第 520 頁。

“普魯士石印通訊”（《*Preussische Lit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 331 頁。

“联邦报”（《*Der Bund*》）——伯尔尼出版。——第 124 頁。

十三 画

“新聞报”（《*The Press*》）——倫敦出版。——第 155、160、198、287、602 頁。

“新聞报”（《*Die Presse*》）——維也納出版。——第 42、275、355、479 頁。

- “新聞報”（《*La Presse*》）——巴黎出版。
——第 126、231、259、491 頁。
- “新奧得報”（《*Neue Oder-Zeitung*》）——見
“奧得總匯報”。
- “新英格蘭報”（《*Neu-England-Zeitung*》）
——第 541 頁。
-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 272 頁。
-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倫敦，漢堡出版。——第
45、549 頁。
-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 117、321、
322、563 頁。
- “奧格斯堡報”（《*Augsburger Zeitung*》）——
見“總匯報”。
- “奧格斯堡報”（《*Augsburger Zeitung*》）——
見“總匯報”。
- “奧得總匯報”（《*Allgemeine Oder-Zeitung*》）
——布勒斯勞（今弗羅茨拉夫）出版。
——第 321 頁。
- “奧地利通訊”（《*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維也納出版。——第 4、
502 頁。
- “奧地利帝國維也納日報”（《*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第
414 頁。

- “瑞士”（《*La Suisse*》）——伯爾尼出版。
——第 125 頁。
-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
出版。——第 16、29、113、114、182、
238、268、346、497、499、518—520、522
—527、577、590 頁。
- “糧食交易所快報，農業報”（《*Mark-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倫
敦出版。——第 347、373 頁。
- “解放”（《*L'Emancipation*》）——布魯塞爾
出版。——第 42 頁。

十 四 画

- “漫遊者”（《*Der Wanderer*》）——維也納
出版。——第 331、503 頁。
- “維也納勞埃德氏報”（《*Wiener Lloyd*》）
——第 198 頁。

十 五 画

- “論壇報”（《*Tribune*》）——見“紐約每日
論壇報”。
- “墨爾本商業通報”（《*Melbourne Commercial Circular*》）——澳大利亞出版。
——第 495 頁。

二 十 画

- “議會報”（《*Il Parlamento*》）——都靈出
版。——第 275、331 頁。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倫——第 5、23 頁。
 土尔图凱（土特腊坎）——第 333、516、530、531、581—585 頁。
 土庫曼彻——第 401 頁。
 土尔克斯坦——第 15 頁。
 大西洋——第 104、216 頁。
 大諾夫哥罗德——第 14、261 頁。
 小亚細亞——第 7、304 頁。
 小瓦拉几亞——第 502、507、511、533 頁。
 上海——第 112、114 頁。
 广州——第 16、115、495 頁。
 也門——第 146 頁。
 土麦那（伊斯密尔）——第 165、219、239、276、278、295、331、332、430 頁。
 凡迪門島（塔斯馬尼亞島）——第 342 頁。

四 画

- 巴黎——第 5、46、47、106、121、125、132、134、164、185、238、258、265、289、290、300、301、316、321、349、351、365、408、437、464、477、478、491、595、606—608 頁。
 巴登——第 551、573 頁。
 巴特那——第 358、476 頁。
 巴士姆（巴士米）——第 129、487—490、512、602、617 頁。
 巴罗达——第 359 頁。

- 巴塞尔——第 104 頁。
 巴格达——第 15 頁。
 巴尔米拉——古代城市和古代国家。——第 146 頁。
 巴勒斯坦——第 7 頁。
 巴雅澤特（多古巴雅西特）——第 512、617 頁。
 巴尔干山脉——第 25、28、36、381—383、481、483、484 頁。
 巴尔干半島——第 36 頁。
 巴尔塔利曼尼——第 162、271、304、353 頁。
 比哈尔——印度的省。——第 171 頁。
 比斯开灣——第 129 頁。
 比碩夫斯海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頁。
 太平洋——第 599 頁。
 太恩河——在英国。——第 308 頁。
 太晤士河——第 255、325 頁。
 切斯特——第 566 頁。
 切尔奇-帕里什（切尔奇）——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頁。
 切尔克西亞——第 160、311、451—459 頁。
 日內瓦——第 104 頁。
 日德兰半島——第 274 頁。
 牛頓——第 589 頁。
 牛津郡——英国的郡。——第 496 頁。
 爪哇——島屿。——第 144 頁。
 夫賴堡——第 574 頁。

中亚細亞——第 171 頁。
厄尔布魯士山——第 444 頁。
什列斯維希——第 117、274、477、561 頁。
扎勃利亚克——第 503 頁。

五 画

布倫——第 605 頁。
布达——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的西岸地区。——第 104 頁。
布拉格——第 12 頁。
布哈拉——第 15 頁。
布魯薩(布尔薩)——第 259 頁。
布柯維納——第 9 頁。
布澤烏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 頁。
布魯塞爾——第 121、289、556、558、604 頁。
布勒斯勞(弗罗茨拉夫)——第 321、322 頁。
布來洛夫(布來拉)——第 446、507、508、530、535、618 頁。
布萊克本——第 189、374、468、503 頁。
布加勒斯特——第 20、38、162、220、267、272、273、355、481、508、509、511、516、531、534、586、618 頁。
布利斯托爾——第 173、189 頁。
布黎紀瓦特——第 374 頁。
布萊得弗德——第 371、466 頁。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415 頁。
卡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401 頁。
卡爾斯——第 129、488、512、513 頁。
卡利庫特(柯日科德)——第 358 頁。
卡拉法特——第 480、507、509—511、533、534、580、585、586、618 頁。
卡爾納梯克——印度的省。——第 170 頁。
卡爾斯多爾夫——第 552 頁。

卡姆契克河(卡姆契亞)——第 481、483 頁。
卡夫丁峽谷——卡夫丁城附近(古羅馬)。——第 222 頁。
卡特加特海峽——第 501 頁。
漢陽——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 111 頁。
漢堡——第 39、324、561 頁。
漢諾威——第 561 頁。
漢普郡——英国的郡。——第 475 頁。
加拉茲——第 15、133、355、447、530 頁。
加爾各答——第 140、170、247、250、358、359 頁。
加里西亞——第 10、18、272 頁。
加利福尼亞——第 112、369、493 頁。
聖阿爾班——第 344 頁。
聖彼得堡(列寧格勒)——第 12、16、38、132、133、162、197、221、259、266、267、272、278、279、300、305、310、311、313、357、365、420、421、430、444、457、503、572、604、613 頁。
聖讓得阿克(阿卡)——第 232 頁。
聖尼古拉碼頭(舍夫卡捷爾)——第 444、616 頁。
尼薩——巴尔干的一个居民点。——第 315 頁。
尼尼微——古代城市。——第 210 頁。
尼科波尔——第 384、508、533 頁。
北京——第 111、115 頁。
北明翰——第 308、343、374、398、467、475 頁。
北明翰区——第 189 頁。
古里亞——第 443 頁。
古巴島——第 175 頁。
古扎拉特——印度的省。——第 171 頁。
弗蘭德斯——第 145 頁。
弗里布爾——瑞士的州。——第 99、100、

124、132 頁。
 瓦尔那——第 382、481、483、485、508 頁。
 瓦拉儿亚——第 8、9、12、27、36、160、162
 —164、185、220、267、272、303、313、
 324、355、380、384、443、444、447、484、
 502、509、510、515—517、530—532、
 534、581、585、604 頁。
 印度河——第 15、16、141 頁。
 印度斯坦——第 115、143—147、149、
 246、253、359 頁。
 东吁——在緬甸。——第 319 頁。
 生河——在印度。——第 358 頁。
 皮蒙特——第 481、574、575 頁。
 平德列克利(埃列格利)——第 313 頁。
 幼发拉底河——在近东。——第 15、486、
 487 頁。

六 画

达卡——第 147 頁。
 达尔温——英国的盆地。——第 189 頁。
 达普——在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
 ——第 358 頁。
 达尔馬威亚——第 11 頁。
 达尔雅尔峡谷——在高加索山脉。——
 第 443 頁。
 达达尼尔海峡——第 5、14、16、17、126、
 135、162、163、298、302、350、353、372、
 430—432、443、449、595 頁。
 伊薩克查——第 491 頁。
 伊皮罗斯——第 10 頁。
 伊斯坦布尔——見君士坦丁堡。
 伊茲馬伊尔——第 383 頁。
 伊赫吉曼山隘——第 381 頁。
 伊奥尼亚群島——第 18 頁。
 安特卫普——第 324、553、556 頁。
 安提瓦利(巴尔)——第 18 頁。
 安提奥克(安塔基雅)——第 122 頁。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第 221、421、426
 —435、441、588、594 頁。
 安那托里亚——第 617 頁。
 亚尼納——第 36 頁。
 亚得利亚海——第 9、18 頁。
 亚平宁山脉——第 143 頁。
 亚历山大里亚——第 122、424、426 頁。
 亚历山得拉炮台——在高加索。——第
 457 頁。
 西萊丁——英国的郡。——第 195 頁。
 西諾普——第 602、603、613、614、616 頁。
 西西里島——第 143 頁。
 西斯托夫(斯維施托夫)——第 532 頁。
 多瑙河——第 7、9、11、14、17、21、133、
 160、212、237、279、318、365、366、379—
 384、443—451、463、480—486、491、
 502、503、507—514、517、530—534、580
 —583、586、594、595、611、618 頁。
 多尔尼-勒-格朗——瑞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 99 頁。
 多勃拉尔——巴尔干山脉的一个山隘。
 ——第 381 頁。
 艾尔威尔-魏尔——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468 頁。
 艾納德什克(伊涅杰克)——第 382 頁。
 艾尔斯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333 頁。
 托列斯-維德拉斯(托列治-維德拉什)
 ——第 482 頁。
 托倫蒂諾——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348 頁。
 托罗斯山脉——在土耳其。——第 420
 頁。
 米德——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頁。
 米兰——第 18、32、106、574 頁。
 匈牙利——第 11、15、18、261、272、305、

373、442、443 頁。
 华沙——第 38、383、407、408、413、464、481 頁。
 华盛顿——第 331 頁。
 地中海——第 16、18、28、121、240、275 頁。
 色雷斯——第 12、38 頁。
 吉耳弗德——第 599 頁。
 朴次茅斯——第 121、599、600 頁。
 乔罗赫河——在高加索。——第 488 頁。
 伏尔加河——第 14 頁。
 百蒙得錫郊区——现为伦敦的一个区。——第 342 頁。
 列杜特-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489、513 頁。
 好望角——第 416 頁。

七 画

貝恩利——第 468、493、589 頁。
 貝拉里——第 359 頁。
 貝耳島——在比斯开灣。——第 568 頁。
 貝魯特——第 262 頁。
 貝凱普——第 468、493、589 頁。
 貝凱普区——第 493 頁。
 貝拿勒斯——第 358 頁。
 貝捷克(貝希克)灣——在爱琴海。——第 221、278、295、302、309、352、463 頁。
 貝尔比斯郡——英屬圭亚那的郡。——第 416 頁。
 貝尔格萊德——第 11、39、315、381 頁。
 貝薩拉比亚——第 9、258、305、509 頁。
 里子——第 398、466 頁。
 里海——第 14、132、402、443、486 頁。
 里斯本——第 418 頁。
 里昂河(里奧尼)——在高加索。——第 487 頁。
 里斯康土——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

第 477 頁。
 苏格兰——第 70、75、92、336、370、470 頁。
 苏黎世——第 104、513 頁。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 332、333、381—384、481、483、508、618 頁。
 苏茹克-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451、453 頁。
 苏利納支流——在多瑙河三角洲上。——第 318、448—450 頁。
 沃倫——第 503、532 頁。
 沃倫省——第 268 頁。
 沃耳特(沃耳土)——第 488 頁。
 沃耳特尼察——第 507、516、530、531、534—535、580—582、585、586、596、618 頁。
 克里木——第 131、258、457 頁。
 克拉約瓦——第 355、384、507、509、533、580 頁。
 克拉科夫——第 316、410、414、417、445、449、594 頁。
 克罗地亚——第 11 頁。
 杜布諾——第 481 頁。
 杜罗河——在比利牛斯半島上。——第 424 頁。
 杜塞尔多夫——第 263 頁。
 沙瓦河——多瑙河流域。——第 7 頁。
 沙恩弗德——第 493 頁。
 希瓦——第 15、501 頁。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 380、480、482、534 頁。
 希魯茲布里——第 343 頁。
 运河——在中国。——第 114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18、324 頁。
 利物浦——第 151、152、173、189、344、448 頁。
 伯尔尼——第 124、132 頁。

来巴赫(柳布梁納)——第 5、123 頁。
 坎特布里——第 344 頁。
 那不勒斯——第 103、106、348、426 頁。
 辛辛那提——第 545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5、9、
 10、12、14—19、27—30、35、38、39、40、
 77、122、126、127、130、131、155、161、
 162、164、219—222、241、258—263、
 266、271、278、291、293—296、300、301、
 303—305、311、313—315、319、331—
 333、350、351、354、382—385、419、421、
 425—427、431、438、442、443、451、458
 —460、463、480、483、484、491、508、
 512、515、533、588、598、611、613、615、
 616 頁。

八 画

阿瓦——在緬甸。——第 319、475 頁。
 阿尔塔——第 18 頁。
 阿拉伯——第 145 頁。
 阿納帕——第 160、453 頁。
 阿姆河——第 501 頁。
 阿留塔(奥尔特)河——第 508、510、511、
 516 頁。
 阿勒頗(哈勒布)——第 315 頁。
 阿克頓——第 468 頁。
 阿达納——第 426 頁。
 阿格拉——第 242、358、359 頁。
 阿尔达汉——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
 第 512、513 頁。
 阿克林頓——第 493 頁。
 阿克尔曼(德涅斯特河上的別尔哥罗
 德)——第 402、403 頁。
 阿速夫海——第 316 頁。
 阿迪杰河——在意大利。——第 510 頁。
 阿迪斯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205 頁。

阿格拉姆(薩格勒布)——第 11 頁。
 阿哈尔齐赫——第 487、613、616、617 頁。
 阿尔明尼亚——第 7、8、27、129、156、
 486、487、616 頁。
 阿尔哲什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511、581、583 頁。
 阿腊克斯河——第 401、486—488 頁。
 阿姆斯特丹——第 416 頁。
 阿拉哈巴德——第 358 頁。
 阿尔巴尼亚——第 17、260、385 頁。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納)——第 36、122、
 129、160、162、221、278、381、382—385、
 402、421、430、431、438、444—449、452、
 454、457、460、481、594 頁。
 阿巴薩巴德——第 401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143 頁。
 阿斯特拉巴德——第 130、132 頁。
 阿希佩拉哥群島——在爱琴海。——第
 5、260 頁。
 波提——第 160、491 頁。
 波焦——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頁。
 波河——第 517 頁。
 波茨坦——第 237 頁。
 波斯灣——第 486 頁。
 波士頓——第 189 頁。
 波尔頓——第 189、374、467—469、505、
 589 頁。
 波斯尼亚——第 8、12、38、220、260、314、
 315、384 頁。
 波希米亚——見捷克。
 波罗的海——第 135、261、501 頁。
 波多尔斯克(赫梅里尼茨克)省——第
 268 頁。
 羅馬——第 261—263 頁。
 罗蒙——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頁。

罗陀斯島——在爱琴海。——第 60 頁。
 罗瑟海特——倫敦郊区。——第 96、97 頁。
 罗斯托克——第 324 頁。
 罗坦斯塔爾——第 493 頁。
 罗契得尔区——第 589 頁。
 拉合尔——第 358 頁。
 拉索瓦——第 508 頁。
 拉多加湖——第 17 頁。
 拉吉馬哈尔——第 358 頁。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 510 頁。
 明斯克省——第 268 頁。
 明格列里亞——第 131、443、617 頁。
 金角——港灣。——第 126 頁。
 金德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93 頁。
 图兰(土尔克斯坦)低地——第 14 頁。
 图諾拿(朱木拿)河——在印度。——第 358 頁。
 孟买——印度的城市 and 管区。——第 170、242—244、251、358、359 頁。
 孟加拉——印度的管区。——第 141、143、148、170—171、228、229、242—243、251 頁。
 彼特拉——古代城市。——第 146 頁。
 彼得瓦尔登(彼得罗瓦拉丁)——第 220 頁。
 帕迪罕——第 493 頁。
 帕尔馬——第 574 頁。
 武昌——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 111 頁。
 卑謬——緬甸的一个居民点。——第 476 頁。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东岸地区。——第 39 頁。
 坦比哥——第 453 頁。
 直布罗陀——第 17 頁。

居塔希亞——第 425、426 頁。
 林格伍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9 頁。
 松德海峽(厄勒海峽)——第 17、135、501 頁。
 杰尔庫姆-卡列——高加索的海岸要塞。——第 513 頁。
 法尔瓦尼区——在瑞士。——第 99 頁。
 的里雅斯特——第 18、319 頁。
 底格里斯河——在近东。——第 15 頁。
 迭麦拉拉郡——英屬圭亞那的郡。——第 416 頁。
 依麦列梯亞——第 443 頁。
 拉芒什海峽——第 163、588 頁。
 些耳德河——第 424 頁。
 門的内哥罗——第 13、21、380、384、503 頁。

九 画

南京——第 114 頁。
 南威克——第 192 頁。
 南安普頓——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42 頁。
 南高加索——第 488、617 頁。
 南卡罗来納——美国的一个州。——第 216 頁。
 哈姆——第 563 頁。
 哈佛尔——第 39 頁。
 哈特福郡——英国的郡。——第 497 頁。
 哈里法克斯——第 195、222 頁。
 哈尔德伐尔——第 250 頁。
 科倫——第 32、33、44、45、324、545、558、562—565 頁。
 科尼亞——第 420、423 頁。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324、348 頁。
 科尼斯霍芬——第 573 頁。

威根——第 374、492、493、503、504 頁。
 威尼斯——第 207 頁。
 威尔士——第 319、325、466 頁。
 柯恩——第 468 頁。
 柯夫諾(考納斯)省——第 268 頁。
 美索不达米亚——第 145、304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47、563 頁。
 耶拿——第 510 頁。
 耶路撒冷——第 122 頁。
 柏立——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468 頁。
 柏林——第 31—33、45、46、96、106、131、265、266、322、324、464、478、502、563、564、572 頁。
 洛桑——第 99 頁。
 香港——第 115 頁。
 威海——第 501 頁。
 恆河——在印度。——第 358 頁。
 勃固——緬甸的省。——第 228、229、319 頁。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 104、148、152、191、256、343、371、375、494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18、324 頁。
 約克郡——英国的郡。——第 152、191、343、470、494、497 頁。
 叙利亞——第 304、512 頁。
 信德省——在巴基斯坦。——第 15、171、204 頁。
 保加利亞——第 38、261、304、384、491、594 頁。
 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島。——第 28 頁。

十 画

馬賽——第 358 頁。
 馬其頓——第 12、17、38、384、480 頁。
 馬六甲——第 228 頁。

馬德拉斯——印度的城市和管区。——第 170、242—244、251、358 頁。
 馬格德堡——第 33、542 頁。
 馬里乍河——第 36 頁。
 馬尔他島——第 5、18、129、164、430 頁。
 馬尔卡河——在高加索。——第 478 頁。
 庫尔——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342 頁。
 庫尔兰(庫尔澤姆)——第 131 頁。
 庫楚克-凱納吉(凱納吉)——第 122、221、260、458、472、594 頁。
 庫班河——第 443、455、513 頁。
 庫拉河——第 487、617 頁。
 庫尔迪斯坦——第 380 頁。
 庫列夫查(居列夫查)——巴尔干的一个居民点。——第 7、382 頁。
 特尔尼——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348 頁。
 特薩利亞——第 10、17 頁。
 特林泰姆——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 頁。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 10、15—17、129、420、443、485、487、490 頁。
 特兰西瓦尼亞——第 9、10、272 頁。
 特兰西瓦尼亞阿尔卑斯山脉——第 510 頁。
 埃內茲——第 275 頁。
 埃里溫(耶列溫)——第 401、488、617 頁。
 埃士頓——第 589 頁。
 埃士頓区——第 589 頁。
 埃塞基博——在荷屬圭亞那。——第 416 頁。
 埃尔斯倫(埃尔祖魯姆)——第 421、487—490、512 頁。
 海牙——第 77 頁。
 海德——第 589 頁。
 海格——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04

- 頁。
 海利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05 頁。
 烏尔未汉普頓——第 374 頁。
 格拉斯哥——第 374、445 頁。
 格連加里——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470 頁。
 格洛索普——第 589 頁。
 格尔拉赫斯海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頁。
 格魯吉亞——第 131、316、443、444、487、491、513、597、616 頁。
 格罗德諾省——第 268 頁。
 格律恩斯菲尔德——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頁。
 紐約——第 16、263 頁。
 紐切爾奇——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93、589 頁。
 紐沙特爾——瑞士的州。——第 102、125 頁。
 納瓦林(皮洛斯)——第 26、36、221、400、425、594 頁。
 納希切萬——第 401 頁。
 爱尔兰——第 69、73、75、82、84、92、137、143、180、182、253、256、257、265、285、286、324、397、421 頁。
 爱丁堡——第 475、493 頁。
 高加索——第 443—445、460、461、478、485、486、532、488—490、513、535、613、614 頁。
 高止山脉——在印度。——第 248、358 頁。
 倫敦——第 4、5、20、32、42、43、45、96、113、121、156、161、172、173、182、231、254、255、258、264、269、289、299、316、324、351、360、365、369、372、402、422、437、444、445、448、451、463、467、491、542、544、557、561、563、564、575、594、599、600 頁。
 倫巴第——第 43、108、143、348、373、510、517 頁。
 哥特蘭島——波罗的海的島嶼。——第 501 頁。
 哥本哈根——第 77、269、393、477、501 頁。
 宾格利——第 468 頁。
 班斯里——第 189 頁。
 旁遮普——第 15、171、242、359、501 頁。
 敖德薩——第 15、126、213、300、305、324、331、366、445、447、489、532、602 頁。
 索非亞——第 381、384、480、508、515、533 頁。
 席尔河(日伊烏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508、510 頁。
 泰尔諾夫——第 414 頁。
 烏特烈赫特——第 415 頁。
 恩菲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頁。
 柴郡——英国的郡。——第 375 頁。
 茹尔日沃(朱尔朱)——第 403、507—509 頁。
- ## 十 一 画
- 基輔——第 261 頁。
 基輔省——第 268 頁。
 基利亞——第 5 頁。
 基特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頁。
 基尔梅赫姆——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66 頁。
 基耳馬尔諾克——第 374 頁。
 基台尔明斯特——第 189 頁。
 莫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402 頁。
 莫斯科——第 11、133 頁。
 莫茲多克——第 443 頁。
 莫尔达維亞(莫尔多瓦)——第 8—10、
 27、36、160、162—164、185、220、267、
 272、303、313、315、355、380、381、384、
 443、444、447、604 頁。
 設刺子——第 15 頁。
 設菲尔德——第 333、368 頁。
 捷克——第 118、261 頁。
 捷列克河——第 513 頁。
 曼成——第 491、574 頁。
 曼彻斯特——第 46、76、141、152、189、
 284、356、357、374、398、465—467、469、
 475、493、505、521、548、577、589 頁。
 得比——第 469 頁。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 375 頁。
 悉尼——第 16、371 頁。
 教皇国——第 348 頁。
 密卡岱——在緬甸。——第 319 頁。
 鹿特丹——第 324 頁。
 梅德斯頓——第 97 頁。

十二画

斯坦福——第 493 頁。
 斯泰福——第 368 頁。
 斯利特——哥特兰島上的筑壘要点。——
 第 501 頁。
 斯拉廷納——第 509、517 頁。
 斯凯尔斯-奥尔查德(斯凯尔斯)——英国
 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 頁。
 斯拉窩尼亞——第 11 頁。
 斯德哥尔摩——第 131、268 頁。
 斯泰里布雷芝——第 468、589 頁。
 斯特拉斯堡——第 605、606 頁。
 斯托克波特——第 151、189、190、468
 頁。

斯比脫菲尔茲——第 189 頁。
 斯比特海德海峽——第 121 頁。
 黑森——第 565 頁。
 黑海——第 11、14—16、21、28、29、129、
 135、160、165、221、259、298、313、366、
 381、382、432、443、445、450、451、454、
 455、486—488、491、595、597、599、602、
 613、616 頁。
 黑林山脉——第 14 頁。
 黑石山脊——英国地名,为一小丘。——
 第 191、195 頁。
 黑塞哥維那——第 8 頁。
 塔霍河——在比利牛斯半島上。——第
 424 頁。
 塔納——第 358 頁。
 塔雷什——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
 第 401 頁。
 塔千罗格——第 15 頁。
 普納——第 359 頁。
 普雷茲——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頁。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 333 頁。
 普雷斯頓——第 374、467—469、493、504、
 520、521、528、590 頁。
 普魯特河——第 197、237、238、279、295、
 305、363、379、463、531、532、597 頁。
 萊蒂(萊佳)島——位于多瑙河三角洲。
 ——第 448 頁。
 萊斯特——第 466 頁。
 萊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475 頁。
 菲力浦港——在澳大利亞。——第 496
 頁。
 菲力浦堡(普罗夫迪夫)——第 381 頁。
 都諾——第 507、508 頁。
 都拉索(都勒斯)——第 18 頁。
 廈門——第 495 頁。
 雅西——第 133、267、272、273、481 頁。

腊万納——第 348 頁。
 溫泉关——希腊山隘。——第 551 頁。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 443、487、
 488、512、513、617 頁。
 惠特奈尔——第 468 頁。
 提尔西特(苏維埃斯克)——第 5、123
 頁。
 喀琅施塔得——在特兰西瓦尼亚。——
 第 331 頁。
 喜馬拉雅山脉——第 143、253 頁。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14、16、17、26、27、
 37、420、485、614 頁。

十三画

奥尔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13、374、468 頁。
 奥腊什——第 480 頁。
 奥里薩——印度的省。——第 171、252
 頁。
 奥查科夫——第 383 頁。
 奥提尼伊——瑞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 99 頁。
 奥斯坦德——第 39、554 頁。
 奥里繆茨(奥洛摩茨)——第 355、464、
 478 頁。
 塞凡湖——在高加索。——第 401 頁。
 塞爾維亞——第 8、12、27、38、39、259、
 260、303、314、384、480、511、515、533、
 586、589、595、618 頁。
 塞勒特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
 509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4、350、420、451、
 452、532、614、615 頁。
 新堡——第 308、368 頁。
 新加坡——第 228 頁。
 頓河——第 14 頁。
 滑铁卢——第 483 頁。

雷佐溫——第 325 頁。
 路易吉安那——第 574 頁。

十四画

維丁——第 384、480、491、503、508—
 511、516、530、531、580、586、618 頁。
 維也納——第 4、6、7、11、42、106、124、
 125、131、134、143、240、258、265、266、
 268、272、279、292、301、302、313、352、
 355、364、365、406、410、411、412、415—
 417、437、446—450、462、464、472、473、
 486、491、502、507、531、572、592、594、
 598、604 頁。
 維罗那——第 5、123、399、402 頁。
 維爾納(維爾紐斯)省——第 268 頁。
 赫尔(哈尔)——第 255、344 頁。
 赫拉特——第 501 頁。
 赫尔辛格——第 17 頁。

十五画

德里——第 140、227、358 頁。
 德森(提契諾)州——在瑞士。——第 342
 頁。
 德黑兰——第 15、131 頁。
 德勒穆——第 223 頁。
 德勒斯頓——第 131 頁。
 德布勒森——第 38 頁。
 德干高原——在印度。——第 143 頁。
 德涅泊河——第 14、532 頁。
 德涅斯特河——第 9、14 頁。
 摩地那——第 574 頁。
 摩里亞(伯罗奔尼撒)半島——第 11、36
 頁。
 摩拉瓦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12
 頁。
 撒丁島——第 106 頁。
 撒哈拉——第 145 頁。

魯舒克(魯塞)——第 482、507、508、510、
516、533、618 頁。

魯美利亚——第 275 頁。

劍橋——第 344 頁。

緬甸——第 175、204、228、229、319、475
頁。

黎巴嫩——第 7 頁。

墨爾本——第 371、545 頁。

十六画

霍亭——第 481 頁。

霍姆斯——第 420 頁。

霍尔施坦——第 117、274、477、561 頁。

霍耳博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255 頁。

諾定昂——第 65、189、466、467 頁。

諾瓦拉——第 517 頁。

諾依达尔特——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
——第 470 頁。

錫蘭——第 143 頁。

錫利斯特里亚(錫利斯特拉)——第 261、
333、380—384、508、516、618 頁。

澤稷島——海峽群島之一。——第 606
頁。

澤姆林(澤蒙)——南斯拉夫城市。——
第 165 頁。

十八画

薩爾賽達島——第 144 頁。

薩拉密斯島——在愛琴海。——第 161
頁。

檳榔嶼——在馬六甲海峽。——第 228
頁。